一代伟人

评点圈注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红旗出版社

一代伟人
评点图注

毛泽东

评点古今诗文书章

《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史记》严格、准确。"相砍书"《左传》砍的战争有些少。行武出身的人要读《吕蒙传》。《朱元璋传》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甲申三百年祭》被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柳文指要》可谓解柳全书。《经史百家杂钞》尽抡四部精要。

ISBN 7-5051-0242-7

9 787505 102422 >

ISBN 7-5051-0242-7/A · 8

定价：75.00元(全三册)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柳文郁
唐　夫　主编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唐夫主编. -北京：
红旗出版社，1998.9
ISBN 7-5051-0242-7

Ⅰ.毛… Ⅱ.唐… Ⅲ.古体诗-文学评论-中国 古代Ⅳ.
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994 号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主　　编　柳文郁　唐　夫　　封面设计　李 法 明
责任编辑　刘玉成　　总 策 划　天方文化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利民印刷厂印刷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45 印张　插图 24 页　100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套　定价：75.00 元(上、中、下)

ISBN 7-5051-0242-7/A·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962年毛泽东在火车上看书



1953年毛泽东观察中国古画



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的木床。床上的毛巾被有许多补丁。右边放的书是为了便于随时阅读



毛泽东和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合影。



这个持枪证是 1950 年 12 月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按规定签发给毛泽东的，实际上并未给他配发枪支。



毛泽东阅读过的《资本论》等书。



1946年毛泽东在审阅文件



堪称双绝的毛泽东签名和印章



著名篆刻家邓散木为毛泽东治的印。受到毛泽东的喜爱。



毛泽东穿过的绒布睡衣，肘部打了补丁。



1961年毛泽东在读书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厅



1954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宪法草案



毛泽东身穿羊毛衫、在躺椅上休息



1946年毛泽东在枣园窑洞工作



1949年，毛泽东和长子毛岸英（右二）、儿媳刘松林（右一）、女儿李讷在北平香山



1951年8月9日，毛泽东同长女李敏、次女李讷等在香山讲故事



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看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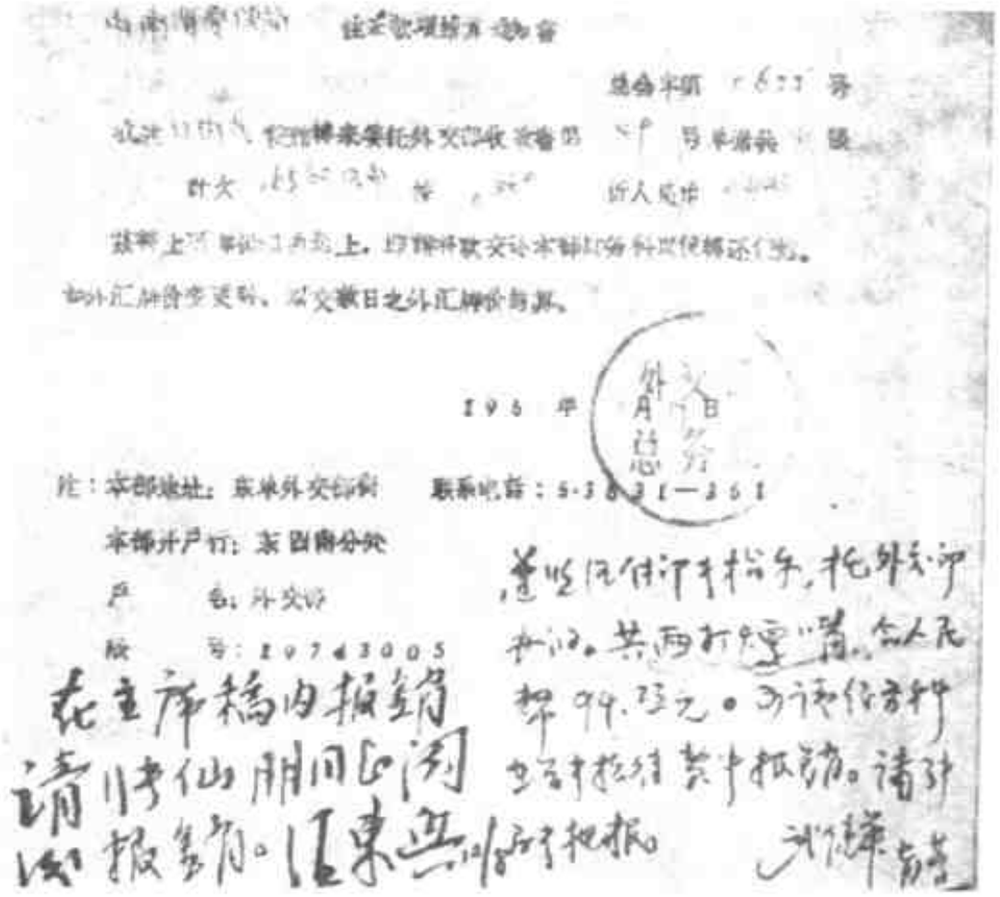
毛泽东观看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时和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握手



毛泽东的餐厅除了一张饭桌与一只饭篮外，俨然就是一间书屋。



女团员们争相为毛泽东点烟



毛泽东抽烟多，经外交部买了两打带过滤嘴的烟嘴，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在他自己的稿费中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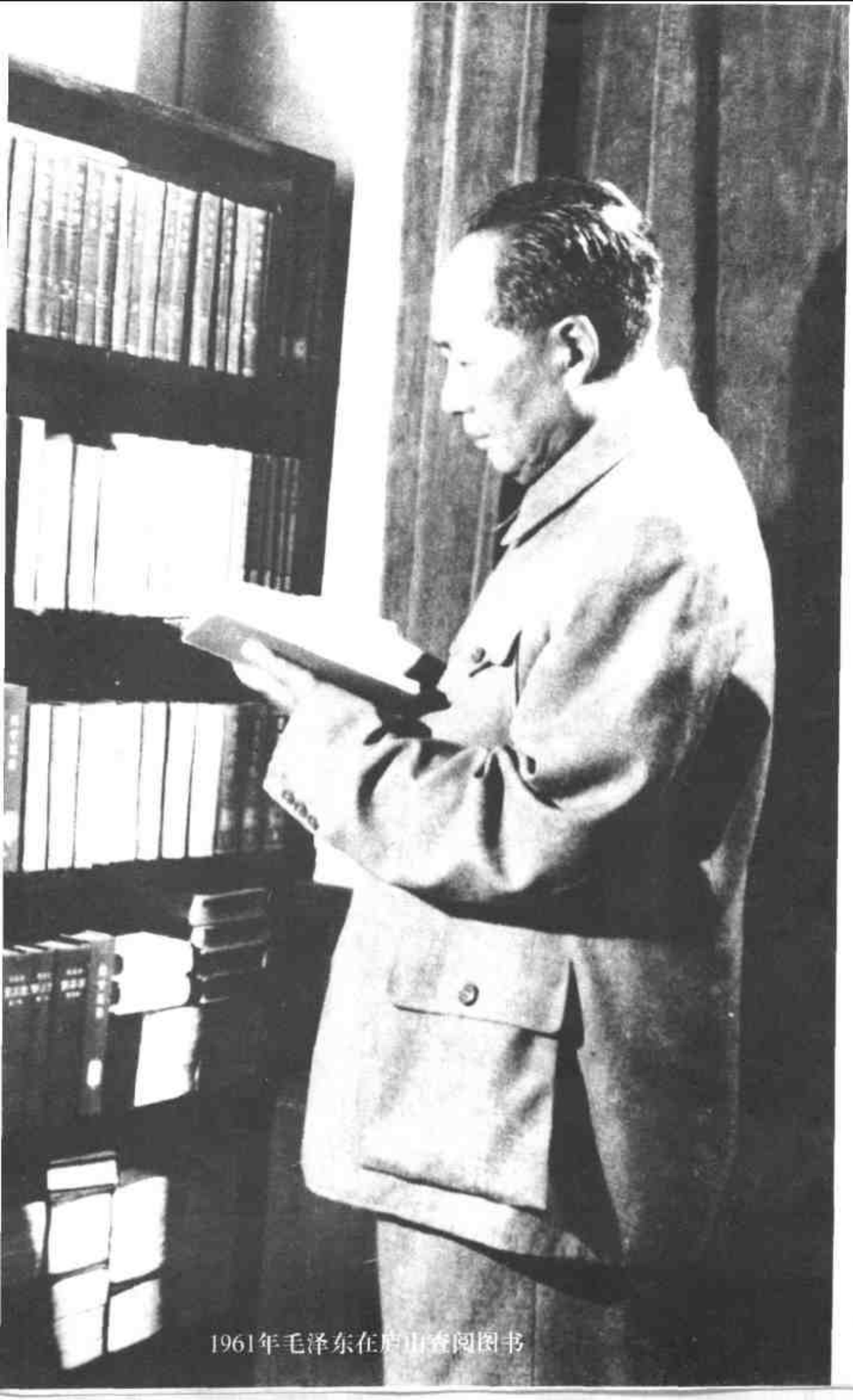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使用过的购货证及留下的购货券



1954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宪法草案



毛泽东阅读过的《资本论》等书。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胡绳、田家英一同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和有关同志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



毛泽东晚年搬进中南海游泳池附近居住。他经常在这里游泳。

目　录

（上册）

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 …… (1)

毛泽东对于二十四史的历史价值非常重视，他一生不仅通读过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重点篇章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的真实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史记》严格、准确 …… (13)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名著《史记》，深受毛泽东的喜爱。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书本身的严格准确，更由于作者司马迁为了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搏斗的精神……

毛泽东评点《汉书》 …… (26)

《汉书》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

东读《汉书》，尤其喜欢读《赵充国传》。敢于坚持真理的西汉名将赵充国，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

毛泽东评点《后汉书》 …… (45)

毛泽东尽管对《后汉书》的文采很欣赏，但却对东汉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不过，由于东汉的士大夫很讲求气节，因而毛泽东读《后汉书》对也很注重东汉士大夫的节操。

毛泽东评点《晋书》 …… (53)

士大夫的操行和所谓的"五胡乱华"，是两晋时期比较突出的问题。毛泽东读《晋书》，很注重对两晋时代特色的把握，高屋建瓴地用批注的形式对其加以准确的评价。

毛泽东评点《隋书》 …… (61)

隋朝与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完成了中国统一的王朝，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人们通常都习惯性地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炀帝的暴政，但毛泽东却能以敏锐的历史目光，从隋文帝身上看到"蕴藏大乱"。

毛泽东评点《南史》 …… (67)

毛泽东对《南史》情有独钟。李延寿所记叙的梁武帝、韦叡、曹景宗、陈庆之等个性突出、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他或发感慨，或表钦佩、或加批评，在《南史》上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评点《北史》 …… (97)

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毛泽东读《北史》，对战争中必然会出现的战俘问题非常关注。他对《王建传》的批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战俘问题，显得凝炼而深刻。

毛泽东评点《旧唐书》 …… (102)

毛泽东喜欢读《旧唐书》，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他在读《旧唐书》时，很注意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唐朝的兴衰成败，用简洁的批注表达对各类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褒贬。

毛泽东评点《新唐书》 …… (116)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一个王朝，但也是各类政治问题显得比较突出的一个历史时代。毛泽东读《新唐书》，写了不少的批注，对唐代的

立储、开元之治、藩镇割据等问题尤为注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旧五代史》 …… (130)

《旧五代史》因其本纪部分的史料最为充实，将五代嬗递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实，因而毛泽东读《旧五代史》与读《新五代史》的侧重面有所不同，比较注意对后梁和后唐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

毛泽东评点《新五代史》 …… (142)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之间的兴废和争霸战争连绵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当时的残酷的战争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正面或反面的军事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就尤其注重总结这一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评点《宋史》 …… (150)

两宋是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再度崛起的时期。北宋先后与辽、夏对峙而终亡于金，南宋先后与夏、金、蒙古并立而终亡于元。因此，毛泽东读《宋史》，很注意研究两宋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问题。

毛泽东评点《明史》 …… (159)

毛泽东读《明史》留下的批注不多。他读《明史》比较注意明代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对《明史·宣宗纪》的批注，很能说明他的这个政治取向以及读史联系实际的特色。

"相砍书"《左传》砍的战争有点少 …… (166)

毛泽东看《左传》与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角度。毛泽东从《左传》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统计，《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但他对《左传》中描写战争的文字所占比重偏小却有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元史纪事本末》 …… (174)

《元史纪事本末》记述了元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是一部学习元朝历史的入门性史书。毛泽东阅读了这部书，并对书中所记的某些战争作了批注，从中可以看出他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敏锐的洞察力。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 (180)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极为喜爱的一部历史

巨著。他不仅自己读过17遍，还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和谈论此书。关于这部书，毛泽东既提出了中肯的评价，也提出了阅读这部书应采取的态度，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评点《通鉴纪事本末》 …… (197)

《通鉴纪事本末》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采用纪事本末体例的历史著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部史书，并作了许多圈点批注，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毛泽东评点《读通鉴论》 …… (213)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撰写的一部史论名著。毛泽东认真阅读、批注了这部书，他对王夫之的观点，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两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看待历史问题时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毛泽东评点《智囊》 …… (223)

《智囊》是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集的一部笔记小说。毛泽东很爱读这部书，在书中作了许多批注，涉及他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行伍出身的要读《吕蒙传》 …… (241)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公安部

长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谈到了这篇《吕蒙传》，并说，行伍出身的要读此传，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后，还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干警学习。

《张鲁传》值得一看 …… (252)

1958年，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指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当时，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兴起，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是意味深长的。

《郭嘉传》值得一读 …… (265)

《郭嘉传》是《三国志》里有名的一篇，主要讲述了三国时期曹操的谋臣郭嘉多谋善断的故事。毛泽东对《郭嘉传》评价甚高。他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号召各级干部要多谋善断，提出建议：《郭嘉传》值得一读。

《黄琼传》、《李固传》可读 …… (274)

《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两篇人物传记，但毛泽东所看重的主要是李固。毛泽东之所以对《后汉书·黄琼传》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后汉书·黄琼传》记录了李固给黄琼的书信。

《朱元璋传》用力甚勤，掘发甚广 …… (291)

《朱元璋传》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撰写的一部史学力作。对于这部书，毛泽东不仅作了很高的评价，还对它的修改与再版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这充分体现了领袖对史学家的极大关怀。

《李自成》写得不错，要让姚雪垠继续写下去 …… (298)

对李自成起义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将姚雪垠这位作家与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成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得以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

《永昌演义》赞美个人品德，贬抑整个运动 …… (307)

《永昌演义》四十年代在陕西广为流传。1944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该书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并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 (317)

该书在延安出版后，毛泽东立即阅读，读后

非常高兴，还特意请作者吃了一顿饭，并建议以后写的再大一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毛泽东自豪地认为该书的出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本国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甲申三百年祭》被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 (325)

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共产党，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因此，毛泽东与党中央把此文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十批判书》崇儒反法 …… (339)

1973年5月，江青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供批判用的，并顺口念了一首诗，将《十批判书》作为学术上崇儒反法的代表作。

《奴隶制时代》中提出的历史分期有道理 …… (354)

《奴隶制时代》出版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收藏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阅读时所作的标记。毛泽东对该书中提出的

历史分期很感兴趣，并赞成郭老的古史分期说。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表明作者敢于站起来说话了 …… (359)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撰写的一篇历史理论文章。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

《柳文指要》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 …… (371)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毛泽东更推崇柳宗元。因此，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也多加关注，为使此书能顺利出版，毛泽东专门致信当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但此书的出版仍一波三折，毛泽东对此书的评价则是一分为二。

《经史百家杂钞》尽抡四部精要 …… (380)

毛泽东曾将曾国藩编撰的《经史百家杂钞》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加以比较，认为后者“畸于文”，而不及经史；前者则两者兼备，是学习国学的入门书。毛泽东还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研读此书的方法。

《共产党宣言》等书讲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 (384)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较早读到也是印象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之一。这本书不仅使他确立了自己的终生信仰，而且教给他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共产党宣言》伴随了毛泽东光辉战斗的一生。

马克思写出《资本论》不是偶然的 …… (395)

《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评点这本书更侧重这部巨著产生的条件，以及在这部书中体现出来的辩证逻辑的强大力量。

读了《“左派”幼稚病》才知道“左”
与右同样有危害 …… (404)

毛泽东读这本书时，正值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革命事业因此遭受严重破坏，毛泽东本人也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因此，他深有感触地对彭德怀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清楚了 …… (413)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列宁的

著作。毛泽东对中南局负责人说，他是先读列宁的作品，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国家与革命》是毛泽东接触最早也是最喜爱的列宁的著作。这本书对毛泽东的革命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册）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告诉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 (429)

1933 年，毛泽东将此书寄给彭德怀，并在信上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此书为证，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可以澄清混乱思想 …… (44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在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1958 年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要求学习这本书，以此来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 …… (453)

毛泽东重视此书，与当时正在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关。它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提出的逐步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参考，这即“很有启发”。“相当不足”是指什么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创造了苏联 …… (461)

这本书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赞扬此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提议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这本书为中心材料。虽然今天看来这本书还有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知晓这一切。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470)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虽然有不少缺点，毛泽东还是很重视。1959 年庐山会议初

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这本教科书。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读这本书是比较好的办法。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 (493)

《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至少读了10遍，足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在长达3400多字的批注中，毛泽东在很多地方已超出了原书的思想深度，并表明了对有关的哲学重大问题的见解。

《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书 …… (501)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真理，感召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并成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开拓性著作。毛泽东评价它是“通俗”而“有价值”的。

《哲学与生活》更深刻 …… (511)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与他发愤读书，加强理论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从他给艾思奇的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求知中表现出来的严谨认真，虚怀若谷、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

《〈实践论〉解说》写得极好 …… (523)

1950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立即撰文加以解说。为了做到完整准确地讲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修改。这不仅是对李达个人的支持，也是对用通俗化的语言宣传唯物论的支持。

《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 (530)

《盛世危言》是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刚满13岁，辍学在家务农，这本书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不久他上了东山高小，独自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革命军》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 (535)

1958年成都会议前夕，毛泽东抽空“望了一下”邹容的《革命军》，并且在会上推荐给大家读。他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赞扬《革命军》很好读。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它呢？

《大同书》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道路 …（561）

在评述《大同书》9年后，在理论上找到了通往大同之路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中作了一次实现大同社会的尝试。不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彻底从《大同书》描写的空想社会模式中摆脱出来。

《一种清醒的作法》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573）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写的研究东西方关系的著作。毛泽东看过之后，又将它推荐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这是必读之书。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他在书里看出什么了呢？

《论语》有一部分真理 ……（578）

《论语》是儒学经典，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部著作的评价，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致的。但总的讲还是一分为二，肯定其中有部分真理。我们对毛泽东对《论语》及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各地理解。

《老子》中有辩证法 ……（594）

毛泽东很欣赏《老子》这部道家经典中的辩

证法思想，并称赞老子这个人很老实，搞阴谋，写在书上，并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例。他还曾饶有兴味地阅读中国哲学界讨论《老子》的有关材料。

《中庸》里有为学之道 …… (609)

毛泽东读书往往抱有双重目的，其一汲取思想资源；其二学习治学方法。对《中庸》的研习，一方面使他批判地吸取了中庸范畴所表达的“无过无不及”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使他认识到博学作为为学之道之于求知的重要性。

《庄子》中有真理 …… (624)

对《庄子》这部集中反映道家风貌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爱。他将《逍遥游》中鲲鹏的形象入诗，用来表达自己的高远志向与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还从中挖掘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以启发当代科学的研究。

《墨子》——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 (639)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称赞他在中国找出了赫拉克利特，即墨子。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墨

《中国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
…… (682)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考、伦理观念紧密结合，同时，因为论战的需要，吕振羽按照中国哲学史的脉络写成了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及对哲学史的叙述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形而上学 …… (693)

毛泽东与《简明哲学辞典》的主编之一尤金关系甚密。但对他的这部书却颇多微词。毛泽东对其中“同一性”一条的批评，不单是指的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伦理学原理》越读越有趣味 …… (705)

青年毛泽东认为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这一根本问题，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国民精神处着手。因此，他十分醉心于哲学研究。《伦理学原理》批语集中地反映了其当时的哲学主张、见解和思维水平。

《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 (721)

毛泽东是由一个《天演论》和进化论的信奉者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天演论》作出审视和批判，肯定其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成分，指出其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成分。

《金刚经》很值得一看 …… (736)

毛泽东读过一些佛学经典，早年还信佛，他在与班禅的谈话中，曾饶有兴味地谈起《金刚经》，认为“值得一看”。做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为什么要读《金刚经》呢?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 (743)

《六祖坛经》是记录禅宗南宗开创人慧能的行迹与语录的佛学经典。毛泽东称这部著作是劳动人民的，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

《逻辑与逻辑学》颇为新鲜 …… (752)

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爱读逻辑学书，热衷于逻辑这一方法、工具的探究、掌握与运用，是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典型侧面。潘梓

年《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在激起毛泽东浓厚兴趣的同时，更启迪了他对逻辑的认识。

《逻辑指要》足以为今日之参考 …… (758)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解放前的旧作。1959年根据毛泽东提议选编的一套《逻辑丛书》把《逻辑指要》列入其中。毛泽东没有因为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弃之，认为“学问之事，庸何伤”，并亲自为其代写说明。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看不错 …… (765)

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毛泽东却支持他，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历史有独到见解

…… (786)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送给毛泽东一本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在随后的彻夜长谈中，两人对书中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谁也没说服谁，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十几年后，

梁说，毛泽东的路子对。

《群学肄言》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 (799)

毛泽东一生在读书学习上收获得甚丰，不仅由于他好学，更由于他会学、善学。他始终坚持对为学之道的探索和运用，使其治学独具个性。研读《群学肄言》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书中所倡扬的为学之道有了深切的体会。

《孙子兵法》里有一些很好的原则 …… (810)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军事理论著作。对这一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毛泽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战争论》值得学习 …… (828)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学习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还积极地学习外国的军事理论，包括这本《战争论》，以期把军事理论弄出头绪。毛泽东不但自己读，还在自己的住处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这部书为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西行漫记》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 …（840）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采访后的结果。毛泽东对斯诺的行动是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对斯诺讲："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此书果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民歌 ……（849）

对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欢，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老百姓的诗歌。毛泽东晚年曾为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书写《诗经》中的一篇诗，使她免受恋爱失约之怨。一段佳话，令人倍感伟人的慈祥和温暖。

《楚辞》有民主色彩 ……（856）

"楚辞"是楚国巫系文化的辉煌结晶。以屈原为首形成楚辞创作圈。毛泽东不只极为欣赏楚辞诗人编织的幻想境界，而且受其影响，他的许多诗词，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为瑰丽优美的华章。

再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866）

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艺术想象吻合了毛

泽东的审美旨趣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互相印证，直接沟通；屈原为理想而不惜献身的崇高个体人格，得到后世一切有识之士，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深深敬佩。故毛泽东之于屈原，既敬其人，又爱其诗。

《天问》了不起 …… (876)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充满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除了以上的原因，还在于屈原在几千年前就能够提出那样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人类理性的深度。

《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 …… (882)

毛泽东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所以毛泽对李斯评价也较高。他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恐怕不完全是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证明的。

《触詟说赵太后》说明：不注意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 (887)

如何真正地疼爱自己的子女，《触詟说赵太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毛泽东以此为例，提醒

人们要关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以身作则，堪称楷模。这从他对毛岸英、李纳的教育中可见一斑。

（下册）

《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 (892)

毛泽东将宋玉这篇《风赋》中的大王之风定性为贵族之风，将庶人之风定性为贫民之风，并看出其中阶级斗争的含义。这一番妙解，实在是毛泽东独有的。

《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 (896)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一番花言巧语，迷住了楚王，使登徒子成了好色的代名词。毛泽东不是昏庸的楚王，他一针见血地道破其中的诡术。在毛泽东的眼中，登徒子变成一位爱情专一、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

学习《愚公移山》 …… (900)

《愚公移山》是为人们熟悉和称道的寓言。两千年来，它成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的象征。在党

的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引述这则寓言，并赋予了它全新的革命内容，将愚公精神推向社会领域。

《七发》的气氛有批判色彩 …… (905)

《七发》是汉代文学家枚乘的名作。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下发此赋，并写了长长的评语，这似乎叫人不好理解，其实它正符合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治国风格。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 (913)

《治安策》是贾谊的一篇著名政治文章，旨在为国为民的长治久安提出政治谋策。毛泽东高度赞扬贾谊的才华，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过秦论》讲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 …… (928)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文中揭示秦王朝的原因即在“仁义不施，功守之势异也”的道理。毛泽东曾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以《过秦论》中的观点作为批语，显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历史价值的肯定。

《鹏鸟赋》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 (937)

《鹏鸟赋》本是贾谊以庄周齐生死等荣辱及知命不忧的思想为基础的自我排遣和自我慰藉之辞。但毛泽东却别是一种读法，他从中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认为生命如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有始必有终，而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将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上邪》要多读 …… (944)

1962年，毛泽东的儿媳邵华病休于大连。当时她学业未竟，久留外地身体不好，加上和丈夫有些小磨擦，情绪低落。毛泽东给她写信，除鼓励她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之外，还要她多读《上邪》，这是为什么呢?

《大风歌》很有气魄 …… (948)

刘邦的《大风歌》，质朴的几句，展露出一代雄主的宽阔胸怀。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显然是将刘邦的诗的气魄同他建功立业的气魄揉在一起来体验和赞扬的。我们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是否也能感受到这种气魄。

《观沧海》大手笔 …… (952)

毛泽东对曹操其人评价甚高，也很欣赏他的

文章诗句，特别是这首《观沧海》。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漫步时，嘴里常常低吟此诗。他在此间创作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就借用了该诗中的一些句子。

《龟虽寿》讲了养生之道 …… (956)

1961年，胡乔木因劳累过度生病，毛泽东劝其放下一切事情，专心静养，并让他读这首《龟虽寿》。第二年，毛泽东还向林彪推荐这首诗，劝其注意养生之道，增强信心，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登楼赋》中含有故土之思 …… (962)

晚年的毛泽东很喜欢这篇《登楼赋》，因为其中含有故土之思。并说人老了，更容易怀念这些。但作者写这篇赋的时候，正值30岁，完全谈不上老年，这也许是毛泽东在借以表露自己别人难以知晓的万般情感吧。

《文赋》有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 …… (966)

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有唯心与唯物两种解释。毛泽东肯定了陆机《文赋》的唯物观点，赞同萧统的批评见解。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 (977)

在中国古代诗文集中，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便是《昭明文选》，其中许多篇章，他都能背诵。在他的谈话和著作中，引用《文选》的名句很多。毛泽东是公认的二十世纪语言文学大师，这与他熟读《文选》，借鉴吸收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有相当的关系。

《与陈伯之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 …… (988)

《与陈伯之书》是南朝梁代丘迟给陈伯之的劝降书，陈伯之收到此书不久，即率八千人归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将此书推荐给黄克诚、周小舟，说“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泽东是纯粹地让他们欣赏一篇文学作品，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登池上楼》通篇矛盾 …… (993)

通篇矛盾的《登池上楼》一诗为南北朝诗人谢灵运所作，毛泽东评点这首著名的诗篇，并没有就诗论诗，而是从中挖掘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以达知人论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读诗评诗的一

个特点。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月赋》最著名 …（998）

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同舒同讨论齐国的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之事，还随口背诵起谢庄的《月赋》，而后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秋日楚州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光昌流丽

……（1004）

对这篇几百字的文章，毛泽东写下了1000多字的批语。从对文章本身及作者王勃的评点，到最终将视野投向世界是青年的、创造世界的是劳动人民的境地，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永远是相通的。

《登幽州台歌》情深意长 ……（1016）

晚年的毛泽东，时常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读诗。有一次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完陈子昂的这首诗，毛泽东连声夸赞道："孟夫子选得好嘛"，并评述这首诗"情深意长"。此时的毛泽东从诗中到底体会到了什么呢？

马周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1019）

公元631年，马周替人向唐太宗写一奏折，

“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毛泽东十分赞赏马周的才德，称他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奏疏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将进酒》好诗 …… (1028)

毛泽东特别喜欢李白的诗。称他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将进酒》一诗，笔力豪迈，情怀傲岸，狂歌高唱，全以神运，难怪毛泽东称之为“好诗”。

《蜀道难》写得淋漓尽致 …… (1037)

对“奇之又奇”的《蜀道难》一诗，不少人从思想方面作出种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毛泽东却认为大可不必。他称赞此诗主要看重它高超的艺术性，它的淋漓尽致的描画、想象与夸张……

《北征》虽敷陈其事，然亦有比、兴… (1042)

毛泽东读过不少杜甫的诗，评价却不甚高，说他的诗哭哭啼啼。1965年毛泽东致信陈毅，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并举《北征》为例，认为该诗虽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但其中亦有比兴。

《赠卫八处士》毫无雕琢之工 …… (1051)

毛泽东晚年喜好唐诗，他常叫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小孟多次为毛泽东读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因为她知道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诗。它的质朴与苍凉是否暗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呢?

《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 …… (1055)

刘少奇曾引此诗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毛泽东总觉不甚妥当，他以一个近乎职业文学史家的治学方式，翻阅有关图书，推理考据，层层分析，得出了诗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的结论。

《从军行》(之四) 中有意志 …… (1061)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因病住院，倍受伤病折磨。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给她写信，鼓励她意志可以克服病痛，一定要锻炼意志，并抄录了这首《从军行》，告诉她：这里有意志。

《师说》有真知灼见 …… (1066)

1940 年秋，马列学院的几位同志接毛泽东去作报告，一路上，他们讲了许多情况，毛泽东以

虽然“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的精神，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很有感慨地谈起了韩愈的《师说》……

《伯夷颂》颂错了人 …… (1070)

韩愈的《伯夷颂》歌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还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是颂错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夷还是一个有气节的人，所以毛泽东在号召人们不怕困难的时候，提起这篇《伯夷颂》。

《黔之驴》讲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 (1074)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一篇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都提到它。意思虽不完全一致，但都是鼓励人们做那种无所畏惧的小老虎，接受那头驴的教训。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气概… (1078)

这首诗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应答之作。诗中表达了作者虽屡遭挫败仍坚韧不拔、豪迈激越的气概。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里引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鼓励人们在同地球的开战中也要有此气概。

《琵琶行》高在作者与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 (1083)

一曲《琵琶行》，感动无数人，其中奥妙，仁者见仁，众说纷纭。毛泽东从作者与弹琵琶者有平等心情的角度，指出该诗的高明之处，这是否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人民特有的血肉关系呢?

《放言五首》(之三)讲了盖棺定论的道理
…… (1089)

"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曾引用白居易这首诗的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辨别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林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苍凉优美 …… (1092)

毛泽东爱读豪放派的诗词，但也不废婉约。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范仲淹的这两首词，毛泽东更能从中体会出苍凉而优美的意境。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喜欢的词风也是多样的，各有兴会，毛泽东兼收并读。

《六国论》提出的联合抗秦论未必然… (1097)

苏询在他的名篇《六国论》中设想六国若团结一致，联合抗秦，即可免遭灭亡的命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看待秦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是极高明的。

《谏论》空话连篇 …… (1102)

《谏论》是苏洵的一篇政治文章，论述了天下谏君之道。但皆书生之谈，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毛泽东说它“空话连篇”。对毛泽东来讲，这个问题恐怕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了。

《朋党论》有些论断似是而非 …… (1108)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毛泽东对此评价似乎不高，认为有些论断“似是而非”，到底文中有哪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呢?

《蝶恋花·出塞》看出兴亡 …… (1114)

清初，抒发兴亡之感是文坛上的时髦调子。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旋律，毛泽东是在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

读到这首词的，一语“看出兴亡”的评点，也流露出一代伟人令人感慨的千思万绪。

《三垂冈》歌颂李克用父子 …… (1118)

毛泽东在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时，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三垂冈》的诗，并请田家英代查一下诗的作者。晚年的毛泽东曾用这首诗中的“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句多少有些凄凉的诗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原因何在呢?

“昆明大观楼对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 (1123)

昆明大观楼对联，180 字，气势宏大，对仗精巧，洋洋洒洒，开启长联之风。清人梁章钜在其《楹联丛话》中讥其冗长。毛泽东认为此说不确，赞扬此联从古未有，别具一格。

《两般秋雨庵随笔》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 (1132)

《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较著名的笔记小说，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历史、经济、人物轶事和民间传闻故事等领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作为“闲书”来读，虽作消遣，亦从中吸取一些文化知识。

《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国际斗争的故事 …… (1139)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对于政权是否稳固以及阶级斗争问题极为敏感。他向身边的领导干部推荐《东周列国志》，就是要以史为鉴，告诫全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 (1148)

现实的黑暗，必将引起人们的激愤。但小说不同于历史实录，它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具普遍意义。然谴责小说暴露黑暗每止于现象、罗列事实，深度不够，缺少理想。政治性强，但艺术性低。这些作品，与毛泽东的审美标准大异其趣，这是他不喜欢读的主要原因。

《聊斋志异》借鬼狐说教 …… (1161)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写的一部描写鬼怪的小说。毛泽东不同意鲁迅将它归于“怪异小说”的说法，而把它归为“社会小说”之列。毛泽东从这些妖神鬼怪中看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 (1173)

毛泽东最早获取军事斗争知识靠的不是军事理论专著，而是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他从中读历史、读军事，体味文化意蕴，并用它来解决纷繁复杂的许多现实问题。

《水浒传》要当作政治书看 …… (1194)

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水浒》情结”。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他最早从《水浒传》中得到的启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刻的辩证思想，与借鉴《水浒传》也不无关系。晚年将纯学术研究与政治挂勾，发动评《水浒》运动，造成了重大失误，这是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 (1221)

《西游记》是毛泽东从小就十分喜爱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直到晚年他还把《西游记》的几种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他很欣赏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对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造反精神给予了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 …… (1240)

《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却是中晚明的社会现实。毛泽东称之为“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时下又誉之为“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 (1254)

毛泽东一生爱读《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认为这是一部写得最好的中国古典小说。他为什么强调《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是怎样评价这部古典小说的？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 (1262)

毛泽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政治领袖的视角来读《红楼梦》的。他认为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他是怎样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他是从哪些方面分析《红楼梦》的历史价值的？

《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 (1268)

毛泽东读《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是讲阶级斗争的”。第四回是小说的“总纲”。他为什么说第四回是个“总纲”？他是怎样理解《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 …… (1273)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这是为什么呢？

《自嘲》中的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1280)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旧体诗，特别是《自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其中的两句诗，号召人们以之为座右铭，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起这首诗，认为它符合辩证法。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是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 …… (1286)

这两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出自两

个“小人物”之手，遭到“大人物”的阻拦。毛泽东专门就此文章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它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不久，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升到文化领域的讨论，最后转向政治批判……

《不怕鬼的故事》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 (1332)

1955年，毛泽东指示把中国古典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此事由何其芳具体负责。毛泽东亲自为其修改序言，并要求将序文送《红旗》和《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本书呢?

《红与黑》中的于连雄心勃勃，值得赞扬 …… (1345)

《红与黑》中的于连长期以来被不少人认为是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胆大包天、想入非非的大坏蛋。毛泽东却认为于连是有胆量的人，是雄心勃勃的人，是帮助德瑞拉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这一篇翻案文章，道理何在呢? ……

主要参考书目 …… (1355)

后记 …… (1356)

目　录

（中册）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告诉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 (429)

1933年，毛泽东将此书寄给彭德怀，并在信上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此书为证，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可以澄清混乱
思想 …… (44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在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1958年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要求学习这本书，以此来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 …… (453)

毛泽东重视此书，与当时正在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关。它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提出的逐步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参考，这即“很有启发”。“相当不足”是指什么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创造了苏联 …… (461)

这本书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赞扬此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提议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这本书为中心材料。虽然今天看来这本书还有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知晓这一切。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470)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虽然有不少缺点，毛泽东还是很重视。1959 年庐山会议初

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这本教科书。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读这本书是比较好的办法。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 (493)

《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至少读了10遍，足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在长达3400多字的批注中，毛泽东在很多地方已超出了原书的思想深度，并表明了对有关的哲学重大问题的见解。

《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书 …… (501)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真理，感召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并成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开拓性著作。毛泽东评价它是“通俗”而“有价值”的。

《哲学与生活》更深刻 …… (511)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与他发愤读书，加强理论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从他给艾思奇的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求知中表现出来的严谨认真，虚怀若谷、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

《〈实践论〉解说》写得极好 …… (523)

1950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立即撰文加以解说。为了做到完整准确地讲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修改。这不仅是对李达个人的支持，也是对用通俗化的语言宣传唯物论的支持。

《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 (530)

《盛世危言》是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刚满13岁，辍学在家务农，这本书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不久他上了东山高小，独自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革命军》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 (535)

1958年成都会议前夕，毛泽东抽空“望了一下”邹容的《革命军》，并且在会上推荐给大家读。他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赞扬《革命军》很好读。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它呢?

《大同书》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道路 …(561)

在评述《大同书》9年后，在理论上找到了通往大同之路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中作了一次实现大同社会的尝试。不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彻底从《大同书》描写的空想社会模式中摆脱出来。

《一种清醒的作法》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573)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写的研究东西方关系的著作。毛泽东看过之后，又将它推荐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这是必读之书。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他在书里看出什么了呢?

《论语》有一部分真理 ……(578)

《论语》是儒学经典，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部著作的评价，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致的。但总的讲还是一分为二，肯定其中有部分真理。我们对毛泽东对《论语》及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备地理解。

《老子》中有辩证法 ……（594）

毛泽东很欣赏《老子》这部道家经典中的辩证法思想，并称赞老子这个人很老实，搞阴谋，写在书上，并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例。他还曾饶有兴味地阅读中国哲学界讨论《老子》的有关材料。

《中庸》里有为学之道 ……（609）

毛泽东读书往往抱有双重目的，其一汲取思想资源；其二学习治学方法。对《中庸》的研习，一方面使他批判地吸取了中庸范畴所表达的“无过无不及”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使他认识到博学作为为学之道之于求知的重要性。

《庄子》中有真理 ……（624）

对《庄子》这部集中反映道家风貌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爱。他将《逍遥游》中鲲鹏的形象入诗，用来表达自己的高远志向与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还从中挖掘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以启发当代科学的研究。

《墨子》——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639）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称赞他在中国找出了赫拉克利特，即墨子。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墨子》一书又是如何成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的……

《天问》之后一千年才有《天对》 …… (651)

屈原的《天问》提出一千年以后，柳宗元以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诗的形式作了一篇《天对》，大胆地回答了一千年前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智慧与胆识的行动。毛泽东肯定它，也就是肯定了作者的这种勇气和精神。当然，“天对”是无止境的。

《天论》中发展了唯物主义 …… (661)

1959年，毛泽东读了一篇关于柳宗元的文章后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的发展就见之于他的这篇《天论》。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 (669)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

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为“开一代风气”之作，只可惜写了一半，就没下文了。毛泽东对此似颇有点遗憾。

《中国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

…… (682)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考、伦理观念紧密结合，同时，因为论战的需要，吕振羽按照中国哲学史的脉络写成了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及对哲学史的叙述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形而上学 …… (693)

毛泽东与《简明哲学辞典》的主编之一尤全关系甚密。但对他的这部书却颇多微词。毛泽东对其中“同一性”一条的批评，不单是指的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伦理学原理》越读越有趣味 …… (705)

青年毛泽东认为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这一根本问题，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国民精神处着手。因此，他十分

醉心于哲学研究。《伦理学原理》批语集中地反映了其当时的哲学主张、见解和思维水平。

《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 (721)

毛泽东是由一个《天演论》和进化论的信奉者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天演论》作出审视和批判，肯定其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成分，指出其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成分。

《金刚经》很值得一看 …… (736)

毛泽东读过一些佛学经典，早年还信佛，他在与班禅的谈话中，曾饶有兴味地谈起《金刚经》，认为“值得一看”。做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为什么要读《金刚经》呢？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 (743)

《六祖坛经》是记录禅宗南宗开创人慧能的行迹与语录的佛学经典。毛泽东称这部著作是劳动人民的，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

《逻辑与逻辑学》颇为新鲜 …… (752)

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爱读逻辑学书，热衷于逻辑这一方法、工具的探究、掌握与运用，是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典型侧面。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在激起毛泽东浓厚兴趣的同时，更启迪了他对逻辑的认识。

《逻辑指要》足以为今日之参考 …… (758)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解放前的旧作。1959年根据毛泽东提议选编的一套《逻辑丛书》把《逻辑指要》列入其中。毛泽东没有因为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弃之，认为“学问之事，庸何伤”，并亲自为其代写说明。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看不错 …… (765)

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毛泽东却支持他，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历史有独到见解
…… (786)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送给毛泽东一本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在随后的彻夜长谈中，两人对书中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谁也没说服谁，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十几年后，梁说，毛泽东的路子对。

《群学肄言》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 (799)

毛泽东一生在读书学习上收获得甚丰，不仅由于他好学，更由于他会学、善学。他始终坚持对为学之道的探索和运用，使其治学独具个性。研读《群学肄言》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书中所倡扬的为学之道有了深切的体会。

《孙子兵法》里有一些很好的原则 …… (810)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军事理论著作。对这一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毛泽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战争论》值得学习 …… (828)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学习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还积极地学习外国的军事理论，包括这本《战争论》，以期把军事理论弄出头绪。毛泽东不但自己读，还在自己的住处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这部书为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西行漫记》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 … (840)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采访后的结果。毛泽东对斯诺的行动是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对斯诺讲：“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此书果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民歌 …… (849)

对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欢，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老百姓的诗歌。毛泽东晚年曾为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书写《诗经》中的一篇诗，使她免受恋爱失约之怨。一段佳话，令人倍感伟人的慈祥和温暖。

《楚辞》有民主色彩 …… (856)

“楚辞”是楚国巫系文化的辉煌结晶。以屈原

为首形成楚辞创作圈。毛泽东不只极为欣赏楚辞诗人编织的幻想境界，而且受其影响，他的许多诗词，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为瑰丽优美的华章。

再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866）

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艺术想象吻合了毛泽东的审美旨趣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互相印证，直接沟通；屈原为理想而不惜献身的崇高个体人格，得到后世一切有识之士，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深深敬佩。故毛泽东之于屈原，既敬其人，又爱其诗。

《天问》了不起 ……（876）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充满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除了以上的原因，还在于屈原在几千年前就能够提出那样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人类理性的深度。

《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 ……（882）

毛泽东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所以毛泽对李斯评价也较高。他的

《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恐怕不完全是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证明的。

《触詟说赵太后》说明：不注意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 (887)

如何真正地疼爱自己的子女，《触詟说赵太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毛泽东以此为例，提醒人们要关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以身作则，堪称楷模。这从他对毛岸英、李纳的教育中可见一斑。

目 录

（下册）

《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 (892)

毛泽东将宋玉这篇《风赋》中的大王之风定性为贵族之风，将庶人之风定性为贫民之风，并看出其中阶级斗争的含义。这一番妙解，实在是毛泽东独有的。

《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 (896)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一番花言巧语，迷住了楚王，使登徒子成了好色的代名词。毛泽东不是昏庸的楚王，他一针见血地道破其中的诡术。在毛泽东的眼中，登徒子变成一位爱情专一、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

学习《愚公移山》 …… (900)

《愚公移山》是为人们熟悉和称道的寓言。两

千年来，它成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的象征。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引述这则寓言，并赋予了它全新的革命内容，将愚公精神推向社会领域。

《七发》的气氛有批判色彩 …… (905)

《七发》是汉代文学家枚乘的名作。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下发此赋，并写了长长的评语，这似乎叫人不好理解，其实它正符合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治国风格。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 (913)

《治安策》是贾谊的一篇著名政治文章，旨在为国为民的长治久安提出政治谋策。毛泽东高度赞扬贾谊的才华，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过秦论》讲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 …… (928)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文中揭示秦王朝的原因即在“仁义不施，功守之势异也”的道理。毛泽东曾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以《过秦论》中的观点作为批语，显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历史价值的肯定。

《鹏鸟赋》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 (937)

《鹏鸟赋》本是贾谊以庄周齐生死等荣辱及知命不忧的思想为基础的自我排遣和自我慰藉之辞。但毛泽东却别是一种读法，他从中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认为生命如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有始必有终，而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将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上邪》要多读 …… (944)

1962年，毛泽东的儿媳邵华病休于大连。当时她学业未竟，久留外地身体不好，加上和丈夫有些小磨擦，情绪低落。毛泽东给她写信，除鼓励她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之外，还要她多读《上邪》，这是为什么呢?

《大风歌》很有气魄 …… (948)

刘邦的《大风歌》，质朴的几句，展露出一代雄主的宽阔胸怀。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显然是将刘邦的诗的气魄同他建功立业的气魄揉在一起来体验和赞扬的。我们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是否也能感受到这种气魄。

《观沧海》大手笔 …… (952)

毛泽东对曹操其人评价甚高，也很欣赏他的

文章诗句，特别是这首《观沧海》。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漫步时，嘴里常常低吟此诗。他在此间创作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就借用了该诗中的一些句子。

《龟虽寿》讲了养生之道 …… (956)

1961年，胡乔木因劳累过度生病，毛泽东劝其放下一切事情，专心静养，并让他读这首《龟虽寿》。第二年，毛泽东还向林彪推荐这首诗，劝其注意养生之道，增强信心，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登楼赋》中含有故土之思 …… (962)

晚年的毛泽东很喜欢这篇《登楼赋》，因为其中含有故土之思。并说人老了，更容易怀念这些。但作者写这篇赋的时候，正值30岁，完全谈不上老年，这也许是毛泽东在借以表露自己别人难以知晓的万般情感吧。

《文赋》有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 …… (966)

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有唯心与唯物两种解释。毛泽东肯定了陆机《文赋》的唯物观点，赞同萧统的批评见解。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 (977)

在中国古代诗文集中，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便是《昭明文选》，其中许多篇章，他都能背诵。在他的谈话和著作中，引用《文选》的名句很多。毛泽东是公认的二十世纪语言文学大师，这与他熟读《文选》，借鉴吸收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有相当的关系。

《与陈伯之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 …… (988)

《与陈伯之书》是南朝梁代丘迟给陈伯之的劝降书，陈伯之收到此书不久，即率八千人归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将此书推荐给黄克诚、周小舟，说“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泽东是纯粹地让他们欣赏一篇文学作品，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登池上楼》通篇矛盾 …… (993)

通篇矛盾的《登池上楼》一诗为南北朝诗人谢灵运所作，毛泽东评点这首著名的诗篇，并没有就诗论诗，而是从中挖掘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以达知人论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读诗评诗的一

个特点。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月赋》最著名 …（998）

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同舒同讨论齐国的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之事，还随口背诵起谢庄的《月赋》，而后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秋日楚州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光昌流丽
…… （1004）

对这篇几百字的文章，毛泽东写下了1000多字的批语。从对文章本身及作者王勃的评点，到最终将视野投向世界是青年的、创造世界的是劳动人民的境地，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永远是相通的。

《登幽州台歌》情深意长 …… （1016）

晚年的毛泽东，时常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读诗。有一次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完陈子昂的这首诗，毛泽东连声夸赞道："孟夫子选得好嘛"，并评述这首诗"情深意长"。此时的毛泽东从诗中到底体会到了什么呢？

马周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 （1019）

公元631年，马周替人向唐太宗写一奏折，

“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毛泽东十分赞赏马周的才德，称他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奏疏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将进酒》好诗 …… (1028)

毛泽东特别喜欢李白的诗。称他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将进酒》一诗，笔力豪迈，情怀傲岸，狂歌高唱，全以神运，难怪毛泽东称之为“好诗”。

《蜀道难》写得淋漓尽致 …… (1037)

对“奇之又奇”的《蜀道难》一诗，不少人从思想方面作出种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毛泽东却认为大可不必。他称赞此诗主要看重它高超的艺术性，它的淋漓尽致的描画、想象与夸张……

《北征》虽敷陈其事，然亦有比、兴… (1042)

毛泽东读过不少杜甫的诗，评价却不甚高，说他的诗哭哭啼啼。1965年毛泽东致信陈毅，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并举《北征》为例，认为该诗虽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但其中亦有比兴。

《赠卫八处士》毫无雕琢之工 …… (1051)

毛泽东晚年喜好唐诗，他常叫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小孟多次为毛泽东读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因为她知道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诗。它的质朴与苍凉是否暗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呢？

《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 …… (1055)

刘少奇曾引此诗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毛泽东总觉不甚妥当，他以一个近乎职业文学史家的治学方式，翻阅有关图书，推理考据，层层分析，得出了诗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的结论。

《从军行》(之四) 中有意志 …… (1061)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因病住院，倍受伤病折磨。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给她写信，鼓励她意志可以克服病痛，一定要锻炼意志，并抄录了这首《从军行》，告诉她：这里有意志。

《师说》有真知灼见 …… (1066)

1940年秋，马列学院的几位同志接毛泽东去作报告，一路上，他们讲了许多情况，毛泽东以

虽然“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的精神，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很有感慨地谈起了韩愈的《师说》……

《伯夷颂》颂错了人 …… (1070)

韩愈的《伯夷颂》歌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还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是颂错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夷还是一个有气节的人，所以毛泽东在号召人们不怕困难的时候，提起这篇《伯夷颂》。

《黔之驴》讲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 (1074)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一篇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都提到它。意思虽不完全一致，但都是鼓励人们做那种无所畏惧的小老虎，接受那头驴的教训。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气概… (1078)

这首诗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应答之作。诗中表达了作者虽屡遭挫败仍坚韧不拔、豪迈激越的气概。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里引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鼓励人们在同地球的开战中也要有此气概。

《琵琶行》高在作者与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 (1083)

一曲《琵琶行》，感动无数人，其中奥妙，仁者见仁，众说纷纭。毛泽东从作者与弹琵琶者有平等心情的角度，指出该诗的高明之处，这是否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人民特有的血肉关系呢?

《放言五首》(之三)讲了盖棺定论的道理

…… (1089)

“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曾引用白居易这首诗的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辨别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林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苍凉优美 …… (1092)

毛泽东爱读豪放派的诗词，但也不废婉约。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范仲淹的这两首词，毛泽东更能从中体会出苍凉而优美的意境。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喜欢的词风也是多样的，各有兴会，毛泽东兼收并读。

《六国论》提出的联合抗秦论未必然…（1097）

苏询在他的名篇《六国论》中设想六国若团结一致，联合抗秦，即可免遭灭亡的命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看待秦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是极高明的。

《谏论》空话连篇 ……（1102）

《谏论》是苏洵的一篇政治文章，论述了天下谏君之道。但皆书生之谈，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毛泽东说它“空话连篇”。对毛泽东来讲，这个问题恐怕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了。

《朋党论》有些论断似是而非 ……（1108）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毛泽东对此评价似乎不高，认为有些论断“似是而非”，到底文中有哪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呢?

《蝶恋花·出塞》看出兴亡 ……（1114）

清初，抒发兴亡之感是文坛上的时髦调子。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旋律，毛泽东是在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

读到这首词的，一语“看出兴亡”的评点，也流露出一代伟人令人感慨的千思万绪。

《三垂冈》歌颂李克用父子 …… (1118)

毛泽东在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时，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三垂冈》的诗，并请田家英代查一下诗的作者。晚年的毛泽东曾用这首诗中的“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句多少有些凄凉的诗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原因何在呢?

“昆明大观楼对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 (1123)

昆明大观楼对联，180 字，气势宏大，对仗精巧，洋洋洒洒，开启长联之风。清人梁章钜在其《楹联丛话》中讥其冗长。毛泽东认为此说不确，赞扬此联从古未有，别具一格。

《两般秋雨庵随笔》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 (1132)

《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较著名的笔记小说，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历史、经济、人物轶事和民间传闻故事等领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作为“闲书”来读，虽作消遣，亦从中吸取一些文化知识。

《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国际斗争的故事 …… (1139)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对于政权是否稳固以及阶级斗争问题极为敏感。他向身边的领导干部推荐《东周列国志》，就是要以史为鉴，告诫全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 (1148)

现实的黑暗，必将引起人们的激愤。但小说不同于历史实录，它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具普遍意义。然谴责小说暴露黑暗每止于现象、罗列事实，深度不够，缺少理想。政治性强，但艺术性低。这些作品，与毛泽东的审美标准大异其趣，这是他不喜欢读的主要原因。

《聊斋志异》借鬼狐说教 …… (1161)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写的一部描写鬼怪的小说。毛泽东不同意鲁迅将它归于“怪异小说”的说法，而把它归为“社会小说”之列。毛泽东从这些妖神鬼怪中看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 (1173)

毛泽东最早获取军事斗争知识靠的不是军事理论专著，而是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他从中读历史、读军事，体味文化意蕴，并用它来解决纷繁复杂的许多现实问题。

《水浒传》要当作政治书看 …… (1194)

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水浒》情结”。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他最早从《水浒传》中得到的启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刻的辩证思想，与借鉴《水浒传》也不无关系。晚年将纯学术研究与政治挂勾，发动评《水浒》运动，造成了重大失误，这是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 (1221)

《西游记》是毛泽东从小就十分喜爱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直到晚年他还把《西游记》的几种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他很欣赏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对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造反精神给予了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 …… (1240)

《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却是中晚明的社会现实。毛泽东称之为“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时下又誉之为“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 (1254)

毛泽东一生爱读《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认为这是一部写得最好的中国古典小说。他为什么强调《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是怎样评价这部古典小说的？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 (1262)

毛泽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政治领袖的视角来读《红楼梦》的。他认为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他是怎样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他是从哪些方面分析《红楼梦》的历史价值的？

《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 (1268)

毛泽东读《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是讲阶级斗争的”。第四回是小说的“总纲”。他为什么说第四回是个“总纲”？他是怎样理解《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 …… (1273)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这是为什么呢？

《自嘲》中的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1280)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旧体诗，特别是《自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其中的两句诗，号召人们以之为座右铭，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起这首诗，认为它符合辩证法。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是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 …… (1286)

这两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出自两

个“小人物”之手，遭到“大人物”的阻拦。毛泽东专门就此文章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它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不久，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升到文化领域的讨论，最后转向政治批判……

《不怕鬼的故事》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 (1332)

1955年，毛泽东指示把中国古典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此事由何其芳具体负责。毛泽东亲自为其修改序言，并要求将序文送《红旗》和《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本书呢?

《红与黑》中的于连雄心勃勃，值得赞扬 …… (1345)

《红与黑》中的于连长期以来被不少人认为是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胆大包天、想入非非的大坏蛋。毛泽东却认为于连是有胆量的人，是雄心勃勃的人，是帮助德瑞拉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这一篇翻案文章，道理何在呢? ……

主要参考书目 …… (1355)

后记 …… (1356)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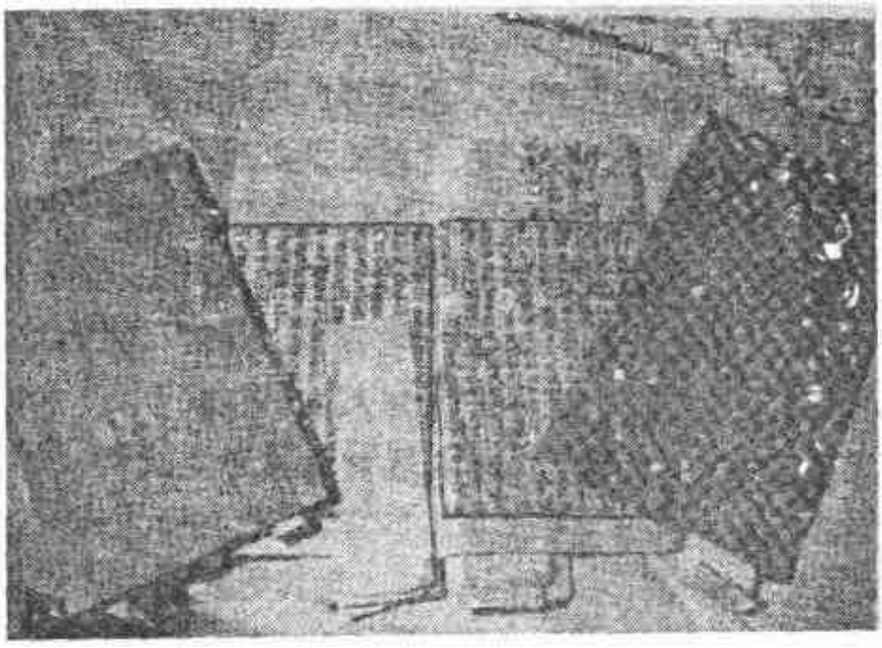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

毛泽东对于二十四史的历史价值非常重视，他一生不仅通读过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重点篇章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的真实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

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批注之一页

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帝纪》里，既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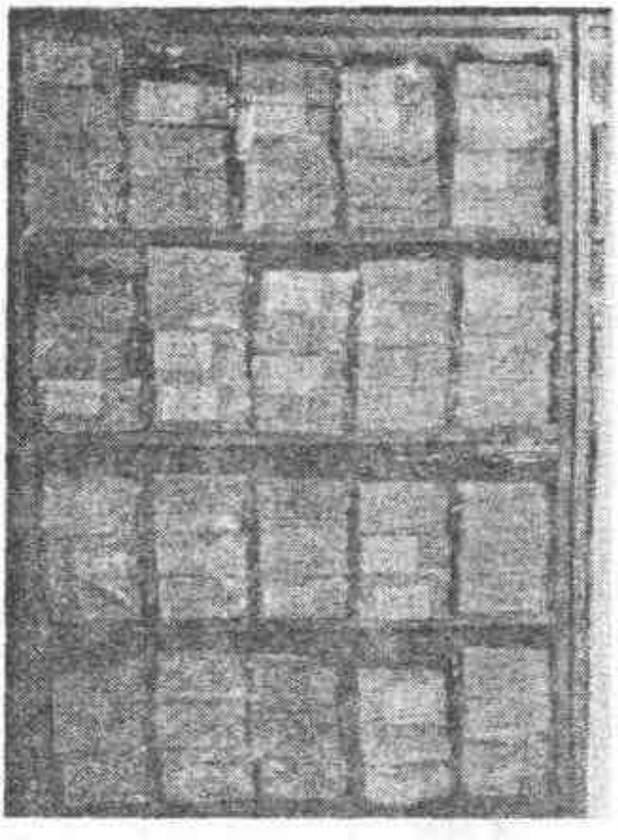
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作品介绍】

二十四史是指清朝乾隆年间被乾隆皇帝钦定为“正史”的24部纪传体史书，即西汉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唐朝房玄龄等人所撰的《晋书》、南朝萧梁时期沈约所撰的《宋书》、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唐朝姚思廉所撰的《梁书》、唐朝姚思廉所撰的《陈书》、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唐朝李百药所撰的《北齐书》、唐朝

令狐德棻等人所撰的《周书》、唐朝魏征等人所撰的《隋书》、唐朝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唐朝李延寿所撰的《北史》、五代后晋时期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和宋祁所撰的《新唐书》、北宋薛居正等人所撰的《旧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宋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辽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金史》、明朝宋濂等人所撰的《元史》、清朝张廷玉等人所撰的《明史》。



毛泽东书架上摆放的《二十四史》(局部)

二十四史的编辑，起自西汉，迄于清代，前后经过了两千余年。其中，属于个人撰写的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等，其余均为官修。官修正史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两人受命于政府而独立撰

写的，如《汉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新唐书》等；一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力量撰写的，如《晋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

作为纪传体，二十四史中除《三国志》、《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周书》、《北史》等7部史书没有“表”、“志”，《隋书》、《旧唐书》等没有“表”，体例不完整之外，其余各部史书的体例都很完整，即包含了“本纪”、“志”、“表”、“列传”这四部分基本体例。《史记》、《新五代史》还有“世家”这种独立的体例。

“本纪”名义上是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一朝一代或数代皇帝或皇后事迹的史篇，如《史记》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以及《旧唐书》有《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高宗本纪》、《则天武后》、《中宗、睿宗》、《玄宗本纪》等，但实际上除去记叙皇帝或皇后的出身、经历等事迹外，其大量的篇幅记叙的还是某一皇帝在位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因此，所谓“本纪”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事记。

“志”是分门别类地记述各个时代典章制度，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制度和现象的史篇。如《隋书》有《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等。除《史记》把这种史篇称为“书”之外，如《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淮书》等，其余各史都把这种史篇称为“志”。

“表”是用表格的形式把本纪、志、列传中适宜作一览性表达、或不容易写清楚、不值得专门写的制度、人物、事情等内容作特殊表述的史篇。如《史记》有《三代世系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

“列传”分为人物传记和外国传两大类。外国传记叙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情况。人物传记又分为专传、类传等两类。专传用来记叙重要人物，类传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来记叙各类人物。如《史记》的70篇列传分为《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等。

“世家”是记叙世袭封国诸侯或割据政权事迹的史篇。如《史记》有《吴世家》、《齐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燕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等，《新五代史》则有《吴世家》、《南唐世家》、《前蜀世家》、《后蜀世家》、《南汉世家》、《楚世家》、《吴越世家》、《闽世家》、《南平世家》、《东汉世家》等。其余各史则将“世家”归

并到了“列传”中。

据张志哲先生的统计，二十四史共计3260卷。其总字数约有4千余万，以纪传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4千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宝库。过去比较流行的版本主要有清朝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以及民国时期上海涵芬楼影印的百纳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华书局的系统整理，遂有了二十四史的标点本。这部标点本是目前二十四史最好的版本。而毛泽东当时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标点本尚未问世，所以他所批注的二十四史是用的武英殿本。

【试　析】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学习。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由于二十四史基本涵盖了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因而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价值非常重视，特别爱读二十四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他多次教导别人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早年就曾阅读过二十四史中

的部分史篇，1952 年，为了能够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他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直到他逝世，毛泽东在 24 年间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极其细致认真而且很有章法。

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因此，对二十四史的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对书中的错别字或卷数的统计错误也时有改正，还写有不少批注。为了便于查阅，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都标注了传主的名字以及阅读的时间、遍数。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标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卷目提要外，还写下了自己的《辽史》卷数的考证：“《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志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再如，毛泽东在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有：“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 月再阅”、“1975.9 月再阅”。这时，距毛泽东逝世仅有一年。可见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仍在坚持阅读二十四史。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在此时对《晋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至今仍是一个谜，令人费解。

由于二十四史是在从西汉到清代的近两千年间陆续修成的，既有官修，也有私撰，而且各史编修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史家素质都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各史的质量自然就显得参差不齐。毛泽东的史学素养很高，因此他读二十四史，也喜欢从史学的角度对各史以及各家注释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

判。例如，他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一些。"对于各家注释，毛泽东则喜欢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以及为《后汉书》写有按语的刘邠，而不太喜欢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说："李贤好"，"刘邠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应该说都是比较妥贴的，具有优秀史家的卓识。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曾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罪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

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但毛泽东同时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明确指出：“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毛泽东在1964年春所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历史观：“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盘踞底下流者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著名帝王采取的是傲视的态度。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其《沁园春·雪》中淋漓至尽地表达了出来：“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对中国古代的帝王也不全是否定，对他们的成功之处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例如，他就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对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

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就能看出：“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1957年六月，毛泽东在接见冒广生、冒舒湮父子时，曾接着冒广生谈到秦桧的话题，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征明有首词：‘笑区区一桧何所能，遂其欲!’大可一读。”

当然，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要完全用某一种固定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所作的诸多批注，往往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强调理论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也注重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卷98《马周传》卷末的“赞”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乎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认为马周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继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于是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很善于联系实际。例如，据《南史·梁武帝纪》载：“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

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又有御刀蒜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咀之等四十余人，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曾对张弘策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已决心乘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重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在“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和“政出多门，乱其阶矣”两句旁划上了曲线和密圈。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是赞赏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而且是由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而产生了一种政治警惕。再如，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梁武帝在襄阳起兵反齐时，为了破坏齐军从荆州会合进攻襄阳的计划，他派遣参军王天武等人用反间计离间齐将刘山阳和萧颖胄的关系，取得了成功。《南史·梁武帝纪》中记载了梁武帝在送走王天武后对心腹张弘策所说的一段话：“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以表示重视和同感。又如，毛泽东在读《北史·王建传》时，对北魏大将王建主张杀掉后燕军队俘虏的行为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在读《旧五代史·王彦章传》时，对后唐庄宗李存勖杀掉因负伤被俘的后梁大将王彦章极为不满，批注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的真实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永恒的思想光辉和文化魅力。（杨倩描）

《史记》严格、准确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名著《史记》，深受毛泽东的喜爱。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书本身的严格准确，更由于作者司马迁为了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搏斗的精神……

【毛泽东评点原文】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

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摘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摘自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一误

二误

——摘自毛泽东读《史记·陈涉世家》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史记》是西汉中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司马迁所著，他的生卒年月与汉武帝相始终。他的著作按《太史公自序》应名为《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亦之称为“太史公

记”、“太史公”，因为“太史令”一职是其祖传世业，“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史记”原本为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学杰作，我们能够得以赏鉴，实乃是司马迁用生命与人格的代价换来的。就在《史记》完成近一半时，司马迁因李陵事下狱，蒙受奇耻大辱。此案近因乃李陵，实是惹怒了人主，诚如《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之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三年后，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实是大耻。在生死去留之际，支撑他完成父亲遗命的是：被囚禁演《周易》的西伯；困厄不遇，终以《春秋》传世的孔子；屡遭放逐，遂有《离骚》的屈原；双目失明，竟有《国语》的左丘；等等。从此，他虽是一个“刑余之人”，终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业。一生耿直，从不阿谀的司马迁在完成了《史记》后，仍不能得到宽恕，终究还是被人主以“有怨言”，下狱死。尽管人主有生杀欲夺之权，但由司马迁们这些以祖传世业为业的史官的遗风里，已播下了“不虚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美”、“不隐恶”的种子。正是这样，《史记》对汉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唯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的评价再精辟不过了，在《汉代文学史纲要》中认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历时三千年左右，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篇（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亦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与影响与一般人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

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主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在《史记》的五个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

《史记》作为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在思想上的成就，首先表现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候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的中心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地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索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是站在思想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中走了出来，有时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其次，表现了他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历史观的进步性，

是我古代历史家中少有的。他重视经济的作用，重视经济发展状况对国家兴衰、对历史事件的决定作用，这是先秦儒家学派不重视、不研究的问题。司马迁写《平准书》，写《货殖列传》，第一次把经济问题载入了百科全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待严重的社会贫富问题上，司马迁和当时一般人的看法很不同。他并不认为，人民贫穷的根源在于商人的“积贷逐利”和商业发达的结果。他很了解，“势利”是统治阶级追逐得厉害的东西，可是他们往往只许自己无穷尽地追求“势利”，占有“势利”，却不准人民“富厚”，并鼓吹人民应该安分守己，甘贫如饴。司马迁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惨遭“腐刑”，从自己的惨痛遭遇里，他认识了汉代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的面目，更深地体会到，人民如果不能设法自富，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因此他提出“羞贫穷”的看法，他痛斥那些“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话仁义”的人，说他们帮助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欺骗和控制人民，而自己却以“长贫贱，好语仁义”的虚伪行为去求取功名和“富厚”，这真是可耻极了。司马迁的获罪皆因其语大弊伤道，不过，其语足以警醒世人。众所周知，他同样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对陈涉那种首创精神的高度评价，表现了其非凡眼光。他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和睦，主张各民族平等，这里所表现的民族观点的进步性实在超群。

《史记》在思想上的一个鲜明特色是表现了司马迁勇敢的不与圣人同是非和他那种敢怒、敢言，敢于揭露黑暗面，敢于批判现实政治的豪迈气魄。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夫子因忌讳时政，甚至不顾事实，来妄赞“当代”。而迁的蒙辱则在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当然他最大的贡献是对秦汉之际和西汉前

期社会的研究，这也是《史记》的精义之所在。它揭露和批判了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揭露了以皇帝为代表的集团内部的倾轧和那些名公世卿们的卑鄙与自私；谴责了各种不义战争，……认为正是这些“外攘夷狄”和“内兴功业”，人民“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而百姓自己落得“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悲惨境地，真乃将人类社会贫富悬殊的病根一语道破。如果说一位历史家具有进步的历史观是可贵的，那么，具有这种勇敢的求实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因为这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付出血的代价的。《史记》是司马迁的血泪之作。

【试　析】

《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它的作者司马迁也受到毛泽东的崇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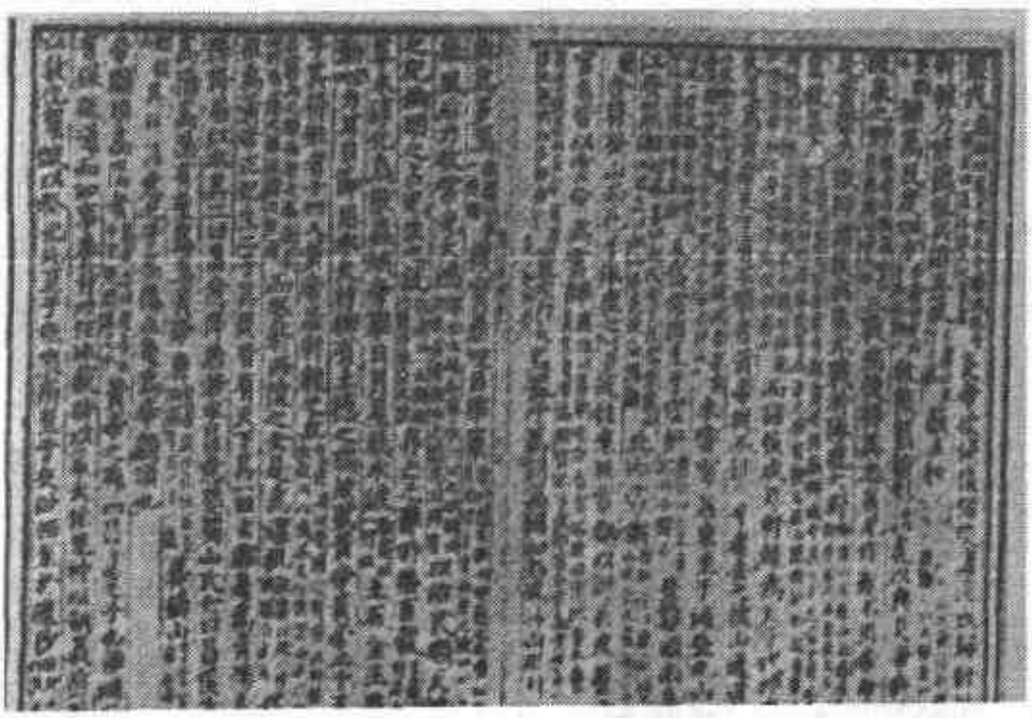
司马迁出身于西汉一个史学世家。在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下，从小博览典籍史册，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20岁后，心怀远大抱负，外出游历，考察史迹，采访史料，从长安南下，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后来担任了郎中，在皇帝身边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多次随汉武帝巡游，领奉使西征巴蜀。这些都使司马迁有众多的机会广泛接触人民，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扩大了眼界，从而掌握和充实了自己对历史的感性材料。特别是掌握了许多难得的史料，使得他得以去伪存真，辨清真假，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称赞《史记》“严格、准确”，恐怕与司马

迁的这样一种精神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1917年暑假，他与朋友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再回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了解农民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据介绍，毛泽东投身革命工作之后，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满怀激情，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戎马倥偬的游击环境下，抓住一切时机，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自己有三个夙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论。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反映，是我们党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思想方法，联系到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议，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毛泽东善于继承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

司马迁一生坎坷。其父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四年后开始撰写《史记》。七年之后，正当司马迁潜心著作之际，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战败而降，他为李陵辩解，得罪了汉武帝，被捕入狱，遭受腐刑。

司马迁遭遇这一奇耻大辱后，精神遭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以更大的毅力、勇气和斗志，继续写作他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公元前93年，司马迁53岁时，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终于完成。不久，这位饱受屈辱但仍不屈不挠的史学巨人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史记》书影

司马迁受辱后惨痛的心路历程在他给朋友的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有所表露。信中说，他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以前人身遭厄运但发愤著书的事例自勉：“盖文王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对司马迁这样一种为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上述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勇于在逆境中振作精神，奋发有为。1957 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吴冷西：《要有五不怕革命精神》）。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作为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继承。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讲到“象《史记》这样的著作……很严格、准确”，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振四海的帝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首事的功勋，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著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边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固然予

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饰其心胸狭窄，过于自负，甚至滥杀降卒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高尚史德。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还有两处具体的评点。

一处是在读《高祖本记》时毛泽东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项王，即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即刘邦。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残余的割据武装，伺机而起。楚旧将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之孙心。刘邦起兵沛县，初依项梁，后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最后刘邦与自立西楚霸王的项羽又争斗四五年，最终大败强敌项羽于垓下，项羽在乌江自杀身亡。

刘邦之所以取胜，一个是因为他能够得人心；一个是他知人善任，能博采众长，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项羽则勇武善战，军力强大，但所到之处烧杀掠抢，失去了人心；且听不得不同意见，有良臣谋士弃之不用，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恐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王不是政治家，而刘邦是政治家。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告诫各级干部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

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联系实际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霸王别姬》这出戏，取材于项羽兵败垓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骏马名骓，有美人名虞。“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事见《史记·项羽本纪》）。毛泽东说：“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肯定刘邦的“从谏如流”，善于听取意见；否定项羽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导致失败的可悲下场。这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给予今人的宝贵意见。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的另一处评点是在读《陈涉世家》时，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一误　二误”。

据介绍，在一本清武英殿版的《史记》中，毛泽东对《陈

涉世家》这篇传记，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并写下批注。毛泽东主要是从总结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这个角度来阅读这篇传记的。

《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还是雇农时，曾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陈胜起义胜利立国称王后，那些旧伙伴来找他，陈胜未忘前言，接待旧相识，使之出入宫廷。这些人常常毫无顾忌地谈论陈胜当农民时的贫困往事，"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书页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一误"。

传记又载：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任朱房、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个人大权在握后，胡作非为，对许多不顺从他们的将士随意治罪。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加官晋级。许多将士见此都不愿意追随陈胜了。司马迁痛惜地指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在这段天头上又批注："二误"。

这很少的几个字，内涵却相当丰富。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即陈胜犯了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和重用奸人、偏听偏信、脱离了患难与共的干部的错误。保持本色，不脱离本阶级的群众；任用贤能，打击邪恶，这两条来自2000年前农民起义的教训，牢牢地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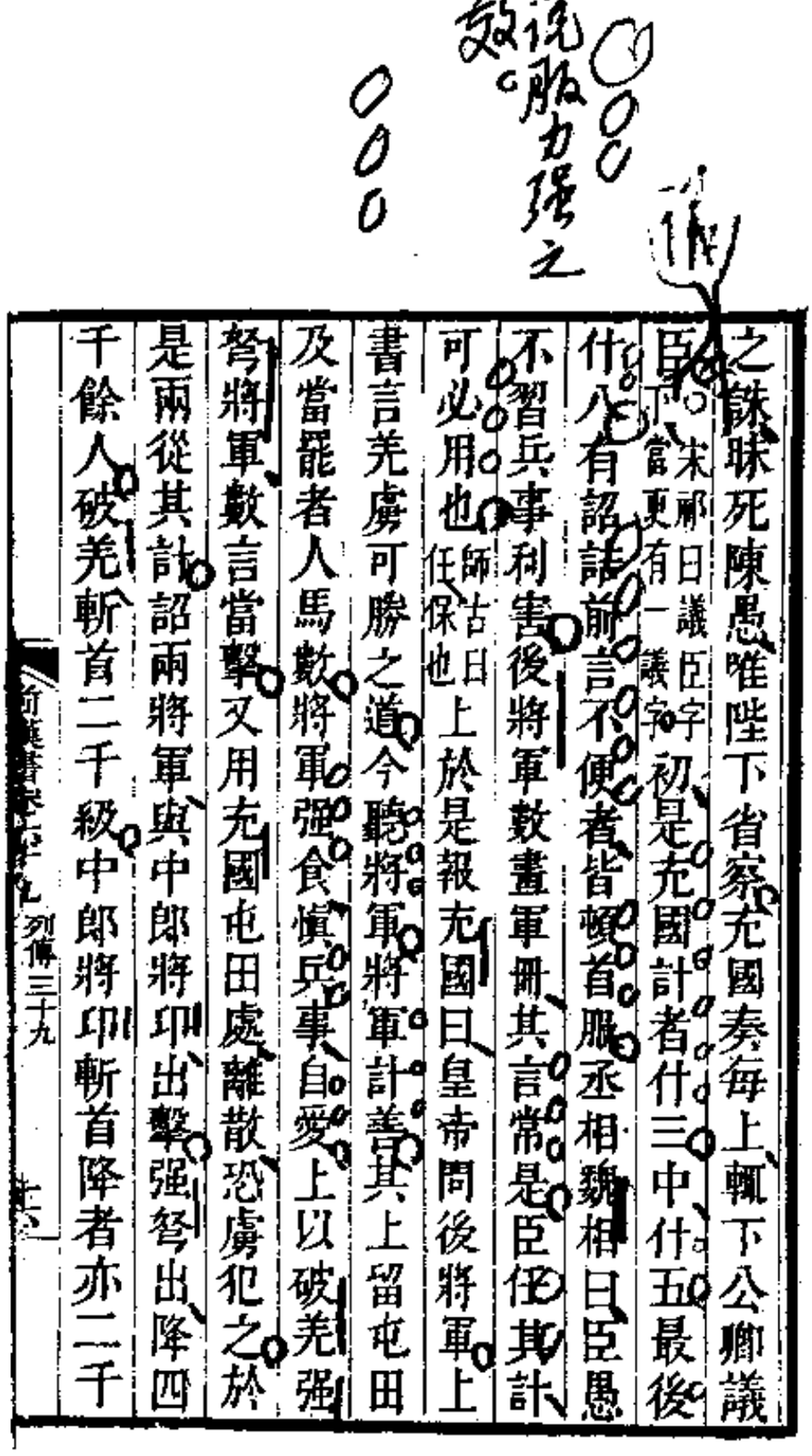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汉书》

《汉书》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东读《汉书》，尤其喜欢读《赵充国传》。敢于坚持真理的西汉名将赵充国，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

【毛泽东评点原文】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

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的批注

【作品介绍】

《汉书》共100卷，是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所编撰的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父班彪（3—54年）在光武帝时期曾任县令、司徒掾、望都县长等职，才学出众，尤其爱好历史。班彪见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虽然有褚少孙、扬雄、刘歆等人的续作，但都不能与《史记》媲美。于是，班彪决心续补《史记》。他广泛收集史料，博采遗闻佚事，撰写成《史记后传》65篇。

班固有很高的天赋，9岁时便能写出漂亮的文章，16岁便到了洛阳，进入太学读书。他博览群书，读书不喜欢逐字逐句的分析，而注重对文章宏旨的把握，因而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精通。班固在23岁时，班彪病逝。班固于是离开了太学，回家为父亲守丧。在这段时间，他认真阅读了父亲的《史记后传》，认为《史记后传》仍不太完备，于是便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体例，开始编撰《汉书》。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

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替班固鸣冤辨白，救出了班固。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对班固的才学十分赏识，便任命他担任了兰台令，负责编撰东汉开国以来的历史。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同时，他又撰成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纪28篇。汉明帝于是

命令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撰。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经过20余年的艰苦写作，班固终于大体完成了这一部史学名著的编写，对史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跟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北匈奴，相继担任中护军、行中护军事。大破匈奴之后，班固在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为这次胜利刻石颂功。永元四年，窦宪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势自杀，班固因此而受到牵连，被捕入狱。洛阳令种兢是班固的仇人，他乘机指使人多次毒打和侮辱班固。班固在狱中饱受折磨悲愤交加，死于狱中。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班固的妹妹班昭又补续了“八表”，并与马续一道完成了《天文志》的写作。

《汉书》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206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23年），记述了整个西汉一代230年的史事。计有本纪12篇，即《高祖纪》、《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平帝纪》；有表8篇，即《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有志10篇，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有列传70篇，即陈胜至吴芮等《列传》4篇、荆王至中山孝王等《列传》8篇、季布至扬雄等《列传》45篇、《儒林列传》1篇、《循吏列传》1篇、《酷吏列传》1篇、《货殖列传》1篇、《游侠列传》1篇、《佞幸列传》

1篇、《外戚列传》1篇、《元后列传》1篇、匈奴、西域等《列传》3篇、《王莽列传》1篇、《叙传》1篇；共一百篇。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单卷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如《高祖纪》分为上、下卷，《外戚传》、《匈奴传》、《西域传》等也分为上、下卷，《王莽传》分为上、中、下卷，《五行志》甚至分为“上”、“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等五个分卷。这样，《汉书》实际上就变成了120卷。

从体例上看，《汉书》尽管沿袭《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记事方式，去掉了“世家”，将其内容放入“列传”，并把“书”改称为“志”，但在本纪、表、志、列传，特别是“志”的具体形式上却也有创新。改“书”为“志”，原本是因为《汉书》本身既然叫“书”，那记典章制度这一部分也就不好再叫作“书”了。但班固在改《史记》的“八书”为《汉书》的“十志”上却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把《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律书》、《历书》合为《律历志》，改《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平准书》为《食货志》、《河渠书》为《沟洫志》，又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而且它的记事比《史记》更详细，更有系统。如《五行志》尽管是讲五行灾祥，但也保存了不少自然现象的史料；《刑法志》是记载军制和刑法的，为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地理志》则是记载地理沿革和行政区划的，《艺文志》则是目录学最早的专著，使人们得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总之，“十志”的创立是《汉书》最为成功的地方。因而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沿用“志”这种体例来记载典章制度了。

从史料来源上看，对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

年）以前的记述，《汉书》基本上是抄自《史记》；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记述，《汉书》则主要是在班彪的65篇《后传》的基础上撰写的。但是，班固自己也增补了大量的史料，特别是诏令、奏疏、文章，如《贾谊传》中增加《治安策》，在《晁错传》中增加了《募民徙塞疏》、《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在《李广传》中增加了《武帝奖誉诏》等。因而使《汉书》的内容比《史记》更为丰富、更为充实。同时，班固还对《史记》和《后传》的文字作了增删改易，改正了《史记》的不少错误。尽管在对人物描述的生动性上，《汉书》不如《史记》，但在记述的准确性上，《汉书》却超过了《史记》。

《汉书》的缺点主要是班固的思想观点比较保守，因此多以封建的正统观念、儒家的正统思想为准绳来评价历史和品评人物，以极力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缺乏司马迁《史记》中的那种人民性和同情心。另外，《汉书》喜用古文字和古句法，是二十四史中最难读的史书。在它问世之时，东汉人读起来都感到有相当的困难，连当时的著名学者马融都曾跟着班昭学习《汉书》。因此，替《汉书》作注的人比较多。在唐代以前，仅有名的《汉书》注家就有23家。唐代的颜师古集众家之长，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新注。清末的王先谦吸收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成果，征引有关著作达67家之多，撰成《汉书补注》。近人杨树达所撰的《汉书窥管》、陈直所撰的《汉书新注》、吴恂所撰的《汉书注商》，也是研读《汉书》的重要参考书。

【试　析】

赵充国（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邽（旧治在今甘肃天水西南）人。赵充国是西汉中期的名将，在汉武帝和汉昭帝时，他曾多次率军与匈奴和氐人作战，屡立战功，被授予后将军。汉宣帝时，由于他与霍光等人一道册立宣帝即位有功，因而被封为营平侯。

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由于当时负责处理西羌事务的西汉官员义渠安国处理不当，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因而起兵反汉。这时已76岁高龄的赵充国自请为将，带兵出征。赵充国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便上书汉宣帝，建议对西羌部落实行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先零羌，而对开羌、罕羌采取招抚的战略方针。

赵充国到了金城（今青海民和），渡过黄河后，便按兵不动，打算利用汉军的威势和自己的威信招降罕羌和开羌，对西羌部落实行分化瓦解，等羌人十分疲惫时才发动进攻。但酒泉太守辛武贤却不赞同赵充国的计划，他向汉宣帝上奏，说：

各郡的部队都屯驻在南山防守，北部边境空虚，这种局面势必不能保持太久。有人说到了秋冬才进军，这是敌人在境外情况下的对策。如今，羌虏不分早晚地掠夺抢劫，当地气候十分严寒，汉马不能耐寒过冬，屯驻在武威、张掖、酒泉的一万以上的骑兵，马匹大多都十分瘦弱。可以增加马料，在七月上旬带上三十天的粮食，把部队分成几路，从张掖、酒泉一齐出发联合攻击罕、开部落在鲜水一带的部队。羌虏把牲畜视为命根子，现在使得他们都离散了，如果分兵出击，即使不能完全

歼灭他们，但只要在夺取他们的牲畜、俘获他们的妻子儿女后再收兵回去，冬天再出兵攻击他们，大兵频频出动，那羌虏必定就会被摧毁的。

汉宣帝把这封信交给赵充国，让他与部下一起广泛商议后作出答复。赵充国和长史董通年联名上奏，说：

辛武贤打算快速率领一万骑兵，分成两路从张掖出发。道路迂回，长达千里。用一匹马自身驮上三十天粮食，总计米二斛四斗，小麦八斛，又有衣装和兵器，难以追逐敌人。汉军辛辛苦苦地到达后，羌虏一定会商量出他们的军队如何进退的办法，带领部队稍稍后撤，向有水有草的地方走，进入山林之中。汉军随着深入，敌人就会占据前面险要的地方，把守后面狭隘的关口，以断绝汉军的粮道，汉军必定会有遭到重创的危险。如果被夷狄所耻笑，那一千年也无法挽回了。而辛武贤认为可以夺取他们的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只是空话，不是最好的计谋。再有，武威县、张掖的日勒都正当北部边塞，有可通的山谷和水草。臣下我担心匈奴与羌虏已经有了计划，而且想要大举入侵，希望能拦腰截断张掖、酒泉以隔绝西域，因此，那些郡的部队尤其不能调动。先零首先叛逆，而其它部落则是被先零所胁迫的。因此，臣下我制定了一个计策，打算原谅罕、开部落愚昧的过失，放在一边而不提这事，首先将先零诛灭，以威慑他们。如果他们悔过、变好了，那就顺便赦免他们的罪行，选择了解他们的风俗的好官吏安抚和管理他们。这是能够保全我们的军队、保证胜利、安定边疆的策略。

汉宣帝把赵充国的奏书交给群臣讨论。公卿中发表意见的人都认为先零兵力强盛，而且依仗有罕、开部落的协助，如果不先打败罕、开部落，那么先零就不可能被战胜。

汉宣帝于是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担任强弩将军，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给他一封玺书，嘉奖并采纳了他的计划。并写了一道敕书，斥责赵充国说：

皇帝慰问后将军，出师在外十分辛苦。将军的计划是打算到正月才攻打罕羌，羌人那时收获了小麦，已经远远地送走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上万的精兵将要入侵酒泉、敦煌了。守卫边境的部队少，老百姓由于要防守保卫边地，就不能够耕种田地了。现今张掖以东，一石粮价值一百多钱，一束草料价值几十钱。同时还要辗转运输，百姓将会受到烦劳和骚扰。将军率领一万多人马，不趁早在秋天双方共同拥有水草便利的时候，去争夺羌人的牲畜粮食，却想要等到冬天。到那时，羌虏都存储起了粮食，藏到山中占据了险阻，而将军的战士却被严寒折磨，手足皲裂冻伤。这样难道对汉军有利吗？将军不顾中国的花费，想要用拖上几年的方法取得微小的胜利。凡是做将军的，谁不乐意用这种办法呢！

现在命令破羌将军武贤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带兵两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带领婼、月氏兵四千人，大约一万二千人。携带三十天粮食，在七月二十二日攻打罕羌，推进到鲜水北边的句廉一带，距离酒泉八百里，离开将军约一千二百里。将军你率领部队由近路向西同时行进。即使不能与羌人相遇，那也能让敌人知道汉军从东方、北方同时杀来，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分化他们的党羽，即使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但应当会有被瓦解的。已经诏令中郎将赵印带领胡越骑飞的射士、步兵二校前来，增加将军的兵力。

现今，金、木、水、火、土这五星从东方升起，中国将会大胜，蛮夷将会大败。太白星在高空中出现，领兵深入敌方敢

于战斗的将会有好运气，不敢战斗的将会有灾祸。将军赶快整装出发，顺应上天的安排，诛杀作恶的坏人，将会所向无敌，不要再有疑虑。

赵充国受到斥责后，认为将领带兵在外，有随宜处置的权力，应该见机行事，以保证国家的安全。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谢罪，顺便陈述了用兵的利害，说：

臣下我曾见过骑都尉义渠安国前一次有幸得到的陛下赐给他的书信，信上说让他挑选羌人中可以当使者的人出使罕羌，告诫他们说大军就要到了，汉朝不会诛杀罕羌。用这个办法来挫败反叛者的计划。陛下对他们的恩德极其深厚，不是臣下我所料想得到的。臣下我独自在心中赞美陛下的无与伦比的恩德，认为这个尽善尽美的计划不会停止实施，因此，便派遣开羌部落的首领雕库向羌人宣布了天子的最高恩德。罕羌、开羌之类的部落都听到了天子英明的诏令。如今，先零羌的杨玉（这人是羌人大首领中最有名的大王）带领四千骑兵和煎巩的五千骑兵，占据山深林密的险要地方，一有机会便出来抢劫，而罕羌和开羌却还没有侵犯我们。现在把先零放在一起，而先去攻打罕羌，就是放掉有罪的，诛杀无辜的；弄出一个仇敌，变成两个敌害。这的确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

臣下我听说兵法上讲“进攻力量不足的，防守却有余”，又讲“善于作战的人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所调动”。现在罕羌想要去进犯敦煌、酒泉，那我们就整治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的到来。我们毫不费力便有了调动敌人的手段。用得到良好休整的军队去攻击极其疲劳的军队，这是取得胜利的决窍。如今害怕这两郡的兵少，不足以防守，而调发他们去进攻羌虏，这是放弃调动羌虏的手段而走上被羌虏所调动的道路。

臣下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不恰当。先零羌虏想要背叛，所以与罕、开部落解除仇恨、结成盟约，然而他们的内心不能不担心在汉军到来后而罕、开部落背叛他们。臣下我个人认为：从先零的角度考虑，他们通常愿意抢先去援救罕、开部落的危难，以巩固他们的盟约。如果先攻打罕、开部落，那先零就必然会去救助他们。如今羌虏的马匹肥壮，粮食正好充足，攻打他们，恐怕不仅不能重创他们，反而正好使先零能够对罕、开部落实施恩德，从而巩固他们的盟约，使他们合成一党。一旦羌虏关系牢固、合成一党，那他们就会有精兵两万多人。如果他们胁迫其它各小部落，那归附他们的人就会逐渐多起来，象莫须之类的部落就不敢轻易地脱离他们了。如果是这样，那羌虏的军队就会逐渐多起来，讨伐他们就得动用几倍的力量。臣下我担心国家忧患与拖累要用十年来计算，而不只是二三年了。

臣下我能够承蒙天子的厚恩，父子都是显要的官员。臣下我的职位已做到了上卿，爵位已是列侯，年龄已是七十六岁了，为了陛下英明的诏令，即便是尸体填埋在山沟里，死骨也会不朽，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唯独想到只有作战的利害关系上，臣下我是最为熟悉的。根据臣下我的计划，要是首先诛伐了先零，那么罕、开之类的部落不用再麻烦动用军队，他们就会降服。如果先零已被攻灭，而罕、开部落不降服，那就等到了正月再攻击他们。这样，即符合计划，又正是时候。现在进军，确实看不出它的好处。希望皇上裁决明察。

六月戊申，赵充国向皇上呈交了奏书。七月甲寅，皇上送来玺书，同意了赵充国的计划。

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旁逐字加了旁圈，还注明了“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是“七天”。可见毛泽东阅读的细致。

赵充国于是根据计划，出兵打败了先零部落。先零部落的羌人丢弃了车辆辎重，渡过湟水逃跑了。罕羌见先零部落逃走了，果真便归顺了汉朝。

这年秋天，汉宣帝又命令赵充国趁天时极其有利、官兵们斗志高昂的时机，在十二月进攻先零羌。这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一万多人了。赵充国估计先零部落必定会衰败，于是便想把骑兵撤走，实行屯田，以等待先零羌的败落。他写好了奏章还没有递送上去，而恰好得到了汉宣帝命令他进军的玺书。他的儿子中郎将赵印害怕了，派宾客劝告赵充国说："假使命令军队出动，而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杀死，从而危及到了国家，那将军还可以进行防守。既然如此，管他利与害，又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要是一旦不符合皇上的心意，派遣绣衣使者来责备将军，将军自身不能够保全，国家又怎么能够安宁呢？"赵充国叹道："说这话是多么地不忠诚呵！如果当初就采用我的意见，羌虏能够到这种地步吗？过去，推举可以先去巡视羌虏的人，我推举了辛武贤，但丞相和御史却又禀告皇上派义渠安国去了，结果把羌人的事情搞得一团糟。金城、湟中的谷子一斛值八钱，我对耿中丞说：'买进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妄动了。'耿中丞请求买进百万斛，但买到手的却只有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 时，先就用去了一半。失掉了这两条计策，羌人因此敢于叛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如今，要是我们陷入长期战争，那四方的蛮夷就会突然发动暴乱，相互连带起来造反。如果是这样，那即使是有富于最高智慧的人也是无法对付的。我们的担忧岂只是羌虏！我坚持我的意见，死也不放弃。对英明的国君，可以提出忠直的意见。"

于是，赵充国向汉宣帝献上了《屯田奏》，说：

臣下我听说战争是用来彰扬道德、铲除祸害的。因此，在外用兵的措施得当，在内就会产生福份。不可不谨慎。臣下我所率领的将军、士兵、马、牛所吃的，每月消费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饲料二十五万零二百八十六石。如果战乱久久不能解除，那徭役就不能停息下来。臣下我又担心其它的蛮夷在突然之间发出意料之外的变故，相互连带起来造反，使英明的国君为此担忧。这出兵一事，的确不是平日朝廷既定的稳操胜券的计划。况且，羌虏容易用计谋去攻破他们，却难以用军队去打败他们。所以，臣下我个人认为去攻击他们是不恰当的。

臣下我估计从临羌东到浩，羌虏旧有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没有被百姓所开垦的，约有二千顷以上。两地之间的邮亭大多数已经毁坏。臣下我以前指挥士兵进山砍伐木材，大小共有六万多根，都摆放在水边。希望撤走骑兵，留下被免罪的犯人、应募出征的人，以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军官、军士的私人随从人员，合计共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每月消费谷子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零八斛，分别屯守在要害的地方。冰雪溶化后，顺水向下流运送木材，修缮乡亭，疏浚沟渠，修理湟峡以西的道路桥梁七十处，使道路能通到鲜水左右两岸。到了耕种季节，每人分给土地二十亩。到四月青草长出来后，从各郡的骑兵和属国胡人骑兵中调发强健的骑兵各一千，以及备用战马各二百匹，到这里来吃草，担任耕田的人的警卫兵。收获的粮食运入金城郡储积起来，增加积蓄，节省很大一笔费用。现在，由大司农负责运送、已经运到了的粮食，足足够供给一万人一年的食用。恭敬地呈上记载田地和器具的帐簿，请

陛下裁决批准。

汉宣帝读了赵充国的了《屯田奏》，很不以为然，便写信给赵充国，说："皇帝问候后将军。你说打算撤走骑兵，用一万人来种田，假如依照将军的计划，那羌虏什么时候能够消灭？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请你认真考虑后，再上奏。"

赵充国于是向汉宣帝写了一封奏状，重申自己的理由，说：

臣下我听说帝王用兵，不用直接进攻就能让敌人屈服而取得胜利，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作战。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所以首先得使敌人无法战胜自己，以等待能战胜敌人的时机。蛮夷的习俗虽然不同于礼义之国，但他们想避开灾祸、追求利益，爱亲戚，害怕死亡，却完全与我们是相同的。如今羌虏失掉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密的青草，对寄身他处、远远逃避感到愁闷，骨肉不一条心，人人都有背叛的念头。而英明的天子撤回军队休战，留下万人种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来防御可以战胜的羌虏，虽然羌虏还不能马上就被歼灭，但战争结束却再过一整月就能看到了。羌虏已经瓦解，前后投降的人已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以及听我们的话回去告谕羌虏的人共有七十批。他们是坐着不动便能支解羌虏的工具。

臣下我恭敬地分条列出不出兵而留下屯田的十二条便利：步兵九校，军官、军士一万人，留守屯驻，以作为防御力量，耕种又能收获稻谷，威慑与恩德同时施行。这是第一。又因为我们挤走了羌虏，使他们不能回到肥美富饶的土地上来，我们用贫困来破坏他们的部众，以造成羌虏内讧的加剧。这是第二。居民得到了田地并且耕作，不荒废农业。这是第三。军马一个月的粮食，估计可以供养带甲士兵一年。撤走骑兵，以便

节省一笔很大的开支。这是第四。到了春天，抽调带甲士兵，沿着黄河、湟水用船运送谷子到临羌，向羌虏炫耀，显示我军的威武。这是世代相传的对付敌人的手法。这是第五。利用闲暇，时常顺流运下我们所砍伐的木材，修缮邮亭，运入金城储积起来，这是第六。军队出击，取胜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出击，则让反叛的羌虏在大风寒冷的地方逃窜，遭受霜、露、疾病、瘟疫、冻坏手脚的痛苦，这是坐着不动就必然能够取胜的决窍。这是第七。没有因通过险阻、远距离追逐而造成部队伤亡的害处。这是第八。对内不会损害汉军威武的态势，对外不会让羌虏有机可趁。这是第九。又不会惊动河南地区的大开、小开部落，使我们不至于担忧他们会生出其它的变故。这是第十。修建煌峡中的道路桥梁，使它可以达到鲜水，以控制西域，使我们的威信传布于千里之外，使军队前进有如在床上走一样的安全和容易。这是第十一。庞大的费用既然节省下来了，那就能够提前停止徭役，以防备意外事情的发生。这是第十二。留下部队来屯田能得到十二条便利，出兵攻打就要失掉这十二条便利。臣下我充国的才能低下，年纪已老，不懂长远的策略，希望陛下明确诏令，让见识广博的公卿讨论臣下的意见，选择采用。

毛泽东对赵充国所列举的屯田十二条便利十分重视，逐字旁圈的竟有十条之多。

但汉宣帝仍不同意赵充国的意见，再次写信给赵充国，说：

皇帝问候后将军。你所谈的十二条便利，朕知道了。你说虽然羌虏还不能马上就被歼灭，但战争结束却再过一整月就能看到了。这“再过一整月就能看到了”，说的是今年冬天呢，

还是说的什么时候？将军唯独不去想一想羌虏听说我军撤走了许多，他们健壮人又相互聚在一起，于是便去攻打和骚扰种田的以及路上的驻军，又杀害和抢劫百姓。将怎么来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还有，大开、小开部落以前曾说过："我们把先零所在的地方告诉了汉军，而汉军不前去攻打，长期呆着不动。这会不会象本始五年时那样，不区别好坏，而把我们连同在内一起攻击呢？"他们的内心常常怀有恐惧。如今不出兵，他们会不会发生变故，与先零合成一气？将军认真考虑考虑，再上奏。

赵充国也再次上奏，说：

臣下我听说作战以计谋为根本，因此多谋算胜过少谋算。先零羌的精兵现在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丢失了土地、远远地客居在他方，部众分散、受冻挨饿。罕、开、莫须部落的人又多次突发性地掠夺他们的有病和体弱的人以及牲畜，因此他们叛逃回来的人接连不断，都知道了天子明确命令相互捕捉或斩杀的奖赏令。臣下我个人认为可望在短时间内便能打败羌虏，远也超不过明年春天，因此说战争的结束再过一整月就能看到了。臣下我看到北部边境从敦煌到辽东有一万一千五百多里，防守边塞、布列在烽火台的官兵只有几千人，但敌人屡次用大部队进攻却不能得手。如今我们留下一万步兵来屯田，尽管地势平坦，但却有很多高山，便于远望；部队相互联防，构筑了濠沟、堡垒和瞭望台；营垒相连不断，准备好了锋利的兵器和弓弩，修整了好战斗的用具。烽火连通，具备了调集兵力共同作战的态势；养精蓄锐以等待疲惫的敌人来进攻，这在军事上是最有利的。臣下我个人认为屯田对内有不耗废庞大费用的好处，对外有进行防御的准备。骑兵即使撤走了，但当敌人看到

我们留下万人屯田、做好了必定要擒拿他们的准备，他们就会土崩瓦解，归服于仁德 。这种局面的出现，应该是为期不久了。从现在到三月底，敌人的马匹瘦弱，所以他们一定不敢把妻子儿女丢弃在其他部落中，从远处爬山涉水而前来侵犯。又看到我们屯田的人是精兵万人，因此他们始终不敢再带领他们的妻子儿女回到故地来。臣下我的愚笨计划之所以料定羌虏将必定会在那里而瓦解，就是因为如此。这是不用战斗而敌人就会自己败亡的策略。至于羌虏的小股人侵和抢劫，不时杀害百姓，那原本是无法一下子就禁止得了的。臣下我听说作战如果不能确保胜利，那就不能草率投入战斗；进攻如果不能确保攻克，那就不能随意使士兵劳苦。假如让军队出战，即使不能歼灭先零，但只要能使羌虏绝对不再小股人侵，那么就可以出兵。即使在今天同样能够这样做，但放弃坐着就能取胜的办法，而选择冒险的举动，打过去最终看不到好处，还会使内地空虚而自行疲敝。降低了国家的威信而自己遭受损失，这不是治理蛮夷的方法。再说大部队一出动，回来后就不能再留下来了，湟中也还不能空虚。如果这样，那又会再次征发徭役。况且，对匈奴不可不防备，对乌桓不可不担心。现今长期转辗运输有大量耗费，倾尽战略储备以供给一个边远的地方，臣下我个人认为这不恰当。校尉临众有幸能接受宣布皇上的威德的任务，带上很多的钱，安抚众多的羌人，向他们宣布皇上英明的诏令，他们大概都会闻风仰慕的。虽然他们以前曾经说过“会不会象本始五年时那样”，但大概不会有别的什么意思，不值得为这缘故而出兵。臣下我心中只想：“奉皇上的诏令到了边塞之外，率领军队远距离进攻羌虏，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辆、铠甲散弃在山野，虽然没有尺寸的功劳，但敷衍了事却能

得到避免嫌疑的好处，而且事后没有过失和责任。这是作为人臣没有忠心而得到的好处，而不是英明君主和国家的福份。”臣下我有幸能够率领精兵出击，声讨不义的羌虏，但却久久地留着上天要诛灭的敌人没有歼灭，罪该万死。陛下宽大仁慈，不忍心诛杀，让臣下我多次能够周密的谋划。愚笨的臣下我个人认为自己的计划十分周密，不敢躲避斧钺的诛杀，冒死陈述愚笨的意见，希望陛下审察。

每当赵充国的奏书呈递上来，汉宣帝都要下发给公卿们讨论。在这场书信往来的争论中，公卿中赞成赵充国计划的人开初只占十分之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便占到了十分之五，最后竟占到十分之八。连丞相魏相也对汉宣帝说：“臣下我愚笨不熟悉军事的利害，后将军多次谋画军事计策，他说的常常是正确的，臣下我保证他的计划一定能管用。”

毛泽东对这一段记述，逐一加了旁圈，还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汉宣帝终于同意了赵充国的意见，并给赵充国写了一封信，说：“皇帝问候后将军。你上书陈述了可以战胜羌虏的方法，现在听将军的。将军的计谋很好。请上报留下屯田以及应当撤走的人马数目。将军要强迫自己多吃饭，慎重地处理军事，要自己爱惜自己！”不过，汉宣帝鉴于破羌将军和强弩将军多次提出应当出击，又见赵充国屯田的地方比较分散，担心敌人进犯，于是对两种计划都加以采用，诏令两位将军与中郎将赵印出兵进攻。强弩将军出击，降服四千多人，打败羌虏，斩首二千级；中郎将赵印斩首及降服的也有二千多级，而赵充国所降服的又有五千多人。

取得这场胜利后，汉宣帝便下诏破羌将军和强弩将军撤

军，只留下赵充国继续屯田。第二年五月，陷于穷困之中的西羌各部完全土崩瓦解了。羌人原来约有五万人的军队，前后被汉军斩首的有七千六百人，投降的有三万一千二百人，淹死在黄河、湟水中的和因饥饿而死的有五六千人，下落不明以及逃亡的还不到四千人了。赵充国于是胜利班师回朝。这年秋天，西羌各部都归顺了汉朝。

毛泽东对赵充国的行为十分赞赏。为此，他不仅在《汉书·赵充国传》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字，还特意在与他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交谈时拿出《汉书》，翻到《赵充国传》，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杨倩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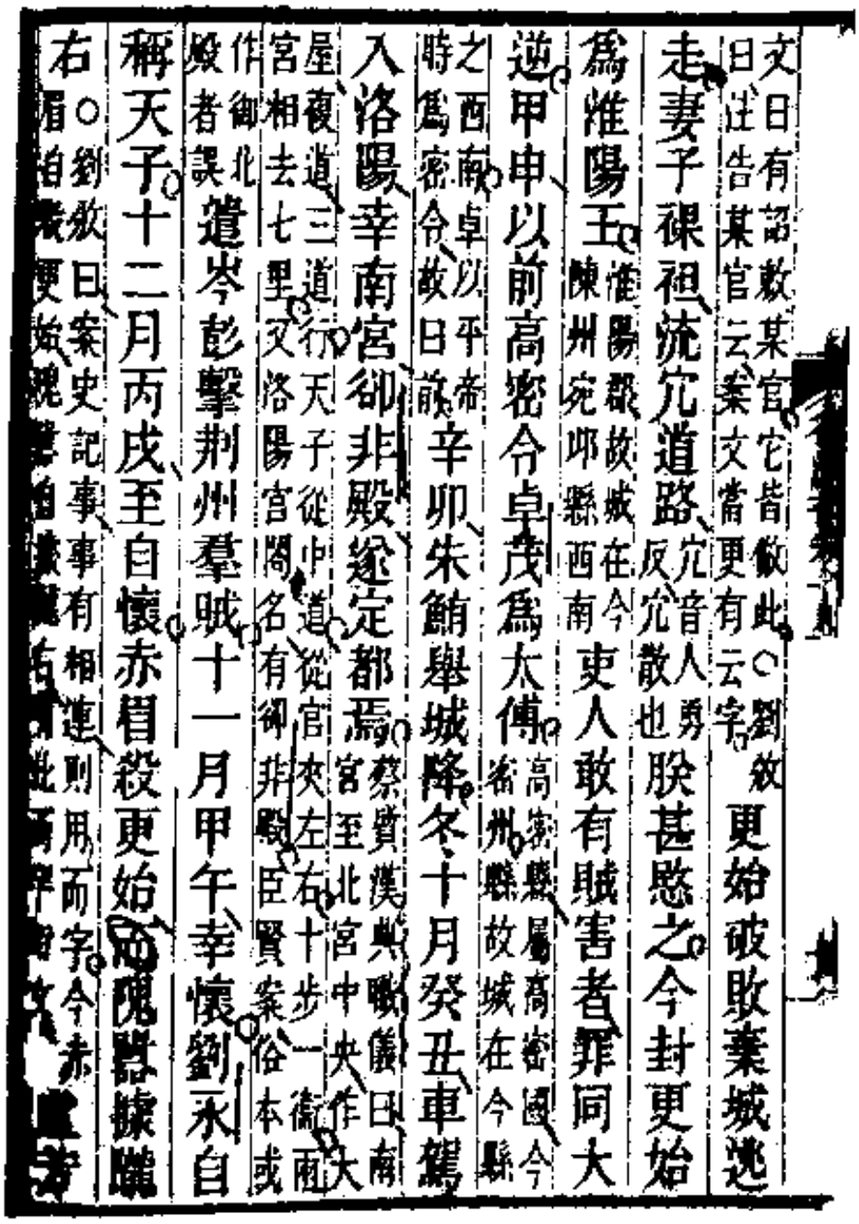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后汉书》

毛泽东尽管对《后汉书》的文采很欣赏，但却对东汉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不过，由于东汉的士大夫很讲求气节，因而毛泽东读《后汉书》时也很注重东汉士大夫的节操。

【毛泽东评点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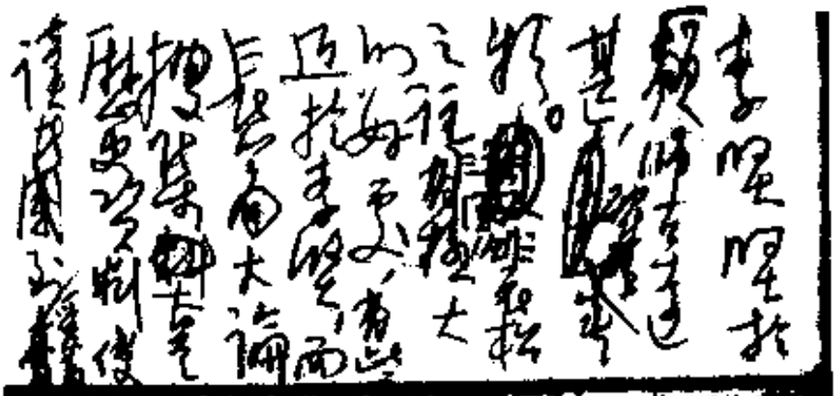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第21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文曰有詔敕某官宅皆徹此○劉攽曰注告某官云案文當更有云字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冗音人勇反冗散也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南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之西南卓以平帝時爲密令故曰前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蔡質漢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卻非殿臣賢案俗本或作御北殿者誤遣岑彭擊荊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魏武諫據臨右○劉攽曰案史記事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赤眉等眉伯敖更始魏武始據臨菑而降等

毛泽东读《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批语



定安定涇州縣薛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
（曲梁縣屬廣平國今洺州縣也）
歿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日在危八度虛危青地誠張步擁兵據
秦王五年乃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
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
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尚書不明德慎罰亦克用乂安國注云慎刑罰亦能用勤善也）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尚書曰罔
以小謀敗大作）惟諸將業遠功大誡欲
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臨臨若臨深履薄居人上於於如履薄冰再居人上操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
勝欲則凶日慎一日終無災）其顯效來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10卷和列传80卷，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志30卷则是由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

范晔（398—446年）字蔚宗，顺阳（旧治在今河南浙川东）人。范晔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祖父范宁曾任东晋的豫章太守，生父范泰因拥立宋武帝刘裕有功而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范晔因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而袭封了范弘之武兴县五等候爵位。

范晔是一个博学多识、很有才华的人。《宋书·范晔传》因而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他早年投奔在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门下，担任过冠军参军、右军参军等职。其后又历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432年）冬，35岁的范晔因行为不检点而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数年后，范晔被提升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他与谢综、孔熙先等人一道谋立刘义康为帝，因被人告发，于同年十二月（446年1

月）被捕处死，年仅48岁。

范晔以一生文才自负，著述极多，但大都散佚了，只有《后汉书》得以完整保留，流传至今。

在范晔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述已有10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刘珍、李尤、伏无忌等人所撰写的《东观汉纪》，三国时期吴国的谢承所撰写的《后汉书》、西晋的司马彪所撰写的《续汉书》、西晋的华峤所撰写的《后汉书》等。但范晔对这些史书都不满意，因此当他被贬为宣城太守时，由于政治上不得志，他便以《东观汉纪》为主要依据，并参考谢承《后汉书》等众家著述，斟酌取舍，删繁补缺，开始撰写《后汉书》。他原计划写本纪10卷、志10卷、列传80卷，合为100卷，并有序传。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在被处以死刑之前，已经完成了纪传部分的写作，但10志却最终没能定稿。

《后汉书》记事起自东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记载了整个东汉一代共196年的历史。本纪10卷中有《帝纪》9卷、《皇后纪》1卷，在位短暂的小皇帝不便单独成卷，便附于其他皇帝之后，因而《帝纪》9卷共记载了东汉12位皇帝的事迹。由于《光武纪》和《皇后纪》都分为上下卷，所以《后汉书》的本纪实际上是12卷。《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列传部分设有单传、合传、类传。但范晔根据东汉的历史特点，又创设了歌颂敢于反抗封建统治权威、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人士的《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记载宦官专权的《宦者列传》，记载文学家事迹的《文苑列传》，记载方士活动的《方术列传》，记载优秀妇女事迹的《列女列传》，记载孝子事迹的《孝子列传》等8个新的类传。在这些新创立的类传中，

《党锢列传》和《列女列传》最能反映出范晔史学的卓见特识。如《党锢列传》用同情和颂扬笔调，记载了党人名士坚贞不屈的行为和气节，富有正义感，生动而感人。《列女列传》则与后世的《烈女传》只讲封建的“节烈”完全不同，入传的妇女，如女史学家班昭和女文学家蔡琰（蔡文姬），范晔所注重的主要还是她们的卓越才华。

范晔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他在撰写《后汉书》时，能够吸取司马迁和班固两家的长处，以简约的文辞来阐发精深的意旨，以严密的结构来记述一个时代的史事。因此《后汉书》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范晔对于自己所撰的《后汉书》是很自负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吾杂传、论，皆有深意精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并非自我夸大之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誉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南宋文献学家陈振孙也赞誉说：“范氏删取《东观汉纪》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因而，当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大家争相传诵，以致其他各家的后汉书竟逐渐人们被淡忘、被时代淘汰了。

由于范晔的《后汉书》存有无“志”的缺陷，因此到南朝萧梁时期，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为完善其体例，便取用西晋司马彪《继汉书》中的八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后汉书》之缺。不过，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尽管新增了记载官制的《百官志》和记载车马、冠服等制度的《舆服志》，但却没有《沟洫志》、《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到了唐代，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在刘昭注释的基础上，在张大安、刘讷言等人的帮助下，参照王规的《续后汉书》注、刘昉和吴均的《后汉书》注等各家之书，广征博引，重新为《后汉书》作了注释。后来通行的《后汉书》的注释，纪传部分就是李贤的注，而志的部分则是刘昭的注。

【试　析】

陈寔（104—187年）字仲弓，东汉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年轻时曾当过县吏，尽管地位卑微，但他却喜欢读书，能诵读各种儒家经典。县令邓劭很欣赏陈寔才干，便让他进入太学读书。其后，历任颍川西门亭长、功曹、太丘县（旧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县长等职。

陈寔为官公正廉洁，为人讲究道德。因而陈寔的官职尽管不高，但在当时的朝野却很有威望。民间出生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陈寔调解裁决后，当事人都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有这样的乡谣："宁受到刑法处置，也不愿受到陈君（陈寔）指责。"太尉杨赐、司徒陈耽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声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了高官感到惭愧。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陈寔也受到了牵连。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而纷纷逃亡，可陈寔却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于是，他自己要

求官府把自己逮捕下狱。党锢之祸结束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想授与陈寔高官，但陈寔却不愿接受。陈寔逝世后，全国竟有3万多人赶去为他送葬。

毛泽东很欣赏陈寔。1965年，他曾把《后汉书·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后汉书·陈寔传》中有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小偷潜入陈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陈寔发现小偷后，没有大喊捉贼，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叫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惊，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很和气地劝说他："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此后，县中盗窃绝迹。后来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代名词，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晋书》

士大夫的操行和所谓的“五胡乱华”，是两晋时期比较突出的问题。毛泽东读《晋书》，很注重对两晋时代特色的把握，高屋建瓴地用批注的形式对其加以准确的评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

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毛泽东读《晋书·江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晋书》原名《新晋书》，共有130卷，是唐朝初年房玄龄等21人奉敕编撰的记载晋朝历史的官修史书。

两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修史盛行的时期。从晋末到唐初的200年间，据说撰写晋代历史的人前后共有26家，而较著名的有18家。其中，在唐初还有完整保存的纪传体有东晋何法盛的《晋中兴书》78卷、刘宋谢灵运的《晋书》36卷、萧齐臧荣绪的《晋书》110卷、萧梁萧子显的《晋史草》30卷，而在唐初还有完整保存的编年体则有西晋陆机的《晋纪》4卷、东晋干宝的《晋纪》23卷、东晋曹嘉之的《晋纪》10卷、东晋习凿齿的《汉晋阳秋》47卷、东晋邓粲的《晋纪》11卷、东晋孙盛的《晋阳秋》32卷、刘宋刘谦之的《晋纪》23卷，刘宋王韶之的《晋纪》10卷、刘宋徐广的《晋纪》45卷、刘本檀道鸾的《续晋阳秋》20卷、刘宋郭季产的《续晋纪》5卷。此外，有缺佚卷篇的各种《晋书》还有不少。但唐太宗对这些晋代的史书都不满意，对其提出了批评，说“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事乏实录。荣绪烦而寡

要，行思劳而少功，叔宁味同画饼，子云学堙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典，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陆、曹、邓，略记帝王：骞、盛、广、松，才编载记。”于是，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让唐政府组织人力，编撰一部《新晋书》。

《新晋书》由房玄龄、褚绪良、许敬宗监修，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分任撰录，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参与修订条例和参正文学。唐太宗还亲自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下了附于篇末的“论”。由于人手众多，现存史料又极为丰富，因而这部《新晋书》前后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新晋书》问世后，唐以前的各家晋书，就逐渐散失了，因此《新晋书》也就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了《晋书》。

《晋书》记事，起自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迄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前后共156年的历史。《晋书》有帝纪10卷，仿照《三国志》的体例，记述了虽未称帝、但却是西晋的奠基人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以及西晋的4位皇帝和东晋11位皇帝的事迹。《晋书》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等10志，体例没有创新，史料大多来源于《宋书》。但《天文志》和《律历志》因为是长于天文、历法的李淳风所撰，较为精详，在是10志中可算是写得比较好的两个志。另外，因为《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而《晋书》的《食货志》在记述发展经济情况时又往往追溯到东汉和三国，因此一些珍贵的经济史料得以保存。《晋书》有列传70卷，多为合传，并在类传中新

增了《忠义》、《孝友》、《叛逆》三个名目。列传70卷共收录人物772人。

"载记"30卷，是《晋书》在本纪、列传之外依照《东观汉纪》的"载记"体例而设立的，主要用于记述西晋末和东晋时期与晋朝并存和对峙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即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其中，前赵有3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有4卷，成汉、后燕、南燕各有2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有1卷，西秦和北燕合为1卷。由于这些政权不隶属于晋朝，但又是中国境内的政权，与当时的海外诸国，如朝鲜、日本等明显不同，因此《晋书》便采用了"载记"这个体例，以便在确立晋朝的王朝正统的前提下，分述上述政权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有"载记"这种体例的唯有《晋书》，因而显得很别致。

由于《晋书》的编撰历时不足三年，再加上它又是由众人分头撰写的官修史书，因此《晋书》出现了不少前后矛盾、互不照应的地方。如，《李重传》说"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但《晋书》却并没有《百官志》；再如，《司马彪传》说："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而《晋书》却并没有《郊祀志》。

尽管如此，但由于《晋书》集中了众家之长，体例组织严谨，又收录了不少重要的文章，如江统的《徙戎论》、陆机的《辨亡论》、阮瞻的《无鬼论》、鲁褒的《钱神论》等，加之唐以前的有关两晋及十六国的史书大都散佚，因而《晋书》也就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北魏人崔鸿原著有《十六国春秋》100卷，详细记载了十六国的历史，《晋书》的"载记"史料大部分都是出自《十六国春秋》。在《十六国春秋》散失

后，人们要了解十六国的历史，那就只能看《晋书》的“载记”了。

【试　析】

郭象（252—312年）字子玄，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他喜好《老子》和《庄子》，能言善辩。太尉王衍很欣赏他，常说：“听（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象早年以清高著名，州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予以回绝，而以著书立说自娱自乐。但中年以后，郭象却又愿意做官了，先后担任了司徒掾、黄门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很看重他，推荐他做了太傅主簿。郭象任职当权，势倾内外，成了一个非常势利的人物，当时的清谈派人物由此都很蔑视他。

西晋时期，玄学盛行，因而《庄子》之书成为一门显学，在郭象之前为《庄子》作注的就有数十家。魏晋之际，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向秀（227—272年）在各家《庄子注》的旧注外另作新注，颇有见地。但向秀尚未对《庄子》中的《秋水》和《至乐》两篇作注便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无知，致使向秀的注本散佚。郭象为人没有德行，他在得到向秀的注本后，见向秀的注本在世上还没有得到流传，便对向秀的《庄子注》进行了增改，自注《秋水》和《至乐》两篇，改易《马蹄》一篇，述而广之，编成了自己的《庄子注》。

《晋书·郭象传》称郭象“为人行薄”，而毛泽东对学术上的剽窃行为一向深恶痛绝，因而便批注道：“郭象无行。”当然，毛泽东说“郭象无行”，还有一重意思，即对郭象早年自

命清高，而“任职当权”后却极端势利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评。

自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匈奴问题的解决，南匈奴和一部分不愿向西迁往欧洲的北匈奴以及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开始在今河北、内蒙、山西、陕西等地的边境地区定居。到西晋时期，又再次出现了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今山西地区，鲜卑族已进入今辽宁、河北、甘肃、青海境内，氐族和羌族则进入了今陕西、甘肃、四川的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内迁，一方面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在当时也确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出于其它复杂原因而举行的武装反抗，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给西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晋惠帝元康四年（294 年），匈奴人郝散率众在上党（今山西长治）起兵。元康六年，郝散之弟郝度元又联合冯翊（今陕西西安东部）、北地（今陕西富平、耀县一带）两郡的马兰羌、卢水胡起兵，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击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和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关中地区的氐族和羌族民众纷纷响应，氐人齐万年被拥立为帝。元康七年，齐万年率军击败西晋建威将军周处，关中大震。元康九年，西晋积弩将军孟观率军进攻，俘虏了齐万年

当时正担任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令的江统认为要彻底平息少数民族的反叛，光靠军事镇压不行，必须要利用孟观的这次军事胜利，把已经迁入内地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于是，他写了一篇《徙

戎论》，详细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夫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及至周室失统，……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关中土沃物丰，厥土上上，……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而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然而，由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前后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当时已经爆发，因此江统在《徙戎论》中所提出的建议，晋惠帝却没有、也不可能采纳。结果不到十年，氐人李雄便在成都称帝，建立了成汉；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帝，建立了前赵（后改称汉国），成为"五胡十六国"的先导。因而当时的人们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统确实有先见之明。因为在他的《徙戎论》问世后的17年，即晋愍帝建兴元年（316年），西晋就被汉国攻灭了。但毛泽东却对江统的见解不以为然，批注道："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毛泽东认为：在封建时代，由于各中原王朝采取了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不可调

和的矛盾，而且当时西晋政权已是病入膏肓，无力控制局面了。如果强行迁走“五胡”，那势必会激起“五胡”反乱；如果不迁走“五胡”，听之任之，那“五胡”最后势必也会反乱。这是封建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经过千数百年以后，即到了今天，由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各民族和睦相处，已经“化”为一家，亲如兄弟了，因而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民族政策的历史诠释。（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隋书》

隋朝与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完成了中国统一的王朝，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人们通常都习惯性地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炀帝的暴政，但毛泽东却能以敏锐的历史目光，从隋文帝身上看到"蕴藏大乱"。

【毛泽东评点原文】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隋书·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隋书》共85卷，唐朝魏征、颜师古等撰。

《隋书》是唐朝史馆编撰的所谓梁、陈、齐、周、隋等五代史之一。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623年1月），鉴于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只有萧梁沈约所撰的《宋书》、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唐高祖采纳秘书丞令狐德棻的建议，下令史馆遍修梁、陈、魏、齐、周、隋等朝史书。其中，隋史的编撰，由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负责。然而由于人废于事，经过数年修撰，终高祖之世，这个庞大的修史计划却没有能够完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取消了编修魏史的计划，又命令史馆继续编修梁、陈、齐、周、隋等五代史。其中，由孔颖达、许敬宗、颜师古、魏征等人负责撰写隋史。魏征与房玄龄还担任了总监诸史的任务，到贞观十年，唐前五代史的纪传部分，连目录共252卷，全部完成。其中，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有本纪5卷、列传50卷，共55卷。

由于唐前五代史都只有纪、传，而没有志，因此在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命令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著作郎敬播、秘书丞令狐德棻、谏议大夫褚绪良等人再编修一部梁、陈、齐、周、隋等五代史书的志，由令狐德棻监修（后由长孙无忌监修）。到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梁、陈、齐、周、隋等五代史书的30卷志历时16年，终于完成。这30卷志原本是为了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特意编修的，因而当时被称为《五代史志》。

这时，由于《梁书》、《陈书》等均已单独刊行，所以唐朝史馆便把它放入唐前五代史的最后一部书即《隋书》中。因此，这一部《五代史志》后来便被人们称为了《隋志》。

《隋志》的5卷本纪和50卷列传是颜师古撰写的，而其中的序、论部分则是由魏征撰写的。《隋志》的30卷志分为10部分，即《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据说，《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是由李淳风撰写的，《经籍志》是由魏征撰写的，而《五行志》的序则是由褚绪良撰写的。

唐高祖下令史馆开始编修隋史时，距隋朝灭亡仅有几年，尽管隋朝禁止私家修史，经整理编撰成书的现成史料很少，仅有王胄所记录的《开皇起居注》60卷和《大业起居注》、王劭所整理的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隋书》80卷等，但由于唐朝史馆中编撰《隋书》的人都曾在隋朝生活过，整个隋朝又仅有30余年的历史，他们对于隋朝发生的历史事件应当说都是耳闻目见的，而且隋朝遗留下来的官方文件也还有很多，如牛弘的《朝仪礼》100卷，以及《隋律》、《隋大业律》等，因此唐初编修隋史应该说文书档案之类的资料还是丰富的。

在唐初史馆编修的唐前五代史中，《隋书》被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一部。清人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7中说："《隋书》最为简炼。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简净如此。"不过，隋朝本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隋书》写作能取得圆满成功不可忽视的原因。尽管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建国，到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于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灭亡，立国总共才有38年、

统一全国的时间只有30年，然而它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却给继起的唐王朝以深刻的影响，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大统一以及迅速灭亡的经验和教训也发人深省。这些史事在《隋书》中都有突出的反映。例如，《炀帝本纪》、《李密传》、《张须陀传》、《杨善会传》等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隋朝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荒淫无耻以及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情况，《陈耀传》则记载了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隋书》的十志，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是《隋书》中分量最重的部分，尽管只有30卷，但在分量上却比本纪和列传的55卷还要多。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隋书》，共有1900页，纪传部分有900页，而十志部分则有1000页。十志虽在体例上没有什么创新，但由于它原本是《五代史志》，编撰者又都是优秀专家，因而在内容上特别充实。它以隋朝为重点，兼述南北朝各政权的典章制度及其源流，记叙严密而系统。例如，《经籍志》共记录唐朝以前的各种书籍14466部，合89666卷。它不仅总结了从东汉到唐初这六百年来的学术源流、书籍流传的情况，而且还创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学上具有范例作用，对后世的图书分类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了近代。再如，《食货志》虽然只有1卷，篇幅不多，但却对南北朝后期的经济情况，如均田制，货币、租庸调等作了一个总结概括。《地理志》分上中下3卷，大体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的行政区划为准，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地理沿革情况，保存了当时国内外的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乐志》3卷记叙了当时“九部乐”的源流、歌曲、乐器等，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因

此，宋人郑樵称誉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司马）迁、（班）固以来，皆不及也。"

【试　析】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祖籍为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其女杨丽华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杨坚因而担任了上柱国、大司马，逐渐把持了北周的朝政。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废除了年幼的静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隋朝。杨坚在位共24年，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先后派兵攻灭后梁、后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再一次统一了中国；他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九品官人法，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吏均由中央任免，并确立三省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他继续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搜查隐漏户口，重编户籍，削弱了豪强势力，使封建国家管辖的人丁数字大增，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而，《隋书·高祖纪》对他的政治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但同时也对他的过错进行了批评，说他"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毛泽东读《隋书·高祖纪》时，对这一评价部分中的"好

为小数，不达大体”以及“素无学术”、“持法尤峻”等内容特别注意，批注了四个字：“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之道，而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也很深刻。在中国历史上，一般都认为隋朝建于隋文帝而亡于隋炀帝，隋文帝是明君，而隋炀帝则是暴君。但毛泽东却认为隋朝的短命（581—618年），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隋炀帝的暴政，有许多亡国的因素都是在隋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因此，他在读史时，对隋文帝的言行十分留意。他在读《北史·隋本纪·高祖纪》时，也对隋文帝的错误举措作了批注。《北史·隋本纪·高祖纪》记载有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的一道诏书：“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的事。隋文帝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的蠢事。（杨倩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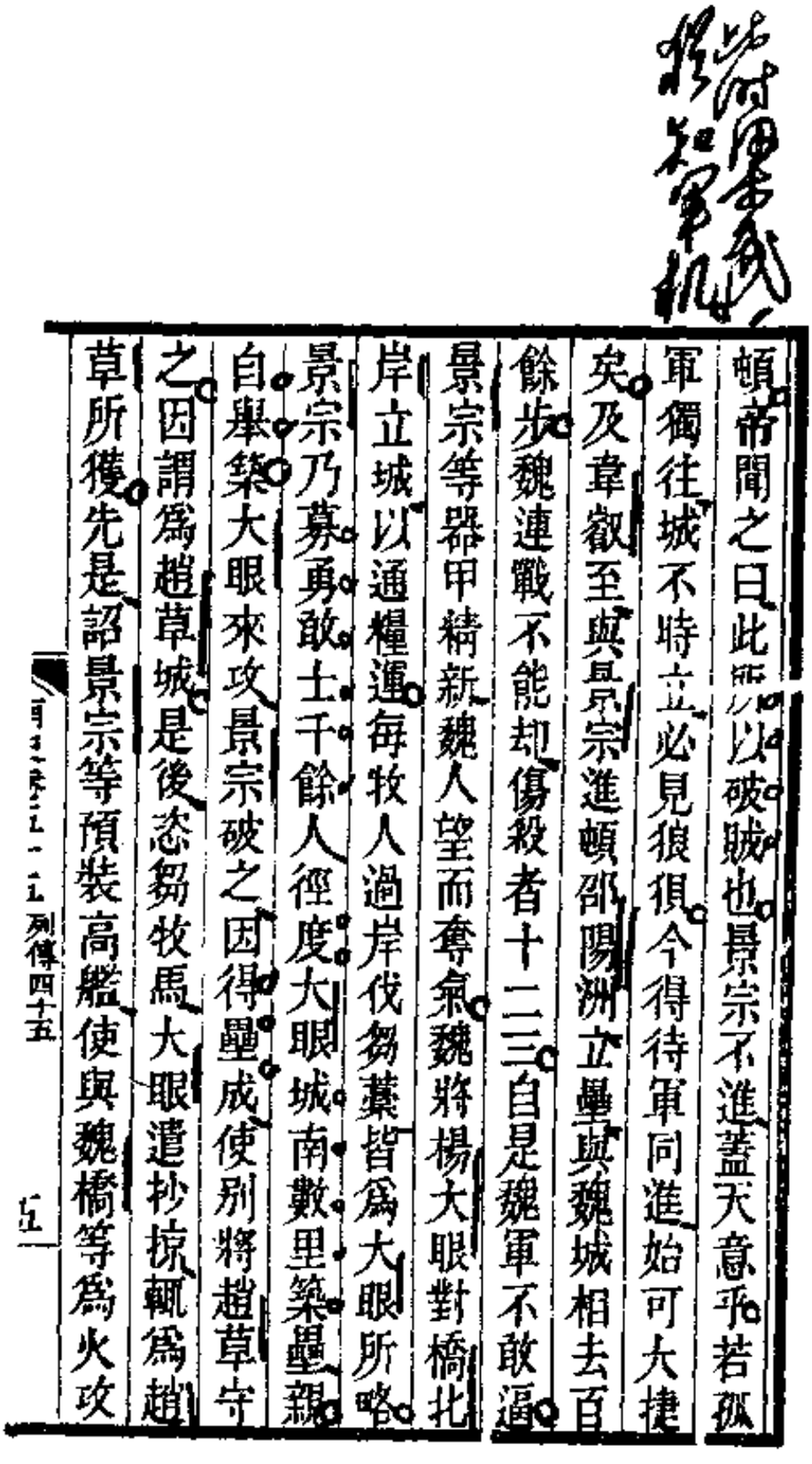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南史》

毛泽东对《南史》情有独钟。李延寿所记叙的梁武帝、韦叡、曹景宗、陈庆之等个性突出、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他或发感慨，或表钦佩、或加批评，在《南史》上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评点原文】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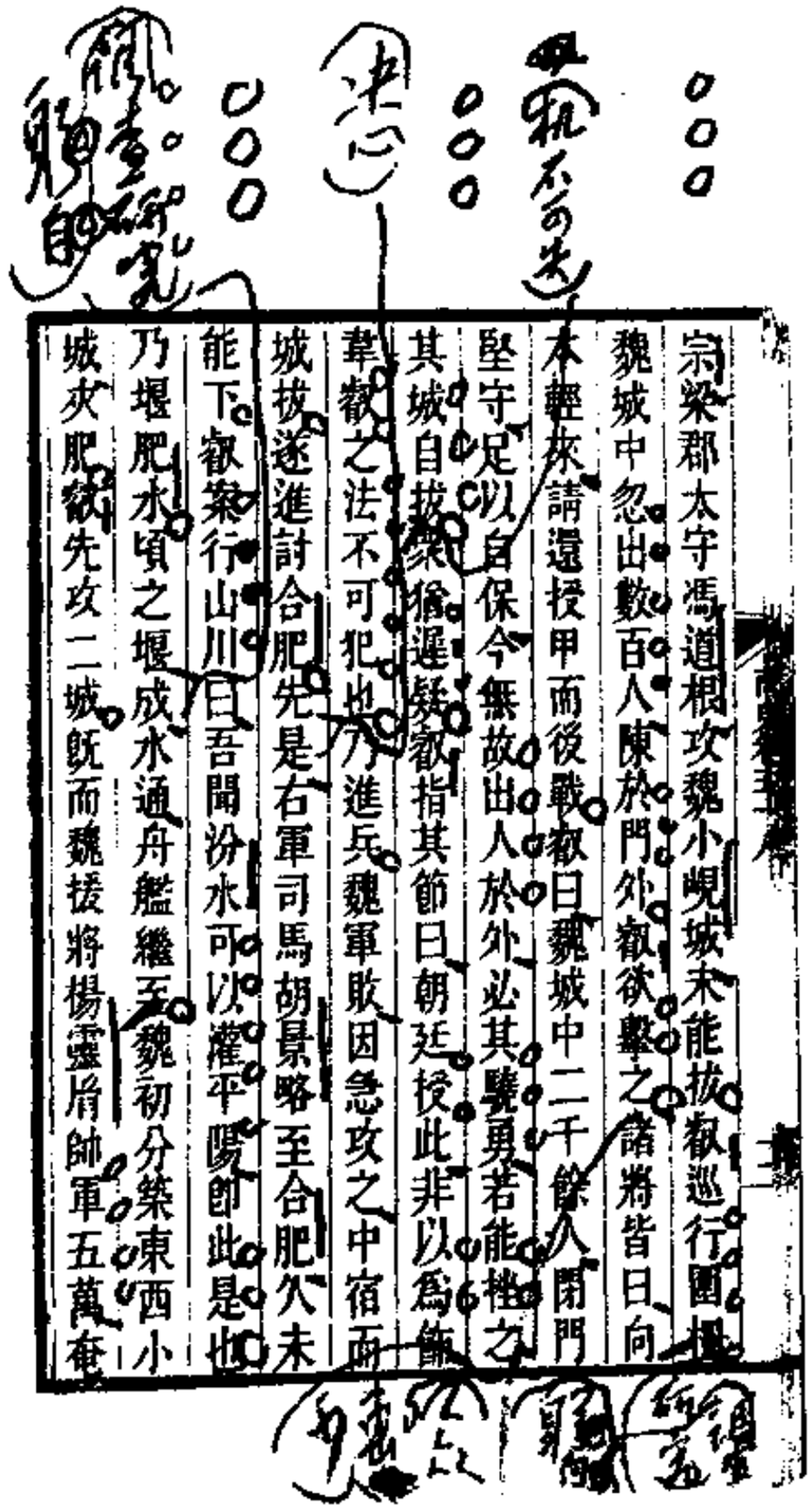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頓帝聞之曰此賊必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四十五 五

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壘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軍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次肥城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

毛泽东读《南史·韦叡传》的批语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毛泽东读《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袁顗无能。

——毛泽东读《南史·袁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南史·袁粲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此种推证，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无治，众皆效尤。

——毛泽东读《南史·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

语集》第1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南史·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曹景宗不如韦叡远矣。

——毛泽东读《南史·韦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景宗亦豪杰哉！

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

——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的批评（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南史》共80卷，是唐朝史学家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关于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纪传体通史。

李延寿（生卒年月不详）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大约生活在唐高祖、太宗、高宗时期。历任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职。

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在隋朝曾担任过州郡僚佐之类的官职。隋朝末年，李大师参加了窦建德的起义军，并担任其礼部尚书侍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唐军包围了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李大师奉窦建德之命，前往长安劝说唐朝撤围，结果被唐朝扣留。窦建德被唐军击败后，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靖远），直到武德九年遇到大赦才回到家乡。李大师早年就对南北朝的历史很有兴趣，遭到扣留和在流放期间，因缺少书籍，他不可能有著述的条件，但却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因而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他对南北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延寿在《北史·序》中说：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李大师回到家乡后，便开始撰写一部南北朝的编年史，但他只写了两年，便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病死了，其著述尚未完成。

李延寿决心继承父志，在父亲旧稿的基础上，改编年体为纪传体，撰写出《北史》和《南史》。然而，就个人状况而言，要想获得大量的史料，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上天不负有心人。贞观三年，唐朝设立史馆，李延寿进入史馆，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承担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贞观十五年，令狐德棻推荐李延寿参加了《晋书》的编撰工作。贞观十七年，褚遂良又推荐李延寿参加了《隋书》“十志”的编撰工作。这就为李延寿搜集史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追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因此遍得披寻。”

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经过16年的时间，李延寿终于完成了《北史》和《南史》的编撰。由于是私人编撰。李延寿遇到不少的困难。据他自己讲：“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自手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

《南史》记事起自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迄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了宋、齐、梁、陈四朝

共169年的历史。因《南史》是删改增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而成的，所以体例比较简单，只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其中，本纪分为《宋本纪》、《齐本纪》、《梁本纪》、《陈本纪》，列传则有《后妃列传》、《宋宗室列传》、《齐宗室列传》、《梁宗室列传》、《陈宗室列传》、《宋诸臣列传》、《齐诸臣列传》、《梁诸臣列传》、《陈诸臣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文学列传》、《孝义列传》、《隐逸列传》、《恩幸列传》、《海南诸国等列传》、《贼臣列传》。

《南史》文字简练而史料充实。《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原共有252卷，李延寿的《南史》却只有80卷，还不到四书总卷数的四分之一。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说："《南北史》就各朝正史，量为删减。《魏书》、《宋书》所删较多。《魏书》不过十之二三，《宋书》则删十之五六。"但李延寿所删去的，只是书中所记载的诏、诰、表、疏之类的文章，但在很多地方又增补了不少史料。但《南史》同《北史》一样也有不少缺点：一是仿照《魏书》的体例，不分朝代把祖孙父子都置于一位传主的传记中，成为一种大姓家谱式的史传，使人们查阅相关事伯时感到很不方便。一是删减文章太过分，使有些有价值的文章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删去了。一是有些叙事过分简要，影响了所记述事件的完整性。

【试　析】

刘宋时期的名将臧质，是毛泽东比较感兴趣的一位人物。他在《南史·臧质传》上批注道："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

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对臧质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

臧质（？—454年）字含文，祖籍为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臧质出身于世家大族，历任世子的中军参军、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国参军、给事中、建平太守、徐兖二州刺史、义兴太守等职。臧质虽为人放荡不羁，但颇有才干，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侵，进围汝南（今河南汝南）。刘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前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同救援汝南。臧质等人到达汝南时，遭到魏将乞地真的拦截。臧质麾军奋进，杀死乞地真，挫败魏军，迫使魏军撤围。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解汝南之围”。

同年十一月，北魏太武帝又率军进围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文帝任命臧质为辅国将军，领兵万人，救援彭城。当臧质到达盱眙时，魏军因未能攻克彭城，已转而南下，渡到淮河，逼近盱眙（旧治在今江苏盱眙北，已没入洪泽湖）了。臧质于是进入盱眙守城。北魏太武帝指挥魏军猛攻盱眙，但未能攻下。北魏太武帝想软化臧质，于是向臧质要酒喝。臧质装了一坛屎尿，送给了北魏太武帝。北魏太武帝大怒，便下令筑起长围，将盱眙城围得如铁桶一般。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是欲战法，激之使战。”对臧质送一坛屎尿以激怒北魏太武帝的做法作了分析。

当时流传着两首童谣，其中一首说：“虏马饮江水，佛狸（北魏太武帝的小名）死卯年（451年为辛卯年）。”臧质便引用童谣，写了一封信给北魏太武帝，大骂他此行是自己来送死的，并说：“如果你运气好，那还能被乱兵杀死；但如果你运

气不好，那就会被我活捉。我要用一头驴载着你，把你送到都城的市场上斩首。”北魏太武帝见信后，暴跳如雷，于是做了一张铁床，在铁床上加上了铁铲，说：“攻破盱眙城、抓住臧质后，定要把他放在这张铁床上铲死！”臧质针锋相对，又向魏军散发传单，写明如果谁杀死北魏太武帝，就封他做万户侯，赏赐布、绢各万匹。

盱眙之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打得异常艰苦。魏军先后动用了钩车爬城、冲车撞城，但由于盱眙城墙坚固，再加上臧质防守有方，魏军未能得逞。魏军后来又拼死抓城，与宋军进行肉搏战，但也被宋军挫败。魏军被击毙了万余人，尸体在城下堆积如山。北魏太武帝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悻悻撤走了事。宋文帝为嘉奖臧质的卓越战功，便任命他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二胜盱眙之敌”。

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太子刘劭因害怕失去皇位继承权，便谋杀了宋文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一面派人向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和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报告，一面率令五千人马火速向建康（今江苏南京）进军。四月，各路讨伐刘劭的人马在建康城外的新亭拥立刘骏为帝，是为孝武帝。五月，臧质、薛安都、程天祚等人攻入建康，生擒了刘劭。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克刘劭之逆”。

孝武帝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大肆镇压异己。而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不把孝武帝放在眼里，就更犯了大忌。臧质当初就不太愿拥立孝武帝，而倾向于让孝武帝的叔叔刘义宣当皇帝。于是，臧质曾多次劝刘义宣举兵自立，但刘义宣生性胆小，不敢造反。不久，当刘义宣得知孝武帝与自己的女儿淫乱的事情后，勃然大怒，因而听从了臧质的再次劝

说，联络豫州刺史鲁爽和兖州刺史徐遵宝，约定在建武元年（454年）秋季共同举兵。然而，鲁爽由于当时喝醉了酒，听错了日期，结果在当年正月便举兵造反了。刘义宣和臧质无奈，也只好提前起兵，顺流东下，进攻建康。

孝武帝命令王玄谟屯兵梁山，垣护之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柳元景屯兵采石（今安徽马鞍山），王玄谟屯兵梁山洲（是历阳和采石间长江中的沙洲），共同阻截刘义宣和臧质的大军。臧质针对敌情，向刘义宣建议："如今用一万人攻取南州，梁山自然便被隔绝了；用一万人牵制王玄谟，王玄谟必然不敢轻动。我从外江通过，直取石头。这是上策。"刘义宣原本同意了臧质的这个计划，但刘义宣的门客颜乐之却对刘义宣说："臧质如果再攻下了东城，那大功就全都归他了。您应该派遣自己的部下去。"结果臧质的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实施。五月十九日，臧质率军进攻王玄谟，占领了梁山洲。但后来当臧质再次攻击王玄谟时，却因遭到王玄谟、薛安都、垣护之等人的夹攻而受到重创。臧质想找刘义宣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时，而刘义宣早已惊惶逃跑了。臧质无法，只好也逃回了寻阳，放火烧掉了自己的房屋，带着妓妾，乘船到南湖中藏身。其后，被追兵发现，被乱刀砍死。

李延寿在《南史》卷18的"论"中说："含文（臧质的字）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李延寿的这个观点，而是对臧质的不幸感到惋惜。他在记述梁山之战说部分批注道："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但毛泽东在前面"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这句话曾用红笔划上了着重线，并批注有"此是妄想"四个字。这说明，毛泽东对臧质的为人还是有批评的。对臧质这位"豪杰之士"

一生的评价，应该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在褒中有贬。

袁颢（？—466）字国章，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袁颢出身于世家大族，早年曾任豫州主簿、晋陵太守、领军前将军等职。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465年），袁颢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不久改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袁颢见前废帝荒淫暴戾，政权不稳，便与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邓琬等人联络，于景和元年冬奉年仅10岁的晋安王刘子勋为盟主，举兵反叛。这时，湘东王刘彧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前废帝，自立为帝，是为宋明帝。

袁颢与邓琬等人不愿承认宋明帝，但拥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建年号为“义嘉”，与宋明帝对抗。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徐州刺史薛安都、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湘州行事何文惠、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豫州刺史殷琰、司州刺史庞孟虬等人也都加入了刘子勋集团。

袁颢被刘子勋任命为安北将军、尚书左仆射，是刘子勋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然而，袁颢却为人吝啬、志大才疏。《南史·彭凯传》记载：彭凯“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因而尽管刘子勋集团表面上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却因袁颢等人的无能，导致众人离心离德，所以并没有能真正形成战斗力。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宋明帝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消灭了刘子勋集团。袁颢所部，未经一战，将士便纷纷溃散而去。袁颢本人也被部下砍了头。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反面的教训也十分留意，因而袁顗的所作所为也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南史·袁顗传》后，批注道："袁顗无能。"这不仅是对袁顗个人的评价，也是对刘子勋集团失败原因的总结。

袁粲（420—478 年）字景倩，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袁顗的堂弟。袁粲虽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衰，早年日子过得很苦。袁粲从小好学上进，常常裹着破衣服读书，足不出户。

宋文帝时，袁粲做了扬州从事，开始步入仕途。到宋明帝初年，袁粲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后，历任领军将军、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宋明帝临死时，特意委托袁粲与褚彦回、刘昱共同辅佐太子刘昱。刘昱即位后，是为后废帝。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 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造反，杜黑骡、丁文豪等人起兵响应，攻入建康。这时，因指挥混乱，宋军将士都丧失了斗志。袁粲见形势危急，便慷慨激昂地对宋军将领说："寇贼已经逼近，而大家却惊慌失措。我受先帝的顾托，原本就该以死相报。今日我愿与褚彦回护军一道为国家而死！"宋将陈显达等人受到感动，冒死出战，终于击败了杜黑骡、丁文豪等人，使建康形势转危为安。

宋顺帝刘准即位后，袁粲担任了中书监，同时仍担任司徒、侍中。这时，官居司空、骠骑大将军的萧道成已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加紧了篡夺刘宋政权的政变准备。宋顺帝升明元年十二月（478 年 1 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从江陵起兵，进攻建康，想要消灭萧道成。袁粲为保住刘宋政权不至于落到萧道成

之手，便与尚书令刘秉、前湘州刺史王蕴等人一道，假传皇太后旨意，命令宋将卜伯兴、黄回等人率领禁卫军进攻萧道成。但由于萧道成早有防范，袁粲等人组织的进攻遭到了失败。萧道成派部将戴僧静领兵前去杀害袁粲。彭粲的儿子袁最抱着父亲，大叫："请让我先写！"戴僧静的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袁粲对儿子说："我不失忠臣，你不失孝子。"他要来笔墨，写下一道诀命书："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魂归坟垅，永就山丘。"父子两人同时被戴僧静杀害。

毛泽东对袁粲的气节感到钦佩，于是在《南史·袁粲传》后，批注道："袁粲死节。"

孔琇之是南北朝萧齐政权时期的人。其祖父孔靖、父亲孔灵运在刘宋政权时期都曾身居要职。据《南史·孔琇之传》记载，孔琇之在担任吴（今江苏苏州）县令期间，有一位10岁的小孩到邻居家稻田里，偷割了一束稻子。孔琇之便将他抓了起来，要治他的罪。有人认为孩子还小，便劝说孔琇之不要这样做。但孔琇之却振振有词地说的："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于是，这个孩子便被孔琇之治了罪。全县都被这件事情震惊了，没有人再敢犯罪了。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用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们的错误，因此对孔琇之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以及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极为不满，用红铅笔在这一段上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提出了异议。他在天头上批注道："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无治，众皆效尤。"并联系当时的实际，对"如曰一人小过无治，众皆效尤"的状况抒发了自己多少有些忧虑的感慨。

梁武帝萧衍（446—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旧治在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其父萧顺之为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道成推翻刘宋政权、建立萧齐政权后，萧顺之因参与政变有功而被封为临湘县候，历任侍中、领军将军、丹阳尹等要职。

萧衍喜爱读书，博学多才，长于文学，精通音乐，擅长书法。年轻时曾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名士交结，号称“八友”。萧衍也颇有政治和军事才干，足智多谋。他最初担任卫军王俭的东阁祭酒，后因军功而被封为建阳县男，不久又担任了司州刺史。齐明帝死后，萧衍担任了都督、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这时，萧齐政权已发生了严重的内乱。

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平二年（500年）十一月，萧衍利用萧齐政权的内乱，举兵反齐。第二年三月，萧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称帝，改元中兴，宣布将萧宝卷废为涪陵王。萧宝融即齐和帝。齐和帝任命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乐大将军，派他率军顺流东下，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同年十二月（502年1月），萧宝卷被杀，萧衍攻入建康。中兴二年（502年）三月，齐和帝下诏禅位于萧衍。四月，萧衍称帝，改年号为天监，建立了梁朝，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也颇有战略眼光。如齐明帝建武二年（496年）春，北魏兵分数路大举南侵。萧衍受命担任偏将军，跟随左卫将军王广之出兵，救援被北魏军队围攻的司州州治平阳（今河南信阳）。齐军推进到距平阳百里左右的地方时，因见魏军的军势强盛，众将胆怯，竟裹足不前。王广之派徐玄

庆抢占了贤首山，但又被魏军包围。萧衍挺身而出，利用夜色掩护，率军从魏军的空隙中登上了贤首山，与徐玄庆会合，牢牢控制住了这一战略要地。当双方决战之时，正巧有一阵大风刮向西北，萧衍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向将士们高喊："这就是所谓的'归气'，魏军要逃了！"将士们大受鼓舞，奋勇向前，与城内守军内外夹攻，击败了魏军。

再如《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十一月，北魏中山王元英率领大军围攻萧梁的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旧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梁武帝命令征北将军曹景宗指挥各路援军前往解围。梁武帝诏令曹景宗先屯驻在道人洲，等待各路援军到齐后再一起向前推进。但曹景宗为了抢头功，却违背命令抢先进军。由于途中遭遇暴风，不少战船被刮翻，曹景宗只好又退了回来。梁武帝得知此事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后来，梁军果然大破魏军。

毛泽东在此段加了帝圈，在天头上写道："此时梁武，犹知军机。"肯定了梁武帝在天监五年以前的军事才能。

梁武帝在位48年（502—549年），早期常以萧齐政权灭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但在其统治后期，却沉溺于佛教，容忍权贵违法乱纪，听不进不同意见，任用小人，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

据《南史·贺琛传》记载，在梁武帝的晚年，散骑常侍贺琛上书，对当时户口数量减少、新收复地区拖欠赋税、官吏贪污凶残、无耻之徒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晋升、国家的开支太大等政治弊端提出了批评，并建议梁武帝制订严厉的制度，加

强对官吏的节俭教育，以刹住官吏的贪污和奢侈之风；在提拔官员时要强调公平的原则，在国家的开支上要强调节约的原则等等。梁武帝看了贺琛的奏书后大怒，立即写了一封敕书，对贺琛进行斥责。首先，梁武帝认为："自己即位40余年来，历来都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你贺琛出身名门望族，不能象那些没有教养的人一样，没有根据地胡说八道。只认为我能上书提意见，只恨朝廷不能接受。你不是说官吏有过错吗？那你就具体说出是谁！"

毛泽东读到这里，认为梁武帝的这些话与三国时吴国的皇帝孙权反驳名将陆逊意见的话如出一辙，便批注道："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对梁武帝的强辞夺理提出了批评。

梁武帝认为自己能够以身作则，说："朕绝房事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睡觉也有三十年了。朕住的房间只能摆下一张床，各类奢侈品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皇宫。这也是人们都知道的。朕平生不喝酒，不喜欢听音乐。朕三更就起来处理公务，如果事情多，那就得忙到傍晚才能吃上饭。朕过去的腰围超过了十围，可如今瘦得只有二尺多了。朕过去用的腰带还留着呢，决不是胡说。"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认为梁武帝所说的情况尽管属实，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这虽然是难得的，但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小节，无关于政治，而"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才是梁武帝所犯错误的要害。

梁武帝认为贺琛批评他不听官员奏事便武断地提拔官员不公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任用官员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古人曾

经说过："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而朕并不是不知道。如果因为其中有小人，就不让臣下向皇帝奏事，那在道理上能说得过去吗？因此，你贺琛必须说出朕提拔谁恰当、提拔谁不恰当来。

毛泽东针对梁武帝的狡辩，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顺便用梁武帝所引用的古人这句话批注道："'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梁武帝最终还是因"予智自雄"而葬送了自己。中大同二年（547年），他不听臣下的劝说，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归降。其后，反复无常的野心家侯景乘机攻破了建康，梁武帝反成了侯景的阶下囚，在被软禁期间懊丧地死去了。终年86岁。

《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在《梁武帝本纪》末尾对梁武帝评论道："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胜势，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李延寿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比较公允的。梁武帝不就是一味仿效西周时徐国国君徐偃王的那种仁义，"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以致于造成自己得到天下、而天下又在自己手中丧失的吗？

毛泽东对于梁武帝这个前半生与后半生的作为和境况完全

不同的封建帝王有着许多的感慨。他不仅在“忘情干戚”、“驰于刑典”、“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等字句旁密密圈点，并画有着重线，而且还借用五代诗人罗隐所写的悼念三国诸葛亮的《筹笔驿》一诗中的诗句，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以表达自己对梁武帝的嗟叹之情。

韦叡（442—520年），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刘宋时期，他曾担任过雍州主簿等职。萧齐时期，历任齐兴太守、右军将军、上庸太守等职。齐东昏候永元三年(501年)，他跟随梁武帝萧衍起兵反齐，很受梁武帝看重。梁武帝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廷尉，封都梁子。其后，历任豫州刺史、雍州刺史、护军、车骑将军等职。

韦叡为人严谨，处事大度，爱护士兵，军纪严明，富有谋略，善于出奇制胜，是萧梁时期的著名将领。天监四年，韦叡奉梁武帝之命，率军反攻北魏，屡破北魏大军，攻取了合肥。次年，他又随曹景宗出兵援救钟离，大败北魏中山王元英，救出了被围的司州刺史昌义之。天监八年，他又率军援救司州刺史马仙琕，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与魏国相持，迫退了魏军。韦叡因身体虚弱而不能骑马，因此常坐在板舆（担架）上督战。魏国非常害怕他，称他为“韦虎”或“韦武”。

毛泽东很爱读《南史·韦叡传》。因《韦叡传》与《裴邃传》一道，都列在《南史》卷58中，因而毛泽东在这一卷开始的天头上，便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并标写道：“梁将韦叡、裴邃传。”在《韦叡传》文内，毛泽东更是密加圈点，并作了25处批注。

韦叡作战善于把握战机。例如，在天监五年的合肥之战中，韦叡先派部将王超宗、冯道根率兵进攻北魏的小岘城，但王超宗、冯道根却未能攻下。于是，韦叡亲自前往小岘城指挥作战。当他率领部队抵近到城下勘查地形时，城中忽然冲出来几百名魏兵，在城外布列战阵，向梁军挑战。韦叡相要乘机攻击他们，但部将们却都劝阻他说："我们是轻装前来，不便迎战。请让我们回去披上铠甲后，再来迎战。"韦叡说："城中的魏军有两千余人，如果闭门坚守，那完全有力量能守住城池。如今却无缘无故放出来几百人。这些人一定是魏军中骁勇善战之辈。我们如果能够挫败他们，那城中的魏军就会丧失斗志。这样一来，这座城自然也就能攻下了。"但部将们仍然迟疑不决。韦叡于是指着手中都督的节仗说："朝廷把这节仗授予我，不是用来作装饰的。韦叡的法度，不可违犯。"于是，梁军向魏军发动进攻，打败了出城挑战的魏军，并乘势猛攻小岘城，没用多少时间便攻克了这座敌城。

毛泽东在《南史·韦叡传》的这段记叙旁批注道："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对韦叡临机应变的能力作了有力的肯定。

韦叡在攻克小岘后，便率军进攻合肥。韦叡的右军司马胡景略在韦叡之前便率部到了合肥，但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韦叡对合肥周围的地形地貌进行仔细观察后，对部将们说："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这就同'汾水可以灌平阳'一样。"于是，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筑堰拦截淝水，把水灌到了合肥城下。韦叡决定先攻下合肥城东西两旁的两座小城，但这时北魏大将杨灵胤却率五万援兵突然来到了合肥。韦叡的部将请求等朝廷增兵以后再战，但韦叡不为所动，指挥部队很快就攻克

了这两座小城，稳定了部队的情绪。魏军进行反扑，相要捣毁梁军修筑的堤堰。梁军的军监潘灵祐劝韦叡退守巢湖，大多数将领则劝韦叡退保三义。韦叡大怒，说："作战失败，将军首先该死。如今是有前无退！"他将自己的旗帜树立在堤堰下，以示无退兵之志，并亲自指挥作战，击退了前来凿堤的魏军。其后，他派出梁军的战舰，直抵合肥城下。因合肥城被水淹灌，梁军的战舰与城头的高度相等，因而梁军最终攻破了合肥。

毛泽东在这里有两处批注：一是"以少击众"，一是"将在前线"。这一方面表达了毛泽东对韦叡的赞许，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作战原则的表白。

天监五年，韦叡奉梁武帝之命，率军前往邵阳洲，与曹景宗会合，共同出兵援救钟离。韦叡率部从合肥穿过阴陵大泽，急速向钟离开进。当时，北魏中山王元英所率领的军队号称百万，连城四十余座。部将见魏军兵力强劲，感到害怕，便让人出面劝说韦叡缓慢推进。但韦叡却说："如今钟离上空箭如雨下，城里的守军只能是凿洞居住、背着门扇出来打水。我们即使是象车子一样奔跑还担心救援不及呢，更何况放慢进军速度呢！"结果，韦叡所部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便赶到了邵阳洲。其后，韦叡又与曹景宗齐心协力，最终击败魏军，获得大胜。

毛泽东对韦叡敢于赴汤蹈火的勇气十分钦佩，在这一段上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毛泽东不但赞赏韦叡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同时也嘉许韦叡仁厚的品德和作风。例如，

韦叡善于团结部下和调解部下的矛盾。在合肥之战中，韦叡的右军指挥官胡景略和前军指挥官赵祖悦在一起作战时发生

了冲突，闹得关系十分紧张，彼此都想要找机会陷害对方。胡景略甚至在一怒之下因咬牙切齿而咬得满嘴流血。韦叡认为将帅不和将会给全军带来祸患，于是亲自出面调解。他知道问题的关键在胡景略，便首先做胡景略的工作，给胡景略斟上酒，向胡景略请求说："我希望两位虎将不要再私斗。"韦叡最终调解了两人的矛盾，使整个战役进程没有受到影响，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此很有感触，于是在这里批注道："干部需和。"

作为主将，韦叡的日常工作相当繁忙，甚至连屯驻地的营房修建的标准等问题都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他白天要接待各种客人，晚上则要考虑军事问题。常常是三更起床，一直工作到天明，而且，他接人待物，非常客气，因而想要报效国家和想要做出番事业的人士都争相恐后地前来投奔他。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逐字旁圈，并批注道："劳谦君子。"

韦叡有着过人的优秀品质。如《南史·韦叡传》记载：韦叡攻克合肥时，一切缴获都归公，"所获得军兵，无所私焉"。韦叡生性慈爱，抚养死去兄长的儿子比抚养自己的儿子还要周到。他当官所得的俸禄，都分发给亲戚朋友，而自己则是"家无余财"。毛泽东在这此记述旁分别批注道："不贪财"、"仁者必有勇"。

韦叡为人也很厚道。在救援钟离获胜后，被救的司州刺史昌义之连声呼喊："我获得了再生、我获得了再生！"为了报答韦叡和曹景宗的救命之恩，昌义之特意拿出 20 万钱设赌，让韦叡与曹景宗玩掷骰子赌输赢。韦叡赢了，却故意重掷一次，输给了曹景宗。当取得胜利后，曹景宗与其他将领都争先向梁武帝报捷，但韦叡却总是在最后才向梁武帝报捷，从不与他们

计较。韦叡因此而搏得了世人的赞誉。毛泽东对此分别批注道："使曹景宗胜"、"曹景宗不如韦叡远矣"。

李延寿在《南史·韦叡传》的末尾对韦叡的生平作风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韦)叡有旷世之度，沈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

毛泽东很欣赏这一段文字，在这里批注道："我党干部要学韦叡作风。"既然毛泽东要把韦叡的作风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可见韦叡作为一位古代的名将，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曹景宗（457—508年）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曹景宗出身将门，其父曹欣之，曾任刘宋政权的徐州刺史。曹景宗自幼喜好打猎，精于骑马射箭，有豪侠之风，以胆勇闻名。在围猎中，当众人骑马追上獐鹿、马鹿混杂奔驰时，他能一箭准确地射中獐鹿而不伤人马。当遭到几百蛮贼包围时，他能镇静自若、箭无虚发，击退蛮贼。当他朋友的父亲因犯法而被处决，在没人敢去收尸的情况下，他却敢出面收尸。曹景宗还爱读史书，少年便有大志。据《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曹景宗"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

对《南史·曹景宗传》中的这些记述，毛泽东多有圈画，有好几处还是逐字作了旁圈。

曹景宗在萧齐时期便是有名的战将，历任游击将军、竟陵太守等职。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他曾随太尉陈显达北

征，以奇兵两千大破北魏中山王元英的四万大军。梁武帝起兵反齐时，曹景宗召集家族子弟300人从军，并担任先锋，被甲驰战，为梁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梁武帝即位后，曹景宗即被封为湘西县候，授予郢州刺史、加都督。

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北魏中山王元英进攻钟离，萧梁政权的徐州刺史昌义之被围。梁武帝诏令时任右卫将军的曹景宗都督众军前往救援，时任豫州刺史的韦叡当时也受曹景宗指挥。尽管曹景宗开初因争功心切，孤军冒进，遭遇暴风而受到小挫，但当韦叡赶到后，两人却能齐心协力，击败魏军，赢得了钟离之战的胜利。

曹景宗作战，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钟离之战中，曹景宗与韦叡首先逼进屯邵阳洲，抵近魏军城寨百余步建起堡垒，并与魏军连续交战，“杀伤者十之二三”，打出了军威，使魏军从此不敢再小看梁军，心有余悸。接着，曹景宗又招募一千余名勇士，再次推进到北魏骁将杨大眼的城寨南数里的地方筑城，并亲自参加筑城。杨大眼来攻，被曹景宗击败，从而建起了这座“赵草城”。第二年三月，趁春水泛起、淮水暴涨六七尺的有利时机，曹景宗与韦叡兵分两路，根据梁武帝的诏令，各攻一桥，用火攻的战术，将魏军架在淮水上的两座浮桥首先烧掉，把东西两岸的魏军分隔开来。接着，曹景宗与韦叡协同作战，命令“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魏军在梁军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吓得胆战心惊，西岸的杨大眼、东岸的元英都烧营弃城逃跑。魏军“诸垒相次土崩”，士兵“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缘淮百余里尸骸相藉”。梁军俘虏魏军“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毛泽东读到此处，对曹景宗的勇猛剽悍的战斗作风十分

赞赏，不禁批注道："良将也，仅次于韦叡、裴邃。"

曹景宗也颇有文才。钟离之战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为曹景宗举行庆功宴会，叫左仆射沈约赋韵，让大家饮酒赋诗。沈约是当时的文豪，认为曹景宗只是一介武夫，便没有给曹景宗诗韵。曹景宗非常生气，乘着酒醉，便向梁武帝再三要求赋诗。梁武帝只好让沈约把剩下的"竟"、"病"两韵给了他。曹景宗提起笔，很快便写出了一首好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曹景宗在这里用霍去病作比，不仅显得很有气势，而且也极为贴切。梁武帝赞吧不已，沈约和许多颇有才华的大臣也"惊嗟竟日"。结果，梁武帝还下令将曹景宗的这首诗录入国史。

毛泽东对曹景宗的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他的文采颇为赏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善于学习，还特意将曹景宗的这段佚事来作号召，说："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曹景宗与韦叡这种近乎完人的"劳谦君子"的形象迥然不同，他身上有着许多令人不能接受的毛病。《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中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住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曹景宗为人好胜争强，除韦叡外，他谁都瞧不上。

然而，曹景宗为人不拘小节，对标志着权贵和地位的那些繁文缛节和虚伪的排场，他是极为厌恶的。《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

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毛泽东为人也十分慷慨豪迈，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让自己的性格受到束缚。因而，《南史·曹景宗传》所载的这段曹景宗的自白引起了毛泽东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令他非常感兴趣。他不仅在“作贵人，动转不得”等处逐字密密加了旁圈，还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道：“景宗亦豪杰哉!”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与《南史·曹景宗传》的这段生动的文字相映生辉，活脱脱地烘托出了一个真实可信、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着强烈向往的曹景宗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比韦叡、曹景宗晚出的梁朝名将陈庆之，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个人物。毛泽东在载有《陈庆之传》的《南史》卷61的书封上，曾用粗重黑铅笔划着两次阅读此传的圈记，并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着两道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用苍劲的笔迹，标写了“陈庆之传”四个醒目的大字。

陈庆之（484—539年）字子云，义兴国山（旧址在今江苏宜兴西南）人，出身于寒门。他从小便做了梁武帝萧衍的仆人，对梁武帝的侍候十分殷勤周到。梁朝建立后，梁武帝便让他做了官。陈庆之历任主书、奉朝请、武威将军、右卫将军、北兖州刺史、南司州刺史、北司州刺史等职。在整个梁朝时

期，出身寒门而做到高官，就只有陈庆之和另一位梁将俞药。

陈庆之富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能攻善守，能临机决断，出奇制胜。梁武帝普通六年（525 年），北朝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任命让陈庆之为武威将军，让他与胡龙牙、成景俊等人率军接应元法僧。陈庆之完成任务返回后，梁武帝授予他为宣猛将军，又让他护送豫章王萧综人镇徐州。北魏派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 10 万大军来争夺徐州，但被陈庆之挫败。梁武帝担心梁军失利，诏令萧综引军南撤。但这时心怀叵测的萧综却与左右心腹一道投奔了北魏。梁军失去主帅，处于危境之中。陈庆之当机立断，迅速斩关夜退，保全了梁军。

梁武帝大通元年（527 年），陈庆之跟随领军曹仲宗北伐，进攻北魏南兖州的治所渴阳（今安徽蒙城）。北魏派常山王元昭率军南下增援，部分梁将已有胆怯之心。但陈庆之却趁敌军远来争锋、人马疲惫之际，率 500 骑兵在距渴阳 40 里的驼涧，迎头拦截，击破魏军前军，使魏军震恐丧气。其后，双方在渴阳展开攻防战，从春到冬，总共战了数十百个回合，两军都打得疲惫不堪。这时，北魏又派来了救兵，乘势想要包围梁军。梁军主帅曹仲宗等人担心腹背受敌，打算南撤。陈庆之反对退兵，认为现在把斗志消沉的梁军置于绝境反而能够取胜。他手持节杖，往军门一站，对曹仲宗说："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教。"曹仲宗认为这个计策不错，便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时，魏军在渴阳城外构筑了 13 座堡垒，犄角相连。陈庆之率军勇往直前，一战便攻破了四座敌垒。接着，陈庆之又将魏军的尸体和俘虏全都摆放在阵前，以壮军威。各路梁军受到陈庆之所部胜利的鼓舞，斗志倍增，最终将魏军全部击败，获得大胜。

大通二年（528年）四月，北魏的秀容部酋长尔朱荣利用北魏内乱，进军洛阳，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把持了北魏朝政。元子攸即为北魏孝王帝。北魏的北海王元颢见势不妙，便南下投降了梁朝。梁武帝想乘机向北扩张，便于这年十月封元颢为魏王，任命陈庆之为飚勇将军，派他率军护送元颢北还，以争夺王位。陈庆之一路夺关斩将，连克铚县（今安徽宿州）、荥城（今河南宁陵），于第二年四月击败北魏都督丘大千，占领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元颢在睢阳正式称帝，并任命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北魏派济阳王元晖业领兵两万前来救援，屯驻考城（今河南民权）。陈庆之又攻克考城，生擒了元晖业。北魏大梁城（今河南开封）的守军也被迫投降。

北魏派左仆射杨昱等人率领7万魏军固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又派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军占据虎牢，以阻止陈庆之向洛阳进军。为确保荥阳，北魏还派遣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人率军增援荥阳。陈庆之在荥阳城下对将士们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的激励下，梁军一鼓作气，在魏军援军赶到之前，迅速攻克了荥阳。不久，北魏援军赶到，又包围了荥阳。陈庆之趁敌军立足未稳，率3千精兵出城迎战，大破魏军。鲁安投降，尔朱兆等人狼狈逃走。陈庆之麾军进攻虎牢，尔朱世隆不敢抵抗，弃城而逃。北魏孝庄帝放弃洛阳，逃往河内郡（今山西沁阳）。元颢于是进入洛阳，改元大赦，并任命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陈庆之从铚县到洛阳，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47次战斗，共攻克大小城池32座，可谓所向无前。因陈庆之所部都穿着白色的战袍，因此洛阳一带便流传出了一首民谣：

“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元颢在利用梁军兵力登上皇位后，便图谋摆脱梁朝的控制。陈庆之因麾下的人马不到一万，便向元颢建议，请他出面向梁武帝要求派兵增援，并解放以前被俘的梁朝将士，以补充部队。但另有所图的元颢却给梁武帝写了一封密信，请梁武帝不要派兵北上。梁武帝不便回绝元颢，只好答应了。这样一来，洛阳城中的梁军不到一万，而元颢的人马却有十万。陈庆之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他见前途不妙，曾向元颢请求出任徐州刺史，但却遭到了元颢的拒绝。陈庆之的军副马佛念建议杀掉元颢，占据洛阳，但因涉及到梁朝与元颢政权的关系问题，所以生性谨慎的陈庆之没有同意。

北魏大将尔朱荣、尔朱世隆等人在得到喘息之机后，又纠集人马，号称百万，向洛阳反扑而来。元颢进入洛阳仅有 65 天，洛阳便又陷入了北魏军队的包围中。陈庆之为了打破魏军的包围，便根据元颢的命令，渡过黄河，固守北中郎城。这时，元颢被尔朱荣击败，逃到临颍后被魏军活捉。陈庆之见大势已去，便集中所部数千人马，边战边撤，在到达阳城（今河南登封）一带时，因作战失利，部队溃散，陈庆之只好扮作僧人，从小路逃回了梁朝。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 年），陈庆之担任了南北司州刺史、加都督。陈庆之又向北进攻，击败了魏将娄起、是云宝等人。梁武帝大同二年（536 年），陈庆之又击败东魏大将侯景。

在整个南北朝期间，南北交兵，多是北朝南侵，南朝多居于守势。陈庆之的北伐，可以说是创造了南北朝战争史上的奇迹。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辉煌战绩，不能不激起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的浓烈兴趣。因此，他反复阅读了《南史·

陈庆之传》，并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写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1969 年 6 月 3 日在武昌"。从如此特殊的读书标记和批注，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陈庆之军事成就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北史》

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毛泽东读《北史》，对战争中必然会出现的战俘问题非常关注。他对《王建传》的批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战俘问题，显得凝炼而深刻。

【毛泽东评点原文】

王建膺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北史·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北史》共有100卷，是唐朝史学家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关于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代等王朝的纪传体通史。

《北史》记事起自北魏道武帝拓跋鬉登国元年（386年），迄于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年），记载了从北魏到隋末共232年的历史。《北史》同《南史》一样，也只有本纪、列传两种体例。其中，本纪12卷，分为《魏本纪》、《齐本纪》、《周本纪》、《隋本纪》；列传88卷，分为《后妃列传》、《魏宗室列传》、《齐宗室列传》、《周宗室列传》、《隋宗室列传》、《魏诸臣列传》、《齐诸臣列传》、《周诸臣列传》、《隋诸臣列传》、《外戚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孝行列传》、《节义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隐逸列传》、《艺术列传》、《列女列传》、《恩幸列传》、《僭伪列传》、《高丽列传》、《序传》。

《北史》大体上是删补《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的。对《魏书》是删多补少，对《北齐书》和《周书》是补多删少，对《隋书》则是略有删节。《北史》对《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削的多是诏、诰、表、疏。在体例上，《北史》对所记述的对象也作了不少结构的调整和补充。如，《北史》的北魏（包括东魏和西魏）部分尽管多用《魏书》的史料，但鉴于《魏书》没有为西魏立传，因此李延寿便根据《魏书》又补写了西魏的三个帝纪。同时，又增补了梁览、雷绍、毛遐等人的专传。再如，《周书》没有《文

苑传》，《北史》为填补这一空缺，便选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其弟颜之仪入《文苑传》。其中，颜之推本在《北齐书》的《文苑传》中，因其后又在北周做官，所以李延寿便在《北史·文苑传》中将他放在北周一段。为了能使各朝传主的比例均衡以及名实相符，李延寿又对各书《文苑传》、《文学传》的传主数量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如，《魏书·文苑传》原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等8人，但《北史·文苑传》只取了温子升，其余的人物都附在各自的家传中；《隋书·文学传》原有刘臻、崔颉、王儁、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等10人，但《北史·文苑传》却只取了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等7人，而将崔颉、王儁、孙万寿等3人放入各自的家传，同时又增补了虞世基、许善心、柳誓、明克让等4人。又再如，《魏书·酷吏传》原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赫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等9人，《北齐书·酷吏传》原有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等4人，《北周书·酷吏传》原有王文同，而《北史》则将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等7人放入各自的家传，把其余的7人列入《酷吏传》。李延寿这样的重新划分，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北名》同《南史》一样，也以文字简练见长。北宋司马光赞誉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祇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言之也。"宋祁也在《新唐书·李延寿传》中称赞说："其书甚有条理，刊落酿辞，过本书（即南北朝各史）远甚。"而且，由于《北史》和《南史》的篇卷较少，容易抄写，所以在印刷术尚未问世之前，它们的流传

较广。到宋朝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但《北史》和《南史》却还相当完整，因而宋人便用《北史》和《南史》的有关篇卷来为《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补缺。由此可见《北史》和《南史》的价值之高。

当然，《北史》同《南史》一样，也有明显的缺陷。撰写史书，最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是撰写“志”和“表”。但《北史》和《南史》一样，既没有“志”，也没有“表”。这首先是它最不足的地方。其次，《北史》对南北交战的史事删削过多，使许多重大战役的进程不甚明白。另外，对一些历史事件还有部分记述上的错误。因此，阅读《北史》还必须与《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相互参考。

【试　析】

《北史·王建传》记述了北魏与后燕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之战的部分情况。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十年（395年）七月，定都于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其子慕容宝率领八万大军进攻北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率军迎战，击败了燕军。慕容宝被迫引军南撤。同年十一月，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追上了燕军，将燕军主力歼灭，慕容宝单骑逃遁。

参合陂一战，北魏生擒了后燕王公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拓跋珪从中挑选了贾彝、贾闰、晁崇等几位有才能的后燕文臣，予以任用。而对其余的战俘，拓跋珪原打算“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但却遭到了王建的反对。

战斗结束后，王建是北魏的皇亲贵戚，也是一员骁勇的猛将，战功卓著，时任中部大人。王建认为：后燕军队的主力在参合陂一战中丧失殆尽，国内兵力已经空虚。如果将这些俘虏放回去，那后燕就又能得到兵力上的补充。这无疑是纵敌生患，不如将他们全部杀掉了事。王建再三请求，北魏将领又都赞同王建的意见，拓跋珪只好采纳了王建的建议，将俘虏全部坑死。但事后不久，拓跋珪又感到了后悔。

以王建为代表的北魏军人肆意坑杀俘虏的严重后果在一年后便得到了历史应证。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 年）八月，拓跋珪趁慕容垂病死、慕容宝新即位之机，率领 40 万大军对后燕发动了大举进攻。至十一月，魏军攻占了后燕大部分地区，燕军分别集结到了中山、邺（今河北临漳）、信都（今河北冀县）三城，进行固守。拓跋珪命令王建率军进攻信都，城中拼死抵抗。王建“攻城六十余日，不能克，士卒多伤”，直到拓跋珪率军增援后，信都城才被攻克。第二年三月，拓跋珪指挥魏军围攻中山。这时，慕容宝已出城逃跑，城内守军的兵力并不多，但他们害怕被俘后再遭屠杀，便拥立慕容普，坚决抵抗，誓死不降。魏军攻城未能得手，拓跋珪派人向城内守军招降，便燕军将士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但恐如参合陂，故求全月日命耳。”拓跋珪一听，气得回头朝王建脸上直吐唾沫。其后，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中山城才落入了魏军之手。

毛泽东一贯反对屠杀俘虏，主张优待俘虏。因此，他在这里批注道：“王建庸人，不知政治。”这实际上也是对道武帝拓跋珪的批评。（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旧唐书》

毛泽东喜欢读《旧唐书》，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他在读《旧唐书》时，很注意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唐朝的兴衰成败，用简洁的批注表达对各类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褒贬。

【毛泽东评点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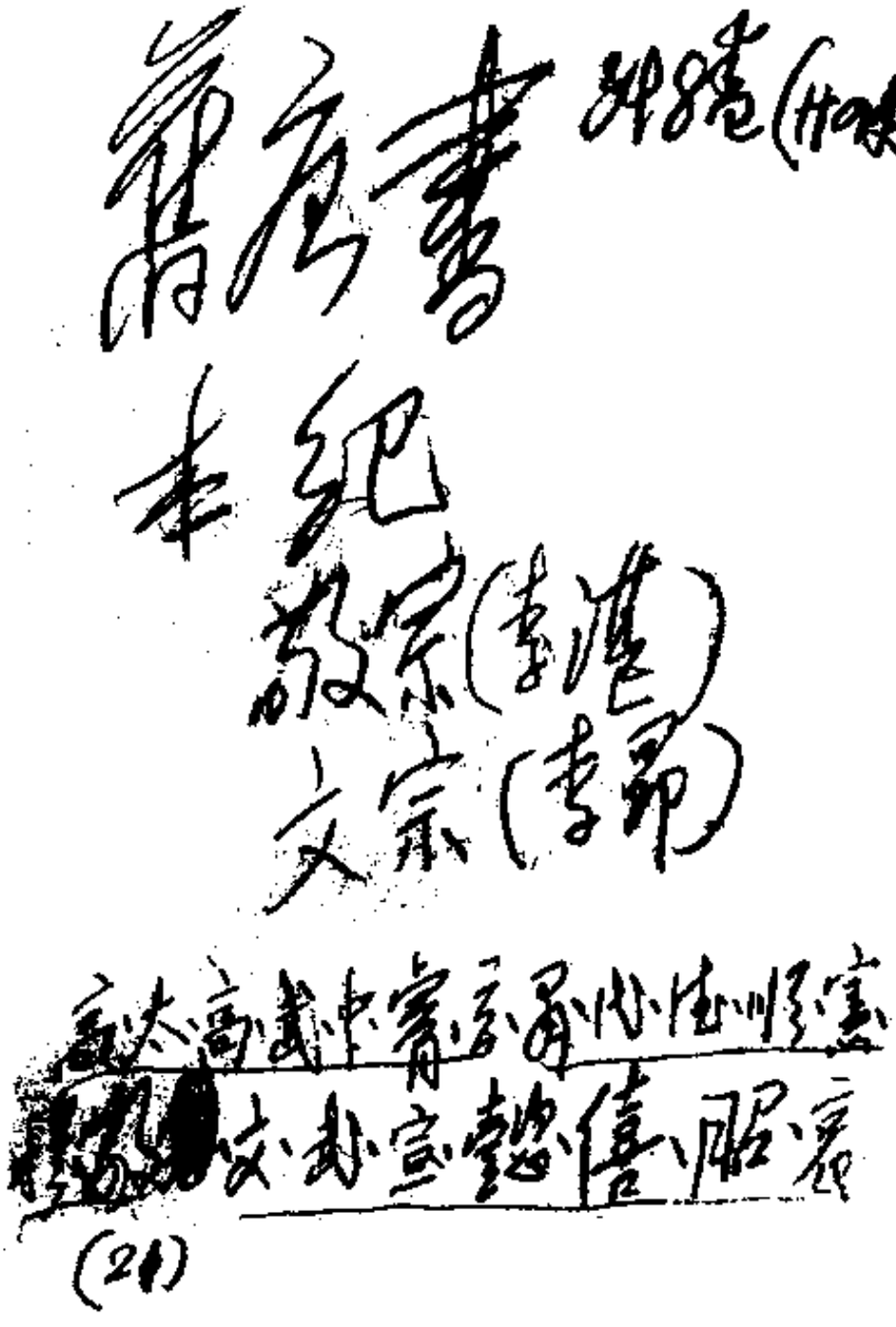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见《光明日报》1991年9月9日。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旧唐书·高祖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

批语集》第2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在旧唐书卷十七上下封面上写下的文字

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曲，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幽求传》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旧唐书》共200卷，后晋赵莹、刘昫、张昭远等撰。

后晋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三个王朝。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尽管政局混乱，但由于当时距唐朝灭亡不久，加上各政权的吏官制度也比较健全，因而早在后晋之前，后梁、后唐二朝就曾有过编修唐史的计划。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编修唐史，说："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寖深，何由寻访？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马员外郎李为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不久，吕琦、尹拙、王伸、崔梲、李崧等人也参加了编修工作。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元年（944年）八月，因赵莹被罢免了宰相职务，新宰相刘昫又接替他担任了监修。到第二年的六月，经过4年多的编撰，这部唐史便修成了。

这部唐史原称《李氏书》，纪、志、列传共有220卷，共有目录1卷，后改称《唐书》。后人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相区别，又将其称为《旧唐书》。在《旧唐书》修成的第二年，后晋王朝便被契丹攻灭了。

在《旧唐书》的编撰过程中，赵莹在前朝担任监修时，在

人才选拔、人员组织、体例制定、史料征集等方面，曾做过不少的工作。而刘昫担任监修还不到一年，只是挂名而已，并没有做多少具体的工作。在具体负责编撰的人员中，出力最多的实际撰写人则是张昭远、赵熙、吕琦等人。

后晋政府组织人力编修《旧唐书》时，距唐朝灭亡的时间仅有30多年，因而当时还能搜集到大量的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之类的史料。唐朝现成的国史主要有吴兢的《唐书》80卷、韦述的《续唐书》113卷、柳芳的《续唐书》130卷和《唐历》40篇，蒋偕的《续唐历》20卷、于休烈的《续唐书》106卷、陆长源的《唐春秋》60卷等。唐朝现成的实录主要有温大雅的《唐创业起居注》5卷以及敬播、许敬宗、韦述、魏元忠、吴兢等人所撰写的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实录等。总起来看，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是唐武宗以前较多，而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帝五朝却是空白。这种唐代史料前详后略的不平衡状况自然也就对《旧唐书》的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而《旧唐书》在记述唐太祖到唐代宗时期的历史时，叙事很有条理，史料也很充实；在记述唐德宗至武宗时期历史时，虽然史料要欠缺一些，但叙事也比较简洁；在记述唐宣宗到唐亡的历史时，则有不少疏漏和谬误，文字也不足观。另外，由于《旧唐书》多用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因而本纪部分因直接采用实录而显得比重较大，宣宗以前的列传部分也大多采用国史的原文。这种编撰方法固然有缺点，但却能保存原始材料的真实性。

《旧唐书》的本纪和列传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如《武宗、宣宗纪》中仅记载吴湘狱案就有1000余字，《懿宗、

僖宗纪》中记载了唐僖宗咸通八年（867年）延资库的详细帐目。清人赵翼对《旧唐书》本纪部分所记的史事之详也颇感惊异。他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迁劫，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瞭如。"再如，《吕才传》中记载了吕才抨击宅经、禄命、葬书的文章，《卢藏用传》中记载了卢藏用的《析滞论》一文，《李百药传》中收录了李百花的《封建论》一文等等。《旧唐书》的各志，除《历志》和《经籍志》因史料缺乏而只记述到唐玄宗时期外，其余诸志，如《礼仪志》、《职官志》、《刑法志》、《食货志》等，尽管略为简略，但却大体较为清楚地记叙了唐代近300年的典章制度。

《旧唐书》在体例的制定上也较有特色。例如，它仿照《后汉书》在列传部分首列《刘玄传》的体例，也在列传部分首列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薛举等25人的传记。这不仅完整地记载了隋末大起义的情况，而且也说明了唐朝建立的历史条件，在时间和逻辑关系上都是很合理的。再如，由于五代各政权都是从唐末藩镇割据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因此它没有设立《藩镇传》，而把各藩镇与文武官员作同等看待，都放入各自的列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统治者的对唐末藩镇割据的立场。

当然，现存的《旧唐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编撰粗疏是其最大的不足。如，《王求礼传》载于卷101，但又见于卷187下；李善附见于《曹宪传》，但又附见于《李邕传》。另外，由于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在北宋问世以后，人们宥于偏见，推崇《新唐书》而贬低《旧唐书》，因而《旧唐书》逐渐流布日稀。到明代嘉靖年间，闻人诠在苏州王氏家得到了

《旧唐书》的本纪和志，从张氏家得到了《旧唐书》的列传部分，总算才凑成了一部完书。于是，他经过整理，重新翻刻了《旧唐书》。但闻人诠翻刻的《旧唐书》分为200卷，在卷数上已同原来的《旧唐书》有所不同了。

【试　析】

唐高祖李渊（566—635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出身于贵族家庭。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元年（572年），7岁的李渊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后，因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伯母，因而李渊得到了较快的提升，历任谯州、陇州、岐州刺史，荥阳、楼烦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右骁隋卫将军等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春，任太原留守。

李渊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做官，很注意结交豪杰、树立恩德，因此颇有号召力。当隋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之时，他听从次子李世民的建议，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乘机起兵反隋，迅速攻取了长安，立隋炀帝孙杨侑为帝。次年四月，他逼杨侑让位，建立了唐朝。李渊在位八年（618—626年），先后削平群雄，统一了全国。然而，李渊在政治上却缺乏决断力。他早就知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兄弟俩结党、次子李世民拉帮结派，两个集团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却不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这一事态的恶性发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铤而走险，率兵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击败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两人的儿子。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两月后又传位李世民，自称太上皇。后在郁郁寡欢的心境中死去，终年70岁。

《旧唐书·高祖纪》在记述李渊为人的优点时说："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毛泽东在这里批注道："遇事无断制。"对李渊在这种"宽仁容众"的表面现象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撰写《旧唐书》的史臣在《旧唐书·高祖纪》末尾的评论中，在肯定李渊功绩的同时，也对李渊有所指责："然而优柔寡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搆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盛彦师，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北）人。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反隋，盛彦师率宾客千余人参加了李渊的唐军，担任行军总管，屡立战功。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率领残部投降唐朝的原瓦岗军领袖李密反判唐朝，从桃林（今河南灵宝北）率部脱离唐军控制，打算前往襄城（今湖北襄樊）。唐将史万宝害怕李密，不敢拦截，对盛彦师说："李密是骁勇的贼寇，又有王伯当辅佐他，恐怕我们无法与之对抗。"而盛彦师却笑着说："用数千人在半道打他的埋伏，就必定能割下他的头。"史万宝说："你有什么计谋？"盛师彦说："兵法强调'诈'，我不能对您讲。"于是，盛师彦率领部下翻越熊耳山，在熊耳山南麓的山路傍设伏。这时，有人问："听说李密打算去洛州（今河南洛阳），而您却进山，这是为什么？"盛师彦说："李密声言去洛州，而实际上是想去襄城与张善相会合。"不出盛师彦所料，李密果然从桃林南下，翻越熊耳山，结果中了唐军的埋伏。李

密被杀，王伯当被擒。由于盛彦师料敌如神，对敌情判断十分准确，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名将”。

武德四年（621年）八月，盛彦师奉命安抚河南地区。这时，兖州总管徐圆朗响应刘黑闼，起兵反唐。盛彦师因寡不敌众，在作战中被俘。徐圆朗对盛彦师礼貌有加，极为优待，让他写信劝说他的弟弟献出虞城投降。但盛彦师却在信中写道：“吾奉使无状，为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徐圆朗最初十分恼怒，但见盛彦师却神情自若，最后也不得不对盛彦师的气节表示钦佩，笑着说：“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对盛彦师的优待仍旧不变。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徐圆朗被唐军击败。盛彦师虽然逃出了徐圆朗之手，但唐高祖李渊却对他被俘后受优待一事耿耿于怀，找别的借口给盛彦师安了个罪名，将他赐死。

毛泽东对此大为不平，便在《旧唐书·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之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毛泽东对李世民颇有研究。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讲道：“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他在读《智囊》一书时也对唐太宗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唐高祖李渊次子。李渊称帝后，被封为秦王，担任尚书令。他曾率兵先后平灭群雄，建立了显赫的军功。武德九年（626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立为太子，不久又迫使父亲

让位，登上了帝位，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23年(626—649年)。在其统治的前期，他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发展科举制，延揽人才，使唐朝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他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他出兵击败东突厥，发展与西域的交通，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他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交往；因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有过人的政治手段。贞观二年（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封建论》一篇。其中，他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覆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之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啗藜藿，乐撤簠簋，言必悽动，貌成瘠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

更无异辞；才及曰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毛泽东对《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所记载的这一段文字很感兴趣。他不仅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所谓的“四道”与毛泽东批注的“工作方法有四”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李百药是从儒家政治的角度，用“大舜之孝”和“文王之德”来谈李世民的“孝”，用“大禹之泣辜”来谈李世民的“慈”，用“帝尧之求谏”来谈李世民的“谦”，用“圣人之善诱”来谈李世民的“明”的，注重论证儒家的治国原则。而毛泽东则是从后半部分，即李世民的具体政治事例来归纳出“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的，即不建“小阁”，生活节俭；亲口吃野菜，不听音乐，以体恤灾民；不好虚名，不贪边功，以爱惜国力；勤于政事，喜好与人讨论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这些特色。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借鉴历史人物优秀品质的。

李义府（614—666年），祖籍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后迁居永泰（今四川盐亭）。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李义府通过制举考试，被任命为门下省典仪。不久，他又经黄门侍郎刘洎和治书侍御史马周的推荐，升为监察御史，并兼侍晋王李治。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又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李义府因此升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他与许敬宗帮助唐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从而被拜为宰相。

李义府文采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表面上待人彬彬有礼，和蔼温顺，见人必带笑，但内心却异常阴险狠毒，“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李义府传》称：“时人言李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李义府极为贪婪，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徇私枉法，又多将其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广树朋党，以致权倾朝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由于李义府依仗武则天的势力，专以卖官为事，使吏部的正常任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人们怨声载道，因而导致了唐高宗对他的不满。不久，唐高宗便将李义府治罪，把他流放到了巂州（今四川西昌）。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李义府忧愤成疾，死于巂州。

毛泽东历来对“笑里藏刀”的人深恶痛绝，因而便在《旧唐书·李义府传》上批注道：“笑里藏刀李义府。”以表达自己对李义府的切齿痛恨之情。

朱敬则（635—709年）字少连，唐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年），累官任右补阙。长安三年（703年），迁正谏大夫，不久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到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的诬陷，将被处死，朱敬则挺身为他们申辩，两人才得以免死。后被诬降官。长安四年，朱敬则因年老而辞去知政事，累任冬官侍郎等职。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病死于家中，终年75岁。

朱敬则为人清廉而正直，早年以辞学知名，精通史学，曾搜集魏晋至隋唐君臣成败之事，编著为《十代兴亡论》。朱敬则的文章，有西汉贾谊之风，受贾谊《过秦论》的影响，尤其

注重的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过程的探讨，著有赞扬秦朝废除分封制的《五等论》等。

毛泽东对朱敬则的评价极高。他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并在"朱敬则"三字旁用黑铅笔画了三条粗重的黑线，以表示强调。

毛泽东对《旧唐书·朱敬则传》中所引录的《上武则天疏》极为重视。他之所以把朱敬则誉为政治家、历史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篇奏疏中得出的结论。

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严厉镇压反对派，大兴告密之风，对有嫌疑者进行严刑逼供，而朱敬则却认为武则天称帝至今已有十年了，如今政局已经稳定，应该取消告密和严刑逼供的方式了。于是，他在担任了右补阙之后，便上武则天疏，分析了秦朝和汉朝的兴衰成败。指出：尽管"刻薄可施行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但"不戢将自焚"。秦朝就是因为"不知变"，一味用严刑酷法，"往而不返"，结果才导致灭亡的。而汉朝则"知变"，以"仁义"治天下，因而汉祚长久。他进而要求武则天"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蠹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武则天读后，认为朱敬则说得很对。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朱敬则的这封奏疏，一一加以旁圈，并引用西汉贾谊《过秦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是完全赞同贾谊和朱敬则所总结出的秦朝因暴政而亡这个历史结论的。

刘幽求（554—715年），冀州武强（今河北武强）人，生性刚烈，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刘幽求通过制举考试，被授予阆中县尉，由于刺史对他没有礼貌，他一怒之下便弃官归家。过了很久，刘幽求才被重新授予朝邑县尉。唐殇帝李重茂唐隆元年（710年），刘幽求作为当时临淄王李隆基集团的政治骨干，参予和策划了诛杀韦皇后（唐中宗皇后）的宫廷政变，使李隆基之父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李隆基也被立为太子。刘幽求因有大功而从朝邑县尉被提拔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其后，刘幽求见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强，已对李隆基的皇位继承权构成了威胁。便又与张暐共同策划发动政变，以诛杀太平公主。因计划泄露，李隆基采取“丢卒保车”的办法，让唐睿宗李旦将刘幽求、张暐分别流放到封州和峰州。唐睿宗先天元年（712年）七月，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于同年八月即位，李隆基即为唐玄宗。刘幽求由封州被召回，担任了左仆射（左丞相）、平章军国大事。由于唐玄宗李隆基为了稳定政局，采用了姚崇“不用功臣”的建议，因而不久刘幽求便被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年）春，姚崇指控刘幽求口出怨言，刘幽求因而被贬为睦州刺史。其后，调任杭州刺史。开元三年十一月，刘幽求又调任桂阳群刺史，在前往桂阳的路上因气愤而死。

毛泽东“刘幽求能伸而不能曲，年六十一，以恚死”的批注，是对刘幽求不能经受挫折的批评。毛泽东特别提到“年六十一”，强调年轻气盛尚可原谅，而61岁的老夫就不能再“聊发少年狂”了。（杨倩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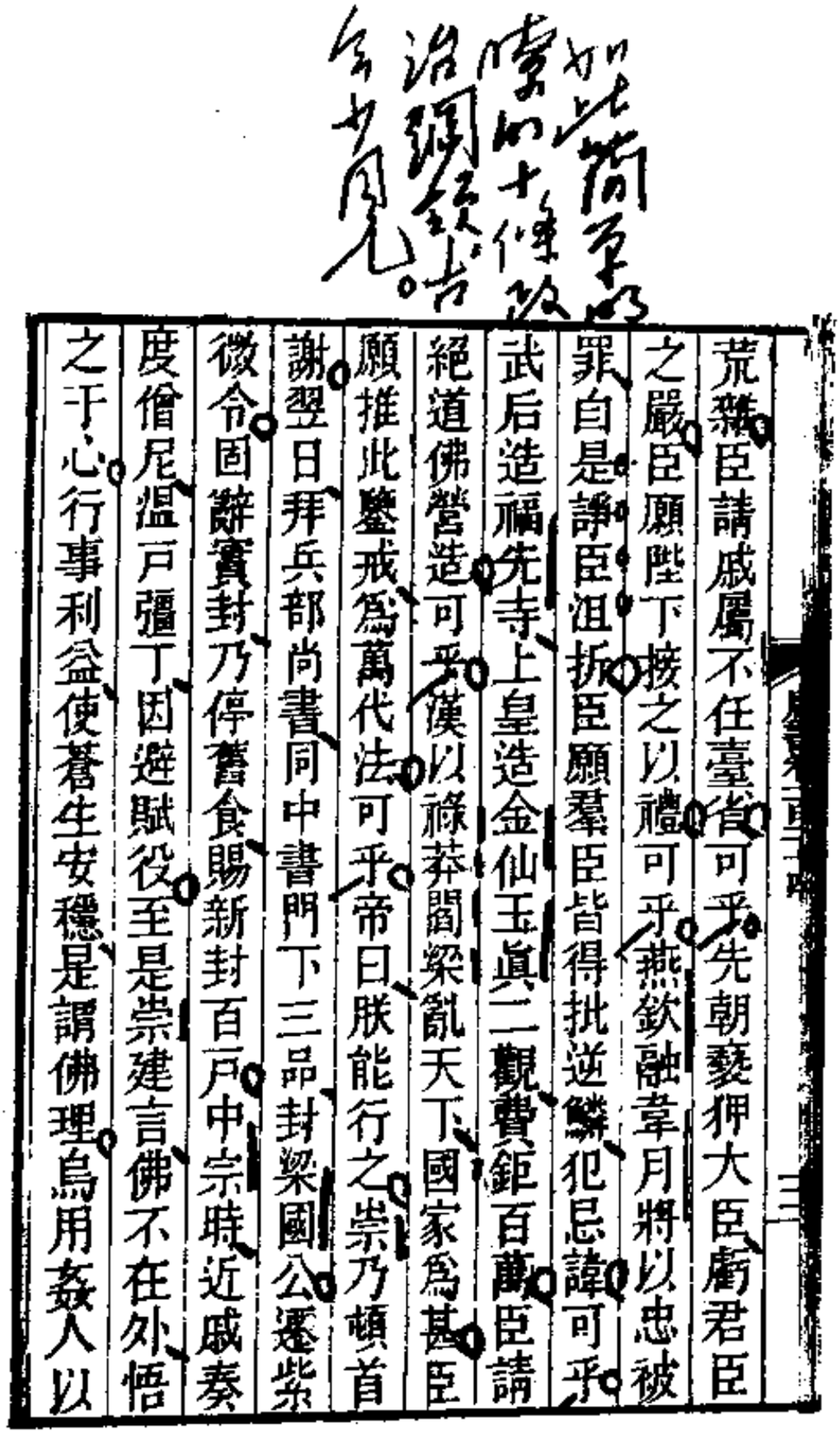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新唐书》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一个王朝，但也是各类政治问题显得比较突出的一个历史时代。毛泽东读《新唐书》，写了不少的批注，对唐代的立储、开元之治、藩镇割据等问题尤为注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新唐书·郁林王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荒殘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夔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闔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寶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写的批语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韩愈《佛骨表》祖此。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田弘正，好将军。

——毛泽东读《新唐书·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新唐书·王承元传》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新唐书》共225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在《新唐书》成书之前，宋仁宗因对《旧唐书》感到不满意，认为它只是史料堆砌，而没有很好地总结唐代盛衰的历史经验，曾命令王尧臣、张方平等人重修一部《唐书》，但王尧臣等人一直未能修成。庆历祐五年（1045年），宋仁宗接受贾昌朝的提议，又命令由曾公亮提举编修，欧阳修负责修撰"纪"、"志"、"表"，宋祁负责修撰"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等人协助修撰。经过17年的编撰，直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方告完成。

宋人对唐史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新唐书》成书之前，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唐代史料，又完成了不少唐史的著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敏求的《唐武宗实录》20卷、《唐宣宗实录》30卷、《唐懿宗实录》25卷、《唐僖宗实录》30卷、《唐昭宗实录》30卷、《唐哀帝实录》8卷、《唐大诏令集》130卷，赵邻几的《社会昌已后日历》26卷，胡旦的《唐乘》70卷，王沿的《唐志》21卷，孙甫的《唐史记》75卷等。于是，欧阳修和宋祁等人便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著述，修成了《新唐书》。

不过，《新唐书》在编撰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抄摘《旧

唐书》，而是审慎地斟酌去取，下了一番工夫的。首先，《新唐书》是宋人站在北宋统治集团的立场上来总结唐朝历史的，因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与《旧唐书》的作者有差异。例如，《旧唐书》对藩镇割据不持可否，而这一历史现象却是宋人所切齿痛恨的，因而《新唐书》不仅创立了《藩镇传》，而且还将其放在一般的类传之后，以示贬抑。其次，为了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新唐书》尤其注意体例上的创新，以便安排新的历史内容，更准确地反映唐代的历史面貌。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总结了《新唐书》的编纂原则："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损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皆有据依。"而事实上，《新唐书》在编撰过程中也是完全遵循了这些原则的。

《新唐书》有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共为225五卷。记事时间与《旧唐书》大体相同，为整个唐代近300年的历史。《新唐书》创立了《仪卫志》、《兵志》以及《藩镇传》、《公主传》、《奸臣传》，并恢复了自《汉书》以后便已中断的《表》，创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唐书》的列传部分在分类上也比《旧唐书》多了六类，削去了《旧唐书》的61项列传，新增了338项列传。《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则是在大量删削《旧唐书》的本纪而修成的。《旧唐书》的本纪部分有30万字，而《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则只有9万字。删削最多的是《哀帝本纪》。《旧唐书·哀帝本纪》原有13000余字，而《新唐书·哀帝本纪》却只1000余字。但《新唐书》在删节的同时也对本纪部分作了一些史事的补充。如《则天皇后纪》的垂拱三年记事，《旧唐书》仅记正、二四、八等四个月的四条事，而《新

唐书》则载有十个月的史事。总之，《新唐书》基本上克服了《旧唐书》前详后略的问题。

《新唐书》的表和志都写得比较好，历来为学者们所称道。《新唐书》表中的史实虽个别有错漏，但因眉目清楚，便于查检，从而确立了以后正史的编撰体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唐书》问世后，以后编撰的《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无不有年表世系，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50卷志的内容都写得比较充实而有条理。如《选举志》系统地记叙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兵志》比较详尽地记载唐代兵制的演变。《食货》的内容比《旧唐书》丰富，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在叙述唐朝的地理沿革、军府设置、物产分布等情况的同时，尤其注重水利，详细地记载了各州县的沟渠、陂塘、运河、井泉的分布状况。《艺文志》则补充了唐玄宗开元以后的书目，因而内容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许多。《新唐书》的列传有150卷，尽管卷数与《旧唐书》相同，但因改变了《旧唐书》本纪大于列传的比重，因而其列传在内容上就比《旧唐书》充实多了。

但《新唐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欧阳修和宋祁过分注重文笔，讲究《春秋》笔法，结果造成本纪的文字太为简略，甚至有时还不记年月，导致史事不明；在本纪中也有因文害义的情况。另外，欧阳修和宋祁都提倡古文，而不喜欢骈文，因而凡是用骈文写成的诏、诰、表、疏，《新唐书》都一概不用。结果使一些有影响的骈文，如李密的《讨隋帝檄文》、唐太宗徐贤妃的《谏伐高丽疏》等都被删去。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当《新唐书》修成时，宋仁宗也感到有些不满意，声称

《旧唐书》还不能废。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也认为在保存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上，《新唐书》大不如《旧唐书》，从而在编撰参考时，只采用《旧唐书》，而不愿采用《新唐书》。吴缜还撰有《新唐书纠谬》20卷，分析了《新唐书》的不足，并指出了《新唐书》的460条错误。虽然不是条条都正确，但其中有不少意见可以说是切中了其要害的。

【试　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物，但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失误也时有批评。如在《新唐书·郁林王恪传》上，毛泽东就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恪和李治都是李世民的儿子。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他的母亲又是隋炀帝的女儿。因而李恪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有着很高的声望。李治即唐高宗，其母为长孙皇后。李世民最初将李治立为太子，但后来见李治为人柔弱，缺少英气，便打算改立李恪为太子。在这个问题上，谁优谁劣，李世民是很清楚的。然而，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却凭借自己唐朝元勋的地位，坚决反对改立李恪为太子。李世民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听信了长孙无忌的话。结果，李治即位后，李恪遭到诛杀，四个儿子也都被流放。而且，由于李治的软弱无能，最后还导致了武则天的专权，引起了唐代中期政局的动荡。

徐有功（640—702年），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他的祖父徐文远系唐初的著名文士。武则天统治时期，徐有功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司刑丞、左肃政台待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当时，武则天为镇压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势力，大肆任用狠毒的官吏，如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动用严酷的刑法，陷害无辜，制造了许多的冤案。而徐有功却用法宽仁，独存平恕，而且敢于主持正义，不惜以死执法。他经常与武则天当面争辩有关案件的是非曲直，遭到武则天的厉声叱责，左右大臣都感到心惊胆颤，而徐有功却神色不变。前后因徐有功据理力争而被释放、减刑的有数十百家。徐有功曾因公正执法而三次遭到诬陷，险些被处死。但徐有功对此却矢志不渝，泰然处之。

毛泽东对《新唐书·徐有功传》读得很仔细，加了许多旁圈、三角、叉、套圈等标记，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封建时代的执法楷模是赞许的。但他对徐有功的一段言论也提出了批评。

据《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当徐有功第一次遭到免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左肃政台待御史时，他不愿接受这项任命，曾向武则天提交了一份辞呈，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但武则天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他最后也只好担任了这个官职。徐有功这段话的意思是：鹿虽然在山林间奔走，但到头来却仍免不了遭到宰杀，被厨子做成菜肴而摆上饭桌。陛下让臣下我担任法官，而臣下我只能是守正行法，因而到头来必定会因此而送命。这是徐有功的牢骚话。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了一长段的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

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伟乎?”这不仅是对徐有功的委婉批评，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以身殉职”这一精神含义的理解和表白。

姚崇（650—721 年），陕州硖石（旧治在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毛泽东对姚崇十分赞赏，因此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天头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下了“姚崇”两字，并在这两字之前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唐睿宗时，姚崇见太平公主权势太盛，为了削弱其权力，曾奏请让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因而被贬职。唐玄宗即位之初，召见姚崇，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姚崇则针对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弊端，向唐玄宗提出了 10 条意见。并说如果他这 10 条意见不能得到采纳，那他就不愿接受宰相的任命。据《新唐书·姚崇传》记载，这 10 条意见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寖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唐玄宗听后，一口答应：“朕能行之。”后来，唐玄宗和

姚崇就是以这10条纲领为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毛泽东在这段记述的天头上批注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姚崇不信鬼神，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蝗灾，老百姓相信迷信，只是一味祭拜，看着蝗虫啃食庄稼而不敢捕杀。姚崇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督促百姓捕杀蝗虫。这时，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该用德。过去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国君刘聪要消灭蝗虫，可结果不但没有能消灭得了，蝗虫反而更加厉害了。”黄门监卢怀慎也说：“人力怎么能够抗拒天灾？而且把蝗虫杀多了，必然会损伤天地的和气。”连唐玄宗对捕蝗一事也有很大的疑虑。但姚崇不为所动，说服了众人，鼓励大家积极灭蝗，最终战胜了这场特大蝗灾。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唐玄宗打算前往东都洛阳巡视，但这时太庙却忽然无缘无故地坍塌了。唐玄宗满腹狐疑，便就此向宰相们征询意见。宋璟和苏颋认为这是天降灾异，告诫陛下不宜东行。陛下应该停止前往洛阳，修养道德，以接受上天的谴责。但姚崇却不以为然，回答说：“臣下我听说隋朝修建太庙的木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期的旧宫殿。大山有了松散的土壤还会发生山崩，更何况木头用久了它是会自然腐朽。”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天降灾异”，因此劝说唐玄宗按期前往洛阳。唐玄宗听了姚崇的话，十分高兴，便依从了姚崇的建议。

姚崇历来不信佛教。他在遗嘱中对儿子们说：“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

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人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绿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儿曹慎不得为此！”姚崇遗嘱中所说的罗什即十六国后秦时期来中国翻译佛经的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姚兴即后秦皇帝。五帝即指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三王则指夏、商、周三代。彭祖是夏朝人，传说他活了800余岁；老聃即老子，春秋时期的人，传说他活了200来岁。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批注道：“韩愈《佛骨表》祖此。”毛泽东所说的《佛骨表》即韩愈向唐宪宗上奏的《论佛骨表》。毛泽东认为韩愈《佛骨表》中所表述的反佛教思想即源于姚崇，对姚崇的反佛教言论寄予了很高的评价。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姚崇向唐玄宗请求，辞去了宰相职务，并推荐宋璟担任了宰相。两人以其突出的政绩在历史上齐名，被并称为“姚、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卷124的“赞”中评论说：“姚崇以十事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姚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欧阳修的这种看法，批注道：“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这里所谓的“道”，即政治方针和路线。而所谓的“方法”，即政治方式和策略。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问题也很注意。他在《新唐书·田弘正传》和《新唐书·王承元传》上所作的两条批注："田弘正，好将军"和"青年将军王承元"即是专门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作出的评论。

所谓藩镇，就是当时由节度使统辖的军区。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萎缩，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从而导致了唐朝后期延续一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出现。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藩镇几十个。这些藩镇的力量悬殊较大。最小的藩镇只管辖两个州，兵力只有几千；而最大的藩镇却管辖十来个州，兵力达到十来万。不少大藩镇往往仗恃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任命辖区内的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许多节度使不仅利用屯田的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他们还竭力扩充军队，选练精兵。不少藩镇还豢养有自己的"牙兵"。这种"兵牙"就是节度使的亲兵，也是藩镇武装的核心。他们骁勇善战，待遇优厚，也极为骄横。不少节度使都是"牙兵"推选出来的。而且，即使是节度使，只要他违背了"牙兵"的利益，往往也会被"牙兵"杀死或推翻。例如，在唐朝后期的150年里，"河朔三镇"的先后57任节度使，就有22人是被"牙兵"和部下杀死或赶走的。不少藩镇的节度使，有父死子继的，兄终弟继的，叔侄相承的，有"牙兵"和部下拥立的，朝廷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否则他们便会用武力对抗朝廷。例如，在唐朝后期的150年里，"河朔三镇"先后更换了57个节度使，而真正由朝廷委任的却仅有4人。

"河朔三镇"是指幽州、成德、魏博（后改称天雄）这三

大藩镇。它们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策源地，也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最为严重的地区。早在唐代宗即位之初，因无力肃清河朔地区的安史残余势力，便先后将安史的降将李怀仙、李宝臣（原名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就地任命为幽州（兼领卢龙）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相卫节度使、魏博都防御使（不久升节度使）。其中，幽州镇和平卢镇管辖幽（治今北京）、莫（治今河北任丘），妫（治今河北怀来）、檀（治今北京密云）、平（治今河北卢龙）、蓟（治今天津蓟县）等州，成德镇管辖恒（治今河北正定）、定、赵（治今河北赵县）、深（治今河北深县）、易（治今河北易县）等州，相卫镇管辖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汲县）、贝（治今山东清河）、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等州，魏博镇管辖魏（旧治在今河北大名）、博（治今山东聊城）、德（治今山东德州）等州。

田弘正（764—821年）字安道，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人，系魏博节度田承嗣之侄。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承嗣之孙）死后，田弘正被众人拥立，继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服从中央的命令，先后帮助朝廷出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原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逼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归服了朝廷，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元和十年，他服从朝廷的调动，转任成德军节度使。次年，成德军发生兵变，田弘正被原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害。

王承元（800—833年），祖上是契丹怒皆部人，系德节度使王武俊之孙。王武俊死后，王承元之父王士真、王承元之兄王承宗相继被部下拥立为成德节度使。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后，众人又想推举年仅20岁的王承元接任成德节度使。但王承元不愿继续对抗朝廷，便秘密向朝廷上

表，愿意放弃成德节度使的职位，入朝供职。唐穆宗于是授予王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其后，历任鄜坊丹延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等职。终年33岁。

毛泽东之所以赞誉田弘正为“好将军”，赞誉王承元为“青年将军”，是对他们反对割据、拥护中央行为的肯定。（杨倩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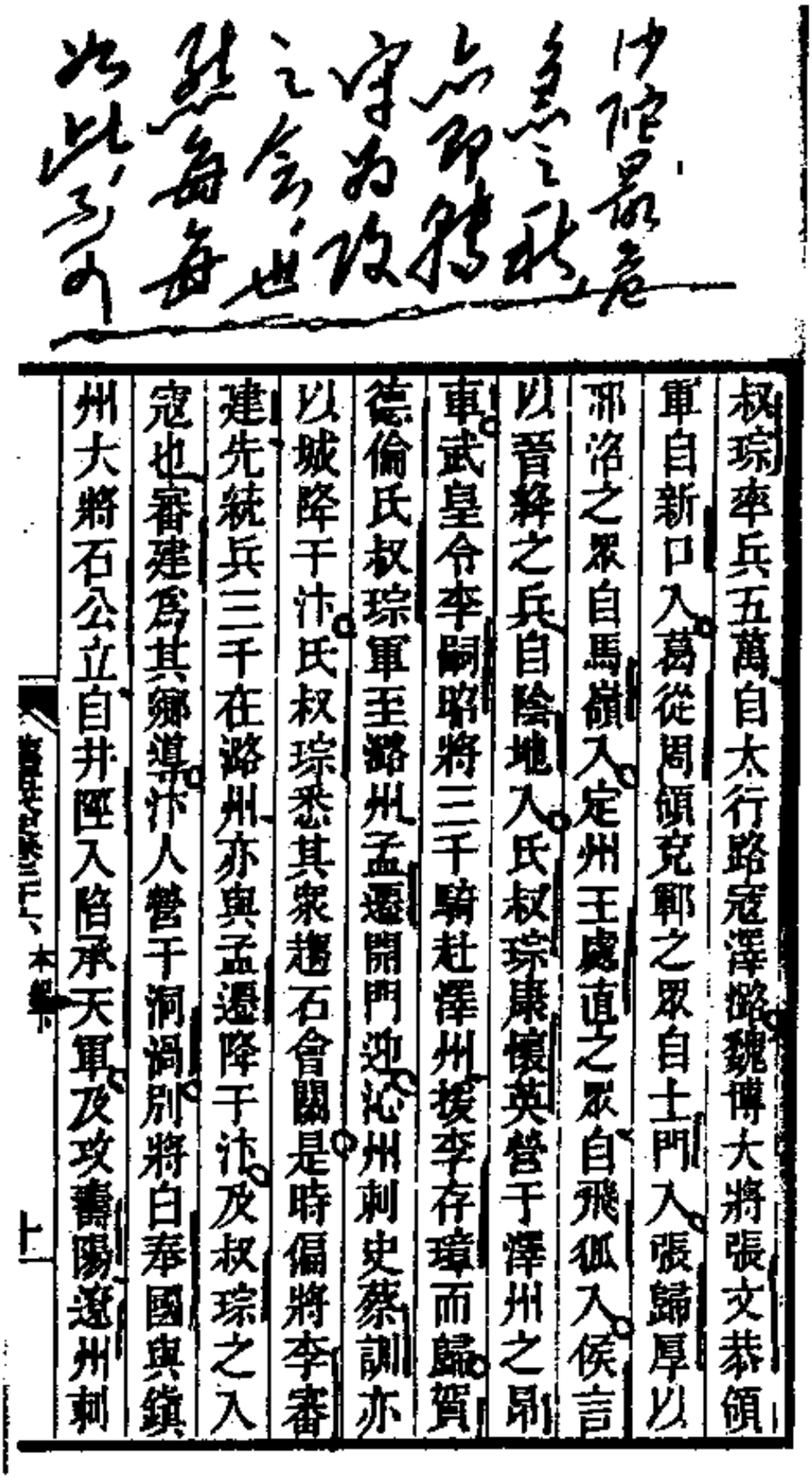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因其本纪部分的史料最为充实，将五代嬗递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实，因而毛泽东读《旧五代史》与读《新五代史》的侧重面有所不同，比较注意对后梁和后唐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

【毛泽东评点原文】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
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
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
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昇
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質
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
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
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
寇也審建爲其鄉導汴人營于洞渦刖將白奉國與鎮
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壽陽遂州刺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唐武皇纪》写的批语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

如此，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旧五代史》共150卷，北宋薛居正、卢多逊等撰。

《旧五代史》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总称《五代书》或《五代史》。欧阳修的《五代史记》问世后，为了有所区别，人们便改称这部《五代史》为《旧五代史》，而改称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为《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的编撰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由当时任宰相的薛居正挂名监修，而实际则由卢多逊、扈蒙、李穆、张澹、李昉、刘兼、李九龄等七人共同编撰。到次年闰十月，只经过了18个月，全书的编撰便告完成。

《旧五代史》的记事起自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迄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年），记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

汉、后周五代14位帝王前后53年统治时期的历史。其史料来源，主要是范质的65卷《五代通录》和多达360卷的五代各朝的实录，如后梁李琪、张衮的《太祖实录》，后唐张昭远、赵凤的《懿祖实录》和《庄宗实录》，后晋贾纬、王伸的《高祖实录》和《少帝实录》，后汉张昭远、尹拙的《隐帝实录》，后周王溥、扈蒙的《世宗实录》等。由于史料来源丰富，编撰又者又是从五代时期过来的人，对五代的典章制度比较熟悉，所以《旧五代史》成书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不过，在编撰体例上，却是令薛居正、卢多逊等人颇费斟酌的。因为所谓五代，准确地说其实应是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分裂割据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907—923年，定都汴梁，今开封）、后唐（923—936年，定都洛阳）、后晋（936—946年，定都汴梁，今开封）、后汉（947—950年，定都汴梁，今开封）、后周（951—960年，定都汴梁，今开封）五个王朝，历史上称作“五代”；同时，我国的南方地区前后分别出现了前蜀（903—925年，定都成都）、吴（902—937年，定都扬州）、闽（909—945年，定都长乐，今福州）、吴越（907—978年，定都杭州）、楚（907—951年，定都潭州，今长沙）、南汉（917—971年，定都广州）、荆南（907—963年，定都荆州，今江陵）、后蜀（925—965年，定都成都）、南唐（937—975年，定都金陵，今南京）等九个王朝，加上北方的北汉（951—979年，定都太原），历史上称作“十国”。此外，在我国东北地区还有契丹族政权，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有南诏政权、吐蕃政权等。它们也同“五代”和“十国”并存。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比较复杂。而且，在《旧五代

史》开始编撰时，北宋尚未完成全国统一，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北方还有北汉。由于这种原因，《旧五代史》出于尊北抑南的政治目的，也出于编撰的方便，薛居正、卢多逊等人于是把当时相继统治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作为正统王朝，分为五个部分，断代为书，计有《梁书》24卷，《唐书》50卷，《晋书》24卷，《汉书》11卷，《周书》22卷，各书统一都有《本纪》、《后妃列传》、《宗室列传》、《诸臣列传》。在五书之后，另有杂传7卷，即《世袭列传》2卷、《僭伪列传》3卷、《外国列传》2卷。《世袭列传》用于记载表面上中原王朝称臣的各割据政权的首领，如高季兴（荆南国主）、马殷（楚国主）、钱镠（吴越国主）等人的事迹。《僭伪列传》则用于记载公开称王称帝的各割据政权的首领，如杨行密（吴国主）、李升（南唐国主）、王审知（闽国主）、刘龑（南汉国主）、刘崇（北汉主）、王建（前蜀国主）、孟知祥（后蜀国主）等人的事迹。《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兼述了十国的历史，尽管比较简略，但也是《旧五代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列传》则记载了当时高丽、新罗、占城以及中国内部契丹、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

当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问世后，由于欧阳修的名气大，《新五代史》又效法《春秋》，特别强调“尊王”，因而很受封建统治者的尊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朝正式规定学校只用《新五代史》，而不用《旧五代史》，因此《旧五代史》的流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元明以后，《旧五代史》在社会上已很少有流传。到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已找不到《旧五代史》的原本了。于是，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人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所有《旧五代史》史文，并从《册府元

龟》、《资治通鉴考异》、《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书中，抄录引有《旧五代史》的材料，经过排比，编成了一部《旧五代史》的辑佚本。但这个辑佚本多有残缺，只能说是恢复了原书内容的十分之七八。中华书局于1976年出版的点校本《旧五代史》，就是以邵晋涵等人的辑佚本为底本，整理付印的。

《旧五代史》取材严谨，史料可靠。其梁、唐、晋、汉、周五书的本纪部分是仿照《旧唐书》的体例撰写的，因而内容比较充实，累计多达61卷，仅比全书累计70卷的列传部分少9卷。另外，《旧五代史》的12卷志尽管从《永乐大典》辑出时内容有残缺，但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材料，而其中的选举志还是新创的体例，记载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情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旧五代史》原书的完整面貌，但从宋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元人胡三省作《通鉴注》时只用《旧五代史》，而不用《新五代史》的情况以及现存《旧五代史》的内容上看，《旧五代史》以史料详实见长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试　析】

梁太祖朱晃（852—912年）原名朱温，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朱温的父亲早死，母亲带着朱温兄弟三人到刘崇家，以帮佣为生。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朱温参加了黄巢起义。素来以雄勇自负的朱温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所以当黄巢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起大齐政权后，朱温便被提升为同州防御使，成为起义军的一员举足轻重的大将。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 年），因黄巢政权内部矛盾加剧，开始腐败混乱，再加上军事屡遭失败，朱温见势不妙，于是叛变降唐，被唐僖宗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次年，朱温又被唐僖宗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会同李克用等唐朝各路藩镇，对黄巢起义军进行了血腥镇压。中和四年（884 年），黄巢兵败而死。

唐朝的宣武军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辖有汴、宋、亳、颍等州，其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封丘、开封、尉氏、柘城、沈丘、山东单县、安徽砀山、亳县、涡阳、蒙城、阜阳、颍上等地。黄巢起义失败后，朱温即以汴州为中心，招纳黄巢起义军的余部，重用落第进士敬翔、李振等人，勾结当地的富商和土豪，逐渐形成了气候。然而，由于宣武军位于黄淮平原间，从战略地位上看，是所谓的“四战之地”，南有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感化军节度使时溥，西有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军节度使王行瑜、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西北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北有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东有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泰宁军节度使朱瑾、平卢节度使王师范等，当时的形势对朱温极为不利。

朱温自幼狡猾过人，好使无赖手段。他首先拉拢陈州刺史赵犨和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泰宁军节度使朱瑾，集中力量攻灭了秦宗权，同时联络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等人以牵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接着，朱温翻脸不认人，又消灭了天平军节度使朱宣，进而攻灭了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将黄河中下游地区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唐昭宗光化二年（899 年），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南下进攻罗绍威（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之子），罗绍威向朱

温求援，朱温趁机进军河北，迫使罗绍威、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都依附了自己。

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朱温进攻关中，打败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毁掉长安城，于唐昭祐宗天祐元年（904年），为了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朱温又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次年，朱温杀掉唐昭宗，将年仅13岁的李祚立为皇帝，是为唐哀帝。这时，除割据河东的李克用集团还有能力与朱温抗衡、占据幽州的刘仁恭不服从朱温外，其他藩镇不是被朱温消灭，就是依附了朱温。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见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废除了唐哀帝，自立为帝，改名晃，建立了梁朝，建元开平，史称后梁。唐朝由此灭亡，五代十国由此开始。

然而，朱温全盛的时期实际上是在梁朝建立之前。朱温称帝后，与河东李存勖（李克用之子）交战屡遭失败，为人也日益荒淫暴虐，甚至把儿媳妇当作情妇。他因喜欢养子朱友文的妻子，便打算将朱友文立为太子。乾化二年（912年）六月，儿子朱友珪的妻子与朱温乱伦后，得知了这一情况。朱友珪恐遭不测，便发动政变，杀死了朱温。

毛泽东在读了《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后，联系到东汉末年曹操的事迹，对朱温的为人有不少感想，便批注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人。"其中，"狡猾"二字明显带有贬义。这说明，尽管毛泽东文为"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但也认为朱温还远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这是毛泽东在阅读《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

后所作的批注。

唐武皇即李克用（856—908年），唐沙陀部人。沙陀原是西突厥别部，在今新疆巴里坤一带游牧，唐宪宗时，其酋长朱邪执宜内附，东迁到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李克用是朱邪执宜之孙，因其父朱邪赤心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而被唐朝赐姓名为李国昌，故改姓李。

李克用15岁时便随父征战，冲锋陷阵，骁勇无比，能一箭射下双鹏，故沙陀军中称他为“飞虎子”，又因一目失明，被唐人称为“独眼龙”。李克用长大后，被唐朝任命为云中守捉使。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李克用杀掉唐朝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了云州（今山西大同）。不久，李克用被唐军击败，与其父朱邪赤心逃入鞑靼。黄巢攻克长安后，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召他为代州刺史，让他率沙陀骑兵南下镇压黄巢起义。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28岁的李克用因攻破长安有功，被唐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中和四年，李克用征讨黄巢路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节度使朱温认定李克用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强藩，便邀请李克用进城，设宴款待，把李克用及其随从灌得大醉。当晚，朱温派兵围攻、并放火焚烧李克用下榻的上源驿。李克用的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及几百名随从全部杀死，李克用与几名随从苦战突围。从此，李克用与朱温势同水火，势不两立。然而，由于李克用自恃强盛，驭军无方，又多采取四面出击的战略，树敌过多，因而终李克用之世，李克用的晋军与朱温的汴军交战，往往是胜少败多。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朱温在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后，便开始大举进攻河东。这年正月，朱温派大将张存敬率

军首先攻陷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和绛州（今山西新绛），接着又进攻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张存敬在绛州屯兵2万，以阻击李克用救援河中。河中节度使王珂的妻子是李克用的爱女。她见形势危急，便与王珂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无可奈何地给她复信说："贼阻道路，众寡不敌。救尔，即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弃城归朝。"王珂只好投降了朱温。河中失守，隔断了李克用与朝廷的联系，使李克用丧失这一战略要地，因此《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说：李克用"霸业由是中否"。

四月，朱温调集汴军、魏博军、定州军等各路人马，合围晋阳（今山西太原）。晋军屡战屡败，晋将李瑭、李审建、孟迁、张鄂等先后投降朱温，晋阳人心大乱。当时，由于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朱温运输不济，士卒又多闹腹泄，疟疾流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李克用得以保住了晋阳，并不失时机地派出大将李嗣昭、李嗣源在每天晚上率军偷袭汴军营垒。朱温无法继续攻城，只好于五月退兵。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昭率领5千骑兵随后掩击，重创汴军大将氏叔琮所部，杀死汴军万余人。

次年二月，朱温再次亲率大军进攻晋阳。三月，汴军大将氏叔琮重创晋军名将周德威，乘胜围攻晋阳城。李克用此时几乎丧失了固守晋阳的信心。他见汴军攻城日急，便打算放弃晋阳，逃往云州。但当他召见李嗣昭、周德威、李存信等人宣布这一计划时，却遭到了李嗣昭等人的激烈反对。李克用被迫取消了这个计划。几天后，原被打散的将士陆续回到了晋阳城，增强了晋军的防守力量。晋阳得以转危为安。李克用还是采用老办法，派遣李嗣昭、李嗣源乘夜出城袭击汴军，最终将汴军迫退。汴军大将朱友宁在撤退途中遭到晋军的掩击，受到重

创。晋军乘胜收复了慈、隰、汾三州。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建立了梁朝。第二年，李克用因心情郁闷，头长恶疮而死。尽管李克用最终也未能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但因他能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顽强苦战，从而保全了晋军的实力。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嗣位，经过20余年的苦战，最终攻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李克用尽管生前没有称帝，但在后唐建立后，因有早年的创建之攻而被尊为太祖武皇帝。

毛泽东在阅读《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时，很注意汴军两次围攻晋阳的战役。他从李克用两次转危为安、转过为攻的战例中归结出“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的结论，从而告诫人们：胜利往往就存在于最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董璋原为后梁的骁将，梁太祖朱温对他十分赏识，把他收为义子，赐姓朱，名友让。后梁灭亡后，董璋投降了后唐，深受后唐庄宗李存勖信任。同光三年（925年），后唐攻灭后蜀，授予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董璋和孟知祥联兵对抗后唐中央政权，图谋割据四川地区。在击败率军前来讨伐的后唐大将石敬瑭后，董璋又与孟知祥发生矛盾。长兴三年，董璋率所部万人突然向孟知祥发动袭击，双方在汉州（今四川广汉）的弥牟镇一带进行激烈的攻防战，结果董璋大败，回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后被部下所杀。获得胜利的孟知祥乘胜攻占了东川，不久便建立了后蜀政权。此即为“攻者败，守者胜”。

《旧五代史·董璋传》中引用《九国志·赵季良传》说：赵

季良与孟知祥在闲谈时曾说道："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当董璋率所部万人突然向孟知祥发动袭击时，孟知祥"忧形于色"，但赵季良却说："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可见赵季良对董璋十分了解，孟知祥对董璋也早有了防范。但董璋却"不守巢穴"，放弃了自己方面的优势。《旧五代史·董璋传》中引用《九国志·赵廷隐传》说：董璋"部下多敢死之士"，双方交战之初，因孟知祥的士兵对董璋军队战斗力之强感到畏惧，所以尽管孟知祥亲自督战，但也多次被董璋击败。于是，孟知祥的部将赵廷隐伪装溃退，董璋上了当，一味纵兵追击，指挥陷于混乱。孟知祥与部将张公铎乘机率兵反击，董璋军队的阵势大乱。赵廷隐又回头冲杀，与孟知祥等人合击董璋，董璋大败而逃。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剖析具体的战例。因而他读至此，便在《旧五代史·董璋传》上批注道："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对董璋与孟知祥在弥牟镇之战中各自的表现和最后的结果作出了准确的评判。（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新五代史》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之间的兴废和争霸战争连绵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当时的残酷的战争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正面或反面的军事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就尤其注重总结这一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评点原文】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刘郭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版）

（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有害无益。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新五代史》共有74卷，是北宋欧阳修私人撰写的一部记述五代十国历史的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被人们改称《新五代史》。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历任西京推官、知谏院、知滁州、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欧阳修博学多才，不仅在文学上有卓越的成就，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在金石学和史学上也颇有建树。

欧阳修是《新唐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但他的《新五代史》却是在《新唐书》之前写成的。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不满意，认为它繁猥失实，大约在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年），他仿效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和孔子《春秋》的笔法，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改变体例，增补史料，开始着手编写《新五代史》。到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经过近

20年的撰写，《新五代史》已基本完成。但欧阳修却一直把《新五代史》收藏在家，只给少数好朋友看看，而不愿公之于世。皇祐五年，他在给梅圣俞的一封信中写道："间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后，他的家人把《新五代史》献给了朝廷。熙宁十年，《新五代史》正式刊行，与《旧五代史》并行于世。

《新五代史》的体例比《旧五代史》精巧，计有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旧五代史》是把梁、唐、晋、汉、周分为五个部分，断代为书，把各朝的本纪、列传放在各书中，而《新五代史》则是用通史体例，把梁、唐、晋、汉、周拉通，先记各朝本纪，再接以列传、考、世家、年谱，最后是《四夷附录》。

本纪部分，《旧五代史》五书累计有61卷，而《新五代史》却只有12卷，作了大量的删节。列传部分，《新五代史》创立了不少类传的新名目。例如，把《旧五代史》的《后妃列传》、《宗室列传》合并为《家人传》；设立了《梁臣列传》、《唐臣列传》、《晋臣列传》、《汉臣列传》、《周臣列传》，凡只在某一朝代任职的，其列传即系于某朝的臣子列传之下，如果传主在两个以上的朝代任过职，不便系于某一朝，则放入《杂传》；由于五代各朝的历史都比较短，当时在几个朝代做官的人为数不少，因此《杂传》多至19卷，在类传中的篇卷最多。欧阳修为了突出《春秋》笔法的"褒贬"，还根据五代的实际情况，增设了《死节列传》、《死事列传》、《一行列传》、《唐六臣列传》、《义儿列传》、《伶官列传》等，按封建道德标准来表

彰节义之士，鞭挞无耻之徒。另外，欧阳修在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时，不用《外国传》的名目，而改作《四夷附录》也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在记载奚、契丹、吐浑等情况时，其内容也比《旧五代史》要详实一些。

薛居正、卢多逊等人编撰《旧五代史》时，北宋尚未统一全国，因而十国部分的有关史料，他们所掌握的并不完整，而且对南唐、吴越、北汉也不可能作完整的记述。而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时，有关十国的史料，能见到的也都可以见到了，因而在史料的掌握上，他要比薛居正、卢多逊等人丰富得多。因此，欧阳修针对《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过于简略的问题，采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世家”的名目，把十国一律放入世家，每国一卷，补充了不少内容，完整地记述了十国的历史。为了把五代和十国的关系从时间上统一起来，欧阳修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十国世家年谱》。

由于《新五代史》是由于出自欧阳修一人之手，以学问文章见长的欧阳修在书中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且在皇祐五年完稿后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修改，因而《新五代史》体例严谨，文字简洁，立意鲜明。然而，《新五代史》也有严重的不足。一是志的部分不完整。欧阳修改志为“考”，但他却主观认为五代的典章制度不足为后世效法，因而只撰写了《司天考》2卷、《职方考》1卷。即便是这两考，内容也是十分单薄的。因此在典章制度方面，《新五代史》是无法与《旧五代史》相提并论的。二是删削过多。同编撰《新唐书》时一样，出于对骈文的反感，凡是《旧五代史》中所引录的骈文诏、诰、表、疏，无论好坏，欧阳修都一概全删。另外，由于《新五代史》的篇幅只有《旧五代史》的一半，因此宥于篇幅，

欧阳修对《旧五代史》中的许多史事也做了大量的删节。这样一来，尽管《新五代史》也增补了不少史事，但从保存史料这个角度看，《新五代史》就不大如《旧五代史》了。三是太注重《春秋》笔法。为了做到象《春秋》一样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欧阳修特别注意所谓“书法严谨”，而不以叙事详略为意。因此《新五代史》往往因注重书法而忽略了必要史实的记载，在文字上有时为了追求简略，以至晦涩难通，因文害义。

【试　析】

刘郛（857－921年），密州安丘（今山东安丘）人，“素好兵书，有机略”。刘郛原为平卢节度使王师范的大将，兵败后投降了朱温。朱温对刘郛十分看重，先后任命他为左龙武统军、永平军节度使等。梁末帝朱瑱郛即位后，仍将刘郛视为军事支柱，让他担任主将，指挥梁军与李存勖的晋军抗衡。

后梁末帝乾化五年（915年），梁末帝为了削弱魏博镇的力量，将其分为相、魏二镇，结果激起魏博将士反叛，投入了李存勖的怀抱。李存勖得到魏博，便基本上控制了河北地区。因而李存勖迅速带兵南下，进驻魏州（今河北大名）。这时，刘郛正屯驻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他估计晋军主力已经跟随李存勖南下，晋阳必定空虚，于是便捆扎了许多插着旗帜的草人，将其绑在驴背上，让驴驮着它们在魏县城头上转围，而自己则亲率梁军主力直奔太原。晋军被刘郛的草人瞒过，一时竟不敢有所动作。但刘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时，却遭遇了大雨，因道路泥泞，无法进军，只好返回。刘郛见晋军兵锋正

盛，便在莘县（今山东莘县）深沟壁垒，积蓄粮食，固守不战，打算与晋军长期相持。

梁末帝不懂军事，三番五次地催促刘郭出兵，与晋军决战。李存勖对刘郭的为人以及梁末帝数次逼迫刘郭出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对部将们说："刘郭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于是扬言要回太原，让符存审留守魏州，自己率晋军主力佯作西去，暗中却将部队开到贝州（今河北清河）潜伏下来。刘郭果然上当，出兵万人猛攻魏州东城。李存勖指挥晋军迅速南下，攻击刘郭，重创梁军，将梁军全部逐出了河北地区。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兵书，而注重临机制敌。1961 年 3 月 23 日，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讲过自己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1962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因此，毛泽东读到《新五代史·刘郭传》，对"素好兵书，有机略"的梁将刘郭极为鄙夷，于是在这里批注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刘仁赡（899－957 年）字守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仁赡"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是南唐的著名

将领，深受南唐中生李璟的信任，曾先后任左监门卫将军、黄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等职。

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后周的国力大为加强。在此基础上，周世宗为统一中国，便开始了南征北伐。而位于长江和淮河间的南唐，便成了周世宗南征的重点对象。

位于淮河南岸的寿州（今安徽寿县）作为南唐抗击北周的前沿要塞，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住寿州，李璟特意任命刘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镇守寿州。

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冬，周军从寿州以西的正阳渡过淮河，立即向寿州发起了猛攻。但周军的进攻却遭到了刘仁赡所部的顽强抵抗，寿州攻防战进行得异常激烈。《新五代史·刘仁赡传》记载："世宗攻寿州，围之数重，以方舟载砲，自淝水中流击其城；又束巨竹数十万竿，上施版屋，号为'竹笼'，载甲士以攻之；又决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岁大暑，霖雨弥旬，周兵营寨水深数尺，淮、淝暴涨，砲舟、竹笼皆飘南岸，为（李）景（璟）兵所焚，周兵多死。"周世宗见寿州难以攻克，便任命大将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留下李重进和张永德两军，对寿州进行长期围困，而自己则率领周军主力对寿州以外的江北各州发起攻击。

李璟派遣齐王李景达率军救援寿州，而这时李重进和张永德两军却因相互怀疑而不能协同作战。刘仁赡向李景达建议乘机出起进攻，以击败周军，但李景达却不答应。刘仁赡十分气愤，从此病倒在床。

显德四年（957年）正月，周世宗再次率军来到寿州，首

先击败了驻扎在寿州城外的李景达所部。南唐中主李璟闻风丧胆，也打算向周世宗奉表称臣、割地求和。而刘仁赡却不顾一切，顽强坚守，屡屡挫败周军的进攻。刘仁赡的儿子刘崇谏与诸将商议，打算开门投降。刘仁赡知道后，立即下令将儿子斩首示众，监众周廷构哭着为刘崇谏求情，但刘仁赡却义无反顾，杀了刘崇谏。将士们深受感动，都发誓死守寿州。

三月，刘仁赡的副使孙羽趁刘仁赡病得不省人事，开门投降。周世宗派人将刘仁赡抬到自己的大帐前，望着刘仁赡，感叹良久，赐给刘仁赡玉带、御马，又让人将刘仁赡抬回城中养病。当晚，刘仁赡因病重而去世。

毛泽东在阅读《新五代史·刘仁赡传》后，批注道："（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有害无益。"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少略通兵书"的刘仁赡的英雄行为是十分赞赏的；但在另一个方面，联系到毛泽东在《新五代史·刘郛传》上的批注"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又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兵书和实战的辩证认识。（杨倩描）

毛泽东评点《宋史》

两宋是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再度崛起的时期。北宋先后与辽、夏对峙而终亡于金，南宋先后与夏、金、蒙古并立而终亡于元。因此，毛泽东读《宋史》，很注意研究两宋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问题。

【毛泽东评点原文】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2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詰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
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進兵
獲馬三百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人來降乙亥范
陽民以牛酒犒師丁丑帝乘輦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
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來降壬午知涿州劉
守恩來降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于高梁河敗績
甲申班師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乙巳
帝至自范陽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從征失律
貶崇信軍節度使甲寅彰信軍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
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甲戌汴水決宋城縣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纪》写下的批语

【作品介绍】

《宋史》共有496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书。

《宋史》是元朝翰林国史院组织宋史局修撰的，原书题为"元中书右丞相脱脱等修"。实际上，参与修撰的除脱脱外，还有后来担任右丞相的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及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斡玉伦徒、揭傒斯、王沂、危素、王思诚等38人。其中，据说欧阳玄出力最多。脱脱、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曾先后担任过都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等9人为总裁官，斡玉伦徒等27人则为编修。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刚刚灭亡了南宋，元世祖忽必烈便下诏编修宋史。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元政府根据袁桷的提议，曾下令收购辽、金、宋的遗书。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元英宗硕德八剌又下令让虞集编修宋史。但这三次编修工作都没有完成。其原因主要是对辽、宋、金三朝的正统问题有重大分歧，争执不下。当时，有人主张把宋作为正统，把辽、金视为割据而编入载记；也有人主张编修一部《北史》以记载辽、金两个王朝的历史，编一部《宋史》以记载北宋的历史，编一部《南史》以记载南宋的历史。但这些意见在元顺帝以前始终未能得到统一。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当元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时，元政府才根据脱脱的意见，最后决定把辽、宋、金都视为正

统，让三史独立成书，一视同仁，并在翰林国史院下分设辽史局、宋史局、金史局分头进行编修。

宋代文化发达，雕板印刷极为盛行，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修史的数量和质量从整体上说都是空前的。元人苏天爵说："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别集、小说，不知其几。"因此，元朝所能见到的宋朝的国史、实录、会要以及私人撰写的纪传体别史、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宋代史料，为数甚多。而且，宋代的国史都有现成的本纪、志、列传，元人编修《宋史》，只需稍加剪裁或整理便可。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元朝在正式设局编修《宋史》以前又有过三次未能成功的编修活动，为编修《宋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宋史》尽管极为庞大，但经过众多元朝史官的编撰，它最终也只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便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 年）十月赶写成书了。《宋史》问世后的第 23 年，元朝便灭亡了。

《宋史》记事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迄于赵昺祥兴二年（1279 年），记载了北宋和南宋共 320 年的历史。在《宋史》的 496 卷中，有本纪 47 卷，即《太祖本纪》3 卷、《太宗本纪》2 卷、《真宗本纪》3 卷、《仁宗本纪》4 卷、《英宗本纪》1 卷、《神宗本纪》3 卷、《哲宗本纪》2 卷、《徽宗本纪》4 卷、《钦宗本纪》1 卷、《高宗本纪》9 卷、《孝宗本纪》3 卷、《光宗本纪》1 卷、《宁宗本纪》4 卷、《理宗本纪》5 卷、《度宗本纪》1 卷、《瀛国公本纪》1 卷；有志 162 卷，即《天文志》13 卷、《五行志》7 卷、《律历志》17 卷、《地理志》6 卷、《河渠志》7 卷、《礼志》28 卷、《乐志》17 卷、《仪卫志》6 卷、《舆服志》6 卷、《选举志》6 卷、《职官志》12 卷、《食

货志》14卷、《兵志》12卷、《刑法志》3卷、《艺文志》8卷；有表32卷，即《宰辅表》5卷、《宗室世系表》27卷；有列传255卷，即《后妃列传》2卷、《宗室列传》4卷、《公主列传》1卷、《诸臣列传》177卷、《循吏列传》1卷、《道学列传》4卷、《儒林列传》8卷、《文苑列传》7卷、《忠义列传》10卷、《孝义列传》1卷、《隐逸列传》3卷、《列女列传》1卷、《方技列传》2卷、《外戚列传》3卷、《宦者列传》4卷、《佞幸列传》1卷、《奸臣列传》4卷、《叛臣列传》3卷、《世家》6卷、《周三臣列传》1卷、《外国列传》8卷、《蛮夷列传》4卷；总共约有500万字。

《宋史》保存了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丰富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高宗本纪》在所有本纪中篇幅最长；而《食货志》14卷，是《旧唐书·食货志》的7倍；《兵志》12卷，在二十四史中是分量最重的；《礼志》28卷，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宋史》列传255卷，共记述了2000多人的生平事迹。因此，体例完备、志书详细、列传丰富、史料充实、原始材料多是《宋史》的优长之处。

但《宋史》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由于宋蒙战争的影响，宋代的国史和会要只修到了宋理宗朝，宋理宗以后连实录也没有修，而且宋理宗朝的实录也不全。元人编修《宋史》，主要是依据宋代的《国史》和实录。因此，宋理宗以后史料的缺乏自然就影响了《宋史》的编撰，以致宋理宗以后的历史记述十分简略，造成了《宋史》前详后略的缺陷。另外，由于《宋史》成书过于仓促，元朝史臣无法在短期内消化宋代丰富的史料，只能是草率从事，因而《宋史》也就存在有剪裁失序、缺头少

尾、疏失遗漏、繁杂芜秽的问题。一人两传，传与传、表与传、纪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矛盾等问题，以及史事错误的地方实不少。就是在阅读《宋史》时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

【试　析】

宋太宗赵炅（937－997年）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北宋的第二位皇帝（976－997年在位）。他即位后，继承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迫使原只是称臣纳贡的、割据福建漳州和泉州的陈洪进以及吴越王钱俶“纳土”，归朝听封。第二年，又攻灭了割据河东的北汉政权。至此，五代十国时期内地遗留下来的割据政权被北宋全部消灭，只剩下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辽朝与北宋对峙。

辽朝是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五代十国时期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趁中原内乱之机而建立的、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后唐末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向契丹交纳布帛30万匹为条件，借助契丹兵力推翻了后唐，建立了后晋。石敬瑭成为后晋高祖。石敬瑭所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即幽州（治今北京）、涿州（治今河北涿州）、蓟州（治今天津蓟县）、檀州（治今北京密云）、顺州（治今北京顺义）、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蔚州（治今河北蔚县）、朔州（治今山西朔县）、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应州（治今山西应县）、儒州（治今北京延庆）、新州（治今河北涿鹿）、妫州（治今河北怀来）、武州（治今河北宣化）、寰州（旧治在今山西朔县东南）。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后，便控制了燕山山脉，其骑兵可以随时长驱

南下。中原王朝丧失“幽云十六州”后，则步兵无险可守，很难在华北平原上抵御契丹的南侵。因此，自后周开始，中原王朝为解除契丹的威胁，都念念不忘收复“幽云十六州”。

宋太祖时期，尽管对北伐也作了一些准备，但由于主要是对南方割据政权用兵，所以无暇顾及北伐一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在攻灭北汉后，想用出奇制胜的手段，乘契丹不备而乘胜攻取幽州。于是，他不顾士马疲劳，率军东撤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后，立即挥师北上，奔袭幽州。

毛泽东读至此，在这一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对宋太宗轻率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批评。

六月二十三日，宋军进抵幽州城下，两天后对幽州展开了围攻。七月初六，契丹大将耶律沙率援军赶到，与宋军在高梁河一带展开激战。傍晚时分，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又率10万大军赶到，将已经疲惫不堪的宋军击溃。宋太宗带着箭伤，仓惶乘驴车南逃。但《宋史·太宗纪》对此仅有简略的记述：“癸未，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

毛泽东读至此段，在天头上批注道：“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毛泽东所说的“尔后屡败”，是指宋军的雍熙北伐。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春，宋太宗又“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块节度假崔彦逼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逼之，以其众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兵分三路，大举北伐。

《宋史·太宗纪》记载了雍熙北伐的概况："三月癸酉，曹彬与契丹兵战固安南，克其城。丁丑，田重进战飞狐北，又破之。潘美自西陉入，与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其刺史赵彦辛以城降。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癸未，田重进战飞狐北，获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颜、马军指挥使何万通。乙酉，曹彬败契丹于涿州南，杀其相贺斯。丁亥，潘美师至应州，其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司门员外郎王延范与秘书丞陆坦、戎城县主簿田辩、术士刘昂，坐谋不轨弃市。庚寅，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岐国公陈洪进卒。辛卯，田重进攻飞狐，其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举城降，以其县为飞狐军。占城国遣使来贡。丙申，进围灵丘，其守将穆超以城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壬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乙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擒，守节而死。"

这里尽管没有交待契丹军队的战法，但博学多识的毛泽东却通过《续通鉴纪事本末》、《辽史·耶律休哥传》等其它的记载，对契丹在这次作战中所运用的"诱敌深入"的战术有详细的了解。因此，他结合自己的认识，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

敌。”

《宋史·太宗纪》篇末的“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对元人的这个评价极其反感，在这里批注道：“但无能。”寥寥三字，便点明了宋太宗志大才疏的致命弱点。“赞”又曰：“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毛泽东又在此处批注了四字“幽州之败。”用无可争议的事实对元代史臣的溢美之辞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杨倩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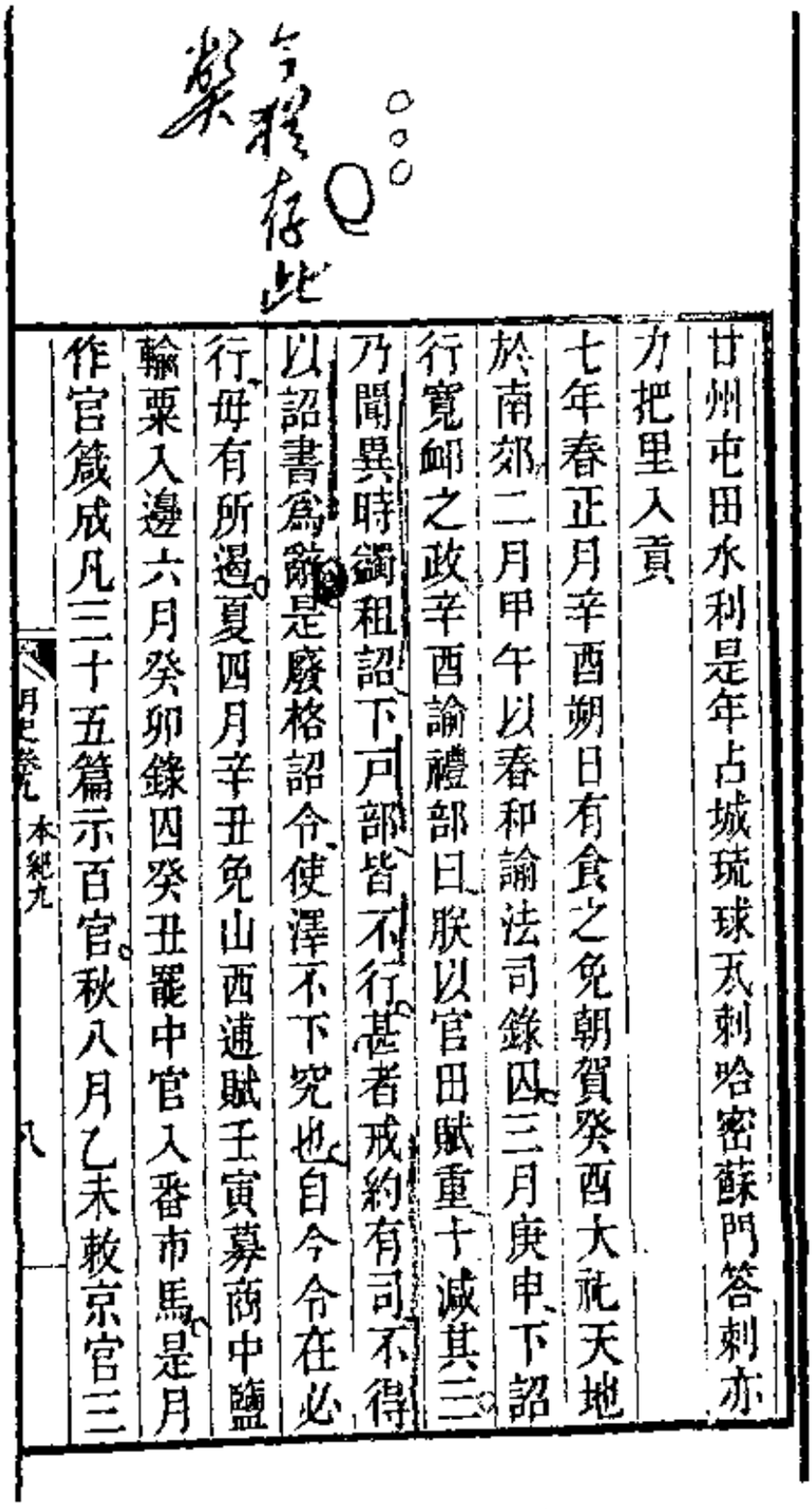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明史》

毛泽东读《明史》留下的批注不多。他读《明史》比较注意明代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对《明史·宣宗纪》的批注，很能说明他的这个政治取向以及读史联系实际的特色。

【毛泽东评点原文】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明史·宣宗纪》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第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甘州屯田水利是年占城琉球瓦剌哈密蘇門答剌亦
力把里入貢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癸酉大祀天地
於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三月庚申下詔
行寬卹之政辛酉諭禮部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
乃聞異時鋤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
以詔書爲言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
行毋有所遏夏四月辛丑免山西逋賦壬寅募商中鹽
輸粟入邊六月癸卯錄囚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是月
作官箴成凡三十五篇示百官秋八月乙未敕京官三

毛泽东读《明史》批注之一页

【作品介绍】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332卷，由清朝的张廷玉等人奉敕共同编撰。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到乾隆，历时95年，前后共修撰了三次，参与修撰的人员累计约有二三百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设史馆修史的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和扩大自身的影响，于是设立了明史馆，命令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人纂修《明史》。然而，由于当时政府不稳，所以《明史》的编修工作没有进行多久就停止了。

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政府再开史馆，继续编修《明史》。康熙帝任命大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让卢君琦、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毛奇龄、潘耒等60余人担任纂修。其后，张玉书、张廷敬、汤斌、徐乾学、张英、王鸿绪等人都先后担任过总裁。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完成了列传202卷。到雍正元年（1723年），完成了本纪、表、志108卷。《明史》大体算是修成了。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认为《明史》还未尽善，又任命隆科多、王顼龄为《明史》监修，任命徐元梦、张廷玉、朱轼、觉罗逢泰为总裁，任命孙嘉淦等25人为纂修，对《明史》进行全面修订。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定稿，由当时的总裁官、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领衔，呈上《明史》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目录4卷，不包括

目录，其总数为332卷。到乾隆二十四年（1777年），乾隆帝又命令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人将《明史》逐一考核添修，并亲自阅定，然后重新刊刻颁行。这才是《明史》的最后订正本，也就是现今通行的《明史》。

《明史》的记事，起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迄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记载了明代277年的历史。其本纪部分为《太祖本纪》3卷、《惠帝本纪》1卷、《成祖本纪》3卷、《仁宗本纪》1卷、《宣宗本纪》1卷、《英宗本纪》2卷、《景帝本纪》1卷、《宪宗本纪》2卷、《孝宗本纪》1卷、《武宗本纪》1卷、《世宗本纪》2卷、《穆宗本纪》1卷、《神宗本纪》2卷、《熹宗本纪》1卷、《庄烈帝本纪》2卷；志的部分为《天文志》3卷、《五行志》3卷、《历志》9卷、《地理志》7卷、《礼志》14卷、《乐志》3卷、《仪卫志》1卷、《舆服志》4卷、《选举志》3卷、《职官志》5卷、《食货志》6卷、《河渠志》6卷、《兵志》4卷、《刑法志》3卷、《艺文志》4卷；表的部分为《诸王表》5卷、《功臣表》3卷、《外戚表》1卷、《宰辅表》2卷、《七卿表》2卷；列传部分为《后妃列传》3卷、《诸王列传》5卷、《公主列传》1卷、《郭子兴等传》3卷、《诸侯列传》156卷、《循吏列传》1卷、《儒林列传》3卷、《文苑列传》4卷、《忠义列传》7卷、《孝义列传》2卷、《隐逸列传》1卷、《方伎列传》1卷、《外戚列传》1卷、《列女列传》3卷、《宦官列传》2卷、《阉党列传》1卷、《佞幸列传》1卷、《奸臣列传》1卷、《流贼列传》1卷、《土司列传》10卷、《外国列传》9卷、《西域列传》4卷。

《明史》主要取材于明朝的实录、典志、传记、杂史等。明朝尽管连一部国史也没有修成，但实录却有3094卷，私家

所撰的各类明史著作总计有3282卷，各类典志总计2064卷，各类传记总计1001卷，各类杂史约有1000多种，史料极为丰富。而清朝参加《明史》编修的人员中又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等。清初担任《明史》总裁的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明史》的纂修义例是徐元文委托黄宗羲、顾炎武两人制订的。因此，《明史》的编修，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规划，分类也比较妥当。在编修过程中，《明史》又经过了多次大修大改和订正，长期反复考证推敲，因而在《二十四史》中，应该说是写得较好的一部史书，体例比较严谨，文字精炼，内容充实，矛盾之处也较少。例如，《明史》的志分为十五目，在《二十四史》中，是名目最齐全的。再如，明初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丞相，六部尚书直接受皇帝控制。另外都察院置左右都御史，掌纠察百官，权力也相当大。所以明政府机构中的主要官员即六部尚书加都御史，是为七卿。而《明史》为了反映明代官制的特点，便新创了《七卿年表》。《明史》的《阉党列传》、《流列传》、《土司列传》，也是新增的类传名目，反映了明朝的时代特色。

然而，在清朝民族歧视和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明史》在记述内容上却存在不少缺陷。例如，清朝之祖先女真部落联盟，原与明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明史》却不敢涉及清朝祖先的问题，女真部落联盟的历史全部被删去。又如，崇祯以后，明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以抵御满清，史称南明。南明政权延续了18年之久，是整个明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等三王，原本应附于本纪之末，自成一卷。但《明史》却将三王附见于各始封王之后，仅有廖廖数语，使南明史事淹没几尽。

【试　析】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所号宣德，在位10年（1425－1435年。）

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是明朝的鼎盛时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创业的基础上，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明朝前期政治的弊端，因而一改明初的严酷国家政治，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了宽缓的政策，以稳定内部关系，求得社会的安宁与自身统治的稳固。史称“仁宣之治”。由于明仁宗在位仅有一年，因此，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是在明宣宗时期完成的。

不过，由于“仁宣之治”比较注重宽容，因而也就出现了“纪纲不振”的问题。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事情屡屡发生。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第二天，他鉴于当时的政风不严，因而对自己所下的诏令是否能得到落实存有疑问，便对礼部官员重申道：“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穷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毛泽东读至此处，深有感慨，便对此批注道：“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所说的“此弊”，指的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问题。这个批注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写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

非常注意，并极力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1959 年 3 月 29 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曾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下达，上情不能上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联系现实的。（杨倩描）

“相砍书”《左传》砍的战争有点少

毛泽东看《左传》与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角度。毛泽东从《左传》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统计，《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但他对《左传》中描写战争的文字所占比重偏小却有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

——摘自毛泽东与孟锦云的谈话（见

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

【作品介绍】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最详备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该书上自鲁隐公元年，晚于《春秋》，终于鲁哀公27年，但其记事至鲁悼公4年。按鲁国君王十二公纪事，追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事。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开始将经传合编为一，广为流传。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中国很早便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的政治人物、思想家以及民众，都把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看作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即使短期内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下，统一的意识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长期连续发展的强大精神纽带。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

丰富内容。《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

《左传》这部优秀的史学、文学名著，千百年来，却是一部争论很大的著作。历来学者围绕《左传》的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说它的名字的缘起。《左传》是大家习惯上称呼的书名，即《左氏春秋》的省称。而其最早的书名却是与此倒过来叫的《春秋左氏》。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书名，于是《左传》便有了现在的省称，从此以后便沿袭下来。

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最早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其他事迹介绍不详。《论语》提到过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孔子非常敬重他，说是与他同好，但是并未说此人曾作《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才把两个左丘明断为一人，并说他和孔子同观鲁国史记，并为之作传，也就是《左传》。到了晋代，杜预作《春秋集解序》，便将左丘明说成是孔子的学生。这样，左丘明作《左传》说，经两汉、魏晋维持了几百年。唐代学者赵匡对此说提出异议，否定左丘明曾作《左传》说，此后，宋元学者多同意赵匡的说法。清代末年，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经过研究，认为《左传》是汉人刘歆采取《国语》依《春秋》编年而成的伪作。四十年代还有人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后人否定左丘明著《左传》的种种说法，多是推测之辞，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相比之下，司马迁肯定左丘明作《左

传》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司马迁著《史记》，取材严谨，被后人誉为“实录”，他对左丘明的评价，也仅寥寥数语，体现了他“疑者阙焉”的科学态度。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盲史，类似古希腊荷马式的人物，《左传》和《国语》中的大部或一部分历史是根据他的传诵，由儒家子夏的再传弟子们笔录、整理，最后写定的。当代学者徐中舒先生对此说法有过系统论述，他在《左传选·后序》中说：“左邱明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瞽矇先辈的诵说。他就在这样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实，成为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同时他又必须经常将这些史实融会贯通起来在瞽中传诵下去，使这些史实不至湮灭。当他一年又一年的反复传诵，又使他的文学技能不断提高。因而，他所传诵的历史，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是丰富的，组织方面是严密的，修辞方面是动人的。《左传》文章优美就是以这样传诵作为蓝本后来笔录成‘语’，又经过一番加工。最后，《左传》作者又在子夏门下长期讲习中，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搜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这种说法，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左传》同《春秋》的关系，也是人们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中还夹杂着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斗争。两个学派都承认《春秋》是经，可对《左传》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古文派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今文派却说“《左氏》为不传《春秋》”，仔细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原文，今文学派较有道理。《春秋》和《左传》都是史学著作，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专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们“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左传》与它

们显然不同，它只叙事，不解释《春秋》的经义。他有很多"无经之传"，或者同经文相矛盾的传文。因此，可以说，《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依照它的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的次序，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悼公十四年）间的春秋史。他取材广泛，博采了古代和当时的史书的记载，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以及周、郑、宋、卫等国的旧文简册和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删繁就简，加以裁编而成的。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几个历史时期的部分资料。后来，汉朝人的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书，都曾以《左传》的记载为依据。

春秋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很迷信，每逢国家大事，多预卜吉凶。《左传》就记载了很多这类预言，其中有灵验的，也有不灵验的。凡是灵验的，一定是比附之辞。研究《左传》的学者就利用书中的预言，以及《左传》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把它的成书年代定在公元前375——351年之间，否定了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旧说。

《左传》反映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虽然宣扬了唯心史观和等级观念，但就其整个思想倾向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性，如《曹刿论战》、《师旷论卫人出其君》反映出以依靠人民、"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幼童汪锜奇执干戈以卫社稷》中反映出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役人相命各杀其长》描述了劳动人民反抗阶级剥削的斗争。本书热情赞扬了管仲、子产、叔向、晏婴等对国家

和人民作过贡献的政治家，对残害人民的各种暴君和暴政以及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左传》为古代史学创立的范例，为两汉史学家司马迁、荀悦所效法，从而推动纪传、编年两大史书体裁走向成熟。《左传》文字简练优美，作者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纷繁的事物。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的生动细致，描绘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左传》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艺术成就，被尊为《十三经》之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试　析】

《左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古典作品之一。1906年，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传》受此二书影响，从此他对历史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1936年，毛泽东撰写的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八年的曹刿论战，几乎是全文引用，用来说明他要阐述的军事思想。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引证之前，毛泽东写道：

春秋时期，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

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他风趣地说：“请看历史学家左丘明的论述：……”。在全文引用了《左传》所载曹刿论战一文后，毛泽东具体分析这个战例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毛泽东对《左传》关于曹刿论战的记载作了现代意义上的说明，其材料是传统的、历史的，而其所用理论却是现代的、科学的。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 年）所记刘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的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38 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犯

错误来说明，他指出："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引用晋楚城濮之战，阐述以少击众，将劣势转化成优势，要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使全局转换成优势，转换成主动。

毛泽东是把《左传》当作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在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上，建国前，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事上，建国后主要集中在政治上。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保天下。"由于《左传》记事以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史为主干，而其描写战争的篇幅比《资治通鉴》相对要少，因此，在建国前，毛泽东更重视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毛泽东在对孟锦云论述了古代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后，接着又说："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魏建震）

毛泽东评点《元史纪事本末》

《元史纪事本末》记述了元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是一部学习元朝历史的入门性史书。毛泽东阅读了这部书，并对书中所记的某些战争作了批注，从中可以看出他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评点原文】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毛泽东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2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元史纪事本末》是明代史学家陈邦瞻撰写的一部记述元朝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陈邦瞻（？—1623 年），字德远，高安（今江西高安）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中进士，后历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吏部稽勋司郎中，浙江参政，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广西、广东巡抚，总督两广军务，户、工、兵部侍郎。从这份简历可以看出，陈邦瞻并不是一个只顾读书的伏案书生，而是一位历任中央政治、经济、军事各部门的要员和巡抚、总督数省的封疆大吏。他对于治国理民颇有经验，故史称其“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从陈邦瞻一生的政绩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称道：如他在任河南右布政使时，分理彰德诸府，曾“开水田千顷，建滍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时，曾派兵讨平上林、田州等地的土司叛乱，击退海盗林辜老所领万余人的侵扰，捣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入内地的巢穴。此外，他对于明熹宗的乳母、无恶不作的客氏，也敢于上疏指责说：“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如此犯颜直谏，确实难能可贵。

陈邦瞻生活在社会危机比较严重的明代中后期，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政治上竭力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

此他十分注意研究和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尤其重视与其时代相近的宋、元两个朝代的历史，以便尽力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借鉴。这就是他撰写《元史纪事本末》的政治意图。

陈邦瞻在撰写《元史纪事本末》之前，曾着力撰写了一部记述宋代300多年历史，共109卷、约60万字的《宋史纪事本末》，深得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称赞。于是，他接着又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写成《元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初稿，并由臧懋循（字晋叔，浙江长兴人）补撰了一篇《律令之定》，随即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式刊行。《元史纪事本末》共立27个篇目，合为6卷，约10万字，所记内容与《宋史纪事本末》紧相衔接，两书略如一部书的上下编。后来，明末史学家张溥又就《元史纪事本末》各篇撰写史论，附于各篇正文之后，并按篇分为27卷，重新刊行，即为现今所见版本。

《元史纪事本末》对于元代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如元初的农民起义、北边诸王之乱、日本用兵、阿合马等奸臣的横征暴敛，以及元代的科举、律令等各种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述。但是，作者把南宋灭亡以前的元代史事尽归入《宋史纪事本末》，又认为明军破大都、元帝北逃以后的史事应属于明史范围而不记述，所以全书内容过于简略。此外，该书多取材于《元史》和《宋元通鉴》，因不是第一手材料，故史料价值不高。而且，该书对史实的考证和叙述也不够精当。例如卷13记有“泰定三年四月，修夏律、阳武河堤三十三所”。此文出自《元史》卷30《泰定帝纪》，原无“阳”字，“武”字前后当有脱文，作者妄自补一“阳”字，缺乏根据。又如卷22记述皇子古纳答剌事，前一年称“皇子古纳答剌”，后一年称

“皇子燕帖古思”，易使读者以为是两个皇子，而实际上《元史》中明确记载是皇子古纳答剌改名燕帖古思，作者把改名一事漏记了。

尽管《元史纪事本末》存在上述缺点，但由于它采取纪事本末的体例，以事件为中心，取材精炼，叙事简明，轮廓清晰，条理分明，仍可作为学习元史的入门书。而且，作者对于和明代有关的元代科举学校等典章制度、河渠、海运、营田治河、天文历法等内容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这是我国水利史上一篇很重要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元史纪事本末》成书以后，明清两代多次刊印，广为流传。

【试　析】

《元史纪事本末》中《占城安南用兵》一卷，记述了元世祖忽必烈从至元十九年（1282 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多次派兵征讨东南沿海的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安南（今越南北部）两个小国的有关情况。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段历史，对书中记叙的几次战争颇感兴趣，并作了批注。

元朝统一中国之初，占城国王迫于元朝的强大威势，曾遣使上表称臣。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占城既已归附，遂命大臣唆都负责在占城国建立一个行省，欲将占城纳入元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占城国王子补的并不甘心受制于元朝，反对在占城建立行省，并将元朝派往其国的使臣统统关押起来。对此，元世祖怒不可遏。命令唆都调集淮、浙、福建、湖

广等处的军队共5000人，海船100艘，战船250艘，从海路大举进讨占城国。至元二十年春，唆都率军攻入占城国。占城王子补的为避元军锋芒，率众“遁入山谷，后遣其臣宝脱秃花阳求归顺以款师，复潜杀所执使臣皇甫杰等百余人”。过了许久，唆都才发觉上当，遂发兵攻山，但当转战至木城下，因道路险阻而无法再进。于是，补的乘机派兵截断了元军的归路，元军大惧，经过殊死战斗，部分元军才得以逃出山谷，经过这次惨败，唆都最后不得不引军撤退。

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得知唆都战败的消息后，又命镇南王脱欢督率左丞李恒等人领军南下，会同唆都军再次征讨占城。这次征讨，脱欢打算从陆路进发，遂“以安南通谋占城，令军行假道于其国，且征其粮响以给军”。面对元军的入侵，安南国王陈日毫不畏惧，“遣兵分道拒守境上”。至元二十二年。脱欢领军渡过富良江，攻入安南，经过一番大战，安南军败，陈日领军遁走，其弟益稷率众投降。然而，元军虽取得初战的胜利，但随即却受到大面积的疾疫困扰。加之安南军不断地骚扰袭击，元军亦死伤惨重。在这种情况下，脱欢自知无法抵达占城，便不得不引军撤退。这时，陈日乘机派兵追袭，元军大败，唆都、李恒二人皆战死。

至元二十四年春，脱欢再次督率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楫等人领军进击安南。“鹏飞与楫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弃城走于海”。毛泽东读史至此，对于“十七战皆捷”的说法颇感怀疑，便在天头上批注道：“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他认为这十七战不可能是硬碰硬的战斗，元军之所以“皆捷”，是因为陈日有意要避开元军的锐气，主动率主力撤退于海岛。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批注是完全正确的。至元二十五年春。脱欢派兵入海追击陈日，但却找不到他的踪影。不久，元军又多染上疾疫，战斗力顿减。于是陈日乘机率军反攻，元军“所得险厄皆失守”，脱欢“遂谋引还”。陈日又迅速聚集“散兵三十万守御东关，遏脱欢归路”，迫使元军“且战且行，日数十合”，“将士裹疮以战”。最后，元军死伤惨重，樊楫和右丞相阿八赤皆战死，脱欢由小路狼狈逃回，此次征讨遂终归“无功而还”。由此可见，在上年的十七战中，安南军主力确实没有受到什么重创，而是为避元军锐气主动地撤离了；否则，陈日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又迅速聚集起三十万的兵力进行反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的批注不仅正确地揭示了“所谓十七战皆捷”的真实内涵，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所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

经过上述几次征战的失利，元世祖后来不得不改变策略，一面主动遣使与安南修好讲和，一面又整兵聚粮以备再行征伐。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在经过长时间的备战之后，命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人领军再次征讨安南，但结果仍然是“无功而还”。第二年，元世祖驾崩，皇孙铁木耳即位，正式下诏“罢安南兵，释其使归国”。至此，元朝的“占城安南用兵”行动遂以失利而告终。（唐华全）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极为喜爱的一部历史巨著。他不仅自己读过17遍，还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和谈论此书。关于这部书，毛泽东既提出了中肯的评价，也提出了阅读这部书应采取的态度，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评点原文】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草稿



司马光画像

——毛泽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页，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街亭）初战亮宜自临阵。

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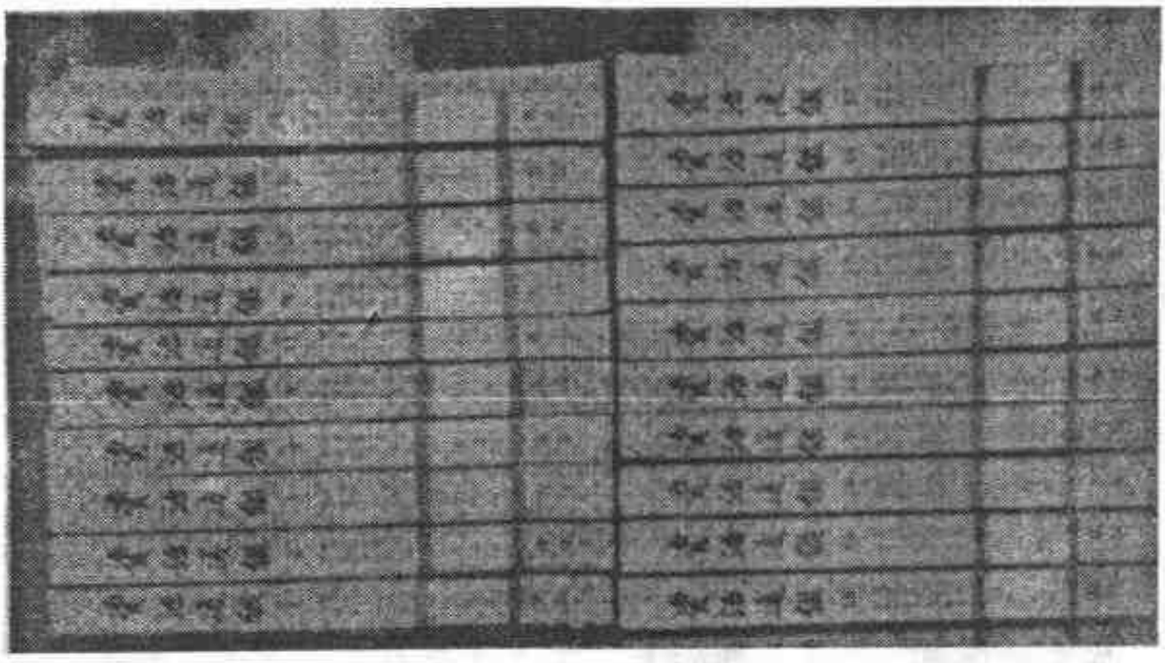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1、卷72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约300余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时中进士甲科，由奉礼郎累迁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开始设书局编集《通鉴》。神宗即位后，推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六任闲职，皆以书局自

随，专意编写《通鉴》，历十四年之久。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编成奏上，迁资政殿学士。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他由洛阳还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尽罢新法。不久，病死。司马光“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二十几种，五百余卷，主要历史著作除《通鉴》外，还有《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毛泽东读过的平装标点本《资治通鉴》

司马光从小就酷好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他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史学方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他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另一方面，司马光生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北宋中期，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

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阶级矛盾极为尖锐；而辽、夏的威胁和侵扰，又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朝野上下响起了一片“求治”的呼声。“以史自负”的司马光就企图通过历史的编写，“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来总结统治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这就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两个主要原因。

司马光编写《通鉴》，有一个长期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已经着手修史的具体准备工作。这时，他首先编写了一部与后来《通鉴》断限相同的大事年表，简要地记载了历代的治乱兴衰，名为《历年图》，共分五卷，于治平元年（1064 年）进呈宋英宗。《历年图》记事虽简，但附有“历代论”和“后序”，比较集中和系统地提出了作者对历代政治兴衰的看法，反映出司马光编写一部通史的思想观点已经酝酿成熟。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仿照《左传》的体裁，很快写成《通志》八卷，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秦二世三年，这记就是《通鉴》前八卷的样书。此书进奏以后，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四月，英宗遂命司马光设立书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继续编写历代君臣事迹。这是《通鉴》正式编修的开始，从此司马光个人的修史工作成为一项官府的任务。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奉旨进读其书，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为它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成书。此后，尽管朝廷政治斗争的风浪极其复杂剧烈，司马光的官职也几经变迁，但他的修史工作始终没有停顿。一直到元丰七年十一月，《通鉴》全书终于修成奏上，这时上距治平三年设局修史历时已达十九年之久。

《通鉴》的作者虽然只署司马光，但此书并非司马光独力编成，而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在书局中，司马光自任主编，协修人员主要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这三人与司马光志同道合，他们在史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史书，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是著名的汉史专家，并"习知汉魏晋唐之典"。范祖禹好学能文，"深明唐三百年治乱"，是著名的唐史专家，著有《唐鉴》一书。他们三人各有分工，主要任务是分段编写丛目和长编。至于全书的剪裁熔铸、文字锤炼以及杀青定稿，则由兼具才学识三长的司马光自任其劳，一手完成。另外，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也属书局成员，他专门负责全书的文字检阅工作，为完成《通鉴》也出了不少力。也正是由于在几位名家参修的基础上，又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得《通鉴》这样一部贯穿千年史事、褒贬历代政治而成书于众人之手的历史巨著，结构上浑然一体，文字上简洁质朴，如一气呵成。

在编写《通鉴》的过程中，从开始收集资料到最后写成定稿，司马光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方法和步骤，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通鉴》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黏排列起来，叫做丛目。丛目要求尽量详备，凡是各种史料"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这时第一稿。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长编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便作进一

步的修改。第三步是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均衡全文，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通鉴》的整个编纂过程，从丛目到长编，从长编到定稿，每一个环节的写作任务都相当艰巨，耗时颇多，但司马光和书局同人始终都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写作环节，这样就克服了历来设馆修史的种种弊端，有效地完成了这一史学巨著。

司马光等人编写《通鉴》时，博览群书，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司马光自己说他为了搜集史料，曾“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据宋人高似孙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近人张煦侯又据《通鉴》和《通鉴考异》所引各书篇目加以考索，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共301种。如除去《史记》至《新五代史》等19种正史之外，还有282种。由此可见，司马光引用史料之广泛与丰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通鉴》所引之书如今已大半失传，唯赖《通鉴》保存了不少佚书的内容，有的还比较完整。因此，《通鉴》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它专详历代的治乱兴衰，着重叙述了中原各朝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突出地记载了历代战争的谋略和经过，同时对于一些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论，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礼乐兵刑的演化、各族之间的往来，以及社会风俗的变迁、丁口的增减、典籍的聚散、历法的改革、水利的兴修等等，也都有所选择地作了适当的记载。因此可以说，《通鉴》是一部以政治、军事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内容的通

史。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主要意图，是要通过历史事实，为封建帝王提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所以，《通鉴》记载历代史事，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讴歌颂扬贤明、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也敢于深刻地暴露历代统治者的丑行坏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鉴》还比较详尽而真实地记载了秦末、汉末、隋末、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并且往往占到记叙当时史事一半以上的篇幅，实际上已成为记载当时史事的中心。司马光写这些，主观上只是为了给北宋统治者敲警钟，筹划镇压人民的对策，但客观上却反映了历代盛衰演变的基本情形，也为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阶级对立和斗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鉴》记事虽贯穿古今，但却详今略古，繁简适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有其独创的特色。《通鉴》采取《左传》的编年体形式，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把大量分散在纪传体正史和其他书中的材料集中编排，依次叙述史事，从而避免了纪传体史书中一事复见数篇、前后屡出、断续相离的短处，既节省了篇幅，又较好地展示出史事的前因后果和演变的趋势。同时，司马光还广泛吸收了纪传体史书写人物传记，特别是写类传、合传和附传的经验，充分运用追叙和并叙的方法，对旧有的编年体写法加以改进，从而扩大了编年体记事的范围，弥补了编年史中事以年隔的短处，容易使读者得到一个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通鉴》在编纂上的另一特点，是通过《考异》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司马光编写《通鉴》时，一件史事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互参写成，这样就难免要遇到记载的异同、史实的真伪问题。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他提出用考异的方法来辨

别史料，并编写了《通鉴考异》30卷，用以说明对庞杂的材料如何考订异同，所以去彼存此的原因。这样，既保证了《通鉴》记事的确实可靠，同时也开创了一种记事从实的学风，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鉴》卷帙浩繁，普通人一时难于读完，所以，司马光同时又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此书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而列《通鉴》卷数于下，使读者易于寻览，如果想了解某年有什么重要史事，只要看看这个《通鉴目录》，就可知道其梗概。因此，《通鉴目录》如同一般的目录书，可以帮助读者按图索骥。

《通鉴》在叙事之外，还结合史事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由司马光亲自撰写了史论118篇。这些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和比较浓厚的正统观念，其政治思想也是趋于保守的。但他对于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通鉴》在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通鉴》因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全书文字简洁优美，叙事生动具体。特别是写战争，有的地方还很精彩，如其中写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文字，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因此，《通鉴》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来被视为可与《史记》相媲美的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自编成以后，就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称赞此书“贤于荀悦《汉纪》远矣”；南宋学者王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也”。这些评论虽有过誉之处，但同时也说明《通鉴》确实是一部煌煌巨著，它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试　析】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爱读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故居的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五十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了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

1912 年，年方十九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政法、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又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在这所学校里，他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得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反复阅读之后，深为书中内容所吸引，并由此产生了探究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这是我们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第一次阅读《通鉴》的经历。从此以后，《通鉴》这部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只要有空闲，他总爱拿出这部书来认真阅读。1959 年 10 月，毛泽东赴外地视察前夕，特意开列出要随身携带的书籍名单，《通鉴》一书也在其中，可见他丝毫也不放过阅读这部书的机会。

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推荐《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 17 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通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著作，如要通读 17 遍，这对任何一个专

业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而毛泽东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竟能做到，实在令人惊叹！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有一段时期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晚年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可见毛泽东对《通鉴》这部书真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

毛泽东读《通鉴》，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历代战争的记叙，并注意从这些战争史实中吸取古人如何克敌制胜的经验和启示，用以指导中国现代革命和实践。例如，1936 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的原则问题时，指出："中国战史上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938 年，他在另一部军事名著《论持久战》第 82 节中，为了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战争结局的问题，又再次列举出上述六个战例，并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认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毛泽东列举的这些战例，在《通鉴》中都有比较精彩的描述。他通过反复阅读，自然对这些战争的经过和得失了然于胸，因而引证时便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古代战争中制胜的经验，同时也十分注意吸取古代战争中失败的教训。例如，他在阅读了《通鉴》卷71中关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误用马谡镇守街亭要冲，致使街亭失守，从而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这段史实记载后，即在书中批注道："初战亮宜自临阵。"众所周知，街亭之战的失败，主要由于马谡不听诸葛亮的节度，违背屯兵扎寨的原则，"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而造成的。街亭失守后，诸葛亮用空城计骗过司马懿，使蜀军安然撤回，然后再挥泪斩马谡。《通鉴》对这段史实的记叙虽较简略，但诸葛亮的智慧和情感却展露无遗。然而，毛泽东却从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认为诸葛亮也有重大失误，因而批语指出诸葛亮作为蜀军的最高统帅，在首次北伐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应当亲临前线坐镇。这句批语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再如，毛泽东在阅读了《通鉴》卷72中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粮尽退军，以伏兵击退曹魏追兵这段史实记载后，又在书中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认为，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战失败的教训，因而在以后的几次北伐行动中都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不过，诸葛亮在后几次北伐中，对于军中事务，无论巨细皆一一过问，这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不以为然，因而他自己做统帅时，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只抓重大战略，而将战术问题交由前线指挥去处理，即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可见，毛泽东的确善于从《通鉴》所记载的古代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4年冬，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接见著名史学家吴晗时，谈到了《通鉴》。他说："《资治通鉴》

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这段话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了他对《通鉴》的评价，即“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称赞“这部书写得好”。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读这部书的问题，这就是他说的“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三句话是很重要的，也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所谓“批判地读”，是从立场、观点上说的。所谓“借以熟悉历史事件”，是从增长和丰富历史知识上说的。所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说要以历史为借鉴，从而通过史书把历史同现实联系起来，可见，毛泽东讲这三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显然也是他本人反复阅读《通鉴》和其他史书所采取的态度。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又讲到这种读史的态度，他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泽东晚年同孟锦云谈论《通鉴》时，也讲到这种读史态度，他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于我们阅读《通鉴》和其他历史典籍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历史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极为关

注，就在他同吴晗谈了关于《通鉴》的看法之后，接着他又说："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并把标点《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1954 年 10 月，吴晗便召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会上即成立了标点《通鉴》的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吴晗主持，成员有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等人。1956 年 2 月，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凝聚着吴晗等著名历史学家心血的《通鉴》标点本。《通鉴》标点本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没有不受惠于此的。

大约在 1975 年 5 月至 1976 年 9 月期间，毛泽东同孟锦云围绕《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谈论，其中不少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通鉴》一书具有重要启示。

孟锦云问："《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论史者多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司马光是因尊崇《左传》，"春秋之文不可删改"，故《通鉴》只得从其下限的战国初年写起，以示上接《左传》。而毛泽东则从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政治意图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

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显然，毛泽东的分析要比过去论史者的分析深刻得多。

孟锦云问：“《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毛泽东回答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毛泽东的段话，对于理解封建史臣普遍存在的“为君讳”问题，显然也是很有帮助的。

孟锦云问：“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回答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

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泽东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政治目的和《通鉴》在内容上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特点。

司马光编写《通鉴》是投入了毕生精力，“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和他的写作班子皓首穷经19年，仅残留在洛阳的草稿就放满了两个屋子。对此，毛泽东深为赞叹，他动情地向孟锦云讲述道：“司马光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还曾问：“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解释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显然，毛泽东也很赞赏司马光

为人处事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在今天仍值得提倡。

总之，毛泽东关于《通鉴》的许多讲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唐华全）

毛泽东评点《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采用纪事本末体例的历史著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部史书，并作了许多圈点批注，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毛泽东评点原文】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对弱敌强。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评集》第2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已成催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生子当如李亚子。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9页、第3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人袁枢根据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史文编纂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采用纪事本末体例的史书。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

瓯）人。他自幼力学，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渡过青少年时期。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以试礼部词赋第一而中进士，调温州判官。后历任礼部试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官。卒于宁宗开禧元年，终年75岁，袁枢在任严州教授期间（1173—1176年）由于职掌清闲，故得以从容论著，终于写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他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是同时代人，他们之间互有往来。朱熹《寄机仲》诗中有“却怜广文官舍冷，只与文字相周旋”一句，指的就是袁枢在严州编写《通鉴纪事本末》这件事。袁枢晚年因受“庆元党禁”的牵连，闲居达十年左右，于是研究易学，著有《易学索引》、《易传解义》、《周易辨异》、《易童子问》等书。

袁枢生活在南宋前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宋孝宗统治时期，这是南宋建立以来政治上比较稳定的时期。当时，南宋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种社会环境，对于具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正是抒发其志向和抱负的时刻。袁枢为人正直，他在做史官时，北宋宰相章惇的后人以同乡关系，婉言请求袁枢替章惇作一篇佳传，袁枢断然拒绝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对上，袁枢敢于直言极谏。淳熙年间，宋孝宗宠用奸佞，袁枢便直指孝宗“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这充分表现了他明辨是非，不畏强御的精神。在对金关系问题上，袁枢主张加强备御，以策万全，他对于当时主张放弃两淮而守长江的“退保”政策曾

表示强烈不满。袁枢对于民间疾苦也比较关心。他在奉命巡视两淮灾情时，看到“豪强之户，冒耕包占”，而贫民无地可耕的情况很严重，就建议输课加于田主，闲田给予佃人。在江陵知府任上，他看到江陵靠近长江，百姓常遭水灾，就在楚国旧城“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为虞；种树数万，以为捍蔽”，从而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大困难，因此得到人民的好评。

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读《通鉴》的困难。《通鉴》共有294卷，记载了1362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由于它采取了编年体的写法，对于连续数年的事情未能连贯记述，因此若要了解某事的全貌，就必须翻阅好几卷，这对于查阅一件史实的经过是很不方便的。据说《通鉴》修成以后，司马光很希望书局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看，但很令他失望的是，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人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阅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要打瞌睡。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起来感到很困难。司马光本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晚年曾想另写一部《通鉴举要历》，把《通鉴》再简化一番，但结果没有完成他便死了。有鉴于此，袁枢就根据《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并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再每事标以一个醒目的题目，最后汇集而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通鉴纪事本末》共42卷，它把1362年的史事概括编集为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显然，这比《通鉴》原书要简化多了，从而为初学历史的人提供了很大便利。

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他的政治意图。众所周知，司马光撰写《通鉴》的目的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维护和加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袁枢熟读《通鉴》，对司马光推崇备至，因此他编写《通鉴纪事本末》的目的也和司马光一样。朱熹在《跋通鉴纪事本末》中称赞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所谓“微意，无非是指陈“王道得失”，借以抒发袁枢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袁枢就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等，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反复撰述，以便为当时及后世的君臣提供鉴戒。袁枢还特别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故他对于东晋南朝时期的“祖逖北伐”、“宋文图恢复”、“宋明帝北伐”等史实中大书特书，而对于进占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则标以“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元魏寇宋”、“元魏寇齐”等蔑视性的题目。可见，袁枢的政治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时，便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读后，也十分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并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通鉴纪事本末》除每篇的标题外，其余内容全部抄自《通鉴》原文，袁枢自己没有一句话，因此它在史料价值上自然不可能超过《通鉴》。但是，这部书以事为纲，眉目清晰，旨趣明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精萃的历史教科书，因而它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曾起到很大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对史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为中国史书的编纂创立了一种新的体例。原来，我国自先秦以来直至北

宋，史书的编纂无非采用编年体或纪传体。这两种体例虽然都产生过不朽的名著，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编年体以年为经，突出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因而它在记事上必然前后割裂，破坏史事的完整性，使一桩完整的史事被年、月、日分割成为许多碎片，往往造成“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可以综合运用传、志、表等手段，兼顾时间、事类和人物等各方面的内容，但它也存在各部分之间相互矛盾、重复和脱节的缺点，结果也是“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有鉴于此，袁枢便于编年、纪传二体之外，另行创立了纪事本末这一体例。这种体例是以事件为中心，既有醒目的标题，更有依时间先后而叙述的详细史实，并可“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因而能够做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有效地弥补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缺陷。因此，自袁枢创立这种体例以后，后世史家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在袁枢及其《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下，明清时期还相继产生了13种纪事本末体的史籍，从而使纪事本末体成为我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大主流。

《通鉴纪事本末》对于《通鉴》的校勘也有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时难免会有错误。《通鉴纪事本末》完全依据《通鉴》的原文抄录，因此两书可以互相校勘。清代张敦仁就曾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与明万历年间杭州所刻《通鉴》无注本互校，共校出异文三千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三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又把张敦仁校勘《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可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6年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通鉴》标点本，除了章钰书中的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作注文之外，还选

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作为注文，这就使《通鉴》标点本成为现今最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与其他古籍一样，也难免有它的缺点，这首先表现在取材上的不全不备。《通鉴》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书中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本来就比较少。而袁枢所取资料则更局限于治方面，其余史事，如田制、漕运、府兵以及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内容，皆一概弃而，这就未免显得所见不广了。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各个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则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脉络，因而它只是记述了历代治乱兴衰的现象。再次，《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仇视农民起义的政治倾向。例如，它对于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冠以“讨”、“平”一类的字样；对于农民起义则多称为“某某之乱”。

《通鉴纪事本末》有两种版本：原始宋本共42卷，篇末无史论；后来明末张溥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于各篇之后，并把全书按篇分239卷。

【试　析】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是为了更系统而深入地阅读《通鉴》。他读这部书，用的是光绪戊戌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上面留下了他认真阅读后的许多圈点和批注。

《通鉴纪事本末》中《石勒寇河朔》一节，记述了西晋末年后赵主石勒袭杀幽州都督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迁幽州都督。西晋末年，王浚想趁天下

大乱之际，割据幽州，自立为王。但是，此人生活奢侈，不亲政事，任用小人，滥杀无辜，再加上连年的蝗旱灾害，幽州地区民不聊生。因此，王浚在幽州的统治并不稳固，处境岌岌可危。就在这时，后赵政权已日趋强大，石勒便想攻讨王浚，夺取幽州，但由于心中无底，他又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就问："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迟迟不出兵，是不是担心刘琨、鲜卑和乌桓在后面偷袭你呢?"刘琨时任并州刺史，并州和幽州是当时西晋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于是献策说："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动，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以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宾贵神速，勿后时也。"张宾这番话，对于刘琨与王浚的矛盾，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彼此的心态动向，都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提出了他的决策意见。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已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又画了三个大圈，以示重视。其后，石勒出兵进逼幽州，王浚不听左右劝其抗击的意见，反误以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擒获他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四年以后，石勒又打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所有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如张宾所料。事实证明，张宾对当时形

势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毛泽东便以“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一句批语表示赞赏。

毛泽东对这段史实之所以感兴趣，并作出上述批注，这不是偶然的。早在1944年，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就曾号召说：“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并一再强调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分析方法历来是极为重视的。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彧弑杀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劣势，依靠一批得力的将帅，转而打败劲敌，夺得天下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对《废帝之乱》四个字的标题，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旁圈右侧又重笔画了两道曲线，并在天头上批注道：“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批注中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旁，毛泽东还特别加了旁圈。

宋废帝是宋孝武帝的长子，名叫刘子业，他在位期间残暴淫虐，滥杀大臣，重用奸佞，是一个无道的昏君。刘彧是废帝的叔父，时封湘东王。废帝害怕刘彧谋反篡位，就把他强留在身边严加看管，并经常侮辱他，摧残他，甚至因刘彧体胖而称之为“猪王”，令他睡在猪圈，食在猪槽，还十数次地想借故杀死他。刘彧忍无可忍，就在亲随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的协

助下，与废帝的近臣寿寂之、朱幼细、姜产之等人密谋策划，一举弑杀了废帝。事后，刘彧在建康被拥立为皇帝，是为宋明帝。

废帝的弟弟刘子勋，时封晋安王，废帝也曾下诏欲将他赐死，他的部下长史邓琬便起兵讨伐废帝。不久，邓琬得知废帝已被刘彧杀死的消息，又转而在浔阳拥立刘子勋为帝。这样就出现了刘彧与刘子勋，亦即建康与浔阳之间相互对峙、相互争斗的政治局面。

刘彧与刘子勋的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刺史、太守都纷纷响应刘子勋。刘彧派人去劝说徐州刺史薛安都归服建康，薛安都不从，反把劝说者留下任为其部下大将。刘彧向青州刺使沈文秀征兵，沈文秀本打算响应，但后来还是被薛安都派人拉拢过去了。刘彧派孔去争取浔阳王长史孔觊，结果两个人却一起投奔了刘子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响应刘彧，又被刘子勋派人杀死。当时，刘彧已是众叛亲离，势单力孤，“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这就是毛泽东在批注中说“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所指的历史事实。

蔡兴宗在宋孝武帝时任吏部尚书。宋废帝继位后，他见废帝凶残暴虐，又规谏无效，曾多次鼓动废帝的亲近大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人起事。在刘彧初登帝位，建康的处境极其艰难的关键时刻，蔡兴宗又积极地为刘彧出谋划策。他说：“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用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

了三个圈。刘彧接受了蔡兴宗的建议，厚抚那些在浔阳为官者留住于建康的家属们，这对于收拢人心，从政治上瓦解敌方起了很大的作用。蔡兴宗又说："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既平后，方当劳圣虑耳。"毛泽东对这段话逐字加了旁圈，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显然，毛泽东对于蔡兴宗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赞赏的，所以他在批注中称蔡兴宗为"谋主"。

刘彧的形势转机是从兖州刺史殷孝祖被说服，并率领两千人马赶来支持建康后开始的。史称当时建康方面"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大安"，刘彧在摆脱困境后，接着就分东西两路出兵进击刘子勋，并宣布凡有亲属在浔阳者，"罪不相及"，"勿以亲戚为虑"，"居职如故"，从而大大安定了人心。

毛泽东在批注中加了旁圈的吴喜、任农夫、沈攸之、王道隆、张兴世等人，都是在对浔阳的作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几位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对这句引言语加了旁圈，以示重视。吴喜在刘彧最困难的时候，请求率三百精兵东讨。有人反对说吴喜是个文人，不会打仗，但结果吴喜却以弱胜强，屡战屡胜。在东征的过程中，老百姓一听说是吴河东来了，"皆望风降散"。于是，吴喜以微弱的兵力连续攻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讨平了三吴，并迫使敌将76人投降。接着他又领兵五千余人运送军需物资，积极支援其他部队，为攻下浔阳立了大功。

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众并赖之"。毛

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写有“沈攸之”三个字。沈攸之奉命协助殷孝祖进攻浔阳，殷孝祖不幸战死，众人都认为他是能够替代殷孝祖而指挥全军的最佳人选。沈攸之却认为前来支援他的江方兴与自己名位相等，能力也不在自己之下，便以“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也”的道理，主动请求让江方兴为统帅，自己全力协助，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对沈攸之这种以全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十分赞赏，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沈攸之还很有计谋，他在赭圻围攻薛常宝的时候，敌将刘胡想援助薛常宝，把粮食藏在船舱里，伪装成翻船，让它顺风流下，但很快被沈攸之识破而截获。刘胡又率一万步兵，连夜凿开路为赭圻送粮，但也被沈攸之击败。最后，薛常宝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城破投降，沈攸之以功升为雍州刺史。

龙骧将军张兴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将领。当刘彧的各路大军进逼浔阳，双方相抗而久不决胜之际，张兴世献策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恃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流回狈，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毛泽东在这段分析的每个句号处都加了双圈，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概圈，并写有“张兴世”三个字。张兴世的这一建议，得到沈攸之、吴喜的赞同。沈攸之认为这个建议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于是“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寻复兴归，如是者累日”。毛泽东对第一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对第二段引文每句末加了双圈。张兴世用进而复

退的假象麻痹了敌人后，突然于一天夜里，乘风举帆，进行奇袭，一举攻取了上流的险要之地钱溪，从而扭转了战局。

刘彧从绝对孤立的形势和弱小的军事力量，依靠一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相，采用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终于讨平刘子勋，夺取了天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关于这次战争的全部记述，对战争的发展变化、双方力量的对比、各主要人物的活动、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等问题，都作了精辟的圈点和批注，并认为这次战争是“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而终获全胜的战争奇例。

《通鉴纪事本末》中《后唐灭梁》一节，记述了五代时期后梁与后唐两个政权相互争斗，直至后唐灭掉后梁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后唐灭梁》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并对书中记述的几次重大战役作了许多批注，加以评论。

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年底，时为晋王、后为后唐庄宗的李存勖出兵进攻后梁都城大梁。在一次战斗中，李存勖的部下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四面蚁集，并占据一座土山的制高点，形势十分严峻。李存勖毫不气馁，重新聚集起溃兵散卒，大举反攻，再次夺回了这座土山。傍晚，梁军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敌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画了一串叉，显然是不同意这种态度。决策会上，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后梁大将）骑兵已入濮阳，山下唯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敌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心决胜料敌，唯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心取胜，纵收亲众北归，河朔非王有

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银枪大将王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毛泽东对这三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表示认同三位将军的意见，并在天头上批注道：“此战必不可少。”李存勖采纳了这三个人的意见，并动情地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于是，李嗣昭、王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死亡者几三万人”。毛泽东对这句引文也逐字加了旁圈，以表示很满意这一战役的结果。

后梁遭到后唐的不断打击之后，大势已去，然犹作垂死挣扎。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屯兵于朝城，后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领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礼贤下士，当即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给康延孝，并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还向他询问有关后梁的军情。康延孝以实相告说：“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宠信赵岩及张汉鼎兄弟，这些人便恃宠弄权，卖官鬻爵，胡作非为，民怨极大；而大将段凝等人又“智勇皆无”，“终必败亡”。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康延孝又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依计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番分析逐字加了旁圈，以示重视。

不久，李存勖也面临内忧外扰的严峻形势：梁将段凝等人分兵数路前来争夺郓州；契丹要在“草枯冰合”之时乘机进犯；而境内又因连年的战乱破坏，军需粮草十分匮乏。因此，

李存勖“深以为忧”，遂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人认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并在天头上批注道：“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了李绍宏等人的妥协退兵之策，很不高兴地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他让诸将散去，独自征求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陛下不洗浴，不解盔，日征夜战十五年，方才登上帝位。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安居乐业。现在刚夺取郓州就守不住，陛下怎能安定中原呢？如果依照李绍宏的意见行事，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可谁为陛下守卫呢？我曾询问过康延孝，详细打听了后梁的实情，“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认为郭崇韬的分析与康延孝的计策基本一致，所以又在天头上批注道：“仍康延孝之意。”

郭崇韬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李存勖的决心。于是，他先以优势兵力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接着他又挥师直取大梁，迫使梁末帝自杀，后梁灭亡。至此，李存勖因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机独断”，终于获得“成功”。毛泽东对这次后唐灭梁的决定性战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他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

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毛泽东对于李存勖个人的事迹，也有多处圈点和批注。明末史学家张溥在《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的篇末史论中评价李存勖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活着时，很担心后梁的威胁，“晋王慰以尊养待时，勿轻沮丧”，还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李存勖登上帝位后，立即挥师直捣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既用”。毛泽东对这些评论逐字加了旁圈，有的还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以示重视。李存勖在进攻大梁之前，“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毛泽东读到这里，深为李存勖这种破釜沉舟的豪情壮气所感染，于是对这段话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道：“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显然，毛泽东是想套用三国时期曹操赞美孙权的名言来褒奖李存勖，可谓画龙点睛之语。

总之，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点，其中不乏精辟之论。（唐华全）

毛泽东评点《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撰写的一部史论名著。毛泽东认真阅读、批注了这部书，他对王夫之的观点，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两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看待历史问题时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毛泽东评点原文】

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

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4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17《梁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43、34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之际著名思想家、学者王夫之就《通鉴》所载史实而撰写的一部史论名著。

王夫之（1619 — 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的别号很多，有买姜翁、一瓠道人等十多个。晚年因长期隐居在故乡的石船山下，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遗老，学者尊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自幼博学多闻，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政治形势，注意研究历史和哲学。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他中壬午科举人，后本打算去北京参加会试，但因农民起义造成道路阻断而未能成行。翌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湖南，他拒绝张献忠的召请，隐居于南岳读书。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清军进攻衡阳，王夫之和管嗣裘组织义军

抗击南下清军。兵败之后，他投奔肇庆（今广东高要）参加桂王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介子。不久，因遭王化澄陷害，几乎被杀，又赴桂林投靠瞿式耜。顺治十七年，清军攻陷桂林，瞿式耜等人牺牲后，南明政权江河日下，国事已不可为，王夫之便决心隐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于是，他改名换姓，乔装打扮，辗转于湖南的郴、永、涟、邵等州，匿身于瑶峒间，自号瑶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身。他的重大著作，大多是在这期间整理完成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原投降清朝而后又发动叛乱的吴三桂逼迫王夫之上“劝进表”，他坚决拒绝，并再度逃往深山，始终以亡明遗臣自命。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著作主要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大行录》、《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解》、《说文广义》、《黄书》、《噩梦》、《思问录》等等，总计80余种，300多卷，均收集在《船山遗书》中。

王夫之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民族发展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为了总结明朝覆亡的原因，以便从中寻找出民族复兴的道路，增强人们进行反清斗争的信心。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他着力撰写了《读通鉴论》这部史论名著。

《读通鉴论》共30卷，比较系统地评述了我国自秦汉至五代的历史，包括秦史1卷，两汉史8卷，三国史1卷，两晋史4卷，南北朝史4卷，隋史1卷，唐史8卷，五代史3卷。每卷根据司马光《通鉴》所列帝王世系分为若干篇，每篇又选择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史事或人物分别加以评论。所论各代史事

和人物，皆根据需要发论而无定数，多则数十条，少则仅数条而已。书末还附有《叙论》4篇，集中陈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发表的评论，集中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倾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王夫之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提出了“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称为“理”，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称为“势”，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它的发展规律就表现在它的趋势之中。他还把这种理势合一的理论，贯穿在他对整个历史过程的一系列具体看法之中。如他评论说，秦始皇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是历史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郡县制之所以能推行于全国，正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符合了“理”的缘故。又如，他还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批驳了所谓“三代盛世”的传统谬论，指出上古时代人类还处于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很艰苦，哪里谈得上什么“盛世”？“世益降，物益备”，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王夫之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武器，对宋明理学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现了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并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王夫之还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理论，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而且，“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在他看来，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制度和法令总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有些东西，在三代时候是合理的，可到今天就不一定合理了；

有些东西，在三代时候是有利的，但在今天却可能是有害的。他坚信，只有“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会兴盛；那些“循三代之制”的复古主义者是“贼民病国”，只会徒乱天下。

再次，王夫之是一位正统的儒者，在满清贵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从封建纲常伦理的名分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他看来，夷狄“以其法制之疏略，居处衣食之粗旷”，“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为特点，是有别于中原人民的“异类”。而且，他还认为“女子之干丈夫也，夷狄之干中夏也，……皆阴之干阳也”，是导致国破家亡的“背理”的大事。因此，他把“中国与夷狄”比喻为“君子与小人”，并说“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别之也”。可见，王夫之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存在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固有的民族偏见。但是，在清初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情况下，王夫之通过史论来抒发其强烈的民族情绪，这在当时又反映了他坚决反抗民族压迫的积极的一面。

对于农民和农民起义问题，王夫之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当然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加以阐述，但由于他亲身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深感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王夫之对农民起义是持不合作态度的，但即使这样，他对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还是进行了深入而客观的探索。他指出统治者的“赋敛无度”，是“迫民于死地”，因而必然引起农民起义。他钦佩汉光武帝在天下大乱之后，不过十年就使天下晏然的治术，而反对申、韩一类的苛察法术。更可贵的是，他还肯定农民起义不怕牺牲

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他们在推翻暴君统治过程中的作用，这在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当中是很少见的。

总之，《读通鉴论》这部史论著作中，既有许多值得肯定的、进步的内容和观点，也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阅读时必须有所辨别。

【试　析】

毛泽东阅读的《读通鉴论》，是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勘本，上面留下了他的批注。从这些批注来看，毛泽东对于王夫之所作的史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看待某一历史问题时的思想交流与碰撞。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15《宋明帝》、卷17《梁武帝》中，通过对史实的评论，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对我国历史上所谓“黄老”、“申韩”、“孔孟”等诸家治术的看法。黄老之学，乃是战国、汉初时期较为盛行的道家学说，它将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并列，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主旨是推崇“清静无为”。孔孟治术，乃是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说，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其政治思想是以“仁治”为主要内容。申韩是指战国后期的思想家申不害和韩非二人，他们都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推崇法治。申不害还特别喜好谈论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

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通鉴》卷133宋明帝泰始七年条记载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但因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年纪太小，于是献文帝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父、“沉雅仁厚”且很有声望的拓跋子推。对此，北魏群臣和宗室皆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而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他们纷纷表示今后要以死拥戴太子，而不知有他。最后，献文帝终于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这样，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退为太上皇。

《通鉴》卷133宋明帝泰始七年条还记载说，宋明帝刘彧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曾把各亲王的已孕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其生母杀掉，然后令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当时已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明帝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妃子同婢人李道儿生的，由他收为养子。因为太子刘昱年纪尚幼，明帝担心自己的兄弟们乘机阴谋篡权，就借故把他们一一诛杀了。《通鉴》卷133宋明帝泰豫元年条又记载说，宋明帝在病重之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王景文毒死了。

对于上述两段《通鉴》所载皇帝传位于子的史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采用对比分析的形式进行了评论。他说：“拓跋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术。其欲逊位于子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

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王夫之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父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死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先予，同时也试出群臣拥戴太子的真心。在王夫之看来，北魏献文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亦即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王夫之还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而其残忍的事例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读了王夫之的这段评论后，即在书中批注道：“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显然，他并不赞同王夫之蔑视申韩法术的观点，所举的反证例子则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然而，按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曹操确实推崇申韩法术，诸葛亮并不完全推崇申韩法术，刘备则不推崇申韩法术，三人并不都属于法家之列。

《通鉴》卷145梁武帝天监元年条记载了梁武帝萧衍篡齐登基前夕的一段有趣的故事。南齐末年，时任大司马的萧衍已有篡齐之意，其好友、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沈约劝进说：“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稍后，范云也陈述了类似的意见。萧衍听后很高兴，并让范云在第二天同沈约一起再来。沈、范二人从大司马府出来

时，沈约嘱咐范云第二天一定要等他，但结果第二天沈约却独自先进了大司马府。萧衍让沈约起草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当即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看后表示完全赞同。沈约出来时，范云竟还在殿门外徘徊傻等，他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沈约已赶在自己前面进去过了，于是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安排为尚书左仆射。范云即会心一笑，说：这才和我所期望的一样。

对于上述这段史实，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人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押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他把沈约、范云这样的"干禄"、"希利"之人鄙视为"俗儒"，对他们的行为非常痛恨。毛泽东赞同王夫之的这段评论，并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他认为"俗儒"不是真儒，而是伪儒；这些俗儒、伪儒当中不但没有一个"贤者"，反而还"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

据《通鉴》记载，梁武帝萧衍还以笃信佛教而闻名。他曾创立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皆源于佛教，并附属于佛教。他还早晚去寺庙拜谒、讲经、吃素，甚至三次舍身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在政治上，梁武帝又纵容宗室权臣胡作非为，以至于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贿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但因善于阿谀，仍被信任重用达35年之久。后来，侯景起兵发动叛乱，就是以清除朱异为借口的。

对于上述《通鉴》所载有关梁武帝的史实，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佛老之于申韩，犹鞞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在此，王夫之提出了佛老之学与申韩之术的关系，即"犹鞞鼓之相应也"。这是因为佛老"虚寂之甚"，佞佛的君王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依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因此，他认为"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了王夫之的这段评论后很受启发，于是进一步批注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提倡黄老还是尊崇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由此可见，申韩的法家治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然而，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这种思想倾向，七十年代便掀起了一场"评法批儒"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给我国社会各界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唐全华）

毛泽东评点《智囊》

《智囊》是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集的一部笔记小说。毛泽东很爱读这部书，在书中作了许多批注，涉及他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毛泽东评点原文】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使人改过自效。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3《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3 年版）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 8《明智部·经务·徐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 13《捷智部·灵变·王羲之》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 14《捷智部·应卒·张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 19

《语智部·辨才·子贡》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伴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赵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智囊》是明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集的一部笔记小说。

冯梦龙（1574 — 1646 年），字犹龙，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他的别名很多，有耳犹、龙子犹、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冯梦龙从小就受到系统而完整的封建传统教育，“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在青壮年时期，他象当时所有读书人一样，忙于研读四书五经，应举赶考。但直到崇祯三年（1630 年），他已经 57 岁时，才考取贡生，61 岁时才被选补为福建寿宁县知县。据《寿宁府志》记载，他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他在 65 岁时，离开官任回到苏州，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清军南下渡江时，他痛心疾首，“悲愤莫喻”，于是投奔了南明唐王政权，积极参加抗击清军的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 年），南明政权相继被清军扑灭，冯梦龙也就在这时忧愤而死，终年 73 岁。

冯梦龙生活在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明代末年，当时，明朝内部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外部又面临清军的极大威胁和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冯梦龙很关心时势政治，参加了由张溥、张采组织领导的政治文学社团——“复社”。他们主张“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标榜读书要“致君泽民”，付之实用，并以评论文章、评论社会的形式，对现实政治展开批判。同时，冯梦龙由于长期生活在市民人数众多、市民文化发达的苏州，其思想深受市民意识的影响，因而具有进

步的文学观。他既反对僵硬死板的“八股文”，也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脱离现实的复古文风，大力提倡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注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强调文学艺术必须贴近广大民众，这在当时封建社会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冯梦龙一生创作、编集和整理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主要著作有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长篇历史演义《新列国志》、《平妖传》、《两汉志传》、《古今列女演义》等；民歌集《挂枝儿》、《山歌》等；笔记小说《智囊》、《古今谈概》、《笑府》、《情史》、《燕居笔记》等；传奇剧本《双雄记》、《万事足》、《精忠旗》、《杀狗记》、《三报恩》等；散曲集《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墨慈词谱》等；其他还有《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寿宁县志》等等。可见，冯梦龙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有人称他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

冯梦龙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挖掘人类智慧，他说：人必须有智慧，犹如土地必须有水一样。土地没有水就会变成一片焦土，而人没有智慧就会变成行尸走肉。智慧在生活中的运用，犹如水在地上流动一样。地势低洼的地方往往注满了水，而人事的逆境中也往往充满了智慧。同时他又认为，人们天性中的智慧就象藏在地下的水那样，常常被禁锢在石土之下而不能流露出来，因此，要挖掘人类智慧，就必须依靠后天的学习，还必须有人把过去人类运用智慧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人们学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梦龙便从先秦至明代的各种经史子集、稗官野史、演义传说之中，搜罗选取了近

2000则关于古人运用聪明智慧排解困难的历史故事，分类编集成为《智囊》一书。

《智囊》共28卷，分为10部28类。即：上智部，包括见大、远猷、通简、逆刃4类；明智部，包括知微、亿中、剖疑、经务4类；察智部，包括得情、诘奸2类；胆智部，包括威克、识断2类；捷智部，包括灵变、应卒、敏悟3类；术智部，包括委蛇、缪数、权奇3类；语智部，包括辨才、善言2类；兵智部，包括不战、制胜、诡道、武案4类；闺智部，包括贤哲、雄略2类；杂智部，包括狡黠、小慧2类。每部开头，都各有一篇总序，集中阐述了作者关于各种不同智慧的认识和评价。在冯梦龙看来，能够弃小取大、卓有远见的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而狡黠和卖弄小聪明，则是最低下的智慧。每类开头，都各有一首简短的引言诗，主要述及分类的标准和编集该类的目的。引言诗之下，则罗列出大致类同的历史故事若干条，这是全书内容的主干部分。每条之末，一般又多附有作者的评语。从全书所收录的故事来看，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其搜罗选取之中。这些故事，集中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事等方面的高度智慧。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妙趣横生，而且寓意深刻，发人深思。但由于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也有一些封建性糟粕，而且全书的主体思想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这部书编成以后，一直很受当时官场和读书人的重视。

【试　析】

毛泽东阅读古代文献典籍，不仅重视“二十四史”之类的正史，也重视笔记小说，他在1947年9月12日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就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代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在40年代送给他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珍藏着，后带至北京。1963年1月，他专门从章士钊那里借了一套线装本《智囊》来阅读，这部书是毛泽东最爱读的笔记小说之一。在这部书上，毛泽东作了许多批注，涉及他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

《智囊》卷3《上智部·通简·朱博》首先记述了汉代冀州刺史朱博以才服人的故事。说朱博出身武官，对文法并不精通。他在任冀州刺史之初，即带领部属外出巡察辖境。当行至一县时，有吏民数百人拦道上诉，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时挤满了官寺。一位从事便建议朱博暂且滞留此县处理这些诉讼，等事毕后再继续巡行。想就此试探一下朱博的行政办事能力。朱博心中明白，遂通知准备车驾，出门去见那些拦道告状之人。面对众吏民，朱博镇定自若，他令从事向众人宣布说：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其所属郡衙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县一级官吏；想告郡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行完毕回到治所后各自再来告；其他小官司，则各自到其直接管辖的部门找从事办理。朱博如此果断简明的处理，证明他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众吏民对此惊佩不已，于是四五百告状之人顷刻散去。后来朱傅经过仔细调查，得知这次拦道上诉事件果然是那个提建议的老从事故意煽动吏民所致，于是怒而杀之。毛泽东读了这条故事后，

即在书中批注道："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显然，毛泽东并不赞同朱博怒杀从事的举动，认为那个从事虽犯有错误，但罪不至死，应该通过教育令其改过自新，然后再委以他任。

接下来，《智囊》又记述了朱博调任左冯翊时的一段故事。说当时长陵大姓中有个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因勾引有夫之妇而被人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因为接受了贿赂，并没有惩治尚方禁，反而调他做了守尉。朱博听说此事后，找了一个借口单独召见尚方禁，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经了解此事的底细，只得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道："情欲之事，人所难免。我愿为你洗去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方禁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于是命令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谈话的内容，今后还必须为自己充当亲信耳目，有情况直接禀报。此后，尚方禁在工作中很卖力，经常破获贼盗等犯罪案件，颇有成效，朱博就提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又单独召见那位功曹，痛斥了他受贿包庇尚方禁的事情，并令其将历次受贿之事一一写下来。功曹惶恐万分，只得如实交代。于是朱博责令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其所写罪状削成碎屑毁掉。此后，这位功曹一直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工作上尽心尽责，办事没出任何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了他。毛泽东读了这条故事后，又在书中批注道："使人改过自效。"肯定了朱博在处理尚方禁和功曹二人的问题上，其作法有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

从上述毛泽东对朱博所作的一是一非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犯错误者的一贯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首先，毛泽东认为只要做工作，犯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关键在于改，而不

是一棍子打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曾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其次，关于处理犯错误者的政策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早已提出："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再次，毛泽东还认为，犯错误虽然是坏事，但对于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说："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朱博怒杀从事的不当，又指出朱博令尚方禁、功曹二人改过自新的正确，这都和他关于犯错误的认识、处理的政策原则是相吻合的。

《智囊》卷8《明智部·经务·徐阶》记述了明代内阁大臣徐阶的一段故事。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当地巡抚屡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兵部职方郎中说：要是等我们发兵去，

倭寇已经撤退，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就勉强派3000名羸弱士兵前往。内阁大臣徐阶不同意，说对于发兵一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能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呢？兵部尚书害怕了，就改发精兵6000人，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带领出征。结果，这支部队在初获胜利之后，旋又遭倭寇伏击而溃败。当政之人把这事归罪于徐阶，徐阶就上疏辩解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当地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务。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长官，当兵的只占全国百姓的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承担呢？如果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当地守令就可以了。"

叙述完这段故事后，冯梦龙又对中国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和评论说：汉代的更戍兵制和唐代的府兵制，都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合二为一，因而较好地解决了战与守的问题；但自从唐代中叶改府兵为扩骑之后，及至宋、明两朝，皆实行兵民分治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互不通气，各行其事，因而打仗时很难集中起各方面的力量，造成"战与守两俱虚也"。最后还指出，徐阶的上疏是从军事体制上深入探讨了明代末世衰落的弊端。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基本上赞同冯梦龙关于明代军事体制的看法，并以古今对照的方式进一步批注认为："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

军民统一于党委。”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他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

《智囊》卷13《捷智部·灵变·王羲之》叙述“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在东晋初年，年幼的王羲之很受大将军王敦的喜爱，王敦常带着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床，接着钱凤进屋来，两个人便屏退左右，秘密商量起谋反之事，但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听到了他们的密谋，立刻意识到若被他们发现，自己必然性命难保。于是他急中生智，吐出一大滩唾沫，抹在自己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王敦和钱凤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心想机密已泄，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于是二人撩开床帐，见王羲之吐唾纵横，就相信他确实一直在熟睡。这样，王羲之才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在书中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批注呢？原来冯梦龙在编集《智囊》时，有些材料是采自稗官野史，上述这条故事就源出于《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已指出：“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查《晋书·王允之传》，也确如刘孝标所说。毛泽东熟读史书，对这条故事中的谬误自然很容易发现，所以才信手作出了上述的批注。由此可见，毛泽东阅读笔记小说这类作品时，常常是以正史相对照，很注意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看待作品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他浓厚的史家兴趣和敏捷的史家见识。

《智囊》卷14《捷智部·应卒·张恺》记述说：张恺是鄞县人，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的身份选为江陵县令。一次，征讨交趾的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向江陵县府征集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急用。张恺就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开一个洞，再安放上铁锅，即成一简易炉灶，这样很快完成了所征派的任务。不久，军中又要征集1000多个马槽，张恺就召集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的四角撑开，即成一简易马槽。而且，等喂过马后，布马槽还可以收卷起来带走，很是方便。这样，以后不管军队行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所以大家都争相效法。后来，周文襄推荐张恺做了工部主事，督运便大得其力。

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发表议论说：张恺只不过是个监生，竟有如此出众的聪明才智，看来在选官用人上是不能仅用资历来衡量的。毛泽东读了这条故事后，也十分赞赏张恺的聪明才智，就在书中批注道："小知识分子有用。"在毛泽东读史的众多批注中，如此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

《智囊》卷19《语智部·辩才·子贡》详细记述了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进行外交活动的一段故事。春秋诸侯争霸时期，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了提高自己的声威，便调集军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故乡，为了保家卫国，他就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退兵。子贡见到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并不利于增强田常的势力，而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之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田常得以乘机独掌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先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出兵

救鲁伐齐，然后再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一番救鲁伐齐之举可名利双收的道理，还说若胜了齐国再趁势攻打晋国，吴国就没有对手了。吴王听后有所心动，但表示要先讨伐完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以后才能行动。子贡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去说服越国派兵跟随吴王一同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正担心越王的报复，想来讨伐越国，而现在越国的力量尚弱，不足以相抗，故为了消除吴王的怀疑，就必须派兵随吴王攻打齐国。同时又指出，如果攻打齐国失败，折损的主要是吴国军队，这自然有利于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其他诸侯一起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国就可乘机出兵攻打吴国本土，必胜无疑。越王听后赞赏不已，欣然接受了子贡的建议。这样，吴国终于调集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赶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要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转而攻打晋国，但结果是吴军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出兵袭击吴国，一举擒杀了吴王夫差。三年之后，越国终于在东方称霸。

冯梦龙在叙述完上述子贡这一系列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外交故事之后，随即发表评论说：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又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柯、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毛泽东晚年对于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这条批注就表明了他当时对儒家的看法和评价。所谓"儒术伪耳"，是指子贡作为孔门高足，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四处游说、挑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宗旨，所以他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

“伪儒”。孟轲被后世尊为“亚圣”，但他也曾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儒家的左派”荀子的学生，曾跑到秦国为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积极地出谋划策；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在项羽手下为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时又与众儒生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儒家的宗旨，其实也是纵横家。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孙膑》首先记述了孙膑赛马的故事。战国时期，孙膑到了齐国，住在齐将田忌家里。田忌经常与齐国公子赛马赌输赢，孙膑看到他们的马足力相差不远，都有上中下三等，于是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用您的下等马去与公子的上等马比赛，用您的上等马去与公子的中等马比赛，用您的中等马去与公子的下等马比赛。”田忌依计而行，结果以二胜一负的比赛成绩赢了齐国公子五千金。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又征引唐太宗所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而击之，无不溃败。”并指出这就是采用了孙膑赛马的战术。

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按语之后，就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即唐太宗，朱元璋即明太祖。这两人都是经过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军事才能，称赞他们善

于用兵、很会打仗。特别是对于唐太宗，毛泽东曾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毛泽东就是结合这些历史人物运用的战略战术，在批注中阐述了他对孙膑赛马战术的见解，这些见解凝聚着他从 1927 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人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在三十年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出动兵力 10 万，第二次 20 万，第三次 30 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战胜了蒋介石 50 万大军的进犯而取得胜利。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硬拼蛮干的方针和逃跑主义，才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至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灵活运用“以强当弱”，“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而取胜的典型战例。由此可见，正因为毛泽东亲身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批注上述孙膑赛马的战术时，其见解就显得十分精辟而深刻。

《智囊》接下来又记述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公元前 354 年，魏国为了扩张地盘，出兵攻打邻近的赵国。赵国在连

吃了几个败仗后，都城邯郸也被魏国军队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便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为了解除魏国灭赵后将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就派田忌率兵救赵，孙膑随行任军师。田忌本想直接赶往赵国去解邯郸之围，孙膑却建议他去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他分析说：魏国为了攻打赵国，其“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敝于魏也。”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果然迫使魏军自解了邯郸之围，并抢先占领了桂陵一带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把回撤的魏军打得大败。

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敝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他对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已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可见，毛泽东确实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所以，解放以后，毛泽东在和平的环境中再次读到围魏救

赵这一著名战例时，仍然要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赵奢》记述说：战国时期，秦国出兵攻打韩国，两军在阏与一带展开对峙，赵国派大将赵奢领军前去救援韩国。赵奢离开赵国都城邯郸才30里，就下令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这样坚壁了28天。这期间，秦国派密探来侦察，被赵军捉住，赵奢却好好地款待了这些密探，然后又将他们放走，这些密探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秦将，秦将大喜，自认为赵奢之所以离开都城才30里就停止不前，那是因为阏与不是赵国的国土，赵国人并不关心，赵奢也不是真想救援韩国。赵奢故意造成这种假象后，立即命令部队急速行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距离阏与只有50里的地方，扎下营垒。及至秦军得知这一消息，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经抢先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因而大败秦军，一举解了阏与之围。

冯梦龙在叙述了这段故事后，随即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说：“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并指出赵奢就是运用了“反间计”，才取得阏与之战的胜利。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评论后，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道：“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显然，毛泽东是从秦军战败的角度来分析阏与之战的。他认为秦军失败的原因，就是只注意了屯兵围攻阏与的韩军，对赵奢所领赵国援军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反而中了赵奢的“反间计”，被假象所麻痹，因而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性。对于反间计，唐朝诗人杜牧

曾解释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阏与之战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阏与之战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孙子兵法》中的反间计是十分重视的。（唐华全）

行伍出身的要读《吕蒙传》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谈到了这篇《吕蒙传》，并说，行伍出身的要读此传。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后，还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干警学习。

【毛泽东评点原文】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4页。

【作品介绍】

吕蒙传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斥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时当职吏以蒙年少轻之，曰："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饲虎而。"他日与蒙会，又尝辱之。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逃邑子郑长家。出因校尉裘雄自首，承间为言，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

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拜别部司马。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合并之。蒙阴赊货为兵作绛衣行縢，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从讨丹

杨，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

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拟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以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益州将裴肃举军来附，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攻宁，宁围急，使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足分，蒙谓瑜、普曰："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又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蹑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还，拜偏将军，领寻阳令。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趋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进，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牵如

此。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桴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以拔，乃退。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蒙还寻阳，未期而庐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禽，权曰："鹙鸟累百，不如一鹞。"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规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备自蜀亲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而飞书召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初，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郴，载南阳郑玄之，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受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鄀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也可。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此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术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孙皎》，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刘备请盟，权乃归普等，割湘水，以零陵还之。以寻阳、阳新为蒙奉邑。

师还，遂征合肥，既撤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捍卫。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疆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护军、虎威将军。

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雋、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始难构，宜相辐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以疆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耶？”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

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资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书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土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艚艟中，使白衣摇櫂，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致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至

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之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

蒙少时不条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蒙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邪?"于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试　析】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美蒋的"飞机大炮"，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当时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一堆烂摊子，是千疮百孔的、每况愈下的旧中国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公然叫嚣：共产党搞革命可以打满分，搞建设永远不及格。

我们知道，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初建时期，往往都要实行休养生息，即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要完成一个从"武"而

“文”的转变。一般说来，这个转变有阻滞、有反复，而且是相当艰难的。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常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谈论《诗》、《书》，高祖很是生气，对他说：“老子靠武力取得天下，读什么《诗》、《书》?”陆贾说：“用武力取得天下，难道也用武力治理天下吗？商汤王、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取得天下，而后用文政治理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啊!”陆贾这些话说明了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应当有“逆取”“顺守”的区别，目的是为了实现由“武”而“文”的转换。东汉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时，那些出身军阵的重臣都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企图效法汉武帝时名将卫青、霍去病，也想在北伐匈奴的战争中建功立业，然而，“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刘秀希望以“文政”维护天下的安定，因其“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意”，有儒学修养，故深知文治武功并用的意义，所以压抑了朝中好战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行伍出身，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冲锋陷阵，其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革命胜利后，其思想一时转变不过来，仍是片面倚重“枪杆子”，深信“战争解决一切”。长期的农村环境，使得我们的官兵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毛泽东早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我们的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对于“干部的准备”，除“依靠老的解放区”以外，“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

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为了掌握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谈到《三国志》里的《吕蒙传》。吕蒙是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本来没有什么文化，后来接受孙权的劝告，努力学习，最终智勇双全，为孙权出谋划策。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策划和主持了袭取荆州的战役，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的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力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以后禀报军情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对他说：你现在兵权在握，应当努力学习文化，以开阔眼界才行啊！他说：如今我军务缠身，恐怕没有时间学习。孙权正色道：我并不要求你成为博士，只要你熟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说得好：“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前朝光武帝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就连我们的对手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努力学习呢？于是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在戎马

倥偬之中笃志不倦，功读不辍。数年后，他胆识俱增，更加忠勇多谋。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后，曾对一介武夫的吕蒙并不重视。及至在如何对待蜀国大将关云长的问题上，吕蒙向鲁肃献了“三策”，使鲁肃刮目相看，笑着说：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识英博”，如今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孙权更是满口称赞：没有人能像我们的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刻苦学习。吕蒙凭借自己的才识，最终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并使蜀汉名将关羽败走麦城。谈到这里，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他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写道，“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我全体人民解放军“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

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学习文化。”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作为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眼光深邃高远，绝非一般的领导所能比拟，这与他饱读史书有直接关系。而且，毛泽东读史书有吸收有鉴别，他的很多思想即来源于此。比如他晚年“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的理想，虽然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用意，他的苦心。

毛泽东在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期，联系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号召我军百分之八、九十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学吕蒙，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及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

（裴赞芬）

《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指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当时，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兴起，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是意味深长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

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

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27－628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

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张鲁传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

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试　析】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中最让他动情的，莫过于《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即本文抄录于前的第一、第二两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此时，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读《张鲁传》，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

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要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谈《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泽东用现代汉语对这一纲领作了具体说明，诸如“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以及“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带有明显肯定的语气。而对于“从某几点看起来”“近乎”于此的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有意与“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其赞许与支持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

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于全党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大跃进”的一些作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划去的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民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的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其实，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党的领导干部推荐《张鲁传》。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

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关于《张鲁传》的两个批语以及在中央全会期间向与会者印发的作法，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毛泽东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也与他数十年参加与领导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有关。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总怀念着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首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大跃进’中，所谓‘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曾被毛所肯定而普及全国。毛不再真正深入地注意研究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

1958年，在当时追求“早过渡”的“狂热”之中，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其实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1958年8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元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直到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在中国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于生产中的竞争与分配中的差距的忧虑。他还说：

“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题为《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时，曾经这样说：“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在《红旗》杂志1958年4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又被陈伯达引用，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理论蓝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毛泽东1958年视察河北徐水时，曾十分称道那里仿照军队组织的连、营、团形式的劳动组织形式，他当场要求陪同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进行推广。当时有一个相当普及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一口号是由刘少奇提出又经毛泽东肯定的。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1958年前后，他还多次指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

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下，没有什么“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级，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军衔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可能与“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有关。他提出，可以通过开展批评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要相信“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他希望，“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显然，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近乎《张鲁传》所谓“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在一元化领导下”上下一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等关系，如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风气，是“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类似《水浒传》农民军中“拼命三郎石秀”的精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是注重理想与道德，提倡无条件奉献，完全不计报酬，如“自带工具、粮食”，“不要计件工资”等，甚至从根本上鄙视货币交换，这种观念，也“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联想到《孟子》书中开篇就首先予以强调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原则。

毛泽东写于1959年7月1日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通过对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的回顾，也透露出作者思想深处“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倾向，直到“文化大革命”，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仍然没有改变。他在1966年发布的所谓“五·七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毛泽东还提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

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此外，“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的主张，其实仍然体现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构想。

应当说，毛泽东正是以这种“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观念作为认识基础，构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框架，并用以指导政治实践，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令几代人都难以忘怀的历史悲剧的。（刘宏）

《郭嘉传》值得一读

《郭嘉传》是《三国志》里有名的一篇，主要讲述了三国时期曹操的谋臣郭嘉多谋善断的故事。毛泽东对《郭嘉传》评价甚高。他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号召各级干部要多谋善断，提出建议：《郭嘉传》值得一读。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值得一读。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36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

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作品介绍】

郭嘉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

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语在《荀攸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召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踏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

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为太子文学，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猎嗣。

【试　析】

本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错误日渐严重，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人们憧憬着并不清晰的共产主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一场忘我的产业化事业之中。他们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希冀着在短时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这种不顾客观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的，其结果便是产生了负效应，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毛泽东已经从实践中察觉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

公社”这三面红旗中的某些问题，思想上有所降温，政策上有所退却，当时毛泽东可能还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上认识“左”倾错误，但直到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思想一直是向纠“左”的方向发展的，尽管效果不很明显。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一位有名的参谋，此人多谋善断，为曹操出过不少计策。不如说，曹操攻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因为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如果攻打吕布，袁绍趁机介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所以袁绍定不会攻打许昌，于是曹操便攻打吕布，很快攻克，再攻打袁绍，又取得胜利。接下来是要不要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真，兄弟俩没过多久就开始打起来，袁谭派人到曹操这里求救，曹操去救，乘机占领了信阳，消灭了袁谭的部队，后又设计消灭袁尚。说到这里毛泽东不无感慨，深感多谋善断的意义。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随后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而后就向他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自然会比较“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自己领导经济工作

的方法有所认识，对自己的失误有所觉察，这自然要想到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陈云在负责经济工作时特别注重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反对冒进；而当时人们被那些高指标、高计划所控制，过分狂热，再加上当时个人崇拜的甚嚣尘上，而毛泽东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于是经济上更加冒进，人们又进一步追求高指标，在农业战线上时时“放卫星”，甚至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工业上钢的产量也是大放“卫星”。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反冒进自然要受到批评，不久，经济工作陷入困境，毛泽东对此不得不深思，不能不想陈云。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彭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袁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为此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到郭嘉，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要当机立

断，要不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要讨论一个问题，决定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方面，最困难的方面估计够。把最坏的可能性想到了，就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没有来到，那很好；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来到了，我们事先有精神准备，那就有办法应付，不至于惊慌失措。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毛泽东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的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郭嘉了。毛泽东对郭嘉的评价何以如何之高呢？

郭嘉是三国时期人，初在袁绍手下做事，他看透袁绍是个“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人，要想辅佐他平定天下，完成霸业，是很难成功的。于是在荀彧的推荐下，投靠了曹操。曹操

同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袁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二州相从，地广兵强，而又非常傲慢无礼。我想率兵前去征讨，怎奈力小不敌，怎么办?"郭嘉分析道："昔日楚汉战争之时，刘邦之不敌项羽，您是知道的。然而，汉高祖唯用智胜，项羽虽强，终于为刘邦所擒，以我个人之见，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兵强，无能为也。袁绍坚持旧的礼法，因而繁礼多仪；您却讲求时效，体任自然，此为道胜一也。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您则顺应形势以统帅天下，此为义胜二也。汉末政治失败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则继续实行宽纵政策，故而不能威慑豪强；您却严行法治，严惩不法豪强，故而上下人等皆知遵守国家的法度，此为治胜三也。袁绍外表似乎宽宏大量，而内心却量小忌贤，用人而有疑忌，所任用者，唯有其亲戚子弟而已；您则是外似严肃而内心机智英明，用人而无疑忌，唯才是举，不问远近，此为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断，失在后事；您则策定即迅速实行，应变无穷，此为谋胜五也。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之高门，依靠其累世之资历，高谈阔论揖让之高调，以收名誉，那些善于哗众取宠，用巧言以装饰外表之士多归之；您则以至诚待人，推诚而行，不务虚名，以俭朴为臣下之表率，有功者赏，那些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忠正之士皆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为您所用，此乃是德胜六也。袁绍好施小恩小惠，而不考虑救国救民的大计，诚所谓妇人之仁；您则考虑治国之大事，恩加于四海，此乃仁胜七也。袁绍因不懂用人之道，其大臣为了政权皆相互攻击，造成惑乱；您却用人得法，浸润不行，此乃明胜八也。袁绍是非不明；您则对于正确者进之以礼，对于不正确的正之以法，此乃文胜九也。袁绍好虚张声势，不懂用兵之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

我军有恃无恐，敌军则畏之，此乃武胜十也。”郭嘉分析袁、曹相争，曹操有十胜之处，真是一语见的，入木三分。于是郭嘉备受赏识，曹操对别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从此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讨，谋策帷幄，力挫群雄，功勋卓著。活捉吕布、官渡之战以及对乌丸用兵，这些都是郭嘉的计策，曹操对郭嘉越发器重，一再称道：“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不幸的是郭嘉在北伐的路上病死了，曹操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柩哭道：“奉孝之死，真是天亡我呀!”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遭到惨败，于是更加思念郭嘉。

应该说“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一种才能，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呢？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裴赞芬）

《黄琼传》、《李固传》可读

《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两篇人物传记，但毛泽东所看重的主要是李固。毛泽东之所以对《后汉书·黄琼传》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后汉书·黄琼传》记录了李固给黄琼的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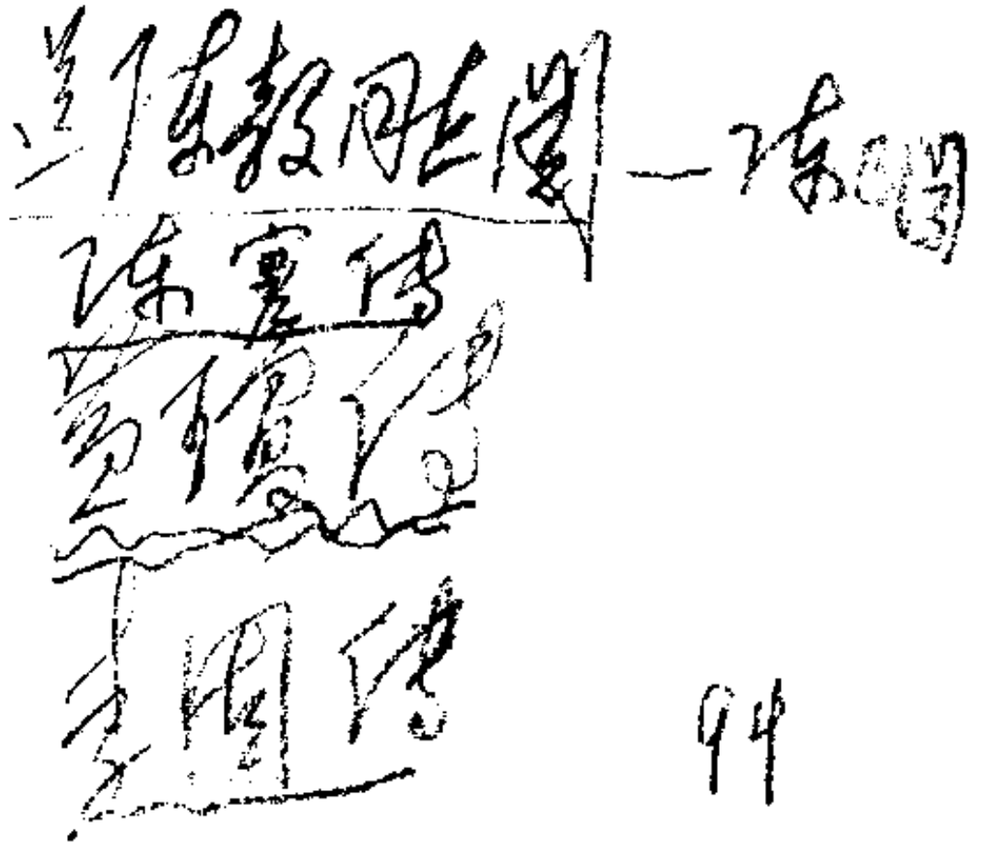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原文】

送刘、周、邓、彭一阅。

送陈毅同志一阅。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00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黄琼传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

逆遗之曰：

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闻？。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

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大盛乎？

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劝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曰：“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

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大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赏赐，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都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

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徒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七年，疾笃，……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珑。

李固传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术传》。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

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夸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戒，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本性廉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

成万安之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有，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

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曰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事，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下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由此言

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罪不能复禁，化导以之寝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得；指撝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

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偿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

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周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周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周事，久乃得拜议郎。

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岁中，梁商请为从事中郎。商以后父辅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异数见，下权日重。周欲令商先正风化，退辟高满，……商不能用。

……迁将作大匠。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陛下拔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宜征还厚等，以副群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光禄大夫周举，才谟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

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盘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利之幼弱。”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瓌，年八岁，是为质帝。

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

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苦烦甚，使促

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因议立嗣，固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

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旦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数十人亦要铁锧，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

【试　析】

《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是毛泽东多次阅读的两篇人物传记。1965 年，毛泽东还特意批示，将这两篇传记“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都认真阅读了这两篇传记。

毛泽东非常欣赏《后汉书·黄琼传》中所记录的李固致黄琼的那一封才气横溢的书信。

黄琼（86－164 年）字世英，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人。黄琼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黄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和神童。《三字经》上所说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就是黄香。黄香少年时便博学多识，精通儒家经典，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当时京师洛阳盛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汉安帝刘祜在位时（107－125 年），黄香曾任魏郡（治今河北临漳）太守等职，官至尚书令。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文。

黄琼与李固早年都以才学闻名，但又都不愿出来做官。汉

顺帝刘保永建年间（126－132年），朝廷征召黄琼进京做官。黄琼行至纶氏（今河南登封），因心中极不情愿，便称病不前。这时，黄琼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书信。

黄琼当时名声很大，也确有才干，李固素来就很敬慕他。为了劝说黄琼出来做官，李固首先在信中谈论孔子对隐居和出仕的态度。周朝攻灭商朝后，商朝孤竹固君的两个儿子伯齐和叔夷逃进首阳山，宁肯饿死也不愿与周朝合作，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柳下惠也是历史上的贤人，但他在担任鲁国掌管刑狱的士师后，虽三次被贬职也不愿隐居而继续任职，可谓“降志辱身”。而孔子对这两种态度则采取了一种折衷的说法，即《论语·微子篇》所说的“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因此，李固针对黄琼的清高，归纳出了圣贤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既不做伯齐和叔夷，也不做柳下惠，而应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可进则进，可退则退。

在做了理论上的归纳后，李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隐居和出仕的态度：如果愿意像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巢父和许由那样，枕山栖谷、不问政事，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想“辅政济民”，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那现在正是时候。针对当时腐败的朝政和黄琼不肯同流合污的心理，李固认为：自从有了国家以来，历来就是“善政少而乱俗多”。因此，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像唐尧、虞舜那样的贤明君主后才出来做官，那有志之士就恐怕一辈子也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

接着，李固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所谓名士的名不符实作了批评：“常闻语曰：‘皎皎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认为当时朝廷征召的名士，如鲁阳樊君、胡元安、薛孟尝等人，尽管品德很高

尚，但事业却无成，以致社会舆论竟认为“处士纯盗虚声”，是欺世盗名。李固写到这里，又乘势用“激将法”激励黄琼：“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黄琼读了李固的信，很受感动，便毅然到了洛阳，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其后，历任议郎、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职，颇有政绩。

李固信中“皦皦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名言，毛泽东过目成诵，反复引用。他在1968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曾联系自己当时的心境，抒发感慨说：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信中的几句话：皦皦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在自知之明。……

1974年，毛泽东又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见毛泽东对李固这封信的评价极高。

毛泽东不光是欣赏李固的文章，而且也看重李固的节操。

李固（94－147年）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李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李颉精通儒学经典，官至博士；父李郃承袭父业，精通五经，擅长占卦，长期在汉中担任州县小官吏。其后，累官至司徒。李固好学上进，博览群书，以天下为己任，好结交英贤。他的学问才识，名动天下，以致“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采来学”，其门下集聚了一批注重气节的门徒。

汉顺帝刘保阳嘉二年（133年），全国发生了多起地震、山崩、火灾等自然灾害，李固受公卿的推荐，赴朝廷对策。李固针对当时皇帝的保母、后妃、外戚、宦官怙势专权的政治弊端，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抨击，并建议汉顺帝降低对保母的酬奖，削去皇后父亲大将军梁商的特权，罢黜宦官，使权归朝廷，政归国家。李固的建议，大多得到了汉顺帝的采纳。保母和宦官因而对李固极为痛恨，便捏造罪名陷害李固。幸亏大司农黄尚向梁商求情，仆射黄琼极力为李固辨诬，李固才得以解脱，被拜为议郎。

不久，李固被任命为广汉雒县（今四川广汉）的县令。李固认为这是变相将自己逐出朝廷，难以容忍，便索性辞官回家，闭门不出。后来，梁商出面向汉顺帝请求，任命李固做了从事中郎。李固见梁商辅政过分软弱，朝廷缺乏纪纲，便向梁商建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整顿纪纲、严肃风化。然而，梁商却不愿采纳李固的建议。

梁商死后，汉顺帝拜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梁冀为人十分残暴。他早年曾担任河南尹，暴戾恣肆，胡作非为。洛阳令吕放是梁商的朋友，因看不惯梁冀的所作所为，便对梁商诉

说了梁冀的种种劣迹。梁商因此而斥责了梁冀。梁冀在挨训之后，立即派人在半道上刺杀了吕放。

梁冀担任大将军之初，李固与他还并无激烈的冲突。汉顺帝对李固也比较信任，将他提拔为大司农。李固积极向汉顺帝推荐人才，使周举、杨伦等德才兼备的士大夫都得到了朝廷的任用。周举等八人作为朝廷特使按察天下，弹劾了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方官，但这些人大多是宦官的亲属，因宦官们向汉顺帝求情，结果汉顺帝却下令放过这些人。李固与廷尉吴雄联名上疏，迫使汉顺帝改变了决定，罢黜了这些为非作歹的地方官。李固接着又与光禄勋刘宣一道请求汉顺帝采取了断然措施，对各州官吏进行了一次大清查，罢免了一批无德无才的官吏，并对其中的贪官污吏进行了严惩。

建康元年（144 年），汉顺帝病死，其独子刘炳即位，是为汉冲帝。但汉冲帝还是一个婴儿，因此由梁太后（梁冀之妹）临朝听政。梁太后以诏书的形式任命李固为太尉，让他与太傅赵峻、大将军梁冀一道参录尚书事，辅佐朝政。梁冀推辞了这个任命，但实际上他已经把持了朝廷的权柄，一手遮天，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汉冲帝只当了一年的皇帝便病死了。梁太后和梁冀于是选立乐安王之子、年仅 8 岁的刘缵为帝，是为汉质帝。李固当时曾建议选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但遭到了梁太后和梁冀的否定。梁冀由此对李固极为愤恨。以前被李固上疏罢免的一百多名官吏看梁冀的眼色行事，捏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联名上章诬告李固，要求将李固杀掉。幸好当时梁太后还信任李固，李固才免于被害。

汉质帝尽管年幼，但却十分聪明。他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

扈，一次散朝后，他望着梁冀的背影说："这是一个跋扈的将军！"梁冀得知后，担心汉质帝长大后报复自己，但派人毒死了汉质帝。梁冀又打算将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刘志立为皇帝。

李固带头，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给梁冀写信，要求"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从汉朝宗室中推选出一位新皇帝，梁冀于是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讨论皇帝人选。李固与胡广、赵戒、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最有德行，关系最亲，应该立为皇帝。梁冀见众口一词，尽管心里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宦官曹腾得知这个情况后，便连夜去见梁冀，劝说梁冀："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梁冀认为曹腾的话很有道理。第二天，梁冀再次召开公卿大会，气势汹汹地宣布了自己要立刘志为帝的决定。胡广、赵戒等人都被梁冀吓住了，转而同意拥立刘志为帝，只有李固和杜乔始终如一，坚持要拥立刘蒜为帝。梁冀并不理睬李固和杜乔的反对意见，厉声宣布："散会！"

李固再次给梁冀写信，还想劝说他回心转意。梁冀大怒，便说服梁太后，先将李固免职，然后将刘志立为皇帝。刘志是为汉桓帝。

一年多后，甘陵人刘文、魏郡人刘鲔因图谋造反，各自都想拥立刘蒜为帝。梁冀于是诬陷李固、杜乔与妖贼勾通，图谋不轨，将李固逮捕下狱。李固的门生王调和河内人赵承等数十人先后向朝廷上书，为李固辩诬。梁太后于是下令赦免李固，将他释放出狱。人们得知这一消息，都感到十分高兴，呼喊"万岁"，京师都轰动了。梁冀大为震惊，便再次逮捕了李固，

并同时逮捕了杜乔，将他们处死，暴尸街头。

李固至死不屈，在临刑之前，他还给胡广、赵戒写了一封信，大义凛然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并对胡广、赵戒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说："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己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胡广、赵戒读信后，都感到悲伤惭愧，长叹流泪。

范晔在《后汉书》卷63的卷末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评论："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蹇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因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不仅全面论述了仁义与生死的关系，而且对李固的所作所为作了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历来强调共产党员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而李固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朝廷的利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畏一手遮天的梁冀，至死不屈的事迹自然也就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唤起了超越时空的历史共鸣。毛泽东之所以要将《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推

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阅读，目的就在于让大家都来学习李固这种“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的节操，以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敢于舍身成仁的优秀精神。（徐立群）

《朱元璋传》用力甚勤，掘发甚广

《朱元璋传》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撰写的一部史学力作。对于这部书，毛泽东不仅作了很高的评价，还对它的修改与再版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这充分体现了领袖对史学家的极大关怀。

【毛泽东评点原文】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

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品介绍】

《朱元璋传》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撰写的一部史学力作。

吴晗（1909－1969年），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后转入中国公学大学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委员，任民盟云南支部刊物《民主周刊》主编。1945年初协助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组织成立民主青年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民盟主要负责人。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1949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托，接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1953年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1954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员，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60年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1961年与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摧残和迫害，于1969年去世。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其冤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吴晗一生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尤以研究明史著称，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海瑞罢官》、《明史简述》、《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等。

吴晗撰写《朱元璋传》，前后经历20年，共写过4次。第一个版本名为《明太祖传》，1944年6月出版。第二个版本改名为《朱元璋传》，1948年8月完稿，翌年4月出版。吴晗自称第一、二个版本“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他“决意重写，改正错误”，从1954年4月开始，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才写成第三次修改稿，并油印成100多份，分送给各方面的朋友以征求意见。吴晗说，第三次

修改稿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于是，他从1964年2月开始，利用病后半年修养的机会，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作了第四次改写，1965年2月，凝聚着吴晗多年心血的《朱元璋传》，终于以崭新的面貌，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从这部书多次改写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吴晗在学术上严谨的学风和敢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的勇气，这是值得每个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朱元璋传》1965年版共分8章，21万多字，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述了朱元璋从一个“流浪青年”到一代“开国皇帝”的复杂经历。书中充分肯定了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伟大历史功绩，即他与其他农民军领袖一起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还肯定了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但统一了全国，发展了生产，使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吏治方面也多有建树。同时也指出，朱元璋推行特务统治，规定八股文制，宣扬神道等措施，则是有害的。全书写出了朱元璋的特点，正确评价了他的功过得失，并认为他在封建皇帝中毕竟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此外，这部书史料丰富翔实，论证细致严密，文字简炼生动，许多年来一直都很受读者欢迎。

【试　析】

吴晗和毛泽东的相识交往，是从1948年开始的。后来，吴晗在改写《朱元璋传》的过程中，便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指导

和帮助。对此，吴晗生前曾十分感激地说："是毛主席教育了我，帮助我克服了超阶级的糊涂观念，才得以在史学的研究和写作中，不断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

1948年11月，吴晗因曾参加争民主、要自由的示威游行活动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迫害，无法在国统区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离开了他执教的清华大学，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石家庄解放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进行紧张的运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百忙中抽空接见了吴晗，并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吴晗把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挤出时间读过这部书稿后，又和吴晗"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但同时也指出了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还"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

彭和尚本名为彭莹玉，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关于彭莹玉的评价，吴晗当时在书稿中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他还赞扬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对此，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他说："像彭莹玉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他建议吴晗对原来的论断再作考

虑。

这次交谈后不久，毛泽东又于同年11月24日给吴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特别感到"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解放后，他重回北京，当再研究这段历史时，果然从《明实录》和其他文献中查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被元军擒获杀害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关于彭莹玉下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在吴晗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他感叹地说："这样看来，彭莹玉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同时，这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后来还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三十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写作。

从1954年开始，吴晗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然后油印出100多份以广泛征求意见，并特地送给毛泽东一份，"请予指正"。毛泽东在这部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的《朱元璋传》油印书稿中，用铅笔画着许多直线、曲线等着

重号，显然，他认真阅读了这部书稿。最后，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了吴晗新的研究成果和对原书所作修改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吴晗认真听取毛泽东以及其他征求来的意见，又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感到对于"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也写了一些文章"。于是到1964年，他利用病休的时间再一次改写了《朱元璋传》，1965年正式出版。新书出版后，吴晗又送给毛泽东一本，以表达他对毛泽东多年来指导和关怀的感激之情。

《朱元璋传》从1944年的初版到1965年的再版，前后经过四次重大修改。它既记录着作者吴晗世界观转变前后的不同研究成果，也倾注着领袖毛泽东对史学家殷殷诱导的一片苦心。（唐华全）

《李自成》写得不错，要让姚雪垠继续写下去

对李自成起义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将姚雪垠这位作家与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成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得以顺利完成的关要条件。

【毛泽东评点原文】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过了，写的不错。……要对姚雪垠予以保护，让他继续写下去。

——摘自杨建业《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作品介绍】

《李自成》是姚雪垠创作的多卷本白话历史小说。姚雪垠，原名姚冠三，1910年出生于河南邓县，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早年时代，他便对文学创作产生浓厚的兴趣，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1938年春，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差半车麦秸》，引起很大反响，并被介绍到国外。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任副部长，专事创作。发表有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李自成》等文学作品，其中《李自成》是其代表作。

《李自成》一书从明崇祯十一年写起，全面反映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向兴盛，再由胜利走向失败着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6年，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发表。已出版的前三卷共8册，230万字。

姚雪垠最早决定创作此书，是在1941年。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一历史现象吸引着他，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立即着手写作。四十年代后期，他开始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抗战胜利后，他又着手研究崇祯极其家族的政治生活，从明武宗研究起，写了不少笔记。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明代的东厂和锦衣卫，发表《明代的锦衣卫》一文。为了写《李自成》，他兢兢业业数十年，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他刻苦勤奋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古籍，查阅了

各种正史、野史、地方志和明清人的文集，搜集研究和考证了明代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历资料和文献，考察了当时的风俗制度、宫廷和民间生活。他下工夫搜集有关史料时，不管有用无用，只要“有关”，就逐条逐句地摘抄成卡片，他摘抄卡片两万余张，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在总纲之下，又分立许多目，有关人物的重要活动，某些重要战役，某些需要澄清的重要历史问题，甚至有关的典章制度、风土民俗，都立有专题。一个题目之下，往往积累有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卡片，不同的观点，有出入的历史记载，都摘录下来，以供排列比较，进行研究。1957年，他开始着手撰写《李自成》。

姚雪垠少年时代的经历，为他创作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提供了生活素材。十四岁时，姚雪垠被土匪抓去作票子。因一个头目喜欢他，把他从票房要出来收为义子，不久这个头目离去，他又被另一个头目收为义子。他在土匪营生活了大约一百天，在此期间，他既是票子，又是贼娃，他的义父和叔叔们对他很好。他跟随他们生活，从心眼儿里喜欢他们讲义气，佩服他们作战勇敢，他相信他们都是好人，是迫不得已才拉杆子的。他来到这个杆子时这个杆子刚成立不久，几个月当中，他看到这个杆子由小到大，迅速发展，也看到了杆子之间的内部矛盾，看到了杆子与地方豪绅之间既对立又勾结的复杂关系，还看到了杆子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这支杆子被一个小军阀的部队和几千名红枪会会员打散，姚雪垠很幸运地逃了出来。他的这段经历，使他对旧社会的农民起义又了很深的感性认识，对《李自成》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上极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和过去的农民起义相比，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自

己的历史特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朱明王朝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北方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都到了尖锐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此历史背景下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在起义过程中，李自成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还提出了“均田”、“免赋”等比较完整的农民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所到之处，三年免征，将富家财物分给穷人，有力地打击了大地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李自成》对这次农民起义的过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展现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鼎盛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写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的生死大搏斗，还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写出了明朝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军、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军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撕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塞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府风光、京城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作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内容的复杂广阔、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

《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其艺术风格上最大的特点是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它的人物的白描手法和各式各样的风俗描

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相国寺的风光、北京的灯市、米脂的送穷、红娘子的结婚、崇祯的抽签、术士的卖卜、巫婆的下神、杆子的结义，无不表现封建中国的独特色彩。

《李自成》的创作手法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走出了一条新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充分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表现生活的手法，同时又适当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巧，还别出心裁地把话剧、电影的表现手法巧妙地运用在小说创作中。在结构和布局上采取大开大阖，虚实相间的办法，往往故事正在进行，突然中断，使读者意想不到下面如何发展。在场面的描写上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晓风残月，时而惊涛急奔，时而流水芳坡。语言笔墨变化更是色彩丰富，除描写、叙述、对话外，诗词歌赋一应俱全。常常通过故事内在的逻辑和使读者对书中人物命运关注的手法，紧紧扣住读者心弦。所有这一切浑然一体，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李自成》热情地歌颂了以李自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明末农民战争，对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腐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李自成》的问世，填补了五四以来白话历史小说的空白，在我国小说史上，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自成》一出版，便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出版的三十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再版的两万多部也在许多地方脱销。《李自成》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试　析】

《李自成》是建国以后第一部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它所描写的农民起义是古代多次农民起义中最著名、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关于这一次农民起义，毛泽东曾有过多次精彩论述，对姚雪垠所作《李自成》，毛泽东大加赞赏。《李自成》的创作，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而其作者姚雪垠，也在十年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得到毛泽东的保护。

毛泽东为何如此欣赏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呢？这要从《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思想说起。在《李自成》这部小说中，通过写李自成起义这一主线，写出了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再现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阶层之间的错综关系，各派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写出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描绘出各种历史画面；写出了农民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联和交织；通过这些描写，既反映出明末农民战争的特殊规律，又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充分表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志气。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姚雪垠既形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面貌，又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刻全面地表现了历史的本质，总结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起到了历史教育的作用。这种创作思路和方法，深受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精辟论述的影响，体现毛泽东所论述的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论述的发挥。

姚雪垠曾经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

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的新的艺术生命。解放前我之所以对写《李自成》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做准备工作，不仅因为没有生活保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驾驭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他对历史资料有了重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

《李自成》的第一卷最初出版于 1963 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为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肯定，姚雪垠拿着样书，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他的妻子来到邮局，给毛泽东寄了一套书，他相信毛泽东肯定会看他的小说。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作到了历史与艺术的完善结合。1966 年 7 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的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的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姚雪垠也未能例外。当“造反派”逼着他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有一天，造反派闯进他的家，他非常害怕那些写《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笔记、卡片被抄去，那么《李自成》的写作就很难继续下去，他大半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结果他的那些东西造反派竟然没

有动，姚雪垠心中一直迷惑不解。直到1977年王任重同志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他才知道了毛泽东下指示要对他进行保护的事情。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姚雪垠的那些图书、资料、卡片才没有被抄走，他这个“极右”分子派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毛泽东的保护，给姚雪垠继续创作提供了条件。

《李自成》的第二卷大部分初稿，写成于1965年以前，一部分是1972年以后补写的，再用一年多时间，又全部进行了反复修改。由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把持文坛，指定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规律，《李自成》的继续写作受到严重干扰，有不能继续之势，1975年10月，姚雪垠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六十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他还告诉毛泽东，“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此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在有关方面的安排

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从1977年开始，《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

在十年动乱中，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表明毛泽东非常赞赏姚雪垠的创作思想和《李自成》的主要内容，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李自成》还未全部出齐，毛泽东却与世长辞了，但他对《李自成》创作的关怀将永传文坛。（魏建震）

《永昌演义》赞美个人品德，贬抑整个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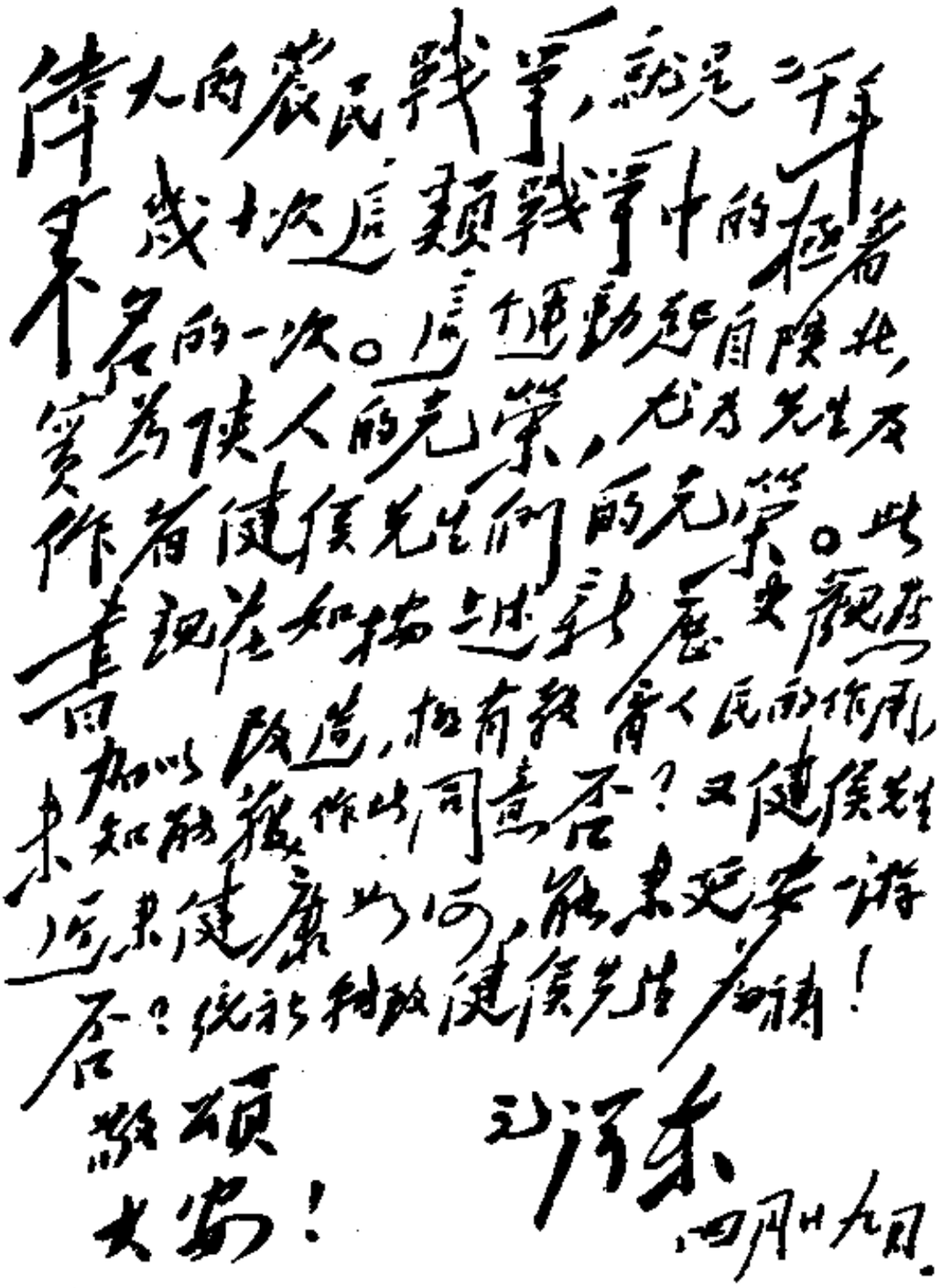
《永昌演义》四十年代在陕西广为流传。1944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该书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并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评点原文】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

张治铭先生左右：

顷读我前辈若干人的信笺，近用鄙人批读一遍，获益良多。兹已饬令部从速办理矣。作此事使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代我向作者致谢之意。此书贯穿自成个人独特的见解即其想像。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积劫沿袭下来的主要的无形政治，大体是自成一种所谓的



毛泽东1944年致李鼎铭的信

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

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为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 1944 年致李鼎铭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0 页）

【作品介绍】

《永昌演义》是一部历史章回小说，它描绘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该书共 40 回，34.8 万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并具有史料价值。

作者李健侯，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同乡，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鲖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父亲死后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米脂在县志局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他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产生了深

深的景仰之情，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10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因而立志为李自成写书，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从正杂史书中寻找线索，参考了60多种古籍，从民间搜集传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务求翔实。1926年，他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

李健侯虽然把李自成当作一个英雄来称颂，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例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生动，故事动人。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宿命论的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贼”来叹息李自成的命运。

解放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后此书几经周折，80年代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积累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李自成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试　析】

1930年，陕西进步士绅李健侯以李自成起义为体裁，写成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歌颂。四十年代，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4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读了这本书，并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鼎铭。

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先生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感谢，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先生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公正地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李鼎铭先生把此封信转到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二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毛泽东之所以欣赏《永昌演义》，主要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有关。此小说以李自成起义为内容，这正是毛泽东非常

感兴趣的。毛泽东通过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通过工农武装割据，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了民主革命胜利。在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他非常注意总结和借鉴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其中尤其是李自成起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更是经常提及。

在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便是他崇拜的一个英雄人物。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时，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要，毛泽东便对大家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毛泽东的话说服了小表弟。1921 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他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 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引用了李自成起义有关资料，他说：“李自成：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据谭震林回忆，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1927 年，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作斗争：“应当认识，历史上黄

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於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1935年10月，毛泽东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毛泽东看到赞美李自成的小说《永昌演义》后，其兴奋的心情不言自明。

毛泽东虽然非常欣赏《永昌演义》，并对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感谢。但是由于作者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李自成起义，此书仍然存在许多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毛泽东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作过深入研究与系统论述，在1939年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体现的抗

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原因和历史作用，有着深刻的分析和评价：“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永昌演义》所缺乏的，正是没有挖掘李自成起义所蕴涵的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它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仅仅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却贬抑了其整个运动，因此，毛泽东对此书的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解放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

虽然李健侯先生未能按毛泽东的意见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工作，但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时，曾带人到米脂县抄《永昌演义》，以帮助其创作。姚雪垠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

版)。1961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姚雪垠给毛泽东寄送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加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的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姚雪垠写完了《李自成》第二卷，为能够尽快出版，1975年10月，他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还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到信后，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着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困难，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说明了他对作者创作思路和主题内容的赞赏，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1944年读完《永昌演义》后所提出的修改思路。(魏建震)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该书在延安出版后，毛泽东立即阅读，读后非常高兴，还特意请作者吃了一顿饭，并建议以后写的再大一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毛泽东自豪地认为该书的出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本国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

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摘自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中国通史简编》是由范文澜主持编写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第一编1941年5月由解放出版社出版，原称《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署名编撰者为中国历史研究会。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字仲沄，是我国当代与郭沫若并称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九届中央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中国通史简编》（写到五代，以后部分未来得及完成，后改名《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只出版了上册）等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界有很大影响。

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下，范文澜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史学工作者，开始集体编撰《中国通史简编》。由于当时同志

们缺少经验，众手所作很难合成一书，范文澜决定自己独立完成此项工作。1941年，第一卷完稿，在延安出版。

《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在这部书中，范文澜系统地运用了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的学说来探索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根据斯大林所论述的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力状况，论证了殷代是奴隶制，西周是封建社会。与过去的旧名书相比，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旧类型史书将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本书论述阶级斗争，着重说明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农民如何起义。对于外来的民族入侵，着重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用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的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规律，说明中国古代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中国历史应该从黄帝开始，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商代是奴隶社会，西周则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并不是没有发展，封建社会又可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以及有关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知识；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以来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对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该书的叙述符合中国实际，对中国通史的写作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其叙事采用夹叙夹议方式，寓论于史，通俗生动，要言不烦，引人入胜。

范文澜有很深的汉学研究的修养，幼年时便开始研读四书五经，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后，深受汉学大师黄季刚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便专门研究汉学。1931年，他出版一本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绪言中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王国维等人关于“史”的解说，论证史书的由来，广泛评述了《春秋》、《史记》以下的史书及其作者。抗战以前，范文澜相继出版了《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抄》，内容都是清代经学家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其中体现了范文澜搜集、鉴别、解释、整理史料的扎实功底。在写作《中国通史简编》时，范文澜将其深厚的汉学功力融入其中，使此书的材料取舍，既避免了墨守陈规，也没有率意而谈穿凿附会以求新奇之处，所用史料，一般是用著作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他以《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为主体，其他作为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强的解说为主体。如《尚书》多采用司马迁和其他汉儒说，《诗》多采毛亨、郑玄说，《三礼》多采郑玄说，《左传》多采杜预说，《墨子》多采孙诒让说，《荀子》多采王先谦说，甲骨文、金文多采王国维、郭沫若说。他的扎实的汉学功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使其《中国历史简编》具有了独特的风格：第一，资料丰富。除了正史所载资料外，金文甲骨、考古材料、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涉及面很广。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第二，训诂依照故传，解说严谨，没有望文生义之处。第三，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优点。将古代汉语化为现代汉语，驱谴自如。

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又属于通史的草创期，其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从1950年起，范文澜从头改写全书，至1954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篇（战国以前），至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范文澜还发表自我检讨文章，指出：对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和个别历史人物，都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歌颂，都是主观主义的。旧版本的《中国通史简编》就存在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陷。例如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都是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但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只讲前一点，对后一点缺少说明，就不合乎历史。有些地方因为“借古说今”，也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范文澜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科学研究的态度，受到后人称赞。

由于《中国通史简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加上资料丰富，内容广泛，解说严谨，文字纯熟生动，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因此它在延安一问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人把它作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读物，它的出版对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汪伪和蒋介石的投降活动，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向成熟阶段。

【试　析】

在毛泽东的故居书房里，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在书中留下了他读过后所作的各种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一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当代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几部通史著作之一。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是时代的要求与党的需要。1940年初，范文澜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同年秋天，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毛泽东亲自去听课。会后范文澜将讲演提纲送给毛泽东审正，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给范文澜回信说："……倘能写出来，必将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毛泽东还说："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一点，深为幸事。"这封信对范文澜鼓励很大。后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这个讲演提纲整理成《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非常注意对中国国情与中国历史的研究。1920年，他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表示要留在国内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再次强调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要性，他说："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毛泽东强调："不但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范文澜到延安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经常就历史研究工作与范文澜交谈探讨。1939 年底与 1940 年初，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和革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重要文章，其中对中国历史的精辟论述，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1940 年，延安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会。一次，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一部中国通史，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范文澜早有此意，听了毛泽东的话，范文澜便主动拟出编写提纲，并就有关体例写法请教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比较好，范文澜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在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下，范文澜领导历史研究会的伊达、谢华、佟佟、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史学家开始集体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毛泽东立即阅读，读完之后非常高兴，大加称赞，还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毛泽东还建议以后写的再大一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并说："《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除了对《中国通史简编》从学术上肯定外，毛泽东还充分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对

它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共产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解放后，毛泽东仍然非常关心尚未完稿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 年 7 月 20 日，毛泽东特意派人到范文澜家中，告诉他："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写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为使范文澜能够写下去，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挡住了林彪、陈伯达等人对范文澜的迫害，但并没有挡住病魔对他的侵袭，他终于没有完成他的巨著，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在病逝之前，范文澜急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从医院里跑了出来，他对一位朋友说："医院里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他谈到毛泽东对他写通史的意见时，流露出了异常的兴奋，表示了急于工作的迫切心情。直到临终之前，范文澜的书桌上还整整齐齐放着那部未完成的通史。（魏建震）

《甲申三百年祭》被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共产党，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因此，毛泽东与党中央把此文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毛泽东评点原文】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



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的作家郭沫若亲切交谈（1964年）

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

近情当以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94年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作品介绍】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先生在四十年代所作一篇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三百周年的史论著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根据周恩来“恢复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是时候了”的要求，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出版发表了一些历史著作，《甲申三百年祭》便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1944年1月15日，重庆进步文化工作者决定筹备纪念甲申三百年，并在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家中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大家各写一篇文章，邀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首发头炮。柳亚子因病谢绝，开头炮的任务便由郭沫若承担。3月10日，《甲申三百年祭》脱稿，经过几天修改，郭沫若把它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审阅。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

《甲申三百年祭》以大量的史实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

盾和民族矛盾：崇祯帝“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又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但官家仍征比搜括，诛求不已，军队到处虐民，使“人人不得守其田园”、“有其家室”、“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崇祯帝虽天天在励精图治，但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在袒护豪家，逼民为贼、为匪。李自成张献忠所隶延安府籍就是一个“饥荒至十分之极”的地方，在蝗、旱灾害下，已民人相食，骨肉流离，而官吏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外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这说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致。文中以生动的笔触记叙了李自成以“剿兵安民”为号召，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使农民起义很快成燎原之势，记述了李自成在李岩的帮助之下，使“农民运动才走上了正轨”，文中深刻总结了李自成起义有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淌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李自成起义军占据北京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错误，就在于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他们不修边

防，不讲政策策略，军纪也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激化。郭沫若写道："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国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秦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王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明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由于起义军的懈怠与内耗，清军铁骑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又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仅39岁。郭沫若说，"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本文是"影射当局"，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甲申三百年祭》在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延安《解放日报》于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的文章，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比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应该与反革命的流氓作斗争，而且要与这些流氓的指使者、民族的叛徒吴三桂、阮大铖、弟也尔们作斗争。郭先生的文章，也正表明了这个不可磨灭的真

理。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歌颂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英雄，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1947年，郭沫若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四十年代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斗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在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宣传历史唯物论被视为非法。郭沫若在《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中写道："关于文化科学之探讨，则禁制纷繁，使学者每每动辄得咎。例以史学言，将来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歪曲历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似此情形，颇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间何世?"《甲申三百年祭》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唯心史观，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一扫以往史籍中对明末农民起义"盗"、"匪"、"寇"之类的污蔑，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唯物史观。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起了开创和指导性的作用。《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新的突破，并正日趋成熟。

郭沫若所总结的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所作《甲申三百年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对现实直接发挥作用的历史论文，发表后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据有人估计，《甲申三百年祭》以读者的众多而论，在我国史学界，也许至今没有出现第二本。从四十年代起，无数史学工作者从中受到过教益，汲取过营养。当然，《甲申三百年祭》作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开创性史论，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对李岩的历史作用，有过分突出之嫌；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够完善，具体的史料分析也时常出现错误。这些只是白璧微瑕，掩盖不了《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路上的开拓之功。1980年，姚雪垠发表《论〈圆圆曲〉》，开始了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批评。后来，他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中，又从史料根据、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政治影响，直至郭老的治史学风等方面，进行了评说，因此引起了许多争论。上海市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论文选中收入王守稼、缪振鹏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客观地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评价。

【试　析】

《甲申三百年祭》这一篇著名的史论性文章，是四十年代新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斗争的产物，它借对明末农

民起义的研究评论，回击了御用文人对革命事业的污蔑，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都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此文章发表后，毛泽东称其大有益于人民，延安整风时列为整风文件。

1944 年，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中国革命势力空前发展、壮大。中共南方局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决定组织一组纪念文章，意在通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革命队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

1944 年前后，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两种命运的搏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我党领导的新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史学领域，尤其是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评价，双方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文人企图通过对明末历史的歪曲宣传，为其“攘外必先安内”寻找历史根据。他们把李自成起义，说成是导致清兵入关的直接原因，借古喻今，比附现实，把日寇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归罪于中国共产党人，掩盖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使国土大片沦陷，从而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罪责。在北京上海等沦陷后，汉奸文人们也打出纪念“甲申”的旗号，贬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奴化宣传。面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汉奸文人对明末农民英雄的污蔑和对明末历史的歪曲宣传，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不应沉默，对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应该清算，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应该总结。思想战线的这场激烈斗争，势不可免。在这种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下，《甲申三百年祭》应运而生，郭沫若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文风，引证大量的史

料，阐明了明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以致亡国，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主要责任，揭示了与人民为敌，倒行逆施的反动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郭沫若还用其如椽之笔，透彻分析了明末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论证了李自成起义是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致。揭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借污蔑李自成以攻击中国共产党人，是有力的回击。

《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革命文人纷纷响应，《新华日报》副刊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更是有意义的事了。”3月20日，在副刊《拆散的百科全书》栏中，还发表了《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一文，对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作了介绍。紧接着，在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群众》上，发表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及《明末的政治风气》、《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文，以为呼应。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史论，刺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痛处，引起国民党集团的恐慌，使其如坐针毡，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连载完毕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对《甲申三百年祭》发起猛烈攻击，

说什么“喜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所代表的思想”，叫嚣“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种流传”，表示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同时此文继续歪曲历史，说什么是李自成起义在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结果造成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一个月后，托派叶青抛出名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的长文，一面吹捧《中央日报》的文章，一面对《甲申三百年祭》和《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其他研究明末历史的文章一一点名进行攻击，说什么这些文章是替共产党反对政府、夺取政权作宣传，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他们一面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围剿，一面使用法西斯的伎俩，宣布此文为禁书，封锁《甲申三百年祭》，禁止它在社会上流传。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1944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在《学习和时局》中，党中央、毛泽东已经开始部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提出了加快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经过七年抗战，党内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对胜利后将遇到的新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施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史论，给我党敲响了警钟，它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总结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至陷于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作者通过对李自成起义功败

垂成教训的总结，阐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描写的在过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以致“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对同样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警示作用。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此文在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意义和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的重大教育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正值延安整风时期。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详细阐述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 1927 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 1930 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 1931 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 1938 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

为戒。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坚信，历史经验有大益于指导现实斗争，历史学家积以学识，其眼光可以更敏锐地发现错误缺点，觉察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六天后，《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出联合通知，指出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要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望乎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对于全党在思想上团结一致，既不失时机地以全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又切切实实地作好对美蒋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起了重要作用。《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传诵一时，洛阳纸贵，这一著作在解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4年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11月21日写的回信，信中说：“大示读悉，……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偿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

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既抒发了深沉的思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甲申三百年祭》所提出的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即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所产生的骄傲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常常以李自成为鉴，告戒自己和同志们。1949 年 3 月 13 日，全国解放在即，在七界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李自成的教训为戒，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这些人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番话，也是以深刻反思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作为认识基础的。

会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开始做进城的准备。有一天，毛泽东问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李银桥满有把握的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见他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戒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3月23日0点，毛泽东诙谐地对随行人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带着这种决心和信念，离开西柏坡，踏上去北京的路。

《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总结的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深深刻印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成为警示中国共产党人言行的座右铭。解放后，毛泽东还常常以此自醒。《甲申三百年祭》对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党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魏建震)

《十批判书》崇儒反法

1973年5月，江青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供批判用的，并顺口念了一首诗，将《十批判书》作为学术上崇儒反法的代表作。

【毛泽东评点原文】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

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不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3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6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作品介绍】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四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最杰出的

著作之一。郭沫若，四川乐山县人，1892年生。中国现代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古文字学家。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中国古代诸子研究的论文集。此书始著于1943年7月，完成于1945年上半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郭沫若作了若干文字订正。

《十批判书》全书共收有十篇论文，其编排顺序依次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面临发生重大转折的大时代的前夕，在这个非常的时代，国民党加强了其法西斯统治，无数的爱国、革命同志遭到迫害。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思想界出现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鼓吹法西斯统治，进行比较历史研究的战国策派，明目张胆地为蒋介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法西斯国家理论制造历史根据，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在此形势下，周恩来充分估计了郭沫若在文化思想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就向当时由郭沫若领导的文委会作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指示，以保存干部，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1941年1月16日，周恩来领导组织了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庆寿活动上，周恩来作了《我要说的话》的发言，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三十年代“革命退潮”时“埋头研究”甲骨金文的“新的努力”，同时明确提

出："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作为进步史学家代表的郭沫若，开始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代进行研究，他仔细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揭示了这个历史大转折时代的特点和规律性：新旧两种势力的决战，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然性，以及同这种新旧交替相联系的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争鸣的百家，是各种社会势力的代言人。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现象，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变革，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历史规律的启示和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现实，使郭沫若在先秦社会与思想研究中萌发了一个重要思想："民本主义"。在《十批判书》中，郭老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作了一番善与恶的判断。符合人民为本位思想的便是善，不合乎这种思想的便是恶。"大体上说来，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此书中，郭老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认为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代表着奴隶制崩溃、奴隶解放的潮流，是"乘着奴隶制的纽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奴隶统治权的革新理论"。孔子袒护乱党，乱党在当时便是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的"与民偕乐"的思想，是为了把奴隶时代的贵族们所专擅的东西，推广开来使人民共同享受，显示了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他同情人民解放，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

在扬儒的同时，郭沫若对先秦法家韩非和秦始皇提出了批判。在四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一批御用文人鼓吹法家思

想，宣扬法家思想中的大一统、权术、专制主义，为他们“一个党”、“一个主义”和法西斯法统制造理论依据。他们歌颂秦始皇，奉承蒋介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了革命文化斗争的需要，为了伸张民主和正义，郭沫若写了《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等论文，对法家进行研究。对于法家，郭老肯定前期法家，否定以韩非为代表的法术家，批判和否定秦始皇。郭老提出，子产、吴起、李悝、商鞅等早期法家，他们的指导思想既非人民本位，也非帝王本位，他们以富国强民为目标，采取国家本位。其思想主张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社会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法术家，在讲法的同时，又强调术，即君主驾御臣民的权变。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帝王本位。郭沫若对韩非的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读《韩非子》一书时心情非常不愉快，其《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秦始皇是韩非的崇拜者，他的政治实践便是韩非思想的现实化。对韩非的否定，必然导致对秦始皇的否定。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措施、知人善用的同时，对秦始皇极端专制、独裁，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秦始皇缄口民主，比他的前辈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他任用李斯那样的变节汉，出卖朋友的专家，姚贾那样的“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赵高那样的腐刑之余，该受死刑的要犯，将天下变成一面刑狱的网。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春秋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因此而遭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郭沫若对秦始皇批判，除了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外，也与其四十年代的古史分期的学术主张有关，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郭沫若

主张汉封建说，认为从春秋以来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先前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们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朝却是奴隶制的大逆转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地化为了奴隶。

《十批判书》所收论文，有其科学的编排体系。排在最前面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并非是作的最早的文章，因为此文是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郭老以此文为基础，再探求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后给他们一个客观评价。《十批判书》所收集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文章，从孔、墨，到儒家八派、稷下、庄子、荀子，再到名辩思潮和前期法家，把春秋战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它使人看到这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怎样勃兴，怎样演进，怎样相互继承，怎样分化，又怎样消失，它们对社会又怎样起着推动或阻滞作用。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将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在此文中，郭沫若修订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肯定了殷商是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在古史分期研究中一个突出困难便是材料问题，仅有的一点材料，时间混沌，真伪难辨。郭沫若早期从事古代史研究之所以产生某些重大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先秦的某些重要文献的考订不够重视。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开头，郭老便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检讨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

有害。”郭沫若的这些论述，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沫若在对彝器、卜辞材料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同时，对有关先秦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订和批判。郭老的这些考订，主要侧重文献的时代性，这比乾嘉学派的考据和辨伪有了很大进步。

除了历史断代和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贡献外，《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对先秦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其贡献主要有：一、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由井田制如何转化为庄园制，也做了较合理的阐述。二、从工商业方面证明了和农业的蜕变有并行的现象，从事工商业者在春秋中叶还都是奴隶，后来才逐渐成为都市的有产者。三、附带着考订《考工记》一书的年代和国别，认定它是春秋间齐国的官书。四、详细地探索了市民阶层的分化，分化的市民奠定了后来封建政权的基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坚实的考据，严密的说理，可贵的创获，以及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赢得了史学界的广泛赞扬。研究墨学的著名学者杜守素看了此文原稿后，写了四首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不少史学家读了此文后，都被他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开始检查旧说，纠正谬误。

《十批判书》既是科学的历史著作，也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在学术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在民主革命史上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不仅曲折反映了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两种命运决战的思想斗争，也体现了郭沫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人民本位主义，为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试　析】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四十年代所作的著作，由于受当时社会背景和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的影响，其判断诸子是非、评判历史人物功过都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便是扬儒批法，崇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批判李斯的法术思想和秦始皇的暴政。《十批判书》中扬儒批法的思想，与建国后毛泽东对儒家与法家的基本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保守的成分，而法家厚今薄古，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潮流。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期，是重礼制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期诸侯国的一批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史学家都免不了要研究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彼此是与非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四十年代民主斗争和郭沫若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基本观点，和当时学术界许多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作者的这种观点会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 1954 年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

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现在仍然有人在怀报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晰蜴之伦的残梦。”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其接受的完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美化，儒家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耳濡目染地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开始读书时，首先读到的便是《论语》等儒家经典，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五四前后，毛泽东写文章时还多次称引孔孟。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受到杨昌济很深的影响，杨昌济是个现代崇儒派，对理学有很深的研究。由于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对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便是清朝的一代大儒。1943 年，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道：“剥削阶段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的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1964 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到中年时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开始对儒家进行冷静客观的认识，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

儒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用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中，是不存在对儒家完全否定思想的。

先秦法家思想，是中国封建制建立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为推翻奴隶主阶级统治，巩固封建政权，建立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法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法家，毛泽东很早便对其理论中的闪光因素有了认识，1912 年，毛泽东写《商鞅徙木立信论》，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在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中，对儒家和法家都有批判的继承。在 1941 年 9 月 10 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通俗地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有正确有路线和方针，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

解放以后，毛泽东开始尊法反儒，1953 年，在批新儒家梁漱溟时，毛泽东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50 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明显。1958 年 5 月 8 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

“破除迷信”的报告时，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批儒扬法的倾向越来越强烈。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可是被人骂了几前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8月30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毛泽东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今薄古，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与郭沫若《十批判书》的观点有着尖锐的对立。毛泽东最早何时读的《十批判书》，现在已不可知，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毛泽

东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指的便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最晚在1954年，毛泽东便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1959年毛泽东外出前，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批判秦始皇观点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代表著作，并鲜明地表示不赞成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毛泽东对《十批判书》的批判更加尖锐。

1973年5月，江青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对郭老的尊孔反法批判严峻。但诗中仍尊称郭沫若为郭老，表明毛泽东批评郭老仅仅限于学术的角度，并无意从政治上对郭沫若进行批判。林立果在搞《五七一工程纪要》时，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

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样，批林便和批孔联系在了一起。7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对外交部简报所作美苏关系、日本政局和日中关系的分析提出批评，他说："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当时在座的工作人员插话说："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日中关系不会很快改变。"毛泽东接着说："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引用这个典故后，毛泽东又说："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革命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从此，毛泽东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批判也开始和批判林彪联系在一起，带上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8月，毛泽东作了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反文王。"毛泽东还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

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毛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的时候，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商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江青还提议我们到毛家湾去找资料。这样以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主席和江青，主席看得很仔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看完《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后，毛泽东作为1974年第一号中央文件批发了此材料。中央就此发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毛泽东虽然尖锐地批评过《十批判书》中的尊孔反法思想，但对郭沫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1973年5月25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其中谈到郭沫若，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

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还引用《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形象地表明了他对郭老尊儒反法思想的批评原则。

虽然毛泽东并没有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思，而只认为郭沫若是学术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但是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评，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和崇拜心理从未减退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此后，当江青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虽然多次称道秦始皇，但他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芦荻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的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魏建震）

《奴隶制时代》中提出的历史分期有道理

《奴隶制时代》出版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收藏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阅读时所作的标记。毛泽东对该书中提出的历史分期很感兴趣，并赞成郭老的古史分期说。

【毛泽东评点原文】

（毛泽东在阅读《奴隶制时代》一书后，明确表示）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

——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3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63页，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作品作绍】

《奴隶制时代》是建国后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奴隶制时代》收集了作者 1950 年至 1952 年间写的 16 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1952 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7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最早出现在十年内战时期。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为了打破文化围剿，郭沫若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御用文人们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1930 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进行精辟的解释，提出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时代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四十年代，郭沫若修正了自己商代是原始社会的说法，在《十批判书》中提出商代是奴隶社会。解放后，郭沫若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1950 年，郭沫若利用郭宝钧提供的安阳殷墟人殉的资料，发表了《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论定这是殷代社会为奴隶社会的宝贵的地下材料，引起关于殷商是否为奴隶社会的争论，拉开了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序幕。通过争论，大体上统

一了殷代为奴隶社会的看法。而学者们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1951 年，郭沫若重新申述了他一直坚持的西周奴隶社会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 年，郭沫若发表《奴隶制时代》一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战国封建说。此文发表后，郭沫若将建国后两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的论文收在一起，编辑出版了《奴隶制时代》这本论文集。《奴隶制时代》所收 16 篇论文，便是郭沫若在建国后研究古史分期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论定殷商是奴隶社会；重申西周也是奴隶社会；研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郭沫若之所以用《奴隶制时代》一文作为其论文集的名称，是因为此文系统阐述了其古史分期的主要论点。在这篇论文中，郭沫若系统阐述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也是奴隶社会，同时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文章用了一半的文字，通过对“一般的生产状况、工商业的解放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的描述，从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并把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 475 年，完整地提出了战国封建说。

五十年代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理论上往往以领袖的观点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新史料的发掘工作也尚未大规模地展开，因此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奴隶制时代》所提出的古史分期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常常遭到后人非议。田居俭的《立一派学说，促百家争鸣》，回答了如何看待《奴隶制时代》问题，着重叙述了自解放以来郭老在分期研讨中所起的作用，“他以具有创建的史学论文，适时地把讨论逐步地引向深入。”“一言以蔽之，立说，争鸣，再立说，螺旋上升，相互促进，推动中国

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逐步深入”，才是《奴隶制时代》的“精髓与价值所在”。

【试　析】

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非常关心。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它出现之日起，毛泽东便一直关注着这个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解放后，毛泽东非常强调用阶级矛盾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提出的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便是以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奴隶制时代》一书出版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收藏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留下了许多毛泽东阅读时所作的标记。

1973年，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修订版出版时写了一篇代序，题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他写道：学术界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时间问题，一直存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议。早先我认为西周也是奴隶社会。但关于奴隶社会的下限，我前后也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早我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在公元770年左右。继后我把这种看法改变了，我设定在秦汉之际，即公元前206年左右。一直到1952年初，我写了《奴隶制时代》那篇文章，才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我所以能作出这第三次改变，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学术研究的结

果。郭沫若运用毛泽东所提出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解决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等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的论述，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研究其社会形态，得出结论：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

在中国古史分期这个学术问题上，毛泽东开始时比较倾向于西周封建说。《奴隶制时代》出版后，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并将战国封建说的提出作为郭沫若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1973 年 5 月 25 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其中谈到郭沫若，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同年 7 月 3 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由于毛泽东对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的表态，是和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表态具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这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以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出现战国封建说一边倒的局面，其他古史分期的观点则经常受到超越学术批评的不公正的批判，影响了学术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正常的学术讨论。（魏建震）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表明作者敢于站起来说话了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撰写的一篇历史理论文章。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

【毛泽东评点原文】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一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这篇文章（指《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一引者注）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引自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版，第5页）

【作品介绍】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撰写的一篇历史理论文章。全文共分4个部分，约4000余字，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历史教学》1958年第6期上面。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史学界、理论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当时的史学工作者几乎都对这篇文章展开了学习和讨论。那么，范文澜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他提出了哪些理论观点呢？这在文章中都有明确的交代，故特将全文移录于下：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须大跃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谁都想跃进，谁都想大大的跃进，干劲是足够的，问题在于如何跃进。

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

持厚古薄今论的人也有他们的想法，以为学术是独立的东西，牵涉到政治就失去独立性，就不成其为学术。讲古，不牵涉政治，所以是学术。讲今，总要牵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学术。这种想法有道理么？我想举事例和厚古薄今论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因为你们厚古，我不免从古说起。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写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记载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说法，《春秋》分三世：所见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的现代史。所闻世相当于孔子祖父的年代，所传闻世相当于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的近代史。

再往上就不写了。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象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伐？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史记》的《今上本纪》固然是早已失传，但在《平准书》、《封禅书》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评，这是不是谈政治呢？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虽然比《春秋》、《史记》差一点，没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那一条不是谈政治的？这三部最著名的史书以外，不论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赞、评、论、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贬而作。野史的写作，多在两朝交替特别是在外族侵入统治中国的时候，当然有强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兴文字狱。如果历史著作与政治无关，清朝统治者何苦杀许多人呢。由于文字狱十分残酷，清朝学者才被迫放弃写历史，把精力转到脱离政治的经学——考据学上去，这完全是在野蛮压力下发生的变态病态，与顾亭林倡导学以致用的经学——考据学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季中国产生资产阶级，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和政治又结合起来。举例来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变法维新为宗旨。这些讲经学、史学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以排满复汉为宗旨。在学报里，讲史学主要是宣传排满，讲经学主要是提倡复汉，这些谈经学史学的学术刊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刊

物。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并无学术应该和政治脱离的说法。

史书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有些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无关，不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产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始表现划时代的大发展，成为服务于人民革命的一个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事实上，他们也是想把反动的政治和学术结合起来的。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说来，结果坏得狠，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记得有一个人在他的一本书里替秦桧说好话，闹得报纸上“舆论哗然”，这不是想替蒋介石辩护反而明明白白告诉人们说蒋介石就是秦桧么。在这一点上，胡适比那些笨伯们狡猾得多。他是反动政客兼反动学者，学术和政治在他身上紧紧结合在一起，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一般是采取政治和学术分开的手法，写出许多琐琐碎碎一字一句所谓点滴功夫的考据文。其中考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的考据文，就当作研究历史，认为考据等于历史，他们既

然把历史说成“垃圾堆”，那末，捡些片言只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称为做史学工作了。胡适这样做，教他的追随者也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何在呢？掉进烦琐主义泥坑里的人，（一）不关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倾向于反动的政治；（二）不关心反动的政治，因而有利于蒋介石的横行无阻。无论是（一）或（二）都对蒋介石有好处，所以，脱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多么巧妙呵！

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开战。还有一种人是不自觉的受影响者。他们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满意蒋介石的反动政治，觉得胡适那套说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学习做一些琐琐碎碎点点滴滴的考据文章。挑选题目，总要离开现实愈远愈好，寂寞的三代于是变成了热闹的市场。因为厚古薄今的习惯已经养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来，不免感到困难。但是，他们是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已经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绩。这种人为数较多，经过自我改造的努力，把旧影响抛掉，是我们史学界的重要力量。

自觉的胡适门徒和不自觉的受影响者两种人情况不同，但他们厚古薄今、逃避现实、脱离政治的学风是一样的。这确实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我们应该反对那种坏学风，从“象牙之塔”跳出来。

上面所说的话，总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脱离政治的想法是错误的。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不扫清从这个错误想法产生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学风，历史学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跃进的可能。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须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必须认清这一点，担当起兴无灭资的责任。不管我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现在少不要紧，只要学就会多起来，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主义阵线这一边，确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这种气势壮，力量也就来了。那些自称为有学术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果敢于在人民面前翘尾巴，拒绝改造，我们应该毫不留情的藐视他们。要知道，凡是装腔作势的人，一定是庸妄浅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点所谓学术，既然装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见。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较短的期间内，消除资产阶级学术在史学上的影响，是完全有把握的。

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认真地下功夫，用成绩来证明厚今的意义远胜于厚古。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否则，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也会窜进今史里面来，例如考证洪秀全有没

有胡子，这就是烦琐主义窜进今史的表现，更危险的而且已经发生一些影响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资产阶级研究学术所常用的诡辩方法，来歪曲今史，牵涉的问题相当大，危害马克思主义学术也相当严重，及早予以防阻是必要的。充实今史研究的力量，并且保持今史研究的健全发展，厚今薄古的学风自然会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今厚了，古也就相对地变薄了。

厚今薄古，在扩大和加强今史的研究以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写出几部质量比较好的通史来，从现代开始通到古代，从经济基础通到全部上层建筑，这样整个历史阵地，基本上都占领下来了。同时逐个占领夜郎国，使那些国王们失去依据，不得不接受改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我们在大力提倡厚今薄古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免得资产阶级学者拿厚古薄今来和我们对立。

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

厚今薄古、兴无灭资是思想战线、学术战线上的问题，这里丝毫不能用其他办法，唯一可用的办法是思想斗争，学术争

论。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必须全力开辟百家争鸣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广泛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边干边学的方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逐步可以得到提高，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也逐步可以得到深入。第二，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种“试验田”，在业务上做出些成绩来。种“试验田”的好处很多：（一）资产阶级学者狂妄自大的借口之一，是说你们只会说不会做。如果我们做出些自己本行的业务来。他们还能拿这个做借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领导工作太忙，没有功夫作业务，这当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科学院任何一个工作者，能够说比郭老还忙么？郭老有十足的理由免种“试验田”，可是他种的是阡陌相连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收。我们种“试验田”来个歉收，一亩收五升一斗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颗粒无收，怎么不让他们有所借口呢！（二）种“试验田”就会知道种田的甘苦所在，这样，就可以同一般工作者同甘共苦，对领导工作的改进有很大的好处。（三）可能有些学术工作者懒情不想跃进，或者想跃进不得其法，领导者起示范作用，可以使懒者变勤，不得法者得法。（四）上级领导者种“试验田”，对下级领导者的错误可以纠正得更准确些，更具体些，更有说服力些。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六万万人都跃进了。农民向四、五、八跃进，工人更是了不起，十五年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要超过和赶上英国，每天看报，使人每天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部门有不跃进的人甚至有些还是领导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试　析】

全国解放后，范文澜继续从事近现代史的研究，写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1958 年他撰写《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也是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学术思潮，进一步从学术观点上论述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1958 年 5 月 8 日，即这篇文章发表 10 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点名赞扬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稍后。他又指示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这篇文章呢？这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厚今薄古，本来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提倡的理论观点。范文澜在文章中讲厚今薄古，着重强调了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是研究古代史，由今及古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1956 年 8 月 24 日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他在谈话中就曾说："历史总是要重视的。""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964

年，他在指导保健护士吴旭君读史时也说："先读现代史，然后读古代史、近代史，再读世界史。"范文澜在文章中还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他曾对资产阶级的"近代文化"和地主阶级的"古老文化"作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他在同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还用形象而明确的语言表述"古为今用"的原则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由此可见，关于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问题，毛泽东与范文澜的认识和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范文澜的文章自然就受到毛泽东的极大重视和肯定。

其次，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范文澜撰写和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全国上下开展"大跃进"运动之际。这篇文章开头就是从"大跃进"谈起的，文中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词，也明显地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今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开始，毛泽东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提纲中也写有这些话。可见，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厚今薄古不仅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毛泽东

认为范文澜的文章对于当时“大跃进”的政治形势也有积极意义，因而值得重视和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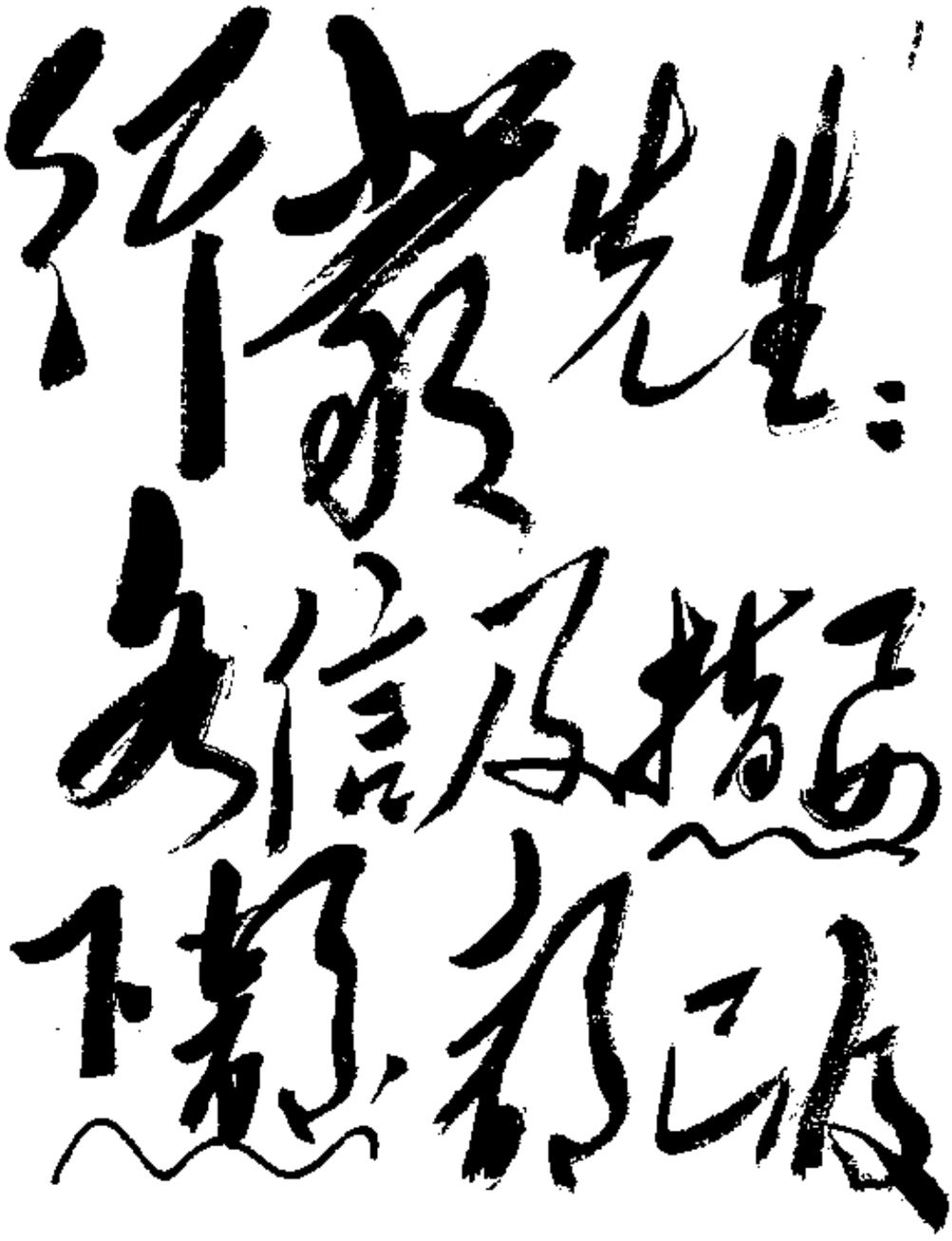
此外，范文澜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孔子、司马迁、司马光等人修史的事例，用以论证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毛泽东熟悉历史，对于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的这些事例，自然是欣然共鸣的。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补充一个秦始皇，并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大概不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说的，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上所作的发挥。1973年8月，毛泽东曾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可见，毛泽东认为秦始皇厚今薄古，确实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的，这与范文澜的文章主旨并不吻合。（唐华全）

《柳文指要》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毛泽东更推崇柳宗元。因此，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也多加关注，为使此书能顺利出版，毛泽东专门致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廖生。但此书的出版仍一波三折，毛泽东对此书的评价则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评点原文】

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



毛泽东1965年致章士钊的信（片断）

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摘自毛泽东1965年致康生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注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1965 年 7 月 18 日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2 页。

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文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 1965 年 8 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 年第 52 期）

【作品介绍】

《柳文指要》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著名学者章士钊撰写的一部研究柳宗元文章的理论著作。1959年9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章士钊在该校汉语考古室主办古代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柳宗元文选”，这次所编之讲义，即为《柳文指要》的底稿。该书于1971年出版。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曾送他一部，作为纪念。

全书近100万字，系统地研究了柳宗元的思想与文章。书中对我国唐代发生的永贞政变作了评析，充分肯定了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的政治主张，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并把柳宗元和韩愈作对比，热诚称颂了柳宗元的“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愈的“以民为仇”的观点，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详细的分析。

【试　析】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毛泽东更推崇柳宗元，这不光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恐怕还与他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有关。当毛泽东知道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读。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

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分！投报相反，尚乞谅解。令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不仅读了《柳文指要》，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读该书的初步印象。

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为这部著作，章士钊同毛主席有过多次切磋。7月18日，毛泽东读了书稿下部之后给章士钊写信，谈及《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信中的“指要下部”、“柳文上部”，均指《柳文指要》一书。“友人”指的是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由于康生从中作难，《柳文指要》几度修改。8月5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信中肯定了该书的优点。12月，康生读完书稿后，给毛泽东写信说：“……85岁的老先生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信中还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接到康生的这封信后，于1966年1月12日给章士钊回信，并把书稿退还。信中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感到《柳文指要》的出

版恐难实现了。1966年5月1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流露出对书的命运的担心，并对自己的《柳文指要》做了检讨。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须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

毛泽东当时支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柳文指要》这类学术问题及作者的党外人士身份，毛泽东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因此，他在章士钊信中自我检讨的文字旁边写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本书是搁下来了。直到1970年，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起《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方能出版。章士钊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给毛泽东并康生，对康生的意见断然拒绝。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那里只有残存的半截手稿，从草稿中可见章士钊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

研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又转给康生研究处理，康生只得同意。终于，1971年9月《柳文指要》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章士钊十分高兴。他自己花钱买上上百册《柳文指要》，叫秘书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他亲笔题字，送给他的朋友们。当然首先是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著，兴趣甚大，阅读精细，评论中肯。从一般文学史研究角度来看。毛泽东认为该书"颇有新义"、"义正词严"，"可谓解柳全书"。对作者的"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加以肯定，对"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觉得"有可取之处"。但毛泽东认为"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作者观点解柳"，因此，该书的大问题就是唯物史观问题。也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评判古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老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士钊立刻转变他的世界观，改变他的方法，只是提醒

他："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既指出书中存在的问题，又十分尊重作者的精神人格，这应该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

《经史百家杂钞》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曾将曾国藩编撰的《经史百家杂钞》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加以比较，认为后者“畸于文”，而不及经史；前者则两者兼备，是学习国学的入门书。毛泽东还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研读此书的方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

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国藩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25页）

【作品介绍】

《经史百家杂钞》由晚清名臣、近代著名文史学家曾国藩编辑而成。

曾国藩对清初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涉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

【试　析】

《经史百家杂钞》的编选者曾国藩（1811—1872），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偏僻山村的地主家庭，兄弟三人，排行老大。父亲曾麟书曾中过秀才，做过乡里塾师。曾国藩6岁入塾，8岁始跟父亲学习五经，22岁中秀才，28岁中进士，初任翰林院检讨，先后做过兵、工、刑、吏部侍郎，官至一品。很得清政府赏识与重用，文韬武略兼有，曾带兵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留有《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治政、治国、治军、治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他曾为稳定晚清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曾国藩的评价，生前身后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曾剃头”、“卖国贼”的恶名。清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是“古今完人”。辛亥革命以后，一些革命党人称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并在“天津教案”中杀人割地，是遗臭万年的汉奸。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他的评价也许更客观，“誉则为圣相，贬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对这位赫赫有名的湖南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以曾国藩为楷模，黄埔军校时，把《曾胡兵书》列为学生必修课之一。

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认为前者比后者更高明。《古文辞类纂》所录只是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而曾国藩则不满足于这个选本，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这部

《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灵。以姚鼐等人为首的清代桐城派，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并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清代只选方苞、刘大櫆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而《经史百家杂钞》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经世济民为依归。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及经世济民之术。毛泽东说“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与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宿如萍）

《共产党宣言》等书讲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较早读到也是印象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之一。这本书不仅使他确立了自己的终生信仰，而且教给他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共产党宣言》伴随了毛泽东光辉战斗的一生。

【毛泽东评点原文】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

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作品介绍】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世界上第一个秘密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党纲，于1848年2月问世。这个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的共产主义纲领的发表，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震动世界的大事件。

《共产党宣言》共分四章，在此篇幅不长的四章书中，马、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次完整、系统和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有的研究者归纳为十条：

第一，阐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第二，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规律；

第三，阐明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

第四，阐明了依靠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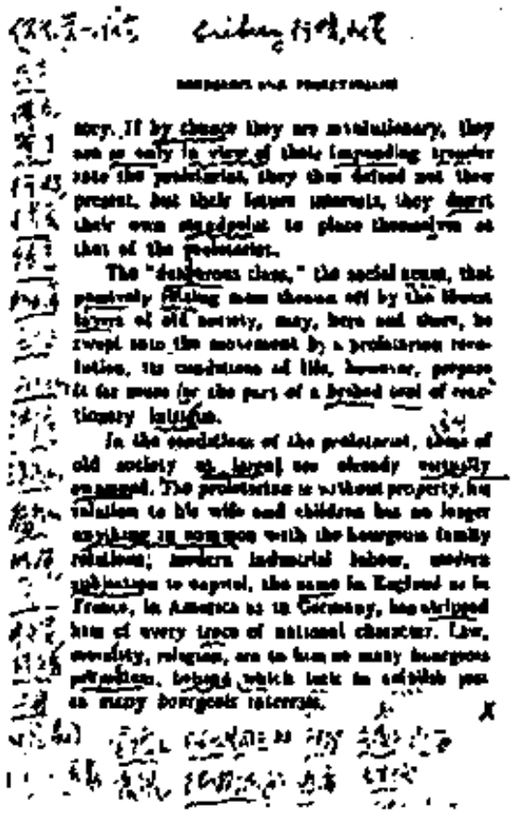
第五，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第六，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必须遵循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第七，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

第八，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思想；

第九，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



1956年毛泽东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的一页

第十，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结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作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利器的《共产党宣言》，经欧洲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且从传播、探索、初步实践到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对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恽代英翻译时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武汉利群书社1921年1月出版。考茨基早年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深受列宁的推崇。例如，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在《社会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如说到考茨基在1891年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作为参考书。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著，初版于1892年。作者著书之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等情况。此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它是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在当年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方面，仍不失为一本启蒙性的读物。毛泽东也就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试　析】

《共产党宣言》，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是毛泽东较早读到也是印象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通过这些书，毛泽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书，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终生信仰，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点，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讲的很明白。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马克思主义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种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

据李锐分析，毛泽东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误差的。这三本书的中文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本书不可能都读过。但这种时间上的误差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

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1920 年 3 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马克思传》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等，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前后规划有 20 种，陆续译成付印”。《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就这样油印出来。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毛泽东第 2 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就是这个油印本的《共产党宣言》。

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毛泽东开始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艰苦历程。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不但使毛泽东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而且掌握了认识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自述道：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关于

农村调查》）可以说，毛主席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他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他深知一个革命者要取得成功必须正确认识世界，而正确认识世界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才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的统治，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要不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也需要作调查研究。

1939年底，毛泽东曾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

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经常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理论营养。50年代末，毛泽东多次阅读《共产党宣言》。

1956的7月16日，他读到该书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感慨地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序言中还说："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毛泽东读到这里，又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掉了，唯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其后，他对《宣言》中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等处，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左"倾严重错误。这一年9月以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特别关注，有很多圈点批画。如：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直线、曲线，段末画圈）

……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圈）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直线、曲线，段末画三个圈，本段右侧画三个圈。）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直线、曲线）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直线、曲线）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用下面的办法：（直线、曲线）

（一）剥夺地产，将地租转充国家支出之用。（直线、曲线）

（二）征收高额累进税。（直线、曲线）

（三）废除继承权。（直线、曲线）

（四）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直线、曲线）

（五）经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直线、曲线）

（六）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直线、曲线）

（七）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直线、曲线）

（八）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直线，段前加三个圈）

（九）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成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

消灭。（直线、曲线，段前加三个圈、段后加一个圈）

（十）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圈）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直线、曲线，段前加三个圈、段后加一个圈）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双圈）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直线、双直线、曲线，段后三个圈，段左双直线）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直线、双直线、曲线）

这些密密麻麻的圈点批画说明，毛泽东面对着当时出现的问题，曾经向《共产党宣言》进行过理论的探索。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上述错误已有觉察并进行了纠正。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建议全党结合实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力图从理论上武装全党的头脑。但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虽然他首先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认识路线，但自己却对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缺乏认真地重视，致使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从而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晚年毛泽东主观上重视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而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与自己的愿望适得其反的原因。（《广读天下书》）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不仅是毛泽东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读物，而且，《共产党宣言》还伴随毛泽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以及他看待世界、看待历史、看待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足以使后人从中得到启示，这即坚定的信仰、正确的方法、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写出《资本论》不是偶然的

《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评点这本书更侧重这部巨著产生的条件，以及在这部书中体现出来的辩证逻辑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评点原文】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

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作品介绍】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全书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因此它也有一个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是马克思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伟大科学理论的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所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关系所依以旋转的核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说明”。因此，一百多年来，尽管资产阶级学者无数次地宣称《资本论》已经“被驳倒了”，已经“过时了”，但是，就连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如美国的卡尔布隆那也不得不承认：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灭亡，你就不能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这部伟大著作就象长青的劲松，在狂风暴雨中昂然屹立，显示出无限的生机。

《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的科学巨著共有三卷，第一卷由马克思自己整理，于1867年9月14日在汉堡出版，第二、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7月初和1894年底出版，实际上这是两位革命导师共同智慧的结晶。诚如马克思在1867年5月和8月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言："没有你，我永远不会完成这部著作。""这样，这一卷算是完成了。只是靠了你，这才成为可能的。"同时，又是两位革命导师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奉献精神的结晶。马克思甚至想移居到生活费比较便宜的日内瓦也没有时间，"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研究，则不得不再搞几年"倒霉的商务"。"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金钱'的著作了！"这就是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送来邮寄手稿所必需的邮费时所说的话。就这样，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先后写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简称《资本论》第一稿，继而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间又写成《资本论》第二稿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单是这第二手稿，就包括23个稿本，总共达1472手稿页。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资本论》的一、二、三卷分别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面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建立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且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上的诸多的一般经济规律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借鉴。这个理论体系可分

为十个部分，即十大理论：

第一，商品价值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价值的本质和价值规律。其理论要点如下：①价值的形成。②价值的内容。③价值的形式。④价值的本质。⑤价值规律。⑥价值的历史性。第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剩余价值的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其理论要点如下：①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②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③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④剩余价值的来源。⑤剩余价值生产的假象。⑥剩余价值规律。第三，资本积累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资本积累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其理论要点如下：①资本积累的必要性。②资本积累的实质。③资本积累的过程。④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⑤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第四，单个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产生资本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其理论要点如下：①资本循环的形态变化。②资本循环的基本条件。③资本周转的方式。④资本周转的时间。⑤资本周转的效益。第五，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心思想是简单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规律。其理论要点如下：①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前提。②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③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的条件。④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⑤扩大再生产的类型。⑥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第六，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产业资本瓜分剩余价值的规律。其理论要点如下：①所耗费资本转化为成本价格。②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③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率。④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⑥个别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⑦市场价值转化为市场价格。第七，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商业资本的作用和工商资本家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

规律。其理论要点为：①商品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②产业利润转化为商业利润。③产业价值转化为商业价格。④商业纯粹流通费用。第八，借贷资本和信用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信用制度的作用和资本家阶级瓜分剩余价值的规律。其理论要点为：①货币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②平均利润转化为利息和企业利润。③借贷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④借贷行为转化为信用制度。⑤信用制度的作用。⑥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第九，地租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作为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形成和大土地所有者瓜分剩余价值的规律。其理论要点为：①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②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③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④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⑤超额利润转化为垄断地租。⑥土地价格。第十，分配理论。中心思想是阐明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其理论要点为：①各种收入及其来源。②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④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

总之，《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础、三条主线、十大理论、科学理论。

一个中心：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全部《资本论》从逻辑结构到理论内容，都是围绕着剩余价值这个中心问题安排和论述的。在第一卷阐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第二卷阐明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在第三卷阐明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问题，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整个《资本论》。

两个基础：全书的理论内容都是以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第一，劳动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全书所有的理论或原理，都是在劳动价值理论

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而使《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强大的说服力。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全书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使革命性和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完成了全书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伟大历史任务。

三条主线：全书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抓住了三条相互联系的主要线索。第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实现和分配的全过程中，始终都以这种对立为基点，并揭露这种对立的形成、性质及其假象。第二，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由这个矛盾决定的。全书坚持在这个基本矛盾的基点上，彻底揭露和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形成、特点和发展，并使这个基本矛盾全面地具体地表现出来。第三，全书自始至终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普遍经济规律，来分析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把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同时，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因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

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资本论》中重要的基本思想。

科学结论：全书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结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社会将要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作出的伟大的、革命的科学结论。

【试　析】

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到陕北。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相对平静的生活，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阅读马列著作，以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今后的革命。这其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谈到了学习《资本论》的问题，说："《资本论》不是很长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坚持学下去，既使象《资本论》这样艰深的著作，也能学懂学好。毛泽东还提倡联系中国经济特点及实际情况（如解放区的边币等）研究和讲授《资本论》。

解放后，为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毛泽东又阅读了《资本论》。1959年10月外出视察时他指名要带的书中就有《资本论》。据帮他管理过17年图书的逄先知说：经毛泽东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

存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但这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就有《资本论》。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有一部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封面上盖着手书草体“毛泽东”三个字的蓝色印章。据张贻玖介绍，毛泽东对这部三大卷巨著的几个序言和跋都读过，画满了着重线和圈。他在“原著者初版序”的写作时间1867年旁，批注：“距今87年”，按这一时间推算，毛泽东这次读《资本论》当在1954年。在序的原文上，又批注：“距1847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27年。”在1873年第二版的序中提到1872年俄文译本时，批注：“距中国这个译本出版的时候（1938）六十五年”。在我国翻译出版这本书的1938年处，批注：“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毛泽东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商品”、“机械与大工业”、“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等章节，用红、黑、蓝三种颜色的铅笔画了不少着重线、曲线、一个圈、两个圈、三角等标记。第六篇的“工资”，第七篇的“资本的积累过程”，也多处画着这些记号。从圈画批注所用笔迹颜色的不同估计，除了上述1954年读过这部书外，可能在延安时就已读过。60年代，毛泽东在读大字本《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时，对马克思肯定的一位评论家的话，以及马克思自己论述《资本论》的写作方法、研究方法之处，都用红铅笔画有着重线。这位评论家的话是：“……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而且宁可反过来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在“法文版的序和跋”、“致读者”、“第三版的序”等处也都有红、黑铅笔画的着重线。马克思那句著名的箴言：“在科学上面是

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便是写在“法文版的序和跋”中，被画着着重线的段落。

毛泽东留下的上述读书批注圈画告诉我们，这部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其重要章节，他是多次读过的。

毛泽东多次谈到过《资本论》，主要分析了这部巨著是如何产生的。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资本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即有象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其次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懂得辩证思维，懂得辩证逻辑。毛泽东对这一点的分析确实抓的很准。《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最简单的元素商品开始，逐步展开，丝丝入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让人感到一股强大的逻辑力量，一种要抓住资本主义本质的力量，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毛泽东的评点，使人们在阅读理解《资本论》时，不光注意马克思分析了什么，还注意到是如何分析的；不光接受他的科学结论，还学习他是如何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得出这些结论，而这一点是更为主要的。

读了《“左派”幼稚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

毛泽东读这本书时，正值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革命事业因此遭受严重破坏，毛泽东本人也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因此，他深有感触地对彭德怀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评点原文】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1933年致彭德怀信（见

《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列宁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摘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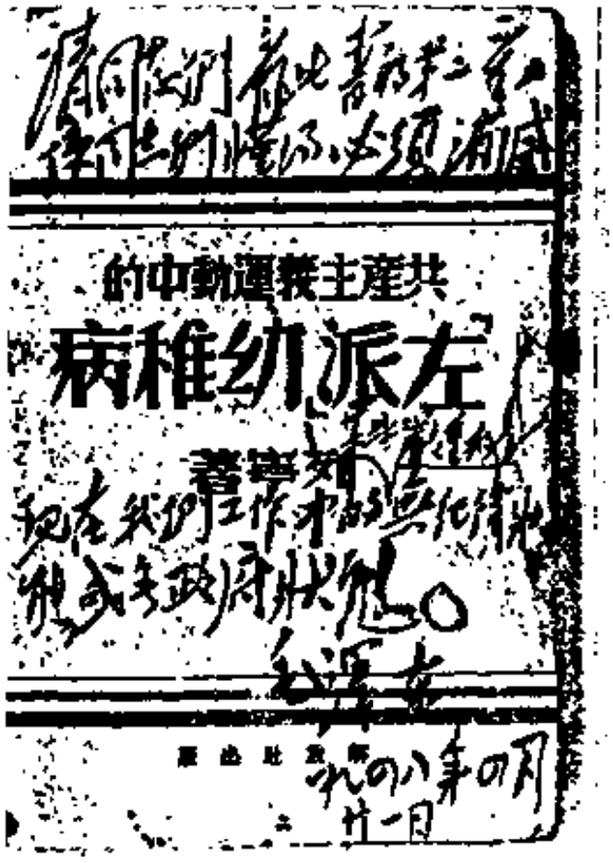
1948年4月21日

——摘自毛泽东1948年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的批语（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第 268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作品介绍】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全文约 9 万字。1920 年 4 月列宁写完该文的主要部分。5 月又根据契切林和卡拉汉帮助搜集到的资料完成了增补部分。6 月在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久，德、英、法、意等国文本也分别在柏林、伦敦、巴黎和米兰出版。在 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推动下，西欧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但是，这些新成立的党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它们都把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但由于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出现盲目照般的现象。其二，它们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因而滋长出一股否认党的纪律、不愿做艰



194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语

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反对共产党人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反对在革命中实行任何妥协的“左”倾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传授给西欧年轻的共产党人，帮助他们克服“左”倾缺点和错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了这本小册子。列宁首先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与此同时，列宁强调，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这些规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本民族的特点，注意民族之间的差别。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真正铁的纪律，这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铁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它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来维持的。无产阶级政党内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好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否认党的纪律，反对集中领导，就是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列宁阐述了共产党的一系列策略问题。关于对待改良主义工会，列宁指出，哪里有群众，共产党人就应到哪儿工作，对群众进行启蒙、教育。把工会中的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把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领袖赶出工会。关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指

出，相当多的劳动群众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支持议会制。因此，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共产党人应当到议会中工作，目的是教育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但同时要重视和利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关于政治妥协，列宁以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为例，指出只要有益于革命运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妥协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共产党人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妥协，应该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结合起来。

【试　析】

毛泽东最早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在1932年，是打漳州时得到的。此后，这本书成了毛泽东时常阅读、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

在中央苏区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连读几遍，用红笔圈画了许多地方，爱不释手。他对贺子珍说：“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格外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工作，毫无办法。”

毛泽东还将此书推荐给党内其他同志。据彭德怀回忆，红军长征后，毛泽东曾寄给他《“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两个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

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1933年，彭德怀任红三军团总指挥。他出身贫困，只读了两年私塾，怀着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参加了党，是红军中英勇善战令敌人望风丧胆的勇将。彭德怀对王明搞的那一套，既不满意，又“提不出什么理由”来批驳反对，他说：“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友谊，毛泽东寄去列宁的这两本书，正是帮助他在思想认识、理论修养上有所提高，为他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武器。

毛泽东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时候，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时候。此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被撤去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调作政府工作。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白区工作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无法存身，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根据地。王明“左”倾路线的特点，在政治上是脱离中国实际，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拒绝与进步的党外人士搞统一战线，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采取“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关门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冒动主义，推动“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还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等冒险的战略战术。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王明的错误路线，对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中央苏区根据地，造成极大的破坏。毛泽东面对着蒋介石聚集50万兵力即

将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回顾党内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他为党的前途命运担忧。但他并没有悲观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同时潜心钻研攻读马列著作。

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多次吃“左”倾路线的亏，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和所批判的“左派”幼稚病，都是从俄国革命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值得我们中国共产党认真学习的。毛泽东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认识到“左”倾与右倾一样能危害革命事业，甚至丧送革命事业，“左”与右同样危险。毛泽东的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成果，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人们永远记取。但后来，毛泽东晚年也犯了“左”倾错误，确实发人深思。

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到陕北的，虽然旧了，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写了一些批语，有 8 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等字样。这说明，到那时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 3 遍了。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给党内同志的信中又提出全党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左”派幼稚病》等四本书，毛泽东推荐这些书，不单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而是着重要求大家通过这本书来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1945 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特别提到全党同志

要读《“左”派幼稚病》一书。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针对“左派”领导人否定集中领导，否定严格纪律的通病，提出必须保证党的集中领导，加强党的纪律，这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早在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列宁的这一论述。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8年6月，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印了这本书的第二章。6月1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宣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加强纪律的主要性，宣言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诚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不能实现这些原则，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就

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各种敌人的反抗，就不能团结中国人民组成统一的国家。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而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些错误的倾向，对于统一斗争，更具有重大危险性，它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坚决地维护自身队伍的铁的纪律是其主要原因，在 1948 年国共大决战的关键时候，毛泽东要求人们加强纪律性，就是要全党、军队振奋精神，昂扬斗志，提高战斗力，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铁的纪律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

《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清楚了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对中南局负责人说，他是先读列宁的作品，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国家与革命》是毛泽东接触最早也是最喜爱的列宁的著作。这本书对毛泽东的革命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评点原文】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

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2 页
注①，三联出版社 1986 年版

【作品介绍】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全文约 7 万字。列宁写于 1917 年 8~9 月间。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这些固有矛盾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于 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促使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连年的大规模战争，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在客观上已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革命的到来必然把革命的根本问题，即

国家政权问题，提上日程。从19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议会道路”以及“和平过渡”，在社统治的工具，也不否认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但是却抹杀暴力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不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通过议会道路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能“自行消亡”。在第二、三、四章，列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概括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前后的革命经验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第二章里，列宁主要论述了1848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进一步说明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夜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11月。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

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列宁引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是马克思总结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后写成的。马克思指出了二月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规律，揭示了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必然性，首次得出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抽象地提到了把国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样一个任务，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当时“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则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变革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无产阶级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态度应该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这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一切革命在国家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所以，列宁对于这个结论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它比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对《共产党宣言》的重大发展。列宁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怎样，无论其演变时间、形式或范围怎样，基本上都和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发展过程一样，都是先完备议会权力，然后完备行政权力，使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强化和巩固。由于

官吏和军事机构“空前膨胀”，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因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第三章里，根据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列宁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的原理，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歪曲。列宁大段地摘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论述。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结论，概括了巴黎公社的主要教训，丰富了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的序言中，把这条重要的结论加了进去。但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了，伯恩斯坦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歪曲为“强调缓慢发展”，不能一下子立刻掌握，因此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考茨基则说：“还是可以掌握国家机器的，只是不主张夺取政权。”针对这些篡改，列宁指出，实际上恰好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

个机器。马克思在提出这个结论之前，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就强调："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也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这封信里，马克思把"现成的国家机器"称为"官僚军事机器"，把"不能简单地掌握"称为"把它打碎"。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要比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论述更明确、更中肯。进而，列宁论述了这条结论的普遍意义。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将"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的结论局限于欧洲大陆，他把英美两国设想为可能的例外。对此，列宁指出，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建立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然而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已经和欧洲大陆各国一样，都有了完备的官僚军事机器，都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压制一切。因而，"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用暴力打碎、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普遍规律。1871年巴黎公社为解决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不仅检验和丰富了他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经验时得出的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用什么样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在论述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两条基本经验时，即用人民的武装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用人民勤务员代替资产阶级官吏。列宁高度地评价了公社为代替被破坏的国家机器而采取的实际步骤，公社的国家

制度和政治形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机器的思想。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国家官吏不过是执行人民的委托的、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工作人员；他们应当服从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他们和工人阶级有同样的权利和共同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权力，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的欲望，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列宁认为，巴黎公社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国家，巴黎公社的民主已由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他强调，民主的转变在取消官吏的特权和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这一点上体现得最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以官吏的特权和薪俸作为区别两个社会、两类国家和两种制度的标志。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议会制的态度，从而论证了打碎旧的官吏机器，建立新的管理机关的必要性。第四章是第三章的继续。巴黎公社以后的20多年里，恩格斯在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他多次谈到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它方面”，包括住宅、权威、国体、政体、民族、民主和宗教等问题。恩格斯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现实问题。这时，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宣扬由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街头暴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背道而驰。在本章里，列宁根据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补充说明，批驳了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无产阶级国家蜕

化变质，从而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在论述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第五章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关系。他指出，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这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上层建筑和国家制度。马克思就是从这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结论，是根据对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而得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才能完成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革命，才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才能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共产主义。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用于维护他们的统治、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则是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剥削者和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形态改变了的民主。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最完全的民主。这同时也将意味着民主的消亡。列宁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进一步发挥，指出了共产主义

社会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联系和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成为公有财产，从而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在这点上可以称作共产主义，但它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在各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们觉悟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否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它“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的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上，对资产阶级权利进行限制、削弱，直至取消。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动全体人民对劳动量和消费量进行严格的统计和监督立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它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调整好，使之能够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只有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高度发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最后一章，即第六章里，列宁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歪曲并庸俗化的行径。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所首先面临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打着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旗号，却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助长无政府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庸俗化的现象。普列汉诺夫在与无政

府主义的论战中，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完全采取了回避态度。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焦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中，坚持了巴黎公社原则，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与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普列汉诺夫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他的这种态度，迎合了无政府主义的需要，从而使自己堕落为“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半庸人。”列宁指出，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因为除了编写过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读物外，还曾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过论战。但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在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考茨基不谈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歪曲，反而鼓吹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至于伯恩施坦篡改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以及185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考茨基也一字不提。因而，“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与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路线站到了一起。列宁说：“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针对考茨基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非有官僚组织不可，应让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等，列宁揭露了其抹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本质区别，从而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制的实质。列宁指出，考茨基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这暴露了他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和对官僚制度的迷信。通过对考茨基与潘涅库克论战的分析，列宁批驳了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歪曲为无政府主义的各种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关于考茨基所宣扬的议会道路，列宁指出，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这一原则的背叛。列宁还肯定了潘涅库克对考茨基的批判，“在这个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原计划的第七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写了一个头，列宁因忙于领导十月革命而未完成。列宁在第一版跋中写道：“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在《国家与革命》里，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并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他批判了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他写道：“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

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他还提出，马克思从来都是根据事物的实际发展，而不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并根据群众运动的经验及时地进行检验、补充和修改，从而提出新的论断。正是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列宁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根据俄国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摘自高狄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

【试　析】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首要的原因是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另外，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1958 年 4 月 6 号，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插话说：“他（指列宁——引者注）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1965 年 4 月 21 号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南局负责人谈话时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毛泽东接触最早也最喜欢的列宁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最早提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1926 年 5 月至 9 月间，毛泽东任广州农讲所所长，当年 6 月他在对

学员讲述“国家”问题时，对《国家与革命》一书有过一段评述。他说：“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列宁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的条件。因此，毛泽东说：“把国家说的很清楚。”这里的“清楚”，不单指把国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讲的很清楚，还在于讲清楚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道理。这一点，对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不久，毛泽东即把列宁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付诸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领导了1927年的秋收暴动，后来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他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指导革命实践，并多次将它列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读书。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地总结革命经验，又认真地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重新阅读《国家与革命》和列宁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的。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在毛泽东的故居书房里有一本1946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用粗糙马兰纸印刷的《国家与革命》。这本40多年前的书，封面已经破损，“1946年”的出版日期已经残缺不全了。但毛泽东当年用粗重铅笔书写的“毛泽东”三个字的签名还清晰可见。封面里页，毛泽东亲笔写着“1946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延安起读”，书中留有毛泽东用毛笔圈画的记号。解放后，毛泽东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因为纸张差，字迹小，有时出差的旅途中，他只能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地认真阅读。据武思萦介绍，在一次外出的列车上，他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又捧起了这本他一直带在身边的著作，全神贯注地读起来。因为本子旧，纸张粗糙发黄，字又小，在

列车飞速行驶颠簸震荡的情况下，就是一般人看起来也很费眼力。可他全然不顾，仍然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一页一页地往下看。列车上的服务员见到这种情形，非常心疼，就对他说："毛主席，这样看书损坏眼睛的。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您也该休息了。"毛泽东非常和蔼而又十分诚恳地对服务员说："这没关系，我不累，为了革命和工作，应该抓紧时间多读点书。"

在认真研读《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充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1.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2.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镇压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建设社会主义。

3. 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8年，毛泽东重读了另一版本的《国家与革命》，对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如消亡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地画着几种符号标志，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

同年，毛泽东多次谈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指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当时依然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

体所有制。11月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这些论述，和阅读《国家与革命》不无关系。

在读1964年出版的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时，毛泽东更多地注意了书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在这些章节旁边，他都涂满了着重线。这说明，这些都是他当时非常关心的问题。

《国家与革命》一书对毛泽东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每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捧起这本书，从中发掘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益的论述。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告诉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1933年，毛泽东将此书寄给彭德怀，并在信上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此书为证，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评点原文】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

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7页）

【作品介绍】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全文约8.4万字。列宁于1905年6~7月在瑞士日内瓦写成，7月底在日内瓦出版。出版时列宁写了序言。1905年1月彼得堡工人罢工，遭到沙皇残酷镇压，史称“流血的星期日”。此后，俄国革命迅猛发展，不断高涨的革命要求党制定统一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但是，党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发生激烈斗争，党内危机越来越深。1905年4月，列宁在日内瓦组织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

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孟什维克也在日内瓦举行了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制定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即俄国革命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重演，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千万不能采取革命行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而只能用和平方式来改良制度，并让资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不要也不能立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大肆吹捧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是“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孟什维克也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支持下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进行攻击。在此关键时刻，为彻底批判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策略，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指引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列宁写作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

全书分序言、正文13章和书后3章。在序言中，列宁说明了当时俄国革命形势，指出为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必须把重心放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方面，并说明写作此书的目的。在第一、二章中，列宁引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着重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阐明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中的意义，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和参加这个政府的意义。列宁指出，临时革命政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则上是允许的。在有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要“从上面”行

动，而同时“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仍然是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做的。以后各章，列宁对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决议逐段引证批判，分析了两种策略的原则区别，揭露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实质，作出四方面论证：

(1) 俄国革命特点和领导权问题。列宁指出，1905 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其它农奴制残余，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20 世纪的俄国，无产阶级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已先于资产阶级建立了政党，并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无产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够。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的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是成为资本主义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2)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农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它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权益，“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因此，农民自然而然地和

必不可免地寻找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农民，打击和孤立想拿革命同沙皇做交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俄国革命才会有真正最广大的规模，也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还批驳了孟什维克的策略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

(3) 关于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列宁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是党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工农民主专政是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革命的胜利，革命专政的产生，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孟什维克的策略是说教，是背叛革命。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指出，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同时又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列宁反复批判了孟什维克尾巴主义立场。

(4)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两步，是“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俄国的民主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都使

无产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对无产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忽视或轻视民主革命的任务，就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要忘记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必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在书后三章，列宁进一步揭露了新火星派同解放派的关系，揭露了新火星派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并根据马克思关于专政的论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的理论依据。

列宁的这部著作第一次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动力、道路和前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策略基础。依据这些原理，以及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于1915年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摘自高狄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

【试　析】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简称《两个策略》）是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书之一。这本书是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的收获。据当时陪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

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1930年，我到白区工作。1932年，当红军打下了福建闽南漳州地区后，我奉命从厦门来到漳州。我们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住处下面约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所漳州龙溪中学。那时，学校已停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回家了。一天，主席对我说："走，我们到那所中学看看去。"这所学校是漳州有名的中学，校舍很宽敞，尤其有一很大的图书室，占了两个房间。毛主席到了图书室，喜形于色，一本一本地翻阅。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对我说："曾志，帮个忙，去找几个箩筐来，我要找些书籍带回江西去。"我和勤务员找来了三四个箩筐，毛主席一边挑选，我们一边把挑选出来的书往箩筐里放。毛主席在学校图书室整整翻阅了一个上午，找人挑了两箩筐的书借回住处。毛主席后来还去过龙溪中学两趟，回江西时，带回了许多图书。

这批书涉及到政治、军事、科学等方面，其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对这些书，如获至宝，认真研读。

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

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就《两个策略》来讲来说，毛泽东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据武思蒙分析，同孟什维克一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陈独秀也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里，都强调国民革命的领导是国民党，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农民是中立的，不参与阶级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也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这一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因为，在中国“产业幼稚”，“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自愿放弃了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察觉到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将会对党的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为引起全党对右倾思想的警觉，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细致的分析，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然而由于当

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已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并没有引起全党的足够重视。

以列宁的思想为指导，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他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与欧美资产阶级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对中国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首先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根本变化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迅速成为觉悟了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②

在反复研读《两个策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明确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3页。

证关系。

他非常赞同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指出："有些人不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还指出，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做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这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主要粮食是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富农经济消灭。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人家搞社会主义而且已经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粮食已不由富农出了，集体农场发展了，才提出消灭富农。而我们的同志是太急了。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党——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的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在《两个策略》一文中，列宁还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他指出，农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它能够成为

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① 因此，农民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找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依靠农民。

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农民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为重要。能否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

早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对中国的农民作了具体的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他认真研究了《两个策略》一文，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数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过程中。农民中又可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列宁对农民的分析相比，毛泽东的分析更加具体、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81—82页。

指导下，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地处理了与农民的关系，发挥了他们的革命作用，使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武装斗争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因而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加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我党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明确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擦干了血迹，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等一系列战斗，标志着我党已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吸取了列宁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提出了许多更为精辟的论述。列宁认为，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手段。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可以澄清混乱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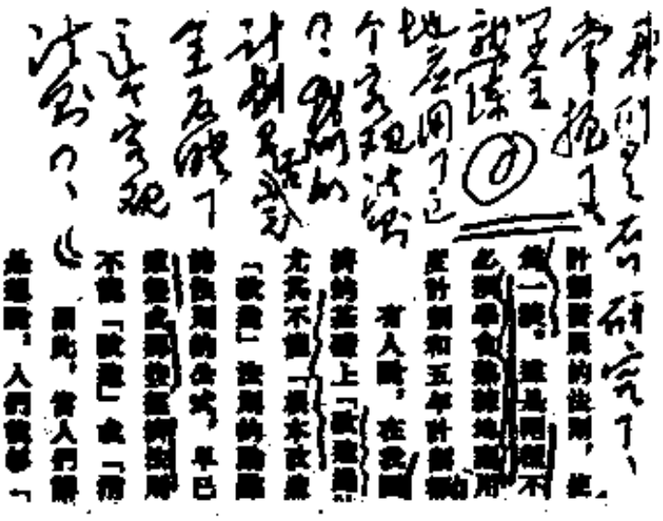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在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1958年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要求学习这本书，以此来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评点原文】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

呢？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1958年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张贻玖著《广读天下书》第138－13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写于1952年2—9月。全文约4.5万字。从本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科学院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重视这一工作，认为这对于苏联青年和各国共产党人都很需要。1951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尚未定稿编写，在斯大林的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为评定该稿，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会上大家对该稿进行了全面分析，发表了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暴露了在苏联部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问题，斯大林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等三封信。这四篇文献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上，同年10月3日、4日苏联《真理报》加以转载。后以《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目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斯大林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首次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从以下方面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批评了苏联经济学家雅罗申柯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在继承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三方面。（二）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针对有人否认经济规律客观性的看法，斯大林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经济规律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规律和法律、经济计划是不同的，人们不能制定、创造、废除和改造它；但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认识、掌握和运用规律为社会实践服务。他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一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二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去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由此可见，认识规律的客观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关于商品生产问题。他对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争论进行总结，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陈旧观念。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私有制，但社会主义公有制仍存在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间为了调拨和使用对方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这一点斯大林认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他批判了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主

张，强调发展国营商业和集体农庄商业的重要性。同时，还阐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以往的商品生产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广大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商品生产，其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耗品，其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所有这些都和资本家参与和组织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截然不同。斯大林关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论述，在理论上存在一些不确之处，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但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四）关于价值规律。他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并指出，苏联的许多商品价格违背价值规律，因而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提出这一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认为，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领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只起影响作用。他还把有计划发展经济规律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前一规律是对后者的限制。这些观点的阐述，不仅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在实践上曾给苏联带来不良后果。通过总结苏联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训，斯大林认识到了重视价值规律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尊重和认识价值规律，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特别强调价值规律在搞好经济核算方面的作用，提出“价值规律是学习经济管理的大学校”的论断，认为它可以促使经济干部的成长，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认为，每一个社会形态中有许多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基本经济规律。作为基本经济规律

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即它能体现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因果联系，并起着决定社会生产的本质的作用；它在内容上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此理论基础上，他第一次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下了定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定义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生产的目的，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文中斯大林首次阐述的另一思想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特有的规律，他认为，这一规律是产生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它使社会主义的计划机关有可能正确计划社会生产，并将为社会主义提供高额盈利。在阐述这一规律如何发挥作用时，他认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基础和依据，这样才能体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和任务。但他不承认价值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存在影响。他强调要把有计划发展社会生产的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和掌握这一规律，正确运用到实践中去，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一思想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和人们仍都具有指导意义。（七）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斯大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有关思想，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首次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贡献。他认为，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产都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它们相互联系，其中生产力反映社会生产中人与自然

的关系，生产关系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规律划分为三类：即某一社会特有的、几个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和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这是他的又一理论贡献。他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能被创造与废除，但能运用它来为社会谋利，这一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被认识并发挥作用，推翻了封建专制。同样，苏维埃只有运用这一规律才能消灭剥削制度，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一规律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它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反作用，即由于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同，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推动者或阻碍者的不同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相适应，因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说明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没有矛盾。绝对适合的提法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八）关于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城乡对立、工农对立、脑体对立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体现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各国的发展史表明，这三大差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消灭了这些差别存在的经济基础，但几千年形成的三大差别，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它们之间仍存在本质差别。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之间的本质差别，至于非本质差别则是不可能消灭的，它将保留在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关于“本质差别与非本质差别”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过程中，三大差别的发展演变趋势。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进一步探讨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问

题。他认为，要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是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产品极大丰富，其中生产资料的增长又要占优先地位；第二是必须逐渐把集体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逐步实现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第三是使社会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让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教育，自由选择职业，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斯大林在该文中的研究主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他还考察了和社会主义经济相并存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他正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即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后又认为剩余价值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因而提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说法作补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他还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说法，乐观估计资本主义的灭亡日子就在眼前。这些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本书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它是对苏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摘自高狄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

【试　析】

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地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信，号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此来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使各级领导干部“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

济工作”。

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 年以前，即 1957 年 4 月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到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时，就谈到过，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事实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他在 1952 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到是有矛盾的，说到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是有矛盾的，没有说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你们大家可以查查他的那本著作。

1958 年 11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听取工作汇报时，又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出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1953 年这本书一出版，他就读过，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表示他已经读过一遍。1957 年第二版时，他又多次阅读，现在书房里仅批注过的本子，就保存有三种。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恐怕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取得毛泽东预期的成果，反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实践证明，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使得人们认识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人们探索、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学习。按毛泽东说：弄懂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还没有别的书，只有这两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样的会议，这样的议题上，提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的是很清楚的了。毛泽东不光号召各级干部读这部书，他自己还带头阅读，逐章逐段议论。并在会上讲解了该书的第一章。明确指出了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重要问题。在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道：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指书中《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篇文章——引者注），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3年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在那里讲了斯大林的那一章。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原则赞成，实际反对。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这本小册子，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

种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

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述。

首先，毛主席对书中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很重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一节，他在“经济法则的性质”下用铅笔画了三条着重线，对这一章的内容，三本书中都密密麻麻地画有着重线和圈，在重要的段落下画着两个圈，三个圈，有的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并批注：“这是完全重要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时，毛泽东批注：“这是一个客观的法则。”“注意。”同时还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一个大圈。在书中讲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时，批注：“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一章，毛泽东在“商品生产”下画着双直线，文内几乎全画满了直线、双直线、圈、双圈、三个圈、三角等等他特有的标记。对文中批评那种认为党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他批注：“看来还得生产商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一章，他对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价值法则受到的限制等处也都画着着重线，天头、句末画着圈圈。

毛泽东还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

条，他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文字旁，毛泽东批注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超越了斯大林的某些观点。他对自己的思想观点作进一步的阐发，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

从毛泽东批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在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研究马列主义。他并没有盲目地全盘肯定、照搬斯大林的这本书，而是善于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好的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

毛泽东重视此书，与当时正在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关。它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提出的逐步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参考，这即“很有启发”。“相当不足”是指什么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

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摘自毛泽东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4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作品介绍】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全称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中宣部组织编写，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7万字。编选了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言论。该书分25个专题，涉及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公有制的建立”、“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等等。编选体例是在每个专题下面，收集摘录马恩列斯涉及到该专题的论述。本书的出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后，上海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在1958年9月就印了20万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试　析】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编写出版，与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关。它是在为当时的领导同志提出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思路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据胡乔木回忆，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4月底，刘少奇在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并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在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对此，刘少奇在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说："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同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紧接着，中宣部组织人很快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编好了。该书出版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列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论述，在他看

来，正在进行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这些理论的现实化，是对这些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所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见到书，就立刻在会上做了宣传和介绍，将它视为一本非常及时的学习材料。并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里讲，供给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共产主义也是先从军队实行的。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议这本书“要广为散发”，并评述道：“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这年年底，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的党委委员们写了一封更详细的公开信，建议干部认真读这本书：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

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在信中要求各级干部不光要读，而且要“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可谓推重高，期望大。

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给陈伯达的信中，特意叮嘱他，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多么渴望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认识共产主义，认识人民公社，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1961年底，毛主席对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自己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象你们游泳也要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比如，要想游泳，必须一定要有水，不能旱游；二是水要有一定的温度和广度，在碗里缸里不能游；三是不能在开水里游。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

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这一时期内，他在党内的讲话中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这篇文章中曾说过：社会主义是块“处女地”，它没有现成的方案，“我们的纲领所具有的只不过是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民想到成千上万的新形式，新主意，解放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错误。”

张贻玖在《毛泽东的书房》一书中介绍了毛泽东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批划的一些情况：

翻开毛泽东读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可以看到，他在有关国家消亡、公有制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有计划的发展生产、充分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共产主义劳动等等论述的地方，几乎通篇都画满了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曲线，重要的段落旁边还画上竖线、圈等标记。他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的“我们甚至不可能确切地想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和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一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曲线，在句子后面连着画了五个圈。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

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这段下面画着着重线，好几句的后面都画着三个圈。这一段的旁边还画着竖的双直线和三个圈。从毛泽东特别重视的这些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着高度的信任。

毛泽东评价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很有启发”，应该是对实践的启发，是对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启发，同时，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联想到当时正在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不难理解这种“启发”的深刻含义了。“相当不足”，主要指马、恩等经典作家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显得有些“模糊”。要弥补这些不足，要靠中国自己31年的经验和苏联41年的经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把马、恩当时设想的理论，一步步变为现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模糊渐变为清晰，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这的确从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勇敢探索精神。但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探索是不成功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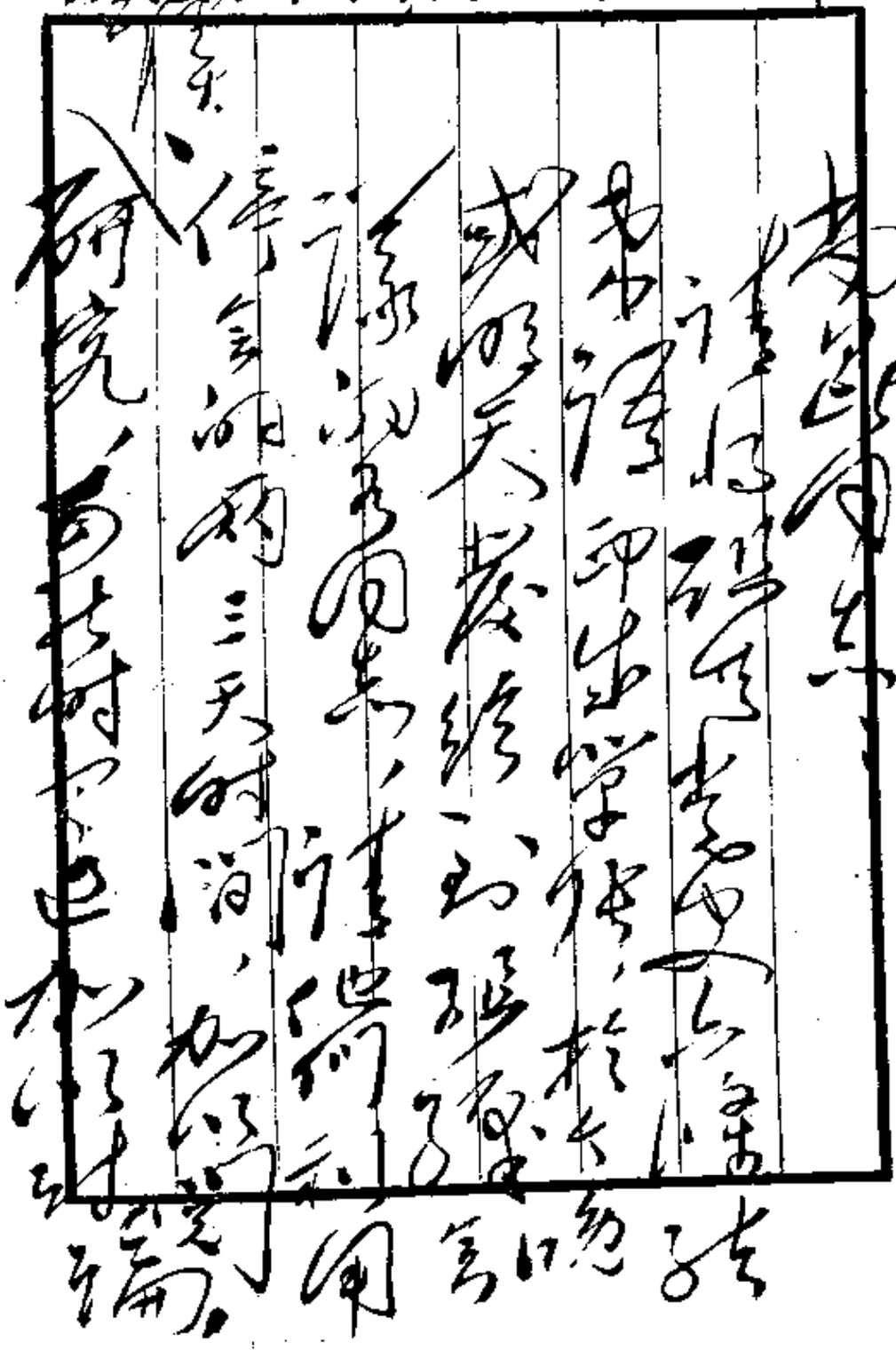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创造了苏联

这本书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赞扬此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提议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这本书为中心材料。虽然今天看来这本书还有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知晓这一切。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 1953 年致杨尚昆的信

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摘自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

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摘自毛泽东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9—480页）。

【作品介绍】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于1938年出版。此书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编写的，斯大林本人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并审阅了全书。最后由联共（布）中央审定。这是一部权威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此书出版后，联共（布）中央很快作出决议，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

全书共分12章，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为主线，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作了总结。这12章分别是：一、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而斗争；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斗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四、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五、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运

动的高涨年代；六、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七、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时期；八、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九、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十、布尔什维克党在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十一、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十二、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宪法而斗争。全书最后的结束语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这本书对人们了解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有一定帮助，对普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宣传和推广苏联的经验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书从1938年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书。在苏共和各国共产党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延安解放社就出版了中译本（博古译），此后，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当然，由于此书成书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以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方法，在今天看来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如书中不恰当地过分突出个别领导人的作用，对某些事实的评述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等，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

【试　析】

自从1939年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后，这本书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不但多次研读此书，而且评价甚

高。在延安一次小会上，他对到会的同志连连说道："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谈到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在这里，毛泽东赞扬此书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一方面是指此书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记述、分析了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还是指苏联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苏联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地借鉴，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号召全党认真学习这本教程，以使得党员干部"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又讲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讲到了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告诉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马列主义，认真钻研马列著作，但他更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重

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反对抽象地学究式地研究马列主义，主张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列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原因正在这里。

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教育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联共党史，要求全党学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列为当时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

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列举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其中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引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它的危害性和克服方法。毛泽东说：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

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又特别提出党的干部要读5本马列著作，其中就有《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其中也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胡乔木写的12本书的目录前面，毛泽东亲自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953年10月，当国民经济恢复取得重大胜利，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刻，为了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毛泽东又致函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信中说：“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可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可见，毛泽东对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是极为重视的。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据专家分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今天看来，还存在一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况且，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联共（布）党史，也是意在中国共产党人回顾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他看中这本书，主要在于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份独特性和某些新东西，而着意处在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和创新。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虽然有不少缺点，毛泽东还是很重视。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这本教科书。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读这本书是比较好的办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

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毛泽东与胡绳、田家英等一同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这本书（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引者注）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作品介绍】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

编写而成。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高度重视此书的出版，苏共中央也曾专门召开经济讨论会，对此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定。1954年8月出版了第1版，1955年9月出版了第2版，1955年9月又出版了第3版。在第3版前言中，作者写道，“教科书的第3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改变了教科书的结构，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了，改动了个别的公式使它们更加明确了。”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译本。

【试　析】

从1958年11月至1960年1月，毛泽东曾经多次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帮助各级干部系统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澄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搞乱了的思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11月9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除了建议各级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外，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提议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者。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但是，在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开展了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思潮的批判，

毛泽东的最初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同年冬天，当“反右倾”高潮过去后，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选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都曾组织过学习小组，认真学习这本教材，毛泽东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来到杭州，住进了汪庄别墅，亲自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同同志们一起边读边议。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据毛泽东的秘书，当年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的林克记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十几页，除星期天休息以外，从未间断。到第二年的2月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这些谈话，后整理成文，供干部学习参考。

保存下来的谈话记录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这个本子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

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意见（以下有的简称“谈话”），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将石仲泉同志整理的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发表的一些主要意见介绍如下。（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一、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1957年2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有的简称“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1949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党中央在1956年就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级，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关于土改与合作化。

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对于富农，在老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互 1954 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 1954 年 9 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一亿二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不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使人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

二、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贯彻了这个精神。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1955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在读《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 年底到 1956 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

在“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工农业并举的思想。

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

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这个方针。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1958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作用的问题上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1959年3月30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

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三、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却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

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让历史去检验。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接触了这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

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

四、从经济学谈到哲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1954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早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很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评论，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关于认识过程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比较多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

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关于部分质变论。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1958年初，他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包含了他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

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使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五、正确地对待毛泽东的“左”倾观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的“左”的倾向在不断发展。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政治方面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这样的话。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1958年11月下旬的

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在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不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另方面仍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

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了九十亿元，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关于物质鼓励问题。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

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预，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极现象是不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实际上不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和消除。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育，有了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失误

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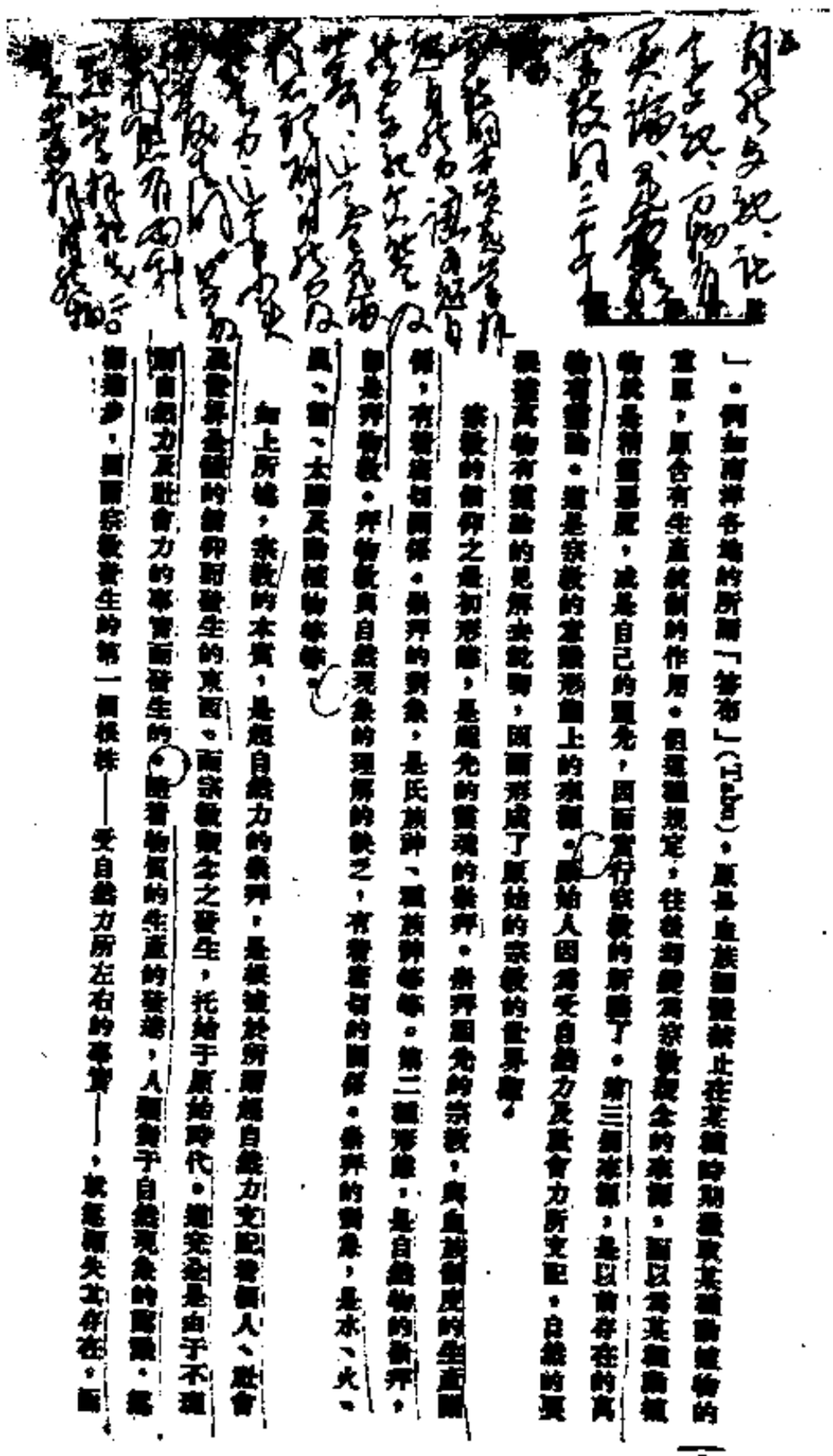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至少读了10遍，足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在长达3400多字的批注中，毛泽东在很多地方已超出了原书的思想深度，并表明了对有关的哲学重大问题的见解。

【毛泽东评点原文】

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的批语

——引自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311页，湖南出版社版。

【作品介绍】

《社会学大纲》初版于1937年5月。作者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这本书原是他讲授社会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写作本书时，李达正在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讲授经济学和社会学。本书1935年曾铅印成16开大本，1936年定稿后，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全书共分五篇，即：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第一篇唯物辩证法部分，主要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特征、对象、诸法则（对立统一的法则、质量转变的法则、否定之否定、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法则与因果性），并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了辩证法，研究了认识过程考察的根据、意识的形成，感觉、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论证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性，批判了布尔乔亚社会学及历史哲学。第三篇社会经济构造，研究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构造的历史的形态。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研究了阶级与国家。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探讨了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及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

【试　析】

毛泽东与李达早在党的创立时期就建立了友谊，大革命失败后中断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并将《社会学大纲》寄给毛泽东，请其指正。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10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研读过多遍。据《读书日记》记载，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他对全书进行了批注。书上批划的符号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以批划笔迹分析，有相当多部分，他至少批读了两遍。从写的批注文字看，有3400多字。这些批注，虽然主要是对书中内容的概述，但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发挥。这不仅表明毛泽东的分析在许多地方已超出了原书的思想深度，而且也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毛泽东对有关的哲学重大问题的见解。

《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在那个时期出版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书籍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论述得较好的一章。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完全按照恩格斯讲三大规律的顺序和观点展开的。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改变了恩格斯讲三大规律的顺序，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中最基本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法则”，其他规律是它的“具体化”，但是对三大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展开论述。李达在这一章中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见解，对列宁的思想作了较深入的阐

述。他指出：对立统一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因为在对立的统一发展过程中，所谓‘飞跃’、‘连续性的中断’、‘向反对物的转变’、‘质量间的转变’、‘旧物死灭与新物发生’，都是必然的形态，都是对立的斗争的发展，都是由对立的转变而显现，都是由对立的统一去说明。”

毛泽东对这一章作了多次批读，从批注看，他对李达的观点是重视的也是赞同的。李达有一段文字写道：“这三个法则之中，对立统一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显然是漏了一个“最”字。毛泽东批读到此，在“根本”前添加了“最”字。这一字之加，不仅是校勘，而且反映了他的观点。因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也认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只是没有对三大规律的关系作具体分析。现在虽然还没有文献材料能够证明《矛盾论》的这一观点来自《社会学大纲》，但是，李达在这里想发挥的也许正是毛泽东想发挥而没能发挥的。

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认识，毛泽东不仅完全同意李达的上述观点，而且有些认识，比李达更进了一步，这在建国后特别是60年代的一些论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1964年8月18日，他在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1965年12月21日，他进一步指出：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

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此外，毛泽东在研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还写了一段批注，阐明他的上述观点。他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这条批注，比上述两项谈话讲得更深一些，不仅陈述了观点，而且简要地阐明了理由。这是不是对李达观点的发挥呢？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毛泽东的观点直接源自李达，但从时间上和表述方式上来看，李达的观点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毛泽东、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毛泽东的观点与李达的观点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无疑还可继续讨论。

在《社会学大纲》第三章第二节里，李达讲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时有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这个命题，是我们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唯物辩证法的创始者们进行的哲学斗争“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普罗列达里亚与布尔乔亚的实际斗争”。毛泽东批读时，在这些话旁划有双线，并写了“斗争就是辩证”的批语。这是对李达观点的概括。这个概括已经不只是讲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

系，更直接地是反映他对辩证法的实质的认识。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显然也是重要的。

在《社会学大纲》的认识论部分，毛泽东的批划符号满篇，不少处还很密集。批注文字虽然不多，但有份量。

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分析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虽然都引用了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论述，但在分析认识的具体过程时，却往往只分析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觉到思维这两个过程。《社会学大纲》比苏联教科书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认识之圆运动的发展”的重要思想。书中写道：“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采取如下的过程，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过程中，不断的暴露出客观世界的新矛盾、新关联、新属性和新侧面。这些新的矛盾、关联、属性和侧面，不断的闯进于人类的意识中，形成客观与主观的新矛盾，促进认识的新运动，使认识进到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更深刻的更完全的更具体的把握客观世界，因而社会的实践更进一步的积极的能动的变革客观世界。”这段精彩的议论与《实践论》最后讲的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是一致的。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也有接近这个思想的论述。这说明他们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贡献。

但是《社会学大纲》在讲“圆运动”之前分析具体的认识过程时，却没有强调由思维到实践的过程。例如，李达写道：

“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又说：“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用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这两处都没有讲由思维到实践这个认识阶段。由于人的认识到思维理性阶段还没有结束，需要回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再认识，不讲这个阶段，对认识过程的分析不能说是完全的。因此，毛泽东在上述两处都加了批语。在前一处批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在后一处批道：“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显然，这两条批注，是对李达以上两处表述的重要补充。这个补充，实际上把认识的全过程分解成三个阶段；即在毛泽东看来，认识过程是两个飞跃、三个阶段。

《社会学大纲》在论述运动过程是辩证法过程时，引用了列宁的话，即“不单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是辩证法，并且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也是辩证法”、“认识是思维对客观的永远的无限的接近。”毛泽东对这两段引文划了几种着重号，并写了一段批语：“将来认识的将是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这段批语，不是就微观的某个具体认识过程而定的，而是讲的客观认识过程。辩证唯物论者是世界可知论者。在认识论中只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不断地实现认识过程推移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就会逐渐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真理性认识。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不就是进入了“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吗？

学习哲学、学习唯物辩证法，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认识能力，使认识进入“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的境地。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王玉石）

《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书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真理，感召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并成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开拓性著作。毛泽东评价它是"通俗"而"有价值"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

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

——摘自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307页。

【作品介绍】

《大众哲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部著作。为艾思奇作于30年代。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艾思奇，寓意“爱好思考奇迹事物”，据黄洛峰回忆，其名是在看了《爱斯基摩人》这部电影灵机一动而取其谐音（《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云南人民版，第61页）。生前还用过李崇基、山本森、李东明、SG等笔名。云南腾冲人。中共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理论战线上的光辉战士。

艾思奇出生在一个具有民主主义传统的家庭里。其父李日垓是一个旧民主主义学者，在北京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毕业后正式加入“同盟会”，利用身居滇南沿边工民学堂总办之便，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为蔡锷所器重。其母是位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得益于其父对中国历代爱国志士壮举和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介绍和讲述，艾思奇从小萌发了对革命、对哲学的向往和兴趣。

1927年与1930年，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27－1928年在日本，他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不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0年再渡日本，以优异的成绩入读于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专业，其间继续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马、恩的著作为之提供了玄妙的古代哲学所未能提供的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艾思奇为此豁

然开朗，在家信中批评了其父“工业救国”的主张，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宇宙观才真正指出了救国救民的道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爱国主义愤，毅然弃学回国。从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可以分这样三个时期：即 1932 年－1937 年在上海时期；1939 年－1948 年在延安和解放区时期；1949－1966 年建国以后时期。

《大众哲学》作为艾思奇的“成名作”就诞生于他在上海时期。这是艾思奇开始以哲学为武器投入革命战斗的时期，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初步结合起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立足于《读书生活》杂志，以通俗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哲学》就是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的最初成果”，它集艾思奇于 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10 月在该杂志第一、二卷上连载的《哲学讲话》单独出版。从 1936 年第 4 版更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初版分为绪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4 章，约 11 万字。从 1936 年第四版起，在绪论之后各章依次改为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被认为是“新给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李公仆《编者序》），即为初学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知识。

《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十几年中一直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一个哲学家的道路》第 57 页）。到 1948 年 12 月，总计发行 32 版。其中由于时代、环境主观认识等各方面的限制，书中也存在着许多简单

化、片面化乃至附会之处。艾思奇本人也承认“现在的《大众哲学》和理想中的还差许多”，对许多具体的批评也是接受的。同我们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比，《大众哲学》当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传播，对当时和随后革命战争年代所起的重大感召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正如贺敬之当年诗中所颂的：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

（转引自《一个哲学家的道路》第47页）

【试　析】

“通俗而有价值的书”是毛泽东对艾思奇《大众哲学》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艾思奇有过一段密切的、直接的联系。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践踏了我大半壁河山，抗日的怒火燃烧在艾思奇的心间，他满怀豪情壮志离开了上海，来到延安，来到了革命圣地，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地方。艾思奇的到来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欢迎。毛泽东曾兴奋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艾思奇”与“大众哲学”早已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艾思奇和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一段朝夕相处、互敬相长的交

往。有时毛泽东去艾思奇住处，有时艾思奇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有时一起出现在抗大、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的课堂上，有时一起汇集在毛泽东提议创办的“新哲学学会”，他们一起研究，共同探讨哲学理论问题。在延安，艾思奇把他在上海时期就已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使之成为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即要使“新哲学”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这是他早已开始致力于的新哲学通俗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艾思奇本人对此曾作过明确的区别和阐述，这标志着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艾思奇对毛泽东是十分敬仰的，他在佩服毛泽东的气魄、胆识、学识的同时，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是从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60 年代初还结合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深入研究写成了《关于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等。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同时作为杰出的哲人对艾思奇则更是虚怀若谷。他不仅把自己在延安时期，标志着哲学思想飞跃和升华的《实践论》、《矛盾论》两书的油印本亲自签送给艾思奇等同志，虚心地所取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仔细地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著作。除了艾思奇 1937 年再版的《思想方法论》、新版的《哲学与生活》的阅读、批注、摘录外，对《大众哲学》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前面引文所见的，早在 1936 年，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当时经费很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致电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让他们设法购买的 10 种至 15 种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中，就点名要买《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之用，称之为“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如上所见毛泽东在延安

得知艾思奇到来的喜悦与兴奋，及其后两人之间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都是与《大众哲学》首先做为一条纽带沟通了毛泽东与艾思奇分不开的。

还有一些事能看出毛泽东对《大众哲学》的喜欢。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托人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带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也有这本《大众哲学》。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外出时，在要带走的一大批书中，指名要带的就有《大众哲学》。

毛泽东喜欢《大众哲学》，首先因为它是通俗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的初次的成功的尝试。旧哲学向来为少数人所垄断，成为极为神秘、极为玄妙，为普通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艾思奇致力于“还哲学以本来面目”，让“大众掌握哲学，哲学掌握大众”的开拓性尝试。他在“哲学讲话”的第一篇，以醒目的标题、生动的语言，开明宗义地声明《哲学并不神秘》，阐明哲学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指出哲学内在于大众对宇宙、人生的根本态度、基本观点之中，内在于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当中，并内在地成为每个人认识、把握宇宙人生的“工具”。哲学内在于我们每个人，而为我们所不自觉。艾思奇就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入手，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形象，讲述我们身边的哲学。全书把具体事例与哲学道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生活中提炼哲学，哲学贴近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给人印象深刻，因而为大众读者所喜爱。尤其是那些在苦闷徘徊中的青年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接受了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公朴先生曾称赞说：“这本书是用

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深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而这在此前，是“未被尝试，甚至被认为不屑于尝试的（艾思奇语）。因此李先生称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大众哲学》是第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艾思奇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大众哲学》充满了通俗化、大众化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探索，为毛泽东所欣赏，同时也为现代人所珍视。

毛泽东肯定《大众哲学》，不仅仅因为它通俗，更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大众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以通俗的形式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本身就是价值。通俗化只是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大众哲学》的内容，把通俗化的形式与深刻的哲理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它本质上是为了大众，是要为大众所掌握的。与以往的任何时代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为少数人所独有，满足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精神点缀品，它是行动的武器，行动的指南。哲学需要掌握大众，大众同样需要掌握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装，通俗化、大众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这种必要和可能。毛泽东作为革命的哲学家，一生极为重视哲学的普及通俗化，极为重视哲学的通俗读物。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时，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要找来看看。这是由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写的，用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不是小说）讲述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欣赏。1951

年3月27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哲学通俗读物，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表达，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一生的追求，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中，就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以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民族形式，并在许多场合给它们以生动的阐释，这也许是他对《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最初尝试所具有的开拓性价值充分肯定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它是反映了时代的新思潮，符合时代的要求，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巨大的感召作用的。《大众哲学》成书于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30年代，当时，许多青年学生有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广大青年彷徨苦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大众哲学》为广大青年指出了一个方向，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的革命结论，但却通过以通俗的形式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征服力揭示了中国的前途和方向。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它的感召下，奔向革命，奔向光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奔向抗日前线。《大众哲学》在当时就是方向，就是旗帜。至今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对它的影响记忆犹新。一个24岁年轻人写的哲学书在短短

13年里再版了32次，这本身不能说不是个奇迹，当年，它也曾成为国民党眼中的毒草，被封为“禁书”，以至于蒋介石为此大骂他的手下，责问为什么没有人能写出有如此影响的书来。

第三，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先驱。通俗化不等于现实化、中国化，但它是中国化、现实化的第一步。“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也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哲学与现状和任务》1938年4月）艾思奇抗战时期在延安这段长长的论述阐明了通俗化和中国化、现实化作为大众化的两个层次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也为我们考察《大众哲学》及艾思奇以后哲学活动的关系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提供了指南。

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的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对共产党进行“围剿”的时期。当时，在我们党内，继立三路线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在上海，党领导下的文化、文艺运动虽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但是仍能进行得很有生气，尤其在留学上海

的中央派出机关因“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遭到破坏，党的临时中央被迫迁入苏区以后，留学上海的文化界、文艺界、理论界的党员不得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并且注意团结各方面的进步力量。艾思奇就是作为李公朴主持的《申报》的主要撰稿人，后又作为《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以答复读者来信的形式和读者谈心，共同探讨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为此，借教条主义的说教是不行的，必须从读者的思想状况出发，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并以他们所易于接受的形式阐发哲理，寓意方向，启迪人生。这对艾思奇同其他30年代上海文化理论界同仁一道，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抑制“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个很好的训练。正是从《大众哲学》开始，艾思奇走上了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我们知道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提出者、最彻底的践行者和最杰出的代表。在《反对党八股》中，曾明确地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艾思奇在延安时期把通俗化运动向中国化、现实化的推进不能说没有毛泽东的影响（艾思奇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杰作），同时，艾思奇的哲学活动也不能说没有对毛泽东产生影响。艾思奇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的先驱，而其得以向前推进的出发点则是其《大众哲学》。（王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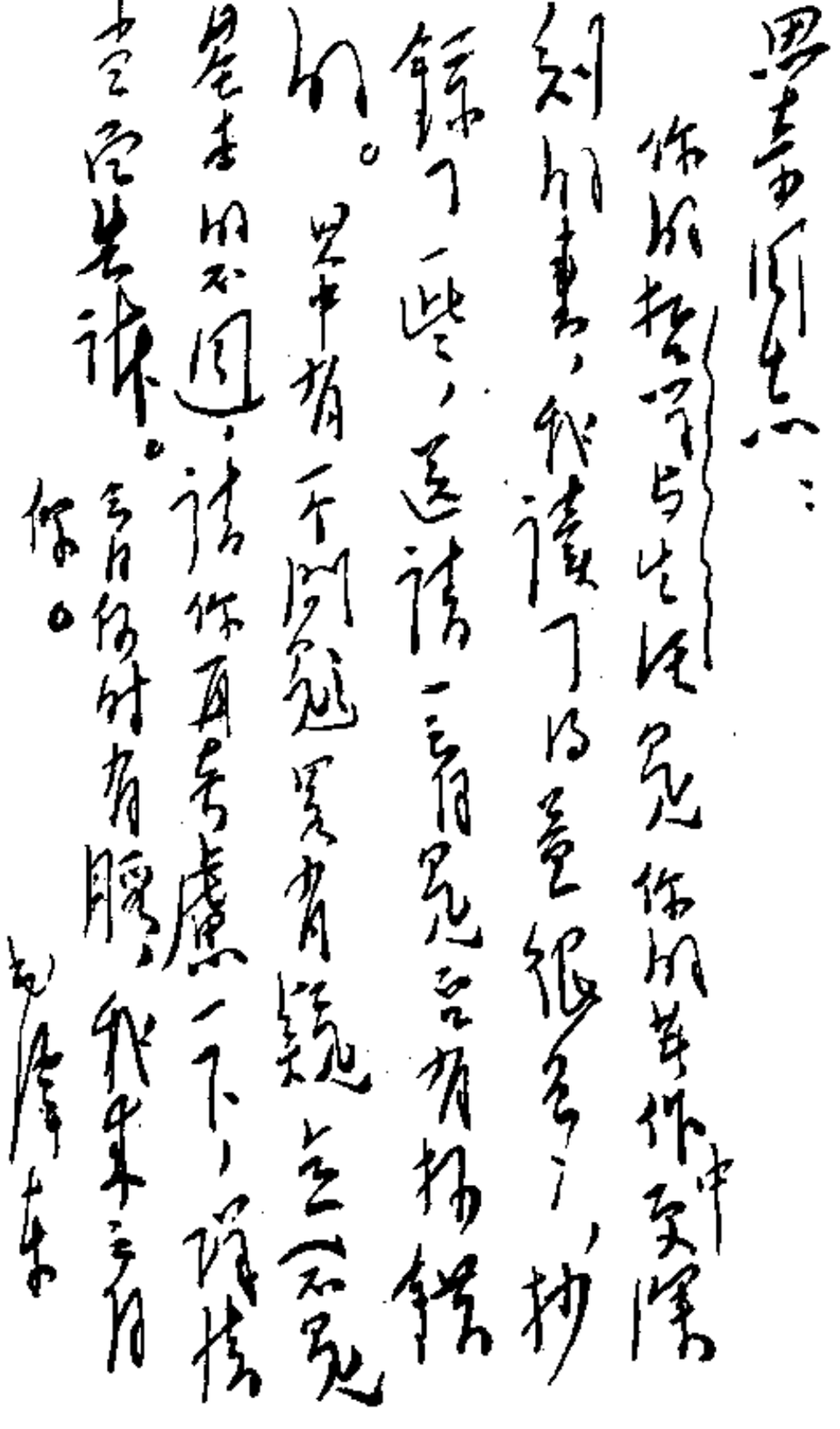
《哲学与生活》更深刻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与他发愤读书，加强理论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从他给艾思奇的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求知中表现出来的严谨认真、虚怀若谷、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

【毛泽东评点原文】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



毛泽东1951年给艾思奇写的信

关于哲学与生活摘要

我们所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都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世界上没有离开事物的名词。相对绝对的名词也不是和客观事物脱离的。

同事物中有绝对之存在

例如行军途，以里计算是不变的。

对距离言，比较长短不变的无变者，无变的长短是变的，也以时间长短是不变的。

对速度而以人是不易变的，不知道人也会变化。

量的不是绝对的，质的也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摘要

看你。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04页。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毛泽东1937年9月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1页）

【作品介绍】

《哲学与生活》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一本哲

学文集。

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势力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攻，当时上海曾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极力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围绕着一些哲学的基本问题，艾思奇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道，对张、叶等的进攻予以有力的反驳和批判。艾思奇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深刻指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统治哲学的旧时代已到了结束的时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成为锐不可当。自1933年至1936年底，艾思奇陆续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文章，一方面深入地探讨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与之相结合，驳斥了叶青之流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这些文章后汇集成册，冠以《哲学与生活》之名，于1937年4月出版。

在这本书中，艾思奇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叶青的唯心主义观点展开斗争。

首先，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规律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其二，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不是“运动的停留”，静止的东西本质上是运动的。

再次，关于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总之，在《哲学与生活》一书中，艾思奇紧密结合社会现实以及思想战线两大阵营斗争的实际，在一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批

驳了唯心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捍卫了唯物辩证法，并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见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当然，这部书只是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不能不带有作者当时思想发展的印迹，有一些甚至存在较严重的缺点。例如，在谈到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时，作者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真理的形式始终是相对的。真理有绝对的内容和相对的形式。”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以绝对的内容和相对的形式来理解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片面的，因为真理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又如，作者关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他认为辩证逻辑消化、吸引、扬弃了形式逻辑，因此有了辩证逻辑，就没有必要保留形式逻辑了。尽管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至今哲学界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以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还有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关于“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等。应当指出的是，书中的这些缺点，在作者后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克服。

【试　析】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落后，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发育成长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表现在思想领域就是，它未能象西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在革命时期形成自己独立成熟的理论。无产阶级理论在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理论相对立

的，但它又是资产阶级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理论成果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幼稚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中国早期无产阶级理论上的不成熟。同时，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急迫的历史主题展开的，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学理上进行长期的研究、吸收和消化，使之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主要是将其作为实际斗争的武器来接受和运用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来不及进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以上诸因素，使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缺乏成熟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导致革命进程经常出现挫折和反复。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就是在理论上准备和修养不足的代价。因此，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便领导全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学习活动，以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对党的理论建设进行补课。他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习到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学习理论蔚成风气。全党的理论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改变了党自建立以来理论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高的状况。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对哲学情有所衷，这充分表现在阅读德国学者包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语之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仍然对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全力以赴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革命，一时无暇从事纯哲学研究。尽管如此，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还是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现实的工作和斗争。在两次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先后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这些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字里行间却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到达延安后，在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抗大讲课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掌握了这一精神武器，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的同盟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科目。因为主观主义和机械论这两种错误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错误缺点，只有自觉地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基于这种对哲学重

要性的认识，加之当时党中央在陕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有利环境，毛泽东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阅读哲学书籍，钻研哲学理论。1936年，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时曾目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人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个晚上的功负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延安的那段艰苦的日子，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来说，不啻是一段黄金岁月。毛泽东发愤学习，研读批注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其他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历史、文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刊，而他下气力最大的还是哲学著作。至今保存下来的他阅批过的哲学著作主要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1932年出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出版）、《大众哲学》（艾思奇著，1935年出版）、《社会学大纲》（李达著，1937年5月出版）、《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1935年1月出版）、《哲学概论》（张如沁著，1935年10月再版）、《辩证法唯物论辞典》（米丁、禹希金柯编著，雨生等译，1939年12月出版）、《哲学选辑》（艾思奇选编，1939年5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著、博古译，1945年10月版）、《西洋哲学史简编》（薛格洛夫编，王子野译，1943年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著，柳若水译，1943年

版）等。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的各种哲学著作也是他阅读的对象。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哲学书籍最多、研究哲学问题最深、哲学理论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后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定位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时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写出饱含哲学意味的有关军事、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著作。

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是毛泽东在1937年9月间阅读的。在阅读过程中他竟作了长达十九页的摘录，足见他读该书的仔细认真态度。1938年初毛泽东就该书写信给艾思奇。信中首先肯定《哲学与生活》是他读过的艾思奇哲学著作中“更深刻的书”。艾思奇《大众哲学》等著述，着重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这些著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启发了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哲学与生活》正是围绕民众提出的一些较深层的哲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回击了唯心论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消除了一些读者的思想疑惑。它所涉及的一些哲学问题是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诸如，绝对与相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与综合、特殊与一般、差别与矛盾、外因与内因、本质与现象、运动与静止、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等。由此，

毛泽东认为这部著作是艾著中“更深刻的书”，“读了得益很多”。

信里所讲的“抄录”即指1937年9月毛泽东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在这里，他对艾思奇的许多观点，表示了赞同和支持。比如，这个摘录的第一页，写道：“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我们所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等，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现实的马，才有马的名词。相对、绝对两名词，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绝对主义在作怪，例如信命运，以为事情是不变的，又如认某处生活环境不适于已，要求他移，也认为环境是不变的，又如认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不知道人也会变化。黑暗不是绝对的、光明也不是绝对的。”诸如此类的艾思奇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阐发，毛泽东读后都颇感有所启发，“得益很多”，故而才不厌其烦地大篇摘录。

至于信中所谈到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是指艾书中“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批驳叶青否认差别可以转化为矛盾的那段话。毛泽东在摘录了那段话后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墨濡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差别就是矛盾”表示了唯物

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他曾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进行了探讨。他在这篇哲学论著中，批判了苏联德波林学派关于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别，并无矛盾的观点，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他把矛盾的普遍性明确地概括为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只有坚持这两方面的含义，才是真正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据此，毛泽东坦诚而友善地指出，艾对差异的理解和表述是不妥贴的，并愿意与他当面详细商榷。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承认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就不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性的原理贯彻到底，而导致形而上学。这段批注，既展现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又展现了他严谨认真而又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张平）

《〈实践论〉解说》写得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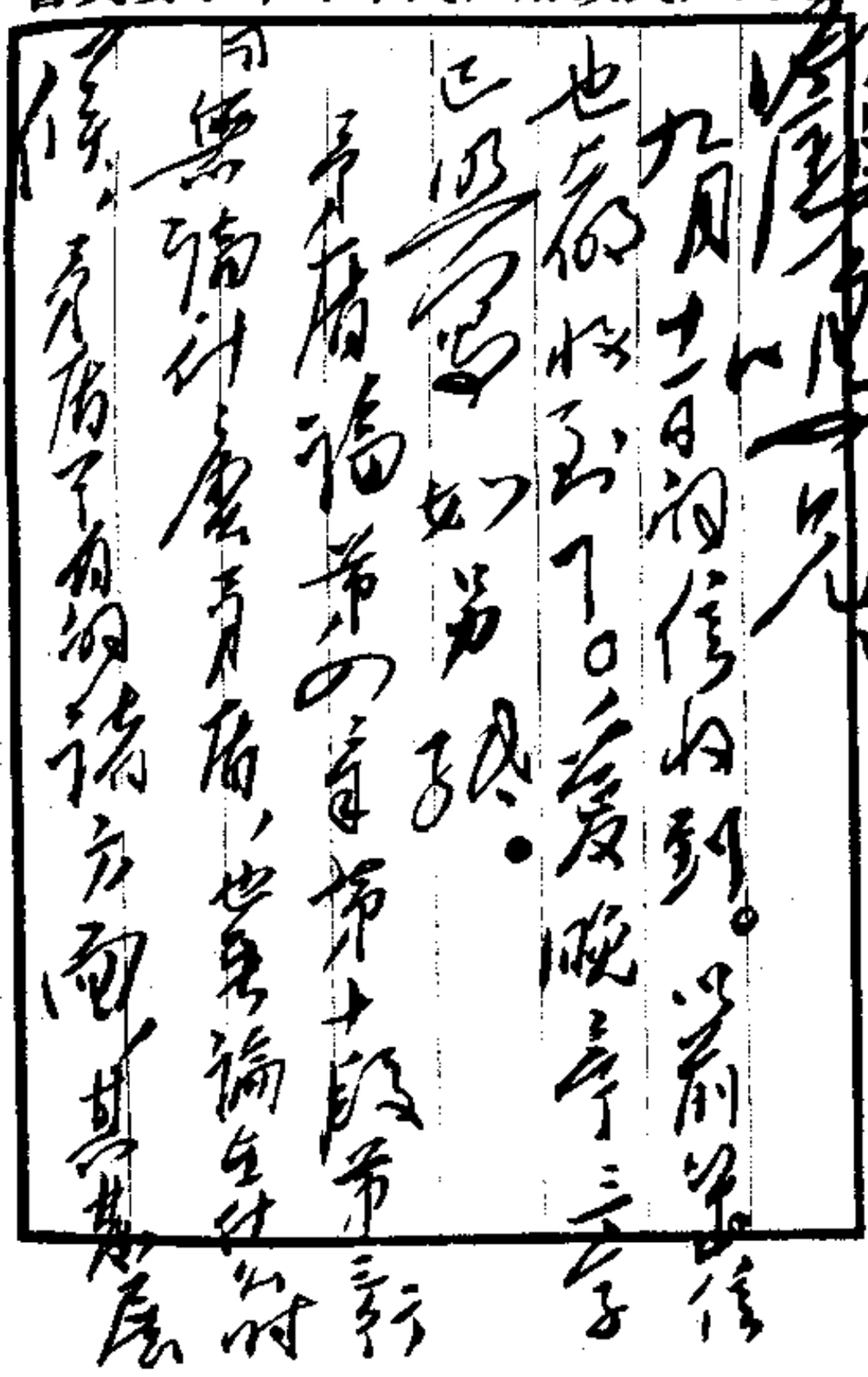
1950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立即撰文加以解说。为了做到完整准确地讲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修改。这不仅是对李达个人的支持，也是对用通俗化的语言宣传唯物论的支持。

【毛泽东评点原文】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致李达信手迹

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1951年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作品介绍】

《〈实践论〉解说》一书是由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撰写的一部通俗地阐述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论读物。这本小册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带有总论的性质，阐明了《实践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意义；第二部分“《实践论》解说”是全书的重点与核心，它采用一段原文一段解说的方式，比较系统、通俗、有针对性地解说《实践论》中的思想、背景及现实意义，

这样一种方式深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是一种普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好方式。第三部分是“怎样学习《实践论》”。内容包括：为什么要学习《实践论》、怎样学习《实践论》和《实践论》学习提纲。这部书对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的著作的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　析】

1950年底，毛泽东重新发表了他在抗战初期写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这部著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他勤奋钻研，力求深入浅出、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著，常常工作到深夜，带病坚持写作。为了尽快地将《解说》付印，又能做到完整准确地讲解毛泽东思想，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亲笔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三个字的，他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信，就修改书稿一事作了说明。这即前面所引的那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解说》一书的体例。该书的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解说。毛泽东认为这样“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在解说《实践论》、《矛

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 年 3 月 27 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信中还具体谈到了对书稿的修改，即“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所说“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是指《〈实践论〉解说》的第二部分，毛泽东阅后，作了以下几个修改：（一）在《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

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李达对毛泽东的修改和指导非常重视，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给李达写了回信。李达将几位助手叫来，告之此事，大家看了信和题词，惊喜交加。李达说：“我正在赶写《〈矛盾论〉解说》，对自己的著作不完善之处，总是反复修改，同时对我的解说也要求准确无误。原著中删去8字，所以及时来信指导。”毛泽东的信的内容是：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对李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面寄予殷切期望和支持。1954 年 12 月 28 日在给李达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泽东对《〈实践论〉解说》的肯定与支持，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普及马列主义的一种关心和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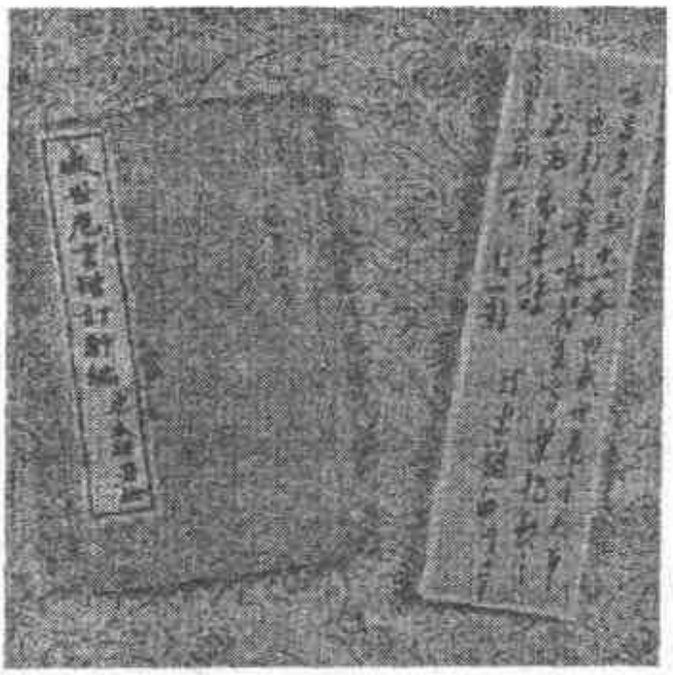
《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盛世危言》是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刚满13岁，辍学在家务农，这本书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不久他上了东山高小，独自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毛泽东评点原文】

[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

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毛泽东学生时读过的《盛世危言》及表兄文运昌的还书便条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作品介绍】

《盛世危言》是近代改良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著作。郑观

应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他放弃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的科举考试，到上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20多年，他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近代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他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1893年，他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该书辗转翻刻达10余万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部书中，郑观应议论时务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方案。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全书主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必然要向东方的落后国家寻找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因此中国富强之道，迫切要政，在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办日报、重游历、设议院、整吏治、开矿业、修铁路等，实行君民共主，以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工商业。作者还指责洋务派单纯学西方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中国旧式的知识分子中比较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

【试　析】

毛泽东是在1906年时读到《盛世危言》这本书的。那年毛泽东刚满13岁，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料理农活。繁重的田

间劳动并没有磨灭少年毛泽东的读书意志。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便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关闭窗户，点上油灯，偷偷阅读他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其中有一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并令他终身难忘，这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也是他阅读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

毛泽东后来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过这段经历，这即前面引述的话。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虽然书中所提倡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经过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经证明，郑观应等人所主张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对于孤处韶山乡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还是相当新鲜的。书中的一言一语都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

这本书是他表兄文咏昌从湘棠阁那里借来的。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展室里，还能看到毛泽东当年的还书便条。这张便条是用毛笔写的：“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这张便条现已成了珍贵文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缩影。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这本书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正象他后来对斯诺讲到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恰好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毛泽东，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毛泽东听了以后很动心。八舅文玉钦、堂叔毛楚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众口一词，都说毛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有大出息。毛泽东的父亲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年轻的毛泽东就抱着这样的志向、决心，离开了生他育他的故乡和亲人，独自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革命军》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1958年成都会议前夕，毛泽东抽空"望了一下"邹容的《革命军》，并且在会上推荐给大家读。他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赞扬《革命军》很好读。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它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



邹容士烈像

毛泽东在《革命军》的扉页上写下章太炎赠邹容的诗

起坐班房，因病而死。

——摘自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见逄先知《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摘自毛泽东1958年同田家英、吴冷西的谈话（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60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作品介绍】

革 命 军

邹 容

革命军自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

不文以生，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及思想间所

不平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哂曰："獾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第一章　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乾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后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

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公；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缔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淘，过昨日，历今日，以象现象于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养善之革命，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合汇，以同归于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睐二百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

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挽诬天命，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有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嗟乎！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地也，此其时也。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

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于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洲人之腌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与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

使贼满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今试游于华盛顿、巴黎、伦敦之市，执途人而问之曰："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欤？抑异种欤？"必答曰："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又问之曰："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必答曰："国者积人而成者也吾亦国人之份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而参预焉。"乃转诘我同胞，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谨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为同胞述之。

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份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份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中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我四百名，吏部三十余，读书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余，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 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是六部满缺司员，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

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理藩之事，惟满人能为之，咄咄怪事。］其余党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诸衙门缺额，未暇细数。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纵曰满洲王气所钟，如汉之沛［今江苏沛县］，明之濠（今安徽凤阳县），然未有绵延数百年，定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人才，至于斯极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来，其手奏中兴之绩者，非出自汉人之手，则各省督、抚、府、道之实缺，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又使非军兴以来，杂以保举、军功、捐纳，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至于科举清要保之选，虽汉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以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得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呜呼！我汉人最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哉！虽然，同种待异种，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乃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骈罗，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广州，若镇江等

处，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满，汉自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惊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危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奖借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如扬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向迩。其余抑扬高下，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勒者乎？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计，以赡其身家，不必读书向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夫亦可思矣。

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曰读书人。故于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虐之，待其垂老气尽，阘然躯壳，而后鞭策指挥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试贴、楷摺，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时无坐立，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汩之者何？汩之以科名利禄，俾之

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辱之者何？辱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贼之者何？贼之以威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牵连之狱，开创于顺治；［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狱，滥觞于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征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璧连城之大类书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为此三书，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体投地，顿首稽颡，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高谈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为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瞰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嫣紫嫣红之滥调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仍特设博学鸿词

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拓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通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呼呜！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覆试而几案不具，待国士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棘围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于士也。名为恩荣，而实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侥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经，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余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厘之施，于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慈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为中国士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从之活动在写真［即影戏］。然吾以为处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于大壤也。既又闻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某某中举，某某报捐。"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犹是嚣嚣然于社会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之腐败士人。嗟夫！吾非好为此奸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实吾国士人荼毒社会之罪，有不能为之恕。《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陇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

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这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于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国之农，为奴隶于贼满人下而不敢动，是非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贼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

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葬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成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曰，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而我同胞置身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则满洲政府殆盲于目聋于耳者焉。夫头同是圆，足同是方，而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以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中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

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若。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敲吾肤，吸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之以朽腐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使之战，不聚歼其兵，而馈饷行敌，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似此残酷之事，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杀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见夫吾同胞每年中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型法之下者不知凡几，贼满人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会审，如御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事。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人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而贼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屠戮我。

若夫官吏之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岂当日贼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贼满人铁骑所至，屠杀虏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籍，不过八日，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贼满人入关之时，被贼满人屠杀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贼满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记》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子以托者孙，孙又以托诸玄来礽。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贼满人割胶州于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如？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谥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时代，所号为令主贤君，及观《南巡录》所纪，实则淫掳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乾隆欲食黄角蜂，由张家口递至扬州，三日而至，于此可其奢侈。]嗟夫！竭数省之民力，以供觉罗玄烨［即康熙］、觉罗弘历［即乾隆］二民贼之行止，方这隋炀、明武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几何。吾曾读《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

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与之计之较之，反任之听之。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

湾，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认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满州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共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马也，牛马何以受治于人？必曰人为万物之灵，天下只有人治牛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于贼满人之胯下，是即牛马之受治于牧人也。我同胞虽欲不自认为牛马，而彼实以牛马视吾。何以言之？有证在。今各府州县，苟有催租劝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数百年豢养深恩，力图报效”等语，煌煌然大贴于十字街衢之上，此识字者所知也。夫曰豢养也，即畜牧之谓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满洲人抢吾之财，攘吾之土，不自认为贼，而犹以牛马视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满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不待辨别而自知。贼满人之为此言也，抑反言欤？抑实谓欤？请我同胞自道之。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此言也，不出于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诸于满洲人之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耶？

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曰黑龙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地，贼满人固当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有人焉，己不能自保，而犹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爱惜己之物，而犹望其爱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辫发，著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Pig 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ヤンボツ［译曰拖尾奴才］才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党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

贼满人入关，所以剃头之令，其略曰："向来剃头之制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言，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头。若惜发争辫，决不轻贷。"呜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同胞！同胞！吾愿我同胞日日一读之！

娼妓之于人也，人尽可以为夫，皆为博缠头计也。我之为贼满人顺民，为贼满人臣妾，从未见益我以多金。即有人其利禄诱导之中，登至尚书总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蚀同胞，而贼满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呜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嗤戟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中落居于山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壤，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

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冠之乱，闯入中原，盘踞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是满人享之。太平天国之亡也，以汉攻汉，山尸海血，所保者满人。甲午战争之起也，以汉攻倭，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同胞！同胞！毋引为己类。贼满人刚毅之言曰："汉人强，满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愿我同胞，当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满洲人之对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择乎！夫犬羊啮骨，犹嫌鲠喉，我同胞受此种种不平之感，殆有若铜驼石马者焉，然而贼满之人奴隶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达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笔不能宣之。吾今发一誓言以告人曰：有满人对待我同胞之问题，以难于吾者，吾能杂搜博引，细说详辨，揭其隐衷微意，以著于天下。吾但愿我身化为恒河沙数，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以演说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惨状于我同胞前。我但愿我身化为无量恒河沙数名优巨伶，以演出贼满人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之活剧于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处温带，人性聪明，物产丰饶，江河源富，地球各国所无者，我中国独擅其有。倘使不受弩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

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迸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上海用印度人为巡捕］，斐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满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过此以往，其光复中国乎？其为数重奴隶乎？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择焉。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剌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然近人有言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如是！如是！则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二百六十余年之奴隶犹能脱。数十年之奴隶勿论已！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于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力，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国其革命！我中国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国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

第六章　革命独立之大义

与贵族重大之权利，害人民营业之生活，擅加租赋，胁征公债，重抽航税，此英国议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唱革命之原因也。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县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重征茶课，横加印税，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驻兵民间，此美人所以抗论于英人之前，遂以亚美利中之义旗，飘扬于般岌剌山，而大唱革命，至成独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州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嗟予小子，无学顽陋，不足以言革命独立之大义，兢兢业业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再拜顿首，敬献于我最敬最亲爱之皇汉人种四万万同胞前，以备采行焉。如左：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

一、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一、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消灭。

一、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一、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

一、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使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一、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一、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一、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一、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一、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

一、人人当致忠于此新建国家之义务。

一、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一、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能以平和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

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

一、定名中华共和国。［清为一朝之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

一、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一、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

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试　析】

在毛泽东丰泽园的故居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1958年2月，毛泽东阅读此书时在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挥笔书写的章太章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愁。临命当（须）掺手，乾坤两只头。"表达了毛泽东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无限钦佩和深深怀念。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宣传家。从小聪颖好学，熟读《四书》、《五经》、《汉书》、《史记》等中国古籍。1889年开始阅读报刊，

接受“新学”，赞同维新变法，痛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忧患国家兴亡。1902年，他排除父亲阻拦，自费留学日本，寻求救国的真理。喜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参照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编写通俗革命读物，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宣传革命的排满活动。1903年被迫回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投入拒俄运动。后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宣传。著《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章太炎为《革命军》作了序，由革命党人集资出版，上海《苏报》曾刊文介绍。同年5月，该书在上海正式出版，影响很大。

《革命军》全书2万字，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共7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论证中国要想富强独立，不可不革命。《革命军》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25条革命纲领。全书热情奔放，慷慨陈词，极富宣传鼓动之威力，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读物之一。

毛泽东多次阅读《革命军》，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据记载，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5年间毛泽东4次阅读有关文章和材料。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一本他编的书：《苏报案》。此书共编入4篇文章，《革命军》是其中的一篇，毛泽东会上讲到这篇文章时说：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船从重庆去武汉的途中，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你们办报的人知道邹容其人吗?”他接着介绍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他非常赞赏邹容那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说：章太炎入狱时，“邹容本来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言谈之中，无不流露出对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赞赏和惋惜之情。

毛泽东赞扬《革命军》一书，恐怕有这样几条原因：首先是《革命军》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这是向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的挑战，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其次，《革命军》的写作用的是浅近通俗的语言，秉笔直书，热情洋溢，使人易于理解，易于受感化，能够很好地达到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革命的作用；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书中昂扬着的革命斗争精神，与毛泽东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精神相共鸣。《革命军》中说："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并雄，不可不革命。"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者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在成都会议前夕，毛泽东还找了这一本书"望了一下"，并且在会议期间推荐给大家读，他的本意应该是要干部群众永远保持一种革命精神，革命热情，把革命工作干到底。这对于革命一生、斗争一生并且要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来讲是不难理解的。

《大同书》
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道路

在评述《大同书》9年后，在理论上找到了通往大同之路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中作了一次实现大同社会的尝试。不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彻底从《大同书》描写的空想社会模式中摆脱出来。

【毛泽东评点原文】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慧，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



康有为《大同书》手稿

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

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88－89页）

然则，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71、1476页）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

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这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184页－185页）

【作品介绍】

《大同书》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为宣扬其维新变法思想所著的代表作。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世代簪缨之家。少年时代，致力于科举考试，但经常以不喜欢八股文而名落孙山。为了求深造，他拜名儒朱次琦为师，学习经史。朱次琦主张济人经世，反对无用的空谈高论，力除汉、宋的门户之见，归宗于孔子，康有为深受其影响。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979年，开始学习西学，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西方改良思想。1888年他以布衣身份上书，阐述已经形成的变法思想。他广招学生，致力于维新理论的研究与宣传。1895年入京参加会试，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任章京上行走，主持变法，领导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百日维新

失败后，亡命海外。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他仍坚持改良立场，走向保守。

康有为不仅是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继承并发扬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对儒家思想进行新的解释和挖掘，为维新变法服务。《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便是其代表作。

《大同书》，是康有为阐述其政治理想的代表作，《大同书》写成后，康有为密不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康有为有生之年，只发表过其中的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到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大同之世，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如何走入这个境界，古代思想家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留下许多论述。康有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写成《大同书》。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是人类至善尽美的境界，是他经世的最高理想。在《大同书》中，他详细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理想社会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具体内容。

《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癸部　去苦界至极乐。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将《大同书》中的内容进行了概括：“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

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进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厂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的十部是康有为设计的通往“大同”境界的途径，又称“去九世”，去九世应从去家界开始。在康有为看来，家庭是丑恶之源，有了家庭，便有了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便产生祸乱。因此应消灭家庭关系，“无有夫妇、父母之私”。在家庭消灭以后，就会“国界日破”。“大同之运，不过百年！”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首先借用了《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把社会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之说，《礼记·礼运》描绘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而不必藏于己，为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不同。”康有为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

“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共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肯定工人具有高尚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他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二十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大地，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只有实现大同盛世，才能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大同书》中的许多议论不免荒诞无稽，但它表现了康有为寻求真理的热情，令人钦佩。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其目的在于托古改制，他在原有的儒家大同思想里，又糅进了耶稣教、佛教平等博爱的教义和西方哲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它的主线，空想社会主义是它的主题，但其思想中也有一些封建残余的思想烙印。此书对大同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洋洋洒洒20余万字，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同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

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它们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提出的社会主张，比朴素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大同思想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它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民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康有为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和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导“大同”学说，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　析】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轰动一时，有许多人都曾倾心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对康有为产生了崇拜之情。1910 年，毛泽东曾作文《言志》、《救国图存篇》、《宋襄公论》，因为文章写得好，在东山小学出

了名，同学们争相传阅，老师也颇为赞赏。其中《宋襄公论》是用“康梁体”写作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二十分，国文教员谭咏春看了以后拍案叫绝：“毛润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一百零五分。毛泽东曾对斯诺谈到这段往事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在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时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康有为便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毛泽东何时开始读《大同书》，现在还未确知。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慧，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与《礼运》中的“大同”说结合起来谈，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毛泽东此时当已读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只是1913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毛泽东读了《大

同书》后，便被其学说所吸引，开始接受其思想。

《大同书》中对大同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描述的都十分具体，毛泽东对这些描述很感兴趣。1919 年 12 月，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建设新村计划：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建设新村社会的计划，很明显是受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大同社会描述的影响。在《大同书》乙部，康有为力陈了有国家之害，主张消除国家，在世界建立一个公政府以统治各国。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受了《大同书》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主张废除家庭的思想，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虽然不像康有为那样把消灭家庭视为实现大同的主要关键，但他也强调要解决家庭与社会的矛盾，在 1920 年 11 月 26 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就提出要组织“拒婚同盟”，通过废除婚约来解决“家庭之苦”，“使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到解放”，后来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都受到毛泽东的极力称

赞。《大同书》中的其他许多主张，都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大同书》上说："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畜牧，沿海之宜渔盐"的提法，多年之后反映在《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

《大同书》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其思想多为空想，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对于《大同书》中的空想成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有一定认识，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的思想"。"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在批语中，毛泽东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毛泽东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同时，毛泽东也肯定了大同社会作为人类理想存在的意义，"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毛泽东在《论人民

民主专政》中对《大同书》的谬误理想提出了更深刻的批评："然则，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道路。"在批判了《大同书》中的空想成分后，毛泽东在理论上阐述了实现大同社会的道路，要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的阐述，指出了实现大同社会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使大同社会由完全的空想变为可以实现的理想。

毛泽东在理论上找到了通往大同之世的道路。但不幸的是，毛泽东在通往大同之世道路的实践上，并没有彻底从《大同书》所描述的空想社会模式中摆脱出来，9年之后，在理论上找到了通往大同之世道路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作了一次实现大同社会的尝试。在北戴河会议讲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1958年8月6日，在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之后第三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又到徐水传达中央要在这里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并且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并推荐给当地有关干部学习。《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形式、社会制度、工农业生产组织以及家庭婚姻形态的种种具体描述，其内容可能对人民公社某些制度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毛泽东的失败尝试，其代价之大，令人深思。（魏建震）

《一种清醒的作法》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写的研究东西方关系的著作。毛泽东看过之后，又将它推荐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这是必读之书。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他在书里看出什么了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64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

蒙哥马利是一位非常开明的西方军界要人，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他在牛津大学就东西方关系问题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他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他还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看法。《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就是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而成的。蒙哥马利有一系列政治、军事观点和战略、策略观点大都在书中得到体现。书中有些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

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和平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次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此点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试　析】

毛泽东一生读过很多外国人写的书，并写过不少批语。1960年6月21日他在读了蒙哥马利写的《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后，用红铅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少奇、恩来、小平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除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的。据忻中回忆，这中间，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我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请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午餐。毛泽东阅读过《一种清醒的作法》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他一直放在身边。1976年9月9日，工作人员开始整理他老人家阅批过的图书时才看到这个批语。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

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因为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却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毛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

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观点，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蒙哥马利插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蒙哥马利是一位很开明的人。1960年5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很有把握的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蒙哥马利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观点和战略、策略观点在他的《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都有体现。毛泽东重视这本书中的见解，除写下"很有意思，必读之书"的批语外，还在书中许多地方作了批划。在这本书中，蒙哥马利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

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和平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毛泽东在对这段话特意划了横道，最后两句除划了横道外，还划了一个大圈，在书页的空白处又划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两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这说明毛泽东对书中的观点很重视。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这本书是“必读之书”，并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读，原因在于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有很大帮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是意味深长的。

《论语》有一部分真理

《论语》是儒学经典，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部著作的评价，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致的。但总的讲还是一分为二，肯定其中有部分真理。我们对毛泽东对《论语》及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备地理解。

【毛泽东评点原文】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

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4页）

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科学就有数学……。

——摘自毛泽东与孔从洲等的谈话（见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第179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

【作品介绍】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之汇编。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典籍之一。


毛泽东在韶山私塾时读过的《论语》

论语之名义，历来有数说：（1）孔子言论之辑录。《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2）孔门弟子辑录所闻孔子之善言。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刑罡疏曰："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能，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3）记述孔子与弟子之有条理的言论。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4）孔子与弟子讨论文义之书。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以上以《汉志》之说为较妥切。

《论语》之名始见于《礼记·坊记》。南朝梁沈约以《坊记》

为子思所作，却无足证。王充《论衡·正说》认为“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又不可信。其名约出现于战国末至汉武帝间。其名称使用的确定，还在汉后。《论语》在汉代还有一些别名。或单曰《论》，或单称《语》，或别称为《传》和《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单称《论》的，如《隶释》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殁，诸子缀《论》”。单称《语》的，如《盐铁论》：“《语》曰：‘百工居肆’。”又《后汉书·邳彤传》：“《语》曰：‘一言可以兴邦。’”别称为《传》和《记》的，如扬雄（法言·孝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近人周予同认为其别称为《传》或《记》，当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详《群经概论》）。详称为《论语说》的，如《前汉书·郊祀志》：“《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

历来考证《论语》之编撰者，有下列诸说：(1) 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为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2) 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江汉郑玄曰：“《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见陆德明《经典释义·叙录》引与《论语音义》引）(3) 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李善注引）(4) 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唐柳宗元：“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论语辨》）(5) 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

称。”（朱熹《论语序说》引）(6) 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孝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一一引）。

以上诸说中，第4、5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张岱年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之说“很有道理”（《论语译注·导言》）。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的论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还是不以具体确指为妥。周予同认为“以《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论撰，其说虽失于泛，但尚不致于如何错误”（《群经概论》）。蒋伯潜认为郑玄之说不若程子之说，而程子之说“又不若《汉志》谓弟子各有所记，孔子卒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之为得也”（《十三经概论》）。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论语》中较少言“天”与“天命”。言“天”的，共二十处，言“天命”，凡三见。言“天”，大多为感叹用语，如“天丧予！”（《先进》）也有用以指主宰一切的“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也有用以指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阳货》）。“礼”在《论语》中共七十五见。反映了孔子对“礼”的重视。孔子主张“立于礼”（《泰伯》）、“克己复礼”（《颜渊》），“为国以礼”（《先进》）。但“礼”并非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其核心范畴为“仁”。“仁”在《论语》中凡一百零九见。《论语》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论语》中对“仁”有“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多种训释，其中以

“爱人”之训最为简明。“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统率“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诸道德规范。《论语》还提出通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子张》)，“能近取譬”(《雍也》)等方法来达到“仁”。所以朱熹曾认为“《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语孟纲领》)。《论语》树立了以孔子为榜样的儒家的理想人格。《论语》中用大量篇幅谈论以“君子”为修养之示准人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修己以敬”(《宪问》)。而其理想人格即是“仁”与“智”的统一。孔门弟子认为孔子即是仁智统一的体现者。孔子常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此“夫子自道也”(同上)。张岱年曾以“标仁智以统礼乐”来概括孔子思想的特点，此也可谓是《论语》一书之要旨。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佚，历来关于《论语》之源流的研究，仅上溯至汉。近有人对《论语》的原始结集本进行了探讨，有以下几种意见：(1)《论语》在先秦时期不只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孔门弟子升堂入室的有七十二子，那么“也应该有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可是颜渊、曾参等的本子没有流传下来，“于今，我们所见到的《论语》，乃子夏的笔记本”(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2)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各派所传之孔子学说，难为别派所承认，后由子夏主持结集成《论语》的原始本子。(3)先秦流传仅孔子言论零章散篇，至西汉时才删重补缀，集成一书(以上两说均见朱维铮《〈论语〉结集胜说》)。

《论语》在西汉，最初有《鲁论语》、《齐鲁语》与《古文论语》三种本子。梁皇侃《论语疏叙》引刘向《别录》说：

“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鲁论语》二十篇，为现行《论语》所据之本。《齐鲁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另二十篇中章句也较《鲁论语》为多。《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无《问王》、《知道》两篇，但分《尧曰》篇的“子张问”为另一篇，于是出现了“两《子张》”。此外，《论衡·正说》云：“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可知西汉还有《河间论语》的版本，由于其早佚，其篇章、内容已无可查考。

汉代还出现两种影响颇大的《论语》合编改订本。一为《张侯论》，由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混合《齐论》、《鲁论》，“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隋书·经籍志》）。一为郑注本《论语》，由东汉末郑玄合并《张侯论》与《古论》而成，并为之注，遂流行至今。

《论语》在汉代已有注本，相传孔安国曾为《古文论语》撰训解，但世不传。包咸、周氏为《张侯论》撰作章句。马融也为《古文论语》作注。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曾盛行于当时。可是这些注本早佚。其部分义释保留在魏何晏诸人之《论语集解》中。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郑注之辑佚本。敦煌千佛洞石室也发现有郑注之残本。

现存《论语》最古注本为魏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杂采汉魏经师八家之说，为研究《论语》思想的重要参考。魏王肃也撰《论语解》，与郑注故意立异，但今不传。《论语集解》中可见说之部分。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常采玄言佛语入疏，但可证《集解》所集诸儒之说。南宋时亡佚，清乾隆间

复由日本传入。宋代刑昺根据皇疏，蔚其枝蔓，辅以义理，撰《论语正义》，开义理说经风气之先。南宋朱熹辑集宋儒十一家学说，撰《论语集注》，重义理但也并非不注意训诂，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清代注本甚多，但以焦循《论语通释》较为精审，以刘宝楠《论语正义》最为详博。近代康有为《论语注》尊今文经学，其引证以今文学为主，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近人注本多不受汉学、宋学之囿，并注意诠释之简洁、通俗。其中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与钱穆《论语新解》流传较广。自古至今各种注本约有三千余种。

《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私人著书的开始。不过，它在先秦时期还只是诸子学说中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之言行集录了。秦时因“儒以文乱法”，《论语》也遭焚书之祸。秦亡汉兴，出现转机。汉文帝虽好黄老之学，但也曾置《论语》博士，《论语》开始列于学官。后又“置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赵岐《孟子题辞》）。汉景帝以后，鼓励民间献书，《论语》出现了三种本子，即《古文论语》、《鲁论语》和《齐鲁语》。汉武帝独尊儒学后，《论语》的地位日益提高。《论语》的三种传本在官府都有人传授。汉元帝时张禹为太子讲授《论语》，其所编的《张侯论》，随太子继位（是为成帝）其地位益尊。此时，《论语》被视为“五经之辖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即达到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的地步。东汉时被列为六经之一，后又列为七经之一（《孝经》名为经，但汉人称为传，后也被列为经，与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合为七经）。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刊印。元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此后《论语》文句变为八股教条。

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通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论语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改变。《论语》一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论语》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论语》的简朴精炼的文句结构与写作方法，也关涉到后来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典籍远播海外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秦汉期间，《论语》已传入朝鲜和越南。据日本史书记载，285年百济王子莽王仁至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此是《论语》开始由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日《大宝令》还指定《论语》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德川以后，为朝野上下广泛阅读，影响更大。中国久佚的皇侃《论语义疏》，也是由日本返入中国的。《论语》最早的西译本当推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出版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又有意、法、英、德、俄等文译本。《论语》对传播所及的各国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论语》所载的孔子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格言极为推崇，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现在海外不仅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而且致力于对《论语》现代意义的诠释与阐发。（夏乃儒）

【试　析】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如："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这之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出自《论语·学而》，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学习之道。"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再如：《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卫即生焉。然曾参孝点，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点，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

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克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这里讲的曾参、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毛泽东举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典型人物，有时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原因还是学习、理解、体会的不够。《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孔子尝言志点，曰，志于通，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这些话皆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些，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对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馆而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看来，《论语》中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17 年 4 月 1 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馆而馁，鱼馁而败，不食’；‘射于矍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仲尼取资于射御。”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

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论语》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没有忘记《论语》。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做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论语》中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本民族的历史遗产，这是毛泽东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的一番话，是他1938年在六中全会上做的政治报告中所做的回答。毛泽东充分地肯定了传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虽然没有点《论语》的名，但做为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与行为的这部儒学经典，无疑做为“珍贵的遗产”，是占有特殊的位置，是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上面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

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此后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问题又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批注，更加准确地剖析了孔子哲学"中庸"的实质。他写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

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及《论语》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6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

看法。”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及《论语》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象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林彪的政治路线于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里就不详述了。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及《论语》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与《论语》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老子》中有辩证法

毛泽东很欣赏《老子》这部道家经典中的辩证法思想，并称赞老子这个人很老实，搞阴谋，写在书上，并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例。他还曾饶有兴味地阅读中国哲学界讨论《老子》的有关材料。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

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93－794 页）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 295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老子》亦称《道德经》。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一口气提出了三个老子：一个是老聃，一个是周太史儋，一个是李耳。从总的倾向看，司马迁似乎肯定老子即老聃。他说老子是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字聃，曾当过“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今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较孔子年辈稍长。《史记》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关于周太史儋，司马迁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

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这就是说，老子是战国人，做过周之太史。不过，这种说法司马迁也不敢相信，他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今人罗根泽做了肯定的判断，认为老子即太史儋。关于李耳，司马迁拿出一个老子家谱，今人范文澜根据家谱判断，老子即李耳。

关于《老子》书是春秋时著作，还是战国时著作？是专著，还是编著？也有不同看法。罗根泽认为，《老子》是太史儋的专著，范文澜认为是李耳的专著，郭沫若认为是关尹编著。对于编著也有不同理解，《老子》书中掺杂有战国时人的语句，这是人们公认的。郭沫若一派人认为虽然《老子》书编著于战国，不免掺杂一些战国人的东西，但基本上是春秋末期老聃的语录汇编。冯友兰一派人认为《老子》书编著于战国，但不单是语录汇编，而是一种再创作，反映战国时人的思想。这是把老子和《老子》书分开，老子这个人是春秋末期的老聃，《老子》书是战国时老子后学的著作。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也有分歧：或者认为是唯物主义，或者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也有人认为是二元论。

关于《老子》所代表的阶级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或者特指为下层奴隶主，或者认为是农民，我们认为是地主阶级。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到了战国，封建制度先后在各个国家确立起来，社会主义要盾已经不是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矛盾。而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时也有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各个政治集团间的争夺，就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老子》代表地主阶级，但不是一般的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内部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

被打垮的那部分人。《老子》的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人的坎坷遭遇和绝望心理。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根源。《老子》的道是超形象、超感觉的观念性存在，是无。它写道：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持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

这就是说，道没有颜色，"视之不见"；道没有声音，"听之不闻"；道没有味道，"淡乎其无味"；道没有形状，"持之不得"；道无始无终，"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总之，道没有形象，不是具体事物，不是感官的对象，所以它"复归于无物"。这种东西只能是无。

道是无，但不是相对有的无，而是绝对的无。凡相对的无都是可以言说的，如某物的生死，即某物的有无；而绝对的无却是不可言说的，即"不可致诘"，"绳绳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正是说的这个意思。一旦有所言说，它就不是常道。

因为道是无，不是有形的具体事物，不包含差别和矛盾，没有任何规定性，所以《老子》又称道为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所谓"混"、"一"，都是一而不分的意思。

《老子》的道是无有的统一。

《老子》的无有的统一应该理解为在无中潜存着有，即在无中包含着能出有的契机。正因为在无中潜存着有，所以无又能出有，或叫做由无而有。在这里，有无不是具体事物的有无，而是一种逻辑概念；由无而有也不是有无的相互转化，而是逻辑的推导。无，有无限的意思；有，有某物意思。由于有无，所以才有有，有天有地，有鸟有兽，有草有木，等等。世界上有什么，它就有什么。有，没有确定内容，是有的一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

傅奕本"冲"作"盅"。俞樾说："《说文·皿部》：'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　'盅'训'虚'，与'盈'正相对。作'冲'者假字也。"（《诸子平议》）"道冲"即道是虚无；"盈"，满；"不盈"，不满的意思。《老子》认为，凡有形有象的东西，如盆盆罐罐，坑洼湖泊，都是有限的，总是可以装满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虚无，不管怎样装，也装不满。这似乎是用形象的语言描摩无限。"渊兮，似万物之宗。"它渊深广大，潜存着有，可以不断地生有，好似万物的老祖宗。正是在个意义上《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

由无而有，是就万物产生说的，同时也是就万物的存在说的，有无就有有的存在，也就是说，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当作"谓其"）所得以然也。"（《管子·心术上》）德，就是得道，万物得道而生，得道而存在。《老子》本文中这个意思讲得也很清楚：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九章）

“一”就是道，万物得“一”就存在，失“一”就死灭。所以《老子》接着说：

“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读如“废”，崩塌的意思）；神无以灵，将恐歇（歇息）；谷无以盈，将恐竭（山谷源泉枯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跌倒、垮台）。”（三十九章）

这就是说，万物得道则有其本质，就存在；失道则失其本质，就不存在。“天得一以清”之清，即天的本质，如果丧失了道，它就无法保持其本质之清，就会破裂。其他事物也莫不如此。

然而，为什么道能够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呢？按照《老子》逻辑，有形的具体事物是有限的，它不能成为自己存在的根据，物质的特殊形态如水、火、木、金、土等，也不能成为千差万别的万物的存在根据，只有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道或无，才能规定万物的存在。

“道常无为无不为”。（三十七章）

“无为”是道一个特征。所谓“无为”，就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作为，甚至不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老子》书中的“无知”、“无欲”、“不言”、“不事”、“不有”、“不恃”、“不宰”，等等，都属于无为的范围。一句话，道是一种没有任何主观能动的客观精神。无为是相对有为而言，是对有为的否定。按照《老子》的逻辑，有为就有所不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二章）这就叫做“道常无为而

无不为”。由此可见，“无为而无数不为”是由无而有的一种表现形式。

《老子》还有一个命题，即“道法自然”。自然是对无为的一种规定，也是无为的结果，说明道派生万物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不造作营为，任其自然。它写道：

“道生之，德畜这，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这就是说，道之生物，德之畜物，物之形物，势之成物，都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莫之命而常自然”，没有谁下命令，永远是自然而然的。

《老子》把道规定为无，反对用物质的特殊形态铸造万物，如果不愿意使自己的哲学体系陷入自相矛盾的话，就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成。所谓无不为，并不象“全能”的上帝那样，创造世界的一切，而是任万物之自为。

在《老子》那里，道不包含有差别和矛盾，万物却包含有差别和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阴阳、刚柔、强弱、大小、美恶、善不善、祸福、长短、高下、前后等，都是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包含而又互相转化。关于对立的相互依存，《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

这就是说，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

后等，每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必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一方不存在，对方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据。

关于对立的互相包含、互相转化，《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祸福互相依存，互相包含，并因此引出两者的互相转化。

对立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老子》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比如对待敌人，则促使其向对立方面转化。

"将欲翕（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

既然翕张、弱强、废兴、夺与之间可以互相转化，那末，欲翕必当姑且张之，欲弱必当姑且强之，欲废必当姑且兴这，欲夺当必姑且与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竭力把敌人推向极端，置之于不道之地，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微妙策略。对待自己则防止其向对立的方面转化。《老子》书中的"守柔"、"守雌"、"守辱"等都是为了防止转化。一般地反对转化是错误的，但不是一切防止转化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在一定质的限度内，在没有可能发生质变的条件下，为了保持事物相对稳定性，防止转化，还是正确的。在这方面，《老子》有很多精采的议论。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这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六十四章）

这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慎终如始，循序渐进，反对违背自然和过分有为的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老子》把防止转化的普遍化、绝对化则是错误的。

《老子》把道作为认识的对象。《老子》认为有形的具体事物是可以感觉的，道则是超形象、超感觉的，并且认为感性认识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道）的。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又怎样获得对道的认识呢？这就是心观，即不通过感觉器官，直接用心去观。心的状态如何，对于能否认识道关系极大。因此《老子》提出“涤除玄览”、“致虚守静”的问题。“涂除玄览（指镜子），能无疵乎？”（十章）这是以镜喻心，使心如明镜，没有瑕疵，一尘不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致虚极”，至于虚无到极点，即心中无物的意思。“守静笃”，固守清静到纯一的程度，即不为外物所动的意思。总之，不论是“涂除玄览”，还是“致虚守静”，都是为了排除感性认识对心观的干扰。在《老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万物生长变化中“吾以观复”，从万物始于道又复归于道的循环往复中把握永恒不变的道。

“塞其说，闭其门，终身不勤。”（五十二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

这就是说，闭目塞听，不出大门，便可全知天下事；相反，与外界事物接触越多，知识反而越少。一句话，只有取消感性认识，才能把握道。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脱离了感性认识，所谓认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子》所谓心观，不过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观，实际上取消了任何认识。这和它宣扬的“绝圣弃智”，“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蒙昧主义是息息相通的。“知常曰明”，不是教人聪明，而是教人糊涂，“如婴儿之

未孩”，象尚未会笑的婴儿那样，天真无瑕而又愚昧无知。

战国期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解体，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成倍地增长，科学文化也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老子》以敏锐的观察力揭露了这些矛盾：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

在《老子》看来，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篡夺、盗贼、道德败坏、种种罪恶的根源，不在社会物质生活中，而在于人们的有为，在于无止境的贪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八章）

然而，出路何在？《老子》是不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即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这样社会里，人民无知无欲，虽然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但却不自以为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虽然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却废而不用；虽有舟车，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有武器，也没有用处。取消文字，“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国家小，人民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这是一个闭塞、落后、愚昧的社会，而《老子》却认为是一个无限美妙的乐土。妄想返回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反动的。但却不

象一些人所说，这是退回到奴隶制，而是出于对现存社会的愤恨、绝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狂想。

《老子》书仅五千言，是一部深刻的哲理诗，包容着极大的智慧。《老子》的道是脱离物质世界的绝对观念，是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核心；但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却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展。它表明《老子》已经不满于对有形的具体事物的东西。其次，它不象元素论那样用物质的特殊形态，而用超出一切具体事物的道来解释万物的本原。所有这些都说明，《老子》的作者的抽象能力比他以前的哲学家都高。《老子》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特别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更为人们所乐道。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接触到过一些对立统一思想，但多半是就事论事，从没有象《老子》这样把它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作为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老子》作者的失足之处，也为人们留下有益的教训。

《老子》这部书对中国哲学、文学、道德、政治、军事等都发生过巨大影响。由于《老子》书瑕瑜并见，一些不同倾向的思想家都把它当作形成自己哲学的思想宝库。（卢育三）

【试　析】

毛泽东是从何时开始阅读《老子》这部道家经典的，现在很难知晓，但他从青年时就开始阅读并熟知是可以肯定的。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最好的

《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汤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可见毛泽东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见诸于《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第十九章，还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社会政治主张。老子的这种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毛泽东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

毛泽东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

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中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评述的。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光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匈牙利事件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据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估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在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

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

>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提交给他的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10份

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 1968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据分析，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老子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

《中庸》里有为学之道

毛泽东读书往往抱有双重目的，其一汲取思想资源；其二学习治学方法。对《中庸》的研习，一方面使他批判地吸取了中庸范畴所表达的“无过无不及”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使他认识到博学作为为学之道之于求知的重要性。

【毛泽东评点原文】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

【作品介绍】

《中庸》是“四书”中的一部，是儒学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兴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愤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于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

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去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在封建社会中，人都处在一定的伦常关系之中，《中庸》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必须依照这些关系要求的规范去生活。"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经"，"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所谓"求"，所依据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标准和要求之下，封建社会的人们都须安于其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们之"修道"，达到这样的道德自觉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自然可以巩固起来，封建社会秩序自然得以稳定。

如何才能形成道所要求的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呢？《中庸》继承孟子思想，强调"诚"对于修道的重要意义。

"诚"可以说是《中庸》的核心范畴。它既包涵有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真诚执着的意思，又包涵有道德为达到高度自觉境界的意思。《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谋，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通过对诚的道德实践的阐发，《中庸》强调指出了诚之对

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诚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为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十分强调所谓"诚之"，即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精神。《中庸》讲"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反强调"诚身"、"诚其意"。并指出"诚身有道"，而这个道既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要实行此道则应"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而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要求人们以千百倍的努力和工夫去体认和实践"天道"，以求达到合"道"的境界。

《中庸》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由上述《中庸》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以人的道德修养为主旨，看重对内在人性心灵的形而上的开掘。并以主观内在的道德修为为决定性的关键环节，贯通了先验本体与情感心理，"天道"与"人道"，客观的外在运动与主观的内在修养，从而将个体内在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统一起

来，形成一种以“修身为本”，以个人的道德品质为本原的决定性因素的世界观和政治伦理观。这显然是对原始儒学德治主义或人治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因为《中庸》以内在心性的探讨和开掘为其基本特征的致思理路，所以受到后世理学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被视为儒家的精义所在，成为后世理学的理论先驱。《中庸》因此便由秦汉之际儒学学者的众多著作中的一篇论文，而被提升到儒家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而且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研究的一部基本文献之一。

【试　析】

1914 年春至 1918 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这四年半的时间，是毛泽东求学精进的岁月，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致力于奠定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通过大量的读书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哲学伦理思想和文化观。

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十分注意就治学问题向当时任教于该校的湖南学界名流如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请教，聆听教诲，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有效方法。

除了向各位老师学习治学方法之外，毛泽东还经常与同学朋友探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罗章龙曾回忆毛泽东与他探

讨治学问题的情形，他说：润之与我在定王台交谈，“最主要是治学问题。因为教育制度不好，治学在青年中是个难题。”“他强调原因是学用不符，读书与社会实践脱节，这就是重大问题。”（《回忆新民学会》）这期间，毛泽东在与同学和朋友的通信中，也大量地讨论读书治学的问题。

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经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关系，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主体意识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主体素养，以臻理想的道德境界。《中庸》所倡言的

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为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而如饥似渴，精进不已地追求知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识，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这封信所言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熹《大学章句》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论述了儒家“修齐治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格物致知”属“修身”的范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命题，也是儒家的为学之道。然而对这一命题的涵义的理解历来不一。根据朱熹的理解，“格物”就是即物穷其理，“致知”就是充广知识。“格物致知”也即通过努力穷究事物之理，而扩展、充广、丰富主体的知识。朱熹在补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究 其理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熹的话，表明他赞同朱熹所阐扬的儒家为学之道，强调要获得真知，就必须广泛深入地学习探究，辨别事物表里精粗，穷尽事物之理；而治学以博，不仅在求知，更在提升心性境界，即如他在这封信中所言：“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举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涵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毛泽东接下来所引孔子“博学于文”语，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久，约之以

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古之贤人圣哲所遗之文献，并以礼自我规约，如此亦可不违于道。另引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见于《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即广泛地学习，详尽地解说。目的是要融会贯通，而后再来简明扼要地阐发大义。在上面的广征博引之后，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是读书人应该遵循的为学之道。

毛泽东征引《中庸》、《大学·章句》、《论语》以及《孟子》的有关论述，意在说明其博学的主张是见证于古之圣贤的，从而强调“博学”的必要性，并使其观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在此，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之一斑。

在处理治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博”“通”与“约”“专”是相辅相成的，由博返约，由通而专，没有广博宏容的知识积累，便很难对学问有精深的造诣。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给湘生的信》1915 年 6 月 25 日）在他看来，这是治学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知识的拓展和积累，认为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奠定厚实的学问基础，才会有所创获。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象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

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扰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了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涯。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对毛泽东一生的心灵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封信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幼年就开始读《中庸》了。毛泽东后来曾谈到他幼年读《四书》、《五经》的情形。1936 年，他在保定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谈及这一点，他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 6 年。背得，可是不懂。”《中庸》为“四书”之一，毛泽东读“四书”自然包括《中庸》在内了。

成年之后，毛泽东重新研读《中庸》，并多有心得，对该书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精辟。如在其 1917 年所著《体育之研究》以及《毛泽东选集》中，《中庸》一书曾被多次引用，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析。而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他对该书所阐发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评说。

1939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自己的观点。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

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对此，毛泽东指出："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中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接下来毛泽东从他对《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理解议论开去，认为"两端""即是指'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原来状态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为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中庸，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等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义。孔子最早把中与庸合称，使用中庸一词。《论语·庸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即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它是一个最佳尺度。中庸之道所要求的就是，人在日常的立身行事中，应随时合乎中道，不偏不倚，不乖不戾，以达到中正平和的境界。这正是朱子《中庸章句》释中庸所言："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两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即子张，商即子夏，都是孔门弟子。两人除丧后，去见孔子，都弹了琴。子张显得快乐过份，子夏则是显得余哀未尽。二者比较是不是过份要好一些？孔子指出，"过犹不及"，即过份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二者都不足取。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子张或子夏，都未能依中道而行，合乎"中庸"这个最佳尺度。

中庸在儒家学说中，主要是作为道德范畴而被阐扬的，是作为道德标准而被表彰的，但是，其所包含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也使其具有了认识论意义。中庸观念承认事物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矛盾，而且看出了矛盾双方片面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由片面发展而导致的对事物的稳定性的破坏。因此它反对片面性，也即反对'过'和'不及'。而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就是说要在两极对立中；发现和把握统一性，维持事物发展的合适的度。这应该说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读罢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后，对陈伯达关于"过犹不及"的思想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

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的评价，表示赞同，并认为中庸观念“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在肯定陈伯达对“过犹不及”的解释的同时，又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足”的。他认为，“过犹不及”不仅是一个哲学认识论上的观念，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从而便突出和彰显了“过犹不及”作为思想方法的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其次，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质量互变的原理，对中庸观念中的“过”“不及”的概念进行了解析，并由此对“中庸”作出新的阐释。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包含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事物尚处于量变阶段时，它便保持着原来的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而当事物的量变过程达到一定的程度，其相对的稳定性便不能维持，就会发生质的改变，由一事物转化为另一种事物。毛泽东认为“过”和“不及”就是未能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当事物仍处于量变阶段，也即是说，事物的量的变化并没有达到足以引起其质转化的程度，事物依然维持其原来的状态，而没有成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时，却“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人的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这是“过”的表现。而当事物的量的变化已经引起质变，事物原来的状态被突破，发展成为具有一种新质的事物时，却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这是“不及”的表现。据此，毛泽东对中庸范畴作出新的解释：“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

庸”，或“时中”。这即是说，要从量的规定性上为质“设立界限”，确立一事物区别它事物的量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才能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做到“无过无不及”即中庸。同时，由于这个标准所体现的是一定质的事物在量上的规定性，也即量的限度，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因此，标准的确立就意味着必须从量的发展变化之中去确定和把握事物的质的规定。这样毛泽东便赋予中庸观念以发展的意蕴，并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对立己说的意思为多。”因为孔子讲：“礼所以执中也。”将“礼”作为“执中”的标准。再次，毛泽东强调充分理解中庸观念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在理论上正确解释中庸观念的内涵固有必要，但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他还用现代政治语言去表达“过”与“不及”概念：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守旧顽固”，右倾。提出了其既反“左”又反右的政治主张。

在这封信中，虽然毛泽东指出了孔子的中庸观念的缺陷，但总的来说，他对中庸思想在理论上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并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然而，值得注意是，大约半年之后，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939 年 5 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一书。在该书附录二“研究提纲”中，艾思奇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不是折衷主义，并认为有人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折衷主义是不妥当的。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庸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的缺点。毛泽东不同意艾对中

庸思想的看法，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份，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毛泽东还写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364 页）毛泽东在这里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毛泽东上述两处对中庸思想的不同评价，首先要归结于中庸思想本身的两重性或者说其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中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事物包含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相互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事物的量变和质变，常态和变革。因此，它包含了不少的辩证法因素，尽管不能说它就是辩证法。而另一方面，中庸思想也确实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尤其是孔子讲："礼所以执中也"，认为"礼"就是"中"的具体规定，"执中"就是要以"礼"为标准。而他所谓的"礼"就是"周礼"，也就是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因此，孔子讲中庸，其根本旨趣就是要维护奴隶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不使其变革。"所以他的思想总起来说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他的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为其形而上学思想所掩盖了。"（冯友兰语。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124—125 页）如果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主要是分析和阐发了中庸思想中所含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那么，在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中，则主要是批判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

看法。而且通过毛泽东的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作为儒家思想基础的中庸观念。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中庸的前一种评价，更多的是关注其理论价值，揭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其阶级性，指出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作用。分析的切入点不同导致了两次评价的差异。其实，在学术界，对中庸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向来存在着很大的分析，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至今不能达成一致。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张平）

《庄子》中有真理

对《庄子》这部集中反映道家风貌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爱。他将《逍遥游》中鲲鹏的形象入诗，用来表达自己的高远志向与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还从中挖掘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以启发当代科学的研究。

【毛泽东评点原文】

庄子讲“一尺一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不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也是无限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与周培

源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 32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踬踬失度因而颠蹶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引者按：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摘自毛泽东《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607 页）

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引者注），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摘自毛泽东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67 页）

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摘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4—135页）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

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摘自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作品介绍】

《庄子》一书，和其他先秦诸子书一样，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的是庄周自己写的，有的是经弟子整理的庄周的讲话记录，有的是庄周后学的作品，还有的甚至是与庄周学派无关的其他学派的著作。《庄子》现存三十三篇。汉以后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古代内、外篇划分不十分固定，但现在的《庄子》内篇，倒是经过整理，把一些唯心主义观点十分明确的论文集中起来，编为“内

篇”，传统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的自作，或代表庄周的思想。本文介绍《庄子》一书的哲学内容主要依据内篇。

庄子（约前369—前286），姓庄，名周，战国时蒙人（现河南、安徽交界处），他和孟子同时而稍晚一些。他的朋友不多，门徒有限。当时学术界的名人只有惠施同他经常往来，进行辩论。他在家乡曾一度当过漆园吏。但是，大概没过多久就归隐了。

庄周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在各诸侯国普遍确立，奴隶制已彻底瓦解。奴隶主贵族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痛苦至极，又无力扭转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就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否定现实世界，寻求所谓的精神解脱，幻想出一个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庄子》一书的哲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世沉浮，玩世不恭的消极颓废和没落绝望的情绪，维妙维肖地表达了这一没落阶级的内心世界。《庄子》哲学把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把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发展为相对主义，并以此为认识论基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为战国时道家的一个重要流派。

《庄子》继承了《老子》思想，把“道”作为它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所不同的是，《庄子》把“道”主观主义化了，由《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庄子》和《老子》的看法一样，认为是“道”。“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师》）道自为本，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原，在天地万物未出现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宇宙是一大空无，“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空间有了，但其中没有东西。“有长而无本

剽（标）者，宙也”。时间有了，但其中没有有始有终的事物。这个空无所有的东西是万物的总根源。“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天地虽大，也不过是有形之物，生天生地的却不是有形之物。所以说：“物物者非物”，使物成为物的东西，其本身不是物。这个东西“惛然若亡（无）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知北游》）这个东西，“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这个东西就是“道”，这个“道”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但它又是无形无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始终在传递着，可是它又不能被具体接受。因此，这样神秘的“道”即不能用感生感知它，也无法用理性来认识它，而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会它的存在。

《庄子》认为，如果把世界看成是物质的，那就必然要有所区别，这样就会产生是非，引起互相竞争，辩论不休。因此它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意思是说，只有把世界看成从来就没有物质的“道”，才可以说是对世界最高的最完善的认识。《庄子》把“道”也称为“真宰”。由于它是绝对的精神本体，因此，它是没有内在矛盾、清除了对他物依赖的东西。所以说，“道”是“无待”的。而“道”又是虚无的，因而也是“无己”的。人之所以有痛苦，不“自由”，就是因为他们把世界看作物质的，“有待”的，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有所依赖，有所期待，有所追求而造成的。大鹏奋飞“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可谓“自由”了，但它必须借助大风才能飞行。如果“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也算不得真正自由。再如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比一般人走路“自由”多了，但是，“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还不能做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变），以游无穷”，（《逍遥游》）就是讲，要乘着“道”（天地之正），驾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才算获得真正绝对的自由。只要“有所待”，就不能绝对的自由。那么什么人才能得到这种自由呢？那就是“无己”的至人，“无名”的圣人，“无功”的神人。做到这“三无”，就达到“无所待”的境界，可以作逍遥游了。这里《庄子》割裂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完全否认客观必然性的“自由”。脱离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讲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不受某种客观条件和内在规律的制约和支配，不可能“无待”，因而也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自由。因之，《庄子》只好运用精神的魔术，在幻想中否定现实世界，在冥想中消除“有待”，达到“无待”，完全泯灭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把世界融为精神的领域，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路线。

《庄子》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取消客观事物的一切是非差别，排斥人的认识的可能和必要，从而陷入极端怀疑和相对主义诡辩论。《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这是说从“道”的观点看问题，物是没有贵与贱的，然而从“物”的观点看问题，那总是以为自己贵而别物贱。所以《庄子》写道：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你从事物大的方面去看它的大，那末万物没有不是大的；你从事物小的方面去看它的小，那末万物没有不是小的。同样，事物的有和无，是和非，也都决定于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它。于是《庄子》结论道：最小的东西，象兔子身上的毫毛，也可以说天下再没有比它大的东西了，而泰山可以说是小的了。历来传说中最短命的殇子，也可以说是最长命的人，而传说中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反而可以说是命短的。这就是说，"是"或"非"是依认识主体的感觉经验如何而定，而感觉经济各不相同，从而是非标准也各各相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 这就完全否认了是非的客观标准。于是究竟谁是谁非永远也搞不清楚。是非无法判断，因此，他的结论是不可知的。《齐物论》中论证说：我与你两个人进行辩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一定对，而我说的一定错呢？同样，又怎么能肯定我说的一定对，而你说的一定错呢？我与你是无法判定的，即使请出第三者来，也无法判定。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没法断定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无法断定谁是谁非；所以说，无论谁也无法判断谁是谁非，是非永远也搞不清楚。

《庄子》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不可靠的，真理是不可知的，因此完全否认认识的可能和必要。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意思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必然要失败。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去追求知识，搞清是非，那就是"道"的亏损，结果会自己陷入无穷的喜怒哀乐的烦恼中去。既然追求认识是不可能的，

不必要的，因此《庄子》进一步提出："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即毁弃自己的肢体，抛掉自己的聪明，离开自己的本性，忘掉知识，这样便能和大道融为一。知识不要了，聪明不要了，连自己的肢体也要毁弃，极端的不可知论，走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可见《庄子》哲学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的起点，割裂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不承认相对中有绝对，从而陷入不可知论，作出了许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结论。

《庄子》写道，天道是无为的，人道也是无为的。《老子》所描写的"小国寡民"的蓝图是宏伟的，但是还不壮观，更为壮观的是"至德之世"。"至德之世"是个什么蓝图呢？是个"同与禽兽居，族与百物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马蹄》）即人类和禽兽同住在一起，与万物同聚在一块，成为人兽不分，人物无别，大家都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的毁灭社会制度的浑沌世界。这个浑沌的"至德之世"，是庄子竭尽心力向往的理想世界。

《庄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更加倒退。它否认一切文化知识，反对生产技术的进步。它认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掊（pǒu）斗折衡，而民不争。"（《胠箧》）在《庄子》看来，社会上的人有了文化知识，才会引起互相争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所以社会上要做到没有圣贤才智之人，大盗才能肃清。要把计量容量的升斗砍破，把计量重量的秤杆折断，这样计量标准没有了，人们就不会去争多论少了。表面上看来，这是防止社会争端的方法，其实这是老子愚民政策的继续。它要人民"愚而朴"（《山木》）来保持所谓"真性"，就是要让人民以及新兴的地主阶级无知不欲，经

缓和迅速灭亡的没落阶级的命运。《庄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本质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

《庄子》一书是一部中国古典要籍。它的哲学思想在漫长的中世纪的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主要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情绪，所以经常成为政治上失意的封建士大夫寻求精神上自我安慰的思想资料。封建统治者也常利用《庄子》思想来标榜自己清高和“无为”、“无治”，以麻痹劳动人民。

另一方面，《庄子》思想中某些对封建道德制度的批判和天道自然无为等思想资料，也经常为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农民起义军所利用，但这个利用是批判的利用。另外，也有些知识分子利用《庄子》的“绝对自由”来作为对抗封建专制的精神武器。虽然，这些对抗是消极的，但是，毕竟是不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庄子》哲学的这些作用，大概是庄夫子本人无法估计到的。（肖　力　王葆元）

【试　析】

对《庄子》这样一部集中地反映道家思想风貌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非常熟悉。

1917年，毛泽东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暑假时，他与好友萧子升进行了一次游学，以此来阅读社会这本大书。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位声望很高的刘翰林家，在与刘翰林的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注的，最

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

看来，毛泽东不仅读过《庄子》，而且很熟，并且比较过后人注释的各种版本。这一点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交往、作文、笔记中也能看出。1915 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 年 4 月 1 日《体育之研究》里，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在 1917 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 年下半年至 1918 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佝偻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在 1913 年写的《讲堂录》里，毛泽东在读魏际瑞(1620—1677)《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的笔记时，曾随手用《庄子》里的叙述来解释有关字词：

蜚蛆　蜈蚣也，食带眼。

带　蛇也，蜚蛆食其眼。（引者按：《庄子·齐物论》有“蜚蛆甘带”。）

鸟憎西施威也　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举动入，鸟见之高飞。（引者按：见《庄子·齐物论》）

浑沌氏　《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儵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讲堂录》里，还有直接读《庄子·逍遥游》等篇章的笔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是指悠闲自得、无拘无束的样子；游，在这里指人的交往与处事。作者在篇中借助鲲鹏横空出世、高翔远举的形象，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的人生追求。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与物“无待”，即摆脱与周围事物的对立与依存的关系。前文引述的 1913 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述的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的文字，表明他从庄子的议论中，通过

水与舟的关系，引申出了一番人生道理。这即人的能力与他担当的任务和职位要相称；人应当厚积而薄发。他以李鸿章为例，虽然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所圣有功”，但这只是象杯水载草介之舟；但在后来的掌管国事时，却着着失败，原因在于“水之积也不厚”，大舟难免搁浅。毛泽东提醒浅薄的不自量力的人要引以为戒。

对《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毛泽东非常喜欢，经常加以运用。如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军队已经不是小麻雀了，已从小麻雀发展成一个翅膀就可把中国扫得差不多的大鹏鸟，最终扫尽全中国。此外，毛泽东在他写的诗歌中，也多将此形象入诗。

最早是1918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稊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激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象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鴳”、“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

1965年秋，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感情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

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鴳小雀。

毛泽东喜爱并引用的不只是《逍遥游》一篇。1963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给李讷的信中就说，读了庄子的《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见前面所引）。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以上部分材料参考了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的有关内容）。

1934 年 10 月 18 日傍晚，毛泽东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据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回忆：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并不熟悉中国的古籍，他说毛泽东引的是老子的话是不对的。这段文字实际上见之于《庄子·养生主》。在这篇里，庄子讲了一个寓言：“庖丁解牛”，以说明做事要依乎天道，依乎刀物本身的固有规律，“缘督以为经”，“以无厚入有间”。毛泽东在这里引庄子的这段话，可能是要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1965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

析，都要按照辩证法时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1966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了几位哲学工作者畅谈了许多哲学问题。之前，他看到了1963年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登载的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毛泽东非常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他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里的话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并明确地表示《庄子》中的这个观点是真理，这是对《庄子》一书价值的肯定和赞扬，也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古为今用，点石成金。

《墨子》——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称赞他在中国找出了赫拉克利特，即墨子。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墨子》一书又是如何成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1939年致陈伯达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页）

【作品介绍】

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书·文艺志》著录《墨子》为七十一篇，现存为十五券，五十三篇。大部分篇章都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材料。其中《经》上下一说是墨翟自作，一说《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亲士》、《修身》、《所染》系后人伪作。

墨子（约前468—前376），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自称“贱人”，（《贵义》）巧为车辖、兵器，其阶级地位属于小私有者阶层。后成为“载书甚多”，博通经典的“士”，自谓“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不无耕农之难”，（《贵义》）所以，有条件读书治学。相传他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烦琐的“礼”而抛弃儒学，创立子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学派，即墨家。

墨家是一个较严密组织的学派性的政治团体，其首领称作“巨子”，成员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他们是墨子学说的鼓吹者和忠实的履行者，生活艰朴，“以自苦为极”，穿着短衣草鞋，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战争。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代继孔丘之后的第二个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一开始是以孔丘和儒家的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儒墨两家相互驳难，揭开了先秦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序幕。到了西汉中期，墨家由战国时的“显学”地位，逐渐湮没不闻，成为绝学。

《墨子》一书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亦有丰富的政治、伦理、逻辑思想。它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它所谓的“利”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尚贤上》）做到这一点的人，它认为就是“仁人”，反之，则是“恶人”或“贱人”。

《墨子》认为，人民不但要求生存温饱，而且要求幸福，但是，许多统治者对内役使人民很劳苦，剥削人民很厉害，使无数的人民冻死饿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使无数的人民病死战死。因此政治上的“交相恶”的混乱局面，即“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兼相爱》）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

《墨子》认为，解决这个最大祸害的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这就是《墨子》一书的“兼爱”思想，是它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墨子》提倡“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作为基础和基本内容的。它写道，只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才能真正实现兼爱的原则。它写道：

“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

爱中》）

只有人人相爱相利，爱人如己，不要厚己薄人、损人利己；做人君的，只要能做“兼君”，“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兼爱下》）这样就会“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和调”、“强不执弱”、“贵不傲贱”，“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一句话，这样就可以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兼爱”的天国，消灭社会上相互残杀的现象，达到天下太平的局面。《墨子》认为儒家的“爱有差等”是不对的，因而大力提倡“爱人犹己”。实质上《墨子》的这种观点不过是小私有者阶层企图摆脱残酷现实的幻想罢了。

把“兼爱”的原则推广到设官治事上，《墨子》主张“尚贤”。“尚贤”是墨家“为政之本”的思想，直接反对西周以来的宗法礼治传统。西周以来的宗法礼治的原则是以血缘关系作为贵、贱、贫、富的标志，而《墨子》则是把“贤能”与“不肖”作为上、下、贫、富的标准，主张改变“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原来出身微贱，但有智慧才干的人参预政治。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上》）使得那些虽有“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墨子》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要求改善经济地位和参预政权的愿望。

《墨子》“兼爱”的社会政治思想立论的基础是唯心的，它所希望和祈求的是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发善心，这只能是空想。

《墨子》提出了“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它能赏善罚暴，能爱人憎人。所以，说到底，《墨子》的这个天实际上是墨子所代表的小生产者意志的

化身。它写道：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

《墨子》通过宗教形式，借用天的权威，作为实现“兼爱”主张的思想武器。

有意志的天就是上帝，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天子。《墨子》根据“上同”的原则，提出了“上同而不下比”的命题，指出各级统治者要逐级上同于天子，但仅仅到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求天子上同于天。只有天的意志才是最高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最高的和最后的标准。须要指出的是，《墨子》虽然尊崇“天志”，但却“非命”，认为富与贫、贵与贱、寿与夭都是人力可以变动的，而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在理论上提出了“力”来对抗“命”。它写道：

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

意思是说，人们发愤图强，就必然富足，不自强努力，就必定要贫寒；人们发愤图强，就必然温暖，不自强努力，就必定要寒冷。《墨子》的这种“非命”主张，打击了世卿世禄的旧势力。但是，由于小生产软弱的本性，始终不能摆脱那幻想出来的强大靠山——有意志的天的支配。虽然抛弃了命定论，却接受了尊天、明鬼的宗教思想。《墨子》把尊天和非命包容在一个思想体系中，这就形成了思想体系的无法摆脱的矛盾。

《墨子》把“鬼”借重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一方面做为实行“兼爱”社会政治思想的具体保证，希冀上天能限制贵族的特权，对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统治者，都能根据小生产者的利益，实行公平的赏罚，否认人的贵贱智愚是由命运决定的，是人力不可改变的，从这一方面说，它对传统的以天命为中心

的宗教思想有所修正，反映了劳动生产者从事生产劳动以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的要求，幻想上天限制贵族的过分贪婪，选择一个好天子来保证他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上天主宰一切，多方面证明鬼神的存在，认为天子是上天所任命的，是代天治民的，这样就仍然维护了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秩序。人们对一切剥削和压迫，只能借助于“上天”、“鬼神”的威力，来说服各级统治者发善施恩。从这一方面来说，《墨子》并没有完全摆脱以天命为中心的宗教思想，从而成了麻痹劳动者的精神鸦片。这是《墨子》哲学思想中的糟粕。

《墨子》认识论的观点是唯物的经验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墨子》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人们的感官所能感觉的客观实际。《墨子》写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无）为仪也。请惑（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下》）

这里所说的“有”即客观实际，“闻”与“见”就是感觉。意思是说，人们通过感觉来认识客观实际，能够“闻之见之”而得到的东西，是真实可靠的。反之，“莫闻莫见，没有被人的感觉所反映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墨子》的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墨子》反对认识可以不通过感性的说法，这是唯物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是不够的，会陷入另一片面性。其一，它的认识论仅停留在感觉阶段，对于假相与真相、正确的感觉与错觉是难以分辨的。它曾把假相、错觉当作认识的前提，得出过错误的结论。如《墨子》中，就以为

有人见过鬼，听见过鬼的声音，从而就确定鬼的存在。其二，《墨子》的“莫闻莫见”，“无从感知”，‘必以为无”也并不是科学的。因为有些事物是无从感觉，但不能因无从感觉而说它是无。

其次，《墨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名”和“实”的关系。它指出，“实”（即客观实在）决定“名”（即名称、概念），“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是反映“实”的。它反对“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认为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就不是真正的知。它写道：

“今瞽者曰：‘钜（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取舍辨别）也。”（《贵义》）

这是说，盲人只知黑白之“名”，而不能区分黑白之“实”，不能认为是知黑白的。因此，它批评儒家象瞎子一样，不懂得什么是“仁”，“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这一“以实证名”的观点，充分表明了《墨子》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立场。《墨子》从这个立场出发，进一步提出区别言论真伪的标准问题。尽管它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把这一认识论的重大问题提到认识史上来也是难得可贵的。《墨子》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出并试图解决真理标准的第一本书，它写道：“言必立仪。言而毋信，……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非命上》）“仪”，又叫“仪法”，就是标准。所谓言必立仪，就是判定言论是非必须确定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三表”。它写道：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

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保用之？废（同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同上）

“三表”又称“三法”，即三条标准。所谓“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明辨是非要以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所谓“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明辨是非要以考察百姓耳目见闻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以上两“表”所涉及的认识论问题，仅指古今经验的东西，还不是直接的实践，实际上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重要的是第三“表”。《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还要看“刑政”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当然，《墨子》中所讲到的“废以刑政”，只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它所说的“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也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因此，以此作为真理的标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但是，《墨子》一书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认为鉴别是非，就要使言论见之于行动，验其功利，观其效果。发前人所未发，是对我国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墨子》一书，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是“非命”说和具有经验论特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糟粕，这样形成了《墨子》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势必促使墨家思想的分化。后期墨家摒弃了《墨子》哲学思想中神秘主义成份，克服了其中某些弱点，对《墨子》的思想作了重大发展。（肖力）

【试　析】

毛泽东对《墨子》的评点，是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

1938年，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注意研究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39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分别就孔子、老子、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了3篇论文，并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其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39年《解放》第63、64期合刊，《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同年第69期，《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1940年在《解放》第82、102和104期上连载。

这些文章，毛泽东不但认真读了，而且提出了重要意见。

陈伯达写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在发表前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陈论墨子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如陈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泽东对墨子评价较高，认为他是一名劳动者，比孔子还要高明，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

特。这是一个很新颖也是很高的评价。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484年），生于爱非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从对自然的观察出发，在“逻各斯”中试图发现世界的本质。但“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的眼中与一定的物质基质相关联。他在事物无休止的变化中，看到宇宙的普遍规律。认为世界是否不断变化的，总是会发生新的改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在流动中，不存在永久的东西；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中。由于不断地变化，一切事物处于不断从一种状态向它的相反状态转变之中，并且自身包含着对立，并在对立中保持平衡。互相排斥者结合在一起，相反者相以对立形成统一。

陈伯达在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墨子也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空间和时间都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也许是受到这个分析的启发，并认为两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上却有相通之外，提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而《墨子》一书就是我们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在给陈伯达的信中，毛泽东就《墨子》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是：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是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比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

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了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不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大部分都采纳了。只是第一条“题目”，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修改，原因不得而知。

《天问》之后一千年才有《天对》

屈原的《天问》提出一千年以后，柳宗元以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诗的形式作了一篇《天对》，大胆地回答了一千年前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智慧与胆识的行动。毛泽东肯定它，也就是肯定了作者的这种勇气和精神。当然，“天对”是无止境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摘自毛泽东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268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版）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24页）

【作品介绍】

天对（节选）

柳宗元

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图形瞥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毂浑沦，蒙以圜号。

问：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对：冥凝玄瑩，无功无作。

问：斡维焉？天极焉加？

对：乌模维，乃系身位！无极之极，游游非堕。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对：堲熙，胡栝胡宇！宏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

问：隅限多有，谁知其数？

对：巧数淫诞，幽阳以别。无限无隅，曷情厥列！

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对：折箦剡筵，午施旁竖，鞠明究瞭，自取十二。非余之为，焉以告汝！

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对：规燬魄渊，太虚是属。棋布万荧，咸是焉讬。

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对：辐旋南画，轴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

问：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对：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

问：夜光何德，死则不育？

对：燬炎奠俪，渊迫而魄，遐违乃专，何以死育！

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对：玄阴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类。

问：何闔而晦？何开而明？

对：明焉非辟，晦焉非藏。

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对：孰旦孰幽，缪缪于经。苍龙之宵，而廷彼角亢。

问：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对：惟鲧说诐，帝圣而孽，恒师屏蒙，乃尚其圮。后惟师之难，瞑顩使试。

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对：气孽宜害，而嗣续得圣，汩涂而棄，夫固不可以类。脘躬是步，桥梢勤跻。厥十有三载，乃盖考绩。宜仪刑九畴，受是玄宝。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继，夫孰谋之式！

问：洪泉极深，何以实之？

对：行鸿下隕，厥丘乃降。焉填绝渊，然后宅于土。

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对：胡圣为不足，反谋龙智？畚锸究勤，而欺画厥尾！

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对：圆流廓大，厥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陨尔力！夫谁骇汝为此，而以愚天极？

问：九州何错？川谷何洿？

对：州错离婓，爰定于趾。躁川静谷，形有高庳。

问：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对：东穷归墟，又环西盈。脉穴土区，而浊浊清清。坟垆燔疏，渗渴而升。充融有余，泄漏复行。器运滔滔，又何溢为！

问：东南西北，其修孰多？

对：东南西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

问：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对：茫忽不准，孰衍孰究！

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对：惟若之华，稟羲以耀。

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对：仙者幽幽，寿焉孰纪！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给华漫汗，而潜谓不死！

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对：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炎赫厥体，胡庸以技屈！大泽千里，群鸟是解。

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堕？

对：禹母产圣，何韪厥旅！彼淫言乱嘻，聪贼以不处。

问：萍号起雨，何以兴之？

对：阳潜而，阴蒸而雨，萍冯以兴，厥号爰所。

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对：惟德登帝，师以首之。

问：天命反側，何罚何佑？

对：天邀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问：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对：桓号其大，任属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坏。

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对：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

【试　析】

《天对》为唐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柳宗元所作。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今山西永济）人。因藉贯河东，故有柳河东之称，又因曾任柳州刺史，并死于柳州，又有柳柳州之称。他出身官僚世家。据《唐书》记载，柳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抑。”《旧唐书》记载，柳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载密致，璨若珠见，当时流辈咸推之”。历任校书郎、监察御史等官职。永贞元年，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是其中的中坚人物。由于革新运动失败，他被一贬再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柳宗元诗、文并称于世，有《柳河东集》传世。

毛泽东对柳宗元无论是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是肯定的。他在读章士钊写的《柳文指要》后，认为该书中“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柳宗元是八司马之一，毛泽东肯定了章士钊为柳宗元翻案，即是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作为。毛泽东喜爱柳文。他在为《柳文指要》跋修改加写的一段话中，对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发动的古文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也大加肯定。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前面引的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柳宗元“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并告诉人们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子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对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谈文论史时就说过：“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同样的意思，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也讲过：“……《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是继屈原的《天问》和荀子的《天说》以来的一篇关于探讨自然以及规律的哲学著作。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

说和神灵创世的谬论。作者认为，作为万物本源的“元气”是一种运动着的物质。“清温燠寒，迭出于时。时之丕革，由是而门，辟启以通，兹气之元。”说明寒冷温热，在不同季节中交替出现，以及由于四季气候变化而产生“四方之门”的设想，其实都是运动着的“元气”自身作用的结果。“元气”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也是一个最高的物质范畴。这个物质实体运动的缓慢、疾迅则造成冷热的天气，使冷暖即阴阳交替而发生作用。这就是说，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正是这种“元气”因阴阳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自然界的诸种形态，是它的具体表现。这种“元气”，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说柳宗元是唯物论者，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在《天对》中，柳宗元既然坚持“元气”一元论的唯物立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元气”之上还存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宇宙万物的最初主宰者。对屈原的《天问》一开头提出的五个问题：宇宙有没有一个“极”物？有没有造始者？最初的造始者是谁给传通的？宇宙的一切变化从那里去考察？谁在那里主宰？柳宗元明确地对曰：“本如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曾罡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认为关于天地形成以前种种恍惚无凭的情况，都是荒诞的传说。昼夜交替，万物从蒙昧状态变化发展，这一切都只是由于“元气”的缘故，哪里是由一个主宰者造成的呢？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它们只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就从他在回答《天问》中的“斡维焉系？天极焉加”的问题时即可看出。他说：乌徯系维，乃糜身位？无极之极，讲弥非垠。或形

之加，孰取大焉!”其意思是，天就在它本来所在的地方，不是用绳固定在那里的，天没有边极，它是广大无限的。因此，没有某种形体可以作为天的边际。天既广大无边，又运动不息。所以，无论从时间或空间上看，它都是无垠的。这就根本否定了诸如什么太极之类的神秘观念，把唯心主义在“元气”上强加的一切神秘东西都抖落下来。对韩愈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确实是一种批判，所以毛泽东说《天对》等哲学著作“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写的。”

另外，《天对》中还探讨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提出了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和“阴与阳者”“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的辩证命题。认为“元气”内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它是“恶乎与我谋?”“恶乎为我设?”即事物的运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应该说也朴素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同时，柳宗元还强调，对自然规律，只能尊重它，适应它，而不能违背。这点在他的寓言《种树郭橐传》中借用神树的问题曾加以阐述。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屈原的《天问》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同时又是一篇表达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它是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表达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思索、疑问及追寻，毛泽东赞赏《天问》，说它“了不起”，原因是在于屈原大胆地提出了问题，而《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诗的形式大胆地回答了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智慧、思想和胆识的行动，而且从《天对》问世以来，就这么一篇，这是毛泽东格外欣赏和推崇

《天对》的地方。当然，《天对》是无止境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探求也是无止境的。

《天论》中发展了唯物主义

1959年，毛泽东读了一篇关于柳宗元的文章后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的发展就见之于他的这篇《天论》。

【毛泽东评点原文】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

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天　论

刘禹锡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阨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鹭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高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灭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辨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铦，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钟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祲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奚预乎天耶？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亦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人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荫于华榱，饱于饩牵，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

莽苍犹郛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则天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潍、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溯洄，不能峭为魁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牵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济，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仅存，亦天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得以晓也。彼江海之覆悖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问者曰：子不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耶？答曰：天形恒圜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有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超乎势耶？吾固曰：万

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耶？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耳，彼猩猩犬鼠之目，庸谓晦而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仪既仪，还相为庸。噎为雨露，嘘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保虫之长，为知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于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绕、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曰人事。在舜之庭，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衰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试　析】

1959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中，刊登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对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毛泽东在这里既指出柳宗元是唯物论者，他的《天对》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关于《天对》本书另有专论)，又说到“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这种发展，见诸于他的著名的《天论》(上、中、下)。

《天论》是唐朝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

《天论》起因于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写《天论》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短文。韩愈认为天是能赏功罚恶的人格神。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刘禹锡的《天论》是对柳宗元的《天说》的重要补充和发挥。后人重辑《柳河东集》时，把刘禹锡的《天论》附在柳宗

元的《天说》之后，也是用来表明《天论》与《天说》之间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刘禹锡在《天论》中曾明确交代了他的创作意图。他说："余之友人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就是说，他写《天论》的目的，在于彻底辩明天人关系的问题。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意思是说，刘禹锡的《天论》的要点是讲天不能干预人的事，这是对他的《天说》的解释和补充。的确《天论》继承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补充了柳宗元《天对》中理论上的不足和缺欠，在探讨天人关系问题的深度上超过了柳宗元，并进一步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批判。

在《天论》中，刘禹锡首先综述了当时有关"天"的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天"有智慧神明，能祸罪福善，主宰人间之事；一种看法认为"天"无智慧神灵，没有赏善罚恶的意志，不能干预和主宰人间之事。前者是一种"阴骘之说"，属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后者是一种"自然之说"，属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刘禹锡否定前者坚持后者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了柳宗元的思想。提出了"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天论》中）的命题，详细地论证了作为世界本原的"元气"和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承认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基础，刘进一步发挥了柳宗元关于客观事物的生成和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的思想，突出强调了"理"、"数"、"势"三个主要范畴。认为这三者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它们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刘禹锡在同意柳宗元天人“各行不相予”思想的基础上，既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又克服了柳宗元只强调天人之间对立的片面性，明确提出“万物之所以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论》中）的辩证思想，得出了“能执人理，与天交胜”（《天论》下）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天人之间即是互相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一种关系，唯物辩证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天人关系问题。前面引的林克回忆毛泽东评柳宗元时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这可能是误记，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这里不管是毛泽东记忆有误还是林克记忆有误，都说明毛泽东很欣赏“天与人交相胜”这一观点。这一命题，不仅深刻批判了韩愈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说教，补充了柳宗元理论论证的不足，而且是对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在《天论》中，刘禹锡还对宗教迷信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如果政治清明，赏罚公平，社会安定，人们就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奚予于天邪”，不去祈求“天”的保祐。反之则必然要相信天命。

总之，刘禹锡以他的《天论》，正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既坚持继承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又从多方面发展了唯物主义，特别是“天人相交胜”的观点，使对天人关系这个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达到了划时代的新水平。毛泽东对刘禹锡的评价是切实的。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为“开一代风气”之作，只可惜写了一半，就没下文了。毛泽东对此似颇有点遗憾。

【毛泽东评点原文】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摘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作者胡适

【作品介绍】

《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58年台北

版，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为胡适所作。

胡适（1891—1961），原名洪骍，字适之（“适”取进化论“适者生存”之意）。安徽绩溪人。幼年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904—1910年间在上海求学，开始接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新思想，尤其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10年到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师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专攻哲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前夕，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回国前，他多次写文章寄回国内，在《新青年》上发表，极力提倡文学革命并作“白话诗”的尝试。当时的胡适不仅受到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的欢迎，还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器重。1919年，胡适受蔡元培之邀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胡适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并成为当时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重大历史人物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胡适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布，在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受到李大钊等的批评。抗日战争时期，他由从教转为从政。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为抗战一事奔走、求援，1942年因国民党内复杂的人事关系离职。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离上海去美国，但甚不得意，后返台湾。1957年11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寿终于履行这一职务的过程中。胡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他一生中曾获得来自世界各国

的35个博士学位，其国际影响可见一斑。50年代国内掀起的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国内影响已蕴含其中。

胡适一生曾从事多方面的文化学术活动，并热衷于政治活动。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因而是一位违背社会发展需要，误入歧途的人。但在学术上，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哲学思想方面则是有一定的积极贡献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一生学术活动最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根据他在北大任教期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自编教材整理而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2月出版。

全书共分12篇。第1篇《导言》，论述“哲学”、“哲学史”的定义，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位置、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和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第2～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了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

书中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期：古代（或上古，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中古（公元初至10世纪左右，大体为秦至北宋初）；近代（或近现代，公元11世纪至胡适当世）。他提示说：古代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是个有创造性的时代，一个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中古，是“一个合久必分的局面”，这是一个“宗教时代”。近代，他认为“从广泛的历史意义来说，我叫这个现代阶段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口述自传》十二，《资料选》下，第274、278页）。

关于哲学史胡适在书中有明确的规定。他说，哲学是哲学

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哲学史则是叙述、评论哲学家们的学说或看法。把众多哲学家关于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确定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依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叙述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在此基础上，他大胆尝试着为哲学史的研究规定了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即“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3页）；二是求因，即“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需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同上书第3页）；三是评判，“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同上书第4页）。这三点可以说既是他编写哲学史的目的，也是他作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并贯穿于《大纲》的始终。《大纲》依此目的和方法对许多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如，在谈到老子的天道观时，他不是孤立地考察老子本人，而是注意到了“天道”这一中国哲学史范畴沿革变迁的线索。他认为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天道观，但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而老子的天道观则有了变化，他不再承认有一个有意志有知觉的天，反而提出了“天地不仁”说。同样，他认为墨子的“天”既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爱，凡事都应该以“天志”为标准。由此，与不同的“天”相对应，就有了不同的“命定说”，胡适指出：墨子有“不信命定之说。”墨子认为“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而老子和孔子则是主张“命定”的，他们把“天”看作自然而然的，“以为凡事都由天定。”老子的“天地不仁”，孔子的“谋

事在人，成事在天”“获罪于天，天所祷也。”都是在承认有“命定的”。“天”和“命定”及诸如此类的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范畴，胡适却能对其作历史的考察，这就是他的“明变”法运用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在“明变”、“求因”的基础上，胡适对各家的学说，都加以了“评判”。评价的标准是要看“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如何。这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在同时的思想上，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第二，“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第三，“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同上书第 131 页）。依此胡适指出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是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评价孔子以后“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对于后者，胡适评价道这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大弊端，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销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同上书第 131 页）。依据一种学说对社会的影响对效益评判它的“价值”或“效用”，胡适认为这种评判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是以“平等的眼光”而不是“带有任何偏见的”。评判的结果，把孔子与诸子并列起来，打破了孔子的独尊地位。这在当时可说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胡适语），使人“面目一新”（蔡元培语）。《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也成为当时“一本开风气的作品”。把儒与非儒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其所产生的效果同等地加以考察，这对二千年来奉儒学为正宗，视他说为异端的传统偏见，的确是个大突破，以至于胡适甚至自负地把这场“革命”比喻为哥白尼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

中心说。(《口述自传》十《资料》下第263页）这是一次真正的“价值重估”。

书中还提出和运用了整理史料的不可缺少的方法：即“校勘”、“训诂”、“贯通”。

此外，胡适还最早地把中西比较法引入哲学史的研究。书中不仅对中国哲学史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典型地引用借鉴了西方哲学史上古、中古宗教、近代文艺复兴的划分方法，而且在许多哲学家的具体思想上也作了贯通中西的比较。例如老子的无为主义与欧洲十八世纪主张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孔子与希腊哲人；孔子的知识论与康德的感觉分析等等都作了具体的、其中有些还是很有价值的比较。

总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此前历史上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不同，它完全打破了经学藩篱，抛弃了儒学一尊的传说，把孔孟学说同其他诸子学说一样，拿来用他的资产阶级观念加以审视、评判，试图还其“本来面貌”。并按历史的顺序，试图说明各家学说的相互联系。在这些方面，确实比当时和以前的所有封建和半封建的学者高明得多。此外，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等方面的见解，在当时也都有破旧更新的作用。

当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既是他“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主要兴趣之所在”之一（另一个为中国文学史）(《胡适口述自传》)，同时也是他“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中国文化建设纲领的实施。《大纲》中对中国哲学的整理，引入的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从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学理出发，整理中国哲学史，其中对哲学史上唯心与唯物的争论，一概“不了了之”，回避抹杀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在某些具体观

点上带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暴露了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方法的局限。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仍不失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蔡元培先生在《序》中所谈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启无数门。”

【试　析】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毛泽东有没有详细读过，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对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颇为了解，也是颇感兴趣的。

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颇具色彩、颇为矛盾和复杂的一个侧面。尽管在20年代中国社会剧烈的政治分歧与裂变之后，由于角色和地位的变化，除了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对胡适也转而持一种积极争取的态度并相应地作了一些争取的工作之外，两人几乎断绝了联系，但在开启现代历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对于毛泽东却是一位颇具感召力，并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的人物之一。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兴起了一股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一些会员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纷纷奔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作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和准备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本人却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去

了。他的解释是：为了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留在国内同那些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的人同样有利于国家。毛泽东的决定自然主要因为他的这番之见，但同时与胡适等的赞同、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曾为此征求过胡适的意见，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为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21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时，曾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就此征询了胡适的意见。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蔡元培的题词并被他誉为"各省的模范"，其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公共活动的场所。胡适与毛泽东虽然在办学宗旨上有一些分歧，但胡适亲自为之命名并为毛泽东所采纳，则表明了二人当时的关系。自修大学的创办，其中有毛泽东的不辞劳苦的筹划，同时也有胡适的参谋。

1919年毛泽东回湖南前夕，也曾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

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表示支持，并实际上也这样做了。是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得到了胡适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称它“眼光放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的文字”“真是我意外的喜观。”

总之，毛泽东在北京和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期间，与胡适有过诚挚的交往，毛泽东以胡适为师长、为楷模，以崇敬的心情拜访过他，请教于他。两人当时在某些问题上还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设法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在两人这样的思想背景和个人交往中，毛泽东对胡适这一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之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成果熟悉乃至于感兴趣，乃见当然的事。更何况有资料凭证：1918年，年仅27岁的胡适归国执教于北大。当时到北大的胡适对人和蔼恭敬，工作上小心翼翼，也很勤奋，因此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尤其是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有自己的新体系、新方法、新见解，受到学生的欢迎及学术界的好评。当时毛泽东也在北大，他是旁听过胡适的课的。五·四时期，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不能把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成果排除在外。

1965年，毛泽东和周谷城畅谈古今中外文史哲时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乃是顺乎拈来的事。“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淡淡的一句，毛泽东在陈述了一件历史事实之中，似乎也让其在咀嚼着一丝遗憾。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按他的历史分期：古代、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应该，而且胡适也计划出三卷。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他正式出版的上卷，即主要对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研究。这确是历史的事实。

对于其个的原因，我们只能从胡适的治学方法上作些推测。胡适在1935年所作为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别一个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对他的影响相辅相成，一方面，也即在消极一面，赫胥黎教他“敢于怀疑”；另一方面，也即在积极一面，杜威又教他如何求证，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套方法。求证，准确地说是实验主义的求证方式，是怀疑的方法论，是怀疑的必要的或必须的补充。两方面的结合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的所谓的“科学方法”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把这一“科学方法”贯穿在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其结果：胡适的学术大多都是有始无终的。不仅他的中国哲学史，而且他的白话文学史，这两个平生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都是只有上文，没有下文。胡适的治学意在开拓，力在求证，而往往又不能兼得，使其不得不顾此失彼。1922年，胡适做完《章石斋耳谱》，曾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力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他知道“用大力阔斧的人也确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但在这次段话中，我们明显感到他在既要“大刀阔斧”、意在

开辟，又要“拿绣花针”、小心求证，而感力不从心并作了倾向于前者的选择。当然最后他还是把二十多年耗在《水经注》的繁锁考证上，表现了在二者之间的游移。但他当时的心理倾向已投影在他当年对哲学史的研究上。胡适的《中古哲学史》写了三次，1919年在北大一次，在中国公学时一次，三十年代再回北大后又一次，却都未完成。胡适真的只写了前半部书。他后来说是因为写到禅宗，有了疑问，写不下去了。唐德刚先生对此则有进一步的解释：胡适既要坚持自己提倡的“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论；同时又受其盛名之累，不能随便犯错误，让人抓住小辫子。结果拉不清佛教问题就无法把中古哲学部分写下去，而同样的因素又使他在佛教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搞“清楚”。（参见《口述自传》第181页；《胡适杂忆》第69页）的确，胡适本人以胆大见长，适宜作开拓事业，他的哲学史，开一代风气，甚至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终因他所受的实验主义“拿绣花针”科学方法的“训练”及他治学的谨慎而颇感疲惫，更何况他的治学，他的活动颇为广泛，学贯中西，融通古今，遍及文史哲，后来又转而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为一些“专业”学者所不齿。在涉足的艺术领域内，重在开拓，以为后来者闯出一条新路子，打开一个新境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面对无限的探索，表现出来的一种无奈和对无奈的一种超越。

但毕竟，有上文的一部中国哲学史，使我们无以得见中国哲学史的全貌，无以在这扇新打开的窗子里尽赏其中的风景，这也自然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和不尽善尽美的遗憾，一种充满着对生命的无限和生命的尽善尽美的“渴求”的遗憾。

这种遗憾，对于一位对中国文化遗产，包括对中国哲学史着浓厚兴趣和真挚情意，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哲人毛泽东来说，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成果。德国古典哲学是它直接的来源，但在更深的意义上，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又不可避免地涂上民族色彩，毛泽东的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内容与形式的交融互汇，而这之中，既有对西方文化遗产的批判总结，更有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批判吸收。毛泽东不仅熟悉西方哲学史，更熟悉、熟读中国哲学史。毛泽东既是把它们作为批判吸收的材料来阅读的，又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持有的科学、客观的态度来阅读的。毛泽东与胡适，在议论上分歧可以说不仅殊路，且很难同归，且甚至事实上越来越远的。新中国前夕，胡适在逃离大陆去美的途中，单就《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肆意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全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旧金山，接受美国新闻记者对早报中“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渡过江了”的消息发表意见的来访中，胡适当即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治。”（《胡适五论》张忠栋第289页）。胡适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及其后以《自由中国》为阵地对人民共和国的恶意攻击，使胡适一步步站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并激发了五十年代对胡适思想全面的批判运动。其中虽然把学术混入政治存在着失误和混乱，但胡适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与对立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胡适的学术成就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这种客观不仅表现在他“对胡适《红楼梦》的研究好一点”的肯定上，也表现在他对中国哲学史只有上文，没有下文的遗憾中。（王秀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考、伦理观念紧密结合，同时，因为论战的需要，吕振羽按照中国哲学史的脉络写成了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及对哲学史的叙述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读过这部书（指《中国政治思想史》——引者注），这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

——摘自孙琴安《毛泽东与七大历史学家》（《见记者文学》1992年第12期）

【作品介绍】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福，字振羽，湖南邵阳人，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26年湖南大学毕业后曾投身北伐战争，后至北平任教于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参与三十年代期间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曾担任刘少奇同志政治秘书和学习秘书，解放后曾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他的上古史研究将中国历史研究推向了传统时代，填补了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并确定殷商为“奴隶社会”，奠定“西周封建说”。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部名著。吕振羽在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中曾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后来又涉入了思想史和哲学史领域。首开这个领域论战先河的是郭沫若，他在日本期间潜心著述集考证与思辨于一炉，写就《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在厘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此以前的垄断过程中的模糊认识，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国民党御用学者陶希圣等人也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幌子写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以达其政治目的，其中陶希圣的四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颇有一些市场。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学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学术斗争。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出了中国哲学史课程，为了与

陶希圣相针对，也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写就讲义，吕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吕振羽严格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解剖中国传统思想的承续，从今天看来，虽有失之于教条化和为论战所囿的特点，但却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而且其内容多有启人深研之处。吕振羽基本采用了二条思想路线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峙消长和表现阶级派别的思想斗争的方式来陈述思想史。他把中国思想史上的各个流派按其形成、发展和死亡的规律来叙述，同时突出揭示出导致其演化的本质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同一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性。他认为儒、道、佛家思想从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看，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包含着共同的本质，但整个封建社会又是起伏不定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各派别思想又呈现出这个历史阶段上升或下降的特点。首先，他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二大阵营，根据他的分野：老子、孔丘、庄周、孟轲、荀卿、韩非、董仲舒、王通、玄奘、韩愈、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畿等人是唯心主义；墨翟、王充、吕才、王艮、叶适、陈亮、李卓吾、王船山、黄梨洲、戴震、魏源等人是唯物主义，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是互相渗透的。

吕振羽把整个封建社会分解为有上升、转折和没落的时期，同时他又把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和朝代也大体如是分解而得出他的思想辨别体系。从大的历史经脉看，如从儒家政治思想分析，他认为孔、孟、荀、韩、董（仲舒）是封建的政治哲学从奠基到完善的时期，这与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一致，这中间有地主阶级的调和，譬如从孔、孟、荀的“仁”、“王道”、“法后王”到韩非强调“法”势”等等专制主义思想，后来又

由法向儒转化至董仲舒形成大一统的专制的理论体系。当然，吕振羽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强调一分为二，他认为孔子的伦理社会观是一种反教权的世俗化思想，而其德化教育则相对比较开明。而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则得益于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即国家从分裂分治的封建领主制向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全面的专制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

吕振羽认为三国到隋朝这一阶段，封建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不断、社会组织分裂，社会意识中弥漫着悲观、虚无的成份，因此，导致儒佛两立和对峙的局面，而到唐代，封建经济又有复兴，一统局面得以重视，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一定时期的儒佛合流即都表达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在一定阶段，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导致了争夺正统的斗争和世俗大地主与小所有者之间的冲突，如韩愈与柳宗元的儒佛冲突。到宋元时期，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而封建的意识形态亦呈现出明显的保守的倾向，朱熹的二元论和复古主义是其典型代表。明清时代则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没落时期，一方面出现了王阳明这样的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回溯和总结者，同时出现了一批唯物主义和只有市民革命倾向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李贽等，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三派政治哲学三足鼎立，最后导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解体。在整个封建时代，孔、孟、韩、荀、董、韩愈、周敦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是代表大地主阶级思想的，当然，他们思想中也各有其合理的成分，如上面提出的孔子，又譬如，象王阳明这样的没落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者其“知行合一”的思想也是非常积极的，这是吕振羽在坚持阶级分析的同时，同样坚持运用辩证法从思想自身发展角度分析的结果。但是同样是地主阶级

思想，其间还有上升与没落的区别。吕振羽认为，老聃的复古主义、庄周的出世思想，魏晋玄学都属于统治阶级中没落阶层的思想，从我们今天的学术眼光看，这其中也不乏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对于老庄玄禅则似乎突出其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和个人体验，社会史的分析是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背景，当然，也会有所影响就是了。另外，吕振羽认为，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看，其中代表新兴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的有：杨朱、申不害、慎到、商鞅、墨翟、王充、陈亮、叶适、王艮、李贽、颜元以及黄宗羲的非君论、王夫之的经济欲望论等。

吕振羽对中国早期和晚期思想史的社会学分析是具有开拓性的，同时他又指出，经济基础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但不是直接性的，思想发展有其独立性，因此，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他也坚持了一分为二的方法。他认为商朝奴隶制度的统治思想是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在巫教神学中出现了人的阶级和神的阶级的划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人的超验的和经验的思想意识中都形成了对位的等级秩序的观念。《周易》时期则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其间思想意识形态从神学的命定论转到辩证的变化观上来，但由于形式化又形成了在吕振羽看来的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的退化。从原始社会到这段时期的思想演化是：从“万物有灵”论到一神崇拜；神权均等过渡到神权等级制度，而世俗中的僧侣阶层成为统治阶层，而《易经》中的卦和爻辞则充溢着阴阳变化的辩证思想，但是随着周朝封建社会的建立，八卦哲学也走向僵化，《洪范》成为表现神权和王权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著作，整个社会的形态从“敬天”开始转向“重民”继而修“礼”施“刑”，儒法思想相继成型。

吕振羽认为承袭周礼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保守主义的，其思想只有二重性既有道德修养的要求同时又以维护封建名教一以贯之，因此，这二者在孔子是统一的，但他不主张对农民无度剥削和滥施暴政，这点又是积极的。吕振羽对墨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尚贤”“尚同”思想是破除封建家族主义和身份制度的，是反对“君权神授”和家族世袭的，虽然带有原始崇拜的痕迹，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意义。

吕振羽对晚明和晚清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这一阶段的社会思想给予了三个方面的区分：一是没落的地主阶级集团的思想，王阳明是集大成者，他批判了王阳明的保守主义，肯定了他“知行合一”的思想；另外是王学左派的王艮、李贽的农民派思想，另一农民派别是颜元的唯实主义思想，这一派思想反映了社会分化和衰落时期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还有一个思想分支是所谓萌芽状态的市民政治思想，这一派思想中首先是黄宗羲、唐甄的“非君论”，一方面表现出了市民民主的思想萌芽，与此相应的是提出了“取消君统”的思想，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意识产生于社会环境，同时人类为现实生存而斗争的思想，被吕振羽认为是达到了“可贵的社会进化论”的见解，因为他认出了社会不断进步的思想。龚自珍和魏源作为进步官僚则反映了当时市民的某些要求，尤其是他们以爱国志士的忧愤心情，充当了时代的号角，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不仅给中国资产阶级乃至予日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相当的启迪。

【试　析】

毛泽东对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阅读和评价是在延安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写出后于1937年6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而吕振羽则于1941年来到新四军工作。1942年3月，刘少奇应中央和毛泽东电召赴延安参加筹备“七大”，吕振羽夫妇同行并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为期数月的行进和工作以后于1942年12月到达延安，当晚，延安举行了欢迎会，吕振羽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过了几天，毛泽东又专门会见了吕振羽，在谈到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时，毛泽东说：“我读过这本书，这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吕振羽点头承认，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叫《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告诉毛泽东，当时为了与陶希圣斗争，以示针锋相对故而也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名称，毛泽东表示赞赏。吕振羽还告诉毛泽东，他打算将近代部分补述完成，并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使这两部书都成为由古至今完整的中国通史著作，毛泽东给予了肯定。

吕振羽当晚曾专此赋诗一首：“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卅翘首望延安。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比。”表达了他的激动及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毛泽东自此对吕振羽的历史著述尤其是思想史著述一直比较注意。延安在1945年曾重印该书。据逄先知记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中，就有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足见毛泽东对该书的重视且看了不止一遍。

毛泽东博览群书，又有浓厚的思辨气质，对中外哲学史的

著作多有涉猎，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都有过分析和评价，这二部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中国哲学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打有各自的西方哲学根底的烙印。而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哲学史，虽然名字是政治思想史，但其内容远溯先秦近至清末，中国哲学大家的思想尽收其笔底，是以其思想家的哲学、伦理、社会思想带出他的政治思想，它与前二本著作的显著区别是他是运用了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即运用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来解剖中国思想史的演进和各个思想家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这个分析贯穿全书，特点鲜明而突出，是一部社会分析与思想分析相结合的哲学史，而吕振羽的另一个特点，在阶级分析和归类的基础上（这是他分析所有思想家的前提）尽量保持了对历史人物的一分为二的认识，譬如对孔子、王充、王阳明，有的在社会分析上有所批判又在思想分析上有所肯定，有的如王充对其作了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不足。这二点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对中国思想传统和著名人物所坚持的认识方法，这也是毛泽东能对该书发生共鸣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时曾指出，他在1920年读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后明确了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书即使涉及不到中国，但他从中提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因此，他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描述中国哲学的演进和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斗争当然是肯定的，而且会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吕振羽曾

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4万字的长篇论文叫《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他在该文中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实际是历史哲学作了概括。他认为毛泽东的历史观共有五个部分组成：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以及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的认识，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结果，是历史科学发展史上的基石。一个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人，一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两人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毛泽东只会从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得出对他思想的进一步印证和充实，毛泽东甚至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能真正读懂它，因此，在解放后，他支持年轻人对红学权威的挑战，主要是他们的观点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认识相吻合，可见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毛泽东思想中浸润之深，其思维触角贯通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当然，结果有得有失。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阶级分析给自古至近代的思想家作了归类，或是地主阶级的或是没落者的或是农民阶级的或是萌芽中的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等等。当然，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源于马克思的立场，这个立场又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因此，它一方面对以前的所有阶级都持批判态度，同时，又对被压迫阶层寄予同情并指出其历史局限。吕振羽基于此点，当然对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又保持了对历史人物的历史的宏观的评价，譬如肯定孔子孟子施“仁政”等等。他既有自己的立场但也没有苛求

前人，因此，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孔子等一直是一分为二的，他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孔子思想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数千年，当然是顺应了封建主义的要求，但同时思想中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和较伟大的观念”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大思想家。吕振羽在随刘少奇赴延安途中，曾经过山东鲁南地区，那里是孔子的故乡，孔子思想在群众中影响较深，如“忠恕”之道，女子守节等。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同志主张对孔子进行批判，吕振羽则认为，孔子思想既有落后的成分需要分析，但同时其群众基础说明了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而且可以扬长避短。得到刘少奇认可后，避免了一次思想运动，而把精力集中到了抗战斗争上，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比较开阔的胸襟。“文革”期间，吕振羽虽力陷囹圄却拒绝了去附合当时的批孔斗争。毛泽东在晚年以前，对中国历史人物譬如孔子也多有肯定，多称“孔夫子”，譬如他指出要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学习孔子的教学方法，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时指出对孔子的长处要读到。可以说，对孔的二点论在毛泽东那里是有的，但不很固定。在他青年时期，他一方面接受了一些儒家的救世、治世思想，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又明显地排斥孔子的封建至尊乃至超越时代的“圣人”地位，尤其是认为再做一偶像的奴隶在新的时代已是断断不可接受的了。毛泽东对孔子的摇摆更明显地体现在他对另一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上。1954年，毛泽东还肯定郭沫若对孔子是革命党的论证，到“文革”后期，则表达了对《十批判书》的不满意，而这个起因大约有二：一是从反“右”至“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行列受到批判、冲击，扫地出门等等，而林立果在

《571 工程纪要》中又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可能引起毛泽东欲为秦始皇正名的念头；其二，主要是从思想角度，毛泽东大概比较一贯的认为孔子思想是保守型向后看守旧的，既不是革新派也没有对社会变革做出明显的实绩，而毛泽东则一方面完成了中国统一之伟业，而且还要实现文化革命以使整个国人的精神面貌更新。当然，他运用的是阶级斗争的方法，而这一点也与孔子保守的思想不符。虽然毛泽东亦想实现道德的革命但这同时也是阶级的革命和斗争，孔子那里没有这种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晚年的变化，但又和其早期思想有所沟通，在这一点他不仅与郭沫若意见不一，恐怕与吕振羽也不一致，因为吕振羽作为历史学家是做的历史分析，因此，他在“文革”中拒绝写批孔文章，但毛泽东做为政治家则有自己的考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政治思想史》使他们沟通了，而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不同位置，又使他们有所区别。（谭风）

《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形而上学

毛泽东与《简明哲学辞典》的主编之一尤金关系甚密。但对他的这部书却颇多微词。毛泽东对其中“同一性”一条的批评，不单是指的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评点原文】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

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相互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作品介绍】

《简明哲学辞典》（以下简称为《辞典》）由苏联哲学家尤金（1899—1868）和罗森塔尔（1906—1975）主编，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约270个条目。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正如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所申明的："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即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地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了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之厚重，其作用之转化，表明它已远远超出了编者在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金是苏联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1953年至1959年任苏联驻华大使，曾为苏共中央委

员。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辞典》最早于1940年译成中文并由新知书店出版。建国前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武装，尤其是建国初期，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用马列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高潮，《辞典》以其通俗性、理论性在当时哲学辞典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受到了青睐。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5次。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发行达几百万册。《辞典》在50—60年代成为较有权威的哲学工具书，对建国初哲学的启蒙和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明显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中的一些片面、简单化的观点，这在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第四版的初版中也有明显表现。毛泽东指出的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同一性”一条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关于“同一性”，《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一版）是这样解释的：“同一性”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形而上学抽象地按照A＝A的原则来理解同一性。但是这种呆板的僵死的同一性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具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否定事物本身存在着内部矛

盾。……它的内部在发生着变化，它处在和其他事物的各种不同的并常常是相矛盾的关系中，因此，……事物的任何同一性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长久的；只有事物的运动、变化才是绝对的、永久的。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试　析】

谈及毛泽东与《简明哲学辞典》不能不首先谈及毛泽东与其主编之一尤金之间的个人交往，因为毛泽东之所以阅读和谈论《辞典》，除当时如上所介绍的该书为五、六十年代权威性的启蒙工具书的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一层浓郁的个人色彩。我们知道尤金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与苏联哲学家中交往最为密切、时间最长的一位。尤金在苏联倍受斯大林的赏识。1950 年 4 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斯大林首推当时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哲学家尤金帮助毛泽东回国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斯大林介绍尤金“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尤金这个人。1950 年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便致电斯大林，邀请尤金到中国来帮助《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编译工作。7 月尤金访华。9 月 30 日，出于《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允许把尤金在中国的工作

时间由原定的9月底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并提到“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毛泽东的要求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毛泽东当即把斯大林的电文转批刘少奇，让他安排尤金在各地的参观讲演。1950年11月12日间毛泽东同尤金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毛泽东虚心地听取了尤金对他文章的看法和意见。尤金特别推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建议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将已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理论刊物上。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年12月第23期上全文发表，《实践论》在苏联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曾把这些反应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实践论》得以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刊登并引发了苏共党内的评论，这无疑有助于毛泽东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树立自己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的形象，其中尤金是有功劳的。1950年12月31日晚，尤金期满归国前夕，毛泽东在颐年堂专门设宴招待尤金，并请尤金看戏，表达了对尤金在华期间留下的良好印象。1951年7月，受毛泽东之约，尤金携夫人季娜第二次访华。毛泽东曾两次到尤金寓所拜访尤金，完全把尤金夫妇当作自己的私人客人。据50年代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负责《毛泽东选集》中译俄工作的师哲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叫师哲同志作好安排，他要去拜访尤金。可是约定时间到了，毛泽东还在勤政殿参加国务会

议。师哲只好到会议厅转了一下。毛泽东一发现师哲走进会议厅，马上看了看表，就退席走了出来。二人来到景山后街尤金住处，他们已作好了准备，尤金还请来了路过北京的两位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作陪。当时谈的是以哲学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物理、生理学方面的现象等课题。两位哲学大师侃侃而谈，其它作陪的却为这些高深莫测的哲学问题所慑服，插不上一句话（《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1953年，尤金因深受毛泽东的赏识而被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委派为驻华大使。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二人的往来虽不象以往那么随便，但一有机会二人仍彼此热衷于探讨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哲学问题当然是中心。而且，常常是公事毕后谈私事（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第十五章尤金受邀请来华”）。中苏这两位哲学家交往如此密切，如此热衷于自己哲学心得和见解的交谈，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共同关注的领域内彼此引为同道，尤金的这部在中、苏都影响颇广的哲学工具书《辞典》之所以引发毛泽东的关注，则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据毛泽东在1958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事后提到的：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尤金《辞典》中一些条目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一条。针对此条目中所说的：“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理论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应用于诸如和平与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毛泽东颇为直率地责问尤金：“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尤金对此无言以对。尽管我们至今无法肯定毛泽东这句话暗含的是什么意思，是观点上的对立，还是有着什么现实的政治背景（因为毛泽东关于矛盾诸方

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矛盾诸方面相互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等等的内容的哲学理论上的升华，是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各种方面矛盾关系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哲学理论基础），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对“同一性”这一条目的观点是持反对意见的，甚至是非常反感的。在公开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谈到对这一条观点的批评。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那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辞就是冲这一条观点来的。其后在1958年8月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否认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毛泽东提及他对尤金的当面批评及尤金的无言的同时，用生动的例子指明该条目在理论上的逻辑错误，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毛泽东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这是毛泽东有针对性地申明的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是对列宁的观点及毛泽东早年《矛盾论》中有关观点的坚持，但这一重申是在毛泽东的晚年，因而是难能宝贵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能彻底地贯彻，晚年还是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这也不能不算是历史的无情和一位历史巨人的遗憾。

毛泽东的讲话，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

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报刊上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中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当日毛泽东要人汇集了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供他研读。

毛泽东之所以对“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的解释如此重视，当然首先是因为《辞典》中的观点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倾向。《辞典》只讲对立物间的排斥，而否定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和统一性，在两个根本对立和排斥的事物和概念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这在逻辑上和观点上都是错误的。也正如毛泽东所批评指出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但这两个阶级却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共同基础而统一于这一生产体系中，没有无产阶级受剥削，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受剥削。而且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可以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使之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向相反的方向互相转化。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为两个根本对立和排斥的两极事物找到了共存于一矛盾统一体的基础，并架构了一条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桥梁，当然这种同一是有条件的。《辞典》中的“同一性”的认识是与此相对的，是反辩证法的，因而是形而上学的。

其次，毛泽东对《辞典》“同一性”一条形而上学的批评不仅仅是对尤金本人及其《辞典》一书的，更准确地说，他是针对斯大林的，是在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7 年 1 月 27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曾深入、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法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很明显斯大林或者只讲事物的绝对同一，或者只讲事物的绝对斗争，割裂无产阶级思想成果同它的遗产思想的历史联系，使无产阶级的文化遗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凭空产生的东西。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本人的这种形而上学在苏共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深深地印迹在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辅助读物的《辞典》这样一部工具书上，深深地影响

了在苏联以尤金代表的及中国50—60年代众多的党员干部群众，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助这本权威性工具书理解、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其在思想上引起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的谈话中深刻地总结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毛泽东之所以对《辞典》中"同一性"一条中的形而上学批评如此之尖锐、如此慷慨激昂，在它带来的思想上的混乱、理论上的错误的原因之外，更因为，如毛泽东在上引1957年1月27日讲话中所说的，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是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而斯大林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不能说不是他政治上形而上学的思想原因之一。

从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党委会上点评《辞典》及此后《辞典》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某些事件的联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辞典》的关注是与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分不开的，是把《辞典》中需要澄清的哲学观点作为他政治生活的必要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基础的。我们知道，上引毛泽东对《辞典》中同一性错误观点的批评是为了阐明"双百方针"而提出的。1956年，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但这一方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接受了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

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至4月间，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为此毛泽东当时批评了《辞典》中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指明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其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给全体与会者的一封信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为《哲学小辞典》（也就是尤金等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三版）；一本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意在要“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此前半个月，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对大跃进产生错误的认识，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及其世界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并认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为此，毛泽东向广大干部推荐《辞典》中的有关条目。尽管其中毛泽东主要是用《辞典》中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辩证法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经验论，尽管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及对大跃进的认识产生了偏差，但毛泽东注重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探究政治问题的思想根源、注重思想方法与政治立场、观点的内在联系则是他作为一名具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的政治家的一贯品格。这种品格，同样反映了在毛泽东对《辞典》错误观点的评论上。（王秀华）

《伦理学原理》越读越有趣味

青年毛泽东认为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这一根本问题，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国民精神处着手。因此，他十分醉心于哲学研究。《伦理学原理》批语集中地反映了其当时的哲学主张、见解和思维水平。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这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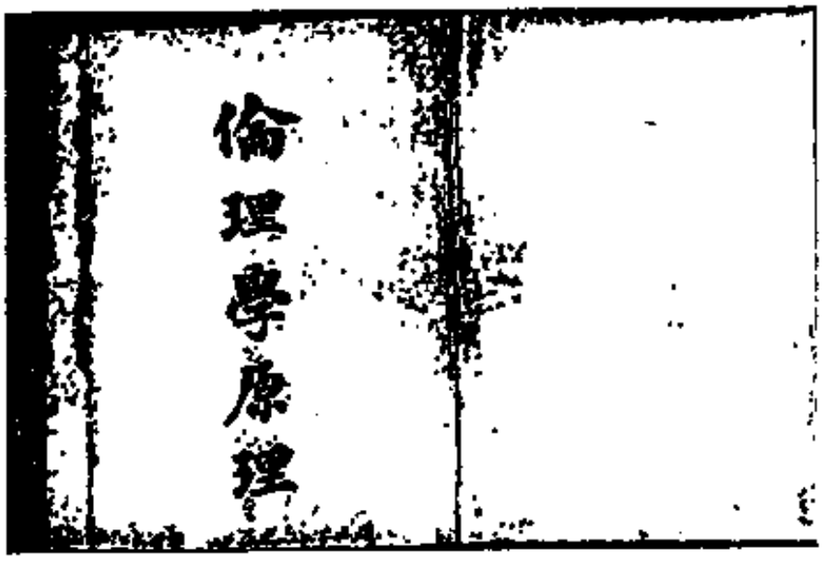
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 1950 年同周世钊谈话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276 页注①）

【作品介绍】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包尔生（19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篇。包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根荷恩的一个农民家庭。1971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 年后任该校教授。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就是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和著述活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过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封面

包尔生的著述十分丰富，并对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其著《哲学导论》（1892 年初版）曾风靡一

时，在问世后的几十年间被广泛阅读。作为伦理学家，《伦理学体系》是其唯一系统的伦理学著作。该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人生观与道德哲学历史纲要；第二编论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第三编为德性和义务论；第四编为国家和社会理论纲要。书前还有一个序论，介绍了他对伦理学的概念、对象、性质、职能以及研究方法的界说。1900 年，日本学者蟹江义凡，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编译成日文，取名《伦理学原理》出版。蔡元培将该书的日文本译成中文，1909 年 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又多次重印。

中文本《伦理学原理》，分“序论”和“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 10 万字。

包尔生的哲学和伦理学说形成的时代，正是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相互交锋，争长竞短的时代。在哲学思想上，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唯心主义思想家之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争论广泛展开。培根的唯物主义，斯宾诺莎的心物平行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费尔特的心理物理学以及叔本华的意志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包尔生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伦理学上，传统上对立的两大学派即形式论和目的论，经过近两百年的争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的边沁、穆勒为代表的目的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和目的，强调功利是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目的，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追求快乐幸福。而以康德

为代表的形式论，则以先验的善良意志出发，强调道德行为的至善，主要根据其动机而与其所产生的效果无所关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更不在于追求什么快乐和幸福，而是体现于自我实现之中。包尔生的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受到这两大派别的影响，打上了它们斗争的印记。正是由于在哲学和伦理学上，当时各派理论学说都对包尔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蔡元培在介绍他的学说时指出："包氏哲学为康德派，而参取斯宾诺莎及叔本华两氏之说，又于并世大家若冯德，若台希耐亦间挹其流也。"这样就使得包尔生的哲学思想具有了鲜明的二元论特征，其伦理学说则染上浓重的折衷调和的色彩。在包尔生的著作中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的身影可谓历历在目。如承认直觉知识的存在，把时间看作"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以及承认有所谓"超绝界"、神的存在等，但他时康德的一些观点又常持批判的态度。包尔生虽然受康德的影响把人的知识分为两种，一是"直觉之知识"，譬如数学之类；一是"经验之知识"。但他所强调的则是经验的知识。他说，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的解释而后起，如解剖学生理学起于医术，几何学起于量地术，而哲学则亦起于求人生之意义及职分也。这些科学必先观察事物之状态，求得其自然相应之规律，而后敢揭以普遍之法式。因果律是也。而这种因果律亦"非预想之定义，两实诉合于观察所得之因果也。他进一步认为："伦理学之研究法，不类数学，而类于理化学。……非由概念而演绎之以为定义，实由经验而确指其事实之关联者。"他指出，实践的规则，源于因果律，而实践规则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是被因果之关联所证明了的，而因果之关联，又必来自于经验。由此，包尔生批判了康德看作先验的东西的直觉论错

误。他指出，“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持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然而在实际上，人类并非是先有了道德哲学，而后才能够作出善恶的判断；而是道德经验先于道德哲学而存在；若无所谓道德经验，则决不可能有道德哲学。正因为包尔生把道德规范归结于经验而不是先天的所谓“直觉”，因此，他认为，道德虽具有普遍性蕴义，但也不能不根据实事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通，有所差异。

伦理学上的目的论和形式论，在善恶的根据上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主张，目的论根据行为和意志对主体自身及其对周围人的生活自然产生的效果就说明善恶之分别，有助于保存和推进人类福利的即为善，反之则为恶。而形式论则坚持善恶的概念是意志本身的绝对性质，而与行为的效果和目的无关。这两种观点虽相互不容，但其致思方式却是相同的，这即是将目的和形式、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并沿着相反的方向把矛盾的双方推向极端。包尔生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对立，以兼采两家，力求纠按它们各自的偏颇。他认为形式论关于道德自身即有价值，即是目的的论点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理论片面强调形式、动机，全然摒弃目的和实际效果，主张为道德而道德即失之偏颇。在此，他明确表示赞同目的论，认为道德是完善人生的一种手段，效果应作为评价善恶的重要依据。但包尔生同时又在自己的思想中为形式论留下地盘，他认为在道德判断中，应当把对人的判断与对事的判断区别开来，前者关涉意向、动机，后者关涉行为的倾向和效果；前者的标准是良心和义务，

后者的标准是目的和效果。由此可见，包尔生一方面看到了目的论和形式论各自的偏颇而试图予以避免，另一方面却因未能找到真正解决两者的理论对立，而摇摆于两者之间，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调和折衷特点的理论。因此，当包尔生进一步探讨至善问题时，就比较明显地趋向了形式论观点。他将自己关于至善的理论称之为自我实现论；并将之与强调行为实际感性效果的快乐论对立起来。他认为意志并不是指向快乐这样一种主观的感觉，意志的至上目标在于达成完善的生活内容。而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即幸福的表现。由于在包尔生那里，意志的目的，意志自身的一般的趋向，这一目标的涵义被理解为人生命存在的完善和完美。其自我实现论主要是指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或道德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这一理论主要是将人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存在而加以阐解的。因此，他批评快乐主义者将至善归结为生命所产生的快乐和感情，指出快乐不是意志的目的，而是伴随意志自我实现而来的一种满意的感觉；而只有当作为有德性的行为的结果时才被赋予价值。

包尔生的这种调和折衷的意趣，正是翻译者所注重的地方。蟹江义凡在《伦理学原理》日译本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所以翻译此书就是取其在伦理学观点上的调和折衷。而蔡元培也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互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旨也是重在调和。

【试　析】

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曾经认真地阅读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读过梁发表于该报的介绍康德的文章，对康德其人其思想较早便有所了解。但是对康德哲学，伦理学思想的系统了解，应该说是从读《伦理学原理》一书开始的。而该书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师从杨昌济学习伦理学。杨所采用的教材便是蔡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并无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并曾根据其中的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成《心之力》一文，深受杨先生赞赏，判给 120 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缘看到这篇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读《伦理学原理》之前或之后写的，其基本观点在该书的批语当有所反映。

杨昌济只教授了这本书的一部分，而毛泽东则仔细通读了该书。全书共约 10 万字，毛泽东却在上面一共写了 12100 余字的批语，这在读书史上可称得上是一种奇观。在他所阅读的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全书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 7 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善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 5900 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约 1500 余字；再次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 1100 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

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和引伸；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处，无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有“切论”、“此语甚精”、“此段可谓发挥尽致”、“至真之理、至澈之言”之类的词语。对原著的否定和怀疑之颇多，常见的批语有“诚不然”、“定然无益”、“此论大奇”、“此处又使余怀疑”等。尤其是批语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历史，中国古近代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观点，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表达了其将中西思想互为发明的理论愿望和学以致用的致思取向。统观毛泽东对该书的批注，其字里行间充分透显着其博学广识的睿智，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能力，洋溢着其渴求真理、真知的精神，体现着改革国家社会、再造道德人心的价值诉求。

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之前，其哲学思想主要受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尤为如此，这反映自 1917 年 11 月 23 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那封长信中所持的观点。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从大本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国民精神着手。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毛泽东阅读了《伦理学原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唯物主义见解和辩证法因素，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视野。”并说了前面引的话。1950 年，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这表明，他在阅读这本书之前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读过这本书之后，从中吸取了唯物主义的营养，并开

始尝试运用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研究、批判所读过的书，观察和分析现实中的问题，从而使哲学思想由唯心主义转变而为心物二元论。虽然我们不能将这种转变完全归结为包尔生《伦理学原理》的影响，但这本书对毛泽东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作用却也不能忽视。

毛泽东阅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点是鲜明的，概括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表达了其哲学思想的心物二元论的基本倾向。

综观毛泽东在批语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应该说其哲学观点明鲜地具有二元论的基本特征。他在批语中说："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物质、客观世界完全依赖于主观感觉而存在。这岂不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千古余响？岂不是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翻版？还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基本(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里肯定了"物质不灭"，并指出有生命的人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两者相互联系，固有其唯物主义的合理的一面，但却将精神不灭和物质不灭相提并论，透露出其二元论的思想倾向。他还进一步以生死为例，具体阐述了物质和精神作为世界本源并存的情景，在毛泽东看来，人生之前，物质和精神即已进存于宇宙之中。一俟人类产生，物质和精神便结为一体。人之生只是物质和精神的"团聚而已"；人之死只是物质和精神的"解散而已"。这就是由人生变化所体现的宇宙间精神和物质并存和变化的必然法则。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批语所体现的哲学理念中，精神和物质成为并存的实体而被赋予世界本原的性质和地位，典型地反映了其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倾向。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毛泽东关注现实生活，重视实际、重视实际经验，这便使他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常常闪烁出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当读到包尔生所言："盖事实之写象虽尝有见于愿望之前者，……亦未有先于事实之写象也"时，毛泽东明确肯定包尔生这种事实先于写象的观点，并批道："写象即观念。"这实际上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承认了存在（"事实"）先于思维（"观念"）的唯物主义观念。在论及美学和伦理学的形成时，他同样贯彻这一唯物主义主张，得出首先有作为客观存在的美的现实和道德实践，而后才有作为美的现实和道德实践的观念反映的美学和伦理学的正确结论。他在批语中说：美学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有道德，人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作皆不过钩画其实际情况，叙述其自然之条理。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物质世界先于意识而存在是意识的最终源泉，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先有被反映者而后才有反映。这一唯物主义主张，还体现于其真理观中，他承认真理反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事物内在的必然性。"凡自然法则，有必然性。"他还进一步区别了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指出真理是客观的，是"天然本质"的反映；价值则与主观"人为"相关联；真理因有价值，但有价值的理论学说来必即是真理，是否真理，只能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天然本质"。因此，对包尔生"学说之无价值，恒以其非真故；若欲证其非真理，而以无价值为言，是颠倒之论也"之言，毛泽东批曰："此言甚切。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由上面的引述不难看出。虽然从总的倾向上看，毛泽东在批语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

还是心物二元论的，但其中唯物主义的成份已突显出来。多种因素杂陈其间，使毛泽东这时的思想呈现出自我矛盾的状态，以至人们在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哲学立场时，或将之归于唯心论，或归于二元论，或归于唯物论。这种情形实不足怪，这恰恰是此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处于转变期的征象。正是以批语为转折，毛泽东开始逐步清理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奥格亚斯中圈”，培养唯物主义的新苗，为五四运动之后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的铺垫。

2. 对辩论法的自觉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在批语中，展示了丰富的辩论思想，反映出此时他对辩征法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已经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他的辩论法思想固然有其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但却浓厚的辩证法思想、西方进化论的发展理论，以及近世谭嗣同《仁学》和李大钊文章中的辩证观点等都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其辩论法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剧变、震荡，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为的革命过程的观念反映，是他深人观察、分析、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运动变化的结果。首先，他较明确地认识到宇宙间的事物都是由矛盾、差别、比较而生，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运动变化的动力是矛盾双方的“大抵抗”，“大斗争”。他在批语中指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具有绝对的性质，它与“天地经古，永世不绝地存在着”，由之，他对所谓“大同世界”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人现处于不大同的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不现实的，“纯粹的平等、自由、博爱”不过是“仙境”而已，倡扬大同之说者，完全是“谬误之理想”。认为“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

治即有一乱，吾人的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亦自有实际之价值。”因此，他特别强调，一切事物都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事物的进化发展就是矛盾对立斗争的表现；“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而不同，与吾人现象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比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论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

在肯定事物矛盾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事物的运动性质，提出一切事物都在对立斗争中不断变化。对时代大变动的深刻感受，使他树立了运动变化的观点。主变主动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乃至性格的鲜明特征。在《讲堂录》中，他写道：“天下万事、万变不穷。”明确肯定，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通属性。在批语中，他指出：“世界中变化万殊”，不存在任何静止不变的东西。他还进一步认为，事物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量变过程，而且表现为质的飞跃、突变，指出矛盾双方能够相应转化，新质不断代替旧质。他在批语中论及生与死的关系时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肯定了生与死、成与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尤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面临大震荡、大变动的现实出发，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积极地鼓吹和呼吁革命，因此，他十分强调质变的意义，主张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促其“由毁而成”、“再造”、“脱胎”，获得新生。《伦理学原理》有言：“传

统足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逐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界不免于歼灭。”由此毛泽东联想到中国社会之现实，在上面郑重地批道：“中华民国正处在此地位。”并根据变化日新的发展观，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只有各种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死也。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最后说：“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坚信新质必优于进而取代旧质，新社会必优于进而取代旧社会。这段批语一方面旗帜鲜明地主张以“改建政体”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革命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再造”。这在改良主义思潮盛行的当时，可以说是震聋发聩的。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坚决、彻底、无畏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对革命的未来，对国家社会的前途充满信心，深信从旧社会母腹中脱胎而来的又是一个崭新的新社会。向人们展示了作者的乐观自信的革命者形象。

毛泽东还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这一辩证思想，指出宇宙万物、人类社会都是在对立斗争中发展变化的，他肯定了包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抵抗”的概念。在包尔生那里，“抵抗”的概念既有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意思，也包含矛盾双方在一定

条件下转化、发展的意思，而在较多的场合更接近于哲学范畴的斗争、斗争性的涵义。包尔生称："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这类观点深表赞同，批道："至真之理，至彻之言"，"振聋发聩之言"。而对包尔生所言，"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则表示"此不然。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坚信抵抗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且穿贯一切事物之始终，它并不因人类文明发展而递减。在这里他用豪纵壮丽的诗般语言表达了这一理念，"河出潼兴，因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冲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由于二元论的影响，在批语中，一方面毛泽东能够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地揭示和分析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又难以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故在其研究分析事物的矛盾变化时，不能不流露出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譬如他在批语中写道："余曰：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阴即阳，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言之，万即一，变即常。"这样他便夸大了差别和矛盾的相对性，取消了物质的差别，在主观上把事物任意等同起来，从而表现出了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3. 崇尚"个人有无上的价值"，强调个性解放，张扬"个人精神主义。"

毛泽东在批语中曾谈到其伦理主张由无我论向"唯我论"的思想转变，"吾从前固立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和无我，今

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能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能从，有之亦由我而推之也。”由主张“无我论”到极端张扬我的地位，发展成宇宙间一切为我而在的“唯我论”，表明毛泽东由信奉扼杀自我，扼杀个性的封建主义的伦理观转而信奉“个性解放”，“个人价值实现”为宏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个人的价值，宣传个人主义，决不意味着他认同那自私自利，追求个人私欲满足的虚伪个人主义。为此，他在批语中特别点明“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所追求的是一种人的道德价值的实现和超越，呼唤一种为了祖国，为了真理，为了“亲爱之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奋发踔厉，一往无前的理想人格。这样毛泽东便把“利已”与“利他”，把“实现自我”与“改造社会”，把“个性解放”与救国救民的要求统一起来。这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吾人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如果说，如上所述，他所谓的个人主义表达了一种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那么，他所谓的现实主义则是这种理想境界的现实寄托，是达成理想境界的切实途径。

在毛泽东那里，现实主义的归宿点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所表达的是“我之现在及现在的我”；个人主义对现实主义具有统率的作用。我是核心，现实是我的内容，又是我的体现，历史与未来都立足于现在的我。这种个人主义统

率现实主义，进而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人生态度，作为毛泽东的价值抉择，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他追求主观理想，却不忘向现实生活的落实。这使他往往特别重实际，重手段，似乎比谁都落实；另一方面在其社会政治生活中，在其致力于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大大小小无数实践中，又始终贯彻着一种理想的指归，表现为似乎总是固执而急切地追求他设想的目标，实现其个人意志。即使在晚年的“不断革命”的信念驱使之下陷入迷途的时候，也是如此，因而他又常常表现得象个理想主义者，毛泽东一生的悲喜剧也许与他这种人生态度不无关系。

除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之外，毛泽东在批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就是其读书方法。他牢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学习徐持立先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坚持把自己的感想、心得记录下来。遇到他所同意的观点，就接受，遇到精采之处，就大力赞誉，有时往往还借题发挥，举一反三，引申阐述；遇到他难以认同的观点，则指出他认为的不当之处，并提出批评意见。在《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中，毛泽东的这一读书方法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读书方法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学习、接受知识过程中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性。他对古今中外各类思想学说如饥似渴地博采广纳，但却从不在这一过程中丧失自我，食古不化，盲从照搬，而是始终保持着理性审视的态度，注重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伸张自我意识，经过批判、筛选、抉取，使所学的知识为我所用，为现实生活服务。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读书方法，可以说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读书生涯。（张平）

《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是由一个《天演论》和进化论的信奉者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天演论》作出审视和批判，肯定其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成分，指出其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成分。

【毛泽东评点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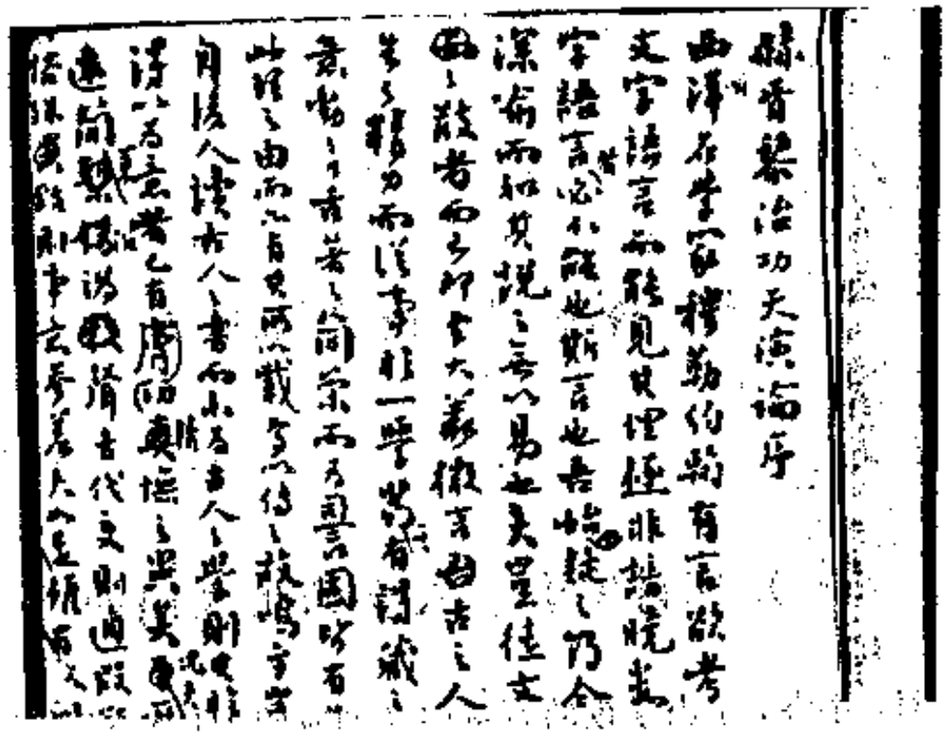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

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作品介绍】

《天演论》是严复所译英国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半部分。



严复《天演论·论序》手稿

赫胥黎（1825—1895）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享有与达尔文同样的声誉。他出生于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个教师家庭，幼时家境不好，早年失学，但他坚持刻苦自学，后入医学院学习。22岁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并先后出任许多学校的讲师、教授和名誉教授、校长，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面世，赫胥黎为之倾倒，成为达尔文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为之作出了许多理论贡献。1860年在牛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曾与威尔福克斯主教展开一场著名的辩论，有力地驳斥了上帝创世说，不但捍卫了达尔文进化论，也宣告科学已从神学中独立出来。70年代以后，赫胥黎的兴趣日渐转向科学与道德、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在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教学等方面，多有创见。如“不可知论”一词即源自他。其卓越成就赢得世界声誉，53个外国科学协会授予他荣誉称号。主要著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科学与道德》等伦理学作品，统收其《论文集》第九卷中，总标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该卷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多阐述进化论原理，后一部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严复（1853—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文、西学的有利条件，进行大量的译书、讲学活动，全面而系统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其主要译作有：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英国著名进化论伦理学家斯宾塞所著《群学肄言》，今译《社会学原理》；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今译《社会进化简史》；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著《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所著《穆勒名学》，今译《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以及英国思想家耶芬斯所著《名学浅说》等。严复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通过上述译作，系统介绍和引进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经典经济思想、政法理论、社会学

说、实证哲学、科学方法，开辟了“西学东渐”的新阶段，满足了广大爱国志士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迫切要求，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所阐述的是一种“超自然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他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对人类社会的演进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他不把社会进化作为是自然进化的自然延续，是整个自然进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他认为，“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不是相互同一的过程，相反，社会进化恰恰是在与自然进化相对抗中实现的；社会进化不仅“是对自然进化的某种层面上的超越，而且更是一种与之绝然对立的过程。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自然进化是以“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而社会进化却超越了这种自发的低下的状态，为文明社会的一种自为的有目的“理想选择”和“事乐竞争”的结果。社会进化过程所体现的是人根据对人有用和令人满意的理想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限制和消除自然状态下的自发的和盲目的选择和竞争。在此基础上，赫胥黎形成了其所谓“两种过程”的伦理观。这两种过程他分别称之为“伦理过程”和“宇宙过程”。所谓“伦理过程”是指人类以同情为基础的良心情感向道德情感的进化过程。所谓“宇宙过程”则是指在自然进化过程中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过程。支配这一过程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律则。因此，这一过程就是一种完全处于自发的自然状态之中的非社会化非人格化过程。而相反，伦理过程则是一种人们的“社会结合的逐渐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道德范畴和法律的约束，人们不再被自然进化中的原始法则所支配，形成动物和植物般的生存竞争关系，相反，他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结合将不

断强化，从而不断增进“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生存机会。”赫胥黎将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严格分峙对立起来，其理论旨趣在于揭示伦理力量之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意义，他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反之，“社会的进步，意味着对宇宙过程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谓之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以那些在道德上最优秀者以生存。”这就是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自然意味会逐步淡化，而其伦理意味将日趋强化；社会的进化日益表现为道德升华和超越。最终人类的道德存在将成为人类自然存在的依据。因此，人类社会的进化实质就是伦理过程对宇宙过程的抑制和取代，是对宇宙过程的自然状态的社会伦理化。为此，赫胥黎进一步阐述社会道德行为与自然生存斗争行为的区别，他强调指出，产生于伦理过程的道德行为不同于宇宙过程中的生存斗争行为，它要求以“自我约束”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他的同伴；而不是象自然状态下的生存竞争那样去取代、排斥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说在于使适者生存，勿宁说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它否定斗争的生存理论。由此可见，赫胥黎的伦理观，立足于人的社会性存在而非自然状态的存在，他更关注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更强调道德对于社会进化的意义。就此而言，赫胥黎的伦理观更富于集体主义的意蕴。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进化论伦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斯宾塞的伦理观有了明显的区别。斯宾塞依据所谓“广义进化论”，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笼统地归于“生物进化”

的范畴。用“生物进化”的逻辑来阐释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用动植物的本能活动来说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抹煞了人类社会中的道德文化现象与自然生物进化现象的区别，从而倾向于伦理自然主义。

应该说，严复《天演论》并不是赫胥黎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忠实译著。严复立足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甚至有改造，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从现实出发，“取便发挥”以“达旨”。因此，《天演论》就不仅“是一部译著，它还渗透和反映了译述者的思想和主张。鲁迅曾指出：“严复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他“做”过《天演论》。鲁迅的一个“做”字，十分准确地道出了严复《天演论》的突出特征。而严复只取原书名的前半部作为其译作的书名可以说是其“做”《天演论》的具体表现。前面已介绍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严格区分了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宇宙过程所通行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律则，而伦理过程则表现为人类道德的不断升华和超越；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化，将是伦理过程对宇宙过程的逐渐抑制和取代。因此在赫胥黎那里，人类不同于自然，人类社会的道德文化现象不同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伦理学不同于进化论。严复不同意赫胥黎这种将自然法则（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峙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不仅以书名取原书名一半的方式表达了其对赫胥黎的不满，而且在《天演论》中，不断通过按语加以批评。例如，在译述赫胥黎“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这

段话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按语："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弁矣。然有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妨正禽曾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本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正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奇，此其言群理，所以不差斯宾塞氏之密也。"这即是说，人类有所谓"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能够相爱互助，团结保群。但这样的道德现象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而不是原因，是"末而非常"。人本来与禽兽及低级动物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不同之同情心、"天良"、"善相感通"。因此，自然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在涉论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道理方面，严复认为赫胥黎上述观点不及斯宾塞缜密。斯宾塞竭力鼓吹伦理自然主义的普遍进化观，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受严复青睐。在《天演论》一书中他多处用斯宾塞来反驳赫胥黎，特别是用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来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斯宾塞任凭"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起作用，而不积极干预的"任天而治"、弱肉强食的思想。认为这是斯宾塞的"末流之夫"，强调要用赫胥黎张扬的"与天争胜"的思想来补救它。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曾指出："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

争。”

【试　析】

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作为一个以博学为学之道的求知者，毛泽东一直非常注意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知识，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进化论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更显其深。甚至晚年他还对《天演论》提出了自己的评价。

毛泽东最早读到《天演论》的时间是在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这一期间。

毛泽东1936年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提起他青年时的一段读书自修的日子。他说：“（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得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取著名的“湖南省高等中学”。入学后，他发现在这所学校所学课程有限，内容陈旧而校规又

很刻板，难遂其求知的愿望。于是便在半年之后，毅然退学，走上独立自学之路。1912 年秋到 1923 年春的这段日子里，毛泽东为了系统而有效率地读书学习，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决定每天到定王台下的省立图书馆去阅读。在这里毛泽东读了很多反映 18—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前引与斯诺的那段谈话，所讲的便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是毛泽东在这时候读到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研究者已查明，这则谈话所列诸书的书名与毛泽东当时实际阅读的著作是有些出入的。这或许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记忆有误，或许是当年谈话时的记录或翻译不确。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中文全译本，是由马君武翻译的，1920 年才出版，因而毛泽东不可能在此前读到。而他所谈的，很可能是一本与达尔文物种起源与进化学说在内容上相关的书，即《天演论》。另外，“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当是严复译本《穆勒名学》（论理学、逻辑）之误，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伦”谐音，故有此误。“斯宾塞的逻辑”，当是严译本《群学肄言》之误。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则是指严译孟德鸠编名著《法意》。

这一段读书生涯，在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迹，对日后其思想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这段自学生活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斯诺讲“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后来也对老同学说，这半年的自学生活是自己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参见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 年第 9 期）的确，

在这半年里，长期感染于传统文化氛围中的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大量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他不仅获取大量的新知识，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更受到空前的新启示，开始对传统社会和西方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他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启蒙。由此，他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逐渐抛弃康有为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

在毛泽东这时所阅读的西方名著中，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应该首推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这部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思想贯彻于对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之中的著作。

进化论概念首先是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学说则是由达尔文创立的。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震动当时整个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原始》）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论证了现存生物包括人在内，是自然界本身长期进化的结果。他指出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认为生物经常发生的细微而不定的变异，经过累代的选择作用，比较适合于当时外界环境条件的个体可以生存，并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产生出新的物种；而那些比较不适合外界环境的变异，就不能生存或不能传种，而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人类对生物界认识的伟大成就，在生物界和自然界认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权威，沉重打击了各种宗教唯心主义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在推动现代生物学进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给以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并指出，达尔文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

‘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认为，他（指达尔文——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他还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之一。

然而，达尔文进化学说只是研究生物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属于生物科学范畴。达尔文并没有将之引入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尽管他也曾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并发表了《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但是在这里他是把人类活动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不是社会学现象看待的。将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的始作俑者是达尔文的两个好友，同时又是达尔文学说信徒的斯宾塞和赫胥黎。他们以进化论为基本理论范式，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民族、道德和文化等现象，形成了进化论伦理学。其代表作品有斯宾塞的《化理学原理》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复中译本《天演论》。

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介绍和鼓吹进化论，是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严复接受进化论思想，并将之推衍至社会领域和历史领域，从而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严复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落至备受列强欺凌的悲惨境地，根本在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落后。严复认为，要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救国保种，首要的就是要以西方价值观念来改造国人精神世界，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而严复坚信进化理念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国人需要学习和培植的根本理念。因此他便竭力鼓吹和张扬社会进化学说。

严复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之下着手翻译《天演

论》的。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划分势力范围，要求瓜分中国，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而许多国人却对之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尤其是统治阶级依然以“天朝上国”自视，抱残守缺，不思改革。面对这种情景，严复痛心疾首，忧虑万分，他慷慨激昂地介绍、宣扬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强调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普遍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无论中国与外国，无论人与自然万事万物，都在这一规律的笼罩之下，“虽圣人无所为力”。其意在唤醒国人不要再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觉之中，不要再麻木不仁，否则必会亡国灭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严复揭示了这一自然法则的另一层意蕴，激励国人不应自甘作劣等民族，坐以待毙，而应奋起去“竞”去“择”，去“适应”社会历史的演化。因为，民族、国家兴衰胜败归根到底取决于其成员自己。《天演论》的出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以大量的自然科学事实佐证、慎密的逻辑演绎和崭新的思想内容，使当时沉迷的中国人领受了一次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启蒙教育，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眼界，鼓荡起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激起大批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的征程。不仅如此，《天演论》之于国人的影响，其深刻性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们通过阅读《天演论》，思想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思想和行为上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权威发动了激烈的挑战。自《天演论》出版之后，其所倡导的观念、口号迅速风行于世，深入人心，数十年间，“自主”、“自强”、“自立”及“竞存”、“适存”之类的词汇便广泛地使用作校名和人名。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进化论一直是

中国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主要思想旗帜。直到五四运动前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自然界和社会普遍定律。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氛围之中，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如饥似渴学习的毛泽东自然会受到进化论和严复思想的深刻影响。象严复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样，毛泽东也强调在世界上国家和民族的斗争中立于不败，就须高度重视国民精神的改造和重塑。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义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他主张“三育并重”、“文武兼备”，力求“变化民质”，塑造身心并完的新型人格形象，以拯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同时，进化论开辟了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先河，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首先是进化论的信奉者，而后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

后来，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又多次谈到达尔文和进化论、《天演论》。直到晚年还时常提起《天演论》及其作者。

上面已经提到，毛泽东曾在1970年评价《天演论》说，它的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个评价表明，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批判，即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它是唯物主义的，而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年，他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忆及他读过达尔文的书，钦佩达尔文的著作，并且称赞为达尔文辩护的科学家赫胥黎。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说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是说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指出了《天演论》及其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并引用马克思的话，将其称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本是列宁讲的。见《列宁全集》第14卷，215页。可能是毛的误记），也即半截子唯物主义——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显然，企图以"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不科学的。恩格斯指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一点也已为中国革命的历程所证明。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所说，为了抵

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进化论和《天演论》的社会影响便最终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并远远超过了《天演论》的影响、作用和地位，而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张平）

《金刚经》很值得一看

毛泽东读过一些佛学经典，早年还信佛，他在与班禅的谈话中，曾饶有兴味地谈起《金刚经》，认为“值得一看”。做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为什么要读《金刚经》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

——摘自毛泽东1961年与班禅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介绍】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①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③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④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⑤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

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纪念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根据梵文并对照 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

释论甚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著《金刚般若论》2卷，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3卷，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2卷。另有师子月、月官等亦撰有论释，但无汉译本。中国从东晋、隋唐直至清末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1卷；隋吉藏《金刚经义疏》4卷（一作6卷），智顗《金刚经疏》1卷；唐慧净《金刚经注疏》3卷，智俨《金刚经略疏》2卷，窥基《金刚经赞述》2卷，惠能《金刚经解义》2卷、《金刚经口诀》1卷，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2卷；宋子璿《金刚经同刊定记》4卷；清徐槐廷《金刚经解义》2卷；近人丁福保《金刚经笺注》等。日本则有空海《金刚经解题》1卷，法树《金刚经诸译互证》3卷，光谦《金刚经破空论俗谈》1卷，楞伽道人《金刚经讲义》1卷等。（苏渊雷）

【试　析】

毛泽东对《金刚经》的评点见诸他在与班禅的一次谈话中。1961年1月22日毛泽东对班禅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4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接着说："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

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3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毛泽东读过一些佛学经典，并且在早年由于受母亲的影响，也信佛，接触过一些佛学知识。他在1936年曾对斯诺讲道：“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但有趣的是，当父亲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的时候，毛泽东却“越来越不信佛”了。

离开韶山，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了一些佛学知识。1917年暑假时，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游学”期间，曾到过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内收藏的各种佛经，还向方丈请教过一些佛学问题。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对此有所记述：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方丈室，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

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八百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一百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

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以后，毛泽东读了一些佛教经典，包括《金刚经》。关于阅读宗教典籍，1961 年 1 月同班禅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过：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综合来看，毛泽东认为《金刚经》"值得一读"，有这样几条原因。

第一，是因为《金刚经》是一部佛学经典著作，反映了佛学的重要观点。《金刚经》被不少人推崇为佛家的至高无上的精妙宝典，有人将它的地位比于儒学中的《中庸》，道学中的《老子》，可见其地位之高。《金刚经》记录了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言简义骇，微言大义，其文看似简单易懂，实则深奥晦涩。其中心是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定。世俗世界的一切现象，"如梦幻泡影，亦如露亦如电"，人们所见所思维的一切对象均属虚妄，人们用言语表达的事物，包括佛的说法，都非真实。因此对现实的一切不必留恋执著。此经弘传甚盛，并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毛泽东认为《金刚经》值得一看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作好群众工作，这是一个群众问题。只有懂得宗教，懂得群众的心理，才能作好工作。关于这一点，除了上面引的毛泽东同班禅的谈话中已讲了的，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50 年代，一

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1959 年 10 月 1 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 年 5 月 25 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六祖坛经》是记录禅宗南宗开创人慧能的行述与语录的佛学经典。毛泽东称这部著作是劳动人民的，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

【毛泽东评点原文】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

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即《六祖坛经》——引者注〕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甄不贾：《毛泽东谈佛论禅》（见《希望》1992 年新总第 2 期）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摘自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2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兴国著《毛泽东与佛教》第 112 页，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作品介绍】

《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六祖”指禅宗南宗开创人慧

能。此文献记录了慧能的行迹及语录。已知的《坛经》有十几个本子，一般认为真正具有代表性及独立性的只有四种。这四种类型的《坛经》为：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改编本、宗宝本。法海本为现存最古老的本子，但真正的古本，即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说法时其弟子所作的原始记录，今已无从得见。法海本亦即敦煌本和伦敦博物馆藏本；惠昕本为中晚唐僧人惠昕改编过的本子，即题为《六祖坛经》；契嵩改编本于北宋时出现(约1056)，有说即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宗宝改编本则完成于元代（1291），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估计《坛经》出现于六祖慧能去世后50年中，即8世纪中叶。随着禅宗流行发展，本来组织就很松散的禅僧为了扩大影响，一再改编《坛经》。

从现存的本子内容来看，《坛经》是南方的禅宗发展成熟的结果。它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慧能在广东韶关大梵寺的说法，这是禅宗思想的主体。它包括了慧能对于僧俗两众的公开说法，传禅及授戒的内容等。也就是在大梵寺登坛说法和授无相戒的这一部分。二、慧能的生平简历和背景。三、平时与弟子们机缘交接时的语录，慧能的嘱咐语。这是有关佛法的问答。三者当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第一部分。所有不同的《坛经》本子分量虽有差异，但第一部分是基本一致的。第一部分也是形成最早的。学者研究，第二部分大致与第一部分同时，各本子差异最大的也就是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中的内容也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及“授无相戒”。前者也就是“我此法门，定慧为本”引出的一行三味、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坐禅等一大套授禅法实践。其次是“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下所说的于自色身归依三身佛，发四大弘愿，无相忏悔

和无相三皈依。无相戒是慧能所物有的大乘戒法。第一部分中的两大内容在不同本子《坛经》中是稳定的。

通过不同《坛经》本子内容上的差异，正好揭示了禅宗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轨迹，各支派的历史演变。例如敦煌本中有慧能在讲堂中升高座说法的礼仪记录，这就反映了本来处在山野林间的禅僧，已经成为了官方接受并支持的一个佛教宗派。因为以往神会只是“设坛讲法”，而无住也只是“严设道场，高座说法”。有“讲堂”已经是禅院内有相当规模后的事了。从《坛经》中可以看出早期南宗的一定仪礼，如慧能说法时的情形：“能大师言，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身净心。良久乃言……”。以往在讲经前多为念佛以求静心，这里则是口诵摩诃般若，显示其宗旨本来就以般若慧为归依。《坛经》中还显示了禅寺中的行事仪则，如说法时，先为听众授“无相戒”，令其“归依三身佛”，“发四弘誓愿”，作“无相忏悔”，最后又是颂“无相偈”。总之，规范化了的说法仪则——净心、说法、授戒、归依、四弘誓、忏悔、作偈颂——说明了禅宗的制度化过程。

再从思想内容上看，《坛经》涉及了禅宗的根本理论和实践。这就是各家版本一律遵奉的宗旨：无念、无相、无住。《坛经》中最为基本的思想都在大梵寺说法中，也就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顿悟菩提等。慧能的教旨是要求习禅者在不刻意追求觉悟与解脱的自然状态下，明心见性，顿入佛地。慧能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对《金刚经》的心解，《金刚经》上就说智慧般若与法空不二，其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更是对慧能“三无”的直接启发。因之《坛经》中特别突出了《金刚经》的地位。《坛

经》中这种强调不依赖外在力量而返求自身内在的修行方式和认识途径，简化了佛教徒获得觉悟、达致成佛的过程和阶次，成佛的依据——佛性，成佛的工具——般若智和成佛的结果——菩提，完全是同一性的。这种理论如果推到极致，将会产生强大的批判力。无论是对后来佛教中思想家，还是对于教外的改革家，禅宗的思维方法和自我扩张的大无畏精神，始终是思想创造的动力和源泉。这也就是禅宗和《坛经》在中国历史上深受士大夫欢迎和欣赏，并在中国思想史上得以产生持久而强大影响的原因。

《坛经》问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风格在充分汲收来自异域的佛教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它独立的品格。印度有它的禅学，但只有中国才能产生如此理直气壮的“自心是佛”的呼声，才敢毫不犹豫地斥责“往生净土”的愿望：“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土就有禅僧活动，就有禅的思想，则真正中国式的禅学理论体系也是此时才成熟而结丰硕之果的。中国的心性之论即将从此而展现其丰富而灿烂的光彩。它预示着心学所特有的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精神的高扬。《坛经》中倡导的“自行佛行”，“自成佛道”的思想倾向直接反映于后来的陆王心学之中。中国佛教已经至此而完成了向内在用功夫的努力。《坛经》将佛教徒通常具有的对佛祖的外在崇拜化为了对内的自我崇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鬼神之说的批判，也是对以往天命观和皇天上帝的否定。当然在高扬自我的同时，《坛经》毕竟不会走得过远，它还保留着对成佛的憧憬，只是将成佛的依据转到自心上面。（黄颂一等）

【试　析】

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尤其是六祖慧能。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回忆道：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到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在1958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讲到了慧能，认为他"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并赞扬慧能敢于否定一切。

从以上的回忆与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慧能在中

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使得人人易懂，人人易学。这样就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因为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只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另外，禅宗的人人心中有佛性，求佛只需直指人心等理论，也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关于毛泽东讲慧能高扬主观能动性一点，可从慧能针对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提出的四句偈看出。

慧能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四句偈：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和上惹尘埃！

可见，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解脱苦难。也就是说，人们要解脱苦难，不必向外面寻找原因，只需要内心用力即可。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慧能“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但慧能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突出主观能动性的，因为他否认一切外界条件的制约，只讲内心解脱。所以他只强调“自性”、“身中净土”：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住处恒安乐。（《坛经·疑问品》）

这正是毛泽东说的“惠能敢于否定一切”，因为他实际上将西方净土也否定了。毛泽东讲慧能说人死后不一定升天，也是从这段话中引伸出来的。

至于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在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的谈话时讲的，《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一语，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据专家分析，毛泽东这一说法的根据之一，可能就是因为慧能是劳动人民出身。慧能少时家贫，曾卖柴为生。据《坛经》记载，他自己说过：“惠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慧能并且是通过卖柴，了解弘忍说法，而因往黄梅冯墓山参拜弘忍和尚的。慧能见弘忍大师之后，“忍大师山中门徒至多，顾眄左右，悉皆龙象，逐令能入厨中供养，经八个月。能不避艰苦，忽同伴戏调，嶷然不以为意。忘身为道，仍踏碓，自嫌身轻，乃系大石著腰，坠碓令重，遂损腰脚，忍大师因行至碓米所，问曰：‘汝为供养，损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见有身，谁言之痛。’”（《曹溪大师别传》）慧能碓米时因身体太轻，于是在腰上系一大石以增加重量，遂导致腰脚损伤。范文澜曾以此为例说明“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郭朋则指出：“在佛教各宗的创始者当中，家境贫苦、出身寒微的，也只有慧能一人。……原来，其他各宗的创始人，例如智顗、玄奘等等，不仅多是出自高门，而且都是深有学问的‘高僧’。这些情况，

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不稀罕’啦。禅宗，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派，那末，它的创始者，自然也应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大概正是因为慧能出身的这种“与众不同”，所以毛泽东把《坛经》称之为“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说《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的另一根据，可能就是肯定慧能佛性论中的平等思想。所谓佛性论，就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本来，中国佛教除三论宗和唯识宗外，其他各宗都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顿悟”成佛却是慧能的独创。慧能不仅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突出强调下层人民成佛的可能性。据《坛经》记载，当慧能第一次去参拜弘忍时，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弘忍责慧能：“汝是岭南人，又是獦，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獦”是当时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慧能的回答表明，他认为“佛性”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均等地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又如惠昕本《坛经》在记述慧能请“别驾”为他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的偈时，别驾对他说：“獦！汝亦作偈，其希有！”慧能答曰：“若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俗谚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慧能这种“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和替劳动人民在文化领域争地位的思想，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逻辑与逻辑学》颇为新鲜

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爱读逻辑学书，热衷于逻辑这一方法、工具的探究、掌握与运用，是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典型侧面。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在激起毛泽东浓厚兴趣的同时，更启迪了他对逻辑的认识。

【毛泽东评点原文】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　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　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作品介绍】

《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出版于1937年10月，为潘梓年所作，是当时颇有见地的逻辑学专著。潘梓年（1893—1912）当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早年因从事进步文化事业，于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此书便成书、出版于他被释放出狱之时。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可见，《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对逻辑性质的探讨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一读而过，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而且其中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对苏联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敢想敢说的结果”。

【试　析】

收到刚出版的潘梓年所著所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之

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

得书当日，看至93页，创他这一段时间读书速度之最高纪录。据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接下去的两天，毛泽东一气呵成读完了这部长达204页的逻辑学学术著作，28日又回头拾起被搁置的《战争论》。身处战争年代，肩负对战争进程、前途与民族命运认知与把握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不惜搁置直接关乎当时时局的战争理论去读一本似乎远离时局的逻辑著作，而且其阅读速度之快，兴趣之浓，感受之深，其对逻辑学这一学术问题兴趣之盎然，其作为一哲学家品性之鲜明昭然若揭。

一气呵成之中又感“颇为新鲜”，是毛泽东对潘书“敢想敢说的结果”的认可与肯定，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潘书中把逻辑学作了方法与技术的区分。认为辩证法、形而上学是思维方法，而形式逻辑是思维技术。这样形式逻辑便只是思维和技术而不是思维的方法，其地位虽有所下降，但正是在返本归正之后形式逻辑才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形式逻辑既然“只配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而没有资格充当思维方法，那么它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这是潘氏技术与方法之分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潘书由于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状态”，不自觉地又溜进了思维的内容，使其对形

式逻辑性质的认识与叙述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潘书没能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正确的结论。尽管如此，潘书中对技术与方法的区分，及包含在其有些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体系中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还是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之所以感到“颇为新鲜”，当有感于这种区分及这种区分必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当有感于这种区分和结论是以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苏联观点所构成的挑战，当有感于潘书中这一创造性的思想成果对自己已有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已构成转换的契机。我们知道，1930 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 1940 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在毛泽东于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 4 日仔细阅读并大量批注的由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教程》中看到。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把形式的论理学等同于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又进而等同于形而上学，未加任何论证的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就先验地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并偷偷地塞进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形式逻辑莫须有地担当了一切有关形而上学的“罪名”，形式逻辑在地位“提升”的同时，不仅无辜地

充当了“替罪羊”，背负骂名，而且使自身遭受形象的扭曲乃至地位的丧失。正是在这样一段对形式逻辑“不公”的裁决的旁边，毛泽东曾用毛笔写了一段这样的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里毛泽东同样把批评形而上学中的话不适宜地加在了形式逻辑的头上，表达了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中对形而上学“不公”裁决“案件”的认可。乃至到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其中有一节关于“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的讨论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可见1938年3月25日得潘著之前，毛泽东基本上接受的是苏联教科书中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形式逻辑的否定与批判，相形之下潘书中关于方法与技术的区分，把辩证法、形而上学与形式逻辑在相互区分的基础上，又在思维的不同层面上统一起来，方法与技术、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形式逻辑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形式逻辑在技术的层面上确立了自身的权威，已有的和新获得的关于形式逻辑性质的观点和取舍的裁定如此不同，乃至截然相反，而且几乎同期或者说相距时间不算远，投射在同一个思维背景上，当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形式了强烈的反差。新获得的对已有的造成很强的冲击波，毛泽东之感“颇为新鲜”也就不足为奇，而且反差越大，冲击越强，其感受越深、新鲜感越鲜明。这也是毛泽东读书的妙趣之一吧。

乃至于潘书不仅以其“敢想敢说”独立思考的成果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而且成为毛泽东对逻辑性质的认识变化的契机。毛泽东对逻辑性质的认识应该

说就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时的这种“颇为新鲜”的感受开始的。在其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不仅一直保持了对逻辑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学术争论的关注，而且得以在争论激烈的双方公开自己的立场，坚持、支持正确的观点。尤其在我国建国初期（50年代）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中，其当初“颇为新鲜”的感受慢慢冷静积淀下来的对逻辑问题的理性、客观认识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正因为潘书《逻辑与逻辑学》作为毛泽东对逻辑性质认识得以转化并成为其朝着正确方向推进、深入的出发点，所以对该书极为珍视。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时，潘书曾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书》，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直到逝世。（王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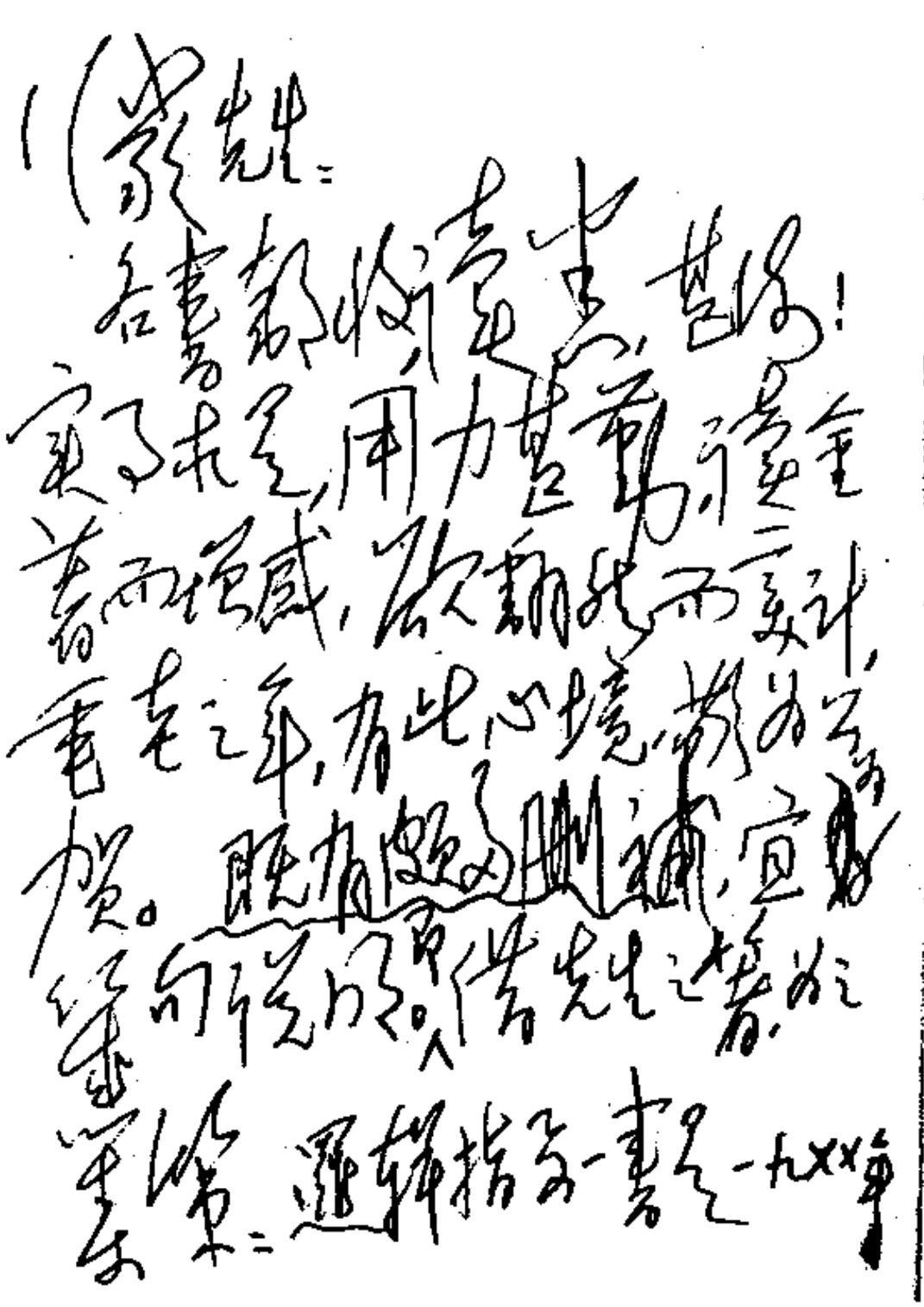
《逻辑指要》足以为今日之参考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解放前的旧作。1959年根据毛泽东提议选编的一套《逻辑丛书》把《逻辑指要》列入其中。毛泽东没有因为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弃之，认为“学问之事，庸何伤”，并亲自为其代写说明。

【毛泽东评点原文】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



毛泽东1959年致章士钊的信

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　士　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

——摘自毛泽东1959年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点，然大抵从西籍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剌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摘自毛泽东与章士钊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8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介绍】

《逻辑指要》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书》中的一部，作者为章士钊。此书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作。1943年，经重新整理后在重庆出版。关于出版此书，书中所附的一篇作者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励，君励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嘱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

尽管这部书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但书中体现的学

术观点却有相当价值。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它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和谬论，提出“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认为普通逻辑中所论及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等，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找到源泉和实例。这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试　析】

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此书重刊写的（未用）序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子蹴踖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见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矍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漏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缛译得来，不足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批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刊行。”从这段序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著述，此书“与叛党有关”之事他不会一无所知，但“学问之事，庸何伤!”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

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不排除主要由于上述原因，1959 年根据毛泽东提议选编的一套《逻辑丛书》把《逻辑指要》列入其中。这适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毛泽东对该书重版事宜表现出很大的关心。1959 年 6 月 7 日，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接着附上了为其代拟的一篇“说明”：

>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校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毛泽东认为在《逻辑指要》重刊时作这一说明“有很大好处”。但在信的末尾还是表示尊重章的意见：“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六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上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很多还是用的毛泽东的原话。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此后毛泽东就将这部书一直保存在身边。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看不错

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毛泽东却支持他，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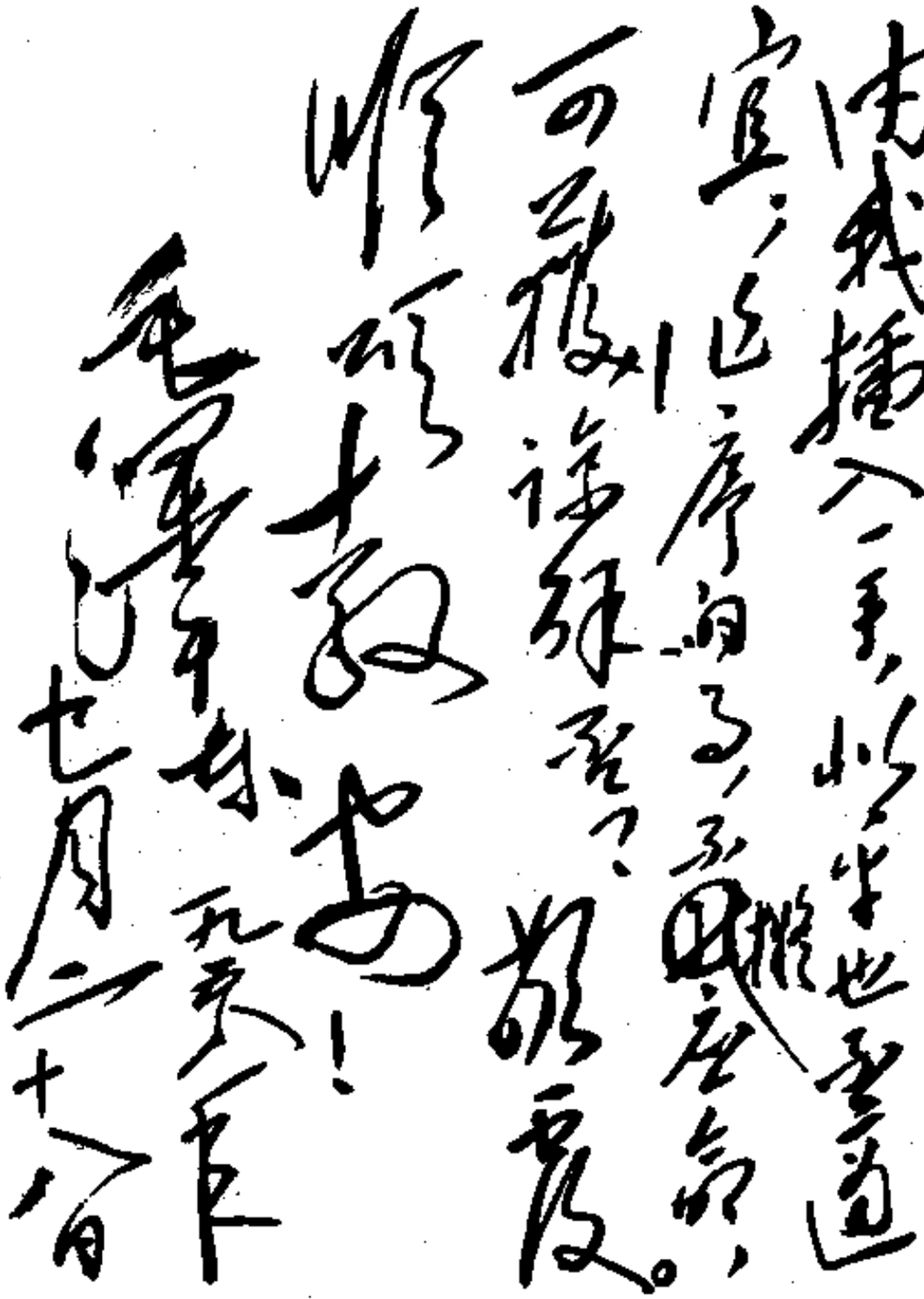
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1958年致周谷城的信（部分）

【作品介绍】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周谷城

一、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

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对事物有所主张；形式逻辑则不然，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正因形式逻辑对事物没有主张，它便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例如形而上学说“凡人皆有死”，形式逻辑对此因无主张，正可依此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论式，如：“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亦必有死”。又如形而上学说“凡金属是不能溶解的”，这当然不对；但形式逻辑依此，也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论式来，如“凡金属是不能溶解的”，“金子是金属”，“故金子不能溶解”。这便是形式逻辑替不正确的主张服务了。主张有对的，有不对的，依主张所演出的论式，其自身却可以都正确。主张的对与不对，要看它与事实符合不符合才能定；如“金属不能溶解”的主张与事实符合，便当算对，否则为不对。论式的正确与否，却只须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就可以定。如前面两个论式的自身，前后都不矛盾：“张三有死”与“凡人皆有死”不矛盾，“金子不能溶解”与“凡金属不能溶解”不矛盾，故两个论式的自身都是很正确的。主张有对有不对，论式却只许正确，不

许不正确。形式逻辑如果只能替正确的主张服务，不能替不正确的主张服务，那它应早与形而上学绝缘了。而事实却不然，可见它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

我们反对形而上学，但不一定要反对形式逻辑。正如我们击溃了敌人时，缴获的枪械中如还有我们可以用得着的，我们大可以留用，不必一律予以销毁。形式逻辑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但落到我们手里，也可以为我们服务。我们说“凡存在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运用形式逻辑，依这主张，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论式来，如：“凡存在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中国社会是存在的事物”，故中国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又如我们说“社会发展是不一定有阶段可言的”，这当然不对。但我们运用形式逻辑，依这主张，也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论式来，如：“社会发展是不一定有阶段可言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发展”，“故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一定有阶段可言的。”这里的两个论式都是很正确的；但两个论式所代表的两种主张，却有对有不对。主张已不是形而上学的了，也有对与不对之分。我们运用形式逻辑，依两种不同的主张演出两个论式，也都可以正确。这可见形式逻辑在我们手里与在形而上学手里都能服务；可见它做我们的工具，为我们服务，与做形而上学的工具，为形而上学服务，都是可能的。

形式逻辑能为我们服务，是一事；是否因此就要把它与辩证法并列起来，又是一事。有人说：“辩证法从发展、运动、联系和相互作用来考察现实现象，这并不排除有考察现实现象底最简单关系之必要，并不排除有把它们看作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和特定的具体条件下是稳固的、确定的、分离的现象之必要。……在整个现实中进行着的发展、变化、对立底斗争；并

不排斥现象、对象或事物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的某种相对的稳定。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着的，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些变化是不大的、不显著的，并且对于实践的目的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对象保持着相对的不变，那末在考察这个对象时可以充分地应用思维底四个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种说法的主要目的在给形式逻辑一个应有的地位，我们完全赞成。不过我们如不了解这个主要目的之所在，而认为这是划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界限的，其结果反会使我们误认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而认两者为同一系列的学问，从而看不清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正确关系。

这里我们且就可能有的一些困难略为谈谈：第一，在某些特定时间内相对稳定的东西可用形式逻辑来处理；然则不在这些特定时间内遇到了很不稳定的东西就不可以用形式逻辑来处理吗？若果如是，则形式逻辑的用处就太少了。第二，那些变化是不大的、不显著的，对于实践的目是无关紧要的；那些变化是大的、显著的，对于实践的目的是关紧要的；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定的界限。因之那里用辩证法，那里用形式逻辑，都不易确定。第三，即使变化之大小的界限可分；然小的变化，竟小到对实践的目的无关紧要了，那末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于这种小的变化根本都不必要，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第四，变化之大小的界限虽可分清，然大小两种变化都是变化；形式逻辑处理的是变化，辩证法处理的也是变化；两者的对象相同，试问彼此之间还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们反对形而上学，连形而上学所用过的形式逻辑一并反对，不可。我们尊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搬到与辩证法同一系列，更不可。

形式逻辑不可与形而上学混同，又不可与辩证法并列，然则究竟是哪一类的东西呢？这里我们可以一言蔽之曰是帮助思维的东西。它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但不可与辩证法并列。辩证法要了解事物；形式逻辑则根据对事物已有的了解，依思维形式作各种推论，使了解更正确。了解事物，须与事物作斗争，须有感觉经验等；根据已有的了解作推论，则不与事物发生直接关系也可以办到。讲形式逻辑的教师，也许列举些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为例，说明形式逻辑的规定；但目的仅止于此，那些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却不一定是他研究出来的。辩证法则不然：自始就要求我们对实际事物作斗争，要我们了解对象。列宁有言曰："形式逻辑……以最普通的，眼睛常见的东西为指导，采用形式的定义，并以此为限。……辩证逻辑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对象，……"① 这区别是最基本的。由此区别，我们不但可以晓得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不同，而且晓得两者相互的关系：辩证法要我们往前进，要真正了解一个对象；形式逻辑要我们根据已有的了解，作正确的推论。了解对象，必求"了解"与"对象"之间的符合；据已有的了解作推论，则求了解本身前后不相矛盾。辩证法指挥我们获得，形式逻辑则帮助我们进行推论。前者可以创造关于宇宙的新知，后者可以纠正关于认识的前后矛盾。创新与正误，都是认识真理所不可少的。学会了辩证法，知道一些东西。也许思考不精密；学会了形式逻辑，头脑很清楚，也许除了形式逻辑以外，一无所知。为求有所知，必须依照辩证法向实际中摸索；力求所知的东西内部很调和，前后不矛盾，则必须运用形

① 列宁：《再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版，第76页。

式逻辑，作推论工夫。照这样说来，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区别，却时刻不能分离。讲到这里，有一问题须随着解答。前面我们说过，学会了形式逻辑的人，也许除了形式逻辑以外，一无所知。学会了辩证法的人，不也可能除了辩证法以外，一无所知吗？不错，这是可能的；专攻辩证法，而不拿它与任何实际相结合，结果除辩证法的条文外，可能一无所知。因此辩证法虽是形式逻辑的主人；但离开了实践，不与实际结合，也不能发挥作用。要救此弊，只有诉诸实践。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①

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基本差异

形式逻辑不能与形而上学混同，也不能与辩证法并列，而是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似的学问，既如上述。现在我们且进而研究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基本差异。这可先从两者所依据的法则或规律讲。辩证法的法则虽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的，但这些法则都存于事物之自身，即都存在于自然界，都是事物自身存在、发展、变化之法则。斯大林谓辩证法把自然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把自然状态看作不断发展的状态，把发展过程看作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把对立的斗争看作由量变到质变这一过程的内容。这固然是辩证法的看法；但这"看法"可以使用的理由就是因为事物自身之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是与这看法符合。先有事物自身之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这些法则反映出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就成了我们的工具，可以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86页。

导我们认识事物，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法则。认识的法则是事物自身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之反映。没有事物自身的法则，便不能有我们掌握的法则。由事物自身的，翻转为我们掌握的；由客观实在的，翻转为主观运用的，于是我们有作工具用的辩证法。故辩证法所依据的诸法则，自始就是属于事物自身的。

形式逻辑则不然，它的法则只是规定推论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三段论式的规则说："每一论式中，只能有三个判断和三个名词，不能多也不能少"，"每一论式中的中名词，在两个前提中，至少必须周延一次"，"名词在结论中的外延，不得大于在前提中的外延"；"由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结论；前提有一为特称，则结论也必是特称的"；"由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得结论"；"前提有一为否定，则结论也必是否定的"。凡此等等，只在作推论时有用；不作推论时，这些都用不着。例如"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亦必有死"的论式中有三个判断，不多也不少；有三个名词，即"人"、"张三"、"有死"等，不多也不少。这论式中的中名词是"人"，它位于"张三"与"有死"之间作了一次媒介，把"张三"与"有死"的关系给说明了；它在第一个前提，即大前提"凡人皆有死"中周延了一次，意即这一次它代表了人类全体。结论"张三亦必有死"中"有死"一名词的外延并不大于第一前提中同一名词的外延。这论式的两个前提中有一个是全称，并非两个都为特称，故可以得结论；又第二前提"张三是人"为独称，范围较特称虽更小（独特有时亦算全称）但结论亦为独称，范围并不大于独称的第二前提。全部规则，这论式都能一一符合，故这论式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论

式。论式之能够正确，就靠有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规定推论过程的，即列宁所谓形式的规定，对于事物自身却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虽然，这些规则的依据实际上有一条公理，即全量大于部分的公理，似为属于事物自身的。但仔细检查起来，这条公理只是推论规则的依据，对于事物自身之存在、发展、变化，依然没有什么说明或解释。

此外更有四条著名的规律，是形式逻辑学者所最重视的，即所谓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是也。这四条规律中，除充足理由律外，其余三者可归并为一条，即同一律是也。同一律谓凡物必同一于其自身，如“人就是人”即同一律的表现，因为“人”与“人”是同一的，“人非非人”，即矛盾律的表现，因人“人”与“非人”是矛盾的；“人不能同时是人又非人”，即排中律的表现，因为“人”与“非人”既相互矛盾了，不能同时又互相一致。矛盾律实即同一律的反面，排中律实即同一律与矛盾律的结合，我们研究时，只研究同一律可也。同一律不是事物自身存在、发展、变化之法则。恩格斯有言曰：“甚至在无机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每一物体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修改它的同一性。”① 没有真正的同一，便无所谓同一律了。

不过同一律虽不属于事物自身，但在形式逻辑中却有它的地位。每一论式中的判断，都要依据同一律或矛盾律。例如“凡人皆有死”的一个判断，便是依据同一律而作成的；“凡人非不死”的一个判断，便是依矛盾律而作成的。判断所代表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事物虽时时变化，人、有死之物、不死之物虽时时变化；但在“凡人皆有死”的判断中，人与有死之物总是同一的，或不矛盾的；在“凡人非不死”的一个判断中，人与不死之物总是矛盾的，或不相一致的。判断是论式的构成部分；判断既然要依据同一律或同一律的反面矛盾律，那末论式自然是依据同一律或同一律的反面矛盾律而构成的。自然界的事物中尽管无同一律可言，但关于事物之认识的判断及论式却非有同一律不可。事物自身尽可以是变化的，但推论的方式却只能在某时限内不变。以“同一的”推论“不同一”，以“暂时不变的”推论“经常变化的”，以形式逻辑的符号推论辩证认识的所得：这等关系的本身也可以说是“辩证的”，亦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正确关系。形式逻辑的本身，自古至今，变化并不甚大；然而自古至今，变化万端的事物，常用它来推论。这一点我们且留到后面再谈；我们在这里，只要明白下之一义即得：同一律虽然存在，却不是事物自身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只是推论式中构成判断之依据而已，只是在推论中对一个前提不任意变更而已。

同一律仅为推论式中构成判断之依据，固如上述，充足理由律，则又与此不同；它虽是正确的认识所必需，却非形式逻辑所真不可少。形式逻辑中的每一个推论，虽有一个大前提作为推论的依据；但这样的依据，并不一定是充足的理由，有时只是一种假定的理由。大前提一出，形式逻辑便可据以为推。推论的错与不错，当然是要注意的。但错与不错，只问前提与结论之间有无矛盾，初不必问大前提本身有无充足理由。要检讨大前提成立的过程，要问它有无充足理由，是实践的事，是向自然界摸索的事，是与自然事物作斗争的事。实践、摸索、

斗争的结果，可能获得一种理由很充足的认识，或与事物真相很接近的认识。但形式逻辑中的推论，却不一定注意实践功夫；它的任务偏重依据大前提来作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故充足理由律虽是正确的认识所必需；没有充足的理由，即不能有正确的认识；然在形式逻辑的推论中，却并不一定被重视。假如每次推论，都要寻出充足理由，则形式逻辑将与其他科学没有区别，或将其他各种不同的科学一一包办起来。例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心理学等，都是要寻找充足的理由，建立知识系统的，假如形式逻辑每作一次推论，即寻找一次充足理由，则它的任务必与其他科学相同，而失去形式逻辑的品质。我们尊重各种科学，却不必把形式逻辑挤入各科之中；形式逻辑独立成科，亦决不至降低其固有的价值。各科要从事物中寻找充足理由以为认识事物的凭据；形式逻辑则只须有各科现成的认识，便可据以为推。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但各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在任何求真的过程之中，却离不开形式逻辑。任何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或求真过程中，必须一面问自己所知的与客观实在符合不符合的，另一面问所知的内部前后矛盾不矛盾。

综括看来，充足理由律虽为正确的认识所不可少，然未必为形式逻辑所必需；例如揭发论敌的错误就常有意地根据错误以为推。至于真正的同一性虽在自然界中看不出来，然在形式逻辑之推论中，确有构成判断所依据之同一律。至于规定推论过程之诸种规则，是形式逻辑所独有的，则更是很显明的事。这正与其他科学各有其自身应用的规则一样。各科自己的规则，都是各科的对象决定的；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思维过程，是

推论方式，故它有其一套规则，有其一套从无数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规则。

三、形式逻辑的功用及其工具性

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所依据的法则或规律看，两者的基本差异，略如上云。现在再从形式逻辑的工具性上着眼，看它有一些什么功用。形式逻辑是工具，是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的学问，前面已经讲过。它的任务重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或了解。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或了解，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这结果可作形式逻辑推论的根据。例如我们说：金是金属，金可溶解；银是金属，银可溶解；铜是金属，铜可溶解；铁是金属，铁可溶解；……是金属，……可溶解；故凡金属都可溶解。这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推论式：由金、银、铜、铁……之可溶解，推论到凡金属都可溶解。金、银、铜、铁等之是否真可溶解，并非形式逻辑所能决定，而是长期实践所决定的。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得到了一种近于真相的了解或认识；形式逻辑可用归纳推论式使已有的认识更为扩大。从这一例，可知形式逻辑是实践的工具。以“凡金属都可溶解”为大前提，又可得出一个演绎推论式，如“凡金属都可溶解”，“锡为金属”，“故锡亦必可溶解”。这个论式中，锡是否真为金属，也非形式逻辑所能决定，也是长期实践所决定的。但一经决定了，形式逻辑便可据以为推，使已有的认识更为具体。从这一例，又可知形式逻辑是实践的工具。除归纳推论式、演绎推论式外，形式逻辑中更有所谓类比推论式者，如：“锡是金属”，“锡在溶炉中由固体化为液体的现象与其他金属在溶炉中所起的变化完全相同”，“故知锡亦可溶解”。这论式中，锡在溶炉中所起的变化是否与其他金属所起的变化相同，也非形式逻辑

所能决定，也是长期实践所决定的。但一经决定了，形式逻辑胥可据以为推，从已知认识未知。由这一例，又可知形式逻辑是实践的工具。

这工具究竟有什么用呢？分别说来，有很多用处。它能把已有的知识由隐藏的地位推到显著的地位。例如“凡金属都可传热”的一个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识，当是任何金属都已包括在内的知识。不过包括在内的若不予一一揭出，便只是隐藏的，不是显著的。我们运用演绎推论一一给揭出，谓金、银、铜、铁、锡等都是可以传热的，那便是把隐藏的知识推到显著的地位。由隐推到显，使认识更明确，这是形式逻辑的用处。形式逻辑又能把个别的知识归并起来使范围扩大成为整体的。例如“金是金属，金可传热”的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识，究竟只是个别的知识；又如“银是金属，银可传热”的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识，也只是个别的知识；其他如铜、铁、锡等也都一一被认识了，是可传热的，但仍都是个别的知识。我们运用归纳推论，使范围扩大成为整体；谓“凡金属都可传热”，那便是整体的知识。知识固然要明确，同时也该很完整。演绎推论把隐藏的知识转成明确的，归纳推论把个别的知识转成整体的。至于类比推论，则更能从个别事物之已知的相同条件推论未知的现象或因素或作用等。例如金是能传热的；银是否能传热，不得而知；但我们拿银与金一比发现银在溶炉中所起的变化，与金所起的变化相同，此外还有种种相同的条件，因知银亦能传热。这竟是由已知推到未知了，不仅推论已有的知识前后矛盾与否而已，当然更是形式逻辑的功用。

形式逻辑固然能把已有的知识由隐推到显，由零推到整，或更凭已知的条件推论未知的现象或因素或作用等；但万一已

有的知识根本就是错误的，而形式逻辑却仍依据它作出正确的推论，那不成了帮助错误吗？诚如此，形式逻辑能依错误的知识作正确的推论，意即把错误如量推论出来。在形而上学手里，形式逻辑几乎经常据错误的认识以为推。但这不是形式逻辑的缺点，这仍是它的功用。就知识的扩充进展说起来，正确的知识应该由隐推到显，使我们对它本身的认识更明确；同时，错误的知识也应该由隐推到显，使我们对它本身的认识更明确。正确的知识之敌人，不仅只是错误的知识，而且是错误的知识之隐藏。把错误的知识隐藏起来，使是非不明，那是知识扩充、进展的大敌。我们革命，要分清敌友；我们求知识，要分清真伪，要分清何者为真的正确的知识，何者为假的错误的知识。对敌人要认得清楚，才好推进革命；对错误的知识要认得清楚，才好谋正确的知识之进展与扩充。正确的知识是从错误的知识中斗争出来的；形式逻辑能把错误的知识由隐推到显，正好发挥了它的工具性，表现了它应有的功用。

上述这些功用是很有价值的，是形式逻辑所以能存在的理由。英美资产阶级学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伪装进步，反对形式逻辑。英国失勒（F.C.S.Schiller）著形式逻辑一书，专门批评形式逻辑，谓形式逻辑不能指导实际生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美国杜威（John Dewy）著思维术及实验逻辑论丛等，从正面说明自己的主张，谓实验逻辑可代形式逻辑。其实形式逻辑，并不因他们的批评而失去价值；他们所谓实验逻辑，更根本不成其为逻辑，而只是一种力谋迁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术。我们讨论形式逻辑，与他们的批评截然不同：我们要揭出它的工具性，明了它的应有功用，把它从形而上学手里解放出来，使它能为辩证法服务。辩证法给我们以正确的世界观，谓

自然界的事物自身有其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这些法则反映出来，成为我们的武器，指导我们能更正确的认识事物。我们对事物获得了正确认识，形式逻辑能帮助我们作正确的推论。

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推论，前后不矛盾了，便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否则我们在实践中依辩证法的指示所获得的正确认识，藏在各人的脑子里，前后矛盾，便不能发挥教育效用。我们要在实践中，拿形式逻辑为辩证法服务；这样服务好了，便能发挥教育效用，进而为建设工作直接或间接服务：动员大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原载《新建设》1956 年 2 月号）

【试　析】

1950 年前，在苏联逻辑学界占优势的观点仍旧是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只承认辩证逻辑，否认形式逻辑。后由于此种观点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所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又被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代之而起且占据上风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集中反映此种观点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著名学者周谷城不满于这种观点，在 1956 年 2 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对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主从说”和流行于苏联及我国逻辑学界的“高低级”说提出挑战。该文提出的新见解是：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杂志社收到了许多反对周谷城观点的文章。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以此拉开序幕。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周谷城的这篇文章。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的见解。1957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谷城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王方名在校刊《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与周谷城观点较为接近的三篇关于形式逻辑的论文。不久，周谷城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载有这几篇文章的刊物。在引用周话的地方，毛泽东还特意细心地折了角。因此，周谷城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微大一点了。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周："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在谈到哲学界正在进行的关于形式逻辑问题的辩论时，毛泽东明确地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第二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邀集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的一些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座，毛泽东当即给他们做了引见，说："你们俩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王方名的几篇文章由人民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

王方名曾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三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一、二、四期上，均署名"求实"。这三篇文章，对三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三篇文章也相当欣赏。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是

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的支持和鼓励，也期待逻辑学界能够平等讨论，共同探求真理。

后来，《人民日报》登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仍旧是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并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又及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17 日，他即邀请周谷城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就逻辑学问题进行了长谈。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担心地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放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夹用英语，风趣地说："formal logic 本来就是 formal 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随即，他们又就当时社会上有关逻辑学的文章和书籍，广泛进行了讨论。这种学者式的对答，也许是毛泽东最为惬意的一桩事情吧。

两天以后，毛泽东给机要秘书高智写了一封信：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 1956 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 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6 月 19 日上午 7 时

《新建设》1956 年全年各期，1957 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这可能是毛泽东再一次阅读有关逻辑学讨论的文章。显然，他仍在思考逻辑学的问题。

后来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告诉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要出版了，并将目录也寄予他。周谷城看目录只有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份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语还要不要呢？他犹豫不决，于是提笔写信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很快回信说：

>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
> 毛泽东
>
>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中，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既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又维护学术的自由讨论，尊重专家学者独立思考，这是哲人的智慧，政治家的艺术。

但毛泽东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前面曾提到，在私下里，毛泽东和周谷城讲过：formal logic 本来就是 formal 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1965 年 12 月在杭州，毛泽东系统而明确地发表了他对形式逻辑的看法：“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

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他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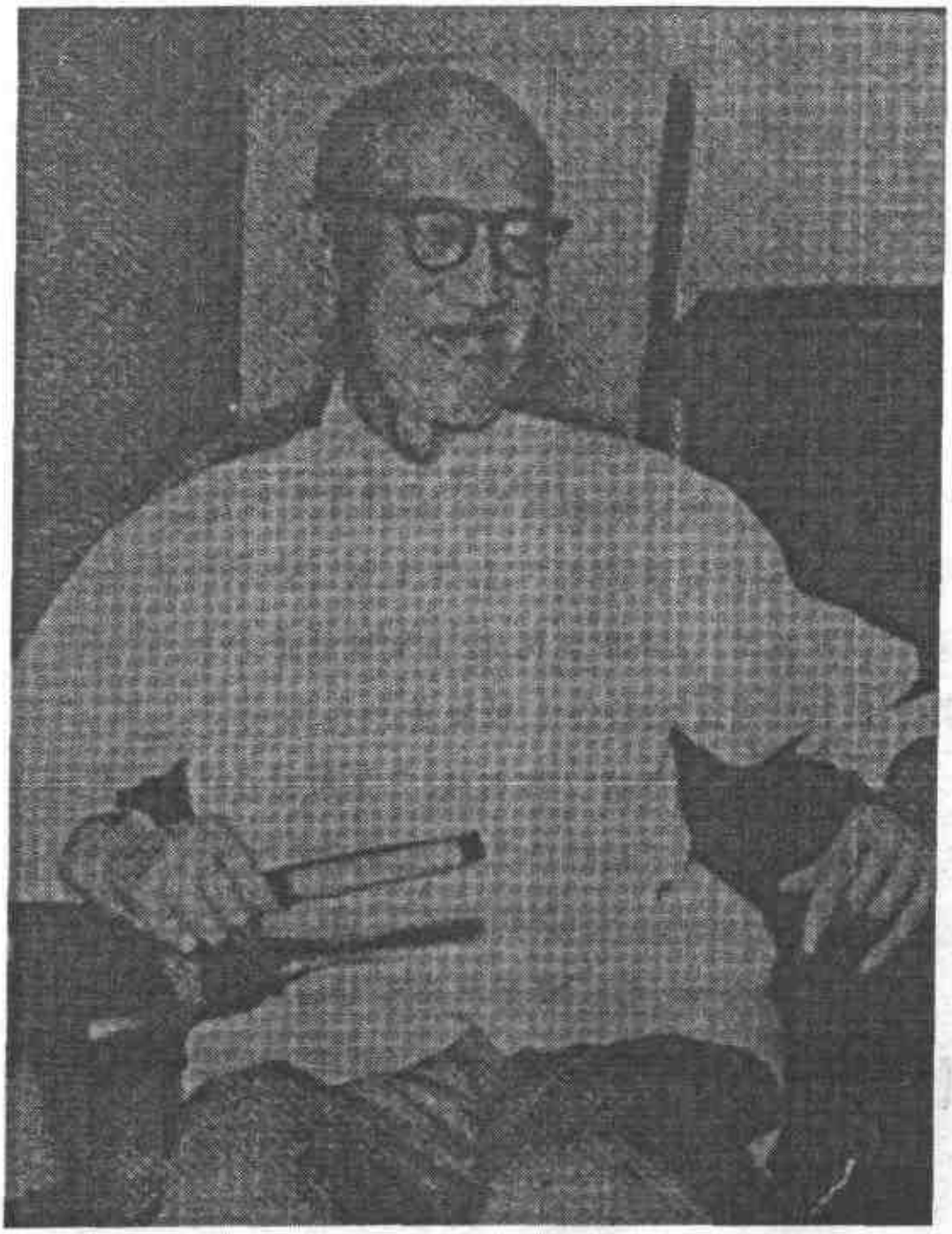
这种观点，是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比较科学的概括。

《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历史有独到见解

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送给毛泽东一本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在随后的彻夜长谈中，两人对书中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谁也没说服谁，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兴先作结论，……十几年后，梁说，毛泽东的路子对。

【毛泽东评点原文】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三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



《乡村建设理论》的作者梁漱溟

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的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摘自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6—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品介绍】

《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梁漱溟著，1937年5月由山东邹平县乡村书店出版。是一部探讨从中西方的对比中，研究中国文化特征，进而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的学术著作。本书做为解决中国存在之问题的一种方法，一条通路，特别是作者将之附诸于实际，在邹平县展开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谈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碰

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以作者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为中心，探讨了改造传统中国社会的问题。书后附有一个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道出了他们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中遇到的困惑、矛盾与危机。作者的这种困惑、矛盾与危机是难免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提出："中国摆脱社会危机的方式，就是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就是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求进步"。"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很明显，作者采取的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的、文化改造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试　析】

1938年1月，正当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梁漱溟来到延安，将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送给了毛泽东，试图求得毛泽东的认同。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甚多。当梁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的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的第一次夜谈中，梁提出了抗日战

争的前途问题。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对中国的前途十分担忧。而毛泽东则经过认真地分析提出中国必胜的乐观结论，令梁漱溟十分佩服。临走，梁漱溟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

‘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毛泽东逝世 10 年以后，已是 93 岁高龄的梁老先生曾经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

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50年春天，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中国革命的胜利，促使他认真思考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新的总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毛泽东对《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有1500多字的评语，对梁漱溟书中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明毛泽东读的非常仔细认真。王子今在他的《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对此有较详细地分析，现介绍如下：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认为，西方社会文化是所谓“个人本位”，“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这种差异源自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

的集团是民族国家”。而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象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象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象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梁漱溟认为，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他还断定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这一差异，从中古时代起就已经出现。

毛泽东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差异，但他认为生活方式并非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赞同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的意见。对于梁漱溟的见解，毛泽东批注：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他还指出：

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

对于西方近代社会出现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抬头，是否来自其集团生活中对个人的过强干涉的反动，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毛泽东批注：

？否！从资本主义而来。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仍然是“农业经济”，是“封建国家”。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毛泽东认为：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

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其具体形式是：“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

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梁著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毛泽东则根据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考察，以批注的形式指出了这样的基本事实：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毛泽东指出，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封建经济”。对于所谓“隐然有似一种共产”，毛泽东批注：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梁漱溟认为：“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无其他。”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也作了批注：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因此，这种所谓“大家相安”的“伦理政治”，实质上是“罪恶多端”的“封建政治”。

梁漱溟在其论著中以为人际关系最可以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征。他所说的“伦理关系”，就

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这种义务关系还导致形成了一种颇为高尚的观念：“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毛泽东在批注中又指出了足以彻底推翻这种认识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中国传统社会，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没有土地垄断，也没有先进生产工具的垄断，“无垄断即无阶级”，虽然也存在贫富与贵贱的差别，“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他还认为，西方人多把钱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中国社会的构成，只是社会职业分工不同而已，只有职业差异，没有阶级分化。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批注：

百分之七十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

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

只有土地剥削。

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来自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的理解。

对于中国近代史中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表现出的颓败之势，梁漱溟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

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于个人的不健全。”因此，“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中国社会于是“崩溃解体”。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与梁漱溟的看法是接近的，他在这几段文字旁批注：

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

这是对的。

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可是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内在危机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文化与西方社会文化孰高孰下的比较，意见又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梁漱溟以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毛泽东的批示表达出对梁漱溟中国近代史之分析的批评：

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

对于“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的说法，毛泽

东尖锐地指出，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与西洋人的文化比较，“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他在批注中写道：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总是高于旧的社会文化形态，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对于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毛泽东批示说：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

毛泽东还写道：

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毛泽东坚持的“革命”的主张，是与梁漱溟的“改良”主张针锋相对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提出，中国摆脱社会危机的方式，就是“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就是“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求进步”。梁漱溟主张：“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对这一段话，连打了四个“?”号。毛泽东还在批注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来源于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

通过毛泽东的评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科学考察，批判了错误的中国史观，提出了推进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

《群学肄言》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毛泽东一生在读书学习上收获甚丰，不仅由于他好学，更由于他会学、善学。他始终坚持对为学之道的探索和运用，使其治学独具个性。研读《群学肄言》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书中所倡扬的为学之道有了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亲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笃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言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

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瞽智眩，心物相对者曰学诖、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涉，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瞽于情，眩于智，而又无学诖、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鉴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24页）

【作品介绍】

《群学肄言》是严复当年所译西方系列名著之一，为英国人斯宾塞所作，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出版。是中国早

期社会学的重要启蒙读物。

希尔伯特·斯宾塞（1920－1903）是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是西方社会学古典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曾被西方社会学家誉为“社会学理论大师”和社会学的伟大先驱之一。

1842年，斯宾塞首次发表政治文章，从此开始了他作为学者和撰稿人的生涯。1948年任英国享有盛名的经济杂志《经济学家》编辑，5年之后辞去编辑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等十分广泛的领域。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1850年第一部学术论著《社会静力学》出版之后，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开始着手撰写以进化论为基础，综鉴人类一切知识领域的“综合哲学”。1860年—1896年间，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在这个庞大的综合哲学体系中，《第一原理》被确定为整个学说的基础，其余各卷则是《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挥。长期以来，斯宾塞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对世界各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的理论最早是在1895年被引进中国的。当时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初次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他告诉国人，这门以名数力质、天地生心诸学科为基础，以“群学为要归”的学问，能够真正认识历史，“心明治乱盛衰之由；同时，又能够指导现实，“有修养治学之功”。他的话也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学术观在国内报刊上最早、最完整的一次表述。1897年，严复开始翻译斯宾塞

《社会学原理》一书，最后定名为《群学肄言》。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自序”开篇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合，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面示以之所以治之方也”。治群学以明治乱盛衰之原因，掌握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根本，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严复认为，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学问之高，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养治学之功”。也就是说群学能使使整个社会，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秩序井然，人民安宁。群学既然是科学的最高层次，是全部学问之旨归，是命脉之学，所以学习西方，必须首先学习这个群学。根据严复的阐述，《群学肄言》的基本思想，概而言之有三层，其一，论述群学（即社会学）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成为一门科学之必然性（第一—四篇）；其二，指出群学研究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困难和偏颇以及祛除这些困难和偏颇的为学之道（第五—十三篇）；其三，阐明西学的真精神及其社会功能和意义（第十三—第十六篇）。同时严复认为《群学肄言》所体现的精神，对于克服中国近世新旧两家（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思想与传统之学）的弊端，是一剂对症之药。显示其受到斯宾塞阶级调和论的影响，在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思想倾向。

斯宾塞还阐述了其关于群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的观点。他认为，“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领治群学，于是去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在他看来，名学（逻辑学）和数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皆抽象的思辨科学，属于玄科。而“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

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则以显著的形式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研究对象。”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他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试　析】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他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之图书馆自修的时候。当时他阅读了严复所译著作的大部分，其中他提到的“斯宾塞的逻辑”现在的研究者已查明，当是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在其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曾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一段，即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篇：“曲乎直乎，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称道者也。”足见当时《群学肄言》一书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一生所取得的丰硕的读书成就，一方面源自其勤奋好学、刻苦认真的品格，另一方面也与其十分讲究治学读书之道有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好学，而且会学、善学。青年时代他便非常注意培养自己的治学读书之道。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经常向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请教并一起探讨治学之道。这可以从1915年黎锦熙的日记中略见一斑：

“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

书方法。”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谈读书事。”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唔季范，久谈社会改造事。”

“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早寅》六期。”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谈读史法。”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

“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之（往）校长。章甫则住一师附小的级住去。”

“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从黎锦熙的日记中可知，毛泽东与他交往密切，而在一起探讨读书方法、学术研究方法则是他们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黎本人当时正在研读《群学肄言》一书，他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缮性”篇，其用心大概也是希望毛泽东学习该篇所阐明的为学之道。

毛泽东显然不仅着重研读了“缮性”篇，而且通读了全书。书中的思想，尤其是对为学之道的论述，令他感触颇深，备受启发。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详谈了他的心得体会。这就是上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在那段话中，毛泽东表达了以下三层意思：

其一，“烙吾心而善吾性”。即通过自我的修养、完善，提高心性境界，是为学之道之大端、根本。《群学肄言》“缮性”篇所阐述的正是这种为学之道。这种为学之道不仅适用于群学（社会学），而且普遍适用于各门科学的研究。

其二，概述《群学肄言》的主旨，指出为学有三难，即物之难、心之难、心物相对之难。若欲祛除此三难，就必须进行心性的修养、完善，而心性的修养和完善在于学问的研习。学

问包括三类科学研究即探索逻辑和数理关系的“玄科”，探讨因果关系的“间科”以及探讨以显著的外在形式存在的客观世界的“著科”。只有对这三科进行深入研究，而又融汇贯通，方能祛除为学之三难，实现“心习娇、性灵缮”，这样才能去谈论治学。

其三，《群学肄言》所阐扬的不仅仅是为学之道，道德修养之道也寄寓其中。如果能通过学问的习修，娇心缮性，最终祛除上述之难，则可达至君子的境界。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儒家心性之学对毛泽东的影响。

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学问的习修对于提高心性境界的重要性，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博学，扩大知识面而又融汇贯通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在这封给萧子升的信中，他还谈到《中庸》里的博学思想，指出：“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他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畸型，“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真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致思倾向的影响，毛泽东在读书学习过程中更倾心于哲学、历史和文学，而对自然科学则不甚用心。他向斯诺讲述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时曾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只是他当时读书的主观兴趣。而实际情况是，在阅读《群学肄言》之后，他便意识到自己学习上的偏颇，并深感懊悔。如上所述斯宾塞将自然科学分为玄、间、著三科，并认为，玄、间两科分门别类地教人

以各种法，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及规律。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习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指出，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参见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12－13页）。斯宾塞的这一观点，使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了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他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溪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心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决心纠正自己学习上的偏向，下功夫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年11月4日，罗学瓒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以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过程中共同注意，并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紧张而繁重的革命工作之后，不得不在读书学习方面，尤其是在了解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作出“最痛苦的牺牲”。尽管如此，由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经其一生一直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新发展的关注，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刊中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成果的“大概”。延安时期，他的读书内容就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搜集的藏书中有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如商务印书馆版的汤姆生《科学大纲》、章垦书店版的普郎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以及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邀请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等同游天坛，他对张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建国之后，毛泽东对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和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逻辑学大讨论，他对这一讨论抱有浓厚的兴趣，始终密切注意讨论过程中各种观点的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并最终形成了有关形式逻辑的性质和特征、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的正确见解。对自然科学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直到晚年，他还收藏和阅读了一些大字样的自然科学书刊，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自然辩证法》杂志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颇为注意，而且常常以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睿智，对某些问题表达其深刻的见解。实现了其青年时代便立志追求的融会贯通、由博而精的治学境界。1964 年 8 月 8 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对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在《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中关于“基

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深表赞赏，并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科学命题。(张平撰)

《孙子兵法》里有一些很好的原则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军事理论著作。对这一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毛泽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评点原文】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摘自毛泽东1936年致叶剑英、

刘鼎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

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合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 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90 页）

【作品介绍】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为我国古代最有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有组织才能的军事活动家孙武所著。孙武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于孔子同时，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公元前 512 年经吴国大将伍子胥推荐，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阖闾因他善用兵，乃命他为将。孙武同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过重要作用。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问世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而又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其间数百年，周朝王室衰微，诸候割据称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互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孙子》、《吴子》及《司马说》等各家兵书均于此一时期问世。而独《孙子兵法》，诚如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它堪称为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

于生命力的一部。

现存的《孙子兵法》是经过三国曹操删削而成的，共分13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事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故又称为《孙子十三篇》。

《孙子》总结中国古代战争中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为其后的历代军事家如孙膑、曹操、诸葛亮、李世民、岳飞、戚继光、曾国藩、毛泽东、刘伯承等所祖述，堪称兵家之“鼻祖”。该书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流至国外，被推崇为“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据说叱咤风云、弛骋欧洲的一代枭雄拿破仑，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还手不释卷地翻阅《孙子兵法》，而发动第一世界大战的魁首德皇威廉二世为战败后才得到此书而扼腕叹息。《孙子》作为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巨大的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古代文化资源。

【试　析】

作为现代中国集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军事家，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和发展。从这

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面，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而且获取了丰富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但是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评价，如何运用、发挥《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的，甚至于毛泽东与《孙子》这部兵书的历史联系如何？我们不能不先从有关毛泽东是何时开始读《孙子》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十六字诀”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等迅速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1931 年，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白区搬到瑞金根据地。影响日益扩大的毛泽东等遭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左”倾盲动主义者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人为地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加以拒绝、全盘否定，当然明显地暴露了那些自

称为所谓的“马列主义的专家”们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浅薄与无知。当然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得知：与那些在国外接受过所谓“正统”马列主义教育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的研究是无从所知的，更何况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对于“山沟”里的毛泽东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战争中的创造性运用之外，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就成了其直接的、可供利用、开发的军事文化资源。那么毛泽东等是不是由此就“无条件”地运用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呢?

据现有的材料看，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长征以前，至少在青少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孙子兵法》的。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夫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内已国，而殖其民，已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又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位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 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其后还有毛泽东转记的《孙子》中的一些原文。其它还有几段，因有《讲堂录》可考，不一而足。可见博学多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这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了解，没有直接的接

触，更谈不上研究。兹有毛泽东与凯丰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为证：会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尖锐的反问使凯丰哑口无言，揭露攻击对手的无知的同时，毛泽东同时声明：《孙子兵法》我并没有看过。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多次讲过。上引1960年12月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就是其中的一次。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从何日起，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直接研读《孙子兵法》的呢？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及他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的同时，又明确指明："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当然喻意那些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所有被所谓的"马列主义军事专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概拒之门外的古今中外的"非马列主义"的军事著作。上引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谈话中更明确提到："后来到了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此外，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也曾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

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可见，只是到了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才开始研读《孙子兵法》的。正如上引所示的，正是在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为此致函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的同时，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研读《孙子兵法》是中国革命战争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同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讥讽”也无意中为之提供了契机。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这大概该是指这个时期说的吧。

没有直接研读过《孙子兵法》，仅有些间接了解的《孙子兵法》的一些原则，汇通其它中国农民战争的古代文化遗产，毛泽东等就制定了与《孙子兵法》及其他传统文化遗产相通的军事作战原则与艺术，以至于他的党内对手们诬告他们对古代文化成就的抄袭与迷信，恶意的攻击与愚蠢的无知之外，倒也无意地帮我们在现代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的身上找到许多古代军事文化遗产的印记，让我们在感叹毛泽东对古代文化遗产生动运用的同时，惊叹毛泽东与孔武这位时代相去甚远的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活动家，在某些军事思想上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早在毛泽东有条件得到《孙子兵法》以前，曾经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

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人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李德还回忆道：“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转引自王子今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与《孙子·军形》中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后先战而后求胜”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强调打仗要打有把握的仗。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军队才能打胜仗，否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先和敌人交战，就要打败仗。所谓“投人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则直接见于《孙子·九地》，是说把军队投入亡地然后才能保存，陷于死地而后才能得生。因为军队陷入危险的境地，然后才能别无选择，听从指挥，奋战取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灵活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类似的原则和艺术，指挥作战，激发全军英勇奋斗的精神，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并不断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曾经积极支持和推行王明路线的李德，尽管他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评论不可能十分公允，然而这里他对毛泽东早在到达陕北以前就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可以对现实产生

积极影响的经验，善于以革命的激情结合历史内容进行有效的鼓动等特点的记述，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等于现实就是历史简单的运用。在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早期（以1936年10月得到此书为界），毛泽东对其原则与艺术的运用可以说是不自觉的，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创造性经验总结，是这两位历史军事理论伟人对战争一般规律认识的惊人的不谋而合！

只是到了陕北以后，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里，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有了自觉的透彻的研究。其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运用才更透彻、更高超，更富有成果，更为自觉。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诸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如我们前面所引所见的。当然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袭取其词语，而是在深入地领会其精神的同时，将自己的实战经验与古代兵家的权谋韬略互相印证与发明，从而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孙子》中对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后的《论持久战》、《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曾多次、反复地引用。毛泽东在赞誉其精彩之处，称其为“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的同时，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去解释它、改造它，从而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更深刻的涵义。首先，毛泽东称誉它是战争规律的可知论。孙武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

凶吉或胜负，认为战争是可以预知的，并由此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重要命题，对此，毛泽东赞誉说：“我们承认战争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显然，毛泽东通过科学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这一古老的命题，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础上。进而毛泽东又把孙子“不可取之鬼神”的关于战争规律“战可知”、“胜可为”的可知论概括为，这“是包括认识和使用两个阶段”即包括了认识客观规律和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去克服敌人这两个过程。在充分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对此，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孙子所谓的知彼知己，是把“可知”、“可胜”奠定在对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反对两种倾向的人，即“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和“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的人，认为这两种人“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毛泽东在他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论述中，还曾特意引用孙武的话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见，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孙子》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格言中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得到了科学的阐释与发挥，并使之作为一个完整的战争过程，提到了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认识。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和改造，孙子的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得到了充实和发挥，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

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上所引，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点阐述和发挥的又一重要军事原则。毛泽东总结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在数量和强度上都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不是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竭、士气沮丧、苦头吃尽、弱点充分暴露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毛泽东总结说，这就是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所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减杀其优势。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为说明这一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在论述“战略退却”问题时，毛泽东研究、援引了中国古代的典型战例，来阐明他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了退却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继而又全文征引《左传》有关齐鲁长勺之战的记述。毛泽东在具体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的同时，从战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 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原则。”接着，他又联想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它们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揭示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句名言蕴含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原则的同时，毛泽东不禁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如此之多！实际上，中国历

史上对这一原则理解最为透彻、运用最为高超的要数毛泽东本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条件出发，即“经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既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论持久战》），在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敌强我弱，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的条件下，正确地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从“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到《论持久战》中对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的科学预测，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基本成形并得到充分的验证。毛泽东戎马半生，可以说，除了解放战争后期外，他所掌握的军力在全局上总是处于弱势，同敌军相差悬殊，乃至不甚匹敌。但是，经过二十年的苦斗，竟取得化弱为强，旋转乾坤的胜利，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积极防御战略。1947 年 3 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 23 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当时，解放区广大人民对胡宗南的进攻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的大门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毛泽东缜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比较了敌我双方兵力情况 。经过全面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作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

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相反，我们部队少，若硬要拼，“迎其锐气，击其精锐”，是注定要吃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坚持“不丧失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却招致了人地两失的惨败，就是没能运用这一原则而失败的反证。

以上所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其锐气、攻其惰归”只是前面所引毛泽东论述、阐发《孙子兵法》中精华的两个代表性方面。类似的方面，还有许多。如：(1)“北平方式”与“不战而胜”。孙子“谋攻之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全胜。即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谋攻方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注重“以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为主要原则的“攻心”战术，可谓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高树勋运动和北平等大城市的和平解放是这一谋略的精彩的发挥和完美的体现。(2)“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孙子《行军》中谈“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而已，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集中使用。“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谋攻》），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十倍于敌”“五倍于敌”和“倍于敌”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十围”、“五攻”和“倍分”的战术原则，这样才能集中兵力，造成战场上的优势，做到“以众击寡”。毛泽东把这一原则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从战略、战术的两个不同层次上予以深刻的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积极发挥集中优势兵力的优势，变劣势为优势、变弱者为强者、变不利为有利、变战略的的被动为战略战术上的主动，进而夺取整个战

略的主动权，直到歼灭一切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3）诸如此类的战略战术原则，还有许多。1947 年 12 月 25 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运用论证的分析法，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原则进行批判继承，曾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核心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中对《孙子》中一些带有片面性和不彻底的原则加以了改造。如，《孙子》中只讲快进快攻，否认持久防御，只讲"穷兵勿追"，不讲"勇追穷寇"，猛追猛打，直至歼灭等。总之毛泽东从中汲取的原则很多，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成功指挥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如前面所引，1960 年 5 月 27 日，毛泽东在他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介绍说：《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倍加珍视，也为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是成功有效的普遍的法则，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同时，从中我们也能看到《孙子兵法》所蕴含的这些原则，大多是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战争的全局的，是具有战役指挥和战略决策的指导意义的。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从中概括、升华出了许多军事哲学思想，如关于己与彼、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等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强调在战争中争取主动和灵活应变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和灵魂，认为它具有关于战争成败的战略意义。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战略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战争进程的驾驭可谓"用兵真如神"，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孙子兵法》中具有战略指挥意义的原则的威力。这也许正

符合了毛泽东于1936年10月22日致电叶剑英等，让他们购买《孙子兵法》加以研读的初衷吧。

日本的军事理论家小山内宏在其所著《现代战争论》中指出："毛泽东的战略，是从其弱者的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卓越的战略，它与孙子的战略一脉相承。"这一相当中肯的评价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与孙子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若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说毛泽东是对孙子的迷信与抄袭，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也是一种无知，是既不懂古代的孙子，也不懂现代的毛泽东，更不懂毛泽东与孙子军事战略思想的之间的真正联系。（王秀华）

《战争论》值得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学习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还积极地学习外国的军事理论，包括这本《战争论》，以期把军事理论弄出头绪。毛泽东不但自己读，还在自己的住处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这部书为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毛泽东评点原文】

蒙哥马利：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十八日

开始看克劳塞维资（茨—引者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

十九日

没有看书。

二十日

P57—91。

二十一日　P92—102。

二十二日　没有看。

二十三日　P103—11。

……

二十八日　战争论P112—122。

二十九日　没有看。

三十日　没有看。

三十一日　P123—167。

四月一日　P168—

——摘自毛泽东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版）

【作品介绍】

《战争论》是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遗著，是一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它在军事思想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战争本性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对军事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它至今仍为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界所推崇。

克劳塞维茨1780年6月出生，12岁时在波茨坦的一个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1801年秋，他被送入柏林的军官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校长香霍斯特的赏识。1815年秋在科布伦次任莱茵军团参谋长，利用空闲时间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工作。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升为将军。在任校长的十二年间，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工作。他先后研究了一百三十多个战例，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并整理了亲自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1830年春调炮兵部门工作，将尚未修订完毕的三千多页的手稿分包封存，准备以后修改，但一直没有机会。1831年因陪同已患霍乱的司令官前往波森，后于当年的11月16日因霍乱去世。死后其妻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十卷，《战争论》是其中的第一、二、三卷。

本书大约写于1818年至1830年间，由于作者曾亲自参加过普法战争和法俄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的思想还

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很大影响，这就为他研究战争理论和写作此书提供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本书有过好评。恩格斯1858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时曾多次引用这一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对作者的评价是：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总之，作者生前对自己的著作充满了信心，正如1827年写的一篇《说明》中所说："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读前六篇时也不会看不见那些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的，而且或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的确，他作出了划时代的努力，得出同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相同"兵者国之事"的结论，并把军事同政治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工具；他虽没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凝炼的语言，但同样提出战争中必须注意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并全面分析了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和进退等矛盾双方，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在以下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足以作为鉴借的军事观点。

第一，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

作者认为："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的绝对忍受就不能成

为战争”，“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这里已充分估计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第二，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并认为偶然性在战争中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获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

第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一再指出：“必须明确地肯定这种实际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观点：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到处都坚持这一观点我们的研究就会一致，一切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这一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在该书中不断出现，正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第四，战争是复杂的多面体

“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性，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战争成

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

第五，战争对军人的要求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并且认为“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因为，“仅仅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因此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这种合金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果断、坚强、顽强和坚定。”

第六，战争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但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式时，运用原则就可以使判断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所以，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第七，集中优势兵力的制胜法则

通过对历史上重大战例的研究，作者认为：“拿破仑这位

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总是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如在莱比锡、布里昂、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失败了。”

第八，战争中的多兵种联合作战

“（1）步兵是各兵种单独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2）炮兵是完全没有单独作战能力的兵种；（3）几个兵种联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4）缺少骑兵影响最小；（5）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这以上几点就是洋洋三大卷《战争论》中许多精辟见解的一部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尽管作者不追求“体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但黑格尔哲学及那个时代德国人创造体系的冲动不时显露，因而许多篇章不仅夹杂着“空话”，并且不时会有“好东西里掺清水”之感。当然，相应于那时的战争机器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战争科学教科书。

另外，作者并没有处处遵守自己的结论，主要是表现在对波兰问题的分析。其实对波兰在18世纪的三次瓜分完全是普、俄、奥三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采取的侵略行动，并非这个国家本身的状况和结构问题。作者的看法与稍后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具有天壤之别。

【试　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信郭化若，信中提出应找些诸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军事战略书来读，“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原信为：

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你不但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据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日记记载，他是于1938年3月18日开始阅读《战争论》的。此时正是全民族抗战蓬勃发展的时期。客观现实的需要，迫使毛泽东深入研究和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吸取其中的精华，用以指导正在开展的抗日战争。因此，毛泽东拿到这本书的第一天，便如饥似渴的地读起书的序言和第一篇“论战争的本质”，一下子读了55页。他不但自己读，还组织和倡导其他同志一起读。这年9月，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就在他自己的住处延安凤凰山组织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讨论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艾思奇、徐懋庸、何思敬、任白戈等人，每周开一次会，交流学习《战争论》一书的体会。一开始，就是专门学习《战争论》原书，请懂德文的何思敬对原文边译边讲。何思敬不懂军事，因而讲的很外行，但毛泽东仍十分仔细地听，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着。徐懋庸在后来回忆道：“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总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

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当时参加了这个学习小组的莫文骅在《终生难忘的怀念》一文中对此也做了详细地回忆：为了正确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

目作过一个报告。”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很快掀起了学习和评价克氏《战争论》的高潮。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译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在阅读《战争论》过程中，充分肯定了书中正确的观点。如《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并批判地吸收了这个论断的合理成分，提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再如，关于战争的目的。克氏认为“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

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同意这种观点。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另外，克氏还将战争的目的区分为“战争行为目的（即军事上的目标）”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显然，毛泽东吸取了克氏的区分。

但是，毛泽东在肯定其正确的观点，吸取其精华的同时，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其错误的观点，剔除其糟粕，而后得出自己的正确观点。如克氏《战争论》中说：“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获得应有的地位。”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反对把革命战争视为赌博，指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彻底扫除干净。”

由此可见，在军事上，毛泽东不但注意吸取祖国的文化遗产，同时还注重研究学习外国的军事理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学习和研究及其在延安掀起的学习和评价《战争论》的高潮，对指导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

毛泽东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建国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过克氏的《战争论》。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蒙哥马利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泽东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的军事理论是从"你们"（这里显然主要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里学来的。这里，既有伟人的谦逊，但也间接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战争论》的高度评价。《战争论》是值得学习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回忆道："60年代初，他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同时，他还向蒙哥马利介绍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毛泽东还于1975年秋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过："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

据介绍，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时，也特别提到了《战争论》。他说，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从而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并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中，中国古代的传统兵法固然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但是，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吕宏强）

《西行漫记》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采访后的结果。毛泽东对斯诺的行动是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对斯诺讲："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此书果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本书《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它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看到

《西行漫记》时的谈话（见《毛泽东国际交往录》第173页）

【作品介绍】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作的中文名字，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于1905年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生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低潮时来华，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1930年以后，为采集新闻，遍访我国主要城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上海，目睹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2年，同时学习了中文。在此期间，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他还编有一部英文的中国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给西方的人之一。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他当时无法理解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便从北平出发，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采访。他也是进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当时他正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海。当时上海租界对中国

战争宣告中立，此书不能出；对封锁新闻的国统区，更不必说。经他同意，飘泊在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出版了该书。为了适应当时环境，没有用原名，而改用《西行漫记》。抗战开始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1939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1941年由于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受国民党打击，被迫离开中国。1942—1943年再次来中国，以后便很困难了。麦卡锡主义控制时期，美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允许报刊发表他的文章，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1960年6月，获得我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会谈。1964年底到1965年初，再次来华；1970年10月同夫人一起来华，并且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会面，这是向美国发出的和平信号，但正如基辛格所言：我们西方人没有那么聪明，没有注意这样一个重要举动。12月18日，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也是最后一次谈话，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随访，但由于病魔缠身，没有成行，于1972年2月15日上午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我热爱中国。"根据他的遗愿，其骨灰的一部分安放在北京大学校内。这里曾是他西北之行的出发点，也是他整理那部书的地方。

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却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愿意作客观公正的了解。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正是由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直到他去世以后，《西行漫记》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

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

作者通过四个月的实地调查和其他采访，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方方面面，由此既解除了他出发前种种问题，也得了关于中国革命可预期的结论。作者充满激情地写到："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说，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讲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一个洋记者，离开故土对一个实际上对自己无多大痛痒的民族的革命进行了考察，终于被"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神"所征服、被那"不可征服的精神所折服"，就象作者承认的那样"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却对1938年的中日战争具有深刻的洞见："当前的历史途径，不是战争，就只有灭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卖外，也再没有中间的路。"并且重复了当年毛泽东的话当作结论：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

喜欢传记的读者也会大有收获，他对当时红色中国的人物尤其毛泽东、周恩来的描写，尽管文字有限，却非常传神，读

来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最为深刻的描述："他（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关于毛泽东，他这样写道："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权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解读了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即使那些喜欢探讨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读者，在这里也会得到许多启示。尽管作者在该书中并未着力这样追求，但在作者不经意的审视中，却已透露出个种消息。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这本书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活历史，它没有

许多枯燥的概念，却能使你于活的经历中感受到同样的理论力度。如果有谁对中国革命的产生和背景，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再发生疑惑，斯诺的《西行漫记》是最好的见证。

【试　析】

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他的名著《西行漫记》由于客观、真实同时也是积极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当毛泽东看到这部书后，认为它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它真实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使国内外各界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面目。

《西行漫记》是斯诺实地了解中国革命后的结果。对他的行动，毛泽东是欢迎并给予支持的。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城第一次见到斯诺时，连声说："欢迎！欢迎！"。毛泽东还说："周恩来同志在电报中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

有一次在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斯诺坦诚地说："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毛泽东笑着说："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斯诺很高兴，他说道："当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悲惨，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并产生了深刻的同情

心。后来我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火，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我花了5年时间，翻译一本《活的中国》，这本书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本书马上就要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赞扬说：“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到了子夜，警卫员为他们送来了简单的夜餐。斯诺看到有西红柿炒辣椒，惊奇地问：“保安还有西红柿?”警卫员答道：“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毛主席捎回来的，今晚为了招待您主席特意让炒了一点。”毛泽东告诉斯诺：“这是延安天主教堂的神父送给东北军的，东北军又送给了周恩来同志几个，他舍不得吃，又给我送了回来。”毛为斯诺夹了几块西红柿，说道：“西红柿在这里是非常新鲜的蔬菜，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要多吃一些。”斯诺表示感谢，并说在北平倒是容易买到。毛说：“西红柿从欧洲传入中国才几十年时间，民间还没有大量栽种。传入你们美国可能要比中国还晚一些吧?”斯诺说：“传入美国的时间，我想不比中国晚多少，因为西红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鲁的森林里，它是16世纪被一个英国公爵从南美洲带到欧洲的。”毛泽东接着说道：“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由于它的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人们视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被它艳丽的色泽和鲜美的浆果所吸引，产生了品尝的念头。他在品尝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接着就吃了一个。他觉得很好，并无难受之感。然而这可口的滋味，使他更加恐惧，他干脆躺在床上，等着死神的召唤。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并没有死。于是西红柿的食用之谜被揭开了，立即风靡世界，成为人们争相食用的

最佳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法国画家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立刻明白了他的巧妙的寓意。斯诺向毛讲了他准备来红区的心情：“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个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毛诙谐地笑道：“你也是下完了死的决心来我们红区，准备‘品尝’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喽。”斯诺说：“我准备来红区的时候，白区流传着许多谣言，说红区一片焦土，草木不生；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你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王；红区内流行着天花、伤寒、霍乱、斑疹、鼠疫等疾病。我来的时候，身上注射了许多种预防针。”毛泽东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风趣地说：“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斯诺也笑了，他说：“我那时候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因为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准确而真实地讲清红区的情况。红区是一块‘未知之地’，是一个最大的谜。为了探明这一切，值得我冒一次生命危险。”毛非常肯定地说：“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斯诺也兴奋地说：“红区的一切都是新闻，都是世界上头号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出去以后，一定会和西红柿一样，风靡世界。”毛泽东又说：“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大运了。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向全世界如实地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1939年5月5日，萧三同毛泽东交谈时问毛泽东对斯诺写他传略的意见。毛泽东说，原稿他没有看过，书，略微翻了几页，有些不完全正确。他还说，斯诺缠了他4个晚上，以后他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

1972年2月15日，毛泽东得知斯诺病逝的消息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斯诺夫人发去了唁电："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白金华、吕宏强）

《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民歌

对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非常喜欢、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老百姓的诗歌。毛泽东晚年曾为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书写《诗经》中的一篇诗，使她免受恋爱失约之怨。一段佳话，令人倍感伟人的慈祥和温暖。

【毛泽东评点原文】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展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

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作品介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所以又叫“诗三百篇”。最初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才称《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50年间的诗歌。这些诗相传是周王朝派专门官员到民间采集而得，称为“采诗”，后经孔子删订成书。近人多以为《诗经》的删订，是出于周代各国史官或乐师之手。



毛泽东在韶山上私塾时读过的《诗经》

《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指“国风”，是各地的土乐，包括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邻、曹、幽等十五国风，凡160篇，多为民间口头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生活、劳动生产、婚姻恋爱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

“雅”是正的意思，“雅乐”是正乐，是宫廷京畿一带演唱的民歌，多是贵族作品。分大小雅。大雅是西周的作品，音调沉厚，象反映周族兴起的史诗及兴盛时期农业生产的情况，也有对西周末年政治不满的讽刺诗。小雅是两周末期和东周时的作品，音调比较轻快，反映了当时纲纪废驰、社会混乱以及人民的悲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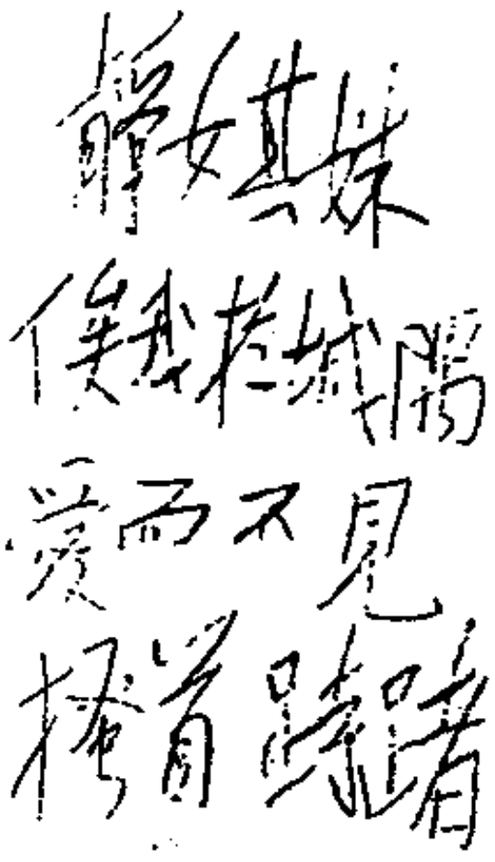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和歌辞，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计40篇。多为歌功颂德、祷告祈福的作品。

《诗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其中的民歌部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愿望，思想内容是健康进步的。它运用四言诗的形式，大量使用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朴素自然、音韵和谐流畅。它标志着我国诗歌的成熟，为后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历代诗人学者的第一部教材。

【试　析】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圣经”之一，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考入长沙的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例如1913年，他在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心情。



毛泽东写《诗经》的诗句赠身边工作人员

以上说明《诗经》在毛泽东早年治学生涯中，是他非常喜欢阅读的作品。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扬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

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作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第二，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

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1965 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两句："有。我有。"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 16 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主席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你为什么那么老

实？现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为姚淑贤写的诗，是录写《诗经》中《静女》的一段。这首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吻写幽会密约的乐趣。那位姑娘按照约定在城楼角等他，故意藏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等到他发现她已经依约来到而且深情脉脉地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北京，便把毛泽东录写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把失约的经过讲了。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毛泽东的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作为伟大领袖虽日理万机，但也体恤下情，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局外人，也倍感毛泽东的慈祥和温暖。（宿如萍）

《楚辞》有民主色彩

"楚辞"是楚国巫系文化的辉煌结晶。以屈原为首形成楚辞创作圈。毛泽东不只极为欣赏楚辞诗人编织的幻想境界，而且受其影响，他的许多诗词，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瑰丽优美的华章。

【毛泽东评点原文】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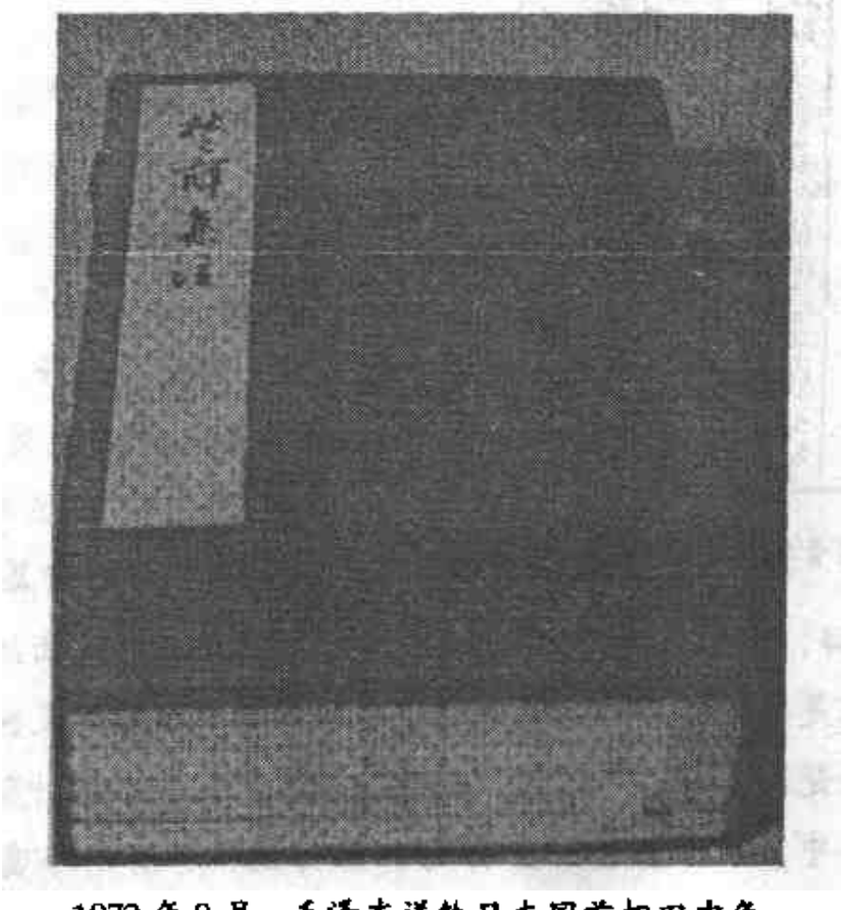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
《关于枚乘〈七发〉》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泽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作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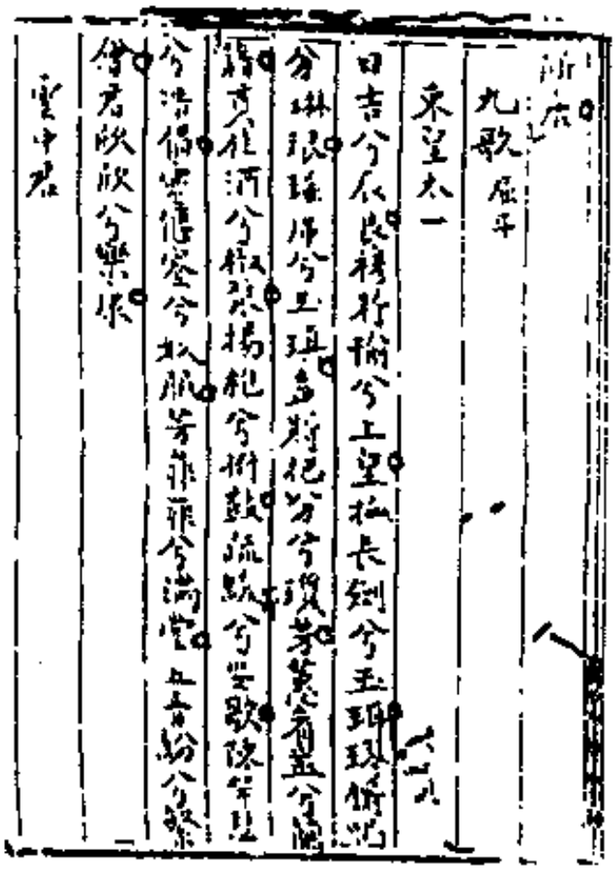
“楚辞”是《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



1972年9月，毛泽东送给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

“楚辞”一词从何而来？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刘向编成

《楚辞》一书。西汉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及屈原以后的楚国作家宋玉、景差，以及两汉时的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和刘向本人所作辞赋编成一集，定为《楚辞》，共十六卷。从此，“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毛泽东青年时代手抄的《九歌》

《楚辞》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的形式。楚辞有其独特的地方文体特色，楚国一带其语言、音乐、宗教等都在诗歌中留下了明显的特征。一是在“楚辞”中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口语，形成它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如“些”、“羌”、“蹇”、“羌”等等，比比皆是。二是楚国的地方音乐在楚辞中有明显的痕迹。如楚辞中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三是楚国的原始宗教色彩在楚辞中得到很好的反映。当时南方的楚国，巫术迷信的宗教风气非常流行。在这种巫风盛行的风俗中，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养育着丰富的想象力，这些都成为“楚辞”文学中的养料。如《离骚》中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等等，都是最好的印证。

“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屈原。除代表作《离骚》外，屈原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九歌》、《九章》等也都是

不朽的名作。

《天问》书中已有专题介绍。

《九歌》共十一篇，和祠神有关。《东皇太一》是迎神曲，《礼魂》是送神曲，其余每篇主祀一神。《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写了祭祀中歌舞娱神的热闹场面和人们对神的热烈礼赞。《湘君》、《湘夫人》、《山鬼》为写神与神、人与神的相爱，是十分优秀的恋歌。这些祠神的诗，大都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国殇》是祭祀那些为国家战死的神。全诗赞美了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写战士们奋勇争先、不怕牺牲，读起来很悲壮。

《九章》是包括九篇诗歌的总体，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处境和悲愤心情的反映。其中《惜诵》时间最早，为初放时所作。《抽思》是怀王时作者流放汉北时所作。其余7篇皆为放逐江南时所作。《九章》从思想内容上看，和《离骚》一样都是写诗人的理想和揭露批判楚国的黑暗政治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

对腐朽的统治集团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诗人都做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如《涉江》："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对权贵们则给予猛烈的鞭挞和抨击，咒骂他们是非不分，颠倒黑白。

《九章》里的诗篇多直抒胸意，直接采用白描的手法，或感情喷发，直接流露，将其奔放的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同《离骚》相比，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浪漫主义成份不多，文笔比较朴素，像《哀郢》、《涉江》、《怀纱》等都是纪实之辞，因此，比《离骚》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在众多楚辞作家中，除屈原外，比较有成就的就是宋玉。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里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辨》，《文选》和《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招魂》非宋玉所作。除《九辨》外，其余诸作是不是宋玉所作，学者之间分歧很大。游国恩等专家认为，宋玉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辨》，其他皆为伪作。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刘大杰。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文选》中所记载四篇也是宋玉所作，其它如《古人苑》中的6篇和《文选》中的《对楚王问》是赝作。笔者同意后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辨》。

《九辨》是一首长诗，共255句。宋玉作《九辨》是借用屈原的口吻，来述说屈原的远大抱负及其不幸的遭遇。同时，也能看到，作者在此作品中也借以抒发自己志不得伸的苦闷。故王逸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

作品写屈原被疏远之后，仍然盼望去见楚王，劝谏楚王任用贤良，联齐抗秦，拯救楚国的危亡。然而楚王却重用小人，听不进劝告，因此使屈原大失所望。诗中描写了屈原不能实现理想的痛苦心情："青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揭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倚结轮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轼。"对小人从中作梗，作者给予了抨击："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宋玉在诗中，也道出了自己的不平的心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郭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这些都是作者失志后内心苦闷和不平的真实自我写照。但是，由于宋玉性格软弱，更由于其没有经历过屈原那种真实的生活遭遇，所以，宋玉也就不可能像屈原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那样强烈，调子比较低沉：“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欲寂寞之绝端合，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赖皇天之厚德，还及君之无恙。”从这些句子看出，宋玉的软弱和屈原敢于斗争、坚韧不拔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三篇，都是针对楚襄王而写的，是“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

“楚辞”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　析】

湖南是楚国旧地，又是毛泽东的故乡，他自小就受浪漫主义文化的熏陶。从青年起，《楚辞》就成为他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关他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很多，可谓常读不辍，有时甚至到了置生命于不顾的如醉如痴的地步。

有关毛泽东读《楚辞》的最早记载是 1918 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无不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艳羡之情。

在延安时期，《楚辞》也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让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给他。为此，1957 年 12 月，逄先知特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列了一个目录，共 50 余种。这一时期，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 年 1 月 18 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凌晨，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李银桥等卫士让他进防空洞，他坚持不去，并让卫士把蜡烛点燃，继续看《楚辞》，读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到忘乎一切的地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李银桥再三催促，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脱口说到：“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样呢？我又回来了，他（指蒋介石，笔者按）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国民党的炸弹扔到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同年 9 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陪同的有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等。到了安徽后，他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推荐了这本书，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他从《楚辞》谈起，又谈到了《论语》及朱熹的注。由朱熹谈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客观唯心主义，还谈到了中国古代具有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特别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 1972 年访华时，毛泽东赠予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由此可见，毛泽东喜爱《楚辞》之深。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楚辞》？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在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理解可基于以下两点：

一、《楚辞》整体上对现实的黑暗持严峻的批判态度，这正是它民主性色彩所在。屈原无疑是"楚辞"群体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就是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悲愤的抒写，表现出诗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坚持理想、坚持操守、宁死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顽强斗争精神。特别是对楚怀王周围的统治集团人们的贪婪、嫉妒、驰骛、追逐、陷害忠良的丑恶灵魂表示了极端的鄙视。屈原的其它作品，如《九章》、《九歌》等，在思想内容上，也都和《离骚》一样是反复地抒写诗人的理想和揭露批判楚国的黑暗政治。尤其是《天问》这首很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几十个问题，表现了屈原对传统思想、历史人物、甚至自然现象、神话传说等的大胆怀疑和一些批判态度。这很符合毛泽东的个性。

毛泽东除高度评价屈原外，还提到了宋玉、景差、贾谊和枚乘，他们的成就虽不如屈原，"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在批判现实黑暗方面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十六篇，现存六篇，以《九辩》最著名。这篇作品显系模拟屈原而成，除悼惜屈原、透露自己的身世外，对妒害贤良的楚国腐朽的社会政治

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但由于宋玉性格软弱，显得很卑顺。

贾谊的赋体作品，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更多一些，如他的《吊屈原赋》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拟自己，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有才智之士的困苦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感情激越，很能打动读者。《鹏鸟赋》也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对黑暗现实的不妥协精神。

二、《楚辞》属于浪漫主义流派，这和毛泽东的审美感悟意趣是相吻合的。毛泽东非常欣赏“诗仙”李白、“诗鬼”李贺、“骚之苗裔”李商隐，认为他们的风格皆秉承了屈、庄的奇幻。

《楚辞》，特别是前期作品皆产于楚地，而楚又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尤其是在祭祀活动中，充满了原始宗教气氛，故在楚辞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浪漫不羁，情感炽烈，这些都成为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品中浪漫主义因素的重要来源。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楚辞的创作才更加开放而少约束，才能表现出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形成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奇丽幻想的境界、雄奇诡谲的完整图画。

毛泽东不只欣赏楚辞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境界的作品，而且，毛泽东的创作，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为瑰丽的华章。他的诗作，吸收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方法，借助大胆的想象，神话般的夸张，采用豪迈的、象征的、富于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抒发自己伟大的抱负、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热情。典型者如《蝶恋花·答李淑一》，除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外，其余描写的都是虚幻的境界。诗中的吴刚、嫦娥这两个神话中的形象，一

个苦恼，一个寂寞，但诗人想象驰骋，对两个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当扬、柳二烈士忠魂升入九霄之后，这两个神话中的人物的精神面貌大不同前，一个捧酒，一个献舞，洋溢出一片敬爱欣赏之情。再比如《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想象非常奇特，抒发了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毛的诗词中，这类作品很多，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作。毛泽东非常喜读《楚辞》作品，于此可见其中的奥妙了。（崔现浚）

再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艺术想象吻合了毛泽东的审美旨趣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互相印证，直接沟通；屈原为理想而不惜献身的崇高个体人格，得到毛泽东的深深敬佩。故毛泽东之于屈原，既敬其人，又爱其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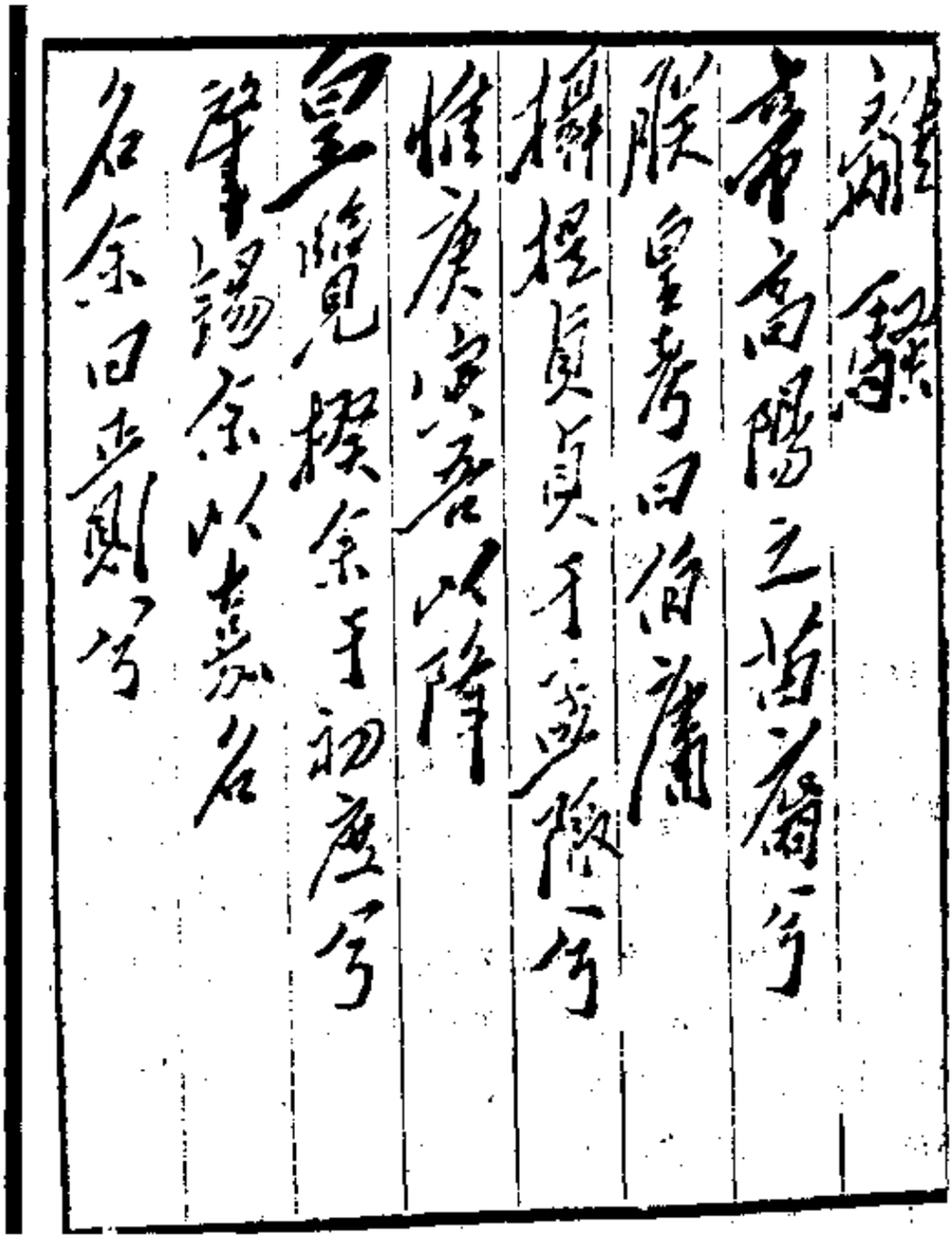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酷爱屈赋，手书《离骚》

【作品介绍】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歌，也是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诗歌。

《离骚》，凡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一篇带有自叙性质的诗歌。《离骚》者何义，历来颇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与之相同的是班固。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以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就是“别愁”的意思。项安世以为是“骚离”的倒言。姜亮夫旧时以为是“离婁”的别构词，但后来他却认为司马迁和王逸的解释比较公允。近人有人认为是歌典名，与《楚辞·大招》所说的“劳商”为双声字，同实而异名，其含义相当于今天的“牢骚”（游国恩《楚辞论文集》）。

《离骚》一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诗人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进行的追求和不懈的斗争。

《离骚》大致可分两大部分，八个段落，再加上一个尾节。首段，从《离骚》一开始就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从其早年起，屈原就努力培养锻炼自己的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伟大事业。第二段写当他自己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参与国事时，却遭到了腐朽保守势力的排挤和迫害，楚王听信谗言，将其放逐，但他“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人不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表明了他志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第三段表现了屈原虽身

处困境，但他“伏清白以死直兮，因前圣之所厚！”仍将继续斗争，宁死不屈。第四段表明自己虽遭废弃，但“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明屈原决不改初衷。以上四段是第一大部分，主要写屈原对自己大半生斗争历史的回顾。第二大部主要是屈原对自己未来道路的探索：第五段借对他的劝告，反复申言自己的斗争关系到楚国的安危，因此决不能妥协。第六段屈原通过幻想境界的描绘，陈述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希望破灭后的痛苦心情。第七段借灵气与巫咸劝告，提出远离楚国的设想，进一步揭露楚国统治者的腐朽，反映了屈原坚持理想、始终不渝的顽强斗争精神。第八段着重抒写屈原热爱祖国，眷恋故乡的沉重心情，“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从幻境回到了现实，集中反映了屈原忠于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最后的“尾声”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总结全诗，立下了铮铮的誓言：即使没有人和我共行美政，但爱国之心不变，宁愿追随前代的贤臣彭咸投水而死！最后，屈原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自沉于汨罗江而死。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崇高亮洁的人格。

《离骚》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诗篇，在艺术上也极具艺术价值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即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开后代文学浪漫主义先河。

《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在《诗经》中，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诗人在诗中写了大量的香花异草，诗人之所以对这些幽花香草那么的癖好，主要是用来比喻他的志行高洁。《离骚》全诗中，比兴是一个接一个，比起《诗经》中比兴的一个片断来说，显然又前进了一步。如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等。

《离骚》虽是一首抒情诗，但是它写得反复曲折、天上地下、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富有故事情节。诗中，一会写到了人间现实，一会又触及到了神仙境界，交叉反复，抑扬顿挫，天上人间，让人神思驰骋。特别是诗的后一部分接连写了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一系列幻境，使得全篇有了很强的故事性。

《离骚》一方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方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句式加长，有利于表现丰富的内容，又有利于表现诗人那胸中流动不息的激情。在《离骚》之前，《诗经》基本上是四言为一句，而到了《离骚》，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皆有之，这就为后代的五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这些字数不等的句子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全诗错落有致，整齐中富有变化。

《离骚》里大量地运用楚方言，使《楚辞》染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方特色。另外，诗中大量地使用虚字，也使全诗显得十分灵活。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试　析】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楚辞》，而在“楚辞”中，他尤爱屈原的《离骚》。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集为一小册子，题为《讲堂录》，并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和《九歌》手抄下来，订在这本小册子的前面，又写有自己对《离骚》各节内容的概括，且评价很高。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初次会面，谈了很长时间，两人无所顾忌，海阔天空，中外古今，无所不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离骚》尤感兴趣，主张对这首长诗赋予新的评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一个批示：将《离骚》印发并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月16日他在讲话提纲中又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举出《离骚》中的诗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所带走的一大批各类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撰的《古义屈宋音》这两本书，在后一本书中，毛泽东曾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做了不少的密密的圈划。可以说，他从青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欢屈原的作品？

首先，从艺术风格上看，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

旨和欣赏特性。

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不仅代表着战国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即湘楚巫史——神话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日本学者藤野友岩在其《巫系文学论》和《天问与卜筮》中一再强调说楚辞是“巫系文学”，这是有相当见地的。

屈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作的，无疑地，这与孔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所体现的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在他的作品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

如果说，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而自发阶段的话，那么，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屈原的作品中，他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羌人香草、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巫咸夕降、羲和弥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屈原所处的楚国，正是巫史文化向理性文化、自然宗教向社会性宗教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说，楚国逐步吸取了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而形成了楚文化的特色，才使神话性文学创作同社会现实之间构成“同一性”，才能使这位具有博大深沉的历史忧患感诗人，运用

理性反思历史，反思传统，探索真理。因此，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话的，思想内容却是历史的现实的。毛泽东主张创作应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正是他的原则。自然他也喜欢阅读、欣赏这类作品。

其次，屈原崇高的个体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把他作为楷模而敬爱。在《离骚》中，主人公（实质是自己的写照）始终是一个上天入地、顽强执着地探索真理的形象。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忧国忧民，当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个形象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

毛泽东很赞赏司马迁对屈原这样的评价：“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显然是将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遇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屈原本为王族贵胄，早年为楚怀王左徒，位居高官，生活于宫廷禁苑，如果不是被两次放逐，也不会写出那样的好诗。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是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作也”。故而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的好文学作品。

出身于湘楚之地的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和情操，更是深深地敬佩。1954 年 10 月 26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访华即将回国时，毛泽东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

客人介绍了伟大诗人屈原，说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还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最后，从探索真理的思想方法和历史观的角度看，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屈原的作品高扬了人的主体价值、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传统观念、现存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大胆挑战和怀疑，从而把人们的思想从宗教迷信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在《九歌》这一组祭神歌曲中，表达了人对神的礼赞及其泛神论观念，但也有希望获得神的保祐这种超自然的实用功利目的的话，那么，《离骚》中那些人格化的自然神：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师等等，则成为诗人随意命令驱使的对象，人的形象比神高大了，神成为人的奴隶，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借神话境界，对以楚王为首的腐朽集团毫不留情地给以揭露和批判，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清明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想和追求。具体地说，就是“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最终达到革除弊端，振兴楚国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加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等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代表，可见毛泽

东对屈原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是给以高度肯定的。

尤其使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的作品不仅对当时楚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且对楚国的历史及楚国由盛而衰的发展变化等等，都有全面的反映。毛泽东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1年7月7日于中南海会见周世钊等人，当有人提到屈原与屈瑕的世系关系时，毛泽东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时间最集中的是在1958年前后。195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虽然他没有说所"领悟"、所"喜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离骚》中那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那不拘成规的对现实的超越，那奇诡的想象世界与毛泽东的精神品貌几乎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勾通。特别是在那最富于幻想的，以空前未有的高速度搞经济"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和"喜悦"的，不就是力图把理想变为现实，把想象变为实践的那种乐观自信，人定胜天的激动亢奋的情绪吗？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自己乐读屈原作品，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恐怕不单单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与那个"疯狂"的时代也有密切的联系。（霍现浚）

《天问》了不起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充满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除了以上的原因，还在于屈原几千年前就能够提出那样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人类理性的深度。

【毛泽东评点原文】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之、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作品介绍】

天　问

屈　原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金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鳌戴山抃，鳌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

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靡萍九衢，枭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浮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厥萌在初，何所亿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

鹿，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脅曼肤，何以肥之？有鹿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会晁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德安施？及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衔，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天命反侧，何佑何罚？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汤臣挚，后北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惊女采薇，鹿何佾？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

百两，卒无禄。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而忠名弥彰？

【试　析】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楚国著名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子兰（楚怀王幼弟）、郑袖（楚怀王宠姬）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的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章》等。鲁迅评价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其《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①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其作品《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人类社会的变迁及其种种神话传说，对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能受天命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信，天命不可依的历史理性信念。所以毛泽东评价《天问》了不起，就在于他几千年前就对于宇宙、自然、历史大胆提出各种问题。正象

① 见《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第76、7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鲁迅所说的，提出前人所不敢提的问题。这显示出人类理性思维的深度。《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这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引起伟大思想家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则是不难理解的了。（宿如萍）

《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

毛泽东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所以毛泽对李斯评价也较高。他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恐怕不完全是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证明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

——摘自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第15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介绍】

谏逐客书

李　斯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疆，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驹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

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疆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试　析】

李斯（？——前208年），战国时期楚国上蔡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从小立志出人头地。据传，小时候李斯发现他家厕所的老鼠非常怕人，而粮仓里的老鼠胆子却很大，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李斯下决心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奋斗。他成了荀子的学生，努力学习，成了才华出众的青年。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入秦后被

任为客卿。后来由于李斯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始皇升任他为丞相。实现了李斯少时的梦想。秦始皇死后，李斯被宦官赵高陷害，株连全家老小全被秦二世胡亥处死。

《谏逐客书》是李斯在秦国做客卿时写给秦王的秦章。秦始皇初年，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当时别国人在秦国做官的称客卿）。客卿影响了秦国贵族势力，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国力量这一事件，请秦王逐客，说客卿都是为他本国的利益来秦国，并不真心为秦国。于是秦王下令逐客，李斯就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而成霸业，列举了由余、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的人物对秦国的重大贡献。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指出对“客”不应一概排斥，否则将不利于秦。文中还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出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虚外患是不可取的。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实际是一篇说理极强的文字。李斯的这篇秦章，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地揭露出秦王使物用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暴露出逐客之非。文章除了一般议论文所具有的各种论证方法外，行文还具有婉转的措辞与犀利的语锋完美结合的特点；而词采缤纷的大肆铺陈，以及气势充沛的排比句式，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赞扬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并接着发挥说：那时侯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言外之意，

那时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关系复杂，统一程度很低，李斯《谏逐客书》的主张，为秦国招贤纳士，蓄兵买马，积累力量为日后统一中国是很有利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称赞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一方面是从文章的写作技巧来讲的，另一方面还基于文章的内容。晚年的毛泽东扬法抑儒，李斯据毛泽东在1964年8月30日的谈话中讲“是拥护秦始皇的，”秦始皇属于法家，属于干实事的。因此，这篇文章就内容及实际结果来讲，对秦的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宿如萍）

《触詟说赵太后》说明：不注意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如何真正地疼爱自己的子女，《触詟说赵太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毛泽东以此为例，提醒人们要关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以身作则，堪称楷模。这从他对毛岸英、李纳的教育中可见一斑。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

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避，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作品介绍】

触詟说赵太后

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呼？”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

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託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试　析】

《触詟说赵太后》见《战国策·赵策》。文章的背景是：赵

国惠文君新丧，秦兵压境，赵太后求援于齐，齐提出长安君为质的条件，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拒绝。国家存亡，千钧系于一发。

在这紧张而沉寂的气氛中，触詟进谏赵太后。触詟劝赵太后，如何真正地爱自己的子女，不计较眼前的一得一失，而是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使子女珍惜为国为民作贡献的机会，同时也使自己受到锻炼，提高能力与提升形象。赵太后接受了触詟的建议。

毛泽东在1967年推荐读这篇文章，其教育意义是深刻的。毛泽东从古人的言论及历史的教训中，提醒人们要关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涉及到革命事业是否能继续下去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革命事业有可能被丧送。

毛泽东不仅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严格要求子女的。关于这一点，李银桥曾介绍说：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1946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毛岸英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从小在延安就跟着大人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学后，和同学们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宿舍，一样的坐公共汽车上学、回家，一样的下乡参加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李纳在学校吃不饱，回到家里就狼吞虎咽地吃饭，工作人员建议为李纳多争取点口粮。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虽然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说：“我是国家干部，国

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据介绍，1951 年外交部亚洲司的服务员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专设二、三辆汽车，同时在西单附近定一联络点，由家长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的时间。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批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酌办”。并批注：“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2000 多年前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及有关批示，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 3 点启示：1. 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家属子女要严格要求，这一方面是清除官场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自己子女的爱护。一些干部子女在某些家长的溺爱下，骄横一时，胡作非为，既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也败坏了“老子”的名声。这应该引以为戒。2. 领导干部教育自己的子女问题，是关系到国家事业是否兴旺发达的问题，应该提高到这一高度来认识问题。3.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教育子女问题，也有警醒作用：特别是目前独生子女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值得人们反省。（戴平）

《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毛泽东将宋玉这篇《风赋》中的大王之风定性为贵族之风，将庶人之风定性为贫民之风，并看出其中阶级斗争的含义。这一番妙解，实在是毛泽东独有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宋玉写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说有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风赋》何曾让景差”，宋玉、景差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人。宋玉的这篇《风赋》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篇《风赋》在《昭明文选》，我前天翻了一下，你们再看看。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3日在
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作品介绍】

风 · 赋

宋 玉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出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漂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飘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烂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杜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凄栗，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

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愤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醯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试　析】

宋玉，战国时楚国人，稍后于屈原的辞赋家，或称是屈原弟子，故文学史上常常是屈宋连称。宋玉在楚襄王时担任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官职。在创作上颇受屈原影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收录宋玉16篇，大多失传。现有《九辩》及《昭明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毛泽东喜爱《楚辞》，自然涉及屈原、宋玉。毛泽东从宋玉的《风赋》中引申出阶级斗争意义。《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铺叙风的一般发生过程，并以大王雄风和庶人雌风来划分。反映出作者的社会立场和阶级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社会内涵。毛泽东说这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这是两种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并借《风赋》中的一句“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来比喻社会风向在开始的时

候，也是最不容易辨别的。提醒人们注意一切处于初始状态下的不显眼的事情，防微杜渐，提高辨别社会风向的能力。（宿如萍）

《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一番花言巧语，迷住了楚王，使登徒子成了好色的代名词。毛泽东不是昏庸的楚王，他一针见血地道破其中的诡术。在毛泽东的眼中，登徒子变成一位爱情专一、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

【毛泽东评点原文】

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

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49—15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

【作品介绍】

《登徒子好色赋》

宋　玉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蚨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

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之说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鸱鹭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妹，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况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俊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试　析】

毛泽东同志博览群书，古典文学造诣很深。经常能从古代诗文中发现一些不被常人所理解的内涵。《登徒子好色赋》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在宋玉的华丽辞章下面，使人们感觉宋玉是无辜的，而登徒子家有丑妻，必然好色。在他的花言巧语下，楚王被打动了，读者也被打动了，以至于几千年来，登徒子一直被看成是好色的代名词。但是毛泽东却能通过宋玉的言谈中，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一针见血地指出：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事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扩大”的方法。从本质上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

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这种说法流传了几千年，一方面说明宋玉的文章写的高明，精彩在其花言巧语下，人们不得不佩服；另一方面也说明楚王的昏庸，偏听偏信。

通过毛泽东评点《登徒子好色赋》，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的一些读史观点。其实早在年轻时候，毛泽东同志撰写《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中就提出一个著名解析：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当然不能机械的理解它，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善于古为今用，能够坚持主见，发古人之未发，借古喻今，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一些常人难以发现的真理。毛泽东同志跳出历史之拘泥，用一种全新的观点去诠释和理解历史给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其实，关于毛泽东评点历史的方法如关于“盗跖”、“水浒”等从学术上可以争端，但有一点是不应置疑的，即就是其现实意义，能够从书房中、古纸堆中解放出来为现实生活服务。毛泽东评点《登徒子好色赋》的深刻喻义即在此，那就是提醒我们干部、学术界在评价历史人物中，在现实生活中不要为花言巧语所打动，而以偏概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更要全面，不能轻信别人“花言巧语。”而“登徒子”的悲剧，很大一部份来自楚王的昏庸。这应该引起广大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的警觉。这也是毛泽东同志评点《登徒子好色赋》的现实意义。（戴平）

学习《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是为人们熟悉和称道的寓言。两千年来，它成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的象征。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引述这则寓言，并赋予了它全新的革命内容，将愚公精神推向社会领域。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

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摘自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品介绍】

愚公移山

列　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

入之迁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试　析】

《愚公移山》这则古老的寓言告诉人们，不管困难有多大，看起来多么难以克服，只要人们和它展开斗争，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个故事历来为人们称誉、传颂，特别是愚公，虽然是寓言里的人物，但两千年来，它已成了中国人们不畏艰难的象征。在今天河南济源县西北，还有很多有关愚公的古迹，如尊愚阁、愚公泉等。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并经常加以引用。据1938年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任队长兼军事教员的王德回忆，当日寇进攻武汉，华中危急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同抗大教职

员和部分学员谈话，他口才无碍，滔滔不绝。在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后说，我们必须准备打持久战。我们这辈子打到老，胡子白了打不走日寇，交给儿子，儿子再不行，交给孙子。接着介绍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中就说道：“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当然，最著名的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作的演讲。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第8个年头的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主席说，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不光要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要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毛泽东接着引述了《愚公移山》这篇寓言，要人们学习愚公移山这种精神，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就会感动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使全国人民一齐起来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挖山不止，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做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将这样一个深受人民喜爱的寓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讲的通俗有趣，并给予一种新的解释，增添了新的内容，赋予了革命的意义，把愚公精神从人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斗争的领域。为在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党的“七大”决定的路线，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起到了动员和鼓舞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明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喜欢把人民喻为上帝。他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依靠群众的力量，他认为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无往而不胜。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1975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就径直说道：“人民就是上帝”。

对《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念念不忘，1964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在同海一波谈话中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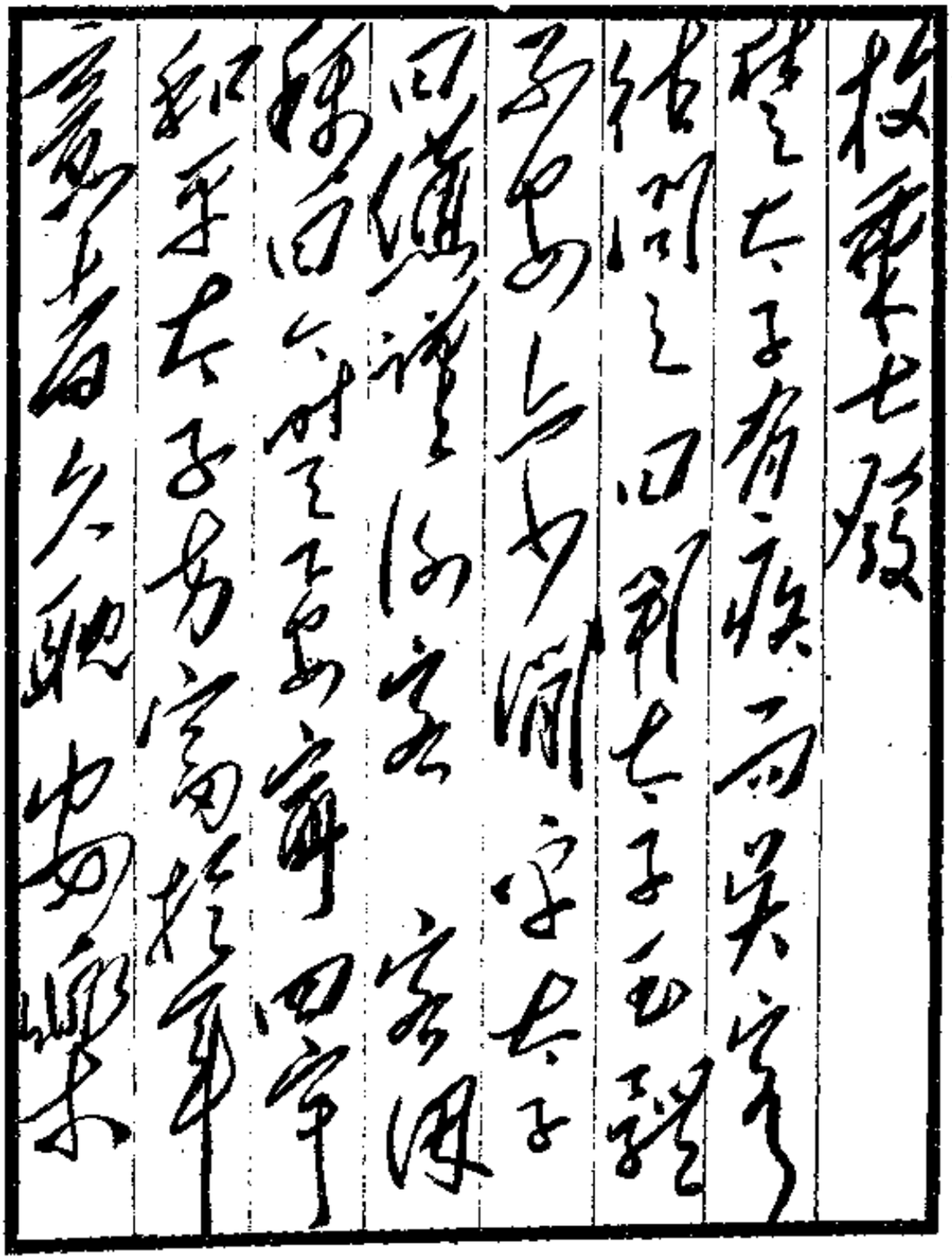
《七发》的气氛有批判色彩

《七发》是汉代文学家枚乘的名作。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下发此赋，并写了长长的评语，这似乎叫人不好理解，其实它正符合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治国风格。

【毛泽东评点原文】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

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厥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



毛泽东手书《七发》

脆肥农，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

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事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靡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摘自费振刚、董学文主编《毛泽东圈点史传诗文集成》，第529—5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七　发

枚　乘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荡者，虽有心略辩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微兮侻兮，浩瀇瀁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渫手足，颖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淏泼，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颓、发瞽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眇小烦懑，醒酲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客曰："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溶溶，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蜿，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轰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

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蓑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凌赤岸，薄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阚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状如奔马。混混庬庬，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跰，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泙汩潏漫，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溪溪，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踸焉，洞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溃然汗出，霍然病已。

【试　析】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代名将彭德怀终于成了右倾主义的代表，被示众。在毛泽东组织人马“批彭”的同时，也是参加会议的人正处于选择的路口，毛泽东同志突然指示下发了《七发》并写自己的评点，这似乎令人有些不好理解。然而当我们细读《七发》及毛泽东的评点，就会体悟出毛泽东既具有诗人的洞察力又具有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七发》是汉代文学家枚乘的名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赋体诗词之一，是一篇讽刺和劝诫之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点的那样，此赋是写给贵族们看的。文中借吴客之口分述音乐、饮食、车马、猎宫苑、田猎、观涛等七种方法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事非。应该说枚乘的文章中孕含着一些颇具现代的科学的养生观，就是通过劳作，改变奢糜的生活方式，志趣存远，超越物我，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些道理，那么也就不值得毛泽东的挥挥洒洒了，他实际上仍然发挥自己“借古喻今”的特长，通过对《七发》评点，表明自己的观点，使庐山会议那种紧张的气氛，在历史文献的参照下，达到一致。我们从毛泽东的评点中，可以看到其深刻的喻义：

第一，生活方式是人行为方式的一种表象。在枚乘的《七发》中，通过太子的患病的致因的层层追究，揭露贵族们生活的奢糜。毛泽东加以引申为这是二个阶级的路线斗争。一种是枚乘所代表的朝气向上，健康有活力的低级阶层，另一种是太子代表的贵族阶层，通过枚乘的批判，使我们对那种贵族们悲观、糜烂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中所遭到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对大跃进的冒进以及“左”倾思想的影响所进行的斗争而被扣上右倾社会主义帽子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评点，已经表达了自己批判右倾主义的基调，那就是一切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象太子代表的贵族一样——

患病了。

第二，如何对待患病的人？毛泽东在评点中，借枚乘的劝讽方法，对于患病的人，并没有一棍子打倒，而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

严格讲起来，《七发》并不是一篇多么高时的文学篇章，但是在政治家毛泽东看来却有另层涵义，使我们对《七发》有了重新的认识。（戴平）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治安策》是贾谊的一篇著名政治文章，旨在为国为民的长治久安提出政治谋策。毛泽东高度赞扬贾谊的才华，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于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作品介绍】

治 安 策

贾 谊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向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无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熟

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无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蔓，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列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谕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

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钝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骫骳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骫骳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最令樊、酈、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徇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

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贾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向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重。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蹠。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蹠。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直倒悬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无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纳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绫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嬖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兽者无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俺

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囊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剔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无行义之（先）〔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礼）〔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

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意）〔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宫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

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杨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无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亡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马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庞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

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傅，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缧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漆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我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庮诟无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挠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卖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无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

"篡篡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掉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意；娶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圉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试　析】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最早的汉赋作家之一。年少时即以诵诗闻名于世。20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次皇帝诏下让议论问题时，许多年长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20多岁的贾谊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文帝越级提升他为太中

大夫。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忌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而死，他自伤失职，忧郁而死，年仅33岁。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未泯，向文帝写了《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在汉文帝时，西汉王朝经过近四十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和恢复，政治比较稳定，正是“文景之治”的清平盛世，而贾谊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锐和崇高的责任感，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了国家潜伏着的种种隐患和危机。《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提出了九个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当朝权贵们掩盖矛盾、歌功颂德的错误做法，批判那种以为“天下已治已为“非愚则谀”。并尖锐指出：如今的形势犹如睡在一堆点了火尚未燃起来的柴草上一样危险。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痛苦的是：诸侯王叛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他分析了发生诸侯之乱的根源之后，提出缩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的对策。贾谊为之流涕的是：一是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二是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态度软弱，不敢碰硬。他建议朝臣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尤其要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贾谊为之长叹息的是：第一，社会风气日益奢侈腐败，已经到了“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严重程度。老百姓贫困破产是社会动乱的基因。第二，汉朝建立后，对亡秦的遗风余俗，未加丝毫涤荡扫除。第

三，对太子的教育未予足够重视。贾谊一再强调当政者应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可惜其它三项内容在班固的《汉书》中没有记载，也许当初班固是选择了主要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贾谊的《治安策》是其通过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提出来的治国匡时的良策。他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分析论证，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朴实犀利，感情中肯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能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学坏。这种把太子放在“玻璃罩”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而难达到贾谊理想的教育效果。毛泽东一向主张，年轻人要成长为革命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他认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们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以自己这种认识尺度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所以说它“近于迂腐。”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这种思想，其子毛岸英就在他的指导下，到农村种过地，到工厂做过工，最后在抗美援朝中战死在朝鲜战场。

毛泽东对历史上有远大政治眼光，主张改革，勇于创新的

政治家，特别是年轻人是极为赞赏的。他称赞贾谊为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对他33岁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写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的才华的欣赏和注重。

（宿如萍）

《过秦论》讲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文中揭示秦王朝的原因即在“仁义不施，功守之势异也”的道理。毛泽东曾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以《过秦论》中的观点作为批语，显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历史价值的肯定。

【毛泽东评点原文】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7页。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过 秦 论

贾 谊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钼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

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语，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

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郡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句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

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欣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试　析】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这即前面引的信。信中推荐他阅读《贾谊传》。毛泽东对贾谊十分赞赏。他在多次讲话中，历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说到“英俊天才”贾谊。对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因梁怀王意外坠马而死，自责“为傅无状”，33岁即郁郁去也叹惋不已。曾深怀感念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至于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提到的班书略去其《过秦论》一文，有的学者撰文指出班固《汉书》并未“略去”《过秦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项籍传》“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曰”，引应劭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应氏所谓“此第一篇也”，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篇。“司马迁取以为赞”，并非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是收入《秦始皇本纪》，毛泽东“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当系误记。此说可备参考。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它纵览秦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分析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功过得失，在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中，力图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汉文帝的政治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然而该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两汉一代，鲁迅曾经指出，《过秦论》与《治安策》等“为两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过秦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不知“攻守之势异也”，即在夺取天下、统一天

下之后，秦政权没有及时地意识到形势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文中对此说道：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由“取”转变为“守，由“并兼”转变为“安定”，政策、策略必须相应转换，然而秦始皇没有能够努力克服长年战争后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因而没有“取之”和“守之”的区别，这样纵使有强将利兵，金城千里，终难免灭亡的命运。关于贾谊的这一论点，后人有不少评论。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说：“谊之论秦，备述本末，而断以两言，可谓至矣。然谊之意以攻守为二涂。用权谋以攻，而用仁义以守，然后为得。汉初豪杰，所见大抵如此。故陆贾有逆取顺守之言，而谊亦为攻守异势之说。”

毛泽东提到贾谊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话，是在他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时候。据王子今介绍，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他注意到朱敬则善于以历史经验完善现时政治的特点。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任正谏大夫等职。他曾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来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说，“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捐不急之官，惜日爱功，话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

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秦政推行法家之术，政策以苛急酷烈为特征，在当时情况下促进了人口增长，国家富强，于是有了削灭六国的基础。然而这都是不得已的“救弊之术”。政策、策略的刻薄与变诈，只适合于进趋与攻战的形势，进入和平时期之后，政风就应当转而宽泰淳和。秦王朝“不知变”，于是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批注：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由此体现出毛泽东对于贾谊著名政论《过秦论》的历史价值的肯定。

《鹏鸟赋》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鹏鸟赋》本是贾谊以庄周齐生死等荣辱及知命不忧的思想作的自我排遣和自我慰藉之辞。但毛泽东却别是一种读法，他从中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认为生命如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有始兴有终，而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将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鹏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

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长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罗！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了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摘自毛泽东同孟锦云的谈话（见白金华编《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第213页）

【作品介绍】

鹏鸟赋

贾　谊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鹏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问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鹏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鹏鸟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鹏汤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

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约播物兮，块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分，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消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试　析】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他对贾谊的《鹏鸟赋》是情有独钟的。曾多次同孟锦云谈到这篇赋。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鹏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毛泽东为什么读了十几遍还想读，他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意境？

贾谊可谓奇才短命，他只活了三十三岁。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不仅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开始颇受汉文帝刘恒重用。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他的

政论文、骚赋都很名。

《鹏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所作。据《汉书·贾谊仲》载："(贾)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渔)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不祥鸟也。谊既以谪(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这说明了他写作此赋的时间和原因。赋的内容除主要抒发他的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外，还用形象的语言说明了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运转推移、永远循环反复，没有什么运动停息。自然界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就人生而言，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相互倚伏，互相转化。既然人的一生灾祸与幸福相伴，那么，对待生命何必珍重爱护？人死以后身体会变成别的东西，这是自然法则，不值得过分忧虑。显然，这是以庄周齐生死等荣辱及知命不忧的思想来作自我排遣。虽然说这有些消极颓废(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但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宁死而绝不同流合污的境界，显然是纯洁高尚的。世俗凡子，或贪财好利以身殉财，或追求虚荣贪权丧身，或怜惜生命害怕死去，只有那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超脱物欲，摆脱世俗的羁绊，忘记自己，与大道共存。即使死了，也好像长久休息一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鹏鸟赋》"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像贾谊那样对待生命。一般人做不到，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皇、汉武照样无例外地追求长生不老。对此，毛泽东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长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罗！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了

个‘万里长城今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历史上追求长生的人非但不能长生，很可能死得更快，因为，误服“仙药”而导致死亡的大有人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就是如此。他躲进深宫，日求长生，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一个叫顾可学的人，罢官十年，不甘寂寞，于是贿赂严嵩，自荐有奇药。嘉靖序闻知后，立刻降赐金帛，将顾召至京师。顾献“秋石”药，说服后可以长生。帝“饵之而验”，但嘉靖帝也只活了60岁。

在追求长生的帝王中，毛泽东提到了秦始皇，汉武帝。

秦王嬴政的丰功伟绩自不必多说，但在他成为“始皇帝”的同时，他就直接面临叫做“死”的绝对矛盾了。他必须和死亡斗争，因为所谓的“皇帝”，乃是超越世俗凡人的。但是，实际上皇帝依然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始皇帝非常畏惧死亡。

按说，他本来是个合理主义者，像始皇、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这样使用号码顺序的命名法，便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当然知道自己终有面临死亡的一天。然而，始皇的地位使他确认他是地上的唯一支配者，是与在上的支配者天帝对等的存在，因此，他应该和天帝一样永生，结果，始皇帝的晚年几乎都耗费在这个目标上。

了解了始皇要追求长生不老的秘密后，民间的方士便开始接近秦始皇，他们自称发现了炼造仙药的仙人，刻意继续探究，然后向秦始皇索取数额庞大的费用。徐市和虑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徐市声称，东方的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

上住着仙人。如果能取到仙药，便可长生不老，秦始皇便让他率领着大船队出海。徐市自然是寻不着仙人和仙药的，在骗取了大量金钱之后，便逃之夭夭了。秦始皇感到自己上了大当，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愤怒。

但是，他的求仙之心不死。又花费了数年功夫，东海仙山还是没有寻到。其实，他是被方士愚弄了。可是，他依然一点也没有自觉。

不幸的是，他在出巡到平原津时病倒了，随后在七月的一天，于巡行中途死去了。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是如此。求仙，对汉武帝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字眼。早年，他就因为求仙而做出了不少荒唐的事情。元光元年（前 134），他派人在建章宫用柏木修建了一座名叫“柏梁台”的高台。台上铸造一个二十丈高的铜柱子，在铜柱之上安装手托铜盘的铜仙人，用来承接上天赐给的仙露。方士们信誓旦旦地说，用仙露伴着玉石粉末喝下，即可长生不老。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丝毫也没有引起汉武帝的怀疑。于是，每当露水降时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如此这样喝了一年，仙自然是没有成，反到落下肠胃病，还差一点一命乌呼。

到了征和二年，（前 91），汉武帝已经六十五岁，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以前。体态龙钟，精神恍惚。他对生命似乎更是恋恋不舍。越是衰老，他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那玄妙奥秘，并扬言永生不死的求仙求神的方术。但无论如何，天命是难违的。武帝终于在后汉二年（前 87）初春，一病不起了。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叱咤风云的秦皇、汉武也只能与黄土作伴了。在这个意义上，皇帝与凡人一

样，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的确，人的生命如同万事万物一样，有始就会有终。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选择。在如何对待生命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是保持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遮世人耳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以为毛泽东不会来。当时中共中央方面，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认为还是不去的好。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去，正好上了蒋介石的圈套。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决计亲自率领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毛泽东的这一举动，轰动了国内外，使许多人士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其实，毛泽东何尝不曾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但他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和平、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毛泽东非常赞同司马迁对人生命的看法。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957年，当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提出了“五不怕”精神，最后一条是“不怕杀头”，如果这样，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霍现俊）

《上邪》要多读

1962年，毛泽东的儿媳邵华病休于大连。当时她学业未竟，久留外地身体不好，加上和丈夫有些小磨擦，情绪低落。毛泽东给她写信，除鼓励她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之外，还要她多读《上邪》，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上邪》一篇，要多读。

——摘自毛泽东1962年6月3日致邵华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5页）

【作品介绍】

上　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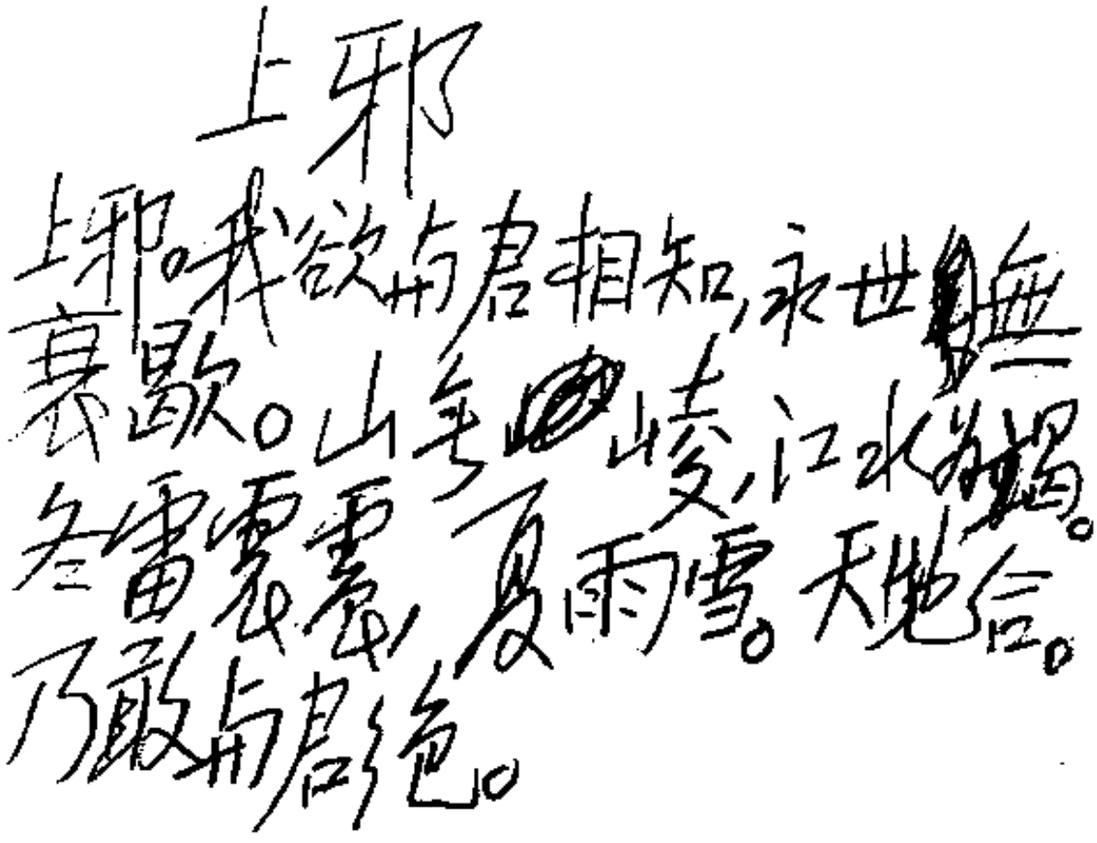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试　析】

《上邪》是汉乐府《鼓吹曲辞·铙歌十八曲》中一首采自民间的情诗。是一个女子对情人表示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誓言。

“上邪”，就是“天啊”的意思。“上”指天，邪，同耶，语气词。在这里乃女子呼天以为誓：我愿与你相爱，让我们的

爱情永不绝衰。《上邪》之所以成为古今情诗的奇作，在于它以人们意料不到的五种自然界的变异，描写出对爱情的坚贞不移。



毛泽东手书《上邪》

毛泽东读这首汉乐府歌辞非常认真仔细，在诗的标题前连画了三个圈；标题旁，画有着重线；开头三句与结尾一句旁划着曲线；全诗每句都加圈。在“山无陵……天地合”等五句的旁边，分别标着“1、2、3、4、5”的数字，指出作者是用了五个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来表达对爱情生死不渝的决心的。

1962年毛泽东的儿媳邵华病休于大连。当时她学业未竟，久留外地，再加上和丈夫毛岸青的生活也有些不尽人意的时候，情绪不大好。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给邵华写了一封

信，叮嘱她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一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信中提及“《上邪》一篇，要多读。”信中还写了许多鼓励的话，希望她坚强一些，不要为困难所压倒，要以事业为重。同时要她相信，爱情上的忠贞不渝，足以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这之中恐怕也体现出毛泽东对《上邪》一诗中所表达的坚贞、刚毅精神的理解和赞赏。

邵华读了此信，深受感动。她那开朗豁达的性情恢复了，对岸青也更加关心和体贴。

《大风歌》很有气魄

刘邦的《大风歌》，质朴的几句，展露出一代雄主的宽阔胸怀。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显然是将刘邦的诗的气魄同他建功立业的气魄揉在一起来体验和赞扬的。我们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是否也能感受到这种气魄。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首诗（《大风歌》）写得很好，很有气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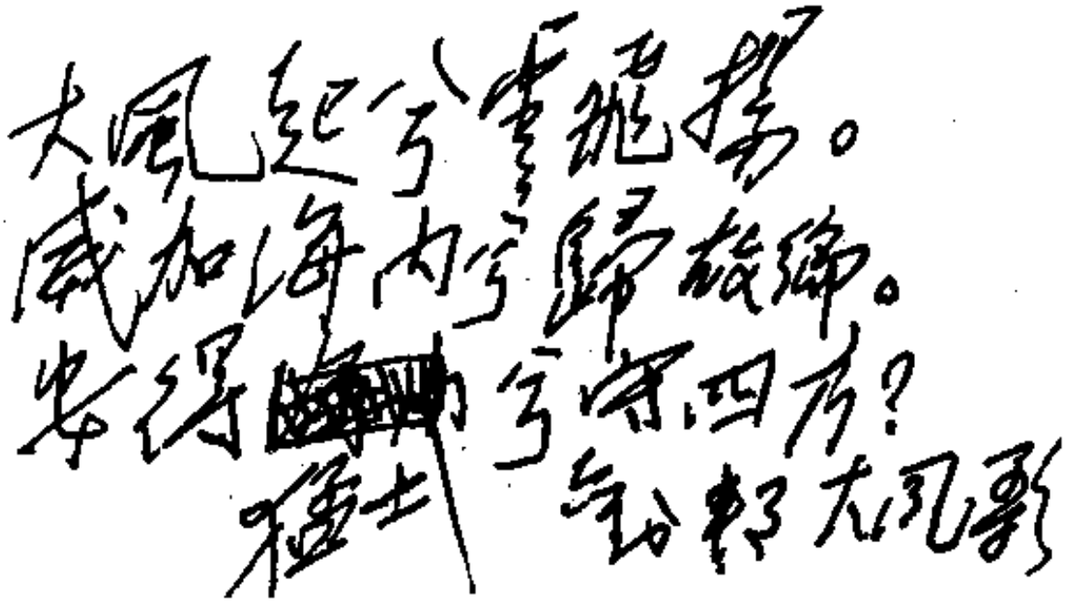
——摘自张贻玖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32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作品介绍】

大 风 歌

刘 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守四方！



毛泽东手书《大风歌》

【试　析】

刘邦（前256——前195），即汉高祖，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早年当过亭长，雄心勃勃，豁达大度。有一次看到秦始皇出游时的威风和气派，曾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起兵沛县，自称沛公。前202年打败项羽，刘邦即帝位，建都长安，史称西汉。后世有"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自高祖始"之说。

据《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刘邦在他称帝后的第十二年十月，平定了淮南王英布的反叛，返回时途径故乡沛县，在沛宫设置酒宴，邀请款待父老子弟，当酒喝得十分畅意的时候，他站起来击筑伴奏，乘兴唱出了这首《大风歌》。质朴的几句，活脱脱展露出一代雄主的豪阔胸怀。

《大风歌》气势沉雄，激越慷慨。第一句的起兴，使诗的意境升腾向上。后两句赞叹大业的荣耀，盼望贤臣良将巩固江山大业。开国君主的胸襟与奋力向上的大风的意蕴相交融，构成了一首旋律高昂、节奏明快、风格独异的短歌。

毛泽东十分喜爱这首诗，称赞它"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并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实属不易。诗风出于本色，《大风歌》出于刘邦的大业。毛泽东显然是将刘邦的诗的气魄同他立业的气魄揉在一起来体验赞扬的。由毛泽东对《大风歌》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的品评与选择，既立足于他所从事的历史的、政治的事业目标，又与他独特的人格意志、浪漫个性、巨人情怀密不可分。这也是毛泽

东喜爱《大风歌》的原因。

毛泽东对刘邦是比较推崇的。毛泽东在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时赞扬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1962 年 1 月 30 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1957 年他在同吴冷西的谈话时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刘邦取胜项羽失败不是偶然的注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毛泽东认为是“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观沧海》大手笔

毛泽东对曹操其人评价甚高，也很欣赏他的文章诗句，特别是这首《观沧海》。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漫步时，嘴里常常低吟此诗。他在此间创作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就借用了该诗中的一些句子。

【毛泽东评点原文】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摘自毛泽东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0页）

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

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摘自白金华编《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第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观沧海》

曹　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试　析】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后封魏王，成为实力强大的三国鼎立之一的魏国。古代帝王中象曹操这样在政治、军事、文学上都为一流的是很少见的。所以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对曹操的"多才多艺"是非常看重的。

曹诗内容深沉，气魄宏伟，慷慨悲壮，开启并代表了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的特色。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文章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上述评论时，用红铅笔圈划起来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曹操的文词风格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之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中，写道毛泽东对曹操的评论是："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意，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显然是采纳了鲁迅对曹操的评价。

《观沧海》，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1207）率军平定乌桓后，在班师途中，路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所作。全诗通过描写碧波辽阔的沧海景象，表达了诗人

开阔的胸襟，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慨及得胜而归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1954 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酝酿着创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触景生情，缅怀千古，壮歌抒怀。其中“萧瑟秋风”是由《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点化而成。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毛泽东的眼中“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参阅《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

（宿如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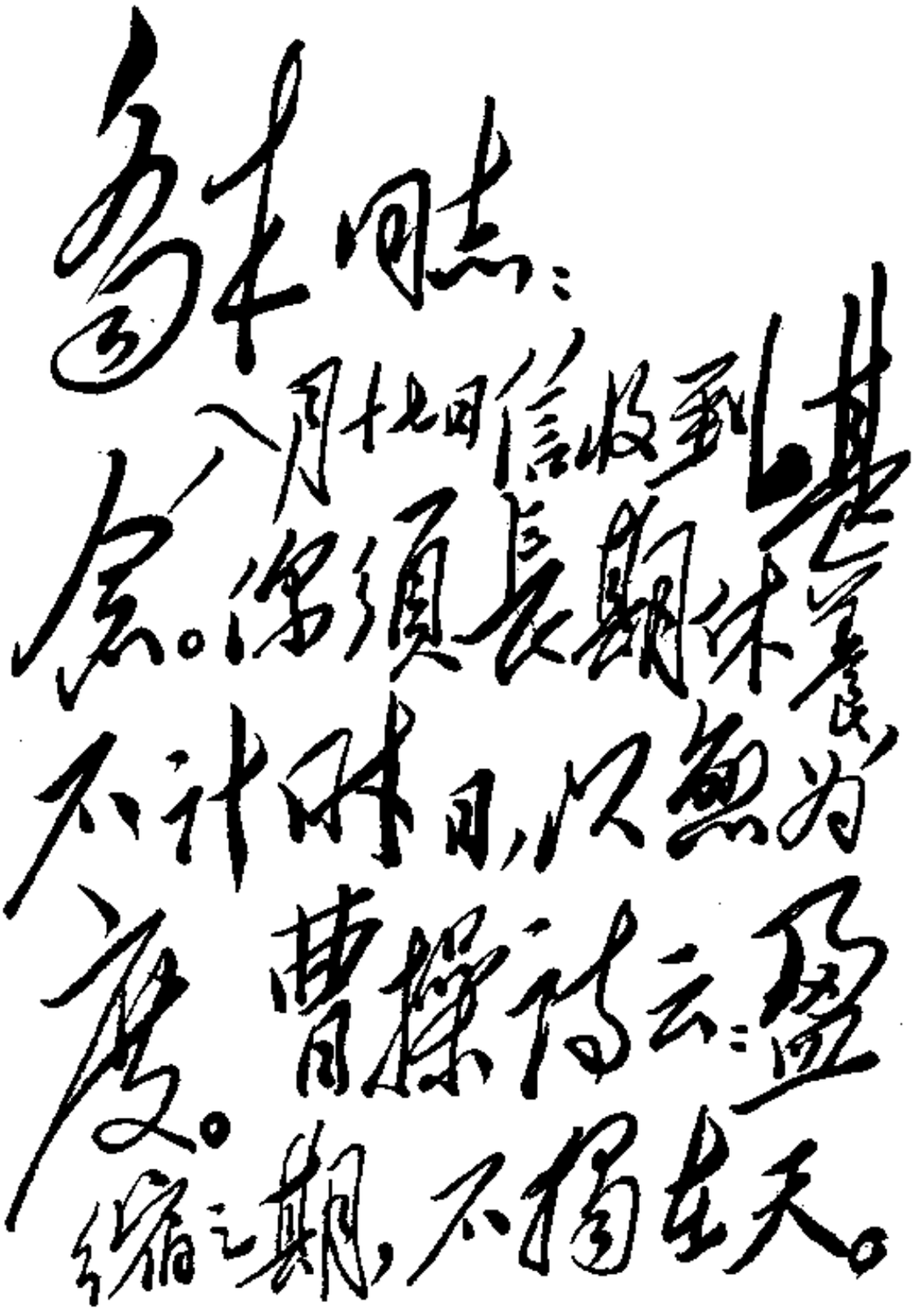
《龟虽寿》讲了养生之道

1961年，胡乔木因劳累过度生病，毛泽东劝其放下一切事情，专心静养，并让他读这首《龟虽寿》。第二年，毛泽东还向林彪推荐这首诗，劝其注意养生之道，增强信心，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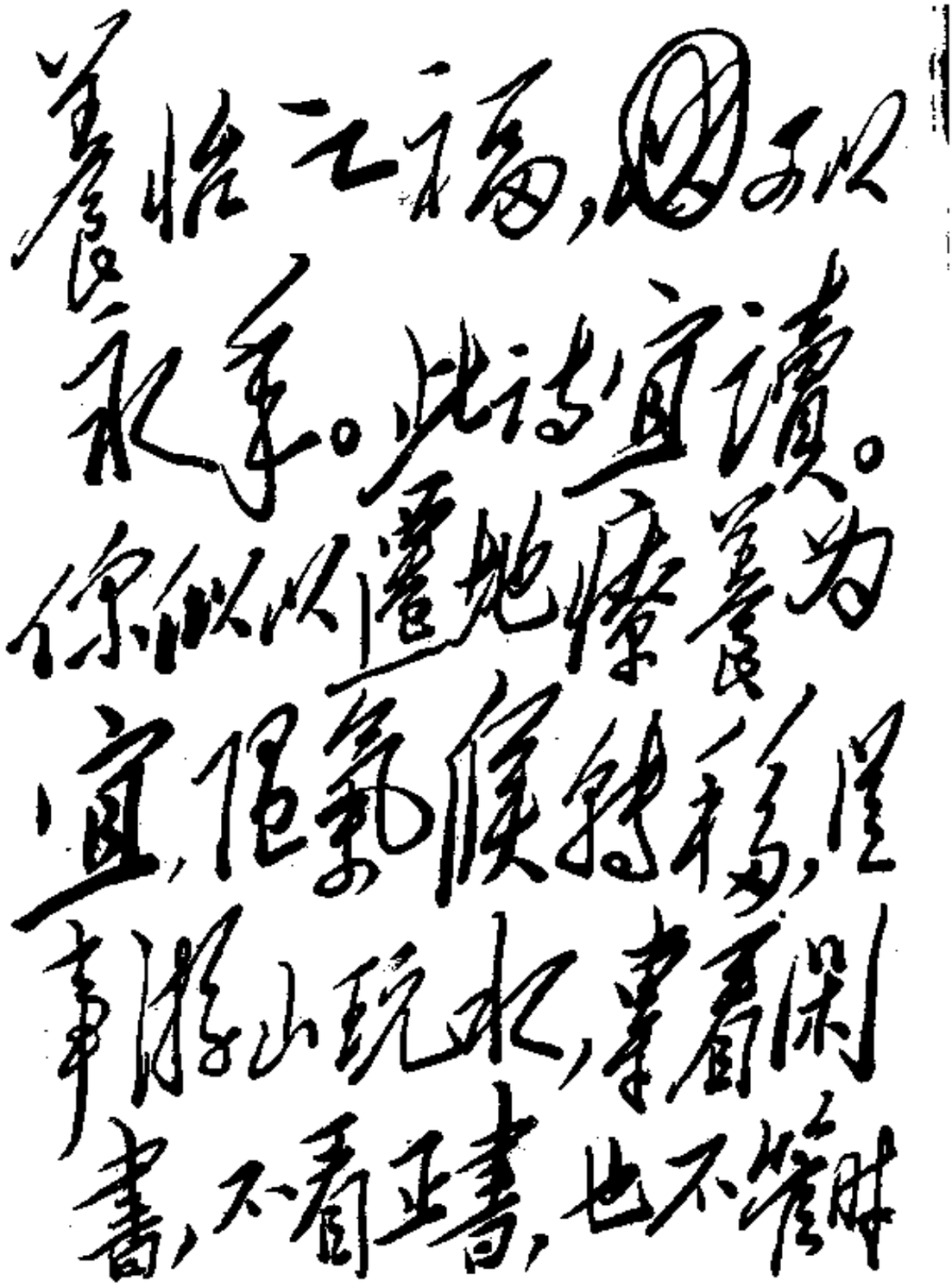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原文】

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致林彪的信（见陈晋著《毛泽东之魂》第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1961年给胡乔木的信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

——摘自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

【作品介绍】

《龟虽寿》

曹　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试　析】

《步出厦门行·龟虽寿》，是曹操的名篇，这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班师途中写的。因为在这次班师途中，他的主要谋士郭嘉病死，年仅38岁，从而引发出他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共12句，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借“神龟”、“腾蛇”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说明人也总是要死的，这是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二是借“老骥伏枥”说明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这是乐观向上的态度；三是借“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说明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对生命的朴素唯物论态度。正如清代

沈德潜所编写的《古诗源》中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

毛泽东对这首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作品的非常欣赏。他不仅自己喜爱这首诗，还经常把它写下来赠给别人，以示鼓励。譬如，1961年8月25日，他给因病休养的胡乔木写信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14日，在给林彪的信中又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读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毛泽东在阅读《南史》时，读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以为必死无疑，已置好棺材，不料不久病情好转，最后活到90岁。史家对此评论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至此以曹操《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意思是并非天道不可知，全在人们的"养怡"而已，实乃"己可造命也"。毛泽东认为，这里面有唯物的因素。

毛泽东曾与他的保健医生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啰。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怎么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死观的。他认为，人有生必有死，生本身包含着死的萌芽，这是一对矛盾，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概莫例外。有些古代帝王妄

想长生不老，千方百计寻找灵丹妙药，这是唯心主义糊涂观念。但是人又不能因此而悲观消沉，不思进取，而是“己可造命”，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积极的养生、锻炼，达到既健康又长寿，最大限度地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这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科学的人生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宿如萍）

《登楼赋》中含有故土之思

晚年的毛泽东很喜欢这篇《登楼赋》，因为其中含有故土之思。并说人老了，更容易怀念这些。但作者写这篇赋的时候，正值30岁，完全谈不上老年，这也许是毛泽东在借以表露自己别人难以知晓的万般情感吧。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作品介绍】

登 楼 赋

王 粲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阗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试　析】

《登楼赋》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粲所作。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鄄县西南）人。出身名门，祖父为汉朝王公，但幼年丧父，13岁时又值董卓之乱，汉末动荡的社会对其影响很大，17岁时避居荆州，历15年无所建树。后曹操大军南下，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曹，以此功受曹操重视，后迁军谋祭酒参与政务。魏国建立以后，被拜为侍中。王粲为文，俊远真挚、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且其创作成就最高。《登楼赋》写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附曹操之前，正值避难荆州，久无建树的时候。王粲才学过人，但长期没有得到刘表的重视。所以，当他暇日登上荆州城楼时，眺望乡国，触景生情，兴起无限感慨，倾吐了一腔的乡关之情、离乱之思、怀才不遇之愤。这篇赋情景交融，基调沉郁悲凉，情深意长。结构严整，环环相扣。全文共3段，前段说荆州地区物阜民庶，虽然信美，但非吾土，不足以久留。紧接着转入第二段，叙写思乡之情。最后抒写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衬以眼前萧瑟的暮景，更见其怀才不遇之情苦，幽愤之甚。起言登楼以消忧，结于下楼时愁愤塞胸，前呼后应。

纵观全赋，主要有二层内容，一是因为常年流离失所，在所居之地，好则好已，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登楼所见，对故乡思念更切。一是因为国家内乱不安，自己的雄才难以发挥，憧憬国土统一，自己的才智也将得以发挥。

1975年，毛泽东同志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他在操心国家大事之余，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喜欢的古典诗词歌赋，因为视

力不太好，只好请人来家专门讲解。那年夏天，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讲师芦荻正给毛泽东讲解王粲的《登楼赋》，讲毕毛泽东评点道：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毛泽东点明了这篇赋的主旨，即拥护统一并愿为统一作贡献和对故乡的怀念，关于第一个主题，毛泽东晚年曾说过，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国民党盘踞在台湾，祖国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作为一个伟大的有抱负的政治家，这是他心中难以解开的郁结，当大自然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时候，企盼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愿望会更强烈，通过听《登楼赋》来寄托自己的忧思，是情理之中的。

关于第二个主题，毛泽东在评述时说人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可是写作《登楼赋》的时候，王粲还只有三十岁，完全谈不上老年，这不过是毛泽东同志借文章表露自己的心迹而已。在评点《登楼赋》以后，毛泽东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想起了32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实际上，晚年毛泽东的内心是孤独的，满腹心事，无人诉说，借古人的诗词文赋，或许可以表露一些心变，抒发豪情。

（戴平）

《文赋》有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

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有唯心与唯物两种解释。毛泽东肯定了陆机《文赋》的唯物观点，赞同萧统的批评见解。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评点原文】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摘自余湛邦《鲜花一束》（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47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魏文帝开始的吧？有《典论·论文》。以后有《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摘自毛泽东 1957 年 3 月 8 日
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

【作品介绍】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著作。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陆机的创作，有诗、乐府、赋、文等，在艺术方面也多有建树。史作有《晋记》、《吴书》、《洛阳记》、《要览》等，今均亡佚。他所写的章草《平复帖》至今尚流传，是书法中的珍品。陆机还有画论，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陆机的文学创作，代表了晋武帝太康时代文学的主要倾向，人称“太康之美”。

在陆机所有的诗、赋、文中，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就是用赋体形式写的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地论述文学创作过程的重要著作——《文赋》。

《文赋》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揭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的想象问题，并对构思中艺术形象的形成，做了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述：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陆机在此段中指出艺术形象的形成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展开丰富的、广泛的艺术想象活动。艺术想象活动是一种不脱离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形象思维活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维过程是和现实形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后来刘勰所说的“神与物游”。陆机还告诉我们，这种艺术想象活动具有无限的广阔性和丰富性，“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它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和限制。陆机继承了司马相如的“赋心”说，又为刘勰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陆机指出，艺术想象过程中包含着强烈的感情活动。“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因此，构思过程也是作者的感情逐渐鲜明的过程。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夸饰》篇中说：“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与泣俱。”都是对陆机这一思想的发挥。第二，陆机告诉人们，艺术形象正是在丰富多彩的想象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想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艺术形象就逐渐鲜明地涌现出来。第三，当艺术形象在作家脑海里呈现出来之后，就一定要用物质手段把它表现出来。对于文学来说，就是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落实下来。为了寻找生动而确切的语言文字来表现它，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陆机用钓鱼和射鸟来比喻，形象地体现了这个艰难的创作过程。在构思和运用语言文字方面，陆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广泛地继承

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做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和反对抄袭前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文赋》中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讲创作中的灵感。“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所谓“应感之会”，就是指灵感冲动，而“通塞”，就是说的灵感有没有的问题。由于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的特点，因此，作家必须重视灵感，在灵感来时，抓住时机进行创作，否则，就很难创作出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的好作品来。陆机的这一观点对后人影响非常大。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特别注意在灵感爆发时捕捉形象，他说：“作诗火急追亡逋，绩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他讲文与可画竹时说，当胸中构思成熟时，竹的形象在脑子里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时，就要立刻“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

陆机多少认识到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达，而思想情感则来源于客观事物。他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又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守斯文。”陆机发挥了《乐记》中的“人心感物”说，但不足之处是只讲了自然事物。后来刘勰提出“文变染守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就着重讲社会人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到了钟嵘的《诗品序》则讲得更明了，有了更大的进步。刘勰和钟嵘的观点显然是受了陆机的影响的。

《文赋》讨探了“意”与“辞”的关系。在安排艺术结构，部署意、辞的过程中，应十分重视意的主导作用。他强调要以

意为主，使辞为达意服务。“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个“理”即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在以内容为主的前提下，又注意到形式的相对独立性，要使形式具有美的特点。他以树喻文，内容是主干，但又要有繁茂的枝叶。没有主干，树就立不起来，也就不成其为树了。但是，没有华美的枝叶，也就没有生气，不是一棵活树，而只是枯树干，同样也不像一棵树。因此，他指出作品一定要做到情和貌的统一，表和里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种观点，随处可见，如“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等。

陆机在《文赋》中还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风格和体裁。他认为文学的体式、体裁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客观事物本身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文学创作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充分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因此，它的风格和体裁为适应客观事物的状况，也必须多样化。陆机对文体的论说，比起曹丕来又有所扩大，把所谓的八类四科，扩大为十类，并分别述说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创作要求，表现得更为细致，因而也显得更为恰当。

在陆机对十种文体特征的论述中，特别应重视的是他对诗、赋的分析。曹丕曾用“诗赋欲丽”来概括诗、赋两体的体点，而陆机则用“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加以分别解说，这样诗歌体裁的抒情特点，辞赋体裁的铺叙特点，就都准确地被说明了，比起含混地用“欲丽”来说明两者，要确当得多。应注意的是，陆机关于诗赋的“缘情”、“体物”的论述，我们不能割裂开来认识，应把它看作是一种互文见义。事实上，赋也是要“缘情”的，诗也是要“体物”的，只不过在当时的创作中，诗歌“缘情”更突出一些，辞赋“体物”更突出

一些。所谓“体物”，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描写，它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文学的形象特征。所以，陆机对诗赋的“缘情”、“体物”的特征的论述，已触及到了文学艺术的两个根本性特点：形象和感情。

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文学理论的一大进步。“言志”也讲诗歌要讲“情”，但这种“情”必须是《诗大序》中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情必须要经过儒家伦理道德的净化，这是对感情内容的一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束缚。陆机提出的诗“缘情”，就是要使诗歌摆脱儒家礼义的桎梏。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声律对于文章的关系意见。认识到了文章的音韵美。他认为文章的声音是变化无常的，要想合于格律是困难的。假如能掌握变化的规律，做好字句的安排，就像放流水以注渊泉，是很容易的。如果不依次序排列，往往会颠倒上下，造成差错。所以音声倘不搭配好，就会象玄黄失调，锦绣的颜色也就不鲜艳了。陆机尽管没有意识到平仄问题，但后来平仄问题的提出，确实是受了“音节之迭代”启发的。

陆机的《文赋》，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创作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想象、灵感、文体、情感、声律、文学的继承和革新、文章的布局和构思及剪裁等等，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篇独一无二的关于创作问题的专论，只有极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可以说都受到了《文赋》的启发。挚虞的

《文章流别论》就是进一步发挥了陆机论文体部分而产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内容。齐梁之际的声律派的基本美学思想也导源于陆机。因此，对陆机的《文赋》的历史价值应给予充分的评价。

【试　析】

毛泽东的读书范围是非常广博的，不仅读了大量的历史、哲学、文学著作，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深有研究。陆机的《文赋》就是他仔细读过的一篇古代文论。

1958年9月，张治中将军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当他们到安徽时，一天，毛泽东对张治中谈起了陆机、陆云兄弟。他说："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1959年，毛泽东又提到了《文赋》并做了批示。事情是这样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在278期有一篇题为《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的文章。该文认为"《文赋》讲的主要是结构修辞的作文方法，甚至于是汉赋的铺张方法。"因此，陆机"是六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开先人。"晏震亚则持反对意见，他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293期（1959年12月27日）发表《如何评价〈文赋〉》一文，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较充分的肯定。晏文认为，《文赋》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尤其包括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等等。"毛泽东读后，将此文

批示给一些同志阅读，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很明显，晏文的结论与毛泽东对《文赋》的看法是相吻合的。那么，《文赋》在哪些地方“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呢？

陆机认为，任何一个作家创作冲动的发生，归之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情感因自然景物和四时变迁而受到触发，二是在阅读前人和当时人作品时产生感慨。《文赋》开头一段说：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凌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民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这就明确把玄览感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触发点。但尤需我们注意的是，陆机对“物”这个概念的认识是深邃的，全面的。

在陆机的观念中，“物”分为两种：一是形外之物，即客观的自然景物，这是作家认识和反映的对象。另一种是形内之物，这个“物”象可以持存在作家的意识中，是客观物的主观反映，它渗透了作家思想感情。因为作家毕竟生活于社会之中，其胸中的种种郁结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个人的遭际。陆机之意，显然是说自然景物、四时变化是一种诱因，经常能触发作家胸中块垒而已。

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作家容易因春气而感到赏心悦目，因秋气而感到忧伤凄凉。而当主观情感强烈时，便移情于物，触物而增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明证。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引起作家创作冲动，而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后一种情况尤多。《文赋》的这个观点，反映了创作的实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文赋》对作家构思时思维活动的特点作了详细论述。他使用了“意”这个概念。“意”相当于现代文学理论的“艺术构思”，综的基本特征是能动地反映外在物，又能通过“文”的手段而被表现出来，供读者观照。“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就是说构思对思维活动（意）极其活跃，驰骋于极为宽广的空间与时间之内，唯其如此，写成的作品方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现丰富而广阔的社会内容。

除此外，陆机对文章体貌、风格的多样性也有充分认识。他认为，作者所欲表现的事物（客观事物）是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故文章体貌也就千差万别。再就是由于作者个性、审美爱好不同，文体的不同，造成作品风貌各异。另外，他在论及文学的社会作用时，把它看得极为重要，其中包括“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那样的政治教化作用，还包括能使作者得到高度的愉悦，或宣泄巨大的悲痛，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获得某种解脱等作用。这几个方面，正是晏殊亚文章论述的主要观点，毛泽东也表示了赞同。

在此之前，毛泽东于 1957 年 3 月 8 日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有一番简要论述，虽然不如读《文赋》那样仔细，没有提出他具体的评价，但显然他也阅读过。（见前面引文）。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并非从魏文帝（曹丕，公元 187—226）开始的。在曹丕之前，就有一些文学批评论文，如《诗大序》、班固《离骚序》和《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但这些批评，或就一部书、一篇文章立论，或就一种文体立论，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论及众多作家和多种文体，

还论述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章的社会作用和地位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系列问题。首先这种综合评论风气的是曹丕，故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从魏文帝开始的”，这一论断，则极为精辟。

按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可谓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后无来者。但毛泽东未作评论，我们也只好付阙。

萧统的《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它虽不是文学批评理论专书，但在“序”里却提出了一些批评理论，例如，叙述了“文”的起源和发展，简略地论述了诸种文体等。而重点阐明的是《文选》选录的标准。即“事出于沉思，而义归乎翰藻”，这正是“文”之所以为“文”的特点。故《文选》选录的范围是单篇的文章，成部的经、史、子著作，均不割裂以入选。很显然，萧统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经藉子史，就在于“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特征，就是“沉思”、“翰藻”。按萧统的本义，“沉思”指的是精心结撰，精心锤炼文辞，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翰藻”指文辞美丽，包括讲究选词、用典、用比以至对偶、声律等方面，也就是“辞采”、“文华”。关于这两句的解释，学术界意见是不一致的。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先生认为这两句可直译为“写作的活动和写成的文章是从精心结构产生出来的；同时，文章的思想内容终于要通过确切如实的语言加工来体现的。”而朱自清先生则认为这两句不外乎“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

实质上，我们可把这句话理解为描写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须有真实的意义（内容）可寻，而这意义的表现，又必须通过深沉的形象的艺术构思，以见出语言词藻之美，而绝不同

于一般的哲学、历史文章和其它应用文字直书即可。所以，毛泽东说《文选》里也有批评，它既讲思想性，也讲艺术性。

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著作中，他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二者是不可偏废的。他根据文艺史上出现过的无数事实，科学地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艺术标准。因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应当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不仅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文艺批评指出了着眼点和归宿。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并把两个标准结合起来，从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观点去评价作品，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虽然是在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但在目前新时期也具有同样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霍现俊）

《昭明文选》好文宜读

在中国古代诗文集中，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便是《昭明文选》，其中许多篇章，他都能背诵。在他的谈话和著作中，引用《文选》的名句很多。毛泽东是公认的二十世纪语言文学大师，这与他熟读《文选》，借鉴吸收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有相当的关系。

【毛泽东评点原文】

好文宜读

——毛泽东在李善注释本《昭明文选》封面上的批语

【作品介绍】

《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选的一部诗文总集，共三十卷。选录了从先秦至梁初八百年间的130余位作家的作品752篇（计诗歌434篇，辞赋99篇，杂文219篇）。共分39类。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旧时被列为“总集”之祖。因萧统为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死后谥“昭明”，故《文选》又叫做《昭明文选》。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卒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他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冬被立为皇太子。

其作品，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五卷，系明辽府刊本，今收入《四部丛刊》集部中。另严可均《全梁文》有昭明太子集一卷。他编纂的《文选》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文选》把入选的700多篇详细地分成三十九类，而且第一类“赋”又细分为京都赋、郊祭赋、耕籍赋、畋猎赋、纪行赋、游览赋、宫殿赋、江海赋、物色赋、鸟兽赋、志赋、哀伤赋、论文赋、音乐赋、情赋等子目十五个。第二类“诗类”又细分为补云诗、述德诗、劝励诗、献诗、公宴诗、祖饯诗、咏史诗、百一诗、游仙诗、招隐诗、游览诗、咏怀诗、哀伤诗、赠答诗、行旅诗、军戎诗、郊庙诗、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子目二十二个，这种大规模地将文学作品辨体区分，在当时是空前的。

《文选》之所以如此对各种文章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从类

编排，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秦汉以后所谓文章之学逐渐与学术性著作（经、史、子）脱离的产物。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而且当时学者都成一家言，所谓历史散文，固都是整部著作，即使是诸子论学著作，也是把某人以至某一学派的论著，编在一起成为专著，很少有单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开始有了变化。许多文士则以所谓“文章显”，因此单篇文章渐多，而好多人也以此名士。如从范晔《后汉书·文苑传》所著录，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傅毅“著诗、赋、铭、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等。到魏晋时期，文人多已有诗文专集，据《晋书》和《隋书经籍志》所载，西晋、东晋两代，文人的专集已不下一二百种。这种作家辈出，作品众多的局面，促使了产生汇辑诗文总集的需要；而文体种类的繁多，又必然促使在编辑总集时，要对现存的文体进行整理、辨析和归纳。萧统的《文选》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文选》对所选作品的分类除上述提到的赋类和诗类外，还有骚类、七类、诏类、册类、令类、教类、策类、表类、上书类、启类、弹事类、奏记类、书类、移书类、檄类、难类、对问类、议论类、辞类、序类、颂类、赞类、符命类、史论类、史述赞美、论类、连珠类、箴类、铭类、诔类、哀文类、碑文类、墓志类、行状类、吊文类和祭文类。这在当时是一件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面，《文选》对文体的详细分类是和萧统的文学思想有关的。换句话说，萧统的文学思想决定了《文选》的编选标准。

萧统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是主张文质并重

的，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家生，暄风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文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可见他对文学作品内容要求是多方面。另外，在《答晋安王书》中也谈到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及教育作用：

说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方诚至，无劳求。

萧统的上述见解和刘勰、钟嵘的主张并无二致。但是，他对文学范围的看法，却和刘勰等人不大相同。他认为心目中的文学作品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谓"事出于沉思"，就是引用典故和古人言论经过仔细的推敲，而"义归乎翰藻"，就是指辞采精巧华丽。因此，萧统在选录一些应用文学和杂文时，选录的六朝骈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先秦、汉魏人的同类作品。在诗歌方面，选取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也多于陶渊明。显然，在选录作品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他的后一种看法——"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占了主导地位。

尽管萧统的选录标准有不尽完美之处，然而他注意到文学和非文学的界线，把"经书"、"子书"和历史著作划为非文学的范畴，不采入《文选》，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不敢加以删选；"子书"只是说明哲学观点，并

不以文章为目的；而历史著作又是以记事为务，“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和文学作品不是一回事。

萧统在具体选录作品时，的确选入了许多作家的具有代表性作品，而且都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至今，这些入选作家的作品还广为传诵。像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曹植、王粲、刘桢、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沈约等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入选的名篇如李密的《陈情表》，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庾信的《枯树赋》、李康的《运命论》等等，历来皆是传诵的名篇。

在《文选》中，萧统选录了陶渊明的诗和《归去来兮》。他对陶渊明的评价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谈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若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从无财无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熟能如此看守?”陶渊明是东晋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描写了淳朴的农村生活，寄托诗人的社会理想，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意义，表现了诗人的思想愿望、生活态度和高洁品格。他的诗，语言清新、质朴自然。个性鲜明，具有独特的风格，洗脱了当时华丽词藻的文风。同时，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完全溶成一体。但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没有提到陶渊明，钟嵘的《诗品》亦仅把陶渊明列为下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萧统却对陶渊明给予“独超众类”、“莫之与京”的高度评价，说明萧统是非常有眼光的。从《文选》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内容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都一概不选，足以证明萧统对入选

的文章是采取非常谨慎态度的。比起徐陵的《玉台新咏》大量采录艳丽绮靡的东西，萧统能摈弃个人和社会当时的生活圈子，鄙弃盛行当时的齐梁文风，足以让后人刮目相看。

《文选》从性质上说，还属一部总集，并不是论文体的专著，但他对后世的文体论，特别是文体分类学，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选》在文体分类上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对当时流传着的众多文章，作了体类上的区分，使之均有类可系。其次，萧统在序文中对文体的源流、发展也作了某些论述。

《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以后的文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熟精文选理。"教育其儿子好好学习《文选》，宋人谚语也说："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文选》经唐代李善加注后，就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掀起了研究《文选》和对《文选》注释的高潮，后人称之为"选学"。

现在《文选》的最早的注本是唐代显庆年间李善的注。李善的注，包括本事、典故和训诂，引用了许多材料，其学术价值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唐代开元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为《文选》作注，侧重于疏通字句，世称"五臣注"。后来，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本结合刻在一起，称"六臣注"。

《文选》的版本很多，以清代胡克家重刻宋刊本李善注《文选》（附《考异》10卷）和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为最善。

1977年，中华书局将胡刻本李善注《文选》缩小影印出版，附《文选考异》十卷，16开本，全三册。该本有两个显

著的优点：一是它把见于《文选考异》的文字用“△”号标出，便于读者读正文时随时参阅附于卷末的《考异》；二是它把尤袤刻本与胡克家刻本较重要的异文校出，列表附于书末，便于读者比较两本的异同。

【试　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除《韩昌黎诗文全集》外，古代诗文集中读得最熟的便是《昭明文选》了。他对《文选》所收的一些纯粹写景言情的辞赋散文十分感兴趣，许多篇章，他都能够熟练地背诵。1917 年，他游览了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曾给罗章龙写过一信，大略是记述他对景观名胜的所见所闻，这篇“游记”的文风与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二（李善注本，下同）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

自建国始至 70 年代，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有时外出视察工作，也必带此书。从他批注过的《文选》版本来看，至少有三种。而且，他还在其中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写下“好文宜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并对其中的诗、赋部分，做了很多记号。他特别喜读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和庾信的《枯树赋》，并用大字排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到了他的晚年，即使重病在身，也常读不辍，兴奋时还背诵上几段。

由于《昭明文选》所收基本上是纯文学范围，故毛泽东阅读和运用《文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引用或改写《文选》

中的名句以增强文章的形象生动效果；引伸、借喻说明自己的独特个性或某种道理；印证自己的观点或某时的心情；借旧形式，创造性地表达新内容。下面分别论述之。

南朝梁代文学家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诚（在今河南）人，早年即以文章著名，晚年才思减退，世谓“江郎才尽”。其诗作幽丽精工，其《恨赋》、《别赋》最著名，但都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别赋》在艺术上比《恨赋》更为成熟，它最突出的长处是借环境的描写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毛泽东颇为欣赏这篇赋，1939 年 7 月 9 日，他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中，说江淹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尽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别赋》收在《昭明文选》第十六。）经毛泽东这么一改，一洗古代多情善感的文人那种离愁别绪，转为快乐地送别同志们从后方赴前方去工作，其意境更高。“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别赋》开首的两句，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引用过。

《昭明文选》卷三十七收有李密的《陈情表》一篇，这是李密为固辞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的托词。李密幼丧父，母何氏改嫁，赖祖母刘氏抚养成人，后事祖母尽孝。《陈情表》词意恳切，感情真挚，极富感染力。其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历来被传为名句。1949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形象地写出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得人心的尴尬处境，“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有时候，毛泽东引用《文选》中的名句，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或者是用来自喻。如三国时魏国李康有一篇《运命论》，该文收在《昭明文选》卷五十三。其中有这么几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毛泽东时常引用这几句话，看来他是比较欣赏的。1974 年 10 月，已靠边站的邓小平，在他的建议下又恢复职位，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恢复国民经济，遏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付出了巨大努力。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在 1975 年夏的一次谈话中，毛明确表示：没有多大问题，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毛泽东便引用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用意是很明显的。1975 年 6 月 7 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道：“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林彪骂我是秦始皇、B——52。”随即他又引用了《运命论》的话解释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别人骂不好。”毛泽东作这样的解释，很能反映他的个性。

谢庄（421—466）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长于词赋。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毛泽东很欣赏这篇赋，1960 年 5 月 2 日，他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与舒同讨论先秦齐国的历史和曹植被贬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他随口背起了谢庄的《月赋》来印证他的观点，并评论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六朝齐梁时的庾信（513－581）辞赋也很有名，其后期作

品的成就尤高，故杜甫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辞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大赋以《哀江南赋》最有名，抒情小赋则以《枯树赋》、《小国赋》为代表。《枯树赋》借古人殷仲文、桓温之口，借题发挥了国破家亡之痛的血泪深情，是他自己身世的写照。毛泽东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1951 年，他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中壮烈牺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毛泽东吟诵庾信的《枯树赋》来表达他丧子的沉痛心情。

《昭明文选》编入了不少骈文，但有些骈文过分繁冗。鉴于此，清代的许槤于道光年间选了一本《六朝文絜》，共收骈文作品 72 篇，作者 36 人，共四卷。他选文的标准是"析词尚简"，故所选皆篇幅短小文辞精粹，多抒情写景之作。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要过这部书来读。

在谈到庾信的作品时，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1949 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其中符定一先生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字语言学家。从 1910 年起，符先生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30 年如一日，终于 1940 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400 余万字。符先生不仅学问大，而且思想进步、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思想感情与毛泽东很接近，故受到毛泽东的尊敬。或许是符先生学问太大了，他总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认得几个字?"大概毛泽东也知道。当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顺口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接着风趣地问道："他（指庾信，笔者按）总能认几个字吧?"

毛泽东不仅乐于读《昭明文选》、《六朝文絜》，而且，在他的著作中，还利用骈文这种形式美的旧文体，创造性表达了新时代的内容，读来琅琅上口。譬如1935年12月5日，他在致杨虎城将军的信中，就使用了骈文这种形式：

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由此可见毛泽东学古而不泥古，基于旧形式，创造新内容的功底。（霍现俊）

《与陈伯之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

《与陈伯之书》是南朝梁代丘迟给陈伯之的劝降书，陈伯之收到此书不久，即率八千人归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将此书推荐给黄克诚、周小舟，说“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泽东是纯粹地让他们欣赏一篇文学作品，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送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

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怫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1959年8月1日致周小舟信（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2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简介】

与陈伯之书

丘　迟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人，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

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子，张绣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失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而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孙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矢贡来庭。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蠕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搤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居其详之。丘迟顿首。

【试　析】

《与陈伯之书》是南朝梁代丘迟给陈伯之的一封信。丘迟(463－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少有文才，8岁便能写文章，时人称奇。在齐时任殿中郎，后在梁朝做官，甚被礼遇，历任骠骑主簿、中书郎、永嘉太守等职。梁武帝天监四年（505），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讨伐北魏，丘迟在军中任咨议参军。北伐后，还拜中书侍郎，迁司空从事中郎，故后人称丘迟为丘司空、丘中郎。

陈伯之，齐末江苏刺史。曾抵抗梁武帝萧衍，以后降梁。梁天监元年，投降北魏，为平南将军。梁天监四年（505），中军临川王萧宏引兵北伐，陈伯之率兵抵御，萧宏命丘迟以个人名义向陈伯之写信劝降。于是，便有了这篇《与陈伯之书》。天监五年（506）三月，陈伯之得书后，乃于寿阳领兵八千归降。

这篇文章历来为人称道。唐李延寿作《南史》，认为陈伯之在北魏，力阻临川王萧宏领兵北征，只因丘迟写了这封信，才使陈幡然归降。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这封信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丘迟非常了解陈伯之身在魏营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出身汉族的南朝士人投奔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北魏王朝，这在当时意味着违背儒家的礼教传统，是严重的失节行为。这种观念，早在汉代就根深蒂固了。丘迟在信中，虽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对陈伯之的揭露和谴责，说明他看重人的节操，坚

决反对丧失气节的行为。因之，他对陈伯之的揭露与谴责也就显得十分的尖锐和严厉，甚至流露出极大的蔑视。作者在指责陈伯之投降的“劣节”后，还着重从利害关系上，向他指明归降之利，拒降之害。指出归降可以“往哲是与”、“先典攸高”，功名传之子孙，拒降则身处异域，有如“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这些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是，光晓之以理还不够，还要动之以情。作者以故乡之美景，故国之情思和古代廉颇投魏思复赵将、吴起离西河而泣的史实，使之产生情感的震荡。像信中所说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年生之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这些情景交融的文字，确实是感人至深。

因此，这既是一纸出色的招降书信，也是齐梁骈体文中一篇难得的情信辞巧的佳作。所以毛泽东说，“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充分地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

毛泽东向周小舟、黄克诚推荐阅读《与陈伯之书》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发表了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被认为是犯了错误，当时受到了党内的批判。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推荐《与陈伯之书》，恐怕不单是要他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还希望周小舟等犯了“错误”的同志“迷途知反，往哲是与”吧，这也是毛泽东作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独特方式。

《登池上楼》通篇矛盾

通篇矛盾的《登池上楼》一诗为南北朝诗人谢灵运所作，毛泽东评点这首著名的诗篇，并没有就诗论诗，而是从中挖掘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以达知人论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读诗评诗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评点原文】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读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

语集》第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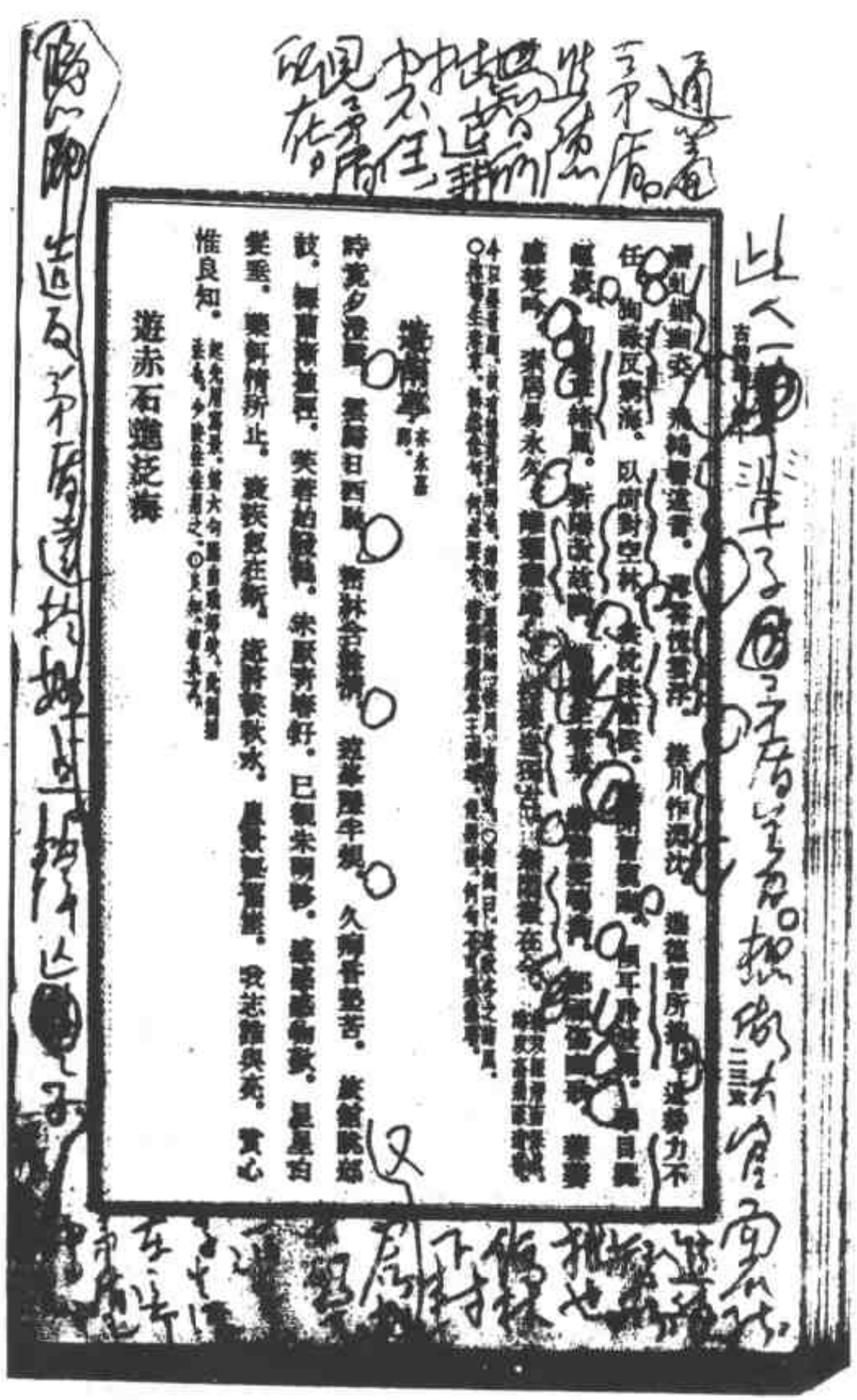
《登池上楼》

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试　析】

谢灵运（385—433），南北朝时代诗人。陈郡夏阳（今河



毛泽东读《登池上楼》写的批语

南太康）人。袭封康乐公，因其“性豪侈，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世称谢康乐。曾任永嘉太守、待中、临川内史等职。谢灵运一生崇尚奢侈，纵情山水，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在政治上，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始终不被重用，遂不问政事，纵情山水之间，寻幽探奇，恣意遨游。后以谋反罪流放广州，被杀，年49岁。作品主要是山水诗，注意诗的形式美，诗的语言多姿多采，对山水景物观察细致，捕捉人微，加之有琢句锤炼之功，常于精巧、富丽中，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给人以自然可爱之感，堪称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对中国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起过较大作用。

毛泽东喜读谢灵运的诗，也很关心谢灵运的个人命运。他曾仔细阅读并圈点《南史·谢灵运列传》中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本《古诗源》，此书由清朝沈德潜编选。选收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并有评释。编者认为诗至唐代为极盛，唐以前诗是唐以来诗歌之源，故名《古诗源》。《古诗源》收谢灵运诗24首，毛泽东作了圈划的就有22首。对谢灵运那些刻划自然风物的清丽诗句，如《邻里相送至方山》中的“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过始宁墅》中的“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等等，毛泽东都在句旁划着直线、曲线或曲线加直线，在句下还连划两三个圈。编者注释中，评论谢灵运诗歌“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以及“别绪低徊”，“触景自得”等处，毛泽东都划着曲线和圈。另外，毛泽东在《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对收入的谢灵运的诗也作过不少的圈划。《登池上楼》一诗是谢灵运由京城建康外放任永嘉太守时

所作。诗中描写作者贬官永嘉、久病初起登楼所见所感，抒泻了仕途不得志的感伤情怀。全诗层次之间联系紧密，由托物兴词、感怀喻志、借景遣怀到决意隐居，转换自然，浑然一体，并且沟通、融化了玄言和山水，寓理于情，寄情于景，“于汉、魏外别辟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黄子云《野鸿诗的》），尤其是对春色的描写，画面鲜丽清新，再加上有“池塘”一联为全诗增色，因而更加引人入胜。

在一本1957年出版的《古诗源》中，毛泽东对谢灵运的这首诗，几乎逐句句末都画着圈或双圈，句旁画满着重线和曲线。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句末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行间写了上面引的批注，不光对谢灵运的这首诗，而且对他的品德和政治态度做了精辟的评点。毛泽东通过“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这两句诗，结合诗人的身世经历，深刻地剖析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实质，指出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而且这一矛盾支配了诗人的一生，最后导致诗人的自我毁灭。

毛泽东在批注中称之为造反的檄文的“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一诗，是谢灵运兴兵叛逆时写的一首诗。他以张良和鲁仲连自喻，其实质，还是毛泽东批注中说的“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的“矛盾达于极点”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评点《登池上楼》，并不是单纯地就诗论诗，而善于从作品中挖掘作者内心的矛盾，以达知人论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读诗评诗的一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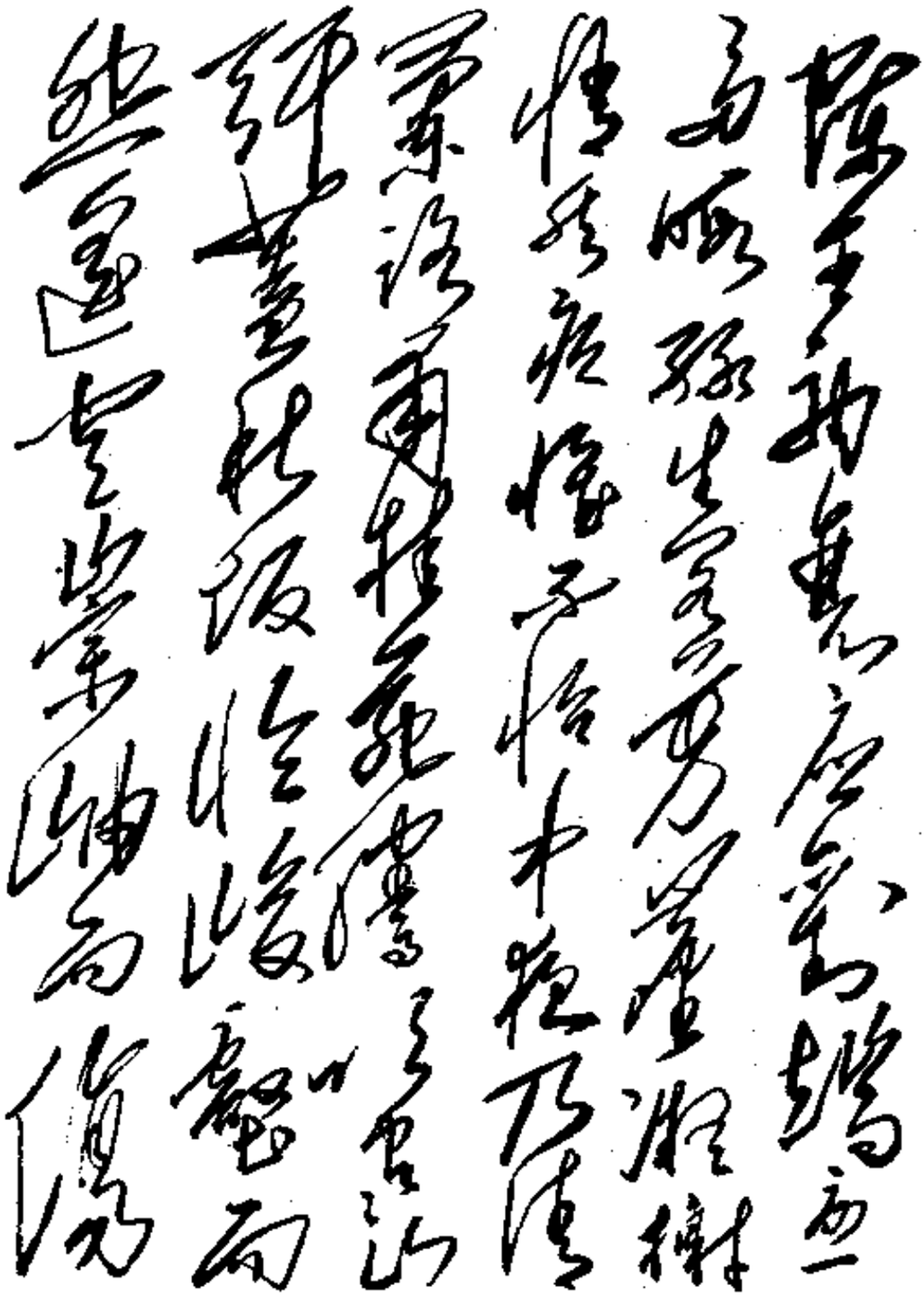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月赋》最著名

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同舒同讨论齐国的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之事，还随口背诵起谢庄的《月赋》，而后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毛泽东评点原文】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摘自费振刚、董学文主编《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文赋卷）第58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手书《月赋》

月　赋

谢　庄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疢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临清壑而怨遥，登崇岫而伤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称曰：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昧道懵学，孤奉明恩。

臣闻沉潜既义，高明既经，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腆朏警阙，胎魄示冲。顺辰通烛，从星泽风。增华台室，扬采轩宫。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瀨；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秉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君王乃厌晨欢，乐宵宴；收妙舞，弛清县；去烛房，即月殿；芳酒登，鸣琴荐。

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亲懿莫从，羁孤递进。聆皋禽之夕闻，听朔管之秋引。于是丝桐练响，音容选和。徘徊《房露》，惆怅《阳阿》。声林虚籁，沦池灭波。情纡轸其何托？怨皓月而长歌。

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歌？川路长兮不可越。"

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

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徽霜沾人衣！"

陈王曰："善。"乃命执事，献寿羞璧。"敬佩玉音，复之无斁。"

【试　析】

《月亮赋》的作者谢庄（421—466），字希逸，南北朝宋代阳夏人（今河南太康）。官至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善诗文，明人辑有《谢光禄集》。据《宋书》说他七岁作文，可惜只活了四十多岁。留下的作品不多，大多系吟风弄月之作，就作品意义来说并不大，但就其风格来看，清新美丽，有创建。《月亮赋》是他的一篇代表作。

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同舒同一起讨论齐国的历史曹植封东阿王、陈王之事，便随口背诵起谢庄的《月赋》，而后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毛泽东在谈论东阿王、陈王时想起月亮赋，大概是由于该赋中作者假设了一个陈王曹植月夜邀仲宣（王粲）作文的故事。

毛泽东赞扬这篇赋可能与它的写法有关。《月赋》的构思奇特，作者设想曹植与王粲月夜游吟，笔法细腻柔和，将叙事

与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表达了一种“离别”、“迟暮”的忧伤之情。方伯荣曾细致地分析了这篇赋的二个艺术特色。一、假设故事，清新洒脱；二、写景状物，细腻柔和。

文章一开头，作者假设了一个故事，陈王曹植月夜邀仲宣（王粲）作文，颇能吸引读者。月夜，凄凉，曹植因失去朋友而忧愁，无心游玩。半夜起来，忧怨满怀，面对着秋末明月夜景，低吟明月诗篇，请王粲作文。

这样的开头，别开生面，设置悬念，把读者领进月夜凄愁的环境之中。忧郁的人物，月夜的景色、多象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陈王因失却两位好友而心情忧郁；因心情不乐才半夜起来；因半夜起来才看到月色；因月色而引出吟诵明月诗篇；吟月不足而令王粲赋月。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清新洒脱，引人入胜。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王粲论月。他不仅谈了月亮给人光辉，给人启示，给人美感；同时还谈了月亮给人悲伤，迟暮之情。

第一，月能“增华台室，扬采轩宫”。作者先从日月对举中引出写月，自然得体，日落月出，这是规律。接着集中笔力写月：月中的玉兔与嫦娥；月亮的亏盈给人的警戒与启示；月亮与某些星宿相遇形成风雨；月亮的传说，“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总之，月亮能使楼台亭室增添光辉，使轩榭宫廷发出光彩。

王粲把月亮与国家事业结合起来，把写景与议论结合起来，把传说与状物结合起来，手法巧妙，启人深思。

第二，月夜美丽的秋景。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月夜柔和、静美、恬淡、素雅、舒适的情景。雨过天晴，秋夜空明，菊花飘香，秋雁哀鸣，一派秋光。用群星、银河失色来衬

托月亮之光明；用大地如蒙上一层雪、天空如同明镜作比喻突出月之明亮。一排排楼宇在月光下似白绢一样洁白，四周台阶被月亮照得象冰一样明净。君王在月夜欢宴。语言清丽，洒脱流畅。

第三，秋夜凄凉、羁孤之悲。秋夜月色凄凉，风吹竹林响，不见亲人，只见漂流异地的人，加上夜间鹤鸣，北地少数民族的乐曲，令人频添悲伤。面对秋月，无处倾吐哀愁。唱出了“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歌？川路长兮不可越”。以及“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的无可奈何的悲歌。

别离，伤感，迟暮，忧思，使月夜凄凉之情倍增。

全文围绕“月”，写得从容不迫，柔和细腻，风格清新。曹植只在文中首尾出现，是个线索人物，构思精妙，饶有情趣。

《秋日楚州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光昌流丽

对这篇几百字的文章，毛泽东写下了1000多字的批语。从对文章本身及作者王勃的评点，到最终将视野投向世界是青年的、创造世界的是劳动人民的天地，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永远是相通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



毛泽东读《秋日楚州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

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作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

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王　勃

上元二载，高溯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

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蜻潼；风壤所交，荆门洎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察尽鹓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陟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檻左峙，俯映元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苹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舣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素交为重，觉老幼之同归；朱绂傥来，岂荣枯之足道。且欣风物，共悦濠梁。齐天地于一指，混飞沉于一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言，俱成四韵云尔。

【试　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是写在清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里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旁边，约1000多字。毛泽东还在该文的标题前划了一个大圈，以示重视。这条批注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从内容看，大约写于1958、1959年。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祖父王通为隋末学者，叔祖王绩是唐初诗人。王勃6岁能

文，才思敏捷。14岁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触怒唐太宗，斥逐王府。后“远游江汉，登降岷峨”，客居蜀中。后任虢州参军。据《新唐书·文艺传》载，王勃在任虢州参军时，“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高宗上元三年（676），王勃渡海省亲，溺水惊悸而死，时年28岁。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时与诗文著称，被称为“初唐四杰”。

毛泽东读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王勃传》。《新唐书·王勃传》中写到：“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的这则批注，可分三部分，第一为考证；第二为评价；第三为议论。

毛泽东先考证了《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和《滕王阁诗序》的写作时间和年龄。毛泽东认为“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是不准确的，毛泽东通过多方面的查证认为王勃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岁。这段考证文字是毛泽东读作品时兴之所至写的批注，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和平时博读的功底。一路叙述，对王勃的行年踪迹和创作历程作了基本概括，精细严谨，一丝不苟，透露出一种近乎职业的研究精神。

第二部分是对王勃其人与文章的评价。王勃才华出众，有建功立业的壮志，却屡受打击和排斥。这使得他能够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受到磨炼，在作品中反映一种积极

进取的精神。在内容上，能自觉地“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扩大了诗歌题材，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形式上致力于改变齐、梁以来浮华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反对宫庭诗人上官仪等人歌功颂德的浮词丽藻，崇尚清新流畅、朴实自然的文风，对唐朝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毛泽东引杜甫赞扬王勃等人的诗：“王扬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赞扬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另外毛泽东还联系作者的命运遭际，认为除了“光昌流丽”之外，由于王勃一生倒霉，到处受惩，他的文章还有“牢骚满腹”的一面，这确是知人之谈。毛泽东特别指出了王勃虽“为文尚骈”，但写的是“新骈、活骈”，与六朝之“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其差别所在，既在于文风（“光昌流丽”），又在于内容（“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第三部分是毛泽东由感叹王勃等人年少有为而生的议论。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原因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这一番议论既是他一时即兴发挥，实际上也是他的一贯想法，即大胆地使用年轻人，相信年轻人。毛泽东说这种想法在1958年党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主要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

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毛泽东说：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时候，秦国有个甘罗，是甘茂的孙子，他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七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做：《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秦汉史专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刘邦的年龄比较大。项羽二十四岁起兵，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年轻的时候，现在舞台上唱《霸王别姬》的扮相不对，应当叫他扮小生。五年为诸侯长，二十八岁时自立西楚霸王，死时才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

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被压迫民族的人。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一个是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还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当时违反“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过，她把老夫子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南北朝时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河南临颍人，顶多不过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她和父亲被围在襄阳的时候，带领了几十个人杀出重围去搬救兵，你看她有多大的本领！

唐朝诗人李贺，河南宜阳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时只有十八岁，做皇帝时只有二十六岁。李世民、李贺都是贵族。

罗士信（罗成）也是山东人，也是十八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青年人，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

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列宁也是三十一岁（1903年）创造布尔什维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这里还有我的老乡黄盖，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三国末年有个王弼，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做《庄子》和《易经》的注释。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就很了不起，他是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也不怕的，他的本领可也不小呀！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个少年将军，他很会打仗。兰陵王是北齐人。高欢的孙子，名高涛灌。他很勇敢，有一个专门歌颂它的曲子，叫《兰陵八阵曲》，据说这个曲子现在日本。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并且切实推行的方针。早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说道："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

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都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毛泽东从一篇文章评到文章的作者，进而引出青年人与老年人的议论，提出要放手任用新人的主张，这种评点恐怕是政治家的毛泽东所独有的。

王勃的另一篇散文《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毛泽东更加喜爱。

《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是王勃用骈体文写成的著名骈文。全文用严谨的对仗，和谐的声律，精炼的语句，和谐的声律，细致优美地描绘了湖光山色，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理，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前人评价王勃文是“篇篇结绿、语语连珠、胸无俭思、腕有余藻”（《铁立文起》）。如拿文章前部写景文字来说，是毫不过分的。韩愈一生中致力反对骈文，但他对王勃的这篇序却极为赞赏，并甘居王勃之后。这说明王勃虽然是用偶句双行的骈体文的形式，但却使本文的内容充实，富于真实的感情，词采又相当的绚丽自然，其严整的格式，叙事

的清新生动，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这些都给骈体文注进了新的活力，成为流传千古的佳篇。毛泽东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后面划着圈，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谈兴正浓时，坐到桌前，悬肘挥毫，为他们书写下这一具有诗情画意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还批注过王勃其它一些诗文。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的天头上，简洁而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在凝聚着真挚友情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下，连划了3个大圈。

毛泽东对《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注，已远远超过了对一篇文章的评价，也超过了对一个人的评价，而将视野投向世界是青年的、创造世界的是劳动人民的境地，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永远是相通的。

《登幽州台歌》情深意长

晚年的毛泽东，时常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读诗。有一次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完陈子昂的这首诗，毛泽东连声夸赞道："孟夫子选得好嘛"，并评述这首诗"情深意长"。此时的毛泽东从诗中到底体会到了什么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这首诗〔《登幽州台歌》〕虽短，可内容是情意深长噢！

——摘自白金华著《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第182页，吉林人民出版

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试　析】

陈子昂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出身于庶族地主，少时轻财重义，使气任侠。18 岁始折节读书，遍览经史百家。后中进士，多次上书论政，颇受武则天的欣赏。曾随军东征，抵制契丹。为官不畏权贵，直言敢谏，力主任用贤才改革吏治，安定民生，招抚流亡，反对淫刑，平息冤狱，遂接连受到排斥打击，仕途几经沉浮。后辞官还乡，晚年被人迫害，冤死于狱中。作诗标举汉魏风骨，反对那种新丽竞繁的齐梁诗风，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打破这种诗风的束缚和影响，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他的诗借古喻今，托物寄情，或感慨时事，或抒发

理想，或指斥时弊。风格质朴明朗，声调苍凉激越，对唐代诗歌颇有影响。

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后派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契丹，陈子昂以右拾遗随军参谋。在兵败情况紧急之际，陈子昂屡次向武献策，武拒不采纳，反而将他降为军曹。诗人受此重击，深感报国的雄图已成泡影。当他登上古老的蓟北楼（即幽州台，遗址在北京市西南），满怀悲愤地唱出了这首撼人心魄的慷慨浩歌。这首独步古今的名诗，时空交错；意境苍凉，表达了诗人心中的万般感慨。

诗人在幽州台上眺望祖国北方辽阔壮丽的山河，神驰于苍茫浩渺的宇宙，又由燕地的远古人物，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不禁将满腔悲痛，倾泻而出。前两句中的“古人”与“来者”，指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以衬托当代君王的昏庸，第三句“念天地之悠悠”，以空间辽阔永恒的描写为背景，烘托出个体生命的孤单寂寞与悲哀无奈。“独怆然而涕下”，表露出诗人心中的巨大悲痛。当然这种悲痛，并不只是对个人遭遇的狭义的哀伤感叹，这里还有着从对个体遭遇的哀伤感叹所升发的对人类命运的深思而悲愁。

毛泽东谈论此诗是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读诗时即兴谈到的。当孟锦云为他读完这首诗后，毛泽东连声称赞：“孟夫子选得好嘛，这首诗虽短，可内容是情深意长噢！”毛泽东以他一生的丰富而激满的阅历，以他登在历史高峰上的境界，理解起这首情深意长的诗来，是否从中体验到一种“伟大的孤独呢！”

马周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公元631年，马周替人向唐太宗写一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毛泽东十分赞赏马周的才德，称他的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奏疏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马周给唐太宗的奏疏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马周给唐太宗奏疏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惟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惟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惟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墙宇门阙方丈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上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诏，以二月幸九成宫。窃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速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

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桀纣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现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闻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皂杂类；韦提、斛斯正无他材，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外廷朝会，骀竖倡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

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

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纣笑桀之亡，而幽、厉笑纣之亡，隋炀帝又笑齐、魏之失国也。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往贞观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也。五六年来，频岁丰

稔，一匹绢易粟十余斛，而百姓咸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何则？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

夫俭以息人，贞观初，陛下已躬为之，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厉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但及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昔贾谊谓汉文帝云"可痛哭及长叹息者"，言：当韩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时，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赖诸王年少，傅相制之，长大之后，必生祸乱。后世皆以谊言为是。臣窃观今诸将功臣，陛下所与定天下，无威略震主如韩、彭者；而诸王年并幼少，纵其长大，陛下之日，必无他心，然则万代之后，不可不虑。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皆由树置失宜，不隆为节制，以至灭亡。人主岂不知其然，溺于私爱尔。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诸王已多，其宠遇过厚者，臣愚虑之，非特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闭同狱囚焉。何则？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宠陈思王，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国，何患不富，而岁别优赐，曾无限极。里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

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现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

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复何为？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试　析】

马周是盛唐时期唐太宗的股肱大臣。他少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嗜学，善《诗》、《春秋》。”他狂傲不羁，自视甚高，但不为世人所重视。后来做了中郎将常何的常客。公元631年，唐太宗召集百官征求意见，马周替常何向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深为唐太宗赏识。后太宗知道此奏折乃马周代笔，便委任他为监察御史、谏议大夫、中书侍郎、中书令、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要职。

在《旧唐书·马周列传》的天头上，毛泽东写道：“马周年四十八。”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马周传》卷后赞语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

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马周有王佐之才，是时唐太宗锐意创建，而马周的意见都切合当时实际，可以称为“以明佐圣”，所以“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是很自然的。赞语以为唐太宗发现和任用马周，与商王武丁访得版筑于傅岩之野的傅说，任以为相，致使殷商中兴，以及周文王遇垂钓渭滨的吕望，号之为太公，后辅佐武王灭商，并没有什么不同。遗憾的是马周才具不及傅说、吕尚，以致后世少有称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评价，他在这段赞语的天头批注：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马周传》中马周上唐太宗的奏疏时，批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这个深受毛泽东赞赏的奏疏的内容及毛泽东的评价据张贻玖介绍是：

第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叹”。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

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第二，建议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仓贮米，东都积布帛，西京金银库，当李密（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充（本为隋朝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是难得的。因此，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第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帝位后，曹植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

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处。贾谊的《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誉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把马周的奏折，上比《治安策》，下比“万言书”，这“一”和“奇”的评价是多么不凡！

享有贞观之治美誉之称的唐太宗执政时期，是唐朝的鼎盛期，但马周却如汉代的贾谊一样，居安思危，于繁华中看出政治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及隐患。他在上唐太宗的奏疏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更可贵的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将个人得失置之不顾，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直言的勇气，这些也许正是毛泽东对这篇奏疏高度赞赏的原因。

《将进酒》好诗

毛泽东特别喜欢李白的诗。称他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将进酒》一诗，笔力豪迈，情怀傲岸，狂歌高唱，全以神运，难怪毛泽东称之为“好诗”。

【毛泽东评点原文】

好诗

——毛泽东读李白《将进酒》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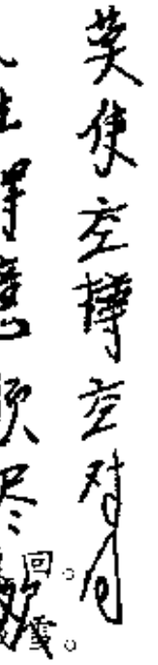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12期）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2期）

【作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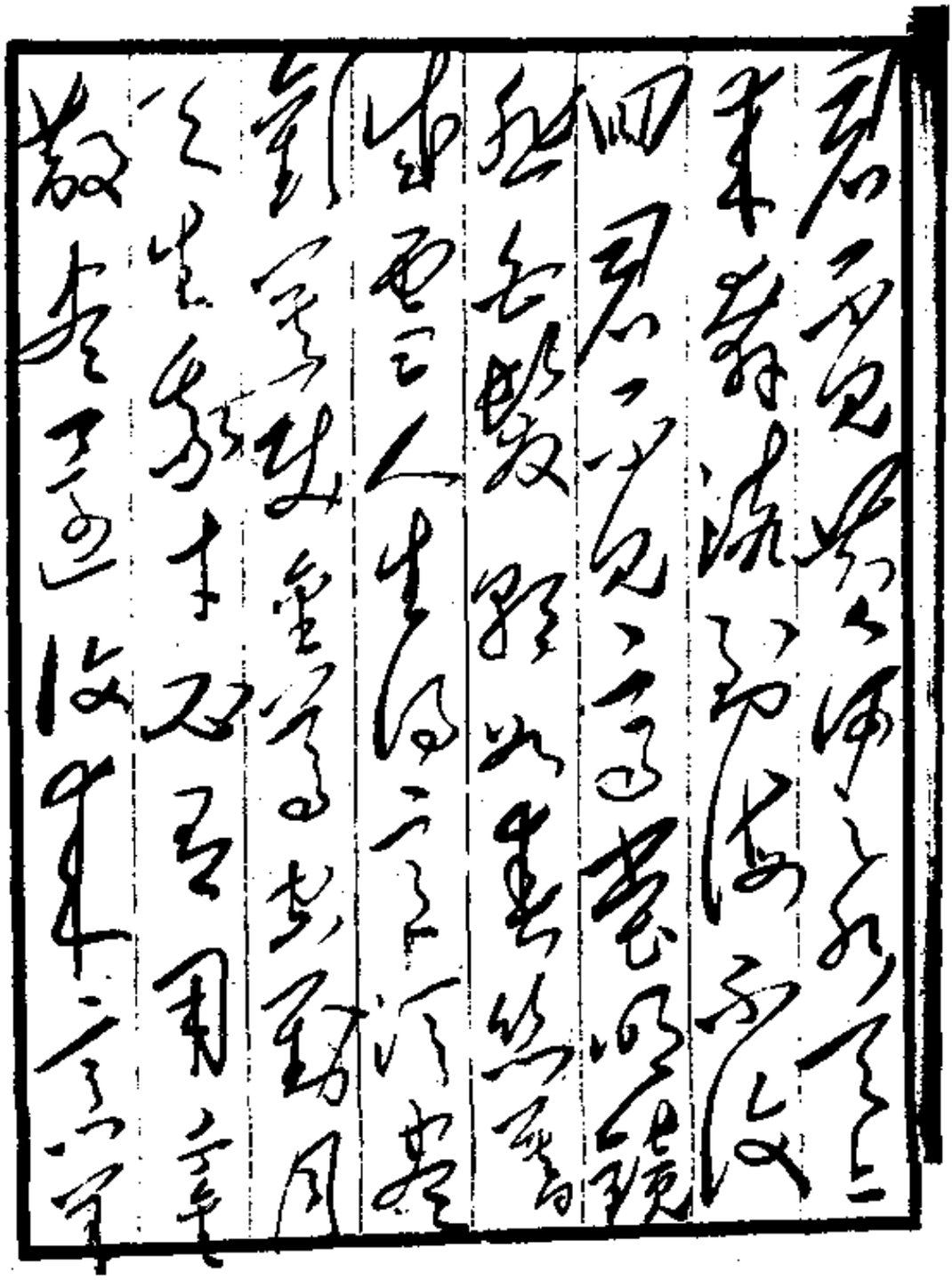
《将进酒》

李　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一五

毛泽东书《将进酒》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閉來垂釣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行路難〔郭茂倩樂府題曰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言蓋陳武帝所制武帝作行路難周所知歌錄云武帝亦通矣唐王昌齡又有變行路難〕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
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
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
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
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

（將進酒）的批話

【试　析】

李白（701——762），唐代伟大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生于碎叶河畔，自幼随父迁居绵州昌明青莲乡（今四川绵阳附近）。少年时代广览博学，行侠好剑，20多岁离蜀漫游，胸怀壮志，诗名远播。天宝初年，得到道士吴筠的推荐，被玄宗诏赴长安，命他供奉翰林，所以又被称做李翰林。终因抱负不得施展，且遭权贵谗毁，于天宝三年春求去，并作第二次漫游。同年，在洛阳与大诗人杜甫相识，结为至交。此后，辗转于河北、东鲁、梁宋等地。安史乱发，曾怀着平乱的志愿，为永王李璘僚。后因图谋割据，兵败被杀，他因牵连坐罪，流放夜郎。途至巫山，遇赦得还。上元二年，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又由当涂（今属安徽）北上，请缨杀敌，至金陵因病折还。翌年，病死于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处。

李白一生坎坷飘泊，涉历甚广，所受思想影响颇为庞杂。喜爱纵横家的作风，又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受道家愤世嫉俗、返于自然的思想影响较深，加之游侠精神，铸成其傲岸不驯的性格。其诗猛烈抨击黑暗现实，藐视权贵，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和丑恶，为人民的苦难大声疾呼；谴责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讴歌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不倦地追求自由，热情地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其间，虽也有“人生无常”、纵酒好仙的消极思想，但总的倾向仍是借以“抒斥幽愤”。想象丰富，感情奔放，意境波澜壮阔，语言明净华美，多有“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关于从民歌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创造性地结合运用神话、幻想和夸张等表现手法，开拓出瑰丽多采用的形象领域，把我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又有“谪仙”、“诗仙”之称。对诗歌体裁，能众体兼备，尤其擅长七古和七绝。所作七绝，在文学史上只有王昌龄可与之媲美。爱好民俗音乐，其《菩萨蛮》词，被称为“百代词典之祖”。《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丁都护歌》、《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梁甫吟》等，均是广为流传的千古绝唱。李白的一些诗作中流露着消极情调，但总而观之，他那丰富多彩、绚烂瑰伟的诗篇是一笔宝贵的艺术遗产。李白是屈原之后最伟大的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突出的地位。

毛泽东爱读李白的诗。1942 年的一天，毛约见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交换文艺工作的意见时，有人问他，您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他还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诗言志”。李白洒脱豪放的艺术气质及其背后传达出的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各种世俗规范的人生价值观，是毛泽东喜欢李白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说李白有道士气，是否与李白笔下总是充满笑傲王侯、讽刺权贵、超脱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的浓烈感情与精神状态有关。龚自珍说：“庄屈不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李白的艺术，融合了道家的洒脱飘逸与屈骚的奇逸瑰丽，超越有限的现世人生，以无穷无尽的宇宙自然为人生精神

的栖息地，向传统的儒家的社会理性发出坚决的挑战。毛泽东做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挑战者，从李白诗歌中获得思想和感情的共鸣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千古诗人心相通。

《将进酒》一诗，是李白于天宝十一年（752）在嵩山友人元丹丘处作的。诗人自长安放还以后，天涯漂泊，南北漫游。仕途失意，理想幻灭，年过半百，功业无成，精神上十分痛苦。他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说："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违。"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中也感叹道："据空鞿铦，壮志竟谁宣。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无风难破浪，失计长江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看来只有以酒浇愁了。因此，诗人在这首诗中，以豪放的笔力，傲岸不羁的情怀，狂歌高唱，抒发内心的抑郁和苦闷，表现了一位希望有所作为而又大失所望的志士的愤懑与抗争。同时，诗中流露出来的诗人对于人生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也是它给人以深沉的感染力的原因。诗人将这一忧患意识表述为"万古愁"，即古往今来无人能回避的永恒的悲剧：宇宙的无限与个体生命的有涯。

这首诗气势奔放，语言豪迈，它以高度的夸张，明快的节奏和参差不齐的句式以及跳跃性的韵律，把诗人的感情，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倾泻而出，酣畅淋漓。赵翼生《瓯北诗话》中称赞道："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在《将进酒》的标题前，划着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划了三个小圈，天头上批

注："好诗"。毛泽东之所以称此诗为好诗，除了以上分析的，恐怕还在于这首诗虽然流露了诗人有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更主要的还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对自我的绝对自信以及充分表达出来的李白鼓舞了古今几多慷慨志士的面对人生的积极抗争与热烈追求。

除了《进酒歌》之外，《梁甫吟》也是毛泽东反复阅读、多次圈划的一首诗。《梁甫吟》是李白初入长安寻求政治出路失败后抒怀言志之作。全诗气势磅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诗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的怀才不遇，表达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境遇和心情。诗中写道："吾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明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他就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全诗。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有一份《梁甫吟》的手抄本，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视力减退，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的。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划着读过两遍的圈记。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他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在函套上也画着读过两遍的大圈。这些印记告诉人们，毛泽东晚年对李白这首政治上失意后的悲愤之作，从感情上，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更深的理解和同情，表露出特殊的倾心。

毛泽东圈阅过的李白的诗还有不畏权贵、不崇拜偶象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表现诗人一身傲骨的《梦吟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反映诗人怀材不遇、极端沉重而又不甘消沉

的苦闷心情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语言明快爽朗，形象生动感人，情感真切朴质，具有民族乐府风韵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江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当然，毛泽东对李白的某些诗也有一些微辞。李白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故而他在《古风》第三首中赞美秦始皇的功业。毛泽东曾从这首诗中引申出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白帝城遇赦，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是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文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在这段富有情趣的调侃议论中，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想当官而不得的尴尬处境之间的深刻矛盾。

《蜀道难》写得淋漓尽致

对“奇之又奇”的《蜀道难》一诗，不少人从思想方面作出种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毛泽东却认为大可不必。他称赞此诗主要看重它高超的艺术性，它的淋漓尽致的描画、想象与夸张……

【毛泽东评点原文】

此篇有些意思

——毛泽东读李白《蜀道难》的批语（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7页，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摘自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作品介绍】

蜀 道 难

李 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试　析】

关于《蜀道难》这首诗，《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由这段话可知，这首诗是天宝元年以前，李白在长安送友人蜀时所作。

李白在这首诗中，根据他在蜀地丰富的生活经验，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以生动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惊异的形象，极力描绘出了一幅蜀地山川奇险图，展现了祖国大自然壮丽多姿的风貌。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的《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划着一个大圈，批道："此篇有些意思。"

1975年，他在同芦荻的谈话中又赞扬"《蜀道难》写得好"，并进而分析道："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看来，毛泽东赞扬这首诗，看重的是它高超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就体现在淋漓尽致的描画、想象与夸张。将蜀道之难写至极境。殷潘在《河岳英灵集》中，也盛赞这首诗"奇之又奇"，"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此诗"笔阵纵横，如蚪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

毛泽东肯定此诗的艺术性，但并不同意任意拔高。他说："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的确，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研究者众说纷纭。有断定为某人某事而作者，有以为讽刺时政者，如萧士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说，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初版于1963年，由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在该诗前面的"题解"中说："唐时，蜀中商业经济极为发达，入蜀的人们乐不思返，而没有意识到这一地区，形势险要，自古为封建割据之地，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诗中强调'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就是指此而言的。"还有称它为"失声横泣之什"者；当然也有以为"自为蜀咏"，"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者。毛泽东不同意这些内容分析，提出"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认为主要是艺术性高。艺术性高，他同样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不光喜欢《蜀道难》，还善于把它用到工作之中。

据作家杜鹏程回忆说，1956 年 2 月 4 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当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面前和他握手时，问他现在在哪里工作，沈雁冰介绍说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工作。周恩来走过来说：就是宝成铁路工地。陈毅也说：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罗！说罢，就随意而动情地吟诵那诗篇中的一些句子。

《北征》虽敷陈其事，然亦有比、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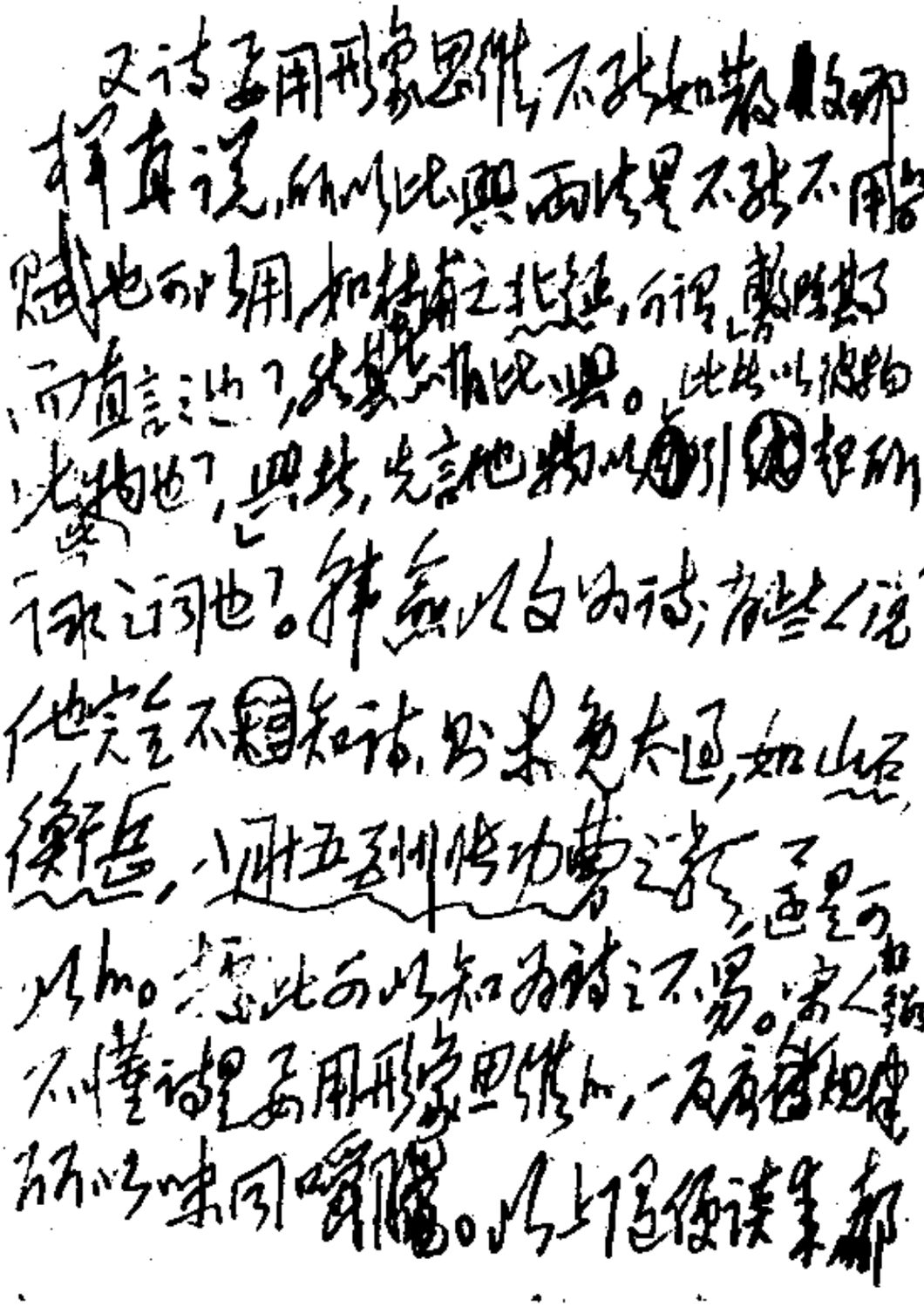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读过不少杜甫的诗，评价却不甚高，说他的诗哭哭啼啼。1965年毛泽东致信陈毅，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并举《北征》为例，认为该诗虽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但其中亦有比兴。

【毛泽东评点原文】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毛泽东1965年致陈毅的信

【作品介绍】

北　征

杜　甫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说。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坡陀望日畤，岩谷互出没。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
粉黛亦解包，衾稠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
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
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
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大宗业，树立甚宏达！

【试　析】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曾居长安城南的少陵以西，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年少多病，勤奋好学。7岁即能写诗。20岁后，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此间所写《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雄姿英发，展露了非凡的艺术才能，显示出青年时期的气概与抱负。35岁时去长安应试，因权奸李林甫作祟，不第。困居长安10年后才勉强获得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这10年，他无法施展才能，生活极端艰难。眼见朝政腐败和人民疾苦，忧愤地写下了《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著名的诗篇。安禄山攻陷长安后，他也流离失所，并为叛军所俘，后逃至凤翔，被肃宗任为左拾遗。期间所作《春望》、《羌村》、《北征》等不朽诗篇，沉痛描述了颠沛流离的经历，表达了对故国沉沦的悲愤、对人民苦难的深挚同情。长安收复后，遂回京都。不久，因疏救房，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此时，两京虽复，但贼敌未平。朝廷为扩充兵员，滥向民间征发。他在去华州任所途中，目击此种惨景，写出了杰出的新乐府组诗“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已达到高峰。不久，关内大旱，因难养活家小，便弃官西去，度关陇，客秦州，寓同谷，跋涉于荒山寒峡之间，至成都定居，筑草堂于浣花溪畔。随后在剑南节

度使严武幕中任职，官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秦州杂诗》、《同谷七歌》、《闻官兵收河南河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严武死后，失去依托，遂携家出蜀，漂泊湘、鄂一带，旅途中作有《秋兴八首》等诗。后病死于赴郴州途中。

杜甫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曾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政治上不断受到大地主势力的排挤打击，仕途失意，又经离乱，一生都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度过。从自己的困境，体验到人民的疾苦，又在漂泊中同人民一起经受着苦难。他身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正是唐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他自己也被推入社会底层，看到和饱尝了社会大动荡中人民所遭受的各种灾难。因此，他以如椽的诗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被后人誉为“诗史”，本人亦被尊为“诗圣”。杜甫的诗既“转益多师”，注意吸取和融和各家之长，又坚持“别裁伪体”的批判精神，成就极高。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也。”杜诗众体皆备，尤以古诗、律诗见长。五古、七古，铺陈展叙，抒怀议论，回怀往复，气势宏伟，五律、七律，对仗工整，语言精练，形象鲜明。其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

毛泽东读过不少杜诗。从他故居的藏书中看，仅圈划过的杜诗就有67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并从中借阅过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12部108本，1964年毛泽东从湖南返回北京，火车经过岳阳地区时，手书

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墨宝，如今由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虽然毛泽东读过不少杜诗，但评价却不太高。1942 年 4 月，毛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毛泽东直言："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 年在同溅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对《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曾从书架上取出《唐诗别载集》，翻到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

比、兴。”

《北征》是杜甫于安史之乱的第二年，从凤翔出发，到州探望家小时所作。全诗计七十韵，一百四十句，七百字。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全诗从命题到写作手法都是以赋为主，“敷陈其事”，所谓“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苕溪渔隐丛话·诗眼》）；以比兴为辅，如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毛泽东对《北征》的评价，说明他不光喜爱浪漫主义作品，对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也是给予积极肯定的。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对杜诗中的优秀之作做了公正地评价。

《赠卫八处士》毫无雕琢之工

毛泽东晚年喜好唐诗，他常叫护士孟锦云为他读。小孟多次为毛泽东读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因为她知道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诗。它的质朴与苍凉是否暗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赠卫八处士》）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

——摘自江东然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9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赠八卫处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试　析】

《赠卫八处士》一诗，是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春由故乡洛阳返华州途中所作。此前不久，唐朝军队与安、史的叛乱军

队在相州大战，洛阳潼关一线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杜甫一路目睹战乱景象之后，来到卫八处士的家里，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

诗中描写了诗人和知交卫八在春天的夜晚久别重逢，畅饮话别的生动景象和感人情谊。诗的开始即感叹亲朋之间别易会难，接着细致地叙写和老朋友见面的心理活动以及主宾间的问答情况。乍一相见，彼此都感到已然苍老，问到一些老友，也大都离开人间，这更加深了动乱岁月中人生无常的感慨。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在老友家中所受到的极亲切热情的招待场面：夜雨春韭，新炊黄粱，罗酒浆，累十觞，开怀畅饮，情深意长。最后诗人在感人肺腑的氛围中，发出了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的沉重感叹。《杜诗镜铨》中引张上若语，称此诗“情景逼真，兼极顿挫之妙。”

毛泽东喜欢唐诗。在他的晚年，唐诗、宋词依然是他主要的精神食粮。他床头的书柜上，总放着唐诗和宋词，他自己读累了，有时便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有一天，毛泽东又提出让工作人员给他读唐诗，他的护士孟锦云在读过几首之后，又读起了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这首诗，小孟已多次给毛泽东读过，因为小孟觉得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诗，毛泽东曾说“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

毛泽东对此诗的评价，确实抓住了它的特点。这首诗有接近汉魏古诗和陶渊明诗歌的那种古朴自然的一面。诗人只是随其所触所感，顺手写出，象毛泽东评的，以口语写心中之事，却造成很浓的气氛，把那一夕生活和心底卷起的层层波澜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毫无雕琢之工”，却结构严密，浑然一体。另外，诗中展露出的质朴无华与深情而苍凉的境界恐怕与毛泽

东的晚年的心境和思绪有某种对应。这可能是毛泽东喜爱此诗的又一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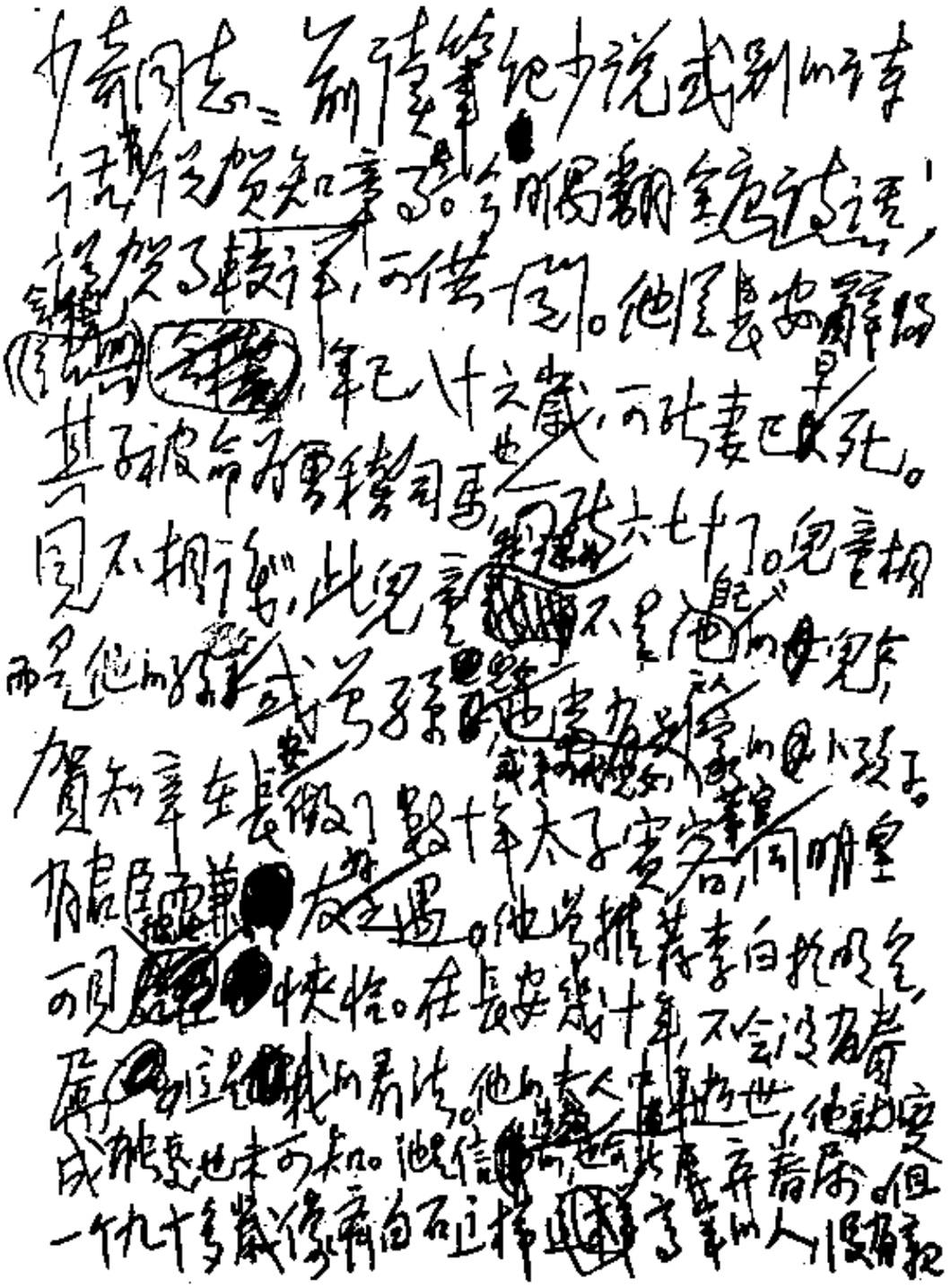
《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

刘少奇曾引此诗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毛泽东总觉不甚妥当，他以一个近乎职业文学史家的治学方式，翻阅有关图书，推理考据，层层分析，得出了诗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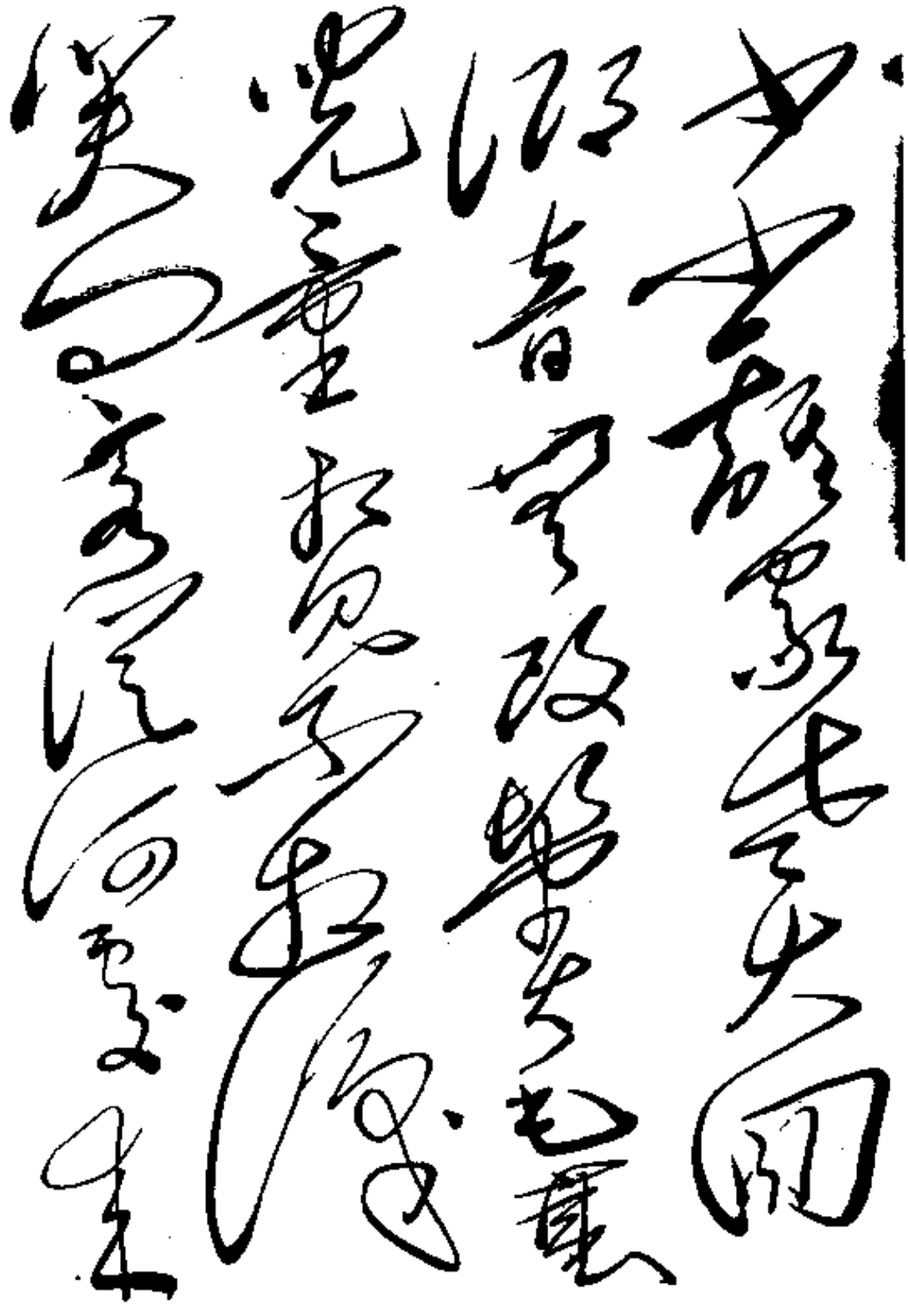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评点原文】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



毛泽东 1958 年致刘少奇的信



毛泽东手书《回乡偶书》

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

10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1958年2月10日致刘少奇的信（见张贻玖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61－62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作品介绍】

回乡偶书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试　析】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省萧山县）人。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后入丽正殿书院修书。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又充太子宾客，后累官秘书监，地位清显。玄宗天宝二年（743）腊月，上表请求还乡为道士。次年，正月五日，玄宗为他饯行（时年86岁）。贺生性恬淡，无论官职大小，喜过常人生活，至老不失诗人的天真。《旧唐书》本传中说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

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仅19首。其中几首绝句写的清新自然，不乏新意。

这首《回乡偶书》，写回乡小景，写岁月变迁，丝毫没有台阁气，亲切自然。1958年初，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古代官吏禁带家属，引了贺知章《回乡偶书》为例证。

毛泽东听了，“总觉不甚妥当”。为了弄清贺知章诗中“儿童相见不相识”一句中的“儿童”是否是贺的后代，贺知章在外居官，中年丧妻后有否再娶，以及当时官吏可否带家眷，毛泽东专门花工夫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找出《旧唐书列传》中的贺知章传进行查对，发现均无不带家属的记载。于是，他特意给刘少奇写了上边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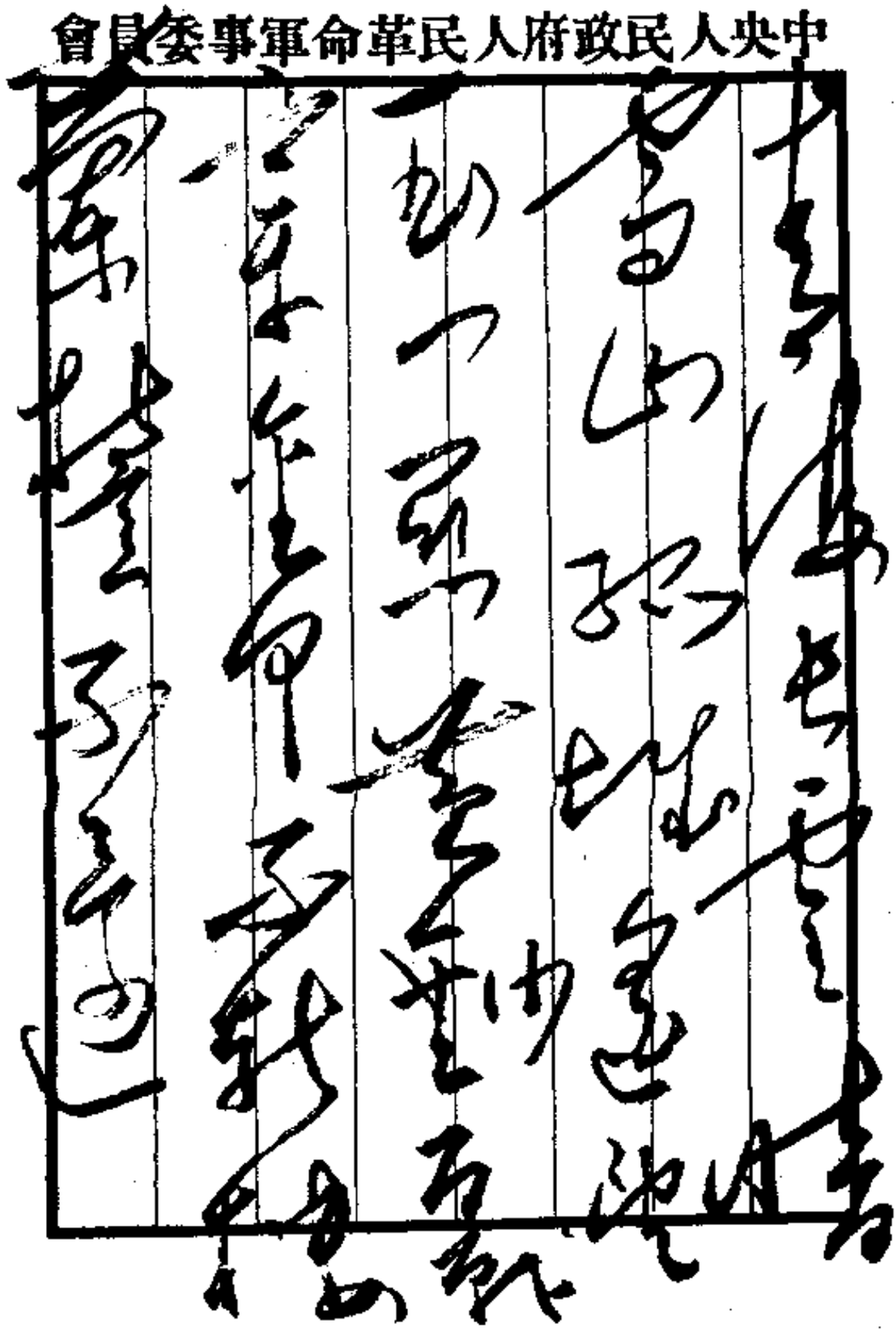
这篇文字，毛泽东从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君王的关系，从他的性格特点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的一般惯例，在翻阅了有关的史料如《全唐诗话》、《新唐书》、《旧唐书》后，细心考据，以近乎一个职业文学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令人叫绝。所论证的虽是理解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严密，令后人可从多方面加以学习、体会。

《从军行》（之四）
中有意志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因病住院，倍受伤病折磨。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给她写信，鼓励她意志可以克服病痛，一定要锻炼意志，并抄录了这首《从军行》，告诉她：这里有意志。

【毛泽东评点原文】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毛泽东手书《从军行》（之四）

——毛泽东 1958 年 2 月 3 日致李讷信
（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55—56 页）

【作品介绍】

《从军行》（之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试　析】

《从军行》（之四）为唐朝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所写。王昌龄（约 698—约 756），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青年时期曾到过河西陇右一带。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授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尉。不久迁校书郎，后贬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丞、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尉，安史之乱后，返乡经亳州，为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以诗名重一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擅长五言和七言绝句，尤以七绝成就最高，在同时代诗人中，只有李白的七绝能和他相比。清代的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

龙标，绝伦逸群。”此论是切实的。

王昌龄的诗，气魄宏伟，句奇格俊，音节响亮，雄浑壮阔，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从军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的旧题。王昌龄的《从军行》共有7首，这是第四首。它热情歌唱边疆战士，赞扬他们以身许国的爱国壮志，境界阔大，气势宏丽，情怀激越，实为千古绝唱。前两句是即目抒情。后两句是誓志克敌。楼兰是汉代西域国。汉昭帝时，楼兰国王与匈奴勾通，截杀汉朝使臣，屡犯边境。后傅介子请赴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后计杀楼兰王带其首级回来。这里，王昌龄用楼兰代指西域骚扰之敌，表述一种扫净边尘的壮志。

毛泽东评点这首诗是在1958年2月3日给他住院的女儿李讷的信中。当时，李讷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正在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毛泽东给李讷写信，信中说：“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并鼓励她：“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并在这两句话下面加了着重号。

毛泽东向来崇尚坚定豪迈的人生意志。他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深受影响，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描述“心力”（即人的意志）发动时不可遏止的境象。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描绘崇尚“任金革死而不厌”的强力人生风貌。他说：“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看来，从青年时代起，他就

体验了并崇尚王昌龄的《从军行》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意志。这种对人生意志的崇尚在毛泽东读泡鳇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也可看出。他说："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廊］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喜爱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的诗，并从中看出"意志"来，也许它正暗合了毛泽东的心理与伦理的追求。

《师说》有真知灼见

1940年秋，马列学院的几位同志接毛泽东去作报告，一路上，他们讲了许多情况，毛泽东以虽然“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的精神，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很有感慨地谈起了韩愈的《师说》……

【毛泽东评点原文】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

——摘自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49页）

【作品介绍】

师　说

韩　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吾乎，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齿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及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

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试　析】

韩愈（公元 768—824 年），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之为“韩昌黎”。著有《韩昌黎文集》。毛泽东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注到：“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隋县，固以流传，厥功伟哉。”批注告诉我们，毛泽东把韩愈文集得以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看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足见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喜好和重视。

韩愈的卓越贡献是他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提倡不拘形式、写作内容充实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并身体力行，在继承秦汉古文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师说》是其中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此文章不仅在文风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出类拔萃、有独到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文笔酣畅流利，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在内容上文章提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毛泽东非常赞同文中观点。

1940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时候到马列学院去作报告，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一行四人去接毛泽东，刚走了一半路，就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见接他来的这么多人，便讲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从毛泽东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出毛泽东早就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反对劳民伤财的作法。在做完报告分手的时候，又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毛泽东借用《师说》里的句子表达的意思是，生于我之前的人，所得到的学问和知识肯定先于我，所以我必须向他们学习；而生于我之后的人，如果得到的学问和知识也比我多的话，我也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师无先后之分，老师不一定贤于弟子，弟子也不一定不如老师。这次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了解了许多情况，所以他说"吾从而师之"，对大家表示感谢。显示出毛泽东一生谦虚好学，善于调查研究，从不摆架子的作风。（宿如萍）

《伯夷颂》颂错了人

韩愈的《伯夷颂》歌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还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是颂错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夷还是一个有气节的人，所以毛泽东在号召人们不怕困难的时候，提起这篇《伯夷颂》。

【毛泽东评点原文】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

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95－1496 页）

【作品介绍】

伯 夷 颂

韩 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惎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惎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惎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昭乎，日月不足为明；慥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非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仍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仍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仍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

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试　析】

《伯夷颂》，载于《韩昌黎文集》第一卷。

关于伯夷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作了一些介绍："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 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对于伯夷，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誉之，有人否之，未有定论。孔子认为伯夷是圣贤，"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史记·伯夷列传》）。毛泽东说伯夷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当时人民解放战争"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关于伯夷其人，据陈迹冬分析，他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并非是忠于纣王，而是对武王的一种反抗。当初，武王伐纣时，伯夷就曾阻止，并提出"父死不葬，爰于干戈，或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质问，但武王不听。伯夷认为武王是一个不仁不孝的人。只是姬周氏族乘殷族用兵平徐夷时，朝歌（殷的别都）虚空，东进夺取了政权。又在大会诸侯时，防风氏因后到，就被杀了，可见其霸道了。再有，《尚书·酒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周贵族康叔教训他的本族臣民，在什么场合下可以喝酒，在什么场合下不能喝酒，限制很严，违背了"酒诰"就要杀头。至于那些降顺了的殷商臣民，则是例

外。让他们聚饮胡喝，让他们更加腐烂衰朽，这对周的统治、周朝的强大是有利的。胜利了的姬周统治者又是何等的阴毒啊！武王的伐讨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决不是为了“解放”殷族人民。由一个暴君替代了另一个暴君，如何会再出现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呢？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只有用死以示反抗。可见伯夷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那时更谈不上“民主”，毛公只是信手抓来，用以讽今。伯夷不过笃于“仁”、“孝”，韩愈要颂伯夷的就是这一点。

再者，韩愈倡导“圣人之道”，是要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他借《伯夷颂》来反对一切军事上、政治上动摇唐王朝的作法，也是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后，反对藩镇割据，巩固中央集权，这是韩愈的题旨。

毛泽东熟读韩文，对这篇《伯夷颂》想必是很熟悉的，所以在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信笔拈来，认为韩愈歌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士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而应当歌颂闻一多、朱自清这样表现民族气节的英雄气概的人，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人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外部势力的封锁、重压，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无畏的精神。他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当然，伯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只是他为之守节的理想、主义是错的，是不值得为之守的，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既说“颂错了”，但又在这篇文章里提起他的原因。

《黔之驴》讲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一篇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都提到它。意思虽不完全一致，但都是鼓励人们做那种无所畏惧的小老虎，接受那头驴的教训。

【毛泽东评点原文】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

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摘自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3页）

【作品介绍】

黔 之 驴

柳宗元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啸，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试 析】

柳宗元曾写过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三戒》，《黔之驴》就是其中的一篇，还有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这些

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问题，高度抽象、概括、形象化的力作，有强烈的政治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经世不衰，独具风格。关于写《三戒》的目的，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在《黔之驴》中，柳宗元通过描写一头外强中干的驴子，终于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讽刺了"乘物以逞"，"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的人。后人将此归纳为"黔驴之技"或"黔驴技穷"，用来比喻本领有限，或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全使出来了，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的《一个极其主要的政策》的文章中，借用这个寓言，来说明敌人是不可怕的，尽管外表是个庞然大物。毛泽东把八路军比作"贵州的小老虎"，把日本帝国主义比作貌似强大的"驴子"，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不管敌人外表如何庞大，由于它的本质是外强中干的，只要我们对付得法，它最终是要被精壮的革命力量所消灭。

同一年，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又引用了这个寓言，不过这回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从这里出去工作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认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土包子"干部，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

那是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号召鲁艺师不要只局限于小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

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驴驹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毛泽东在讲这个故事时，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和侦察驴驹子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作记录的同志，大家都笑了。他运用柳宗元这一寓言故事，来讲述他要说明的道理，使道理形象鲜明地刻印在听众的脑海里，事隔一二十年，许多同志还记着这个“很好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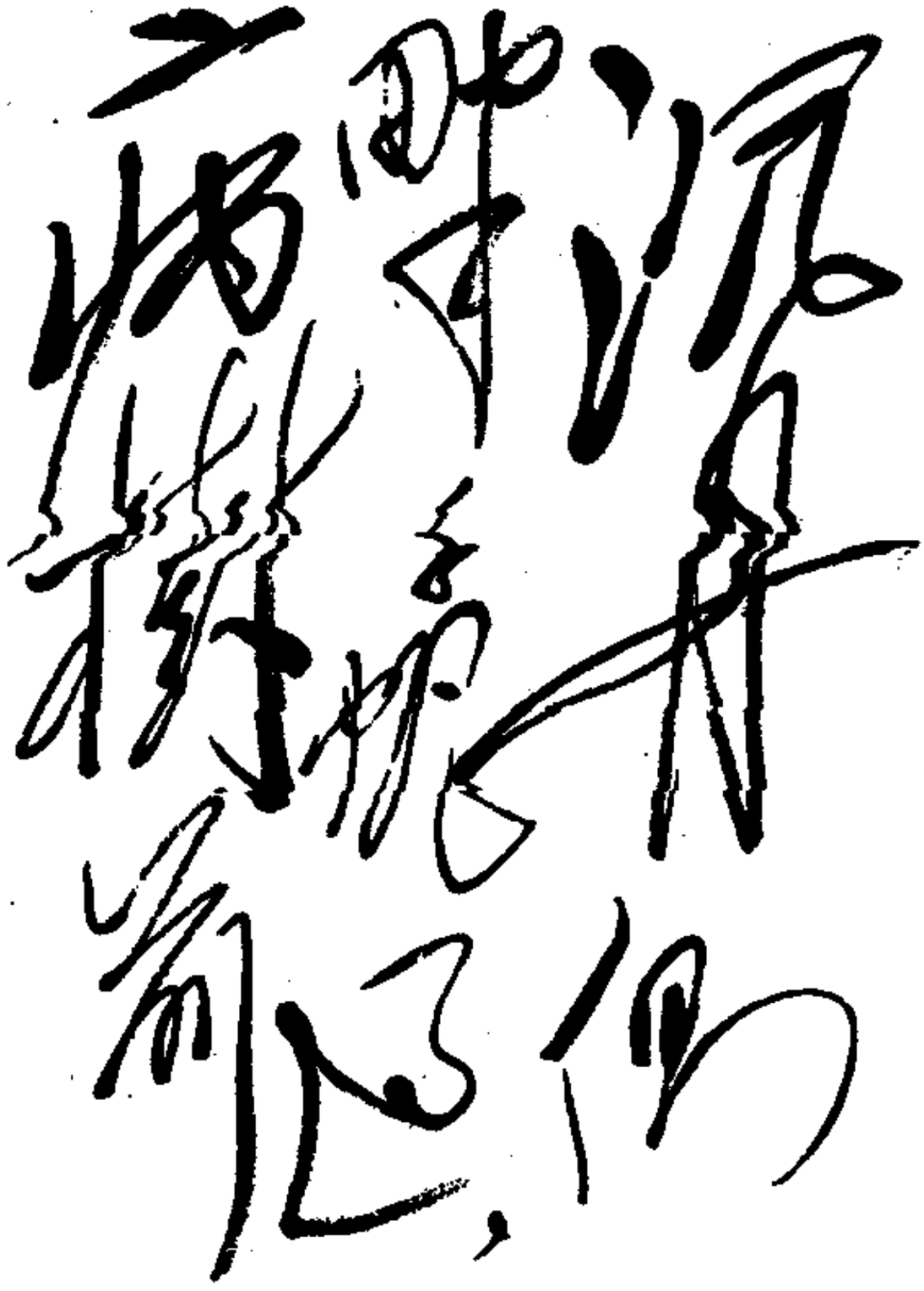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气概

这首诗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应答之作。诗中表达了作者虽屡遭挫败仍坚韧不拔、豪迈激越的气概。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里引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鼓励人们在同地球的开战中也要有此气概。

【毛泽东评点原文】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28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手书《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句》

【作品介绍】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试　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中进士，授太子校书，后为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僚，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升监察御史。永贞元年，刘参与了王、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成为中坚人物。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刺史，途中又改贬为朗州司马。以后又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回洛阳为主客郎中，次年召至长安，为集贤店学士，礼部郎中，出为苏州刺史，移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终检校礼部尚书。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为“国手”，说他的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的诗歌大都是针砭时弊，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他的近代绝律，语言明快简练，音节和谐浏亮，情韵深长，风格雄健。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时作者罢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任，召还京城，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遇，席间白乐天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为我行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歌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徒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回诗相赠，便是此篇。

诗中作者首先慨叹自己谪居巴山楚水荒僻之地，不受重用，仕途坎坷，然后表达了对亡友的怀念，并以王质自比，说自己结束外放，此番返京已有隔世之感。闻笛赋，是指晋向秀在友人嵇康、吕安被害后，途经他们的旧居，闻邻人笛声凄切，乃作《思旧赋》。烂柯人，据载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二童子下棋，观看至棋局终了时，发觉手中的斧柄已烂了，回到家中才知已过了百年。历经多年的坎坷，饱尝世态的炎凉，作者重返故地发现人事皆非，因倍感惆怅。然而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消极悲叹，而是表现出了达观通脱、豪迈激越的气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毛泽东用红铅笔在标题前面画着圈；用黑铅笔在第一句诗前画着圈，每句诗后作了圈点。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重线。编者在注解中写道：“沉舟二语，

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对此作了断句，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诗中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指出个人的沉滞算不了什么，世界还是要向前发展的，这种看法无疑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有积极的一面。编者把它理解为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显然是对诗人的一种歪曲。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欣赏诗中作者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气概”。

毛泽东很喜爱刘禹锡的诗。象讽刺新的权贵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表现出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的《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两首诗毛泽东都曾背诵并挥毫手书过。

刘的一些咏史诗毛泽东也很喜爱。《蜀先生庙》一诗，毛泽东阅后批道：“略好”。《乌衣巷》一诗，圈画过6次。《西塞山怀古》一诗，也圈画过6次。另外象《竹枝词》、《杨柳枝词》等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的诗，毛泽东也都有圈画。

《琵琶行》高在作者与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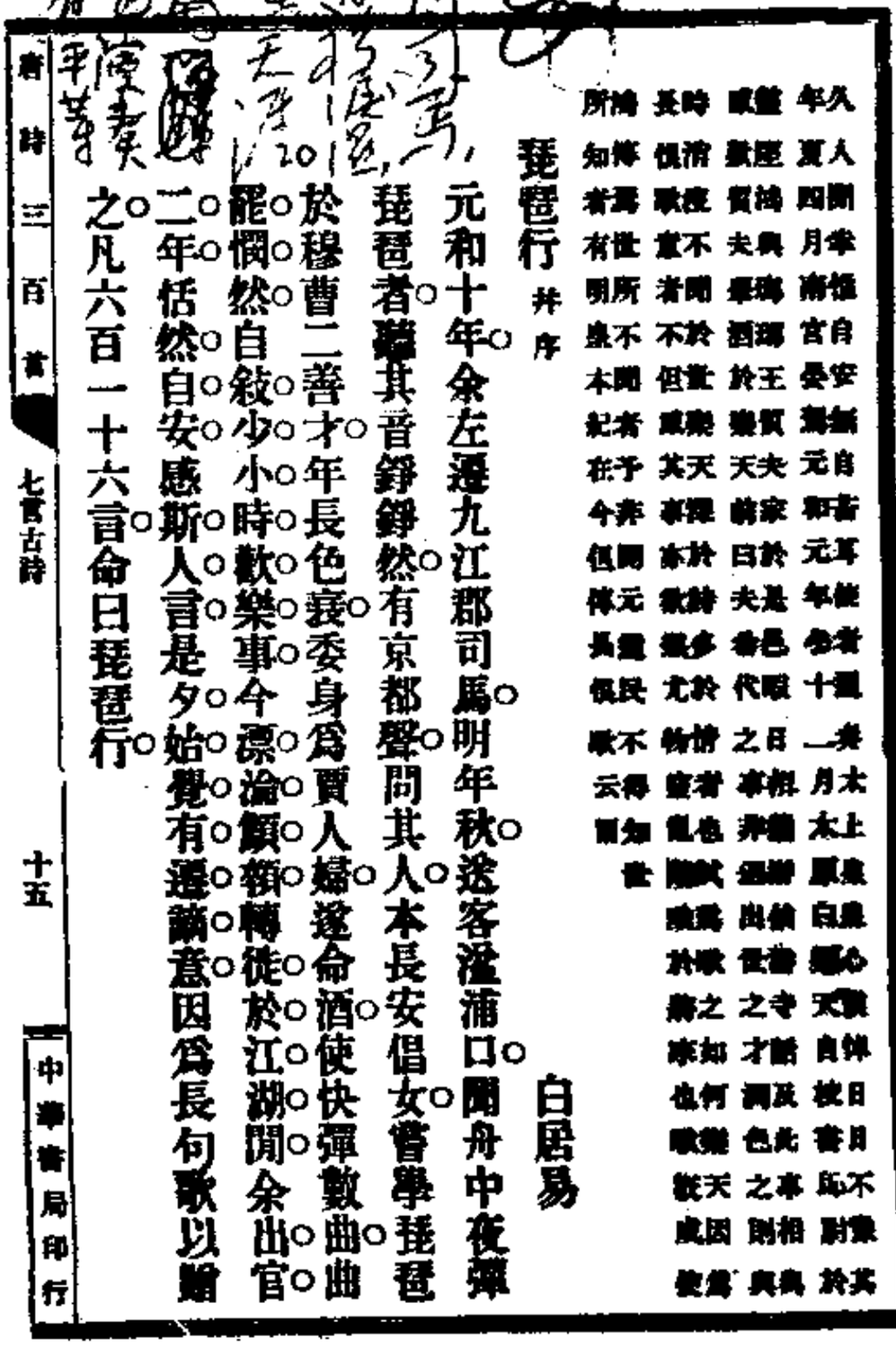
一曲《琵琶行》，感动无数人，其中奥妙，仁者见仁，众说纷纭。毛泽东从作者与弹琵琶者有平等心情的角度，指出该诗的高明之处，这是否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人民特有的血肉关系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唐詩三百首　七言古詩　十五　中華書局印行

琵琶行　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悯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毛泽东读《琵琶行》的批语

【作品介绍】

《琵琶行》

白居易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试　析】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唐代著名诗人。祖籍太原。少时就以写诗闻名，29岁中进士，36岁授翰林学士，先后任校书郎、江州司马、刑部侍郎、太子少傅等。晚年隐居香山。留有《白氏长庆集》，收有2000多篇诗。《琵琶行》是其代表作之一，另外还有《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长恨歌》等不朽之作。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突出代表，新乐府是和古乐府相对而言。它提倡用新题材创作，用乐曲播送。主张内容真实、自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即文学要反映现实，要有战斗性，这无疑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基本精神的。它反映了当时一批诗人，目击朝政腐败，人民的疾苦，要求诗歌突破狭窄的境界，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艺术追求。新乐府使唐代诗歌得到新的发展。

白居易作《琵琶行》时，正值他因做谏官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反映了他政治上遭受迫害、体验朝政黑暗的悲愤心情。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遭遇，以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出白居易对弹琵琶女子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使白居易这首诗成为传世之作。毛泽东评价“白诗高处”在于作者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心情”，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更是白居易的知音。

白居易的诗大都构思曲折起伏，感情刻画细腻真切，语言

朴实优美，并且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除《琵琶行》之外，还有一首《长恨歌》，是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毛泽东也很爱读。据有毛泽东批画手迹可查的，他每篇最少读过五遍。另外，白居易16岁时写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毛泽东对这首诗也很喜欢，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圈划。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待，他也喜欢与人民群众有平等思想的白居易的诗。（宿如萍）

《放言五首》（之三）讲了盖棺定论的道理

"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曾引用白居易这首诗的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辨别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林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毛泽东评点原文】

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

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作品介绍】

《放言五首》（之三）

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试　析】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在去江州途中写的《放言五首》中的一首。这首诗虽是议论诗，但不呆板枯躁。诗中作者宽慰自己遭贬一事，出语婉曲含而不露。结构曲折，论人论事兼备。正反论证透析，抽象的哲理寓形象事例之中，极富理趣。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要阐述这样一条真理，识人论事需长久全面考察方能判断正确。时间的考验将给予公正的裁决。

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谈到了这首诗。把这首诗讲的道理概括为“盖棺定论”，并鼓励人们要奋斗到底，奋斗到死，因为“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对这首诗毛泽东用红笔画满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道出了识别一个人真伪的道理。1972年，在批判林彪阳奉阴违，最终原形毕露的丑露面目时，毛泽东又引用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

《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苍凉优美

毛泽东爱读豪放派的诗词，但也不废婉约。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范仲淹的这两首词，毛泽东更能从中体会出苍凉而优美的意境。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喜欢的词风也是多样的，各有兴会，毛泽东兼收并读。

【毛泽东评点原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

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毛泽东1957年对范仲淹两首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苏幕遮·碧云天》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意。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试　析】

范仲淹（989～1052），江苏吴县人。是北宋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虽不以词知名，但《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确是范仲淹流传下来的五六首词中的精品，也是毛泽东喜欢书写评论的两首。

《苏幕遮》上部分写秋色，下部分写乡愁，给人以优雅、清新的感觉，很有韵味。《渔家傲》以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负责沿边军事行政，抑制西夏侵略为生活基础，上承唐代边塞人的风格，通过描写边塞凄凉的景色，表达边防将士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胸襟开阔，风格明健。毛泽东对这两首词的批语是"既苍凉又优美"非常贴切。并借此引发出关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评论。认为自己的兴趣在于"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而范仲淹的这两首词即介于豪放与婉约两派之间，属"中间派"，所以毛泽东对它们百读不厌。

自晚唐五代以后，在词的创作方面，逐步分成两大派别。以北宋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其风格绮靡婉约，情意绵绵，人们习惯用它来写艳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其风格豪迈宏伟，气势奔放。从毛泽东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宋词非常喜爱，并对其风格及作者也非常熟悉。毛泽东圈划过岳飞、张元干、张孝祥、苏轼、秦少游、李清照等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但他圈划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 98 首。

毛泽东是豪放诗人，但也不乏婉约情调。他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慷慨激昂，豪迈壮观的，但也有几首婉约情调的千古绝唱。如 1923 年填的那首《贺新郎》，那今朝霜重、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的景色描绘，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情态勾勒，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内心感受，深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缱绻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不常显露的内在情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 20 年代初，还写过一首《虞美人》，也是写给杨开慧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不由。

这显然是一首爱情诗，地道的婉约派。1957 年，李淑一因早年从杨开慧处得知了该词，就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写出来，被毛泽东婉拒。但是，1961 年，毛泽东又将该词写出来给他的卫士张仙朋保存。（宿如萍）

《六国论》提出的联合抗秦论未必然

苏询在他的名篇《六国论》中设想六国若团结一致，联合抗秦，即可免遭灭亡的命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看待秦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是极高明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此论未必然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

“论辨类”苏洵《六国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5、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六 国 论

苏 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

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下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试　析】

《六国论》是苏洵的代表作。约成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左右。本文是《嘉祐全集·权书》中的第八篇，《六国论》的“论”字是后人所加。作者苏洵（1009－1079），字明允，四川眉山人。25岁时始发愤为学，曾作秘书少校书郎。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列为“唐宋八大家”。苏洵著有《权书》、《衡论》等。

本文以战国时六国赂秦，反为秦所灭的事例，借古论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改弦易辙，增

强国力，与敌斗争。在六国抗秦的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反而较早灭亡。二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三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合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都是由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或许是因为如果势力相当，都维护各自的利益，不能形成核心，各自为政，在统一布署、调动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兵家最讲究“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而秦国则是万众一心，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即使六国联合抗秦也未必能制之。（参阅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去理解六国灭亡、秦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但过分夸大偶然性，就难以把握历史的规律。毛泽东的这一分析确实令人豁然开朗。

毛泽东从他一生的战争经验中或许也有同感。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以“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苦战八年，终于打退了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又以三年时间轰轰烈烈地打败了蒋介石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成功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史例。其根本原因就是民心所向，以人民利益为重，以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有的战争史家这样形容：解放战争就

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真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任何强大的敌人如果以人民群众为敌，最终都会被历史的车轮辗碎。从蒋介石部队内部来分析，它本来就是由各路反动军阀拼凑而成，虽势力绝大，表面上都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但利益不一，勾心斗角，互不服气，打仗时都以自己本部利益为重，企图保全势力，终成了散兵游勇，被我们个个击破。这不能不说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为什么蒋介石苦心经营几十年，又有美式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最终被毛泽东赶到了小小的台湾岛，这在台湾许多年轻人来说始终是个谜。因为在台湾有关这方面的宣传是绝对禁止的。他们接受的仍是“共匪”、“赤匪”之类的宣传。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听说大陆、香港等地正在上演国产电影《大决战》，这部片子如实反映了有关解放战争的史实，他设法到了香港，终于看到了《大决战》这部电影。观后他佩服地说：“还是毛泽东厉害，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

《谏论》空话连篇

《谏论》是苏洵的一篇政治文章，论述了天下谏君之道。但皆书生之谈，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毛泽东说它“空话连篇”。对毛泽东来讲，这个问题恐怕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了。

【毛泽东评点原文】

空话连篇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1－102页，中央

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谏　论

苏　洵

（上）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辨，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辨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辨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

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

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梁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雎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下）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

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进也，故刑而后谏焉。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

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谠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试　析】

《谏论》是苏洵的一篇政治文章。毛泽东对此评价不高，认为其"空话连篇"。《谏论》分上、下篇。上篇，是从臣下的

角度，探讨进谏的的方式方法。探讨如何使君主纳谏的问题。下篇，则从君主的角度，探讨如何使臣子踊跃进谏的问题。

毛泽东评点的是下篇。下篇先开门见山地把使君纳谏和使臣进谏两个问题同时提起，而且把“能谏之臣”和“纳谏之君”上拔到一个很高的衡量标准，认为“不能使君必纳谏”的臣，“非真能谏之臣”；“不能使臣必谏”的君，也“非真能纳谏之君”。然后又说：“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把提出的问题分流为二：“使君纳谏”之说，以“向之论备矣”，承归于《谏论》（上）；“使臣必谏”之说，以“吾其言之”，开启本文。

紧接着讲如何使臣进谏之理。先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君臣之间的关系。作者连设三个比喻：“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把君主的威势，赫然描绘出来；然后用人不能抗拒上天、触犯神灵、冲撞雷霆这样“亦明矣”的道理，形象精妙地来比拟君臣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怎样使臣下鲠言进谏而无忌无虑呢？作者借圣人言，谈出两条可行之法：一条是“立赏以劝之”，一条是“制刑以威之”。且各举典籍为证。接着连用四句诘问，从反面层层说明道理：“人之情，非病风丧心（即丧心病狂，神经错乱），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又反设条件再问：“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继而递进一步再问：“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搏死者？”又从臣子立场转到君主方面，“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这样一正一反，把“欲臣进谏”之术，落到“刑”和“赏”之上。

为说明这个道理，文章举出三个跳跃山涧的故事作喻，生动地论证了勇者、勇怯半者、怯者三种人在进谏时的表现和刑

赏促动他们进谏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举三人“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使人“与之临乎渊谷”，对他们说：“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于是，“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他两人则不能跳。第二次再对他们说：“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这一回，“勇怯半者奔利”，也跳了过去；怯者还是不能跳。第三回，设有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这样三设条件，“用谓这勇”、“与千金”、“猛虎向逼”，象征精神鼓励、物质刺激、惩罚手段，将勇者、勇怯半者、怯者三种人在不同情况下跳跃渊谷进行了分析，而后归结到“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的结论上来。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批注道：“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毛泽东意思是说，苏洵这个例子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是又深又宽的渊谷，要想跳过去，光有勇气不行，还要看跳者水性如何，否则只能自取灭亡，即使赏刑相加也无济于事。在毛泽东看来，办任何事情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都要分析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能否跳越深谷，要看它有多深多宽的客观条件，又要看跳者是否善水的主观条件；臣下“必谏”君王也是如此。一是要看君王是明君还是昏君，二要看臣下是否进谏的是真理，只有这两个条件具备，才能达到进谏的目的。在这里苏洵只是空谈一气，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毛泽东称之为“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宿如萍）

《朋党论》
有些论断似是而非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毛泽东对此评价似乎不高，认为有些论段“似是而非”，到底文中有哪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在汉献帝之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
“论辨类”欧阳修《朋党论》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9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朋 党 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

为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常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试　析】

《朋党论》是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写的一封奏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讥刺权相吕夷简，被吕指为朋党，遭到贬谪。当时涉世未深、血性方刚的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为范辩护，亦被称为朋党，同时被贬。庆历三年，吕夷简罢

相。杜衍掌政，启用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十项改革措施，称为“庆历新政”。这些政治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攻击杜衍、范仲淹等人引用朋党。欧阳修因积极支持新政，也被保守派列入朋党之内。为回击这些诬蔑，欧阳修写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

朋党，指同类的人为着一定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朋，同类。党，集团。在封建时代这个词一般只用于贬义，是奸邪的同义语。文章一开始，作者便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即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之分，君主要善于识别。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有关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提法并不始于欧阳文忠公。所以毛泽东批道：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朋党之说，早在《韩非子》、《史记》、《战国策》等书中就有记载。稍早于欧阳修的宋初文学家王禹在其《朋党论》一文中指出：“夫朋党之来久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了。”欧阳修的《朋党论》显然受了王禹的观点的影响。“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这种看法倒是颇有见地的。接着，文章又从理论上分析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原因：小人贪图的是利禄、货财，当利益相同时，他们暂时勾结在一起结为私党。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互相疏远，互相残杀，所以他们是不会结为朋党的。即使暂时结合，也是假的。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道义、忠诚信义、名誉节操基础上的。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因此他们的结党能够始终如一。段末，

作者又进一步提醒君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天下就能大治。在这封奏书里，欧阳修向宋仁宗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是要善于识别哪些是由君子组成的朋党，哪些是由小人结成的朋党；第二是要进用君子之朋党，黜退小人之朋党。

在就朋党的真伪善恶及其与国家治乱兴亡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文章进一步列举了六件史实，以证明君主能否正确对待朋党将决定国家的兴亡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第一件是唐尧时，舜佐尧重用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的朋党，黜退了共工、驩兜等四凶的小人之党，达到天下大治。八元、八恺，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四凶即唐尧时的共工、驩兜、鲧三苗，据《尚书·虞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第二件是虞舜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舜都加以重用，天下也治理得很好。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重用君子之朋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第三四两件事引自《尚书》里的一句话：“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然后分别用商纣和周的兴衰来论证。纣有亿万臣民便有亿万条心，绝无朋党之虞，然而商却亡了，而周武王三千大臣结为一党，可谓最大的朋堂了，可是西周却很兴盛强大。第五件事是后汉的“党锢之祸”。据史载，后汉桓帝时，宦官专权，朝官李膺等人反对宦官集团，被诬为党人，捕入狱中，后虽获释，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窦武谋划诛杀宦官，事泄，宦

官曹节等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学者六七百人，逮捕太学生千余人。文中称为“献帝时”，当为作者笔误。“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可算清除了“党人”的隐患了。然而，黄巾起义一爆发，汉室立即大乱，等到汉帝醒悟，释放党人，已为时过晚。第六件事是晚唐的“牛李党争”和唐昭宗的滥杀名士。“牛李党争”是指晚唐时朝臣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等之间的持续近四十年的朋党之争。有关滥杀名士，投尸浊流一事，发生在天祐二年。据《古文观止》载：“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尽杀之。时李振屡举进士不中第，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天祐二年为唐哀帝（昭宣帝）年号，欧阳修称为昭宗，亦为笔误。最后两件史料，又是重用小人之党悻招致亡国之祸的最好明证。

欧阳修举的这些例子，特别是后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这些都是“权臣”所为，并非“傀儡皇帝之罪”。这也是《朋党论》中“似是而非”之处。

《蝶恋花·出塞》看出兴亡

清初，抒发兴亡之感是文坛上的时髦调子。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旋律。毛泽东是在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读到这首词的，一语"看出兴亡"的评点，也流露出一代伟人令人感慨的千思万绪。

【毛泽东评点原文】

看出兴亡

——毛泽东读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3页，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作品介绍】

《蝶恋花·出塞》

纳兰性德

今古河山无定据，
画角声中，
牧马频来去。
满目荒凉谁可语？
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
铁马金戈，
青冢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
深山夕照深秋雨。

【试　析】

《蝶恋花·出塞》为清朝著名的满族词家纳兰性德所作。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州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他自幼修文习武，康熙年间赐

进士出身，官至一等侍卫。善骑射，好读书，为人谨慎，性本淡泊，避谈世事，无心于功名。擅填词，词风近于李煜。内容多写离别相思或怨夏悲秋的个人感受，很少触及社会政治问题。陈维崧说他的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蝶恋花·出塞》是同人随驾到关外巡察时的抒怀之作。词中，作者翘首远望，满目荒凉，于是想到古往今来兴亡盛衰的情景。他从画角的悲鸣声中，从战骑频繁往来之中，深深地感到，世界本来就不象术者说的那样有什么定数，在人与自然的强烈对比中，愈发感到人生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他由此体味到，谁也不能永久地占住山河，保住富贵。每一个王朝，也都是来去匆匆，就象塞外的牧马飘忽、丹枫易老一样。下半阙，作者从昭君出塞联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宫庭近侍，今天甲胄在身，有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的襟袍，踌躇满志，建功立业，但最终又会怎么样呢？最终还不是象昭君一样，青冢之下，受人凭吊。

短短的几句词，人们可以感到在这里诗人的目光纵横百里，诗人的思绪，上下千条，苍凉悲壮的意境中，透出历史、江山的苍桑感，所以，毛泽东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兴亡”。

毛泽东这一评点，确实抓住了这首词的实质。清初，抒发兴亡之感是文坛上的时髦调子。象著名的剧作家洪、孔尚任，在他们的名作《长生殿》、《桃花扇》中所表露出的兴亡之感寄寓着对清朝统治的不满。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繁华之花行将凋落的转折点。他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可以补天的良方，四顾茫然，忧心忡忡，纳兰性德的一生，正如他的好友严绳孙所说，是在“惴惴有临履之忧”中度过的。整天担忧着他踏着的“大地”会突然陷下去。他的忧虑，不仅来自爱妻

的早逝，耳闻目睹的朝庭朋党的倾轧……更是因为诗人以他特有的敏感，看到隐藏在繁华后面的颓唐没落的命运。

纳兰性德有不少词都表露出“兴亡”这一主题。象“……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沉潭底蛟龙穴，蛟龙穴，兴亡满眼，旧时明月”（《忆秦娥》）；“江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望海潮》）；“……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点降唇·小兀喇》）。

毛泽东是在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9 月版）里读到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的。此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选了纳兰性德的好几首悼亡言情之作。如《菩萨蛮》四首、《临江仙·寒柳》，毛泽东在这些作品旁边批道：“悼亡”，又在其《清平乐》（“风鬟雨鬓”）旁批道：“赠女友”。

《三垂冈》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在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时，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三垂冈》的诗，并请田家英代查一下诗的作者。晚年的毛泽东曾用这首诗中的“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句多少有些凄凉的诗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原因何在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1964年致田家英信（见董边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作品介绍】

《三垂冈》

严遂成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试　析】

《三垂冈》一诗系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严遂成，字崧瞻，又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雍正年间进士，他的咏史诗非常有名。有《海珊诗钞》传世。

《三垂冈》一诗是诗人路过三垂冈（今属山西省）时，有感于李克用当年用事而作的一首怀古诗。

三垂冈战役，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祐五年（908年），李存勖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万余人，俘获对方将领数百人。

李克用，原是沙陀人，他父亲原名朱邪赤心，曾帮助唐朝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赐名李国昌。李克用也曾帮助唐朝镇压起义军，封为晋王。

头两句是说李克用是沙陀族的英雄，他极力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反对朱温的篡唐夺权，但却无奈于朱温势力浩大，无奈于朱温的专横。李克用虽对唐王朝忠心耿耿，他却无力挽回其灭亡的命运。“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这两句紧接上句“奈何朱粱跋扈何”，是写李克用自己虽无力扶持唐王朝的统治，无力抑制朱温夺取帝位，但他还尚且能维持着自己的驻地。“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风云”，在这里指战争。在封建社会，社会时局动荡不安，战争此伏彼起，这里作者借变化莫测的“风云”指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帐下”，这里特指军营。在那动荡的战争年代，许多战将的后代，从小就跟随父辈生活在军营，有不少孩儿从小就显出他们的才

能，这里专指李存勖而言。“老泪多”，是指李克用悲伤自己已老，而感叹人生的兴衰。《新五代史·唐庄宗纪》：“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辞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克用死后，李存勖继立为王。公元907年，又败梁军于上党，过三垂冈，感叹说：“此先王置酒处也。”“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当诗人路过三垂冈时，秋风萧索，一派凄凉景色，诗人与李克用一样对人生的兴衰有着同样感受。“至今犹唱百年歌”，抒发出诗人自己对人生兴衰的感叹。李克用父子可称为一代英雄，虽然李克用曾镇压过农民起义，李存勖在历史上也以杀掠与贪财著名，但他们的有些作为毕竟是为了王朝的统一，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借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前面的信。

据专家分析，按照现存的《海珊诗钞》查对，毛泽东凭记忆写下的《三垂冈》与《海珊诗钞》中的《三垂冈》有两字不同，即第四句“连城犹拥晋山河”中的“犹”字在《海珊诗钞》中为“且”字；第七句“萧瑟三垂冈下路”中的“下”字在《海珊诗钞》中为“畔”字。但是，在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2第62则中，袁枚所引的这首《三垂冈》诗，恰好与毛泽东记忆中的一样，即将“且”字写作“犹”字，将“畔”字写作“下”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三垂冈》的；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和袁枚所见到的是同一种版本的《海珊诗钞》或收录了严遂成《三垂冈》诗的某种书。

《三垂冈》一诗毛泽东是很喜欢的，这从他读过几十年之后尚记得即可看出。诗写得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该诗的题旨，诚如毛泽东所讲的，是“歌颂李克用父子”的。

毛泽东对后唐的两个开国皇帝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很赏识。对李存勖在其父李克用死后，一举灭梁的战斗，毛泽东赞之“审机独断”。对历史上的这一战役，毛泽东说：“唐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通鉴记事本末》中记载：李存勖攻取大梁之前，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赞赏，曾对这一段字加了旁圈，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可见毛泽东对李存勖评价很高。

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自己的心情恰如“鼓角灯前老泪多”。不知是否在企盼着“风云帐下奇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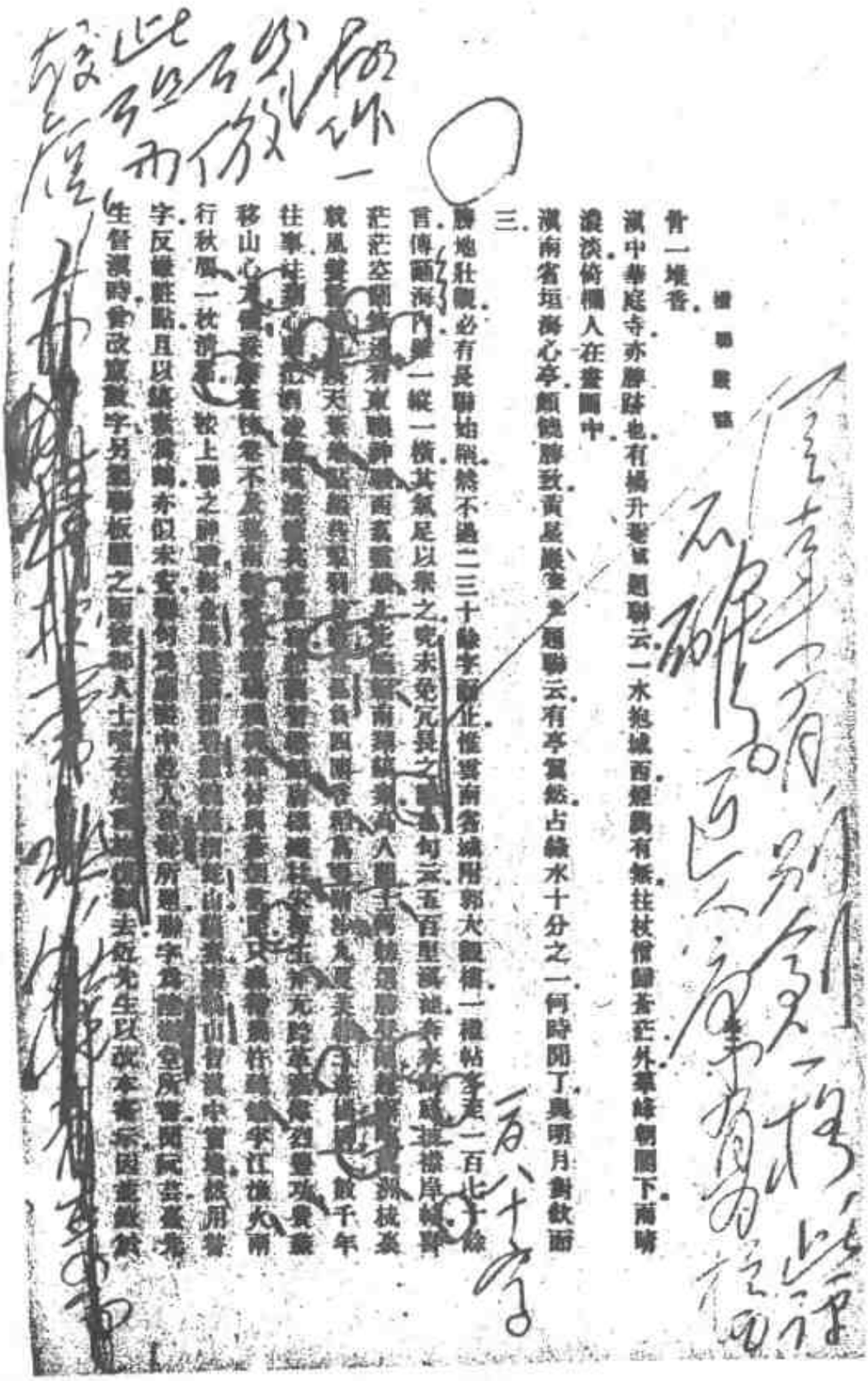
“昆明大观楼对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昆明大观楼对联，180字，气势宏大，对仗精巧，洋洋洒洒，开启长联之风。清人梁章钜在其《楹联丛话》中讥其冗长。毛泽东认为此说不确，赞扬此联从古未有，别具一格。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一百八十字。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毛泽东读《楹联丛话》的批语

——毛泽东读梁章钜《楹联丛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7－1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昆明大观楼对联

孙　髯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试　析】

昆明大观楼对联是清朝康熙年间孙髯所题。孙髯，字髯

翁，号颐庵，昆明人。学识渊博，擅长绘画，诗词文章也样样皆能。他题写在云南昆明大观楼上的长联，被人广泛称道。

毛泽东最初是在清版一本名为《楹联丛话》的书中读到的。《楹联丛话》的作者，是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梁章钜，字闳中，一字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喜作笔记小说，著有《文选旁证》、《浪迹丛谈》、《藤花吟馆诗钞》、《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等，以后三种楹联方面的书影响最大。《楹联丛话》在道光年间已出刻本，后上海会文堂出过石印本。毛泽东在读此书读到该联下一联的“叹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等句时，情绪激昂，颇受感染，在每个字上都划着圈。在“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等句旁划着曲线，每句末都划着两三个圈。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楹联丛话》平装本，毛泽东重读了这本书，并对这一长联和改动的地方作了圈划、标记，还写下了上述批注文字。《楹联丛话》的作者梁章钜说：“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颂海内。”毛泽东在旁边批道：“一百八十字”。看来毛泽东对此联读得非常仔细，还一一数了字数，纠正梁章钜“一百七十余言”的不甚准确的说法。

大观楼对联，上联描绘大自然的美丽景象，壮丽辽阔；下联回首数千年纷纭往事，感慨万端。气势宏大，对仗精巧，洋洋洒洒，开启了长联风气，故毛泽东评之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而不同意梁章钜所评的“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

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的评论，认为“此说不确。”觉得“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他还凭自己的记忆，在批注中写出康有为楹联的下联：“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

康有为晚年卜居杭州，1920年4月在游西湖时作了一幅对联，曾悬于西湖三潭印月御碑亭亭柱上面。这副对联的全文是：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觉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此联精练地刻画了西湖美景，流露出一种清静的心境，艺术品味较高，毛泽东欣赏推崇此联，恐怕是艺术上的。

清朝另一位著名学者在任云南总督时，看到大观楼长联后，给梁章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并“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后当地之人“啧有烦言，旋复撤去”。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将阮的改联也收了进去，“以质观者”。毛泽东对改联评价甚低，批道：“死对，点金成铁。”死对，即对得过死，境象平实而又重复，破坏了原联的境界，确实是“点金成铁”。现将改联列出，便于人们了解阮元是如何“点金成铁”的，改联为：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

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坞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夔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蘚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水，两行孤雁，一片沧桑。

从古到今，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了许多好“对子”，毛泽东在读到这些对子时，常加圈点。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巧对录》上有一则说：有一人徘徊溪畔，想到一联：“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流水去”，很久想不出下联来。他的朋友知道后替他对上：“孤眠旅馆，梦魂曾逐故乡来”。另有一则：“杨柳花飞，平地里滚将春去”；对道：“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还有一则说：有一位教书先生病重，守护他的两个学生在低声商讨说：“水如碧玉山如黛”，下联应如何对？先生听到后说：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说罢死去。毛泽东对这几则都加了圈点，还在天头上画着圈记。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读楹联，而且，在他外出巡视各地时，对悬刻各地的楹联匾额及历代碑刻都十分喜爱。

据介绍，1952 年 10 月，毛泽东游览开封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履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

录下来。

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评价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手轻托下颚，微弯的右臂背在身后，神态从容安详。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

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祠。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系赵藩游武侯祠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对联虽藏禅机，然不乏朴素的辩证法。

1960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

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便娓娓叙说开了：公元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佑党人"的牵连，遭章惇的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朋，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接着朗朗有声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继续讲道：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芾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崖壁，称"三绝碑"。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语重

心长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事后，陈洪新等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之重放光彩。（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如果说文学有"雅"、"俗"之分，毛泽东读书方面则雅俗皆取，兼收并蓄。通过对毛泽东对几幅楹联的批读，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书兴趣广泛，且十分认真，树立了一代思想家兼学者的形象。

《两般秋雨庵随笔》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较著名的笔记小说，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历史、经济、人物轶事和民间传闻故事等领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作为"闲书"来读，虽作消遣，亦从中吸取一些文化知识。

【毛泽东评点原文】

1972年9月，周世钊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

个字。

悼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1972年9月4日

——摘自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3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品介绍】

《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是清代梁绍壬撰著的一部笔记小说，凡八卷。

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年不详。其祖父梁履绳曾注释《左传》，以绩学有名乾隆间。梁绍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长而能诗工文，于道光年间考中举人，官内客中书。

梁绍壬一生到过许多地方，浏览了不少名山大川，“平生惯行役，南北东驱之”，这两句诗正是最好的写照。他曾到过北京，游过闽广，见闻广博，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些经历和见闻，无疑对他撰写《秋雨庵随笔》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两般秋雨庵随笔》内容庞杂，涉及面很广。大致有以下

几方面内容：

这部《随笔》记载了不少清代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事迹，如著名诗人、学者赵翼、袁枚和毛奇龄等。又如“扬州八怪”中的金农，“西冷四家”中的黄易和奚冈，以书法而闻名于世的梁同书（山舟学士）等，都是很有造诣的画家、篆刻家和书法家。这些轶闻材料、故事对后世的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卷二《毛西河》条记载云：

西河先生（毛奇龄，笔者按）凡作诗文，必先罗书满前，考核精细，始伸纸疾书。其夫人陈氏，以先生有妾爱殊，心尝妒恨，辄詈于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猢狲祭乃成。”先生曰：“凡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后生小子，幸仿行之，妇言勿听也。”又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图右史，兼住夫人，中为会客之所。先生构思诗文，手不停缀。质问之士，环坐于旁，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盖五官并用者。……

从这则记载来看，我们对毛西河（奇龄）的写作态度、读书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关系都有所了解，知道了他是一位极聪明的学者和诗人。

《随笔》在诗文评述、论学考证方面的篇数比较多。有些看法，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也值得称道。如卷三《漱玉断肠词》条，对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朱淑贞的命运就表现出相当的同情，与传统文人的偏见和诬蔑之辞大不相同。他认为“改嫁本非圣贤所禁，《生查子》一阕亦未见定是淫奔之词，此与欧公簪钱一事，今古聩聩辨论，殊可不必。”对于民间歌谣，梁绍壬也给以极高的评价。如卷四《山歌》条，他引录了一首

民歌，“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的梳个盘龙髻，小的梳个杨烂头。”认为这首山歌“极有意义”。对吴船山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和童谣“塘下戴，好种菜……摘了大姑摘小姑”等，评之为“音调悲惋”，“音节真如古乐府”。这些见解都是难能可贵的。

《随笔》的作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戏曲、小说资料的搜集。如本书中提到的《长生殿》、《封神传》和《隋唐演义》等，这对后人研究这些作品大有裨益。

《随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虽然涉及不多，但还是有一定的反映。绍壬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夕，对于鸦片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也有部分论述。如卷四《鸦片》条。详细论述了鸦片的分类、贩卖情况、数量及价钱等。作者还写了一首《鸦片篇》诗，表示了愤慨。对于民生疾苦，梁绍壬也表示了一定的关心。如卷四《三江赋重》条，对封建王朝（宋元明清）重税压榨东南一代人民的情况作了较为合理的分析。这些材料对历史研究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当然，《随笔》有相当数量的内容属于毫无意义的消闲之作，反映了封建文人的艺术趣味。少部分内容不太健康甚致反动，如宣扬封建迷信、污蔑农民起义等等，这是我们阅读时应特别引起注意的。

本书版本较多。有道光十七年钱塘江氏振绮堂刊巾箱本，光绪十年钱塘许氏吉华室重刻本，光绪十八年兰溪铜活字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34年上海启智书局铅印本等。

【试　析】

毛泽东一生读书范围是非常广博的，举凡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哲学之类他读得很多，写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心得，即如明清的文人笔记，他也非常爱读。《两般秋雨庵随笔》即为其中一部。对于这部《随笔》，毛泽东在1972年9月4日送给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惇元）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字样，显然，毛泽东是把这部书作为"闲书"来阅读的。

对于这部书，毛泽东没有作过多的评论。他只是在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条目下作过一条具体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

至于毛泽东说"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因他没有具体所指，我们也很难说哪些条目"不太好"，哪些条目"还有味"。既然毛泽东把它作为"闲书"来消遣，也让他的老朋友周世钊如是读，其中必有一定的原因。为什么毛泽东在1972年将这种"闲书"赠给周世钊，说来话长。

毛泽东与周世钊（惇元）1913年一同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同班学习，次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仍在同班学习，而且情谊甚笃，一直到1918年毕业，同学长达5年半。

周世钊在第一师范毕业后，蒙王季范的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而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919上4月，毛泽东突然到修业小学找周世钊，并由周介绍，

在修业小学教历史，每周6节课。在共同的事业中，两人的友谊更加纯挚笃诚了。

后来，由于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于1927年上了井冈山，而周世钊仍继续从事教书的职业。两人一别就是23年。长沙和平解放后，毛与周先有电报往来，再有书信联系，两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彼此以诗歌唱和，又互相赠书。

周世钊在长沙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1958年7月，周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周对纷繁复杂的人事纠纷有些不太适应，工作上也有畏难情绪，曾写信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理。毛泽东复函周世钊，并加以鼓励，使周在工作上得到了不少帮益。

1966年，一切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周世钊有些徬徨，是袖手旁观、坐视事态的发展？还是火上烧油？抑或以老朋友的身份直言相劝？

周世钊对此甚不理解。他曾向毛泽东陈书，请求面见。但毛泽东复函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但后来，周世钊还是去了北京，而且，毛泽东与他还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促膝谈心。周对红卫兵抄他家时搞乱了他的藏书很感可惜痛心，大约也多少流露出不满之意。毛泽东听了周的陈述后，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当周世钊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时，毛泽东又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回答说：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这一席谈话，诚挚隽永，而且含义深远。

以后周世钊又到过北京。但无论形势怎样发展，毛、周之间的同窗之情始终未断。1972 年这次进京，呆的时间较长，不免动了思乡之情，毛泽东知道后，便赠《两般秋雨庵随笔》一套，线装，共八册，以使周作为消遣之用，保持心情平静。

赠书虽是小事，但体现出伟大领袖与一介书生之间半个多世纪的真诚友谊，也体现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情。（霍现俊）

《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国际斗争的故事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对于政权是否稳固以及阶级斗争问题极为敏感。他向身边的领导干部推荐《东周列国志》，就是要以史为鉴，告诫全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毛泽东评点原文】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

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作品简介】

《东周列国志》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共108回，比较全面地演绎叙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间列国争斗的大部分历史故事。虽然有少量虚构情节，但材料基本依据史实，成为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

关于《东周列国志》的著者，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根据元代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平话本，撰写了《列国志传》，共8卷226节，开始于苏妲己驿堂被魅到秦并于天下。到明末，冯梦龙根据史传，对《列国志传》进行删改，删掉一些民间流传故事，改编成《新列国志》，共108回，起自西周王世末，平王东迁。到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些删改，并加上评点、批语等，改为《东周列国志》，起于周宣王闻谣轻杀，到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二百年来流行较广的就是蔡元放的本子。

《东周列国志》以文学形式再现了我国古代一幅历史画卷，反映了春秋战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各诸侯国内部政权争夺、更迭以及各诸侯国之间激烈的争斗、兼并。前半部分主要是反映了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翁、楚庄王五霸之间的争斗；后半部分则主要反映了战国时期秦、楚、齐、魏、赵、燕、韩七雄间的兼并战争，最后演进为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秦朝。其中充满阴谋、强权、弱肉强食。作者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将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贯穿起来，进行文学加工，其中许多故事曲折生动，寓意深刻。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得褒姒一笑的千金买笑的故事；越王勾践为雪灭国耻辱卧薪尝胆的故事；荆轲孤身刺秦王图穷匕首见英勇献身的故事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许多的四言成语也源于这段历史，如“一鼓作气”、“退避三舍”、“毛遂自荐”、“卧薪尝胆”等。当然，由于过份拘泥于历史记载，也影响了其文学价值。

【试　析】

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最喜欢读的有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如《东周列国志》就不止读了一遍。毛泽东原来是从不看小人书的，但1960年有人送了他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小人书，看后很感兴趣，从此看小人书就上了瘾，一看就是几百本，由此也促使他重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

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了《东周列国志》，说：“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认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

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提到：“《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几次提到《东周列国志》并向其他领导干部推荐呢？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读古书的特点，联系一下我国当时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导师和政治领袖，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来理解评述其内容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少新鲜的见解。读《东周列国志》亦如此。

如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这些文字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即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这部历史小说缺陷的评点。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更多地把小说当做历史来读，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自己制定治国的大政方针提供依据。《东周列国志》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因此毛泽东很重视它的真实性，并根据《左传》进行核对，认为它和历史史书记载是相符的。正因如此，《东周列国志》中各诸侯国内部各种势力为争夺政权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各诸侯国间彼此争斗，大国争霸吞并小国的场景对毛泽东来说印象

更为深刻，触动更大。

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来领悟小说的内容和意义时更具有政治性，也更容易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思考问题，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因此读书时也更关注历史上各朝代，各国的兴盛衰败及其前因后果，更侧重小说中的政治斗争谋略，推崇郑庄公，认为他在斗争中很有策略，很厉害。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想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为现实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在谈《东周列国志》时使用了纯属个性化的术语“颠覆”。说小说里边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并说明他再读一遍《东周列国志》的明确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其“怎么个颠覆法”。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同他对当时中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1956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认识上“左”的错误。

从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在内部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中央为此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从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场大战，战场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随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并造成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沿“左”的方向不断发展，修改了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1958年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展开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掀起共产风、浮夸风。不仅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到破坏，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为使领导同志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解决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还把读这本书列为了会议上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中的头一个，并准备在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或者是干部轮训。但由于会议后期，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使本来是纠“左”的错误变成了反“右”，冲击了读书的安排。直到反右高潮过后，到1959年冬，中央重新强调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读书，逐章逐节，边读边议。

庐山会议是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使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扩展到政治、思想、理论等方面，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认为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强进攻的时候。还说彭德怀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

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更促使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加重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

1958 年 7 月起，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小金门、马祖的蒋军不断炮击我沿海村镇。美国则加强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支持蒋介石的行动，并向我军进行军事挑衅，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对此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活动，从 1958 年夏开始，炮击了金门、马祖。

1959 年 3 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达赖喇嘛等人潜往印度。虽然中国政府很快平息了叛乱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美国等帝国主义妄图搞“西藏独立”的阴谋昭然若揭，使得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颠覆活动倍加警惕。

当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颠覆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国家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错误也日益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苏两党间的大论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对斯大林也进行了一番不很公正的评价等。由此中共和苏共就这些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双方展开了讨论，不断交换意见。但因苏联大党主义作祟，对于不听他指挥的中共和毛泽东非常不满，使中苏两党关系出现紧张。1958 年 7 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海军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毛泽东为捍卫国家主权，严辞拒绝。但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1959年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的大规模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前提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各种合同，撤走在华专家，终止经济合作，停止继续向中国提供资料和关键部件、设备等，使中苏论战急剧升级。此后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原本只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常争论和分歧，演变成一场大论战，并扩展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方面，最终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断，也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

中苏大论战的爆发，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作法，使毛泽东更加警惕苏联的“修正主义”侵蚀，随后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修、防修”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可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国际斗争形势，使毛泽东更多的考虑到如何防止中国被帝国主义颠覆，防止中国变修。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国家的领导干部，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掌握治国的方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一再提到《东周列国志》。

毛泽东阶级斗争意识很强，多次提出，必须警惕西方帝国主义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进行颠覆活动。可见，当时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但也因为不切实际地夸大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的阶级斗争形

势，认为苏联已变修，中国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发动了从反修防修目的出发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这个教训是要吸取的。（崔彩文）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现实的黑暗，必将引起人们的激愤。但小说不同于历史实录，它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具普遍意义。然谴责小说暴露黑暗每止于现象、罗列事实，深度不够，缺少理想。政治性强，但艺术性低。这些作品，与毛泽东的审美标准大异其趣，这是他不喜欢读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评点原文】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

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摘自毛泽东1962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末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摘自毛泽东1966年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作品介绍】

《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另外两部是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谴责小说的名字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云：“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颇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此言极是。当时一些作家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既不满现状又找不到出路，便拿起笔来从事小说创作。这类小说多在报刊上刊载，揭露社会黑暗，指责政治腐败，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暴露每止于现象，深度不够。作品中有联缀话柄的情况，虽然受西方小说影响，运用了一些现代小说手法，却不够成熟。这一时期的谴责小说特别兴盛，据统计有1500余种。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李宝嘉。李宝嘉，又名宝凯，又名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二春居士等。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生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晚清最早的谴责小说家。

李伯元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出生于山东，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皆随其伯父李翼清在山东度过。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李伯元才随伯父返回原籍。次年，他以第一名考中秀才，补廪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后编辑或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与梁启超主编《新小说》、吴沃尧、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等。其主要著作有：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

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弹词、戏曲《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等。

从政治思想上看，李伯元鄙弃科举仕进，揭露官场的黑暗，要求改变社会现实，追求进步，明显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但是，其要求改良的步伐是很缓慢的，改良的幅度是很小的。他在《文明小史》中借姚士广的口提出所有的兴造、所有的革除，都应潜移默化，万不可急切从事。他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甚至认为康有为的变法也是“过激”行为。显然，李伯元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在有先进一面的同时，还有其落后的、保守的一面。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早的一部小说。此书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编，每编十二回，共60回，近80万字，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1906年，繁华报馆刊行单行本，前有茂苑情秋生欧阳巨源序。

《官场现形记》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和腐朽，着力描写了清官场的贪污腐败和形形色色的媚外卖国丑态及对人民的残酷迫害。

小说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在作者的笔下，上至军机大臣、大学士，下至州县吏役佐杂，无不“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为了钱，他们可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如第三十一回写田小辫子买官时说：“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真是官场就是商场，官职已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成了特殊形式的商人。官员们无论到哪里，干什么事，皆是一个目的：“千里做官只为钱”。河南按察使贾筱

芝，赴任之初打着“平反冤狱”的旗号，但结果是“一百起案件，倒有九十九起不能断结”，其目的便是从中敲诈财物。作者借一位相士的口说：“姓贾的这杂种，面子说要做好官，其实暗地里想别人家钱，这样的狗官真正害人。”（第二十二回）。小说第十八回写皇帝派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案件时明文交代：“这趟差使原是上头有意照应他，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出去，好叫他捞回两个。”于是，这位钦差大臣到地方办案时，便采用“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想方设法勒索财物，得到两万两银子的贿赂，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拿得出钱的”，“就是得点处分，也不过风流罪过”；“至于那些拿不出钱的人，钦差自然不肯拿他放松”。

官场上不仅见钱行事，而且个个生活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简直是腐烂透顶。冒得功为了得到一个芝麻官，竟用极端下流的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儿去做羊统领的小老婆。成亲之夜，他跪在房门外边，见到羊统领说：“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帅。难得老帅赏脸，沐恩感恩匪浅”。第二十三回写贾集台断案，见到女犯长得漂亮，“虽不致魂不守舍，然而坐在上头，就觉得有点摇晃起来”。

贪官污吏为非作歹，鱼肉乡民，无恶不做。小说写浙江胡统领相华若去严州剿匪，一开始，胡统领得悉让自己去剿匪，非常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官员和军队一路上花天酒地。到严州后，打听到天州本没有“匪”，但为了邀功请赏，一方面伪造情报，把匪情说得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又以剿匪为名，把军队带到乡下，所到之处，“搜掠抢劫”、“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当老百姓受不了

官兵的迫害，赴州衙告状时，知县又加以刁难、诱惑、欺骗。他强迫百姓把官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一齐推到土匪身上”，并要上呈公文感颂胡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的“功德”。官官相护，上下勾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在人民面前是作威作福，可是在洋人面前却是奴颜婢膝、丑态百出。如第五十三回写文制台接见洋人一段颇精彩：巡捕拿了一张大字的片子去两红文制台那里去禀告，但心里一直犯嘀咕，“只得站在廊檐底下”，就是不敢进去，因为文制台一到任，“就有过吩咐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或是下属禀见，统通不准巡捕上来回”。但这一次非同寻常，是洋人来见。正在巡捕为难时，文制台看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刚答完话，脸上就被打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是被斥骂，又是被踢了一脚。此时，巡捕索性泼出胆子，说出是洋人来访。文制台一听是“洋人”二字，“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愣了半天，随后对巡捕又是一耳光子和一脚，直打得巡捕晕头转向。这前后两耳光和踹两脚，逼真地刻画出了文制台对内颐指气使，对外崇洋媚外的丑恶嘴脸。再如第五十五写总兵肖长贵迎接洋人，肖长贵一再强调：“外来的带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咱们都要按照做属员的礼节去见他”，应跪在地上。别人都去登舟迎见，只有肖长贵一人直挺挺地跪在岸上，“双手高捧履历，口拉长腔报着自己的官衔名字”。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它继承了《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的一些手法，如通过人物言行矛盾的自我暴露，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写文制台见洋人，通过文制台先后两次打骂人的描写，使他那一副内心十分惧怕洋人的丑态

栩栩如生。

其次，《官场现形记》还经常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如写方必升听到别人的儿子中了举人，就急得老病复发，痰迷心窍。他训勉儿子要致力于科举功名，突出写他的“痰”的变化。一会儿他“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一会儿“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一会儿“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这些都是随他儿子对科举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听到儿子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这里采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方必升希望儿子科举成名以致神魂颠倒的状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作。

吴趼人，原名宝震，又名沃尧，从其父名吉取字小允，初号茧人，后改趼人，因祖居广东佛山而又号我佛山人，笔名有趼、偈、怫、茧叟、趼廛、趼人氏、检尘子、野史氏、老上海、老少年、趼廛主人、抽丝主人、岭南将叟等。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清宣统二年（1910）。

吴出生于北京，两岁时随父南归，跟着母亲在佛山长大。18岁时离家赴沪谋生，曾在江南制造局做抄写工作。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吴趼人进入办中报生涯。先后主笔《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聘，赴鄂。1904年，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不久，他主动辞去报社职务，回到上海，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1906年，主编《月月小说》杂志。1907年，创立两个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后病死于上海。

吴趼人是一个高产作家，为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30多种，现存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从1903年10月起，陆续刊发在《新小说》杂志上。后由广智书局从单行本行世。此书从1903年开始创作到1909年最后完成，前后长达7年时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小说通过九死一生（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揭示了封建社会即将崩溃时期整个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

该书着意暴露了当时官场上的千奇百怪的丑恶现象，共记载了189件“怪现状”，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暗。如第十四回写清末海军畏惧帝国主义，“兵轮自沉”的丑闻：

“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惧，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益惧，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舢板渡登彼岸。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刻闻上峰将彻底根穷，并劾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

清兵个个成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未见敌就先狼狈窜逃。

在作者的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个个都是卑鄙无耻的家伙。如五十回中九死一生这样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就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

什么“仁义道德”，全是骗人的鬼话。九死一生的伯父平

时道貌岸然，对人大讲孔孟之道，可是他竟乘料理丧事的机会，用可耻的手段骗去九死一生家八千两银子，置九死一生于穷苦潦倒而不顾。莫可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他“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卖为娼。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由许多短篇联结而成的，而这许多故事又都由九死一生这条主要干线贯穿起来的，在结构上比较严密，优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但由于题材剪裁不精，情节没有提炼，人物形象缺乏典型化创造，因而给人们的印象是“话柄”连篇。

【试　析】

“谴责小说”之名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头几年。因这类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少理想的光辉，故名。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和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两次谈起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这些原著。

毛泽东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是“只揭露黑暗”，“给人的印象不好”，“人们不喜欢看”，“反对革命”。我们可以从三个

方面来理解他的含义。

(一) 这些小说对晚清的官僚集团，作了比较全面揭露，对黑暗糜烂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如《官场现形记》，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卑鄙龌龊之事都能做得出来。第二十五回，写贾大少爷托黄胖姑买缺时，黄胖姑说："一分钱一分货。你拼得出大价钱，就有大官做。""这个买卖我们经手也不只一次了，如果是骗人，以后还望别人来上钩吗?"官爵已经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这些人一旦官位到手，便残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又是那样的卑躬曲节，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官场现形记》反映的内容要广泛，全书记载了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作者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这些作品，是清末官场的一幅形象的黑幕图。

作者是满怀愤激的情绪，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毫不留情地进行谴责。作者笔下的晚清社会，仿佛已经彻底烂掉了。漆黑一团，不可救药。虽然说，这些小说在抨击时弊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暴露过多，黑暗太甚，激起了人们的忧愤，但却使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不能说作品中没有清官，然而这些清官，在作者眼里看来，他们比贪官更厉害，更可恨。《老残游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议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

凡几矣。”玉贤、刚弼之流在作品中以“清官”自命，朝廷也以“清官”誉之，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清官”对社会的危害比一般贪官污吏更为严重。玉贤视百姓如草芥，“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一年来，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还用板子活活打死。在玉贤的虐政统治下，曹州成了地狱世界。而被称为“瘟刚”的刚弼，也以“清官”自诩，自命不要钱，实际则滥用严刑，屈杀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但这样的酷吏都能受到清王朝的重用。毛泽东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句插话，说：《老残游记》里讲，清官害人比贪官还厉害。看来，毛泽东对老残的这段议论，印象是颇深的。

谴责小说最致命的弱点就在这里，似乎社会黑暗到没有一线光明和希望。在此之前，毛泽东对《金瓶梅》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二）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政府主义范畴属于改良派。如果说，在戊戌运动变法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蓬勃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他们最害怕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对于人民的革命力量，他们害怕得要命。如李伯元，他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渡”行为，显然，他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的。吴沃尧（趼人）在1907年以前，思想较为进步，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后期则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

场。至于刘鹗，基本上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洋务派的立场上来挽救封建统治的，带有明显的反动倾向。刘鹗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里，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治见解。他把国家比作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一只帆船。船上有四种人：掌舵的、管帆的隐喻清廷统治者，他们并没有错，所缺的只是一个罗盘。第二种人是管理的水手，隐喻中下层官吏，他们正在搜刮乘客的钱财，是作者抨击的对象。第三种人是演说的，暗指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党，作者鼓励人们把他们抛下海去。第四种是乘客，暗指一般老百姓。其中赞成革命的人，被作者骂为不懂事，受人“利用”；而那些反对革命的人，作者认为他们老成持重。除此外，刘鹗还通过作品中的黄龙子大骂“北拳南革”（指义和团和孙中山，笔者注），骂革命党为“乱党”、“妖妇”，义和团为“疫鼠”、“害马”等等。鉴于此，所以，毛泽东说谴责小说“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这样的评价中肯而深刻。

（三）艺术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其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是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是鲁迅先生对谴责小说的批评。这里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分夸张的描写；二是大量堆积、不加取舍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

谴责小说的作者，意欲步《儒林外史》之后尘，但在实际的创作中，由于题材庞杂，缺少剪裁，结构一般都不够严谨。又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但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摹写一连串丑恶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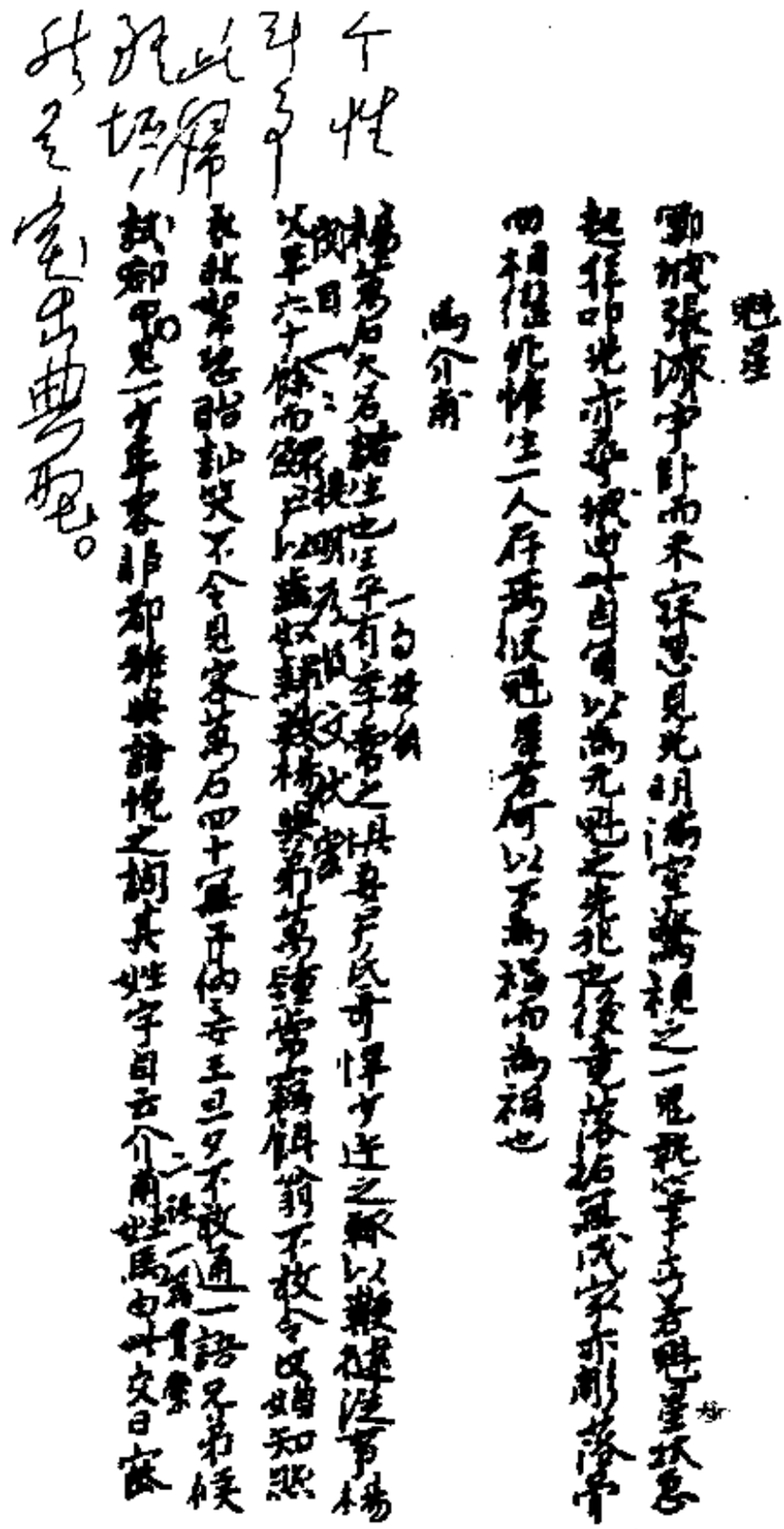
象，比起《儒林外史》，就显得有些浅薄，不能从本质上进行深刻、彻底的揭露。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看，许多语言和情节直来无碍，根本谈不上什么蕴意和意境。如九十九回写道："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些，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等等，类似这样的语言，充斥全篇。至于意境较佳者，如《老残游记》中老残在黄河岸上望月的那段心理指写（第12回），白妞说书（第2回）等，则是不多见的。这也正是人们不爱读、不喜欢的主要原因。所以，毛泽东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认为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还是可以一读的。

《聊斋志异》借鬼狐说教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写的一部描写鬼怪的小说。毛泽东不同意鲁迅将它归于"怪异小说"的说法，而把它归为"社会小说"之列。毛泽东从这些妖神鬼怪中看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毛泽东评点原文】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批语

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摘自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萧三《窑洞城》，《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引者注）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5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介绍】

《聊斋志异》为山东淄川人蒲松龄所著。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室名聊斋，世称聊斋先生。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家道小康之家。他十几岁应童子试就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名籍籍诸生间"。此后，屡应乡试不中，直到七十一岁才熬了个岁贡生的科名，不几年去世。

他怀才不遇，一生遭遇，既有生活的困苦，"久典青衫惟急税，生添白发为长贫"；又有科举的失意，"骥老伏枥壮心死，帖耳嗒丧拚终穷"。康熙十八年春，将其篇章集为《聊斋志异》，在其《自志》结尾有一段低沉的咏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案冷凝冰，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然。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其实，《聊斋志异》的著述凡四十余年，实乃蒲翁大半生经营、积累而成。

《聊斋志异》并未做最后编定，而是装作八册，藏稿于家。生前死后有友人传抄，曾在山东做过数任知府的郑方坤将一部

抄本带回原籍福建，才得以在蒲翁过世半个世纪后于浙江睦州

蒲松龄画像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的山东籍官员刊行，遂风行天下。这部青柯亭本是经过编选，删掉了所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四十八篇，并修改了许多触犯时忌的语句。60年代初，张友鹤取所见诸本会校会评会注，整理出《聊斋志异》三会本，收齐了全部篇章，堪称目前最佳最全之读本。

《聊斋志异》凡四百九十余篇，内容非常驳杂，写作方法也多种多样，从社会意义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审视，良莠不齐。就文体而言，纪晓岚曾讥其：“一书兼二体”，既记述见闻，又随意装点；既有简单记述奇闻异事的短章，如六朝志怪书之粗陈梗概者，又有唐人传奇式的记叙委曲、摹绘如生的篇什。优秀的自然是属于后一类作品。实际上，正是这些无依所据、完全或基本上出自作者虚构的篇章，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最足以代表《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体现着它出于六朝志怪书和唐人传奇而胜于六朝志怪书和唐人传奇的文学特性。

《聊斋志异》题名“志异”，自然是如鲁迅所说，“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从小说情节看，绝大部分篇章具有程度不同的超现实的虚幻性。有的是人入幻域幻境，如“画壁”、“罗刹海市”、“梦狼”、“席方平”等；有的是狐鬼花妖精魅化入人间，如“莲香”、“画皮”、“陆判”、“葛巾”、“素秋”、“黄英”等，中间亦有人、物互化的情节。有些篇章基本上是写现实人生的，如“张诚”、“四七郎”、“乔女”等，自然也少不了羼入一些虚幻之笔，在现实生活的图画中涂抹上些许奇异的色彩。从这个角度自然可以说它与六朝志怪书同伦。由于它的许多篇章，“描写委曲，叙次井然”，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刻画，狐鬼花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又有别于六朝志怪书之“粗陈梗概”，而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人传奇相类，所以鲁迅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拟晋唐小说”，总括其特点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其实，这中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聊斋志异》之“志怪”，与六朝人之“志怪”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六朝人之“志怪”恰如其名，是搜集、记述“怪异非常之事”，同当时人记述世间平常之事都是当作曾经有过或发生过的事情记述的，只是所说之事有“非常”与“平常”之不同，而不是有意识地作小说。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声明：书中采自前代典籍者名有“失实”，非其本人之罪，“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而蒲翁是有意识地编撰奇异的故事。他的故事是寄托情怀，用他在《自志》中的话说，是“遄飞逸兴”，“永托旷怀”，期望于读者的不是信以为真，而是能领会其中的意蕴和情趣。

唐人传奇自然已是“有意为小说”，与记述奇闻异事“未必尽幻设语”之六朝怪书大不一样。明人胡应麟早已揭明了此点，鲁迅亦作如是观。但唐人传奇在发展中一度转向，有的作者从志怪中流离出来，去写人间事，并不加虚幻成分，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皆成佳作；而拘守志怪者，特别是后期作传奇的，仍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不甚考虑有所用意。传奇之名称便由此而得，乃至带贬意。象“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以及“假小说以排陷他人”的“周秦行纪”等假幻设以寓意的作品比较少，没有成为创作的主流。而《聊斋志异》较之唐人传奇有了巨大的飞跃，假幻设以寓意成了他创作意识中的主导原则。但他并不放弃、放松对作为小说的情节层面的追求，力求写得瑰丽奇伟，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那是为了使他的作品更有情趣、更富有神话般的艺术

魅力，更有文学的欣赏价值；而更深层，更为根本的目的却是在于表现他的现实感受、经验、生活情趣，或精神上的向往、追求。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志怪”成为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思想意蕴的载体，也就带有形式的性质。有的批评家称这种小说情节为“内形式”，就是因为在它们的深层还寄寓着某种意蕴。

《聊斋志异》谈鬼说狐，大都有题旨，有所寄寓：《劳山道士》讥刺好逸恶劳、心术不正者妄求道术，到处碰壁；《画皮》讽喻世人勿为化为美女的恶魔的假象所迷惑；《梦狼》借一位老人的梦境比喻封建官吏如吃人的虎狼；《席方平》假司阴写人间官场上贪贿暴虐等；《黄英》写菊精黄英与马子才婚前婚后的矛盾：黄英善菊艺货菊，发家致富。而马子才以陶潜自况，安贫自守，尽力抵制，结果是无法抵制住，最终不得不合流，这显然是揶揄了封建时代文人们轻视工商、以谋利为耻的传统观念；更为人称道的是《公孙九娘》，写莱阳生入鬼村与鬼女公孙九娘的姻缘：作者曾耳闻目睹发生于山东田东部的这一惨案，它是有感而作，写鬼时鬼事，实是谱写时事，为死于清政府的屠刀和酷刑的人们一掬同情之泪，个中也蕴蓄着作者不敢明白说出对官府、朝廷暴虐的微词。

《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是，它的许多篇章都融进了作者的经历与遭遇，特别有名的是以下三篇。写于早期的《叶生》篇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遇，困于名场”。叶生抑郁而死，却死不瞑目，仍以幻形留在世上，将生前拟作的制艺传授给知己者之子，此后生连试皆捷，进入仕途。同样的制艺结果不同，叶生解释他的行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即考试失败并

不认输，死后要为文章争口气。话虽颇气壮，然骨子里却是无可奈何的悲哀，只是聊以自慰而已。作于中期的《司文郎》，其核心情节为有特异功能的盲僧人，凭嗅觉辨别几位士子的文章之优劣。最精彩的是盲僧人说的两句话："仆中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讥刺考官糊眼冬烘，一窍不通，真是辛辣之极。这一类文中大都表现着、隐含着作者的心境、心态，前后不同时期的作品还反映出其思想情绪乃至作品风格的变化。

它的另一特点是在短篇小说体裁、艺术表现方面的创新、探索。他是一位在艺术表现上有所追求的作家，正如他曾在诗中自称所从事的是"狐鬼事业"。前人曾评之为"文之矫变，至此极矣，更有的将他的《王宁》直呼为"性格小说"。

总之，正如有的批评家所云：《聊斋志异》在短篇小说（不只是志怪一类）创作的表现艺术方面，有多方的开拓，胜过中国古代的所有短篇小说作者们创造的总和。

【试　析】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与文艺界人士畅谈《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据萧三回忆，1939 年 5 月 5 号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特来专诚拜谒。"萧三说："真不敢当。"他请毛泽东进他的住房——山下空坪新盖的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没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和萧三谈话。他们谈了些文学的问题，谈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

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毛泽东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毛泽东问萧三，苏联对《聊斋》有什么评论。萧三说，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张只付给五个卢布的报酬。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四月下旬的一天，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姚时晓、曹葆华、严文井等，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吃完午饭，继续交谈。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他举出其中一篇题目叫《席方平》的，说那篇就可以作为史料。毛泽东还讲了《聊斋志异》的其他优点。毛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毛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对大家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

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变，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毛泽东赞扬《聊斋》"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原因大概是因为它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且将妖狐人格化，把鬼神世界社会化，以此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超现实世界中的超现实的力量，以惩恶扬善，反映、表现作者的理想。所以毛泽东不同意鲁迅将它归于"怪异小说"之列，认为鲁迅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强，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花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通过文学作品去透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面貌，是毛泽东阅读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他以一种理性的执著的史家眼光，有意识地去发现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聊斋》中有一篇名为《席方平》，写东安人席方平为屈死的老父席廉赴冥府申冤，他先是寄希望于当权派城隍、郡司和冥王，"抽笔为词"，喊冤以报，但后来事与愿违，虽几经冒死相争却均告失败。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只落得个"阴曹暗昧尤

甚于阳间”的无限感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鞭笞了封建朝政的腐败与官场的黑暗。毛泽东认为《席方平》是一篇很好的史料，并进一步指出：“《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对《聊斋》中体现“民主性”的作品，毛泽东很感兴趣，而且给予肯定和评价。《聊斋》中的《小谢》篇，写一个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知书明理，从而使小谢、秋容由敬慕而爱恋陶生。当陶生受冤入狱时，她们拚死相救。某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了陶生与小谢、秋容的结合。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美丽、聪明而多情，对封建礼教抱蔑视态度，积极主动地去争取美满的爱情。毛泽东读后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像《小谢》这样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它们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愉悦的感受。1942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和鲁艺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位教师的谈话中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

毛泽东不仅读评《聊斋》，而且还善于运用《聊斋》这样的文学作品，指导影响现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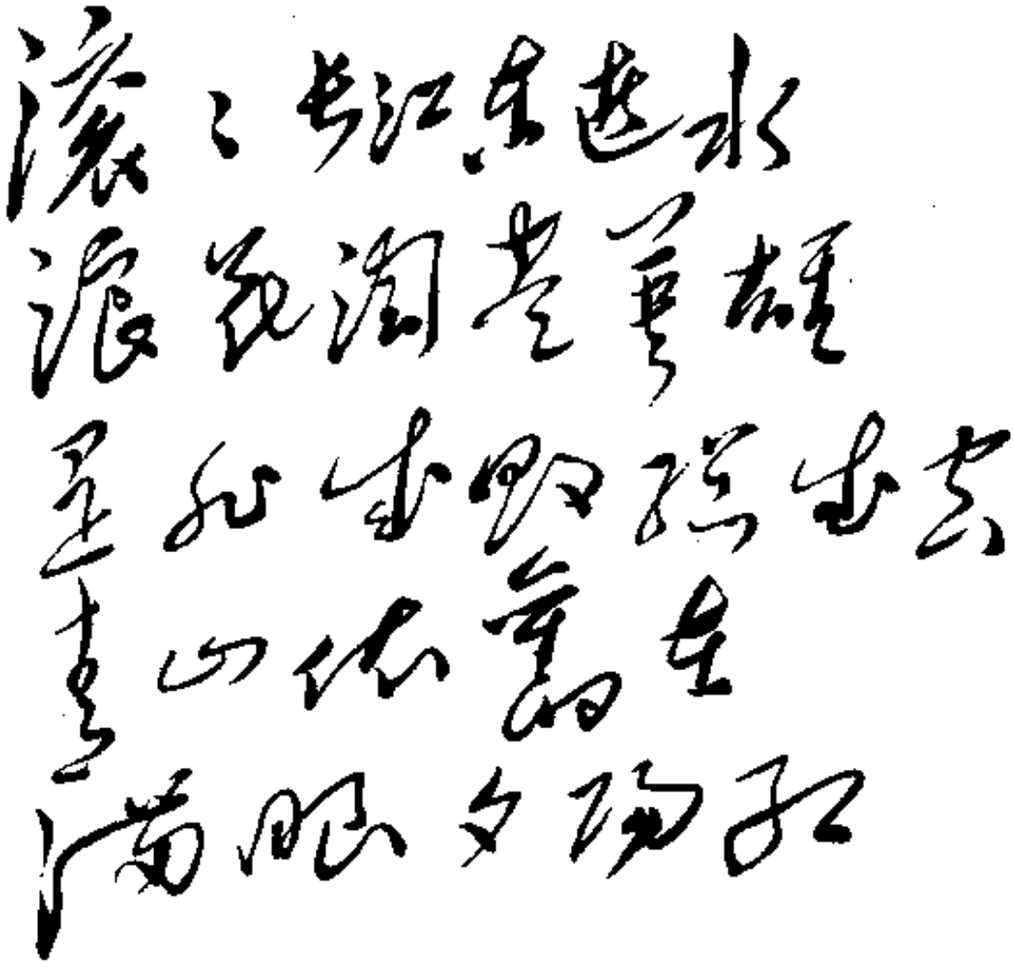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毛泽东最早获取军事斗争知识靠的不是军事理论专著，而是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他从中读历史、读军事，体味文化意蕴，并用它来解决纷繁复杂的许多现实问题。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
（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手书《三国演义》中的诗句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

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三国时代，曹操率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作品介绍】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末有名之为《三国志传》的，清初人省称《三国志演义》，近数十年来，又省称《三国演义》。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以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

现在一般称《三国演义》的原作者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但在罗贯中以前，三国的人和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且各阶层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了艺术创造，这说明，它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罗贯中只不过是它最后的写定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的很少。明初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

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卒年约为1385年。另据别的材料，有说罗贯中名本，字贯中，或说他叫罗本贯，字贯中的。关于他的籍贯，除太原说之外，还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县）、杭州诸说。他的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现存杂剧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但不太复杂，代表性的版本有四种：

①《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为明嘉靖壬年(1522)所刊。全书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尚未分回，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②《三国志传》，一般称“志传体”。有学者认为，可能为罗贯中原作。

③《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般称“李评本”。共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中有眉批、总评。

④《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伦、毛宗岗父子评改本。这个本既保持了原有的思想内涵，又强调了正统思想，艺术水平有所提高，成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的本子。

《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内容是写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活动。它所包含的历史框架，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写了一百十三年的历史。字数近90万。作者

通过这些故事，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或明或暗的种种斗争，以及三国之间众多的军事斗争，其中包括历史上若干著名的战役。

罗贯中是依傍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撰写此书的。所叙的历史顺序，大体上又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这就决定了其"拥刘反曹"的基本倾向。全书显然是比蜀汉为中心，而以刘、关、张、诸葛亮等作小说的中心人物。从情节的安排上来看，全书一百二十回，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的事只用了十六回就草草结束。形成"拥刘反曹"这种状况有比较长远的、复杂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也有作家主观思想的原因。

《演义》是以蜀汉作为正统，以刘备集团作为主要的歌颂对象。其实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原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但人民也深受其影响。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内容简单地归纳为封建正统观念的表现。如果说刘备仅仅因为是"汉室宗亲"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作者赞美的话，那么，在《三国演义》里，对于汉桓帝、汉灵帝以及所谓"汉室宗亲的刘表、刘璋之流，作者为什么就不那么十分尊敬？看来问题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实际上，《演义》的作者之所以反对曹操，也并不完全因为曹操曾经"篡夺"汉朝政权。它们正是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点来"尊刘贬曹"的。曹操和刘备都是封建英雄，但曹操比刘备更坏。作者是有意将曹操与刘备进行对比的。刘备曾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

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如他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老百姓又歌颂他；当阳撤退时，“日行十余里”，也不忍心把百姓抛弃。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知人，对赵云，真心相待；对关、张，名为君臣，而实同兄弟；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托孤，始终推心置腹，敬爱信任。他是以“宽仁有度”的面貌载入史册的。尽管历史上的刘备仍然是个伪君子，但在人民的意识中，他是以“好皇帝”的形象展现出来的。

和刘备相对立的奸雄曹操，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的坏是赤裸裸的，十分露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他一生行动的哲学。对待部下，全用权术和机诈。用诡诈手段斩杀耿纪余党；为防范行刺而“梦中杀人”；忌才妒能定杨修以死罪，性情多疑而误杀吕伯奢全家，为报父仇杀人以万数，以至“泗水为之不流”等等。从这诸多的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演义》中“拥刘反曹”的观念，实是表现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

《演义》中还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这种“义”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开篇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三位异姓兄弟，为了匡扶汉室社稷，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结义为兄弟，共同盟誓，这就决定了三人名为君臣而还情同手足的关系。以后弟兄徐州失散，从“张辽义说关云长”，关公约三事，刺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独行，五关斩将，到古城聚义，关羽一直信守誓言，突出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义气。甚至华容道释曹操，也成为千秋仰

名的“义举”。赵云长阪城救主，保护阿斗等这种感恩义、报知己的行动都是属于义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演义》中所写的义，是与忠、孝联系在一起的，它自然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虽然这种义气能起到团结人鼓舞人的力量，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华容道义释曹操，刘备伐吴，就是典型的两例。

《三国演义》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而诸葛亮，则集中地则表现了这种惊人的智慧，绝世的才能，他几乎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演义》里，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诚如郑振铎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中所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在诸葛亮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一个贤相，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对蜀汉竭尽忠诚。他的一生，是与刘备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有惊天纬地之才，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知识渊博，才华出众。“隆中对”显示了他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奠定了三国鼎立的理论基础。初出茅庐，于博望坡出奇制胜，显示了卓异的军事才能。舌战群儒，争取了东吴这强有力的同盟。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更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智慧。特别是刘备死后，继位者刘禅十分昏庸，他却独立支撑了这个困难的局面。安居平王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虽寸土未得，无功而返，但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与那种排除万难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一直成为封建时代人民所幻想的“贤相”典型。另外，周瑜的战略才干，曹操的豪爽多智，袁绍的优柔寡断，刘表的虚名无实，张飞的粗中有细，关羽的盛气凌人，庞统、姜

准、吕蒙、陆逊、司马懿的长于谋略，马超、许褚的勇猛等等，都写得绘声绘色，从正面、反面使人民认识到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尖锐、军事斗争的变幻莫测。这些，无疑地具有重大的认识和教育意义。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章学诚说它“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是有一定道理的。三国的历史只是作品的一个骨架，而它的血肉部分，主要是虚构。读者感兴趣的，往往是虚多于实这样的情节故事。举例来说，“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记载很简略，而在《演义》中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彩文字。刘备三次访贤，两次误认，时而喜悦，时而失望，故事曲折生动，跌荡起伏，错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演义》艺术上的另一特色是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孔明、曹操、关羽、刘备、周瑜、鲁肃、许褚、司马懿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作者刻划人物，往往是通过不同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反复渲染人物的某一主要性格特征。如刘备的仁，曹操的奸、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张飞的猛、鲁肃的宽厚、周瑜的量窄等等，无不各极其态，栩栩如生。但是，《演义》在人物塑造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鲁迅先生批评它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这种缺点的产生，可能是受史传材料的局限，同时也受某些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特点的影响，另外，与作者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也不无关系。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黄人在《小说小话》

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这说明，"政治家""军事家"读了《三国演义》，会获得政治与军事斗争经验的启示。而"桃园结义"的形式在群众中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人民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组织进行反抗斗争。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如"大意失荆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总的来说，《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三百六十行，都可以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而且，从文学发展角度讲，在它之后，受其影响产生了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舞台上的三国剧目，至今深受群众的喜爱。

【试　析】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小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爱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观点时，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若至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甚爱读《三国》，显然是基于这样的思

想。他最初也是从《三国》获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方面知识的。

《三国演义》以善于描写战争为其特色，就其成功的高度而言，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称它为军事文学，当名副其实。它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其描写的许多战例，虚实分合，进攻防御，以少胜多，应战应合，应擒应纵，这种种的战略和战术，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据清刘鳌《五石瓠》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显然从《三国演义》中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时，曾列举了中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6 个著名的战例，其中有《三国》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描写的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和吴蜀彝陵之战这 3 次战役。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1930 年 10 月始，蒋介石调集军队十多万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进攻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这时约有军队四万多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先是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结果，在 12 月 30 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到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时，突

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人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又乘胜东击，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至此，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打破了。二、三、四次反“围剿”，也都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和灵活的战术，完全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讥讽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问题是，只要能够战胜敌人，消灭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军事知识和一些战术，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

识见深邃的政治家总是把生活原型同小说的夸张描绘混而为一，毛泽东就是如此。正是这独特的阅读方法，往往诱发他对一些作品作出极富个性的，不同于纯小说批评家思想的体会和观点。这样，毛泽东同古典小说的联系，就是从阅读者自身的需要出发，在作品中寻找启示，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

有一次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看这本书（指《三国演义》，笔者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我党的干部队伍，有长征过来的，有陕北的，有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等等，在这些干部之间，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影响各方面干部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团结。作为我党最高领袖的毛泽

东，为协调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外来干部与陕北干部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努力。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他要求外来干部要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也要向外地干部学习。互相团结，共同提高。他针对当时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等问题，多次找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谈话。他首先肯定了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显著，又指出了留守兵团工作也有缺点。他要肖劲光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搞好军民关系。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肖劲光心悦诚服，主动承认了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违反群众纪律等缺点，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1943 年春，留守兵团首创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热烈的拥军优属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促进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可见，毛泽东引用《三国演义》刘备南下的故事，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他的标准是不论资排辈，要靠能力，德才兼备。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如此。1953 年 6 月 30 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为了向大家说明重视培养和提拔青年干部的必要性，曾风趣地说：“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熟悉《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孙吴的大将

周瑜羽扇纶巾，年少英发，有过人的才智和胆识，年轻得志，30岁时已是举世瞩目的杰出统帅。他在东吴两代君主——孙策、孙权的心目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孙策临终时嘱托孙权："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而孙权一登上吴主的宝座，便召见周瑜，倾心相交，求教大事。正是君主如此赤诚相待，并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所以他才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建树丰功伟绩。赤壁之战时，他作为东吴水军大都督，年仅33岁。

在我党的历史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向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领导艺术而闻名于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起用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杰出人才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重用过许多比周瑜当都督时年青得多的人。比如林彪，23岁担任红四军军长的要职，打起仗来比较灵活，毛泽东对他是很器重的；吴亮平，20多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艾思奇，也是20多岁时就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使他们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周小舟，24岁时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主张应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1941年，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周小舟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周小舟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青干部。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当然，在毛泽东的晚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因而重用了姚文元、王洪文一类党内的两面派、野心家，给党的干部队伍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原则。他读古书的目的，不是为读古书而读古书，而是为现实服务。他引用《三国演义》的人物故事，总是那么地贴切，恰到好处，比喻生动，极富鼓动性教育性。譬如，毛泽东治军，非常重视时时事事都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古田会议之后，二纵队开到寻邬，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在讲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时，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时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曹操的大将）的故事：

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但毛泽东又指出，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用不着“激将法”。但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

1944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当讲到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时，他讲到了《三国演义》上的一个事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搠”，直叫着：“我今与你拼个死活。”毛泽东说：“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

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有的学者称毛泽东的这种读书方式为“历史主义的评论方法”，则是极为精当的。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毛泽东这段话表明，他显然是将“小说”《三国演义》与“历史”《三国志》进行过认真的核对。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的关系是进行过深入探讨的。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三国演义》虽然是依傍《三国志》而成，但它叙事的历史顺序却不像《三国志》那样的体例，而是大体依照了朱熹的《通鉴纲目》，这说明，《演义》褒贬抑扬的态度（“拥刘反曹”）显然也和《通鉴纲目》是一致的。

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西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他也不敢不对曹操客气一些。但书名叫作《三国志》，各成体系，说明他没有把曹魏看成正传，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

正统，但这部书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亦未影响后出的《三国演义》。真正影响《三国演义》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袭用了“春秋笔法”，发展了习凿齿的主张，例如把“魏文帝黄初三年”改为“汉照烈皇帝章武元年”，并在这一年大书一条“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朱熹这么做的良苦用心主要是警告那些争夺政权的政敌。从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来看，南宋偏安一隅，北有女真、蒙古等异族的进逼，这和刘备集团偏安于西蜀，北有曹操的威胁，情形是极为相似的。到了《三国演义》成书的明代，虽然朱元璋建立了汉民族政权，但北方边境经常遭到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骚扰，《演义》的作者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代表汉族政权，而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比作曹操，这种“拥刘而反曹”的倾向，则是不难理解的。

至于毛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则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稽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者王侯败则贼”的封建伦理下，果敢地为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以表示他们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尽管他没有做过皇帝，但依然将其列入本纪，这都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和识。而朱熹的传统，显然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奸，作了过分的片面性夸张。其实，曹操成为奸臣那是宋代以后的事。对此，历代都有人为其鸣不平。本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界三位大师郭沫若、剪伯赞、范文澜写文章为曹操翻案，要替曹操摘掉奸臣的帽子。从毛泽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指曹操，笔者按）挥鞭”来看，毛对曹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首句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实际上表明了作者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大多论者认为这是时代和作者的局限，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毛泽东对这句话却独有情钟，颇为赏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处理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多次引用，并赋予与传统不同的新意。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政策。9月8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说服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信中写道：“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 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共同打击北洋军阀；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同心协力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说道：“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总能发现一些常人根本不曾想到过的问题。他的卫士长曾回忆起他谈《三国演义》的一段往事：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纵队在田次湾宿营。毛泽

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泽东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小声问道："主席又要想什么?"毛泽东抬起了头，谈起了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心里的一个疑问，"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接着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

另一件事是谈起董卓。提起董卓，一般读者会想到他飞扬跋扈，嗜杀成性、鸩杀少帝，绞死唐妃，夜宿龙床、野心篡位等等。而毛泽东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很显然，毛泽东不仅仅看到董卓残暴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造成这种惨状与"养兵过多""生产力水平低"有相当的关系。

更有趣的是，毛泽东不仅看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原著，就连《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他看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案头上就常常放有这么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卫士尹荆山觉得很有趣，"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毛泽东却说道："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

来了，道理一目了然。”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不仅自己看《三国演义》，还极力推荐给别人看，给别人讲——将军、干部、战士、群众等等都接受过他这方面的教诲。他给卫士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彝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营，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刘备伐东吴犯了一个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惧，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形势。毛泽东很欣赏《三国演义》中的吕蒙。吕蒙本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从此勤读苦学，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1958 年 9 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时，对张治中和罗瑞卿又谈起了吕蒙，进而又谈到了我们军队的干部。他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知识对一个人的事业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由此，毛泽东谈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了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为了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指诸葛亮，笔者按）；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他本人是名符其实的秀才造反，而且，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集团中，知识分子也是占有一定比重的。毛泽东深知，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这个极为普通而又极为重要的道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处于经济建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与各行各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等的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以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当然，在毛泽东的晚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接连发生了重大失误。1957 年反右的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不仅无法再从事正常的科研工作，而且，连正常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被迫害致死的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少，留下了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的巨大创伤，这是应当永远记住的沉痛教训。（霍现俊）

《水浒传》要当作政治书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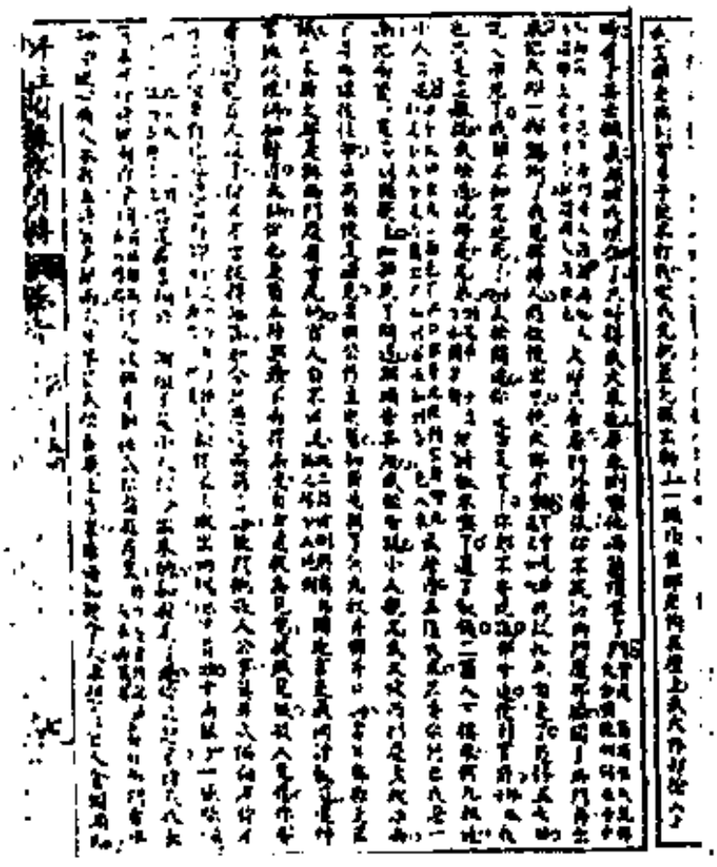
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水浒》情结"。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他最早从《水浒传》中得到的启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刻的辨证思想，与借鉴《水浒传》也不无关系。晚年将纯学术研究与政治挂勾，发动评《水浒》运动，造成了重大失误，这是应当吸取的深刻教训。

【毛泽东评点原文】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

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毛泽东在韶山读过的绘图评注《水浒传》一页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一引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会谈》（见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

会议实录》第 13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 1975 年关于《水浒》的谈话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摘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作品介绍】

《水浒传》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都是在长期民间

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家加工完成的作品。从成书方式上说，它属于一部历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的内容，不全是凭空虚构，而多多少少有历史的依据。正史、野史、笔记和文人的诗文集，很简略地记载了宋江起义时活动的区域和结局。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传说纷纭，大抵不出施耐庵、罗贯中二人。据高儒《百川书志》记载该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后学罗贯中编次。”“的本”即真本的意思，这说明传本是以施耐庵为主，又经罗贯中加工创作的。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材料极少，大约是元末明初人，施的年辈应早于罗贯中。按一般的说法，施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而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年，卒年约为1385年。

《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四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四本，明末清初金圣叹评点，这是清代最流行的本子。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目前的说法很不一致。

水浒故事从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到各种版本的定型，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各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它的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留下了印记。作为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他不仅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而且对

民间故事作了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比如，反恶霸是元杂剧的共同主题，从现存的剧目看，多数只着眼于反对恶霸调戏侮辱妇女或与淫妇通奸，没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的简直成为庸俗的社会道德剧。而《水浒传》则不同。它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表面上看与元代某些水浒戏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林冲的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林冲由忍辱退让、一忍再忍、最后奋起反抗，终于上了梁山这样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宋江杀惜”也是如此。在《宣和遗事》里，只是因为阎婆惜与吴伟通奸，宋江因带酒才杀了她。但在《水浒传》里，却把宋江杀惜与私放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把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变成了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故事。

其次，施耐庵把分散的、零星的水浒故事改写成《水浒传》这部巨著时，在材料的筛选、情节的安排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例如，他把高俅发迹的故事放在全书开端来写，表明了“乱自上作”，特别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这从根本上触及到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把英雄人物个人反抗放在前面写，然后逐步联合，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保持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客观上说明了向统治者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水浒传》虽然没有从正面具体揭示农民阶级所经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对封建统治阶级，上至朝廷大员，

下至一般的贪官污吏，都有深刻而广泛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幸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寓意很明显，“乱自上作”乃是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根源。

小说中的高俅，是统治集团中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都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就这么一个连他父亲都不容他、要告他的状的流氓无赖，只因踢得两脚好球，没半年间，便做到殿帅府太尉（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总司令）。他做太尉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责罚王进，逼得王进走投无路，只好与老母弃官逃走。后来又陷害林冲。在朝中与蔡京、童贯等结成一党，把持朝政、无恶不作。作品还表现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泼皮恶棍。如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高俅的弟弟高廉，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梁中书凭借岳丈蔡京的权势，在大名府大量搜刮钱财；地痞恶霸西门庆，常与人放刁把滥；号称“镇关西”的郑屠，竟敢强媒硬保，娶民女为妾；还有祝朝奉、毛太公、蒋门神等等，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黑暗势力网。不仅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而且，一部分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原本属于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如林冲等，因遭受这样那样的种种迫害而纷纷加入到起义军队伍。农民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逐步展开的。

（二）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神采各异、光辉夺目的英雄群像。这些英雄人物大多身体魁梧，虎背熊腰、粗豪爽朗、质朴纯真，体现了古代英雄的力和勇，既充满了传奇性，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如林冲的安分守己怯于反抗；鲁智深的心地厚实，救人救彻；李逵的天真烂漫、赤胆忠心；武松的秉性刚烈，嫉恶如仇；阮小七的心快口快，不怕官司不怕天等等，都

给人以极鲜明的印象。

（三）小说生动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规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由个人复仇到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发展过程。开始时是个人反抗，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智取生辰纲”则反映了小规模的联合反抗，参加这次斗争的有渔民、店家、下层文人、道士。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取无为军，则是较大规模的联合反抗。自宋江上山后，义军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辉煌胜利。“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描绘了一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提出了“不问贵贱”、“无问亲疏”、“识性同居”、“随才器使”的口号，这实质是“等贵贱”和“各尽所能”思想的艺术再现。

（四）写出了梁山义军的悲剧结局。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早期说话人所依据的《大宋宣和遗事》已出现招安结局，再联系到《水浒传》最后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如元末明初的起义领袖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来看，《水浒传》中这种义军的悲剧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不过，历史上的招安，往往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彼此不能消灭对方而又为了保持己方实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水浒传》却不同，梁山义军不是在走投无路时被迫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自愿向统治者投降的。究其原因，主要与义军领袖宋江所推行的投降路线有直接关系，另外，与作品所宣扬的“忠义”观念及作者的局限也有相当的关系。

《水浒传》在艺术方面，较之《三国演义》有很大提高。

它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绘人物性格方面，得到了卓越的成就。它所写的大都是出身贫贱的好汉，生龙活虎的英雄，具有古代勇和力的象征，既充满了传奇性，又由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是在广阔深厚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作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些英雄性格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性格的形成与家庭出身、个人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天生的英雄，而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他们的性格并非生就如此，而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斗争中，逐步克服自身性格的弱点、缺点才成熟起来。这正是《水浒传》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所在。读者非常熟悉的林冲，其性格的发展就有着清晰的轨迹。即使同一阶层出身的人物，例如，林冲、鲁智深、杨志，都是军官出身且武艺高强的英雄，由于社会经历、生活环境的不同，个性也就因之而异。因此，他们上梁山的原因和过程都大不相同。

《水浒传》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另一方面，是在塑造传奇式英雄的同时，对社会环境，对陪衬人物，对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和大千世界的风俗习惯，都有了较为精细的描写。除了英雄人物叱咤风云的主色调外，还细描细绘了市井小民生活的斑斓色彩。举例来说，作者写武松这一打虎英雄时，又写了潘金莲勾引武松，王婆说风情、西门庆与潘金莲调情通奸，乔郓哥不愤闹茶房，武松祭兄杀嫂等情节，展现了当时的市井生活和王婆、何九叔、郓哥等“卑微人物”即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与《三国演义》只重大场面、大事件、大人物描写，较少或根本不涉及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等相比，应该说，《水浒传》对社

会众生相、对人情世态的描写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对以后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以描写世俗人生为主起了些微的开启作用。这也是《水浒传》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度的又一重要标志。

《水浒传》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仅取得了现实主义的卓越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作者对这些草莽英雄的本质特征或行为给以极度的渲染和夸张。如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武松打虎，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吴用机智超群等等的夸张描写。作者采用的是惊奇与逼真相结合的高超艺术手法。亦即整个故事情节高度夸张和生活细节严格真实相结合。因为，没有极度的夸张，故事情节就失去动人心弦的传奇色彩，没有细节的严格真实，夸张也就会失去真实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塔索在论述英雄史诗时曾说过："逼真与惊奇，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互相排斥的。"但《水浒传》作者的本领就在于能够把这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武松打虎为例，整个故事情节是高度夸张的，但武松打虎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却又是严格真实的，打断哨棒的细节描写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谁也不会怀疑武松赤手空拳打死山中之王的故事。可见，其可信度是极高的。

对比描写在《水浒传》人物塑造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极为成功。这许许多多的鲜明人物性格，从很多方面来看是相近的，然而各人仍旧有着自己所独有的个性。比如鲁智深和李逵，这是一对性格粗鲁的人物，他们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方面，但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分界线。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在次要人物身上，如何九叔和郓

哥，虽都是“卑微人物”，一个圆滑、机灵、世故、苟且偷安；一个天真、正直，敢于到官府去做见证人，性格历历分明。在《水浒传》中，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运用得很多。“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武松杀嫂”等“石秀杀嫂”；“三位女性”（顾大嫂、扈三娘、孙二娘）与“三位兄弟”（阮小二、小五、小七）都是在对比中见出各自性情的。

《水浒传》的语言通俗易懂，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叙事还是刻画人物都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水浒传》本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而成，先天就有口语化特点，又经过文人加工创造，成为纯熟的优秀的文学语言。与《三国演义》相较，更为生动、活泼、生活气息强，个性化达到了很高成就。

《水浒传》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人民的喜爱，而且也深受世界人民的赞誉，现在已有了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风行世界，它将永远放射着璀璨的光彩。

【试　析】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传》是他急于要找的一部书，以致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说，在毛泽东身上有

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

《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水浒》中的英雄，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好汉，他们并不是靠合法的斗争，而是靠勇力，啸聚山林来和统治者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方式”，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爽口回答道：“学梁山泊好汉。”后来他上井冈山，占据山头，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非常看重小说的这一个方面。为此，1944 年 1 月 9 日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这一直是毛泽东解释 20 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们“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毛说：“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神、

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新中国建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笔者按）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毛泽东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又说到：“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一般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无例外地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掠地，占据州府。可以说，这是传统农民造反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支起义队伍如何由零星的个人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这一规律。毛泽东总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在中国革命战略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联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他上井冈山，而不是占据大城市，不能不说是受了《水浒传》相当的影响。可见，他在井冈山时期读

《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就是他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这是他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例如，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在详细分析了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毛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这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象毛泽东那样深刻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实际这是在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 错误。相

反，毛泽东领导队伍上山以后，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争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段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传》似乎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应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地割时，又提起了《水浒传》的故事。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非常善于描写战事，铺写斗争场面，常常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给人以真切、实在的感受。《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堪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型事例。毛泽东很欣赏作者对这一故事的描写，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

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这说明，调查研究在解决现实矛盾问题时是多么地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非常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首先要进行调查，但是，如果这种调查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不真实，他同样没有获得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的发言权。这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个著名故事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42 年 10 月，延安平剧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 1937 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 年 7 月初，正式成立了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同志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 年 2 月 22 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给以热情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正如编导之一的李伦所说，他们是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才确定了该剧的创作指导思想：《三打祝家庄》是以农民

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该剧里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事实证明，该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同志谈的观后感是很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战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这种引申，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相当的关联。

1942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 12 条。第 7 条主要谈革命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时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毛泽东还作一些发挥，显然是让同志们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转变对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59 年 2 月，为纠正 1958 年“大跃进”的弊端，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们以新的历史启示。他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

演唱。毛泽东一再地提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用意是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水浒故事和语言，都是借古论今，以古为鉴，明得失，通权变，以服务于现实，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启示的。这方面的启发，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都有所体现。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不但敢于斗争，而且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下面三个著名的例子。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他没有受过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而是自学成才，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水浒传》就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在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谈到如何看待革命的退却原则，处理好退却与进攻的关系时，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毛泽东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采段落。一般读者对武松打虎这一段情节的体会，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力，而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

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人的，但他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人的。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他又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老虎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这种本性绝不会因武松的仁慈、退让而有所转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之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毛泽东显然强调对反动派不能有似毫的怯懦，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水浒传》塑造了一大批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拼命三郎”石秀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身上，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本色，又有不惜性命做事、勇敢果断的爽快性情。这在救助扬雄和劫法场救卢俊义的描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南京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有两次讲话，针对一些同志在革命胜利后意志消退，革命热情不高的现象，他大力提倡“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说到这儿，他举出《水浒传》上石秀的例子说道：“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以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

拼命的精神。”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是要同志们加以警戒的。

《水浒传》的积极思想还在于，它描写了梁山义军的“革命”理想和行为准则。“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姓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实质是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理想，要求在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欺硬扶弱”，以“义”战胜“不义”。这类描写贯穿《水浒传》的始终。“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最为典型。作者认为，“生辰纲”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财，是不义之财，劫取它是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水浒传》中这种“劫富济贫”的平等模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号召和动员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的话，（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么，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能不能再使用这种模式呢？

1959年，毛泽东多次谈到《水浒传》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等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一定关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刮“共产风”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行为，严重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后来，毛觉察到这种“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便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1959年3月5日，在郑州工作会议上，他举例说：人民

公社正在蓬勃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办事，不要学《水浒传》上李鬼拦路抢劫的办法。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劫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

同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毛泽东多次讲起这个问题，主要是着眼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好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在他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如果说，在封建时代，劫取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这样的不义之财，可以算作正义行动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对劳动人民得来的财富，就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显而易见，《水浒传》中的故事，帮助毛泽东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

毛泽东之于《水浒传》，是烂熟于胸中的。他不时地引用《水浒》中的故事、人物和语言，或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或说明一个道理，总是明了透彻、比喻贴切。比如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

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在谈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引用了《水浒传》上王伦的故事。王伦是最早占据梁山泊的，他本是落第秀才，本事不大心胸又狭窄，当初林冲和晁盖等上山时，他百般习难，不肯收留，后被林冲杀死。毛泽东认为，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准许他们继续革命，“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李逵是《水浒传》众英雄中性格最鲜明的形象之一。他爱憎分明，义重如山，对梁山泊事业忠心耿耿，深受广大读者爱戴。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有时不免简单、鲁莽、不讲策略和方式。三打祝家庄时，他不分对象乱砍乱杀，杀了扈太公一家老小，破坏了宋江制定的分化政策，结果使义军陷入麻烦。

在江西根据地时，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简单粗暴，不愿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的作风，曾引用《水浒传》李逵这个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轰轰烈烈的梁山泊事业最终以全体受招安而归于彻底失败，它的胜利是短暂的。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他们不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向统治者投降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时主动接受招安的。一方面，这与作者的主观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与宋江形象的复杂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1952年到1960年，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而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宋江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但到1964年以后，对宋江形象的认识，大多又持否定的态度，视其为阶级异已分子，在评论中特别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学术界的研究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人“情况简编”呈送毛泽东。毛在阅读这份综述材料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相当重视，也表明他晚年的评论与学术界的讨论有一定的联系。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5年8月14日发表了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其实质性内涵，可以看作他一贯的历史观为适应其新的历史追求的体现。

毛泽东的评价，并非即兴之论，确是有感有思而发，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于：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革命了几十年，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意识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他提醒人们特别应注意《水

浒传》后半部分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对毛泽东的这段评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革命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梁山泊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既是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尽管“道”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水浒传》中的确切含义，主要体现在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娘娘所授宋江的三卷天书中，中心即“全忠仗义”。从《水浒传》的具体描写来看，造反是因为奸臣（贪官）当道，闭塞圣聪；不得已上梁山，虽身在水泊，但心在朝廷，这是与贪官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招安后征方腊，更是忠于皇帝的实际行动。而且，尽管义军攻城掠地，也只是卷起细软即走，从不敢占王土一寸。

第二，与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和所推行的路线政策有根本性的联系。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下层小吏，在宋江的身上，既有“仗义疏财”，不满现实黑暗的一面，又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思想，所以，出于义气，他搭救了晁盖等人，又由于“忠”，他迟迟不肯上山，最后在不得已时才上了梁山。但是，上山后他的基本立场没有转变，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指望朝廷早日降旨招安。他所推行的这条基本路线，除了出身下层的李逵、武松、三阮兄弟等人坚决反对外，却得到了大部分将领的拥护。这一大批人，本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只是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但他们如同宋江一样，盼望早日招安，“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宋江的意识深处，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宋朝皇帝来惩处那一班奸贼。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所以，

他同高俅、蔡京、梁中书等人的斗争，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是“忠”与“奸”的冲突，最后是“忠臣”被害，想“忠”而不得为“忠”。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看，“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参加与坚持革命的反抗；而“忠”则是忠于大宋皇帝。在“义”之前加上一“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封建道德、封建伦理的认同，其意则和“孝”的内含差不多。“忠孝节义”是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而“忠”居于首，则是非常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视“义”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统“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如果单单从学术角度，从《水浒传》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所感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尽管后来毛泽东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将他对《水浒传》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等等，但很难说这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江青等人，顺着毛泽东的思路，无中生有地胡乱发挥和运用，使毛泽东原本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论，一下子升到无比高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例如江青胡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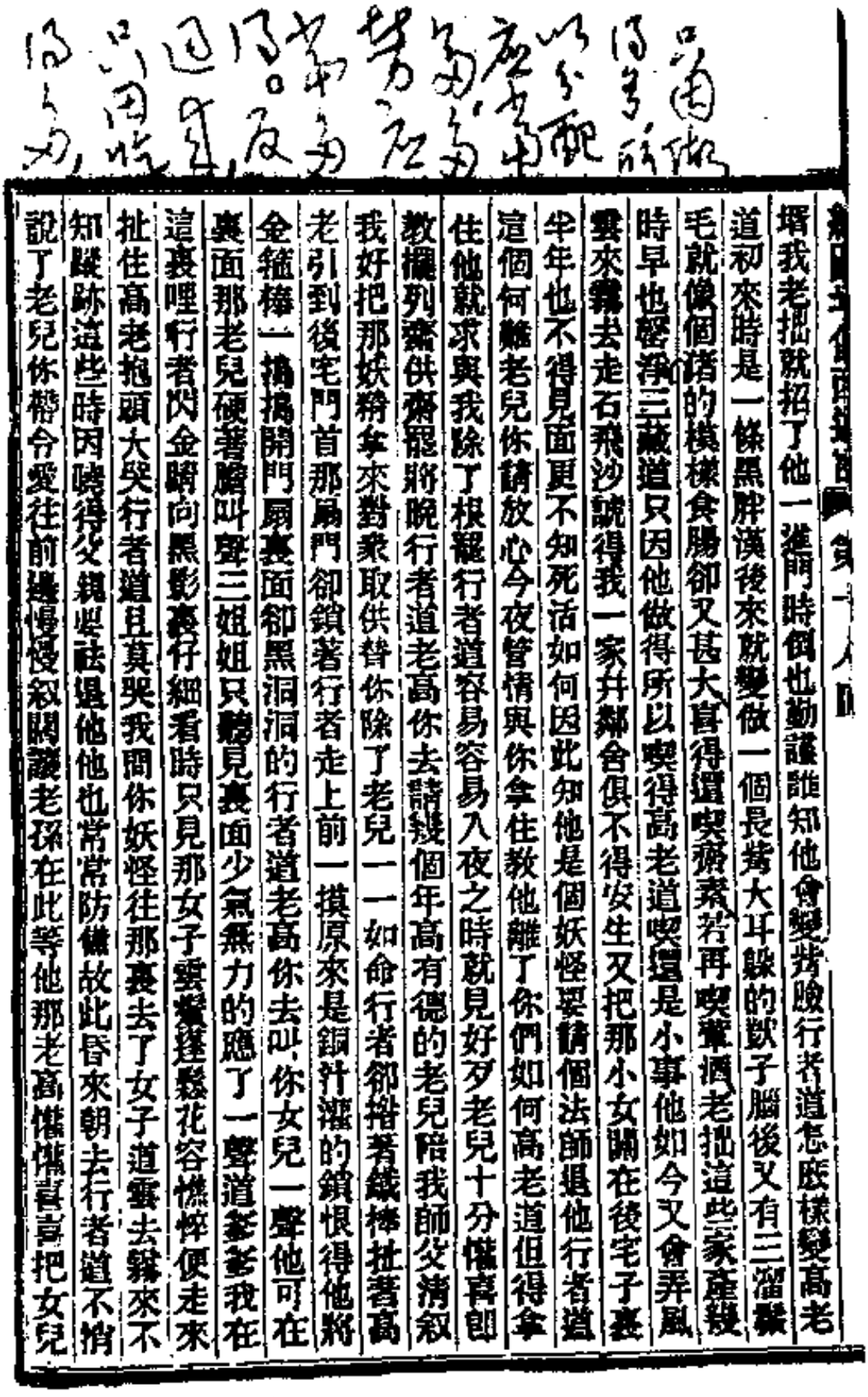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等等，他们这样做，无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毛泽东洞彻到了他们的阴谋，斥责江青道：“放屁，文不对题”，又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些人满以为可以大大热闹一番的“运动”又出乎意料地匆匆落幕了。（霍现俊）

《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西游记》是毛泽东从小就十分喜爱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直到晚年他还把《西游记》的几种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他很欣赏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对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造反精神给予了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



塌我老孤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誰知他會變臉行者道怎麼樣變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耳縣的獃子腦後又有三溜鬃毛就像個豬的模樣食腸卻又甚大喜得還喫齋素若再喫葷酒老孤這些家產幾時早也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喫得高老道喫還是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沙號得我一家并鄰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小女關在後宅子裏半年也不得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退他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你請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離了你們如何高老道但得拿住他就求與我除了根罷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老兒十分懽喜即教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行者道老高你去請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清敘我好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老兒一一如命行者卻揩著鐵棒拄著高老引到後宅門首那扇門卻鎖著行者走上前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恨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裏面卻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他可在裏面那老兒硬著膽叫聲三姐姐只聽見裏面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爹我在這裏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只見那女子雲鬢蓬鬆花容憔悴便走來扯住高老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裏去了女子道雲去霧來不知蹤跡這些時因聽得父親要請退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暫令愛往前邊慢慢叙闊讓老孫在此等他那老高懽懽喜喜把女兒

毛泽东读《西游记》的批语

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页—331页）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罪，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作品介绍】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全书共一百回，八十余万言。全书的结构连贯、统一，而又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第一回到第七回为第一部分，写孙悟空的出身和他反抗神权的斗争；第八回至第十二回为第二部分，写唐僧取

经的缘起；第十三至第一百回为第三部分，写取经的经过。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的基本故事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之久，流传的过程也就是它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西游记》凝结着吴承恩的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吴承恩(1500? —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人。自幼即以文名冠于乡里，但科场屡试不第。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六十一岁时，因为母老家贫，屈就长兴县丞，后与长官不和，即辞职而去。七十一岁，始写《西游记》，但不知成于何年。死时八十三岁，无子。据天启间“淮安府志”的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所著诗文极多，因家贫无子，遗稿多半散失，经邑人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名为“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今存。这不过是他诗文中的十分之一。《西游记》是他“杂记”中的一种。

《西游记》是一部光辉的神魔小说。它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取经的故事，以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并歌颂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坚决反抗的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表达了劳动人民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和克服困难的伟大理想。

《西游记》以大闹天宫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了全书的首要地位。孙悟空是神的世界中一位爱打抱不平的硬汉，他永远是乐观、积极、不怕困难、敢作敢当；他总是兴高采烈，

随意自在，从无忧虑，从无悲愁。失败被擒时毫不在乎，就是把他放在老君炉中，压在五行山下，他也从不叫苦。孙悟空在保护唐僧 取经路途中遇到的妖魔或盘踞山洞，或潜于水底，称霸一方，残害生灵，有的更化作人形，为国师、国丈、唆使昏君，涂炭百姓。它们都是无恶不作，嗜血成性，不仅要吃唐僧 肉，而且还吃当地人民。这些妖魔之中，大多数与神佛有着联系。有的是因为神佛的管束不严而下界行凶，有的则是神佛有意设下的魔障。孙悟空常常是费尽心血捉到它们，正待下手处死，神佛便来保护，说是“我的脚力”，便又弄回天上去了。从这些称霸一方的妖魔的行径及它们与天上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来看，它们的确象封建社会中地方上的豪强、恶霸。孙悟空战胜了它们，正是光明战胜了黑暗，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孙悟空在与妖魔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无穷的智慧，无论妖魔怎样变化，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眼光。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去和妖怪们周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即便一时失利，他也从不消极，必然寻根究底，克服困难，或上天宫，或入地府 ，也不辞劳苦。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只有前进，决不后退，天大的祸事，都愿一人承当。他见义勇为，济困扶危，不但扫清取经的道路，而且路遇不平，举棒相向。孙悟空的形象不仅体现了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战胜统治阶级的理想，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在当时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自然界的力量也同样是残害人民的暴君。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七十二般的变化，呼风唤雨的神通，都表现了劳动人民战胜自然力的理想。他消灭了黄风怪，扇灭了火焰山，也是对自然灾害的消除。这种征服自然的伟大理想，鼓舞着人们对自然灾害所进行的现实斗争。

除了孙悟空的形象，《西游记》还成功的塑造了猪八戒的形象。如果说孙悟空是一位高超的理想主义者，猪八戒就是一位世俗的现实主义者。八戒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突出。他有很多优点，在与妖魔的战斗中，他是一员战将，是孙悟空的有力助手。在取经途中，他作了许多粗重艰巨的活儿：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清除稀柿洞。他那乐观的性格、快活的情趣，表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憨直、顽皮、不拘礼仪，使人感到可爱。这一切构成了他性格中优秀的、肯定的一面。

但是他也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他好吃贪色，喜爱财礼，甚至在取经路上还攒私房钱。他能劳动，却极懒惰，让他巡山，他偷睡大觉；胆小怕事，贪小便宜；有时说点小谎，耍点小聪明，却往往一下子就露了相，给作品增添了不少滑稽场面。这些都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中小私有者的许多特点。他的这些缺点和弱点正好与孙悟空的光辉性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游记》中的唐僧 保留着历史人物玄奘虔诚苦行的一面。他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明知西行途中“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仍然毅然前往。女人国遇配，灭法国受阻，……九九八十一难都没有挫败他取经的信念，美色与富贵也不能撼动他西行的决心。但在唐僧身上有着严重的传统封建思想和君臣观念。他为“我王江山永固”祈祷，拼命维护封建秩序，模范地遵守封建礼法，遇见大小神佛，不管真假他都顶礼膜拜。遇见不管哪一国君主他都毕恭毕敬，山呼万岁。在他身上还表现出了一般士大夫的庸弱无能，一遇到妖魔，他就吓得涕泪交流，离开徒弟他连一餐素饭也无法捞到，以至悟空常常称他是“脓包”。作者在描写唐僧 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知识分子气质时，是采取着批判态度的，不是把他虚饰成一个十全十美

的道德君子，而是把他写得迂腐可笑，有时甚至使人望而生厌。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它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现实的，在神化了的世界里描写人物和环境。它的人物大多数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活动的环境也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它常常抛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按照幻想自身的逻辑展开故事。孙悟空从仙石中生出来，他有无穷的本领，可以上天入地，不怕火烧水淹，可以不食不眠。在这里作者写的是特异环境中的特异性格，一切都是神奇的。但是，在他所创造的幻想的天地中，他的人物和环境是和谐的，浑然一体的。在这里，同样也有细节的描写，描写环境使人历历在目，描写人物也是有声有色。这些细节描写大都只有在神化了的故事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才是合理的，不能用人类社会生活的尺度去衡量它。《西游记》虽然是幻想化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和现实中人的影子。它有着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内容，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

《西游记》自由地驰骋着无比丰富的想象，充分地运用了不平凡的神奇情节，创造出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八十一难，七十二变，大闹天宫、地府、龙宫，飞沙走石的战场，腾云驾雾的神怪，神妙莫测的战斗，“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四万八千里，而孙悟空嚼一颗“定风丹”就能在铺天盖地的狂风面前巍然不动，……这一切把读者带进一个奇妙的幻想世界。这些幻想是那么优美，那么健康，又那么令人信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讽刺和幽默是《西游记》善用的手法。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对现实中的丑恶的、畸形的东西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

种讽刺也是在幻想的形式中、间接地指向现实的。神、佛、僧、道常常是他讽刺的对象。在《西游记》中，作者还常常通过诙谐的对话和轻松的描写，揭露某些可笑亦复可鄙的现象或事物的本质，使得整个作品都笼罩着一种幽默的气氛，读者在这种幽默的气氛中感到轻松愉快，享受到艺术中的喜剧性美感。

《西游记》的语言运用得非常成功。有散文，有韵文，前者已很少带有文言的气息，其特点是字句简短，语言幽默，具体生动，而且是富有创造性的。后者虽是文言的诗词，但已毫不艰涩，浅显易懂，善于体现物情，描摹形象，多带有象征的手法。《西游记》的语言是用经过加工的活的口语写成的。在以口语为基础的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吴承恩是有着创造性贡献的。他接受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活的口语。

《西游记》对以后的神魔小说有很大的影响。《西游记》出现后，许多人开始重视民间神怪故事的收集和整理。和《西游记》直接有关的书便有《续西游记》、《后西游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以及董说的《西游补》。后来的另一长篇神魔小说《封建演义》，也受到了《西游记》很大影响。

【试　析】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长篇小说《西游记》对于毛泽东就

有这样一种“永久的魅力”。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便把《西游记》说成是他从小就喜爱的一部小说。《西游记》中那些动人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给予他终生的艺术享受，即使在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毛泽东十分喜欢孙悟空这一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神话文学的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洒脱不拘、蔑视陈规的自由个性，用他的话说即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他敲开地狱的大门口，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姓名；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耍弄各路大仙；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汗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能耐。1957年2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毛泽东告诉人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并举孙悟空的例子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毛泽东在说这话时脑海里是不是跳荡着孙悟空那洒脱不羁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搬教条，灵活机动，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性格特征的确与毛泽东有某些联系。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

会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所作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毛泽东的书屋里有一部木刻本的《西游记》，第28回是“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唐僧 谴责他滥杀好人，写了一纸贬书，断了师徒关系。孙悟空悲悲切切回到花果山，得知猎户们对花果山滥施烧杀抢掠，危害到他的同伙，便用法力把千余来犯者杀得人仰马翻，不禁鼓掌大笑：“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唐僧的说教乃“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就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所谓“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事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且常常使妖魔鬼域都成灾，为虎作伥，鼓舞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在充满艰难险阻的西天取经之路上不断前行，一步步接近目的。孙悟空打死化作人形的白骨精，为唐僧 西天取经除了恶，这便是最大的善事，唐僧 不理解这个道理，也

不理解孙悟空。他们二人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 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管束。结果是唐僧以善求善，阻力重重，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作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反叛中庸的“乡愿”哲学。在毛泽东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的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看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足，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中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尽善尽美、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的两个大弟子索要“人事”而故意刁难他们。善恶并存的永恒性必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休，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滚滚，形势混乱。前一年的六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在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

散发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在党的领导下，对苏共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进行了斗争。毛泽东的《七律·答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961 年 10 月 18 日，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认为很有教育意义，剧团的同志要他提意见，他便在 10 月 25 日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他们，并呈送毛泽东。郭沫若看到剧中的唐僧是那样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而憎恨不已，把这种感情如实地写在诗里，于是诗中便有了“千刀万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等诗句。毛泽东在看到这首诗后，便在 1961 年 11 月 17 日写了这首七律和他，这首诗写道：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在这首诗里对孙悟空给予热情赞扬，极高评价，隐喻中国人民的革命勇气和信心。对唐僧 则认为还是可以教育的，不同意郭沫若“对敌慈悲对友刁”和“千刀万刮唐僧肉”的观点。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把孙大圣当成

了自己反修诗作中的主要英雄形象，通过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情节的具有象征性的评述，以诗的形式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如何对待中间派，正确区分敌、我、友，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1964年1月同美国友人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见解。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简直就成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文艺作品（包括神话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是神话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他在《矛盾论》中说：

“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神话和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同一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他的构思和创作动机会受到他所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矛盾的影响。

《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映。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吴承恩“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

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张天翼认为：在《西游记》这样的古代神魔故事中，不论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唐僧取经的故事中，一边是高高在

上的统治者——神，上至天界，下至地府，君临万物，主宰一切；一边是受诸神统治的魔，他们偏偏要从统治势力的压迫下挣扎出来，站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他们，魔头们便拼死反抗。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出来了，而且，在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越发展这一点反映得越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魔头的代表，他大闹天宫，败下阵来之后，为什么归顺上界，而修成正果了呢？张天翼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究竟要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孙悟空也糊里糊涂不很了然，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说出“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孙悟空在前七回大闹天宫，其志向不过是想得到玉帝的尊位。这说明孙悟空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了姓孙，就像刘邦、朱元璋那样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但孙悟空在前七回复仇不成，作者吴承恩便只为他安排了两个选择，或者象历代农民起义英雄黄巢、方腊那样被镇压，或者象《水浒》中所写了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张天翼的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张天翼的论述恰恰吻合了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他从张天翼的观点引

伸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后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被随意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作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作反面形象来用。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的运用中，常常引伸出不同的含义。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里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学员讲话，他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从分析《西游记》人物的性格特点入手，来说明这三句话的重要性。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怕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

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象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作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请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事隔几年，重庆谈判，在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许，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西游记》第59至61回写孙悟空借 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价值时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器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搧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作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孙悟空第一次借的是一面假扇，煽不灭火焰 山的熊熊大火。以后他费尽心机，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去骗取扇子也未成功；后来又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最后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才

降服了她，借得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要借题发挥，讲钻到敌人肚子里面作战的方法。1949 年 3 月，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1953 年 9 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孙猴子有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1957 年 4 月 5 日，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又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1957 年 4 月 5 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孙悟空那七十二变的神通，也真是适应了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联想方式。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突出了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情节，妙趣横生。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同一故事以帮助说理，而且都是如此的贴切、自然，真可称得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李怀亮）

2070572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

《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却是中晚明的社会现实。毛泽东称之为“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时下又誉之为“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楼梦》。

【毛泽东评点原文】

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

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摘自毛泽东 1961 年 12 月 20 日
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
记会议上的讲话

【作品介绍】

《金瓶梅》，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的长篇世情小说，全书 100 回，约 100 万字，成书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作者为笑笑生，兰陵人，这是一个化名，其真实身份，迄今仍无定说。目前学术界已考证出一个长长的 60 多人的名单，影响较大的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诸说，但均无确据。

《金瓶梅》的故事，表面上写的是北宋末年，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代中晚期（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现实社会生活，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已作过详细考证。它的故事从《水浒传》第 23 回至第 26 回“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商人、官僚西门庆为中心，以他的发迹变迁为线索，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至朝廷奸臣权相，下连官绅市井无赖，组成全书的情节。其内容简述如下：

西门庆号四泉，乃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生药铺，从小寻花问柳，浮浪成性，爱好拳棒，后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交通官吏，说事过钱，又与地方上的帮闲无赖结为十兄弟，无恶不做，因此，满县人都害怕他，是

个十足的土豪恶棍。

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发妻陈氏，生一女，称西门大姐，后嫁花花公子陈经济为妻。陈氏死后，继娶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正室，又娶妓女李娇儿为第一房妾，接着娶妓女卓丢儿为第二房妾（早亡），又纳陈氏陪嫁的丫鬟孙雪娥为第三房妾。

就在这时，他与武大美丽而风骚的老婆潘金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勾搭成奸，为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又药死了武大。武松为哥哥报仇，欲杀西门庆，却误杀了皂隶李外传，结果被西门庆买通官府，刺配孟州道。他本想迎娶潘金莲为妾，不料媒婆薛嫂给他介绍了一位富有遗孀孟玉楼，他又先娶了这位寡妇顶卓丢儿的缺为第二房妾，然后，又娶了潘金莲为第四房妾。

西门庆的紧邻是花子虚家。花子虚是他的结义兄弟，其妻李瓶儿原是蔡京之婿梁中书的妾，因梁山奸汉李逵杀了梁家一门老小，李瓶儿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乘乱逃到京城，经花太监使人说合，嫁给了侄男花子虚为妻。后花家因分家产，花子虚吃了官司，被押往京城。李瓶儿为救丈夫花子虚，托西门庆走关系，遂即又与之勾搭成奸，并把大半家产转移到西门庆家。待花子虚死后，她又嫁给西门庆，作第五房妾。

西门庆由于巧占了孟玉楼和李瓶儿大量的家产，又发了两三场横财，家中便开了几处店铺，同时放高利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短短几年间，他由一个开生药铺的破落户财主，一跃而成为清河县的首富，家产估价在20至30万两之间。

西门庆很会钻营，发了财后，便拿出大量资金用于政治上的投资。他不惜每年花费大宗银钱，采取行贿手段，从地方官

吏到当朝太师，层层买通，作为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蔡京生日，他送去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又拜其为干爹，结果被任命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千户，官居正五品。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强大的关系网，上至当朝太师蔡京、右相李邦彦、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山东巡按宋乔年，下至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守官员。他无恶不做，在他任提刑期间，干了一系列伤天害理，假公济私的勾当。

在生活上，他疯狂地寻欢作乐，淫欲无度，霸人妻女。他有一妻五妾，又寻花问柳。先诱奸了家人来旺的妻子宋惠莲，发配了其丈夫来旺，致使宋惠莲含恨忍辱，上吊自杀。又和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肆意通奸。此外，他奸占了不少的丫鬟使女：春梅、迎春、绣春、兰香等，又包占着妓院的李桂姐、吴银儿和郑爱月等妓女，据张竹坡的统计，他占有的女人达21人之多，同时，又好男风。

李瓶儿嫁西门庆后，生下一子，取名官哥儿，西门庆更加宠爱李瓶儿，这自然引起潘金莲的忌恨。她便驯养了一只猫，终于吓死了官哥儿。李瓶儿因儿子早无，不久也恼恨忧伤而死。

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便与官哥儿的奶娘如意儿勾搭成奸。并在妓女郑爱月的唆使下，和王招宣的夫人林太太姘上了。这时的西门庆，因淫欲过度，身体便渐渐不支。一天，他从王六儿家纵欲归来，来到潘金莲房中，连日的淫纵，已使他昏迷沉睡，神态不清，但潘金莲欲火正炽，便给他服了超量三倍的春药，致使他脱阳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西门庆死的同时，正妻吴月娘生下了他的遗腹子孝哥儿。

以权势和财势支撑起来的西门氏家庭，在西门庆死后，面

临着大厦将倾的局面。他尸骨未寒，李娇儿便盗财归院。应伯爵，这位他生前“好友”，立刻改换门庭，投靠了另一富户张二官，撺掇李娇儿嫁与张二官为妾。他的伙计韩道国、娼妇王六儿拐了他一千两，逃往东京，家奴汤来保也盗拐了船上八百两货物。

潘金莲与其婿陈经济私通已久，在西门庆死后，由偷鸡摸狗的暗中勾搭，到进一步的纵情幽欢，同奸者还有春梅。后潘金莲因怀孕打胎，丑闻纷纷扬扬，吴月娘识破了奸情，先发卖了春梅，又痛打了陈经济并将其逐出家门，接着令王婆将潘金莲领出发落。这时，太子立东宫，武松遇赦回到清河县，遂以一百两银子买得潘金莲而杀之，又杀死王婆，劫其财，投梁山而去。

春梅被卖给周守备做了妾，后生一子，扶为正室，甚得守备宠爱。早先被西门庆递解回徐州老家的来旺，又回到了清河县，和旧情人孙雪娥谋划出走，事发被捕，孙雪娥交官媒发落。春梅闻讯后，基于旧冤，便把孙雪娥买进周府做佣人，百般凌辱，又将其转卖为娼。孙雪娥不堪其侮，终致上吊自杀。

难耐凄凉的孟玉楼，后再嫁李衙内，独得善终。各房丫环、媳妇亦风流云散，家奴拐财远走他乡，帮闲者亦各投新主。至此，西门氏家族已一败涂地，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惟正妻吴月娘守着孝哥儿，凄凄惨惨地度日而已。

再说陈经济被吴月娘撵出家门后，大肆挥霍家财，既而逼死西门大姐，后沦落为乞丐。在他父亲的朋友王杏庵老汉的引介下，出家当了道士。因嫖娼事发，被送到周守备府。春梅谎称他是“表弟”，瞒过了周守备，把他收留在府，还为他谋取了一个参谋的空头职衔，并给他娶下葛翠屏小姐为妻，让他到

临清去开酒店。在临清，他不意遇见了王六儿母女，又和王六儿女儿韩爱姐一见成奸。葛翠屏死去后，他和春梅旧情复发，乘守备出征之际，与春梅昼夜淫纵，因事败露，遂被周府家人张胜杀死。

春梅在陈经济死后，寂寞无聊，不堪冷落，又勾引家人的儿子，十九岁的周义成奸，终因过渡淫欲，得痨胃病而死，亡年二十九岁。

金兵入侵，冠犯中原，打到东昌府（离清河县很近），吴月娘带孝哥逃往济南，欲投奔亲家云离守，路经永福寺，遇普静禅师，月娘省悟，乃知孝哥即为西门庆托生，孝哥应前愿出家，做了普静之徒。不日，张邦昌于东京称帝，宋高宗于建康（今杭州）即位，朝分南北，干戈宁息。吴月娘归家，遂改心腹小厮玳安为西门安，承受西门家业，侍奉月娘，七十岁而善终。

《金瓶梅》的确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在明代，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一起，被列为“四大奇书”，到了清代，又被冠以奇书之首，称“第一奇书”。至于它的创作主旨，明清两代认为它“指斥时事”，“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写世之丑妻、净妻。”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给以高度的评价。鲁迅先生把它列为“世情书”之最。郑振铎先生则认为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到了八十年代，学术界更把它誉为小说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看来，无论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方式，都有超越以前作品的独特地方，而且，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具体地说，它的“奇”，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首先，它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现实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它对社会生活反映的方式和效果，较之它以前的小说都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它以前的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如《三国演义》；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如《水浒传》；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如《西游记》等，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毕竟隔了一层，有明显的距离。而《金瓶梅》完全是细腻的写实，普通人成了小说的主角，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了小说的热点，它所描写的是一个家庭，实质反映的却是世俗生活的大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这是以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

其次，它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它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是多面的立体人物，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庞春梅、陈经济等，各有其性情，各有其声口，实实在在，有血有肉。这些人物形象，不再是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巨人”，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全人”。它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几乎全部都是反面人物，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都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而且塑造了一群罕见的、自我生命强烈的一群女性，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有《红楼梦》才能和它匹敌。

再次，它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前的独特而完整的圆形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以家庭为圆心，将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都网络在这个圆内。诸如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爱情、婚姻等等，应有尽有，市井三百六十行都涌进了小说的殿堂，可谓十六世纪晚明社会生活风俗史，一部百科全书。而以前的小说，如《三国》、《水浒》等，只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而不

是社会生活的全貌。

当然，《金瓶梅》的缺陷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它赤裸裸的性描写，虽然说，这些性描写只占全书的百分之一二，然而正是这极少的文字，使它一直背着“淫书之最”的恶名，屡遭禁毁。即使在现在这样改革开放，学术氛围宽松的环境下，它依然不能以全本的真实面貌问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人们指责《金瓶梅》的地方何止这些。比如，它全书除偶一出场的正面人物，如武松外，几乎全都是反面人物，没有理想，没有光辉，没有诗情画意，没有美的追求；有的是卑鄙、龌龊、荒唐、堕落、拐骗、奸淫，呈现出世纪末的颓败而不可救药，简直是昏暗一团，难怪有的学者称《金瓶梅》的主题：暴露、无情地暴露，真是一语中的。

《金瓶梅》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

（一）词话本系统。这个系统的本子都题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故称词话本，首有欣欣子序，次廿公跋，后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序，无图。

（二）崇祯本系统。传统所谓之崇祯本，通指《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这个系统的本子或只存东吴弄珠客序，或复有廿公跋，但均无欣欣子序，有图二百幅或一百零一幅不等，有评语。

（三）张竹坡评本系统。全称皆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故又称第一奇书本。这个系统的本子首有谢颐序，署为“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多数本子的扉页上题有“彭城张竹坡批评”。

目前国内最流行的是：

①《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两册，全书删去19174字。

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两册，齐鲁书社出版，1987年1月第1版，全书删去10385字。

【试　析】

毛泽东一生酷好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古典小说。他习惯于体会小说的细节描绘，重视作者的生活经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描绘生活细节，扩而言之，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毛泽东常常从这一角度对一些古典小说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做出提纲挈领的评价，对《金瓶梅》也是如此。

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很明显，是因为《金瓶梅》的确反映了历史最本质的一面。我们知道，《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是十六世纪晚明的中国社会。这一时

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商品经济得到急剧发展，小说对主角西门庆经商致富的过程、资金运转情况、商业经营的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极为详细的描绘，如果把《金瓶梅》说成是嘉靖、万历朝的经济史，也不为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

除了经济生活外，《金瓶梅》还描写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暴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在《金瓶梅》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吏，从上到下，都是贪赃卖法，循情枉法。

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最典型的莫过于西门庆在迫害他的忠实家奴来旺及其妻宋惠莲的事件上。他不但奸占了来旺的妻子宋惠莲，还设下圈套，陷害了来旺。结果使来旺不仅遭受了重责和苦打，最终还被递解回原籍徐州。宋惠莲忍辱不过，上吊自杀。她的父亲宋仁，要到县里告状，结果被西门庆使了银钱，抓到县衙，不上几天，就呜呼哀哉了。在《金瓶梅》里，这些奴隶们，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他（她）们与统治者的矛盾很尖锐。来旺对西门庆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宋惠莲在临死前，也敢于痛快淋漓地揭露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特别是一些女奴，她们不敢明斗，也敢暗争。如秋菊，即使多次遭受苦打，甚而皮开肉绽，最终还是把潘金莲和陈经济的丑闻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金瓶梅》还写到了在商品经济急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选择和伦理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过程。那是一个去朴尚华、穷奢极欲，“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乃不以

纵谈闺帏之事为耻”的时代。他（她）们不仅特别放纵于衣食住行、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官能享受，而且精神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对娱乐性文化的生活要求。拿西门庆一家来说，他及妻妾们于吃、喝、玩、乐是极端地放纵，“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这种风气也波及到了一般市井细民。如穷帮闲常时节，穷得家里揭不开锅，但他得了西门庆接济的二十两银子后，首先想到的是花六两银子到街上为老婆买“时髦服装”。其它如孝的问题，义的品德等等，也渐渐被遗忘了。特别是女人的贞操观念，显得极为淡薄，她们都有改嫁的自由，对婚姻有相当的自主选择权。她们不再为哪位丈夫守节到白头，而且，许多女性都数度改嫁。更有甚者，即使丈夫在世时，也往往与他人通奸，既不讲贞节，也不讲贞操。而在男性方面，居然还有不少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予以鼓励。说穿了，他（她）们看重的是实别利在金钱面前，对传统道德及人的尊严似乎都可以摈弃。所有这些变化，在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金瓶梅》正是以形象、生动、细致的文字，以全方位、多角度的视角，真实反映了那个社会的全貌。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认为“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说起《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这主要体现在男子对女性的摧残上。在作者的意识深处，女人不是人，而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或者说得稍微文雅一点，也只是供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一台雍客华贵的生殖机器。而那些出身低贱者，甚而那些妾，似乎是祸水、是尤物，是她们把男人勾引坏了。她们明明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但作者还要把她们谴责一番。

西门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淫棍。凡列入他奸淫圈内的妇女，他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不管是何等样人——上至官僚太太，下至仆妇丫头，不论妍媸、善恶、贤与不肖。除他的妻妾外，他陆续奸淫了不少婢女与家人奴仆的妻子：春梅、迎春、兰香、如意儿、来旺的妻、来爵的妻、韩道国妻、贲地传妻，等等。外遇则有中年寡妇、败花残柳的林太太、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何止这些，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性虐待狂。他常常在女人身上烧香，以女性的痛苦来感觉到他作为男性的伟大。“用安息香一起点着……须臾，那香烧到肉根前，妇人（指如意儿）蹙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也!”被西门庆用香烧过的女人，除了如意儿，还有林太太、王六儿和潘金莲等。

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自然是看重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毛的评论的确极为精当，尤其是在50至6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内，很是别具一格。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到《金瓶梅》这部书，但在创作中深受其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脂砚斋有一则批语云：“写个个皆别，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这意思是说，《红楼梦》学《金瓶梅》学到了家。我们从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场面的描绘、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几方面，来看两书的关系。

从题材的选择上看，两者都是从一个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着眼，进而体现一代社会的风貌。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

书金瓶梅读法》中说："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即是说，举凡家庭的日常起居、饮食宴筵，婚丧嫁娶，社会交游，以及家庭内部的夫妻、妻妾、主奴、奴奴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都得到了细致逼真的描摹。只不过《金瓶梅》写了一个暴发户商人家庭，而《红楼梦》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后者比前者更典型，更具有代表性，而且，《红楼梦》不像《金瓶梅》那样沉闷、窒息，那样过多的肉欲描写，而有更高的品格和美学追求，较之前者，显得更为文雅高明。

在情节结构上，《红楼梦》仿效《金瓶梅》，也构架起了一个浑然一体的圆形网状结构。这个结构以家庭为圆心，纵横交流，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各级官吏及市井细民，三教九流，它所支撑起的圆面，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

在场面描写方面，《红楼梦》同《金瓶梅》也有许多类似之处。或仿效，或借鉴，或暗合，痕迹宛然。举例来说，《红楼梦》第十三、四、五回关于秦可卿丧事的描写，同《金瓶梅》第六十三、四、五回对李瓶儿丧事的描写，就有些仿佛。贾珍问寿板价值的一段描写，全从《金瓶梅》学得。不过，从形式上说，《红楼梦》的场面描写更为千姿百态，挥洒自然，摇曳生姿。

在人物塑造上，《金瓶梅》给《红楼梦》也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西门庆，在作者笔下，性格复杂内涵极为丰富，绝不能简单地用一"好""坏"来概括。《红楼梦》中这类人相当多。再比如，笑笑生常常把李瓶儿和潘金莲作反比式描写，而林黛玉和薛宝钗也是如此。再比如，丫环春梅与潘金莲构成正

影关系，这种组合关系在晴雯之于林黛玉、袭人之于薛宝钗等组合中也能找到。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在语言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潘金莲常说的“乌眼鸡”一词，在《红楼梦》中，凤姐和探春都说过，且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里的比喻，蕴意深沉丰富。

当然，就以上的诸方面来看，《红楼梦》都远远地超过了《金瓶梅》。《红楼梦》更为细致、严密，颇具意境，而《金瓶梅》略嫌粗疏，艺境不雅，这主要是由于草创的缘故。（霍现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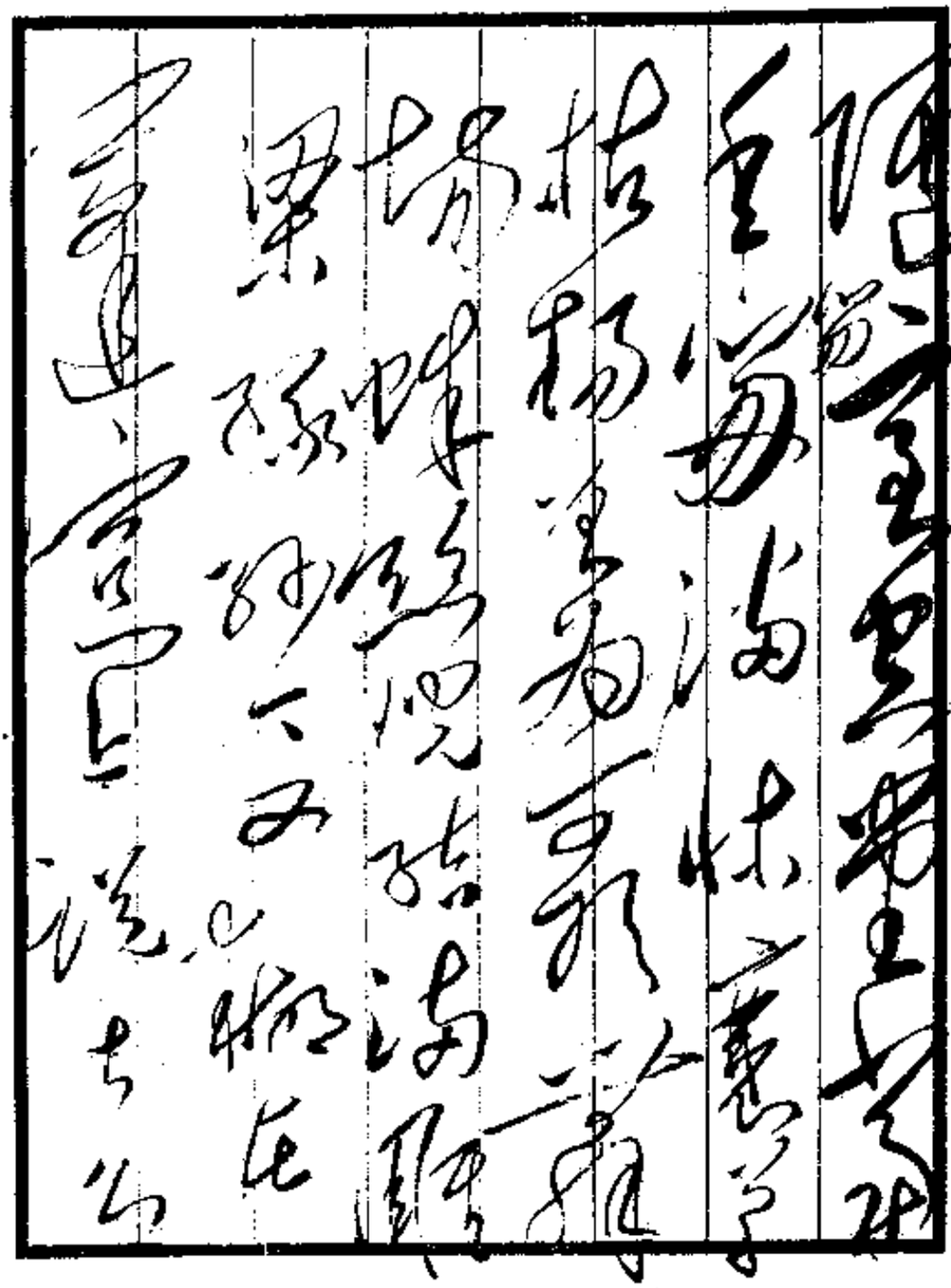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毛泽东一生爱读《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认为这是一部写得最好的中国古典小说。他为什么强调《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是怎样评价这部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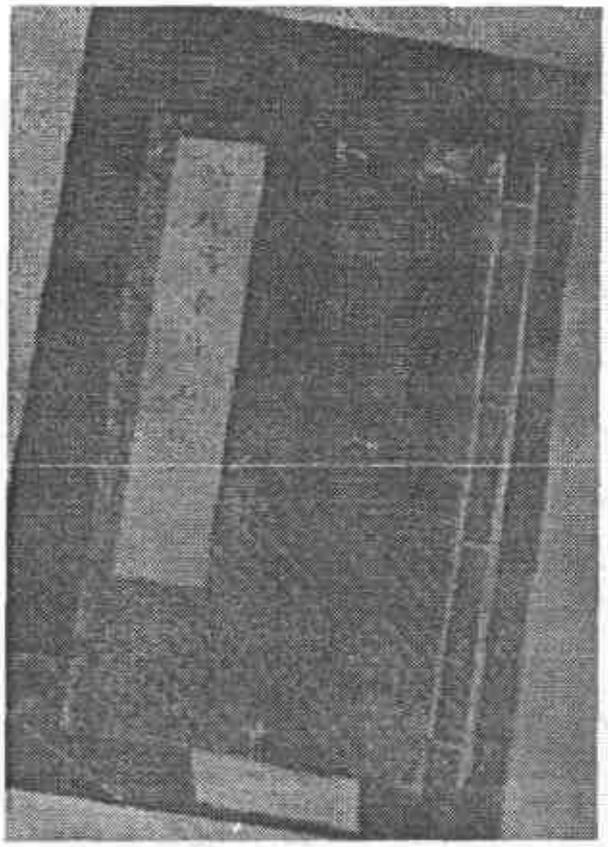
——摘自毛泽东1973年的谈话（见《许世友回忆录》第619—620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手书《红楼梦》中的诗句

【作品介绍】

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以个人和家庭的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原名《石头记》。《红楼梦》为该书流传最广的异名。全书计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撰，后40回则为高鹗所续。《红楼梦》的主要成就体现于前80回，但后40回却以一种差强人意的完整形态，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要求。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描写。在贾府这个豪门贵族由繁盛到衰颓的历史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深刻而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望族家庭的末世景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渐趋崩溃的内幕；在表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反映了那个时代部分青年男女的觉醒意识与封建社会的尖锐矛盾，揭示了导致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出封建社会日暮途穷的逻辑命运。这部小说人物形象鲜明、结构精美、语言素朴而富有个性，在艺术



毛泽东读过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引导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和对美的理想的追求上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

【试　析】

《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他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这部小说，在1913年作的《讲堂录》里，便有读《红楼梦》的记载。从事革命活动以后，他经常阅读和谈论《红楼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20年代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与妻子贺子珍谈到中国古典小说时，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认为“《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到陕北后，毛泽东托人从“国统区”买来《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会间休息与几位将领聊谈时说，不看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不能算中国人”。他问徐海东看过这三本书没有，徐海东回答说：“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毛泽东爱读《红楼梦》，也对这部小说有深入的研究。著名作家茅盾回忆说，1940年6月他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

来问候他，在谈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时，就“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建国后，《红楼梦》更成为毛泽东案头的必备之书，尤其是1964年以后，他多次向工作人员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读过的版本有《全图足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二十多种，甚至还翻阅过根据《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仿写、“续写”的《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续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圆梦》等。毛泽东逝世后，他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他在丰泽园和游泳池住地的图书时，就发现了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及各种铅印本等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其中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毛泽东阅读时都用铅笔圈画过。可见他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细很认真的。

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五遍”。据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的记述，毛泽东说他至少看过五遍《红楼梦》，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他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回答看了两遍。毛泽东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此外，毛泽东在60年代同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如谭启龙、许世友等）、哲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谈到《红楼梦》要看五遍。其实，毛泽东是用“五遍”来强调多读和读懂《红楼梦》。据《中华大字典》解释，“五，屡也。”苏洵的“五战于秦”句中的“五”就是多次之意。在毛泽东看来，象《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不认真地多读几遍，是不能吃透其精神实质

的。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相当高。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我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把《红楼梦》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相提并论，一方面说明《红楼梦》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另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很重视《红楼梦》，把它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

1962 年 8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通过几部古典小说的比较，强调了《红楼梦》是写得最好的古典小说。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种比较，在宏观的历史坐标系中更突出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成就。

毛泽东除了充分肯定了《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外，还对其艺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从他批注的《红楼梦》来看，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赞许有加。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写的批语是："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第十七回写道："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在第十九回写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

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这段批语通过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深刻地揭示出《红楼梦》高超的艺术价值。

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和语言。如在1938年5月毛泽东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他讲得幽默风趣，既形象地说明了“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也暗示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以此讽刺了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反共。在“三反”运动时他用贾政做官的故事，告诫党政干部警惕被坏人包围。至于运用《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来说明事理，更为多见。如

他曾多次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并非象人们想象得那样好办。他不止一次引用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人们勇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他还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阐述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这些引用既肯定了《红楼梦》文学语言的质朴、自然、生动、传神的风格，又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了如指掌，融会贯通，能随机应变地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强化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反映出他对《红楼梦》的评价相当高。他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很突出，必须反复深入地学习才能真正地把握其要领，领会其丰富、深邃的内涵。（赵朕）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毛泽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政治领袖的视角来读《红楼梦》的。他认为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他是怎样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他是从哪些方面分析《红楼梦》的历史价值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摘自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

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摘自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作品介绍】

（从略）

【试　析】

这五段话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谈到《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讲的。它反映了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具有未定性，

不同的接受者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期望。《红楼梦》作为一部千古杰作，历来对它的理解与欣赏就是见仁见智。对此鲁迅曾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对于作品，欣赏者往往要溶入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和现实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少年时读《红楼梦》是当故事读的，但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从考察、解剖历史生活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演变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理解和欣赏这部不朽的巨著了。早在1938年毛泽东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做报告时，就指出，不要把《红楼梦》看作是只描写了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包涵有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他同刘少奇谈到《红楼梦》时说，它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他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他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1965年又同王海蓉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在毛泽东看来，读《红楼梦》不要停留在故事的表面，要挖掘出它的历史意蕴，实现更高层次的审美期望。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红楼梦》展现了封建社会形象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而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小说对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不满意，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还在1961年和1962年提到《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写得有点希望”，这都说明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要求。如果当时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民主性”的意向也难以萌生。因此，认真阅读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既能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又能悟出《红楼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其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展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红楼梦》虽然以豪门贵族贾家为中心，但却是一家连三家，形成了贾、史、王、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清代的二知道人在评价《红楼梦》的创作意义时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充分说明贾府的衰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缩影。对于贾府的败落，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那句“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是个关键。在贾府中一代又一代的男人都成了膏粱纨绔，象凤姐那样的女人“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就连贾母的权力也受到挑战，“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这不仅说明贾府鲜有为家族“运筹谋划者”，而且还反映出以贾母为中心的宗法家长制的动摇。面对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使是探春想修补这个将倾颓的家族大厦，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

窗上”，就成了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兴衰变化的形象写照。

恩格斯在论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恩格斯是把《人间喜剧》当历史来读的。联系到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要求，我们从《红楼梦》里所了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不亚于《人间喜剧》提供给人们的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赵朕）

《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毛泽东读《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是讲阶级斗争的”。第四回是小说的“总纲”。他为什么说第四回是个“总纲”？他是怎样理解《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　深

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作品介绍】

（从略）

【试　析】

这几段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都突出了《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的内容。

《红楼梦》是一部以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着意表现豪门贵族内部冲突的小说，并没有直接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却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依据“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到这部小说所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毛泽东在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到《红楼梦》时说：“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进而，他又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对贾府进行阶级分析：三十多个主

子，三百多个奴隶，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有几十条人命案。基于如此的认识，他才得出“《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被压迫牺牲的死的很多”的结论，明确了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内涵。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还基于他对第四回的分析。他说，“《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这主要是因为在第四回中提到一张“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这贾、史、王、薛四大豪门贵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封建统治的网络。毛泽东把第四回作为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是因为“护官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一种“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生存方式，揭露了他们以此为庇护伞对平民百姓进行为所欲为地欺凌和掠夺的卑鄙伎俩。在这一回中写平民冯渊告薛蟠“依财仗势”，将冯的小主人打死，“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新任知府贾雨村本想为民伸张正义，但从门房处得知，致死人命的薛蟠乃属“护官符”中的雪（薛）家，因而贾雨村为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只得徇情枉法，使薛蟠逍遥法外了。这就雄辩地说明毛泽东抓住第四回这个“总纲”，就解决了《红楼梦》表现阶级斗争内容的关键。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的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谈情说爱）就是掩盖它的”。这里毛泽东又从一个新的视角谈到《红楼梦》是讲

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同他说的《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第四回是个“总纲”的观点是一致的，应该联系起来理解，不要落入旧红学索隐派的窠臼。毛泽东对旧红学索隐派的不满意，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宝黛爱情本身所涵括的政治意义，而又把小说的政治内涵索隐得过于具体。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宝黛爱情的悲剧是与贾府的日常生活溶为一体的，如林家的败落，宝钗寄居贾府，元春晋封为贤德妃，贾赦、贾珍“交通外官，恃强凌弱”，以及贾府被查抄等等。这些以贾府为中心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与四大家族的政治经济命运息息相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可见，《红楼梦》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它在着重反映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的同时，自然地透露出封建社会的生活矛盾，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红学”，并且形成了有影响的两大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据派，又称“新红学”。前者将小说的内容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后者是把这部小说视为作者的自叙传，注意研究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但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巨大价值。毛泽东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来读这部小说，以政治斗争的阅历来理解《红楼梦》的，因而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是历代“红学”家所望尘莫及的。（赵朕）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一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摘自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摘自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作品介绍】

《阿Q正传》，中篇小说，鲁迅著。初载于1921年12月4日—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初收于1923年8月北京

新潮社版《呐喊》。这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的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阿Q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甚至连姓都没有。他有农民的勤劳、质朴，又沾染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但支配着他意识和性格的却是“精神胜利法”。他不能正视被压迫、被奴役的现实，常常以幻想中的虚假的胜利，来代替现实中的真实的失败，使自己精神上“常处优胜”，表现为妄自尊大，掩饰缺点，甚至以丑为荣，以自虐为虐人等等，因此不再有不平和反抗。这使他受尽屈辱而不自觉。此外，他还有着一套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排斥异端，相信“不孝有三”，维护“男女之大防”等，表现了长期封建主义统治对底层人民的毒害。辛亥革命到来时，他从反对革命到“神往”革命，进而要想“参加”革命，虽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但毕竟包含着改变生活处境的合理要求。然而他却被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不准革命”，最后还被革命后的新政权当作罪犯抓去，作为“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作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描写了他的悲惨的奴隶命运，痛切地批判了他的麻木和不觉悟，特别是不能正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由于“精神胜利法”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病态心理对全社会的腐蚀和影响，有它的普遍性，因而鲁迅对它的批判具有针砭由此造成的国民性的锢疾的深广意义。围绕阿Q这个人物，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写出了他所处的典型环境，特别是写出了辛亥革命高潮中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动。起初，地主阶级一片恐慌，阿Q等农民扬眉吐气；后来，投机

者混入革命队伍，地主阶级“骤然大阔”，而农民仍被奴役，阿Q被推上了绝路。作品还反映出辛亥革命后县政权中连原任的官员都未撤换，监牢里关的还是无辜的农民等历史事实，给辛亥革命作了形象的总结，揭示了它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宣告了它的失败。小说采用传记体的叙述方式，以高度典型化的方法和“白描”、“画眼睛”的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并将冷峻客观的描绘与适当的艺术夸张和讽刺手法结合起来。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它所塑造的阿Q的形象被列入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它都对后来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二十年代以来已有了近四十种文字的译本，说明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学名著之一。（史承钧）

【试　析】

《阿Q正传》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熟读的现代小说。

《阿Q正传》问世以后，阿Q这一形象立刻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议论的浪潮此起彼伏，一直延续了30余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自1956年，毛泽东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评述之后，大家才停止了争论。因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顺便提到的关于阿Q的话，确是击中要害、画龙点睛的惊人之语，解决了学术上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解决了“阿Q是个怎样的典型”的问题。《阿Q正传》问世以后，有人说：“阿Q是中国人的典型”，有人说“阿Q是中华民族的典型”，有人说“阿Q是人类的典型”，有人说“阿Q只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典型”。

以上这些观点虽然不无合理的成分，但都只着眼于阿Q性格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上的理解，因此是片面的。毛泽东指出，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段话中的一个“农民”、一个“落后”、一个“不觉悟”、一个“革命”、一个“拿点东西”，就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价。这里既有宏观上的把握，又有微观上的审视；既强调了阿Q及其性格的阶级属性，又顾及到阿Q性格的复杂性；既注意到阿Q性格的各个侧面，又指出了他最突出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没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高超的思维艺术，是很难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难题的。二是解决了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有人说，阿Q的革命是胡闹，不足称道；有人说，阿Q是革命农民的代表，阿Q“造反了”的呼叫是“时代的最强音”，阿Q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都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说：“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拿点东西”，就是阿Q革命的目的。毛泽东的评价和鲁迅的创作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即对阿Q的革命观，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尽管如此，但阿Q和假洋鬼子有本质的不同，阿Q的要求革命和假洋鬼子的投机革命，也有本质的不同。阿Q的革命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被奴役者要求改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毛泽东也深味鲁迅的创作意图，即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所以，毛泽东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提出了指责。毛泽东对阿Q的革命观是否定的，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参阅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以同样的意思提到了《阿Q正传》，希望与会同志不要以为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准许别人革命，不要当《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还要工作人员在会议上印发鲁迅的这篇名作。

毛泽东最早谈到并引用的文字可能就是前面引述的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当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国民党作了一定的让步，这被国民党的某些人认为是一种“投降和悔过”的表现，毛泽东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去形容他们的这种心态是非常形象并恰如其份。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针对国民党很少谈到国共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这一问题，又借用阿Q这一形象讽刺国民党的精神胜利、狂妄自大、盲目陶醉。他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

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举鲁迅写阿Q为例，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在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七届六次全会上，毛泽东又说：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多次提到鲁迅和《阿Q正传》，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作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看来，毛泽东讲《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关键是鲁迅塑造了阿Q这一好形象。

《自嘲》中的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旧体诗，特别是《自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其中的两句诗，号召人们以之为座右铭，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起这首诗，认为它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

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55页）

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合乎辩证法。

——摘自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介绍】

自　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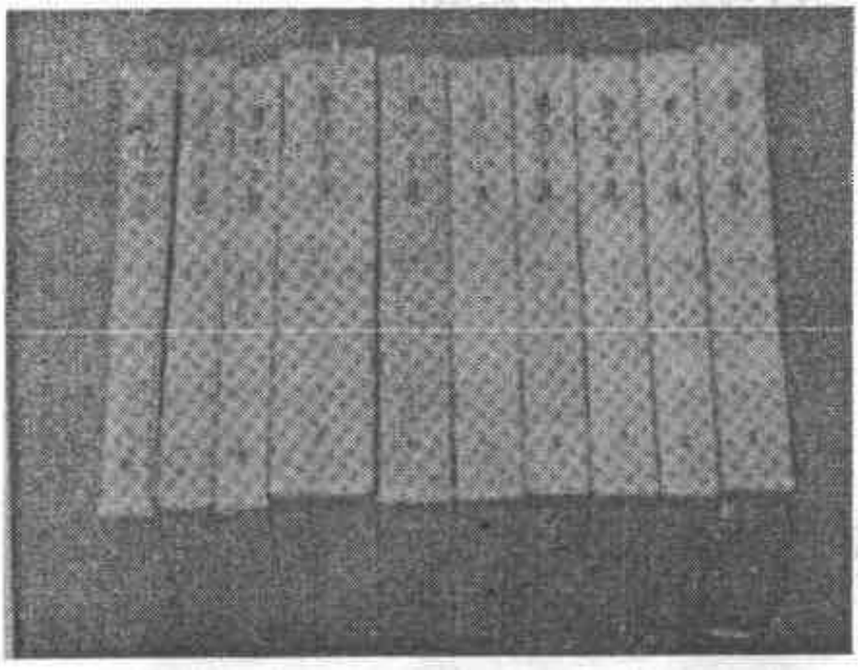
鲁　迅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试　析】

鲁迅的诗数量不很多，但也是鲁迅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他的文章一样，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毛泽东很爱读鲁迅的诗，特别是旧体诗。1957 年 1 月 14 日他在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1938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1959 年 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 年 3 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全集共收诗四十七题五十四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遍，



毛泽东通读的《鲁迅全集》

不少诗他都能背下来。

毛泽东对鲁迅的诗读的非常仔细。《鲁迅诗集》中有一首他于1931年3月5日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歌》。“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记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翻阅《鲁迅全集》

外国朋友来访时，毛泽东常书写鲁迅诗句相赠。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十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十名成员等24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

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四十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十五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鲁迅、毛泽东都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诗书合璧的佳作却成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的丰碑。（徐中玉《读鲁迅著作》）

《自嘲》一诗，作于1932年10月12日，据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可知此诗是题赠柳亚子先生的，这首诗表露了鲁迅在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毫不妥协的坚强的战斗意志和他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这一伟大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人们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作座右铭，不屈服于任何凶恶的敌人，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毛泽东赞美鲁迅的这首诗，实际就是赞扬鲁迅的这种精神。

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释“千夫”为敌人，1944年1月，山东省文协曾给中央总学委打电报，询问《讲话》中解释“千夫”的那句话是否有误，要求“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坚持了他原来的解释，并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千夫指”，典出《汉书·王嘉传》：“千人所指，无病而死”，鲁迅和毛泽东在使用时，对原来的含义做了改变，指被千万人所指斥、咒骂、最终灭亡的敌人。这种推陈出新、不机械拘泥的作法是允许的，也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这句诗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到了这首诗，他认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符合辩证法。辩证法讲究两点论，反对单一地对待事物，鲁迅的这两句诗主张对敌人要“横眉冷对”，对人民则要“俯首甘为”，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确实符合辩证法的精神，由此毛泽东不仅从诗中引出政治意义，还挖掘了它的哲学内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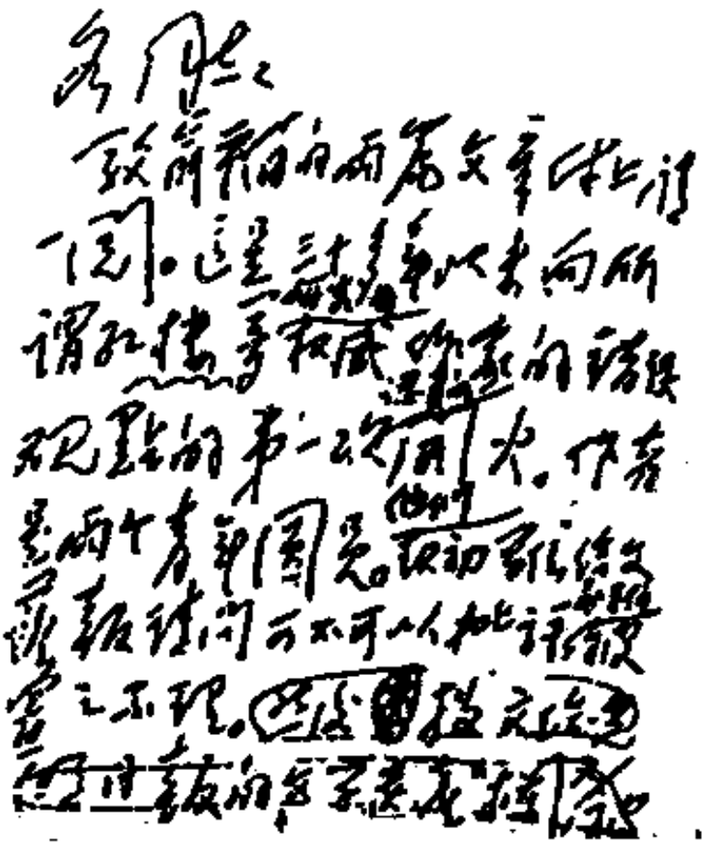
这首诗，毛泽东1945年10月在延安时就曾书写过。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时，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是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

这两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出自两个“小人物”之手，遭到“大人物”的阻拦。毛泽东专门就此文章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它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不久，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升到文化领域的讨论，最后转向政治批判……

【毛泽东评点原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



1954年毛泽东写的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信

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见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第43－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作品介绍】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希凡、蓝翎

一

《红楼梦》是我国近二百年来流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去年（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使优秀的祖国文学遗产“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321页），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人民出版机关的光荣任务之一。

同时，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说，我国古典文学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在艺术成就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学习和继承《红楼梦》艺术创造上的成就，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那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新版本的出版，也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最迫切的严肃而富有战斗性的要求：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说中解脱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学习它，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近二百年，红学家

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所以，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谬说还在影响着一部分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新版《红楼梦》出版后，在各个刊物上陆续地出现了评论文章，对旧红学家们的种种谬说作了一些批判，同时也提出了些新的见解，这种工作是及时的、有益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就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击中旧红学家们的要害，作出科学的结论来，否则，不但使战斗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影响。

《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继续与发挥。作为两个年轻的《红楼梦》的爱好者，我们愿就《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二

《红楼梦》出现在清代王朝的所谓“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期正是清代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它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历史的转变期中注定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集团的内部崩溃开始表现出来了。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贵族家庭也是在这一巨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困的生活。曾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雪芹，在“贫穷难耐凄凉”的境遇中，对“已往”的“锦衣纨绔之时，

饫甘肥之日”的盛世，自然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19世纪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一样，曹雪芹的某些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63页〕，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的必然灭亡。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用典型的生活画面、完整的艺术形象熔铸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深刻地暴露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整体及其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的程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有些杰出的古代作家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中某些消极因素不很相称，甚至存在着极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描写，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中，有时也能不自觉地战胜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正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63页〕曹雪芹也正是以这样的胜利写出了伟大的杰作《红楼梦》。

因此，也只有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上来探讨古典作品的

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恩格斯论到文学的倾向性时写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4页〕

俞平伯未能从这种角度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他(指曹雪芹——笔者)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反正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又说："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能够脱离了阶级的倾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着重点均为笔者所加。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再分别注出。)

俞平伯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红楼梦研究》一书否认《红楼梦》倾向性论点的新的面纱。他在该书《红楼梦底风格》一章中，大大赞扬了所谓《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之后，又把《红楼梦》与《水浒》对比一下，说：

"我们看《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的不满少了些。换句话说，《红楼梦》的风格比较温厚，《水浒》则锋芒毕露了。"这意思也就是说，《水浒》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倾向性，"愤激之情，溢于词表"，因而惹起了俞平伯的不满，而《红楼梦》却具有"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之风，依照俞平伯的论断，"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样的名贵啊"！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批评观点出发，势必得出那样模棱两可的结论。

《水浒》和《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各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从鲜明的政治倾向来看，无疑问的，《水浒》是一部描写伟大农民战争的作品，它热烈地歌颂了农民起义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罪恶，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中揭示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痛苦，它较之《红楼梦》从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暴露其罪恶，却是更加直接、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毛主席告诉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5、826页）

俞平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

过火的“怒书”，并对他所谓的《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力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俞平伯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红楼梦简论》中，他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而“这些成分每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这所谓“基本的观念”，也就是他在《〈红楼梦〉的传统性》一节中很明白的说过的：“《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只能是图解这个抽象观念的影子。即像俞平伯所说：“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角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戏叫《红楼梦》。”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所表演的一出“戏”，其中人物形象就成了这“戏”的客观扮演者。

也许俞平伯会说，“色”“空”观念是《红楼梦》原有的，并非己创。是的，我们也承认此说有所本，甚至也承认作者的世界观有着这种虚无命定的色彩。书中许多地方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曹雪芹世界观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述，评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绝不能简单化地以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因素为主要依据而下断然的结论，而是要看作者的世界观的整体对其创作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的程度，要看作者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

我们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探讨《红楼梦》所得出的结论与俞平伯的结论恰恰相反。《红楼梦》之所以能在创作上取得了杰

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认识不是坠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深刻憎恨，对于大观园被压迫的女奴以及叛逆的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的热烈同情。所以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

俞平伯既然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因此，也就必然会引出对人物形象的唯心主义的理解。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书中人物要说代表作者哪一个都能代表作者，要说不代表作者，即贾宝玉也不能代表他。”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说法实际上也是《红楼梦研究》中某些论点的重复。例如，该书以极大的篇幅讨论钗黛问题，仅只从表现形式上论证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都各自体现着作者所理解的美的一面，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综合”的人物。即所谓“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但俞平伯的根据除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和一些拼凑起来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外，就只有《红楼梦曲》《引子》中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俞平伯解释说：“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所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吧。”

很显然，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依照冠于红楼梦十二支曲之首的《红楼梦引子》来判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

者所要悲悼的是全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而最主要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原非只指钗黛，则甚明显。

最充实的论据还是作品本身。就以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而论，在俞平伯所引证的《红楼梦引子》之后，明明有一首《终身误》，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对钗黛的态度。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

自然，俞平伯并未忽略此曲，然而他所感到有趣的却不再是作者对林黛玉的态度问题，而是钗黛次序的先后问题，于是就轻轻地用“《终身误》是钗黛合写”一句话把内容回避了。

俞平伯想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论据来否定旧红学家们右黛左钗或左黛右钗之说。自然，旧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这场恋爱纠纷说过很多龌龊的牵强附会的话。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中也表明了贾宝玉不爱薛宝钗而爱林黛玉，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俞平伯即使再费几十页文章的考据勉强把钗黛合为一人，也是不能说服读者的。

我们并不想多从考据学的观点来批评俞平伯，他这种观点之所以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形象的曲解。

无疑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创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他们反对礼教传统，蔑视功名利禄。他们在这样共同的精神生活中相爱起来。尽管他们的恋爱和生命的结局是悲剧的。但他们却以此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表示了抗争。他们的思想已开始从原阶级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抗议。

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贵族家庭所

需要的“正面人物”。贾宝玉、林黛玉所叛逆所反对的正是薛宝钗所竭力肯定和拥护的。俞平伯用了许多考据功夫，企图向读者证明作者和贾宝玉都爱薛宝钗，从未贬过她。我们虽然没有去考证这个问题，却在三十二、三十六回碰到两段非常生动的描写与叙述。贾宝玉不仅明显的贬薛宝钗，并且将她与林黛玉相对比。先看三十二回的一段对话：

……湘云笑道：“……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

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了一会子去了。……谁知这一个（指宝玉——笔者），反倒同他生分了。……”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

其次，再看三十六回的一段描写：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闲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

敬黛玉。

这不用解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什么是宝黛恋爱的思想基础，什么是钗黛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质差别。从文学形象内涵的意义来讲，这是两个对立的形象。可是经俞平伯一“综合”，便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这充分暴露出俞平伯对现实主义人物创造问题的混乱见解。

如果说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可以是作者理想的意中人的综合表现，那么，《红楼梦》中全部生旦净末丑的角色，也完全有可能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既如此，也就怪不得可以统一在“色空”的基本观念上了。

我们这样表述俞平伯的论点固然过于粗糙，但却符合他的论点的逻辑发展。总之，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

三

俞平伯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俞平伯也承认《红楼梦》有其不可忽视的传统性，认为它对“唐传奇”与“宋话本”来说，是“接受了、综合了、发展了这两个古代的小说传统”。这结论似乎很正确。可是，俞平伯又用什么观点并从哪些方面来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呢？现在我们就“传统性”一节中的论据逐条地加以分析一下。

一、在《红楼梦研究》中，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之脱胎于《金瓶》，自无讳言”，而《红楼梦简论》正是从此出发来

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而“给它以最直接的影响的则为明代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并说这“色空”观念“明从《金瓶梅》来”。但我们以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地主的腐朽生活的作品，而《红楼梦》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后者在创作上受前者的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后者决不可能是脱胎于前者，这不仅从书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就连俞平伯自己不也考证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所谓自传吗？那么，这“脱胎”又从何说起呢？不加具体的分析，而武断地确定《红楼梦》从《金瓶梅》那里承继了抽象的“色空”观念，这首先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二者是现实主义作品。这种所谓“继承”根本不是什么文学的传统性。如果真有这样的所谓“传统性”，这些作品也就不成为现实主义杰作，而却变成了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这对《红楼梦》和《金瓶梅》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都是极其明显的曲解。

二、俞平伯又举《红楼梦》二三、二六、四九诸回，宝黛引用《西厢》来谈情以及写作方法上的某些相似为例，而认为这是《红楼梦》“源本《西厢》”的文学传统性。

我们承认《红楼梦》的作者确实是受了《西厢记》的影响，但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影响认为“源本《西厢》”呢？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可能而且也必然综合了前代优秀文学传统的影响，但更根本地是它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因为现实才是源，传统只是流，否则，源流颠倒，也就无从称它为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俞平伯在这里所举出的例证，虽然是“最特出的三节”，但是哪一节也不足以说明《西厢记》与《红

楼梦》的传统关系。

《红楼梦》有许多地方引用《西厢记》，这是事实。但这种引用以俞平伯所举的例子来说，只是为了丰富作品情节，强化人物性格，更深刻地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更突出，使人物性格更丰满、更鲜明。宝黛大谈《西厢记》是为了表达他们被封建礼教禁锢在内心的爱。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这种情感是不能用坦率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的。如果这就是文学的传统性，那么，一部最坏的作品假若能引用一些著名作品的原文，当然也就可以说它是继承了这些名著的文学传统了。果真如此，这种传统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谓"脱胎于《金瓶》"，所谓"源本《西厢》"，其传统性的概念不过如此。

三、不但如此，俞平伯认为"《红楼梦》还继承了更古的文学传统，并不限于说部，如《左传》、《史记》之类，如乐府诗词之类，而《庄子》《离骚》尤为特出"，并举二一、二二、六三、七八诸回以证之。实际上像妙玉之赞《庄子》等例子，犹宝黛之谈《西厢》，乃人物性格的鲜明表现，并非是作者的文学观。俞平伯的这种说法，不知是在谈作者的文学素养，还是谈文学的传统性。我们以为首先明确文学上的术语和概念，对俞平伯来说还是必要的。

四、此外，俞平伯还以《红楼梦》中与《西厢记》、《西游记》、《水浒》、《金瓶梅》等书某些在写作方法上相似的情节，来论证《红楼梦》的传统性，认为它是从这些书"脱胎换骨"而来，或与某书是"一脉相连"的，甚至说仅从"隔花人远天涯近"一句话就演化成一段情节。这实质上和上面所分析的俞平伯的许多唯心主义的文学见解确是真正的"一脉相连"的。

我们不想再多加分析。

总之，俞平伯在论证传统性问题时一再解说："它不是东拼西凑，抄袭前文，乃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但从俞平伯的实际分析里，却只能得出《红楼梦》的作者是个抄袭专家的结论。至于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却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但究竟什么是《红楼梦》的"传统性"呢？

我们认为：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而最根本的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态度问题，即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只有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才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红楼梦》的辉煌成就与它以前的古典文学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红楼梦》继承并发展了由《诗经》、屈原、杜甫、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伟大作家所代表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中的人民性传统。《红楼梦》以前的一些小说所暴露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虽然也相当深刻，然而它的深度和广度还显得不够，至少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生活的作品里是如此。但是到了《红楼梦》，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并进而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一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人们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了解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本质，认清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但是俞平伯却认为："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

庭。……简单说来，《红楼梦》的作意不过如此。”将“封建地主家庭”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作为典型的现实生活现象来考察，必然要陷入片面性和局限性。不仅如此，俞平伯还认为，作者对于这个家庭“虽褒，他几时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这样就把曹雪芹看成是没有爱憎缺乏是非的作家，《红楼梦》也成了没有爱憎缺乏是非的作品。很明显，俞平伯的这个见解和他对待《红楼梦》的倾向性的论点一样，只从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方面去衡量他对本阶级的态度，而不从完整的艺术形象去分析，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艺术见解。

《红楼梦》人民性的传统，还表现在作者创造并歌颂了肯定的典型人物。他把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与蔑视者宝黛作为理想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爱情和生活理想的肯定，一方面体现着作者对封建制度的蔑视与反抗，一方面体现着作者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所以当他预感到自己的主人公的性格与当时环境的冲突只可能出现悲剧的结局时，他的偏爱也就更明显了。他准备遵照现实生活的必然规律，在作品里给黛玉以死的下场，来显示她为现实所不容，所毁灭；让宝玉以出家来对抗毁灭了他理想和婚姻的残酷现实，以表现这逆子不回头的精神。当然，俞平伯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另外一种看法的。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他对宝黛将来的结局曾作了很多考证，结论是黛玉因体弱而夭折，宝玉为贫穷而出家，表面上是斥责高鹗续书笔法的拙劣，实际上仍是企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我们认为宝黛的恋爱悲剧正是封建贵族家庭压迫他们的必然结果，是他们的性格与社会冲突的必然结果。作者通过这个悲剧显示了宝黛为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不妥协的抗争与追求。作者是以

充沛的热情赞颂他的主人公们的行动的。但是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却认为作者“对恋爱性欲，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幻仙之训宝玉；同时又极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贾瑞之照风月宝鉴”。把恋爱性欲看成抽象的纯生物主义的，将宝黛的恋爱悲剧与贾瑞的“恋爱”混为一谈。实际上贾瑞那种荡子式的无耻行为应该加以极端的否定。“贾瑞之照风月宝鉴”，正是作者借此暴露封建贵族家庭中男女关系的混乱和可鄙，这完全可以从作者对这个家庭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贾赦、贾珍、贾琏等更深刻的暴露性的描写中得到充分的证据。作者肯定宝黛的爱情悲剧，否定贾瑞式的“爱情”，正表现着是非清楚爱憎分明的严肃态度。而俞平伯将二者混为一谈，似乎要同情都该同情，要否定都该否定，偏一则不公平，这实质上只能是俞平伯自己的逻辑。

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通过历史连续性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达到了他否定丑恶、歌颂新生的目的。林黛玉与崔莺莺、杜丽娘这些元明小说戏剧中的妇女形象是同类型的。她们都渴望着婚姻自主，倔强地反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些典型人物是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时代愈近，其积极意义也就更充分，反抗性也就会更强。林黛玉正是这一历史连续性典型更高的发展。因为林黛玉以前的那些典型，只是在某些方面显示着与封建社会制度的不调协性，特别是婚姻问题。而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却是全面地显示着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调协性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葬花词》正是这个悲剧性格的颂歌。“……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些誓词充分显示出林黛玉的叛逆性格以及同腐朽的封建势力不妥协的勇气和决

心。如果《红楼梦》的作者对这类典型的传统性缺乏了解，就不可能在林黛玉身上概括得更深、更广、更高。

连续性的典型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如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从奥涅金、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克里姆·萨姆金等形象中，可以看出人民性发展的一方面。对“多余人”批判的愈深刻，人民性也就愈强。《红楼梦》在创造历史的连续性典型时，的确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肯定的典型人物形象创造的愈完美充实，它的人民性也就愈强。

《红楼梦》的传统性还体现在作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上。一切真正伟大的艺术，其所以不朽的原因，绝不仅仅因为它在艺术方面有所贡献，更根本的是它对生活有很大贡献，通过真实的生活形象的塑造，帮助人民在社会斗争中和精神上争取解放。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生活理想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反映，在斗争中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曹雪芹的《红楼梦》，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传统。

首先，《红楼梦》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描绘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人的悲剧，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理想。曹雪芹在全书开始，以炼石补天的神话概括了全书的主题。顽石的不能补天，贾宝玉的出走，实际上象征着对封建统治者反抗的继续。在这个悲剧性的结局里，对于专横残酷的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

其次，曹雪芹不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忠实于现实主义的

原则，要写出他所理解的生活的真实面貌来，而且对文学创作在理论上也有比较明确的独到见解。《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就明显地说出了这一点。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我师意为如何？"

在这一段话里，曹雪芹确切地表达了他深湛的现实主义的见解，同时，也给了那些反现实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文学作品有力的总结性的批评。

《红楼梦》丰富的人民性、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作者从这一根本前提出发为追求完美的艺术形式所作的努力，决定了《红楼梦》独特的文学风格：深沉的痛苦、愤怒的诅咒、

健康的欢笑、绚丽的幻想、青春的气息、生命的跃动。这成功除了社会的与作家个人的因素之外，又必然地与民族形式的传统密切地联系着。

正如前面所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中也反映着为了追求文学的美学理想的斗争，当然艺术形式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所有《红楼梦》以前的伟大的古典作家，都是竭力地为自己进步的思想内容寻找完美的形式。追求语言的新颖、鲜明、深刻、准确、优美、健康、有力，追求结构形式的和谐、统一、完整，是他们共同的道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着，并使它达到了新的高峰。

《红楼梦》在民族语言运用上的成功是辉煌的。它继承了古典诗歌、散文、小说的语言美，特别发展了后期的小说、戏剧中的口语化的语言，扬弃了其中原始形态的粗造，巩固了已获得的成绩，并把北京话提高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充满着音乐的声响。

作为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如大家所知，章回小说是为了内容的需要由“平话”发展而来。在初期仍然杂有一些“平话”的原始形态。到了《红楼梦》，作者在前代小说的基础上为复杂的内容创造了最完美的形式。《红楼梦》错综复杂的网状式的结构是高度的统一完整而单纯的，这就大大地提高了章回体的艺术形式，使它达到了真正成熟的阶段。

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才使《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辉地位。

俞平伯不是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而是单纯地以考证其中某些情节、文字和古典作品的相似或受其影

响来论断其传统性，这证明他并不了解什么是文学传统性的内容。

在这里，俞平伯可能提出反驳的意见，认为他的论断是以脂砚斋的评注为依据的。当然，我们也认为脂砚斋的评注是研究《红楼梦》十分可贵的材料，然而脂砚斋是从文学类比的角度去评论《红楼梦》，它根本不能当作曹雪芹的文学观，何况"脂评"还有些不科学的成分在内呢。退一步讲，即使脂砚斋所提供的材料都是非常好的，但以俞平伯的这种观点去运用它，也很难在传统性问题上有科学的阐发。

四

以上就是我们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对《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一文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的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仍旧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红楼梦简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旧红学家们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把考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了。考证方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辨别时代的先后及真伪，提供作品的素材线索。俞平伯却越出了这个范围，用它代替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评《红楼梦研究》

李希凡、蓝翎

一

俞平伯先生所写的《红楼梦研究》，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非常缺少的现在，是颇受广大读者注意的一本书。这部书对研究《红楼梦》的贡献，主要是一些“辨伪”与“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全面地讨论了后四十回的问题，以确切不疑的论据，揭穿了高鹗、程伟元续书的骗局，指出后四十回确系伪作，但也肯定了高鹗的续作能在情节上保持《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因而帮助了《红楼梦》流传的功绩。并由此而涉及到中国封建文人续书的弊病，从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的内容统一的观点上论证了续书的不妥善处。同时，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残缺的情形和八十回后的发展线索，也作了一些考证，对几个不同的版本作了比较，如高本与戚本的比较等，从比较中发现各本的所长所短，以及在文字上的优缺点。

总之，这些属于考证范围的成绩，都是俞平伯三十年来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自然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

如果对《红楼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而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应该说，这还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曹雪芹不但在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独到见解，这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红楼梦》一开始，曹雪芹就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谈话说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词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这一段对话明显地表示了曹雪芹精湛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曹雪芹在这里所反对的是那些缺乏现实生活基础的主观编造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曹雪芹对这些虚伪的作品作出了严格的批评，同时也就替《红楼梦》作出了一个有力的辨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老一套的“才子佳人等书”是迥然不同的。但是，所谓“取其事体情理”，所谓“至若离合悲欢，……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都应被理解为作者是按照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去描写，按照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描写，而不是主观的歪曲，即如鲁迅所评价的那样：“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才符合“追踪蹑迹”意思的本质。曹雪芹正是根据这样的创作原则，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得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有着最深厚的生活感，最活跃的生命力。

作品的实际成就和作者的见解，就是《红楼梦》作为现实主义杰作的最充分的论据，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中心内容。

《红楼梦研究》虽然偏重考证，然而它却涉及到而且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对待《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正是在曹雪芹所阐发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上，俞平伯走向了歧路。俞平伯以其考证学观点，只取其中局部的字句，如“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等，从而把《红楼梦》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这样引申下去，《红楼梦》就成为曹雪芹的

自传，因而处处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二而一的互相引证，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俞平伯关于贾氏衰败问题的考证，却直接把文学虚伪的贾家和曹雪芹家世盛衰变迁的真实历史等同地联系起来看，因此所总结出来的"贾氏抄家后衰败"的三个原因：抄家、自残、枯干（见《红楼梦研究》163 页），就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些表面现象，既不能说明贾氏衰败的真正原因，也不能阐明《红楼梦》伟大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贾、史、王、薛四大封建贵族家族的代表，他们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红楼梦》以贾家为中心，描写了四大家族的活动，上至宫廷宗室，下至乡村农民，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典型的生活画面，使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贵族社会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曹雪芹笔下的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作为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阶级，愈来愈趋向奢侈浮华的物质享受。书中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所说的："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

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正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经济破败的活的写照。为了维持这种豪华享受，只有更加残酷地盘剥农民。这些贵族地主不仅向农民进行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的掠夺，还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只要看一看乌进孝缴租的那张单子（第五十三回），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封建贵族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在压榨农民，逼得他们破产了。《红楼梦》第一回写到甄士隐败家时说：“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这正反映了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不断地加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和贾氏内部的自相残杀，应该说这反映了即将崩溃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上的互相倾轧和道德的堕落，它也不是个别家庭的偶然现象，而概括了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本质。封建统治阶级虽然树立过很多的道德标准，作为被统治者的规范，然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却只是表面上虚伪地维持着这些道德的形式，实际上却是荒淫无耻、伦理乱常、勾心斗角、残酷无情。贾府的生活正是这个阶级的典型的生活状况。所以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也正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生活的典型概括，因而它才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一阶级必然覆灭的预兆，这就是《红楼梦》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面。

俞平伯把贾府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它所隶属的阶级孤立开来去考察其破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说明这一家庭灭亡的事实，而不能回答它究竟为什么必然要灭亡，亦即是它的社会

原因是什么，而这却恰恰是《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情势。

同样的，俞平伯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考证，也是抛开了它的社会内容孤立起来去考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贾宝玉结局问题的讨论。俞平伯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批判了高鹗以庸俗的封建功利主义的结局歪曲了贾宝玉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并没有给这个典型人物应有的结局以确切的解答。按照俞平伯的意见，贾宝玉应是贫穷而后出家，以消极的无法应付穷困而出家，这才是贾宝玉应有的结局，原因是“雪芹的晚年，亦是穷得不堪的”（见《红楼梦研究》146～150 页）。但曹雪芹却终未因贫穷而出家，相反的是在贫穷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着写他的《红楼梦》，把毕生精力投入这一艰巨的创作工作中，直到“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样的历史事实和俞平伯的考证是矛盾的。实际上，俞平伯煞费苦心所搜求得的结论，却完全否定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积极意义，抽掉了它的叛逆性的社会内容。

贾宝玉的结局和贾氏衰败的结局，在曹雪芹原著八十回中是没有写完的，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它的性格是统一的。我们从他的性格已有的发展推断其未来的结局，只要理解了这个性格的本质，还是可以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的。在前八十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形象，可以说已经展开了，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完整性。贾宝玉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逆子，在他的性格里体现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他同情大观园中被压迫的女奴，他力图无拘束地摆开地位的偏见。他厌恶贵族阶级的世俗生活，厌恶封建文人向上爬的必由之路的科举制度，厌恶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厌恶

封建婚姻的象征——金玉良缘，要求个性和爱情的自由发展。这一切都超出了封建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所以他在当时的"禄蠹"们看来是"痴"，是"狂人"，是"无用的废物"。同时因为他违犯了封建的道德规范，就应当成为被迫害的对象。《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展开了这两种力量的冲突。

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注：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后，到了乾隆时代又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发展更是惊人，这在《红楼梦》中是可以看出的。同时这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也是空前的（贾府中许多用具都是外国商品），可见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具备了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期的一些特点。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89页）所谓"乾嘉盛世"就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时代，因此，在社会关系上也显示出转变期的特点〕，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他已经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这种性格愈发展愈明显、愈强列，也就与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所要求他的距离愈大，当时的封建社会也就会更加迫害他，贾宝玉的性格与封建社会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但是当时的封建社会却是没有给这样的人准备下出路，他只能够以个人的形式去反抗当时的封建社会，同时也注定了他反抗的无力，因而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悲剧的。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正是通过了贾宝玉的悲剧性格，曲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贾宝玉的出走

正是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叛逆者的被毁灭，也是封建社会的崩溃的预兆。

由此可见，俞平伯所推断的宝玉贫穷而后出家的结局，就失去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抽掉了它的积极意义，使贾宝玉从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变成为逃避贫穷而遁入空门的市侩，这种看法对这个富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形象，是显著的歪曲。

俞平伯对于宝钗、黛玉两个人物形象的考证，也同样地抽掉了她们的社会内容，从钗黛合为一图推断出二者实为一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批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论述，故不再重复。

俞平伯从这种追求事实的真实的观点出发去探讨《红楼梦》的艺术手法，也必然走入同样的迷途。《红楼梦研究》一书在研究到《红楼梦》的风格时，首先肯定它的“最大手段是写生”，并进一步地解释“虚构和写实都靠着经验，不过，中间的那些上下文的排列有些不同罢了”。“写生既较偏近于事实”，因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一面公平的镜子”。（见《红楼梦研究》117页）

我们进一步考察俞平伯的所谓“写生”是什么呢？按照他的意思，“写生”就是“记实”，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虚构与自然主义“写生”的区别，只是记录事实的次序不同，《红楼梦》是一部记录客观事实的作品，其艺术方法是自然主义的“写生”方法。《红楼梦》所表现出的“写生”的特征，就是写了一些极平凡的人物，“并且有许多极污下不堪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眉毕露无可逃避了，妍媸虽必从镜子里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镜

子却不能负责”（见《红楼梦研究》117 页）

这些意见很明显地表示出俞平伯所理解的《红楼梦》的艺术方法，也就是记录事实的自然主义“写生”的方法。

但是，《红楼梦》所以成为现实主义杰作，却并非像这些“自然主义”歌颂者们所称颂的那样，只是简单地复写客观事实真象，正如镜子照物，对所照之物的好坏美丑“却不能负责”。恰恰相以，曹雪芹这“一面镜子”所照之物，却鲜明地表现出艺术反映现实的必然规律和作家明确的是非爱憎态度，是对生活有所选择和提炼的结果，是从客观现实中概括出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进而写出了社会发展的真实本质。曹雪芹不仅暴露出生活中丑恶的一面，同时也创造出了肯定的典型人物。《红楼梦》不仅显示了在艺术描写上追求“追踪蹑迹”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这样才使《红楼梦》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

其次，俞平伯从《红楼梦》是模写事实的这个观点出发，又发现了它艺术方法上的第二个独特风格，即“《红楼梦》的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因而能够一洗前人的窠臼，不顾读者的偏见嗜好”（见《红楼梦研究》119 页）。这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悲剧结构的形成，是由于“拘束于事实”，作者为事实所迫，不得不被动地采取悲剧的结局，以摆脱大团圆的结局。”

文学作品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是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的。读者也是属于一定阶级的，“读者的偏见和嗜好”也是有阶级性的。一部文学作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最根本的是决定于作者的世界观以及他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因此笼统地以“读者的偏见和嗜好”来判断悲剧形式和喜剧形式

的优劣，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除掉人民中间所喜爱的流露着人民美好愿望的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不论外，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些文学作品所以采取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我们以为，以大团圆结局的封建文学是真正的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歌功颂德的俳优文学，它以封建地主阶级所喜爱的喜剧形式来粉饰生活，掩盖或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便达到欺骗人民、尽其巩固阶级统治的作用。在这种文学中，自然不可能产生反映社会真实的悲剧，也同样不能产生反映社会真实的喜剧，因为它是虚伪的主观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

曹雪芹是现实主义作家。他敢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在客观上也就对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规律必然有所概括，表现出《红楼梦》主人公们的必然的悲剧性结局。因而，《红楼梦》的悲剧结构是由生活的真实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贾宝玉、林黛玉和大观园里一些被压迫的奴隶对封建统治者的叛逆和反抗，所以要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产生封建制度的掘墓人，一方面也是由于它毕竟是大观园中的悲剧，他们的反抗和叛逆，都没有离开公府侯门的贵族生活环境。它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红楼梦》悲剧性结局的艺术构思正是和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互相照应的，绝不能因为《红楼梦》中有作者身世经历的某些概括，就武断地认为“他的材料全是实事，不能任意颠倒改造的，于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读者了”（见《红楼梦研究》120 页）。俞平伯的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抹煞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的“自然主义”写生说的继续。

最后，俞平伯从《红楼梦》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的片面理解上，推论出《红楼梦》艺术方法的根本特色是“怨而不怒的风格”（见《红楼梦研究》124页）。这可以说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总评价。

“怨而不怒的风格”是俞平伯将《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比较的结果。在比较的过程中，对其他现实主义杰作也大肆歪曲，认为《水浒》、《儒林外史》等书作者的态度太不“温厚”，对现实的激愤有些“过火”，缺少含蓄，不如《红楼梦》的“平心静气”（见《红楼梦研究》124～127页）。实际上，这些特点却正是这些现实主义作家们对生活矛盾更深刻的揭露，并且明显地流露着作者的反抗情绪。因之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中国文学最光辉的富有战斗性的现实主义传统。

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的实质，是他对《红楼梦》创作的“自然主义”写生说的另一表现。这就是说曹雪芹只是客观地记录自己的“情孽”经过，并没有通过艺术形象和作品情节体现出作者的爱憎来，对于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对于现实生活既不歌颂也不批判，只是复制和模写，这样的“怨而不怒”的艺术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好一面公平的镜子啊！”

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却否定了俞平伯的论点。现实主义的创作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积极地反映现实，这种反映现实的态度本身就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学评价。正因为是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积极地影响现实，唤起人们对现实的爱憎感，并为美好的理想去斗争。所以俞平伯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这种歪曲的评价是和现实主义相违背的。《红楼梦》在人民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反证了俞平伯评价《红楼梦》

观点的错误。

三

俞平伯这些错误观点的形成，自然不能不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原则问题。为此，我们也就必须进一步去探讨俞平伯是从哪些原则研究《红楼梦》的，他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如何。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他说："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见《红楼梦研究》115页）。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只凭主观好恶，并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反动的功用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翻版。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却和胡适、俞平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论完全相反。毛主席说："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7页）文艺批评在文学领域中是战斗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对待文学的态度首先看它是否对本阶级有利，是否为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文学批评就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直接阐发这些问题。因此，文学批评不可能没有标准。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5、826页）所谓各自的偏爱，实际上都是代表

着不同阶级的不同态度，决没有抽象的无原则的一般的偏爱。

俞平伯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论的见解出发去研究《红楼梦》，必然地要引导出上述错误的结论。

首先，俞平伯以主观主义变形的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曲解了作者的创作方法。

其次，正因为俞平伯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地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地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以部分概全体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地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

再次，由于俞平伯离开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因而在批评作者的态度时，就只能从形式上把它总结成：“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见《红楼梦研究》105、110 页）。这三点都是根据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表白而作出的结论。依照这样的方法，还可以作出无数类似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抹杀了作者积极的思想和《红楼梦》的现实意义；另方面，这三个结论只是作者部分的动机，而书中所表现的内容和客观效果却远远超过了这部分动机，有着更浓厚的社会内容。俞平伯只从动机去分析作者的态度是片面的。因为作家是通过作品来体现他的思想，他是生活的表现者，而不是抽象议论的理论家。曹雪芹的某些政治见解和著书动机与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是并不完全相称的，因而只分析他的著书动机而不分析其作品内容是不能得出较全面的正确结论的。只有把动机和效果、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所表现出的客观内容统一起来考察才是全面的。

《红楼梦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批评还表现

在其他方面，如脱离开内容和人物性格孤立地去分析情节结构文字等。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讲了。

以上所指出的俞平伯的这些错误观点，决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这些抑扬的话头，或者是由于我的偏好也未可知”（见《红楼梦研究》127页），因为这是文学批评的原则问题。在俞平伯的所谓“偏好”的后面，隐藏着研究者的阶级观点。从文学批评观点上说，俞平伯的见解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四

在《红楼梦研究》中，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见解相随而行的是考证学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问题。考证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文学批评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以考证代替文学批评，那就不妥当了。考证与批评是材料与观点的问题。并且这种材料也只能提供出分析批评作品的某些事实的依据，而决不能从中直接引出结论，以代替对作品的本身的全面分析和研究。即使在单纯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也仍然存在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红楼梦研究》关于《红楼梦》某些问题的考证是超出了考证范围的。例如在《秦可卿之死》一文中对于贾宝玉与秦可卿关系的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中关于宝钗、黛玉位置的考证，从“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中关于张道士与贾母隐事的考证，以及对《好了歌注》、《飞鸟各投林》的考证等。俞平伯采用了这些琐细的考证方法，把作品中统一的艺术形象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生活现象。如《好了歌注》和《飞鸟各投林》，本来是作者所描写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灭亡的抒情诗，概括地反映了这一阶级的变化。而俞平伯却

以为每一句代表书中一人的结局，在不能确定某一句代表谁时，就用“谁”、“什么”、“我以为是”等来代替（见《红楼梦研究》170～172页），实际上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测。这些臆测可能来源于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但是，即使在“脂批”里，也并没有把诗中的每一句都作为书中某一人的结局，而是作为有代表性的“一千人”提出来的。可见俞平伯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脂批”实事求是。

俞平伯的这种琐细的考证并不是无目的的，而是要和他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取得一致，用考证去证实他的见解，把完整的艺术形象分割为具体的事实，以符合他对《红楼梦》的“自然主义”写生说的见解。

五

总结起来，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写生说。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纯自传性的作品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看法。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见《胡适文存》卷三231页）他所谓的“自然主义的杰作”，所谓的“《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亦即“《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

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见《胡适文选》398页）。

俞平伯正是一脉相承了胡适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自叙”说，而且比胡适说的更直截了当：“《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他们一致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试　析】

毛泽东这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他1954年10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就两个“小人物”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文章专门致信政治局，这是非同寻常的，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总结了其研究《红楼梦》成果的《红楼梦简论》又于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1953年第九号的《文艺报》上推荐《红楼梦研究》一书，认为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据介绍，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但被退回，退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

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也是经过许多曲折才在母校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上发表。有人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但没能实现。妥协的结果是由《文艺报》转载。但编者在按语中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显然编者持保留态度。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以及它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显然，毛泽东对这两个按语是不满的，这也引出了毛泽东的那封信。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李、蓝的两篇文章，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写道：

"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廿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

据李希凡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

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功用主义。”

不管有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但是，从这几点批示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在50年代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他是十分认真的。

自然，严格地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针对着党内的一种思想倾向的。我们当时虽没有看到这封信（也包括以上引的批语），却知道毛主席曾指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短评，并亲自做了修改定稿的工作。短评对学术界、文艺界不注意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进行了批评，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
> 他们的任务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生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途。

很明显，这决不只是支持两个青年人发表在山东海岛上一所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是对“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寄予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担负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传达，并没有公开。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传达了信的精神。《人民日报》在当年10月23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次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汇报中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审读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

文时，加了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 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 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1月8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11月4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并作了批语。毛泽东批注冯雪峰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冯的错误范围不仅仅限于古典文学方面，错误的性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在冯文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毛泽东对黎之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条批注：1."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文艺报》）"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文艺报》的编者）"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4.不是这些问题（"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此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系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

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赞扬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后来，“决议”和郭沫若、周扬的讲稿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就这样，从对一本书的研究，上升到文化领域的讨论，最后又转向政治批判。

客观地讲，李、蓝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毛泽东支持赞赏他们的文章，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如何清算旧的文化思想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的思考，李、蓝文章在这时出现，自然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此，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恰如陈晋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中所说的，在毛泽东心目中，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

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学观点问题，不只是一个报刊编辑如何看待不同作者的研究结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的问题。这就必然使这场讨论和批判，后来发展到那样的规模——由《红楼梦》而古典文学，由古典文学而各文化学术领域，由各文化学术领域而整个思想理论界，由研究方法而思想批判，理论批判。

这场讨论对文艺界来讲是上了一课，上了一堂马列主义的课，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文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文学理论和当代文艺思潮。何其芳的一番话，可以反映出5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研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情况，政治的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

但是，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理理论争。一些学术批评文章过于简单化，这种做法是有违“双百”方针的，也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

1955年10月11日，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

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评点李、蓝文章的深义。

《不怕鬼的故事》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1955年，毛泽东指示把中国古典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此事由何其芳具体负责。毛泽东亲自为其修改序言，并要求将序文送《红旗》和《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本书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摘自毛泽东于1961年1月23日同何其芳的谈话（见陈晋著《毛泽东之魂》第2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稿子——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4日与何其芳的谈话（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品介绍】

《不怕鬼的故事》是由毛泽东提议，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具体工作由该所所长何其芳负责，该书选录了历代各类作品中各种不怕鬼的故事。选自的作品主要有：

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彖的《睽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韩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牛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孤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龂，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

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狂生耿去病夜坐顶鬼一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不怕鬼的故事》共70篇，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曾作为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少的影响。

【试　析】

毛泽东在1957年5月6日同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时说道：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

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在毛泽东的个人气质中有一种超凡魅力的个人自信，以及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早在1919年，当中国还是魔鬼当道、魑魅横行的时候，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向世人发出号召：“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就是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59年，在中国人民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提倡不怕鬼和主动打鬼的精神，并提出要从古代志怪、志异的人鬼作品中选取若干篇编印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鬼故事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开始变为公开论战，毛泽东日益感受到修正主义背弃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加之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华攻势也日见其凶。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严峻时刻，更应发扬“金猴奋起千钧棒”那样的主动进击的“打鬼”精神。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鬼故事，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十分自然地把它们当作鼓舞志气的工具。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时，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毛泽东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8月23日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辞，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台湾的参谋长赵家骧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个副司令吉星文

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血。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他还讲起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象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凯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同年5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西藏叛乱及随这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在周恩来、陈毅讲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毛泽东讲了一番话：“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鬼、半个人，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

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到：“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5月6日同外宾的谈话整理打印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看后，在自己的那一份上批示：“江青：看第13页。不能看，请林克同志读给你听。”江青多年养病，但在中宣部文艺处挂着职，还是负责人。这份材料的第13页，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毛泽东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同志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何其芳虽然在1938年就和毛泽东相识，但通过这次编书，使他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编书过程中，毛泽东从选目到序言都精心过问。在听取何其芳汇报时发表了许多看法，并多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上编成了。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者。不久，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未预料到的事情，《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中断了。

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把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

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释。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序言”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谕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末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话中，毛泽东讲到：“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于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

术上重视。”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向何其芳谈到自己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何其芳后来读到了。这是两首什么诗呢？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4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这是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中的两首。何其芳说后来他读过的，也是传抄件。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

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这样一大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此外，毛泽东还有几处修改，其中重

要的修改有两处。一是在序言："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很喜欢毛泽东加的这段话，认为这是使文字生动活泼起来的传神之笔。另一处是在序言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时候，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何其芳认为这是有深刻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意见进行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

“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的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并在何其芳的信上批了一段话：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的。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中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这个重要修改是要说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它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周总理1月26日对送审的书稿用墨笔写了批示：

何其芳同志：

修改了几个字，请酌。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

周总理修改的虽不多，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总理批改文件时全神贯注，对文内每个字，每个标点都不放过的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经过这样一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毛泽东是花了精力的，书中也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此书作为当时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在平）

《红与黑》中的于连
雄心勃勃，值得赞扬

《红与黑》中的于连长期以来被不少人认为是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胆大包天、想入非非的大坏蛋。毛泽东却认为于连是有胆量的人，是雄心勃勃的人，是帮助德瑞拉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这一篇翻案文章，道理何在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红楼梦》和《红与黑》两个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摘自毛泽东与孟锦云的谈话（见《大地》1992年第6期）

【作品介绍】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司汤达的真实姓名是玛丽-亨利·贝尔，司汤达是其笔名，他一生用过40多个笔名。他于1783年1月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司汤达深受伏尔泰的信徒、启蒙运动进步思想的拥护者、外祖父亨利·甘尼永大夫的影响。甘尼永大夫十分关心外孙的成长，他培养他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给他讲述历代英雄的光辉事迹。司汤达后来自己也说："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教育成人的。"

司汤达的《红与黑》于1830年11月15日在巴黎问世后，在他的祖国遭到了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甚至维克多·雨果在司汤达逝世时也这样评断："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真是大谬不然。然而，在毗邻的德国和遥远的俄罗斯立即引起两位文学天才的注目。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青年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

司汤达在世时的境遇是不幸的。他所写的33部著作，只

出版了14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巴马修道院》写过一篇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份量的赞许。然而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时间是公正和无私的。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很大变化，司汤达早已赢得了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红与黑》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名著之林。既使是中国的读者对《红与黑》这部名著的顽强的生命力也是深有体会的。它虽几度遭到非科学的对待，然而人们对它的喜爱丝毫未减。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红与黑》的名字产生了好奇，对此的解释真可谓众说纷纭。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是："红"是红色的军装，"黑"指教士的黑袍。也有人不以为然："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对卑鄙可耻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象征于连的力量，他羡慕苍鹰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征身陷囹圄的于连幻想的破灭；"红"与"黑"是赌盘上区别输赢的标志，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它只是个象征性的书名。正象后世的象征主义者所说的，它成了"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若隐若现，更增加了它的魅力。既是象征，人们本来是尽可以通过自己的体会，在意向上充实它的含义。那么能否有一个既贴近又可靠的解释呢？最权威的应该是司汤达自己，他在《吕西安·娄凡》的手稿中，谈到为一部新作取一个《红与白》名字时，曾写道："《红与

白》，或者《蓝与白》，为了使人联想起《红与黑》，并且给记者们一个启示：'红'，共和党人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女沙斯特莱"。循此可知："红"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

《红与黑》原书有一个副标题，这就是《1830年纪事》。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七月革命的一年。1814年拿破仑的垮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法国驻扎着十多万英、俄和普鲁士等国的占领军。法国不仅要承担占领军的给养，而且要付出七亿多法郎的赔款。同时，复辟了的封建势力，仇视革命，迫害人民。尤其是法王查理十世，对法国人民施行高压政策。查理十世所颁发的七月敕令激起法国人民的愤怒，终于导致在七月革命中再被推翻。本书即是对复辟时期的法国作了现实主义的写真。

据司汤达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情读者，《红与黑》就是以当地法院公报中提到的一起谋杀案为基础写成的：有个青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给他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爱上了这家的主妇，最后在一种妒忌和绝望的冲动下把她杀死了。然而，我们绝不应将其视为一本庸俗的社会小说。正如高尔基所言：司汤达的才能的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象拿破仑这样由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开头只是一名下级军官的人，一跃而为叱咤风云的国家元首，这在当时欧洲各国青年人头脑里，无疑引起了许多幻想，《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即是其一。只是于连生不逢时，

在他长到懂事之年，拿破仑已垮台，坟墓也掘了。更糟的是，他仅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摆在他面前的无非两条路：一是乖乖地继承其家业做木匠；一是凭一己之躯杀出一条血路来。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头脑比周围的人要“灵”一些。他自恃其才智，一定要为人上人。然而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阶之路已被大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堵死。天生我才必有用。此路不通，于连就一门心思要当一名年俸十万的红衣大主教。为此，他明知拉丁文《新约全书》毫无价值，却能全部背诵。由于他的惊人本领，他跨进了维立叶尔市市长的家门，做了家庭教师。

于连身上有两种“热情”：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由此，他一方面竭力想跻进上流社会，一方面又瞧不起上流社会人物。他开头所以要占有市长德·瑞拉夫人，为的是要对看不起他的市长之流进行报复。后来当做了巴黎一贵族的私人秘书时，他敢于在夜深人静去赴贵族小姐玛特尔的幽会，也是出于相同的动机——报复。

于连为了往上爬，为了报复上流社会对他的鄙视，他不择手段。他明明是个无神论者，却把自己打扮成最虔诚、最忠实的教士；明明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可公开场合大骂拿破仑。他甚至把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达地夫奉为自己的导师。然而，现实的残酷性在于：他们虽“赏识”平民出身的于连的才干，却只把于连看作会说话的鹦鹉或忠实地摇头摆尾的宠犬，他们决不允许于连与他们为伍。

于连同德·瑞拉夫人偷偷相爱在维立叶尔社会看来，实属大逆不道。而于连和德·拉木尔侯爵之女玛特尔的相爱，尽管合法，但侯爵坚决反对。由于女人的苦缠，侯爵让步了，表示

愿意给于连二万埃居，并为之弄了一个骑士的头衔和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可这一切只是缓兵之计。等德·瑞拉夫人在教会压迫下写了告密信，告发“于连先生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他的最拿手的手段，就是“诱惑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从而“支配主人的财产”。于是，侯爵立即让于连去美洲，从此不准他们再往来。

冷峻的现实使他从五彩的云端栽进无底的深渊。恼羞成怒的他，立即从巴黎赶回维立叶尔，对他以前的情人德·瑞拉开了两枪：一枪穿过帽子，一枪击伤了肩骨。然而就是这并不致命的两枪，却使挑战者上了断头台。他没有为了未来的财富和美人而向贵族的法庭求饶，而是慷慨赴死。

《红与黑》的巨大魅力，还在于它极富艺术特色。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事实”。尽管他总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但他倾心的是人的“灵魂的辨证法”。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严肃地答道：“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泰纳赞誉他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者”。

司汤达笔下的德·瑞拉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和玛特尔的“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小说中的一个“创举”。在《论爱情》一书中，司汤达曾把爱情分为热情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他鄙视肉体之爱，认为“唯有热情之爱能使人幸福”。德·瑞拉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大约就是他所谓的“热情之爱”，而玛特尔的“头脑的爱情”则近于“虚荣之爱”。看来正是这样，于连终于被德·瑞拉夫人的纯真之情所融化，而与玛特尔在感情上始终存在隔膜。

不过，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

沉，一个狂热，她们在这两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温良柔弱的德·瑞拉夫人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必须有很大的勇气；大家闺秀的玛特尔不顾一切地嫁给一个平民，尤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对于连的爱都令人感到某种英雄的气息。正因为如此，当于连被处死以后，玛特尔竟然能镇静地打开一件蓝色大衣，捧起于连的头放在一张大理石的小桌上，亲吻它的前额。最后，她还坐上马车，膝盖上放着于连的头颅，来到墓地，亲手把它埋葬了。

【试　析】

毛泽东一生读过的西方小说并不算多，只有《罗米欧与朱丽叶》、《茶花女》、《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毁灭》、《母亲》、《红与黑》等几部。其中，《红与黑》是毛泽东读得最仔细的一部。他曾经把《红与黑》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说：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这固然有一些戏说的成份，但也能显现出毛泽东对《红与黑》的喜好与看重。

毛泽东曾与他的护士孟锦云就《红与黑》这部小说，特别是于连这个形象有过一番别开生面的精彩议论。

孟锦云原是一个文工团的演员，因为常陪中央首长跳舞而与毛泽东结识，后来调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有一天，正当她当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要她谈谈对《红与黑》的看法。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

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人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毛泽东听小孟这么一说，顿然来了兴致，十分自信而肯定地发表自己的宏论：“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那么，你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了？”

“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毛泽东呷了一口水，继续说下去：“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可我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不敢全说出来，想干的事躲躲闪闪不敢全做出来。你说他不安于职守，这点算你说对了，可那是什么职守？这和感情可是另一回事，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可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无足深怪嘛。”

“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啊。”小孟说。

毛泽东说：“感情的力量有时是不可战胜的，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头脑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就是想事的，你让他不想，除非他是个傻子。于连是知识分子嘛，脑子好使得很呢！你还说于连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得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

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的西方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里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假面舞会，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带个假面具跳。久而久之，谁都见怪不怪了。正像人的眼睛，从科学的观点上看，那图像应是倒着的。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正的呢？那也是习惯使然嘛。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觉得。所以，反的变成正的，正的呢，又成了反的，错的往往成了对的，对的又成了错的。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看，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就观不对。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建立家庭时都要将就将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合凑合。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

小孟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边笑边讲他那句名言：“不破不立嘛！”

听到这里，小孟又反驳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

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叹，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偶尔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又都在崖头上，看得见够不着，他只好爬，拼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停了一会，毛泽东突然问小孟：“如果于连是个有权有势的人，而那个夫人又是个穷人家的女奴，结果将会怎样?”

“那就好办了，于连就跟这个女奴呗。”

毛泽东最后说：“换个位置，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拉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毛泽东这一番巧解《红与黑》，为于连翻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启迪。做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看待于连这个形象时，更多地是从政治的、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分析。他从19世纪西方社会家庭的虚伪与残忍，肯定了于连帮助德·瑞拉夫人反抗家庭压迫的积极一面；从阶级较量、阶级斗争的角度，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于连的抗争与奋斗。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把于连的所作所为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从整个社会的阶级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确实高人一筹。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文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毛泽东和诗》，张贻玖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毛主席的书房》，张贻玖著，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册)，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白金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武在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传统下的毛泽东》，汪澍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广读天下书》，张贻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高狄主编，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

后　记

关于毛泽东读书评点的话题渐成读书界的一个新热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领域。本书对这个话题的探索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关于书的内容及编写体例，自有广大读者评说，在此就不多说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出版的大量图书报刊，特别是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书，给了本书直接的帮助。另外，如张贻玖编著的几部相关的书、王子今著的《毛泽东与中国史学》都给了本书的写作以很大的帮助，在此特别向这些书的作者与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不尽的毛泽东。对世纪伟人毛泽东的研究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了，我们将继续努力。

编者

1998 年 5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　　（下册）
作者=
页数=1356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